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 中苏关系 ——

第一卷
1945.1—1949.2

第二卷
1949.3—1950.7

第三卷
1950.8—1951.8

第四卷
1951.9—1954.1

第五卷
1954.2—1955.7

第六卷
1955.8—1956.9

第七卷
1956.10—1958.3

第八卷
1958.4—1959.10

第九卷
1959.10—1962.12

第十卷
1963.1—1964.11

第十一卷
1964.12—1969.6

第十二卷
1969.7—1991.12

主编
沈志华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

中苏关系

第一卷

1945.1—1949.2

中国出版集团 東方出版中心

《俄罗斯解密档案选编：中苏关系》编辑委员会

主　　编　沈志华

副 主 编　李丹慧　牛　军

编　　委　（以姓氏拼音为序）

陈宪良　崔海智　拉琴科（Sergey Radchenko）　李丹慧　刘　洋
娜丝佳（Anastasiya Bayok）　牛　军　沈志华

译 校 者　（以姓氏拼音为序）

白　桦　曹介民　曹　盟　陈春华　陈宪良　陈云卿　崔海智
戴怀亮　邓　莹　丁宝源　丁　明　樊家鼐　方　琼　冯　峥
高增训　耿葆贞　巩丽娜　古继坤　顾镜清　蒋华杰　李丹慧
李木兰　李　肃　李晓亮　李亚男　李娅妮　李永庆　李越常
刘令仪　刘名子　刘淑春　刘　洋　刘志青　刘仲亨　卢　睿
吕雪峰　吕允连　马善平　娜丝佳　牛　军　彭兴中　强正德
沈凌云　沈志华　师建军　宋　雪　邰浴日　唐松波　王宏达
王会朋　王　前　王　洋　王谊民　王英杰　吴安迪　肖　瑜
谢载福　徐晓村　严巧丽　杨世招　杨希钺　游　览　张好雨
张　坚　张建民　张健荣　张玲玲　张倩茹　张颂超　张秀钰
章若男　赵国顺　甄佳伟　钟舞春　周绍珩　朱丽云

出版前言

本档案集是2009年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课题《俄国中苏关系档案的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009DLS002)的研究成果，首席专家是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教授。该课题已于2013年3月提交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结项，专家鉴定意见为“优秀”。

收入本档案集的俄罗斯解密档案共有主文件2 262件，列为附件的有363件，总计2 625件。实际上，有关俄罗斯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是从1995年开始的，至今历时近20年。收入档案集的文件，是从我们收集并整理的4 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档案中挑选出来，并译成中文的。

这些档案文件涉及的时间范围从1945年抗日战争后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在这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中苏关系的发展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这段历史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一) 1945年至1949年，即抗日战争后期至新中国成立前夕。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国共双方对战后相互关系的设想和构建，反映了在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过程中，苏联的对华政策及苏共和中共的关系发生的重大变化。(二) 1949年至1957年，即中苏两党、两国结成紧密同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两国在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密切合作——苏联为中国的大规模建设提供了巨大援助，而中共则在政治上给予苏共支持和帮助。(三) 1958年至1979年，即中苏从两党分歧走向同盟破裂并最终导致两国严重对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中苏矛盾何以产生，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运问题的论战，以及中苏双方在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四)1980年至1991年，即中苏关系从紧张趋向缓和，最终走向正常化并因苏联解体而完结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档案反映了苏联对华政策的调整过程以及苏美中大三角关系的演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受到档案解密期的限制，第四阶段即中苏关系正常化时期的文件很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在国际关系史上，中苏关系不仅十分重要，也具有一些特殊性：一是中苏两国关系同中共、苏共两党关系密不可分；二是冷战前期，两国存在着紧密的同盟关系，是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在欧洲和亚洲最重要的国家。这使得这套档案的内容不仅涉及两国一般意义上的外交关系，而且大量涉及两国特别是中国的国内问题、中国的经济建设问题、双方的文化交流问题，等等。由于中苏两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地位，中苏关系也不可避免地涉及中苏两国与朝鲜、越南和蒙古这三个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冷战时代的两极格局中，美国始终是影响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这套档案也有不少反映中美关系、苏美关系和中美苏大三角关系变动的内容。此外，印度既是中国的邻国，也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成员和苏联竭力争取的对象，因此档案中也有不少反映中印关系的内容。

文件的形式包括：中苏两党和两国政府及领导人之间的往来电报、信函、照会；中苏两国领导人、外交人员及互访人员之间的会谈记录和谈话纪要等；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会议记录和会议报告；苏联部长会议、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主席团(政治局)的决议、指令、通知等；苏联驻华大使馆及外交部、安全部、国防部、国家计划委员会等相关部门和访华代表团呈送上级或党政领导机构的报告、请示、情报、通报等；苏共中央与东欧各国及朝鲜、越南、蒙古等国共产党有关部门之间的会谈记录、会议记录；苏联政府或苏共领导人与外国政府或外国共产党领导人之间的会谈记录和纪要；等等。

所有档案统一按照文件形成的时间排序，分为12卷，各卷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卷(1945年1月至1949年2月)：抗战结束前后中国政治军事形势、国共美苏四角关系、外蒙古独立问题、国共谈判、东北问题、国共停战问题、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内战、美苏关于中国形势的讨论、苏联在东北地区对中共的援助、美国对华政策、米高扬访问西柏坡、东北军管后各国领事馆问题等。

第二卷(1949年3月至1950年7月)：中国革命形势、苏联对华援助、中共与美国的接触、中国新政府筹备、中苏建交、新政府机构设置、新中国对外政策、台湾问题、中苏友好往来、毛泽东访苏、中朝关系、中蒙关系、中苏条约谈判、应对朝鲜战争爆发等。

第三卷(1950年8月至1951年8月)：朝鲜战争、中朝关系、中蒙关系、苏联对华援助等。

第四卷(1951年9月至1954年1月)：朝鲜战争、对日和约问题、朝鲜停战谈判、中苏关于旅顺基地和中长铁路的谈判、"一五"计划的制订和执行、中苏两党通报各自内部情况、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问题、缅甸共产党实行土改等情况。

第五卷(1954年2月至1955年7月)：高饶事件、日内瓦会议、制定1954年宪法、中苏贸易和苏联援华、胡风问题、第一次台海危机、万隆会议、筹备中共八大、留学生工作等。

第六卷(1955年8月至1956年9月)：苏联援建长江大桥、苏联参与修筑新疆铁路、苏联帮助中国发展核技术、苏共二十大、中国第二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改造、西藏民主改革、中国国内政治运动、中朝关系等。

第七卷(1956年10月至1958年3月)：波匈事件、中苏朝三角关系、"双百"方针、中共整风与知识分子问题、苏共马林科夫反党集团事件、中越关系、莫斯科会议、中蒙边界谈判、建立亚洲无核区的建议、关于台湾问题的情报、中国政治经济情况等。

第八卷(1958年4月至1959年10月)：南斯拉夫共产党七大、苏南关系、中东局势、经互会和华约情况通报、中日关系通报、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第二次台海危机、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苏联帮助中国制造导弹和建设海军、赫鲁晓夫两次访华、华沙大使级会谈通报、中蒙关系和中朝关系、苏联援华问题、西藏问题、中印关系、美苏关系通报、中苏科技合作、中国援助蒙古和朝鲜等。

第九卷(1959年10月至1962年12月)：中印关系、中印边界冲突、布加勒斯特会议、中朝苏三角关系、苏联撤退在华专家、中苏经济关系、中苏边界纠纷、苏联和阿尔巴尼亚关系、

中国经济困难、苏联对华援助、1960年莫斯科会议、各国共产党对中苏分歧的反应等。

第十卷(1963年1月至1964年11月):中苏分歧加剧、中苏两党高级会谈、中苏两党论战、各国共产党对论战的反应、赫鲁晓夫下台、周恩来访苏、马利诺夫斯基事件、中苏边界问题、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援助等。

第十一卷(1964年12月至1969年6月):印度尼西亚政变、第二次亚非会议、中苏在援越问题上的争端、中朝关系恶化、苏共二十三大、国际共运问题、支援民族解放运动问题、"文革"初期的中苏外交、中国"文革"情况、柬埔寨问题、中苏边界冲突等。

第十二卷(1969年7月至1991年12月):苏共对国际形势的调查与分析、中苏边界冲突、中美苏三角关系、印度支那和结束越战问题、中美关系正常化、"文革"后中国的形势和外交政策、澳门问题、中英关系和香港问题、延长《中苏同盟条约》问题、苏共中央关于对华政策的讨论、中苏会谈、苏联事变后的中苏关系走向等。

关于本档案集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有以下几点需要说明:

一、档案出处

本档案集所收入的文件主要出自以下俄罗斯档案馆:

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ХСД(TsKhSD),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原中央党务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后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

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ГАНИ(RGANI),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ГАЭ(RGAE),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RGASPI),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АРАН(ARAN),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ВПРФ(AVPRF),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АМОРФ(TsAMORF),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档案馆,АНБРФ(ANBRF),Архив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ГАРФ(GARF),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ПРФ(APRF),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RTsKhIDNI)，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原苏共中央档案馆(主要收藏1952年以前的文件)，1999年3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ГАСПИ)；

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国家档案馆，ГАХК(GAKhK)，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Края；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ЦГАРК(TsGARK)，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中央档案馆，ЦГАКР(TsGAKR)，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Кыргыз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二、档案收集

这些档案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实际上是从1995年开始的。十几年来，我们一直跟踪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开放和公布的进程，并注意从各种渠道收集有关的解密文件。其主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直接在俄罗斯档案馆复制(主要是复印，也有少量手抄)的档案，这包括当代文献保管中心、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等。在20世纪90年代，这是我们得到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2. 在收集俄罗斯档案方面，美国学术机构是领先的，它们投入重金大量复制并收藏俄罗斯档案，其中与冷战时期中苏关系相关档案的收藏，主要集中在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The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国家安全档案馆(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哈佛大学拉蒙特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Lamont Library)。在我们收集档案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俄国档案的开放政策收缩以后，这些学术机构收藏的纸质文件和缩微胶卷就成为重要的来源。此外，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Stanford University，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日本北海道大学斯拉夫研究中心(Slavic-Eurasian Research Center of Hokkaido University)、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也收藏了一批相关的俄罗斯档案。

3. 进入21世纪以后，俄罗斯对其档案馆的管制愈加严格和保守，使用者(特别是外国学者)已经很难在那里寻找和复制文件。所幸的是，与此同时，俄罗斯学术机构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各种专题的档案集，其中涉及中苏关系的主要有(以出版时间为序)：

Вартанов В. Н. Война в Корее 1950 - 1953 гг.: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Москва，1997(关于1950—1953年在朝鲜的战争：文献资料)；

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苏联与1956年的匈牙利危机：文件集)；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1952,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1999(中国命运中的苏联与斯大林,文件与当事人的见证);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I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1937－1945гг., Книга1: 1937－1944гг.; Книга 2: 1945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0(20世纪俄中关系史: 文献与资料,第四卷);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1, 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3(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速记记录草稿,1954—1964年,第一卷);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XX веке,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Том V,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е, 1946－февраль 1950, Книга 1: 1946－1948гг., Книга 2: 1949－февраль 1950гг.,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5(20世纪俄中关系史: 文献与资料,第五卷);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2,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1958,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6(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4—1958年);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ы, Москва: МФД, 2007(赫鲁晓夫,1964年: 苏共中央全会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

Стаф Т. А. (*ред.*) Совет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Годы разрядки 1969－1976,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ом 1, 1969－май 1972, Книга 2, январь-май 1972,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2007(缓和年代的苏美关系,第一卷);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а.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1964, Том 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9－1964, Москва: РОССПЭН, 2008(苏共中央主席团决议,1959－1964年);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1, 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9(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集,第一卷);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е годы,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т. 2, 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10(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件集,第二卷)。

此外,在俄罗斯学术刊物中也发表了大量的专题档案文献,其中不少涉及中苏关系。这主要是《史料》(*Источник*)、《历史档案》(*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远东问题》(*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近现代史》(*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等。

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冷战国际史的权威刊物,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冷战国际史项目公报(*CWIHP Bulletin*)及网站也公布了大量译成英文的俄罗斯原始档案。

进入21世纪后，俄罗斯和美国的出版物及网站已经成为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主要渠道。

4.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收集俄罗斯档案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学者和朋友的帮助，尤其是他们当中有些人把自己收藏的俄罗斯档案毫无保留地提供我们，如中国大陆学者李静杰，中国台湾学者余敏玲，俄罗斯学者谢尔盖·拉琴科(Sergey A. Radchenko)、谢尔盖·贡恰罗夫(Sergei N. Goncharov)，美国学者凯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马意莉(Elizabeth McGuire)、裴斗虎(Gregg Brazinsky)，加拿大学者吕德量(Lorenz M. Luthi)，日本学者下斗米伸夫(Nobuo Shimotomai)，匈牙利学者王俊义(Peter Vamos)，塞尔维亚学者周万(Jovan Cavoski)，以及旅美华人学者刘晓东等。

三、编辑体例

1. 文件编号

每个主文件前面都标有编号(№)，这是在收集档案时的随机编号，以便于在翻译和编辑时查找档案原文，而与档案的编排顺序无关。

2. 文件标题

每个主文件的标题都是编者根据档案的内容和形式编写的，其原则是通过标题即可了解该档案的大意。

3. 文件日期

每个主文件的日期都是编者根据档案内容确定的，其原则是以文件产生的时间为准，如会议的召开、决议的做出、函电(指令、通知)的发出、报告的提交(或完成)等。对于无法确定的日期，则根据具体内容确定一个大致的时间范围。

4. 人名翻译

外国人名的翻译，主要依据以下工具书：辛华编《俄语姓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新华通讯社编《苏联人物资料》(1972年)、《苏联军事百科全书(人物志)》(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3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的人名(主要是朝鲜、越南、泰国、印尼等国的人名)，按照音译。

中国人名的翻译，音译后对照以下工具书进行确定：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版)、刘继增等主编《中国国民党名人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4、5、6卷及附卷1—4(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或无法确定的人名，按照音译，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所有档案中出现的人名，均作为附录列入人名译名对照表，以便读者核查。

5. 地名翻译

地名的翻译，主要依据《苏联地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俄汉世界地名译

名手册》(知识出版社 1990 年版)、《俄汉地名形容词译名手册》(商务印书馆 1999 年版)等。工具书中没有收入且无法确认的地名,按照音译处理,并在译稿正文中保留原文。

6. 注释

在原始档案(主要是专题报告)中含有少量注释,均移入正文相应位置的括号中。

出版物中发表的档案,原编者加有不少注释,我们根据需要保留了其中部分内容,在注释中以“原注”标示。

译者所加注释标示为“译注”,主要用于说明翻译的情况。

本档案集编辑时所加的注释分为两类:一类用于对原文和译文处理的说明,一类用于对人物、事件或专有名词的必要解释,均标示为“编注”。

7. 批注

档案文献中有大量的手写批注,了解其内容可以知道该文件处理的结果,从而进一步了解苏联领导人或相关机构的倾向性意见。可惜的是,批注意见都是手写的,大多数字迹潦草,难以辨认。我们尽可能地把批注的内容翻译出来,以“手写批注”的方式置于文件末尾。

8. 文件出处

所有文件最后都标有出处,但情况有所不同。多数文件标示的是原始档案的馆藏号,但也有一些文件的馆藏号缺失,其原因:一是在收集档案的初期缺乏经验,没有专门复印或抄录馆藏号;一是俄罗斯或美国出版物公布该档案时未附馆藏号。对于前者,我们将所有收集来的原始档案散件(包括部分出版物公布的档案)均按照时间和专题进行了整理,并已编印成册,即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 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 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 卷),故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这些复印件汇编的卷次和页码。对于后者,则标示的是原出版物的刊号和页码。此外,还有少数从网站下载的档案,其文件出处标示的是公布该档案的网址。总之,这里刊出的档案译文,无论是否附有原始档案馆藏号,都标明了其出处,都是有据可查的。所有这些档案的俄文复制件,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免费对外开放。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刊出的档案文件时间跨度大,涉及内容庞杂,且译者的水平参差不齐,虽经两次校对及统稿编辑,但在翻译和编排方面,肯定仍存在不少舛误和缺陷。所以,一方面我们希望这些文件能够为相关教学和研究提供有益的参考资料,另一方面也要指出,如果在研究中需要引用这些文件,请务必核对原文。

本书编辑委员会

2014 年 5 月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沈志华

中苏关系的历史，无论在历史学界还是在政治学界，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是备受研究者关注的领域，特别是在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后的今天，尤其如此。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解体，整个世界基本上都处于冷战或受其影响的状态中。在这半个多世纪里，从世界政治格局或国际关系形态看，冷战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其中包含着两次重大变化，或可称之为“转型”。总的说来，1947年春夏至1949年底是冷战的初期，其范围限于欧洲，而内容则是以美苏之间的对抗为核心；1950年初至60年代末是冷战的中期，其范围扩展到全球，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在欧亚大陆连成一片，而资本主义阵营则构造了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大西洋包围圈，同时，双方争夺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角力也开始升温；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是冷战的后期，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了大分裂、大改组，不结盟运动方兴未艾，中国退出原来意义上的冷战，而美苏争夺则在缓和对话与军备竞赛中愈演愈烈，最终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稍微仔细地观察便可发现，冷战的这两次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变化有着直接的、密切的关系：第一次转型是由于中国选择了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同盟形成并联手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第二次转型则在于中苏同盟的破裂，中苏两国领导人决心分道扬镳。换句话说，作为一种国际格局或形态，冷战的转型与中苏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是同步的，中苏同盟的兴衰是冷战时期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现象之一，而中苏同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冷战的结局。原因在于，中苏关系是战后整个国际格局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在许多方面决定着冷战时期世界舞台上力量的总的配置和对比。这一现象自然会引起研究者的兴趣：中苏同盟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破裂的？看似强大而牢固的中苏同盟为何只存在了短短几年？昨天还亲如兄弟的中苏两国怎会突然兵戎相见？中苏关系的演变与冷战转型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冷战以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的方式结束，还引起人们对另一个理论问题的思考，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道路问题。苏联是第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为指导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冷战兴起以后，首先是一系列东欧国家和亚洲的蒙古、朝鲜被苏联拉入社会主义阵营，接着是中国和越南、古巴等共产党夺取政权的国家主动加入社会主义阵营。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所有这些国家都仿照苏联模式确定了本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冷战的整个过程中，社会主义阵营不断分化的结果，导致阵营内部各国重新思考和选择自己的发展模式。1948年，南斯拉夫第一个被苏联革除“教门”，走上了对内实现工人自

治、对外倡导不结盟运动的独立发展道路。1956年的波匈事件表明了东欧诸国对以斯大林模式为代表的苏联道路的怀疑和反叛。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裂，中国共产党宣布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试验后，最终选择了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走上了一条与苏联不同的道路。而紧跟苏联的东欧国家则在1980年代开始出现剧变，逐步抛弃苏联模式，实现了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的转型。最后，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旗手，苏联自身也仿效东欧各国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么，在这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中，中苏关系的破裂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无论是从国际关系理论角度回答同盟理论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主义理论角度回答发展道路的问题，人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历史事实。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冷战结束以来的研究表明，人们过去对中苏关系史的基本叙事存在重大缺陷和舛误。

中苏同盟形成、发展和破裂的历史过程，一直是国际学界关注的研究课题。早在1960年代中苏同盟最终瓦解之前，西方的政治学家已经开始对此著书立说。①在此后的20年间，历史学家如滚雪球般地加入了中苏关系的研究行列，研究成果不胜枚举。②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存在着先天性缺陷。从苏联和中国方面来说，学术性研究还根本谈不上，即使有个别著作出现，囿于意识形态的偏向，也不过是相互指责对方，为己方的政策辩护而已。③至于西方学者，其局限性则在于看不到相关的档案文献。对于铁幕另一边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研究者只能依据报纸杂志上的公开资料去推理和猜测。作为直接的研究对象，苏联和中国的档案文献长期封存，有关这方面的原始材料根本无法为一般学者所利用，这是阻碍历史研究开展的最主要的原因。及至1991年冷战结束，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俄国在冷战结束初期大规模地解密和开放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这一现象曾被认为是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次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革命”，令各国学者欢欣鼓舞、兴奋不已。④不过，到90年代中期以后，许多已经开放的俄罗斯档案对于外国学者再度封存，不仅国防部和克格勃档案馆门禁森严，就是以前开放的外交部和苏共中央档案馆，也令国外研究者望而却步。当然，政府的控制已经无法改变俄罗斯档案开放并得到广泛利用的大趋势，目前涉及冷战时期中苏关系历史的俄罗斯档案主要有三个来源。

---

① 例如：R. L. Garthoff, *Sino-Soviet Military Relations*, London, 1966; C. J. Zablocki(ed.), *Sino-Soviet Rivalry: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New York, 1966; R. A. Rupen and R. Farrell(eds.), *Vietnam and the Sino-Soviet Dispute*, New York, 1967; M. Halperin(ed.), *Sino-Soviet Relations and Arms Control*, Cambridge, 1967; W. C. Jr. Clemens, *The Arms Race and Sino-Soviet Relations*, Stanford, 1968。

② 只要在稍具规模的图书馆的书目索引中查询Sino-Soviet一词，出现的相关论著就会令人目不暇接。

③ 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苏共中央两位官员的化名著作：*Борисов О. Б.*, *Колосков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1945-1980,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плыство《Мысль》,1980。中译本见：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肖东川、谭实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鲍里索夫即苏共中央联络部第一副部长О. Б. 罗满宁，科洛斯科夫则是苏共中央国际部处长Б. Т. 库利克。

④ 关于俄罗斯档案的开放和利用的情况介绍，参见Mark Kramer, “Archival Research in Moscow: Progress and Pitfall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CWIHP) Bulletin*, Issue 3, Fall 1993, pp. 18-39；沈志华：《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第136—149页；余敏玲：《俄国主要档案馆现状简介》，(台北)《近代中国》第140期(2000年)，第200—217页。

第一，俄罗斯学者利用近水楼台和内外有别的便利条件，在各种刊物上陆续披露了一些解密文件。这些档案文件多是中苏两党领导人之间的谈话记录、备忘录、电报及相关机构的报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46—1948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往来的函电①，1949年1月斯大林与毛泽东关于和谈的往来电报②，米高扬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西柏坡的报告③，有关1949年6—8月刘少奇秘密访问莫斯科的文件④，有关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会谈的文件⑤，朝鲜战争期间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往来电报⑥，1951—1957年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的谈话记录⑦，1958年夏天和1959年秋天赫鲁晓夫两次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⑧，以及1962—1965年中苏关系恶化时的有关文件⑨。这批文件数量有限，未成系统，且常带有公布者的主观色彩。如俄罗斯学者列多夫斯基利用其在俄罗斯的特殊地位，经常在各种刊物披露经他本人挑选的档案，同时发表自己对这些文件的解读。这种挑选和解读往往表现了披露者个人的主观意识，未必能够全面和客观地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⑩不过，这种缺陷并不否定这些档案文献本身的重要性和真实性⑪，况且其中有许多文件迄今为止尚属唯一的版本。

---

①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Кит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прежнему остается сложным, Письмо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В. Сталину, 1946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4, с. 4－13;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Две телеграммы 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Мао Цзэдуна с И. В. Сталины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6, с. 117－122;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Еще раз о телеграмме Мао Цзэдуна И. В. Сталину от 30 ноября 1947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1, №5, с. 119－122.

② *Тихвинский С. Л.* Перепис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январе 194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4, №4－5, с. 132－140.

③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екретная миссия А. И. Микояна в Китай (январь-февраль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5, №2, с. 96－111; №3, с. 94－105.

④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Визит в Москву делегаци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Китая в июне-августе 1949г.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6, №4, с. 66－83; №5, с. 84－94.

⑤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И. В. Стал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в декабре 1949г. — феврале 1950г. Новые архив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7, №1, с. 23－47;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12 советов И. В. Сталина руководству компартии Китая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4, №1, с. 125－131.

⑥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талин, Мао Цзэдун и корейская война, 1950－1953 годов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5, №5, с. 79－113.

⑦ *Бухерт В. Г.* П. Ф. Юдин о беседах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докладные записки И. В. Сталину и Н. С. Хрущеву, 1951－1957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4, с. 14－28; *Григорьев А.*, *Зазерская Т.* Мао Цзэдун о кита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е Коминтерна и Сталина, Запись беседы П. Юдин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4, №5, с. 101－111.

⑧ *Зубок В. М.* Переговоры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Мао Цзэдуном 31 июля－3 августа 1958г. и 2 октября 1959г.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2001, №1, 100－128; №2, с. 94－106.

⑨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Ваше письмо зовет к сплочению — и это хорошо. Из служебного дневника посла СССР в КНР С. В. Червоненко, 1960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5, с. 3－11; *Прозуменщиков М. Ю.* Спор идет о слишком больших вещах. Неуавшаяся попыта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ого примиреня, 1964－1965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2006, №5, с. 12－27; 2007, №1, с. 3－24.

⑩ 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沈志华：《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二章第三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⑪ 例如，列多夫斯基关于米高扬秘密访华的文章发表后，因米高扬在报告中说中共曾提出掌握政权后将把民主党派赶下政治舞台的说法，与中共当时的实际做法及中共在党内文件中表述的对待资产阶级党派的立场完全不同，便有人撰文对此提出质疑，甚至直接否认俄罗斯档案的真实性。见薛衔天、王晶：《关于米高扬访问西柏坡问题——评〈米高扬访华秘密使命〉》，《近代史研究》1996年第3期；田松年：《与民主党派长期合作是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的基本政策》，《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沈正乐：《"米高扬报告"中关于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质疑》，《中共党史研究》1999年第6期；张士义：《米高扬"报告"质疑》，《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1期。笔者对此问题的看法详见《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在俄罗斯档案馆采取收缩政策以后，俄罗斯学者及研究机构陆续编辑和出版了大量专题性档案集，其中有些内容涉及中苏关系，如有关苏共二十大和匈牙利事件的文件①；有些本身就是以冷战时期中苏关系为主题的。2000年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РАН)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俄中关系：文献与资料》第四卷第二册，2004年又编辑出版了第五卷(分两册)，这三本档案集公布的1945—1950年中苏关系档案资料共815件之多，此外还有作为附录的几十个文件。②其中有关中苏领导人接触的50份最新文件已译成英文在美国发表。③此外，作为苏共高层决策的档案，2002年出版了1945—1953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苏联部长会议的部分历史文件④，2007年出版了1964年苏共中央全会的速记记录及其他文献⑤，2003—2008年分三卷出版了1954—1964年苏共中央主席团的部分会议记录和决议⑥，其中有不少文件是有关中国或中共问题的。显然，这些档案对于了解苏联对华政策的决策过程都是至关重要的。最后，2009年和2010年，远东所又编辑出版了两卷文献集《50年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部是涉及中苏关系的苏联文件资料。⑦

第三，俄罗斯档案馆开放初期，许多国外学者或研究机构纷纷赶赴莫斯科收集档案，尤其美国的一些研究机构捷足先登，花重金复制了大量俄罗斯历史档案，其中专门收集冷战时期档案文献的主要有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国家安全档案馆(Th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此外，国会图书馆(Library of Congress)、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图书馆和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tanford University)也收藏了大量俄罗斯档案。笔者1993年放弃生意、返回学界时，听到俄罗斯档案开放的消息，便倡议中国的历史研究者，特别是苏联史研究者，立即着手收集俄罗斯档案。

---

① *Аймермахер К.* Доклад Н. С. Хрущева 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Волков В. К. и т. д.*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1998. 值得提到的是，利用保存在俄罗斯档案馆的文件编辑的《季米特洛夫日记》，也有许多涉及中国和中共问题的重要资料。见 *Димиитров Г.* Дневник (9 март 1933 - 6 феврари 1949)，София：Универсстетсйо издарелство "Св. Климент Охридски"，1997。

②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I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37 - 1945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0；*Ледовский А. М.*，*Мировицкая Р. А.*，*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ост.*)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XX веке，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Т. V，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1946 - февраль 1950，К. 1：1946 - 1948гг.；К. 2：1949 - февраль 1950гг.，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5.

③ *CWIHP Bulletin*，Issues 16，Winter 2007/2008，pp. 113 - 177.

④ *Хлевнюк О. В.*，*Горлицкий Й.*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 и совет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1945 - 1953，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2. 直到1952年10月十九大召开前，苏共的正式名称应为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为叙述方便，本书在一般情况下都使用"苏共"一词。

⑤ *Артизов А. Н. и др.* (*сост.*)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1964.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е документы，Москва：МФД，2007.

⑥ *Фурсенко А. А.* (*гл. ред.*)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1954 - 1964，Том 1，Черновые протокольны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стенограммы，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3；Том 2，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54 - 1958，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6；Том 3.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1959 - 1964，Москва：РОССПЭН，2008.

⑦ *Мясников В. С.* (*под ред.*) Китай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в 1950 - 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т. 1，Взгляд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ученых，т. 2，Друг с союзник нового Китая，Москва：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2009、2010.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王忍之的支持下,笔者与李丹慧、闻一、薛衔天、杨建国等中国学者曾数次自费前往俄罗斯和美国,专程收集俄罗斯解密档案。由于俄罗斯在档案管理体制上存在的固有弊端,以及相关政策变幻莫测,档案文献的开放和利用时松时紧,所以在那里工作难度很大。特别是对于外国学者来说,把握机会极为不易。

从档案收集的结果和国外学者在论著中使用的情况看,涉及中苏关系的档案文件主要收藏于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①、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②、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和研究中心(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③、当代文献保管中心(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④、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Экономики)、俄罗斯科学院档案馆(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以及俄罗斯联邦国防部中央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以这种方式收集的档案文件虽然显得分散凌乱,查找起来也颇费工夫,但其最大的好处是研究者自己有选择权,而不会受制于人。在此基础上,笔者带领手下博士生已将这些档案的原文复印件按照专题整理成册,以便中国学者利用。⑤其中,一些涉及中苏关系的重要文件已经译成中文在各专业杂志上陆续发表。⑥

随着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并作为史料摆上历史学家的案头,中苏关系史再次成为国际史学界,特别是冷战史领域研究的热点。1997 年 10 月,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东方历史学会的前身)、当代中国研究所和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在北京联合举办了一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 6 个国家的近 30 名学者。会议上,各国学者之间的充分交流,学者与中苏双方当事人的直接对话,双边乃至多边档案的综合利用——所有这些新的形式和内容,在中国打开了冷战后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新的历程。会后,一批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陆续问世。在这次会议讨论的基础上,分别以英文和中文出

---

① 原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

② 原苏联外交部档案馆。

③ 原中央党务档案馆,1999 年 3 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④ 原苏共中央档案馆,1999 年 3 月改名为俄罗斯国家当代史档案馆(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⑤ 其中包括沈志华、李丹慧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22 卷),沈志华收集和整理的《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朝鲜战争》(17 卷)、《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苏联历史》(26 卷)。这些原始文件汇编均未出版,现存华东师范大学文献史料中心(上海闵行)。

⑥ 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时期中苏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世界历史年刊》1997 年号;《关于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俄国档案文献》,《国外当代中国研究动态》1997 年第 1 期;《关于 1949 年刘少奇访苏的俄国档案文献》,《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2 期;《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会谈)》,《党史研究资料》1998 年第 4 期;《关于 1950 年中苏条约谈判的部分俄国档案文献(条约)》,《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67 辑(1998 年 9 月);《〈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中共党史研究》2001 年第 5 期;《建国前夕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部分俄国档案》,《党的文献》2002 年第 1 期、第 2 期;《关于在华苏联专家问题(俄国档案文献选编)》,《中共党史资料》总第 82 辑(2002 年 5 月);《关于苏联对华经济援助的俄国档案文献(1953—1959)》,《国际冷战史研究资料》第 1 辑(2003 年);《关于朝鲜停战谈判最后阶段的俄国档案文献》,《中共党史资料》2003 年第 4 期。

版了两部论文集，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研究的最新成果。[①]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成立后，特别关注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并于2007年和2009年再次与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冷战国际史项目合作，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题国际研讨会。这两次会议都集中了世界各国研究中苏关系史前沿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和领域，并充分利用已经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文献，探讨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②]

冷战结束以后，各国学者充分利用俄国解密档案考察中苏关系的专著也陆续问世。

在俄罗斯，综合性专著的作者大体上都是负责对华事务的职业外交官或苏共干部，他们的论述还带有较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以往苏联政策进行辩护的。不过，其史料价值还是不容忽视的。[③]在专题性著作中，比较集中讨论的是中苏边界问题[④]，涉及的其他领域还有新疆问题、在华苏联专家问题及中苏科学技术合作等。[⑤]这些专题性研究著作的学术性较强，很有参考价值。不过总体看来，俄罗斯本身在这方面的研究几乎都是老一辈学者在支撑，很少看到有青年学者跟进，故颇有青黄不接之虞。

在西方出版的论著中，德国学者海因茨希对中苏同盟建立过程的讨论，最为详尽地使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⑥]美国学者魏丽莎分析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对华政策，所使用的主要也是俄罗斯档案。[⑦]几年前，以英文出版了两部充分利用俄罗斯档案、集中讨论中苏关系的专著，很有学术分量，即丹麦学者吕德量（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和俄罗斯学者拉琴科（诺丁汉大学宁波分校）的《天有二日：中苏对领导权的争夺》，这两本书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中苏同盟破裂的过程及其原因。[⑧]此外，笔者还看到两部很有

---

① Odd Arne Westad(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 - 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李丹慧编：《北京与莫斯科：从联盟走向对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 这两次讨论中苏关系历史的会议均有论文集，一本正在编辑中，一本已经出版了中文本，见沈志华、李滨(Douglas Stiffler)主编：《脆弱的联盟：冷战与中苏关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③ *Брежнев А. А.* Китай: тернистый путь к добрососедству,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98; *Ледовский А. М.* СССР и Сталин в судьбах Китая, Документы и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а участника событий 1937 - 1952, Москва: НИМ РАН, 1999; *Кулик Б. Т.*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раскол: причины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Москва: ИДВ РАН, 2000; *Рахманин О. Б.* К истор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России-СССР с Китаем в XX веке, Обзор и анализ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2.

④ *Ткаченко Б. И.* Россия — Китай: восточная границ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и фактах, Владивосток: Уссури, 1999; *Мясников В. С.*, *Степанов Е. Д.* Границы Китая: 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Москва: Памятник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 2001; *Попов И. М.*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300 лет на грани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Рябушкин Д. С.* Мифы Даманского,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2004; *Ивасита А.* 4000 километров проблем: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ая границ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СТ, Восток-Запад, 2006.

⑤ *Бармин В. А.* Синьцзян в советско-китай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ях 1941 - 1949гг., Барнаул: Изд-во БГПУ, 1999; *Зазерская Т. Г.* Советские специалисты и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Китая (1949 - 1960годы),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НИИХ СПбГУ, 2000; *Мартыненко В. П.* (*ред.*)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ие научные связи: проблемы становл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гск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истории РАН, 2005.

⑥ 原文为德文，中译本见迪特·海因茨希：《中苏走向同盟的艰难历程》，张文武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⑦ Elizabeth Wishnick, *Mending Fences: The Evolution of Moscow's China Policy from Brezhnev to Yeltsin*,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⑧ Lorenz Lü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 - 1967*, Washington D.C. & Stanford: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意思的未刊英文书稿，其作者都是美国的年轻学者。马意莉通过发掘有关中国早期革命的俄罗斯档案，广泛利用对当事人的采访及对伊万诺娃国际儿童院的实地考察，讲述了中共领导人及其子女在苏联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从而对中国革命如何与苏联结下不解之缘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李滨则利用大量俄罗斯档案及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史档案材料，讨论了苏联如何帮助中国建立、发展教育事业，其内容和观点都十分吸引人。①

俄罗斯档案的解密也引起了中国学者的普遍关注，且成为他们研究中苏关系的主要史料来源。除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外，在这方面比较突出的综合性学术著作有薛衔天的《中苏关系史(1945—1949)》，沈志华、李丹慧的《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以及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牛军合著的《中苏关系史纲》。②此外，还有一些涉及科学技术、教育、经济、苏联专家和朝鲜战争的专题性研究著作。③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苏关系史乃至整个冷战国际史研究至今取得的成就，首先应该归功于1990年代初开始的那场“档案革命”，其次才是学者的努力。为了推动中国学界有关中苏关系史以及国际共运史、中国当代史的研究，笔者与李丹慧、牛军提出了收集、整理和翻译相关俄罗斯解密档案的课题，并于2009年得到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批准，作为上海市的重大课题立项。

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课题组对收集到的4 000多件涉及中国问题的俄罗斯解密档案进行了整理，主要是确定文件的时间及相互间的从属关系，然后挑出其中2 500多个文件(含附件)组织了中文翻译。考虑到在中国已有研究机构正在从事涉及1945年以前中苏关系历史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工作，我们所选文件的时间跨度确定为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至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从内容上讲，则主要是挑选那些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档案。

这批以中文形式出版的俄罗斯档案文献，对中国学界的历史学研究，尤其是中苏关系史、冷战国际史乃至当代中国史，无疑将产生重大的推动和影响。实际上，作为课题组的首席专家和主要成员，我们在组织整理和翻译这批档案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近水楼台的便利条件开始了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牛军完成了《冷战与新中国外交的缘起(1949—1955)》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写作，笔者完成了《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写作，李丹慧则即将完

① Elizabeth McGuire, The Sino-Soviet Romance: How Chinese Communists Fell in Love With Russia, Russians,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10; Douglas Stiffler, *Building Socialism at Chinese People's University: Chinese Cadres and Soviet Expert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 - 1957*.

② 薛衔天：《中苏关系史(1945—1949)》，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增订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③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李涛：《借鉴与发展——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2000年版；《苏联专家在中国》(修订版)，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修订版)，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成《无悔的分手：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60—1973)》一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出版)的写作。在我们看来，由于过去历史叙述存在的诸多舛误和片面性，史学研究者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历史的过程梳理清楚。否则，其他一切讨论和分析都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正是因为大量使用了俄罗斯解密档案(自然也会结合对中国档案文献的考察)，作者在研究中苏关系史和中国外交史的过程中才会有新的发现、新的解读，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不同以往的看法或解释。

有关中苏同盟的起源及其发展和演变，笔者提出了如下一些值得注意的观点：

1. 在战后美苏关系从合作走向冷战的过程中，美、苏与国、共三国四方在中国大陆的争斗，呈现出一种奇特的现象。与人们的想象和成见相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的一段时间里，中共与苏共既没有结盟的愿望，也没有结盟的行动。毛泽东开始曾设想依靠美国的帮助，而苏联最初看中的合作伙伴是蒋介石。后来，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以及蒋介石的反苏倾向，迫使斯大林与毛泽东走到了一起。特别是在美苏之间冷战态势逐步形成的背景下，这三国四方相互关系的格局才固定下来。因此，中国内战的爆发并非冷战的结果，也不能说冷战是在亚洲首先出现的。不过，冷战格局的出现对于中国内战的结果确实存在很大影响。在某种意义上讲，中苏同盟和美蒋同盟都是他们在最后关头迫不得已做出的选择。由此还可以看到，意识形态并非中苏结盟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并不排除他们把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作为工具加以利用。

2. 在史学界有关中美关系的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所谓“失去机会”讨论，在此前参与讨论的美国学者和中国学者，虽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美关系的表象及其实质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但基本上都是从美国对华政策的角度考虑问题，而忽视了一个对于中美关系发展趋势同样发挥重要影响的因素，即中共对美国的立场和态度的转变，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是中共与苏联关系的变化。事实上，当1944—1946年中共与苏联的关系尚未确定的时候，的确存在一个美国与中共交好并发展关系的“机会”，但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的原因，这个机会失去了。到1949年，中共即将取得内战胜利的时候，情况已经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斯大林开始对中共采取积极的立场，毛泽东也愈来愈寻求莫斯科的支持和帮助。中苏之间建立新的同盟关系(即中共与苏联的同盟)的趋势逐步显现出来。由于中共的倾向性立场和政策已经确定，并长期在党内进行这方面的宣传和教育，从而为中共以革命的名义取得政权建立了合法化的基础，此时此地，美国决策者内部无论发生怎样的变化、采取怎样的措施，也无法改善与中共的关系了，所以到1949年根本就不存在中共政权与美国政府和解的“机会”。

3. 中苏同盟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之间的确存在着紧密联系，但是与以往人们的理解不同，斯大林决心发动战争并非是认为有了强大的中国盟友(其实当时的中国也根本谈不上强大)以及他们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其实斯大林在本质上并不承认中国经验的普遍性)就可以在亚洲反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了。恰恰相反，笔者推断，中苏同盟条约签订的结果使得苏联即将失去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为了保证苏联战后远东战略得以继续维持下去，斯大林很可能开始考虑重新建立苏联在亚洲的战略基地，而朝鲜半岛就是他选中的

目标。恰在此时，白宫表明了朝鲜半岛不在美国远东防御线之内的立场，加之金日成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从而除却了斯大林内心的最大忌惮，至少使他感到风险已经大大降低。所以，笔者认为导致朝鲜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不是中苏同盟建立本身的必然要求，而是在这一同盟建立过程中双方利益冲突的结果。

4. 如何解释毛泽东力排众议，在万分危急和困难的情况下，非要派兵入朝作战的动机，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笔者的看法是，毛泽东的考虑不同于其他中国领导人的地方在于，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从中国的边境安全和一般理解的国家利益出发的。中国出兵能够保证边境安全的前提是出战必胜，否则作战的结果只能给中国带来更加不安全的因素，而一般中国领导人反对出兵的理由恰恰是认为与美国作战没有胜利的把握。作为一个革命领袖，毛泽东的眼光早已超出了中国的范围，他考虑的是亚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况且他对朝鲜前途和亚洲革命还负有直接的责任。至于国家利益，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革命政权，否则这个国家对于他就没有意义，而当时能够保证中共革命政权的就是中苏同盟，就是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苏同盟条约签订以后，斯大林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极度不满和不信任，这一点或许别人没有看出来，但毛泽东心里十分清楚。所以，尽管内心对绑架中国的做法十分不满，但是在苏联和朝鲜需要中国出兵时，无论军事上成败如何，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毛泽东都不得不做出兵朝鲜的决断。唯其如此，莫斯科和中苏同盟条约才能保证中共新政权的稳定和发展。事实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完全正确的。

5. 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同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主要推动力是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因自身在党内地位不稳，能力又有限，迫切需要中共的支持和帮助，而毛泽东面对战争硝烟散去后经济发展的难题，也不得不依赖苏共，全盘照搬苏联的经验。于是，中苏同盟在内部急迫的相互需求中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在这个阶段，中苏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与夺取政权之前中共只是单方面接受苏共的援助不同，此时的中国也为苏联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帮助。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和大批苏联专家的到来，为中国的现代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中共在"波匈事件"和苏共"六月事件"中对赫鲁晓夫的支持则为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和稳定苏共党内局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6. 与以往人们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苏共二十大并非中苏同盟破裂的起点，相反，在对内发展经济、对外寻求和平方面，苏共二十大与中共八大的方针路线完全是一致的。至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毛泽东在内心是支持和欢迎的，因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搬掉了长期压在中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但同时中共也为此感到不安，因为这毕竟"捅了娄子"，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了思想混乱。所以，毛泽东主张对斯大林"三七开"，支持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而不愿在一般意义上反对个人崇拜。中共中央的态度为稳定社会主义阵营发挥了重要作用。不过，在苏联的压力和影响下，中共八大不再提毛泽东思想，则为日后毛泽东批判苏共二十大路线埋下了伏笔。

7. 1957 年莫斯科会议对于中苏关系的意义，长期没有引起研究者的重视。笔者的考察，不仅厘清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方式从建立国际机构向举办国际会议的转变过程，

而且指出了这次会议在中苏同盟发展进程中的标志性意义：《莫斯科宣言》是中苏两党政治合作的经典之作，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机制已经从斯大林时代的苏共一党独大变成了中苏两党平起平坐、共同指挥。中苏关系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达到了最高峰，而中苏之间的分歧也由此发端。引起苏共和东欧各党不满的主要有两点，即毛泽东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自居的高傲的态度，以及对世界大战和核战争前景的"耸人听闻"的表达方式。

8. 从逻辑上讲，中苏同盟的破裂首先是因为它们之间出现了分歧，但是这种分歧最初并不是表现在意识形态或国家利益方面的冲突，而是反映在1958—1959年中苏对内、对外政策方面的不合。苏共对中共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心存不满和疑虑，引起毛泽东的强烈反应，而中共在台湾海峡危机、中印边境冲突中的做法则令莫斯科十分恼怒，特别是在赫鲁晓夫访美和美苏缓和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分歧更加尖锐地表现出来。当毛泽东和中共处于政治上升期，并对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提出挑战时，这种分歧是无法弥合的，其结果必将导致同盟的破裂。

9. 作为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苏两党，事实上并无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只是在对内对外政策发生分歧时，双方根据各自的历史经验和所处的国际环境，强调马列主义经典的某一方面，试图以马列主义来解释自己行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并由此而发生了所谓的"原则"之争。在这一争执中，双方均不能做出让步，因为这关系到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谁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为统一的标准，社会主义阵营以谁为领袖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理论观点的分歧只是政策方针分歧的表现，而且这种分歧是与中苏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尽管双方都意识到中苏同盟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基石，都明白中苏分裂的后果必然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但是最核心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路线和方向由谁来主导。当问题发展到这一步时，已经预示了两党分歧最终公开化的前景。正像他们当初对于结盟的选择一样，中苏两党面临分歧日益加重的困境时，放弃同盟似乎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

有关中苏关系的恶化及同盟的破裂，李丹慧提出了如下一些值得关注的看法：

1. 1960—1973年中苏关系演变的大致脉络为：两党关系由意识形态分歧公开化到关系破裂，两国关系由恶化到同盟关系终结并走向敌对。中苏关系的内核逐渐发生变化，其中注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冲突的因素，原来以意识形态为主的斗争开始逐步向以国家安全利益为主的斗争转化，并且加入了新的军事冲突的因素。就中国方面来说，这一时期有三个关键性转捩点：其一，1962年。是年，中共在内部将中苏两党两国的斗争定性为敌我性质，为两党关系的破裂和同盟关系的终结奠定了思想基础。其二，1964年。这一年，毛泽东调整国家安全战略，在军事防御战略上，将苏联确立为除美国之外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另一个假想敌；在政治发展战略上，把防备党内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问题确立为首要目标，将国际反修斗争引向国内，酝酿发动一场巩固政权的政治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国在实行反帝反修外交方针的同时，军事防御战略中加入了准备对美对苏两面作战的新内容，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以对美战备为主的同时，加入了对苏战备的新成分。其三，1969

年。是年，珍宝岛中苏武装冲突事件爆发，中苏两国关系一度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到1970年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开始联美抗苏，中苏两国关系由敌对转入军事对峙和政治对抗，中苏同盟终结。

2. 关于中苏两党分歧的公之于众，过去中国方面一直指责苏联在1959年中印边界冲突中保持中立，于9月9日发表塔斯社声明，实际偏袒印度一方，公开表明了中苏两党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分歧，由此第一次向全世界暴露了中苏之间的分歧。苏联方面则对中国公开发表康生在1960年2月华约国政治协商会议上关于普遍裁军协议对中国无约束力的发言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将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会议上讨论的东西公布出去了，实际上将中苏分歧向西方世界公开。这种认识均有失片面，前者作为一种策略，同盟国之一方采取表面上的中立立场是完全可行的，且不乏先例；后者中国代表不要苏联在裁军问题上代替中国承担义务的表态，其实是为社会主义阵营核武器政策的运用留下了回旋余地。两者都并不表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实质性分歧。实际上，中苏领导通过报刊文章等公开讲述各自在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的看法，就是在向外界宣示双方的分歧，到1960年4月中共三篇纪念列宁诞辰文章的发表，这种分歧已十分引人注目。不过，第一次在世界国际群众性组织论坛上正式公布中苏两党重大理论和方针分歧的，还应该算是中国共产党在1960年6月初世界工联理事会北京会议上的做法。在这次会议期间，中国工会代表团在有非共产党人和无党派工会人士参加的总决议、反对殖民主义文件和提案等起草委员会会议上批评苏共的观点，并发动群众签名，联合提出反帝反殖的提案。这一情况招致西方关注，美国中情局等机构即曾报告说，中国在世工联这类组织中公开游说自己的主张，反对苏联。中国代表团在世工联北京会议上对苏联代表团发动的突然袭击，直接导致了布加勒斯特会议上苏联方面对中共代表团的突然袭击。

3. 从1959年10月中苏两党领导人激烈争吵到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这两年是中苏关系演变过程中一个十分特殊的阶段，此阶段实际为中苏两党提供了一个有可能达成新的团结的机遇。其特点为：其一，两党都有实现新的团结的愿望。缓和两党关系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尤其重要，因为经过一年多的“大跃进运动”，中国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中共需要苏联的帮助，不能与之把关系搞僵。其二，布加勒斯特会议及苏联撤走专家之后，毛泽东对苏共的路线纲领采取了一种“大容忍”的态度，中共的对苏方针有了更多的灵活性，意识形态上也开始显示出一种妥协、让步的色彩。这一“暂栖身”式的让步政策，在中苏关系的发展过程中还是首次出现，这种让步政策为中苏关系的缓和提供了重要条件。其三，1960年中后期至1961年后期，中苏两党在宣传论调、方针上出现了某种趋同倾向。这是此前和此后都没有出现过的情况。这种趋同是有意识的主观上的作为，其有别于勃列日涅夫时期向传统马列主义回归而造成的与中国的趋同。当然，此情况的形成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诸如中国的天灾人祸，毛的容忍退让，苏联击落美国U2飞机事件后赫鲁晓夫处境尴尬等。如果中苏双方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主要是中共能够将对苏政策的灵活性继续保留下去，淡化意识形态上的斗争，那么，中苏关系的缓和期应该可以维持得长久一些。倘若两

党关系渐趋稳定，中苏关系的发展或许还可以有另一种前景。

4.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召开，由于苏党新纲领的发布及苏共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打压等问题，中苏关系的缓和转为冷淡、僵滞状态。此后至1962年10月，以古巴导弹危机和中印边界冲突中中苏的斗争为起点，中苏关系的缓和期正式结束。导致中共于1962年末结束对苏缓和的主要因素有三个：一为经济因素。中共中央总结前一阶段政策失误的教训时，暴露出否定"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倾向，这触动和超越了毛泽东承认错误的心理底线。二为政治因素。1962年初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重提彭德怀里通外国、勾结苏联一事，实际激起了毛泽东对中共政权不稳的敏感。6月和8月彭德怀连续上书和写信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要求重新审查他的问题。毛泽东在8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据此批判"翻案风"，开始重新强调阶级斗争。三为意识形态因素。苏共二十二大新党纲全民党、全民国家思想的提出及其将被拿来指导国际共运的前景，超过了毛泽东所能容忍、让步的理论底线。中共此时结束让步政策还因为具备了两个条件，这就是中国国内经济状况的好转，以及国际共运左派队伍的形成。这种变化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同苏共进行斗争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则令中共要做国际共运旗手的心理出现膨胀。如此内政外交互动的结果是，中共于1962年末在内部做出了中苏关系是敌我关系的新的定性。毛泽东开始将对苏方针的基点由以缓和、让步为主，调整为以斗争、进攻为主。苏联方面察觉到了这种变化，认为中国国内开始了对苏联的新的敌对行动。继之，中苏意识形态大论战启动。

5. 在共产主义体系以一党权威为权力基础的政治范式，以及共产国际时代形成的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各国党都强调和承认国际共运必须有一个领导核心，并在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前提下维护正统的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但是，随着各党、各国作用和影响的变化，新的力量脱颖而出，原有领导者的地位也必然遇到挑战。中苏两党这场以意识形态斗争为表现形式，以捍卫和夺取国际共运领导权为实质内容的论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联合起来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时对共同纲领、总路线的需要，则是与各党根据各自国情制定斗争策略路线的需要相矛盾的。由于国际共运确立领导中心的运行机制决定了这条总路线要以领导中心的方针政策为核心，其结果势必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以一党的纲领路线涵盖众党的利益、目标和任务。鉴于各国党所处的发展阶段、国际环境不同，所拥有的历史、文化、民族、宗教背景各异，要使各党派一致接受一条以一党理论为基础的共同纲领和总路线，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这场论战的大前提先就错了。中苏两党都没有理由自认为可以代表共运各党的利益和要求，进而争相把自己的纲领路线确定为国际共运的总路线。在这种前提下，无论是以苏共还是以中共为核心，其结果都是要用自己的方针政策约束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进而要求国际共运中的各党服从苏联或是中国的利益。至于论战的具体内容，可以说，导致两党进行口诛笔伐的最基本问题是对时代的认识，其他观点只是这个问题的延伸。而对时代问题分歧的根源，即在于中苏两国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其间相差至少二三十年。当苏联在世界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时，中国还被排斥在这个体系之外。而帝国主义的对华遏制政策，进一步令中国领导人低估

或者不愿意承认二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核武器出现后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制约等诸种因素对时代的影响，依然坚持列宁几十年前所创立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学说，认为当前时代的特征仍旧是战争与革命。这种带有教条主义色彩的认识基础，决定了中共的对外、对内政策要与苏共的有所不同。当双方把论战的目光聚焦在谁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时，谁真正具备领导国际共运的资格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提上了议事日程。由此，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两党的政治命运、两党领袖的政治地位密切联系到了一起。意识形态问题与政治问题挂钩，确定了两党分手的大局。中苏论战导致两党关系在思想和感情上已经破裂，组织关系的中断只是时间问题了。

6. 1964 年赫鲁晓夫的下台，似乎给中苏关系的和解带来了新的机遇。但是事实上，中苏两党在对缓和双方关系的评估中，仍然继续坚持认为自己的立场代表了马列主义的原则基础，与此相应，双方和解的基础实际也依旧是各自的原则立场。差距只在于双方寻求和解的目标有所不同：苏方以为导致与中国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品质，苏共搬开了这块绊脚石，苏中关系的改善即应大有希望，苏共接受求同存异的团结方式。此为一种务实的和解方针。中方则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是中共意识形态斗争的胜利，苏共有可能纠正赫鲁晓夫的错误，向中共的轨道靠拢。对于毛泽东来说，在国内经济和国际共运的环境均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实现中苏和解的底线已不是求同存异，而是苏共新领导集团改弦更张向中共的正确路线纲领趋同。毛泽东要借赫鲁晓夫下台之机，彻底清除苏共的“命根子”——二十大在国际共运中的法定地位，扭转中共在国际共运中的被动局面，使世界革命党的斗争能够顺利地沿着中共的路线发展。毕竟中共在两次莫斯科会议上做出的实质性让步，导致世界共产党、工人党国际大会肯定苏共一党的会议，并将对二十大的高度评价写入会议的共同文件《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之中，造成了赫鲁晓夫的思想体系成为国际共运共同准则的事实，从而令中共在与苏共的竞争中陷入了受羁绊的被动境地。这实际是一种建立在干涉他党内部事务基础上的团结诉求。因此，就毛泽东而言，与其说是尝试寻求与苏共达成新的和解，不如说是要为中共继续沿着传统的国际共运轨道前进做最后的努力——如果苏共新领导人能够改弦更张，国际共运能以中共的路线纲领为指导，则中共将留在国际共运内，引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沿着毛认为的正确路线前进，否则中共将退出国际共运，另起炉灶，领导世界革命运动。

7. 中国开始脱离苏联领导的国际共运轨道，寻求做世界革命，特别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在这个过程中，中共确立的方针：一是领导左派党从事国际共运，进行世界革命。其主要步骤为继续大力支持国际共运左派党力量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鼓励世界各国共产党、工人党内部左派分子闹分裂，支持国际共运左派分裂势力，与苏共唱对台戏。二是强调世界反帝、民族解放运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拓展国际共运的范畴，争取更多的亚非拉要求独立的国家，树立世界革命运动领袖的形象。其主要步骤为坚决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排斥苏联参与亚非事务；加强对亚非国家的经济援助。事实上，1964 年中期至 1965 年中期，中国反对苏联召集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举行会议与中国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是同

步演进的。1965年莫斯科"三月会议"举行，这次会议使苏联成为号召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支持和援助越南抗美斗争的领导人，而中国则因抵制会议而陷于被动。以中共抵制参加此次会议为标志，国际共运分裂。毛泽东立意另辟新途，领导亚非拉美第三世界国家援越抗美，而第二次亚非会议正好为中国领导亚非拉人民的反帝斗争提供了一个重要机会和舞台。事实上，毛泽东决定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一个目标就是想孤立右派，争取中间派，通过这种形式，与苏联争夺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国家，孤立苏联。中苏双方实际借越战升级之机，以越南的抗美斗争为典范，通过第二次亚非会议这个论坛，争夺对民族解放运动、世界革命的领导权。随着亚非国家的分裂，毛泽东将争取的重点放在了争夺那些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左翼政治领导人、政党和革命力量上面，并试图以这些国家为基点，扩大影响，展开其世界革命的宏图。这期间，世界反帝斗争呈现出两个中心的特点。这种状况实际并不利于越战升级后越南的抗美斗争，其不仅为中越关系埋下了隐患，也使中国的形象大打折扣。苏联这时利用共运国际会议和筹备亚非会议之机树立了自己的威信。中国则是步步被动，拒绝出席莫斯科三月会议，国际共运分裂；反对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亚非国家为此分裂。在苏联抓住越战升级这个机遇做足团结反帝文章的情况下，中国实际两次陷入被动境地，只能在领导国际共运少数左派党的同时，继续领导第三世界少数激进的国家进行反帝反殖运动和世界革命。

8. 1964年第一次中苏边界谈判，毛泽东为中国代表团确定的底线为：必须提出历史上的《中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如果苏方承认这一点，中方可以放弃争议地区。当中苏两国代表团在磋商中暂时搁置不平等条约的原则分歧，苏方实际做出重大让步，谈判取得初步成果，出现签署边界协议、解决东段边界问题的可能性后，毛泽东于7月10日向日本社会党人士发表了同苏联算领土账问题的著名谈话，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客观上起到了破坏谈判进程的作用。考察毛泽东设立的谈判底线的本意，其实只是要同苏联就边界问题进行谈判，以此减轻边境冲突的紧张度，而并不要求谈成。为了保证他自己设计的"反修防修"政治大革命的顺利启动，赫鲁晓夫这个靶子不能倒，不能造成中苏一团和气的局面，尤其不能让苏方在谈判的旗帜下，制造改进中苏关系的假象，以欺骗人民。就此角度评估，毛泽东所确定的这个谈判门槛看似很低，实则却是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对于以国际法原则成熟处理领土纠纷的苏联政府来说，承认"不平等条约"问题是其无法接受的条件。中苏第一次边界谈判破裂后，随着中苏之间的界务纠纷愈益被政治化，边界问题作为一种新的军事冲突因素，成为两党两国领导人决策中的一个砝码，介入到了两国关系的前途之中。中苏边界冲突逐步升级，中苏双方在边界斗争上，从谨慎、克制，发展到主动反击，1969年爆发了珍宝岛武装冲突，两国关系趋向紧张，一度濒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完成了由盟友到敌人的转化过程，同盟关系终结。

9.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面对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重兵压境的威胁，毛泽东着手调整中国的对外战略，考虑选择以改善对美关系为突破口，实现集中力量对抗苏联的战略目标。而美国收缩亚太战略，越美和谈开始，美国宣布停止轰炸和袭击越南北方，中国南部的

压力在客观上减轻的现实,则为中国调整对美政策提供了条件。与此同时,美国因深陷印支战场而力量削弱,苏联势力的扩展已严重威胁到美国的全球利益及自身安全。尼克松政府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越战、借助中国力量与苏联抗衡,扭转与苏竞争中的被动局面。这样,共同的国家安全利益为中美两国关系实现和解提供了现实基础。中国实现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意图,在1970年代的中国外交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在中美高层会晤中,双方在共同抗衡苏联的扩张问题上,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两国共同利益颇多,几乎没有什么分歧。围绕苏联问题,两国领导人互通情报、交换看法并一起寻找共同点。这实际标示了新的中美合作关系的开始。双方还在南亚次大陆问题上共同对抗印度和苏联等议题上达成共识和默契,确定了具体的合作意向,迈出了联合抗衡苏联的第一步。1973年初巴黎和平协定签字、越南战争结束伊始,中美双方即着手进一步落实联合抗苏的战略构想,尼克松批准美国向中国出售飞机及定位导航系统,中美之间在军事上的初步合作由此开始。尼克松表示,如果中国成为第二号超级大国,那么美国就可以削减军备了。实际描绘出了中美联手,成为准盟友的蓝图。

有关中苏关系与新中国外交缘起之间的互动,牛军提出了如下一些引人注意的解释:

1. 提出冷战、革命—建国与革命意识形态这三个历史因素构成了理解、分析和叙述冷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缘起这个历史过程的起点、基本线索和基本框架。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是在外部世界的冷战与内部的革命—建国的历史进程的互动中发生和演变的,并逐步建构出一套理念、话语和外交行为方式,以及形成了一些影响相当久远的重要特征。从历史进程看,1949—1955年的"新中国外交"即是革命和建国相互重叠时期的外交,它面对的外部世界的基本形势就是冷战。进一步说,中国外交在从"革命"向"建国"演进的过程及其中的种种曲折变化,同冷战早期阶段美苏两大军事集团从尖锐对抗到趋向缓和的过程几乎是同步的,这个时期的中国外交需要回应美苏全球战略博弈造成的有时是严峻的外部环境,同时在内部面对的不仅是革命运动的诉求,还有从革命向建国过渡时期必然出现的各种基本诉求。这些内部的基本诉求也在决定着中国人对外部冷战形势做出何种反应。因此,确立研究和解读这段中国外交历史的结构对于揭示其本质是至关重要的。

2. 建国时期的外交是为国家战略服务的,这个时期中国国家战略的形成是同中共领导人在冷战早期阶段向苏联"一边倒"这个选择互为因果的。这个时期的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表明,中国在每个历史阶段上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国际体系来制定国家战略和对外政策,特别是受到中苏结盟过程的巨大影响。从这个时期的结局看,中国的对外政策与外交行为对新国家的身份建构和国家认同产生了巨大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其开始阶段即迅速完成了国家身份与国家认同的建构,其中外交所起的作用之巨大确是不争的事实,它为新国家建构了三个基本身份和认同,即社会主义国家、地区强国和新兴民族国家(后来统称发展中国家)。它们成为中国后来(有些甚至持续到今天)诸多对外政策和外交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这为如何界定和评价早期冷战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如何进一步评价这个时期的中苏关系以及界定其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

响等，提出了新的视角和领域。

3. 通过同时考察了中共决定“一边倒”和处理对美关系之间的联系与互动，进一步揭示了中共领导人在这个阶段与美国的交往及其结果。在建国前夕，中共领导人是在两个领域思考和处理对美关系的，它们分别是防止美国军事介入中国内战和美国是否承认中共政权。这两个问题因为中共的革命和建国之间紧密连接和重叠而同时出现，这两个层次之间存在着某些相互冲突的矛盾导致了中共中央有关思考和决定的起伏与变化，有关政策被证明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并同中共与苏联的互动有复杂的联系。这种状况大致延续到1950年初中苏结盟，是朝鲜战争使中国与美国对抗的格局固定下来，并从此开始持续了20年，成为东亚冷战的中心问题和左右东亚国际政治走势的最为严峻的事态。存在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说明，如果没有朝鲜战争，即便中苏结盟，中美的和解也很有可能大大提前。

4. 指出冷战与中国外交互动对中国东亚地区政策的特殊影响。建国初期在东亚毗邻地区印度支那和朝鲜半岛采取的军事行动都发生在冷战中美苏对抗比较尖锐的时期，以致中国领导人当时都没有将它们看作是地区范围的冲突。他们当时将中国同这个地区各国家的双边问题等，都同冷战、同中国在冷战中的全球性思考、战略设想及战略选择联系在一起，尽管程度有所不同。尤其是建国初期的援越抗法和抗美援朝，发生在中国革命方才奠定胜局和方才选择同苏联结盟、与美国对抗的阶段，从而导致了在这两次重大的对外军事行动中包含了大量中国领导人对冷战下的世界政治之本质的理解，对这个时期的世界战略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中国的世界地位的追求和对中国革命产生超出中国边界的更大影响的期待。这种战略思考，导致中国在整个冷战中几乎都没有形成专门的东亚地区政策，对外战略缺乏必要的层次和清晰度。

5. 将中国援越抗法与抗美援朝置于同一结构中进行比较叙述，揭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些特点对这个时期中国重大决策的影响。从同盟的角度看，在中苏两国战略认识比较一致的地区或问题上，中国有很强的支配力，如在印度支那地区和后来朝鲜停战谈判过程中；在中苏战略互信比较低的时期和问题上，中国影响力就会比较低，例如朝鲜战争爆发问题上，正是中苏之间的不信任导致同盟中出现了“尾巴摇狗”的情况，金日成实际上利用了中苏结盟中的缝隙，通过操弄抬高了朝鲜的影响力，这是朝鲜战争在违背中国意愿情况下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中苏同盟中，中国外交对苏联的依赖度。

6. 指出以1951年夏季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为标志，中国的基本安全态势已经隐然成形，此后在早期冷战逐步走向缓解的同时，建国初期重大决策中的地缘战略考虑也日渐突出。在这两个重合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政策逐步转向为中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屏障，并为此推动周边事态的演变。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形成了一套处理周边国际危机与军事冲突的基本经验，即“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后来的历史证明它们在被反复应用，至今未变。从1953年7月朝鲜停战，1954年初印度支那的战争升级到夏季日内瓦会议达成恢复和平的协议，以及随后立即出现的台湾海峡紧张局势急剧升温，然后到1955年夏季，中国周边

地区出现从军事冲突走向缓和的循环，直到1955年夏中美大使级会谈开始才基本结束。在这个军事较量和外交折冲交替出现的阶段，中国领导人通过各种决策最终为中国塑造了独特的安全环境：在北部和西北部倚靠苏联，在东南沿海方向以及在朝鲜半岛、印度支那等地区，处于与美国间接军事对峙的局面。冷战中的东亚地缘安全格局也因此而基本成形，即中苏同盟为中心的东亚陆地军事集团与美日同盟为中心的主要是海上国家的军事同盟之间的对抗。这大致反映了中国塑造地区安全形势的能力和局限。

7. 指出毛泽东在1954年夏季重提并解释"中间地带"思想的重大影响。1954年7月上旬，中国外交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转变，其结果是在建国之初因与苏联结盟而卷入冷战后，中国领导人终于下决心去开辟美苏两大阵营之外的战略空间。在此时刻，毛泽东重提"中间地带"的意义，在他看来就如同当年走上井冈山，终于找到了走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一样。毛泽东认为"中间地带"有着影响世界政治前途的巨大潜力，是他试图改变世界政治版图而找到的新的战略空间，他相信中国需要也可以在那里大有作为；另一方面，这里对中国也有地缘安全方面的特殊重要性，是中国东南方向的安全缓冲地区之一，中国需要在这里阻击美国的扩张。总之，这里是中国在美苏两个阵营之外展开一场新战略竞争的舞台，中国领导人从此在国际冷战格局中开辟了新的外交战场，他们试图由此打开重塑东亚冷战的道路，结果中国外交实际上成了推动冷战全球化的独特而又影响巨大的进程。从历史的深层看，这次转变也反映了中国外交与生俱来的过渡性，即作为当时中国外交决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有一个从革命政党到执政党的转变过程；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也有一个从革命领导人到国家领导人的角色转变。这一过渡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考和决策。总之，到1955年这个历史时期结束的时刻，中国已经在为挑战冷战国际体系开辟新的基础，并有意无意地迈出了改造冷战的步伐。与此同时，也埋下了导致后来中苏关系破裂的种子。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尽管由于俄罗斯档案的解密和开放，相关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其间的空白和缺漏仍然不在少数。由于俄罗斯档案政策的紧缩，目前还有许多重要文件和史料没有公布，这种状况对学术研究自然起到了限制的作用。就中苏关系史而言，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即使是在政治、外交等目前研究已经十分深入的领域，仍然还有一些重要问题令研究者感到困惑。例如，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目前尚未看到，这里涉及两个重大问题：其一，两国领导人是怎样谈起中国研制原子弹的问题的？这关系到苏联对中国核援助的起源问题，而当事人的回忆录有不同的说法①。其二，关于中国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的问题，究竟是毛泽东提出的，还是赫鲁晓夫要求的，最初协议规定的人数又是多少？这关系到后来终止中国向苏联远东地区派遣劳工协议

① 参见师哲回忆：《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李海文整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572—573页；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78页。关于建立核反应堆的提议，这两本书的说法不同，前者说是赫鲁晓夫当时主动提出的，毛泽东答应考虑；后者说是毛泽东提出的，赫鲁晓夫表示同意。目前尚无有关的档案文献可以对此进行验证。

的原因问题，而赫鲁晓夫的回忆、俄罗斯学者的说法与中国省市档案的记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别。①其他还有很多，如1957年7—9月，赫鲁晓夫同意向中国提供核技术援助时，苏共中央有关会议的讨论情况；1959年5—6月彭德怀在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谈话的内容，尤其是涉及两国军事领域合作的问题；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决定停止向中国提供核技术和原子弹样品前其内部讨论的情况；1960年8月苏联宣布全面撤退在华工作专家前其内部讨论的情况等。

总之，可以预言，随着俄罗斯以及中国档案文献的继续解密和开放，中苏关系历史的研究必定还会有重大的进步。

① 有的说，是毛泽东首先提议向苏联输出劳动力的，有的说是赫鲁晓夫向中方提出的建议；最初提出的劳工人数，有的说是1 000万，有的说是100万或150万；至于协议中确定的赴苏联的中国劳工人数，有的说是20万，有的说是8万。详见赫鲁晓夫：《最后的遗言——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第385—389页；*Сладковский М. И.* История торгово экномиче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и СССР с Китаем，1917－1974，Москва：Наука，1977，с. 216；*Ващук А. С.*，*Крушанова Л. А.* Мобилизационные формы пополнения труд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в СССР，1945－1950 гг. // 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6，№1，с. 5－13；*Крушанова Л. А.* Китайские рабочие в СССР（1945－1960－е годы）// Россия и АТР，2007，№3，с. 118－122；*Дацышен В.* Китайская трудовая миграция в России：Мало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2008，№5，с. 99－104；国务院致山东等省电，1955年2月12日，山西省档案馆，C55－1007－92，第6页；国务院出国工人管理局赴苏工作组的报告，1955年9月6日，河北省档案馆，932－1－294，第11—28页。

总 目 录

出版前言 ………………………………………………………………………… 1—7
序言 中苏关系史研究与俄罗斯档案利用 ………………………… 沈志华 1—18

第一卷(1945.1—1949.2) ………………………………………………… 1—461
第二卷(1949.3—1950.7) ………………………………………………… 1—443
第三卷(1950.8—1951.8) ………………………………………………… 1—451
第四卷(1951.9—1954.1) ………………………………………………… 1—452
第五卷(1954.2—1955.7) ………………………………………………… 1—448
第六卷(1955.8—1956.9) ………………………………………………… 1—392
第七卷(1956.10—1958.3) ………………………………………………… 1—431
第八卷(1958.4—1959.10) ………………………………………………… 1—449
第九卷(1959.10—1962.12) ……………………………………………… 1—437
第十卷(1963.1—1964.11) ………………………………………………… 1—501
第十一卷(1964.12—1969.6) ……………………………………………… 1—447
第十二卷(1969.7—1991.12) ……………………………………………… 1—374
附录 人名译名对照表 ……………………………………………… 375—430

目　录

1945 年

№11963，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
1945 年 1 月 12 日 …… 19
№11967，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
1945 年 2 月 3 日 …… 20
№11971，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
1945 年 2 月 14 日 …… 24
№11976，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
1945 年 3 月 2 日 …… 26
№14614，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
1945 年 4 月 15 日 …… 27
№11994，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
1945 年 5 月 10 日 …… 31
№11999，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
1945 年 5 月 23 日 …… 35
№12 000，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
1945 年 5 月 24 日 …… 37
№12004，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
1945 年 6 月 7 日 …… 38
№12006，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
1945 年 6 月 8 日 …… 40
№12013，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
1945 年 6 月 19 日 …… 42
№12017，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
1945 年 6 月 29 日 …… 46
№12021，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
1945 年 7 月 2 日 …… 49
№24960，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 年 7 月 5 日 …… 59

№24961,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
1945 年 7 月 7 日 …… 60
№12033,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
1945 年 7 月 9 日 …… 61
№12036,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
1945 年 7 月 10 日 …… 68
№14459,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
1945 年 8 月 25 日 …… 69
№14448,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
1945 年 8 月 27 日 …… 70
№12100,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
1945 年 8 月 30 日 …… 71
№14453,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
1945 年 9 月 2 日 …… 74
№13296,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
1945 年 9 月 2 日 …… 74
№12112,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
1945 年 9 月 6 日 …… 75
№12113,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
1945 年 9 月 6 日 …… 77
№12114,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
1945 年 9 月 7 日 …… 79
№09894,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
1945 年 10 月 5 日 …… 81
№09893,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
1945 年 10 月 10 日 …… 83
№14435,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
1945 年 10 月 18 日 …… 86
№12157,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
1945 年 11 月 7 日 …… 91
№12163,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
1945 年 11 月 17 日 …… 93
№12170,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
1945 年 11 月 25 日 …… 94
№00594,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

1945 年 12 月 29 日 …… 96
№00595,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1945 年 12 月 30 日 …… 99
№12194,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5 年 12 月 31 日 …… 109

1946 年

№16062,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
1946 年 1 月 1 日 …… 111
№16063,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6 年 1 月 2 日 …… 112
№12197,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
1946 年 1 月 3 日 …… 113
№2000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
1946 年 1 月 7 日 …… 121
№16067,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1946 年 1 月 8 日 …… 122
№16070,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
1946 年 1 月 14 日 …… 124
№1607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
1946 年 1 月 16 日 …… 125
№16079,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
1946 年 1 月 30 日 …… 128
№1608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
1946 年 2 月 6 日 …… 130
№16083,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
1946 年 2 月 12 日 …… 134
№16086,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
1946 年 2 月 21 日 …… 136
№13317,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
1946 年 2 月 22 日 …… 138
№14449,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
1946 年 2 月 22 日 …… 140
№16108,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
1946 年 4 月 10 日 …… 141

№1612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1946年4月26日 …… 142
№13270，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
1946年5月4日 …… 144
№13271，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
1946年5月8日 …… 145
№13272，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
1946年5月11日 …… 154
№16135，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
1946年6月24日 …… 156
№16137，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
1946年6月27日 …… 156
№09129，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
1946年7月24日 …… 159
№16152，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
1946年7月25日 …… 161
№16153，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
1946年7月31日 …… 162
№16157，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
1946年8月29日 …… 164
№16164，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
1946年9月10日 …… 166
№16173，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
1946年9月19日 …… 168
№16181，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
1946年10月6日 …… 169
№16184，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14日 …… 169
№16191，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4日 …… 171
№16192，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6日 …… 172
№09967，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
1946年11月11日 …… 176
№1620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

1946 年 11 月 15 日 …… 178
№16702,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1946 年 11 月 25 日 …… 181
№16203,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1946 年 12 月 4 日 …… 182
№16204,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
1946 年 12 月 5 日 …… 183

1947 年

№09896,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
1947 年 1 月 6 日 …… 185
№16230,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
1947 年 1 月 28 日 …… 189
№16237,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
1947 年 2 月 20 日 …… 190
№10052,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
1947 年 3 月 3 日 …… 191
№20268,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
1947 年 6 月 12 日 …… 194
№16270,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 年 6 月 15 日 …… 195
№16271,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
1947 年 6 月 18 日 …… 195
№16274,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
1947 年 7 月 1 日 …… 197
№16276,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2 日 …… 197
№20270,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4 日 …… 198
№16277,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5 日 …… 199
№16284,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
1947 年 7 月 14 日 …… 200
№16301,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
1947 年 9 月 26 日 …… 204

№16302,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
1947 年 9 月 29 日 …… 206
№20269,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
1947 年 10 月 25 日 …… 209
№09024,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
1947 年 12 月 10 日 …… 210
№16308,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7 年 12 月 11 日 …… 213
№16311,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 年 12 月 16 日 …… 214
№16312,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 年 12 月 17 日 …… 215
№09109,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
1947 年 12 月 30 日 …… 215

1948 年

№16313,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 年 1 月 3 日 …… 218
№13290,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 年 1 月 23 日 …… 219
№09919,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
1948 年 2 月 …… 236
№16326,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
1948 年 2 月 18 日 …… 238
№1633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
1948 年 3 月 30 日 …… 239
№09898,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
1948 年 4 月 2 日 …… 244
№16646,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
1948 年 4 月 2 日 …… 246
№16339,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
1948 年 4 月 3 日 …… 249
№16342,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 年 4 月 12 日 …… 249
№16344,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

1948年4月17日 …… 250
№0902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
1948年4月20日 …… 251
№16345,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8年4月22日 …… 252
№1372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年4月26日 …… 253
№1635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年4月29日 …… 254
№1635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
1948年5月10日 …… 255
№1635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
1948年5月10日 …… 255
№1635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
1948年5月10日 …… 257
№16361,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
1948年5月27日 …… 257
№16365,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
1948年6月4日 …… 259
№16369,维辛斯基致库兹涅佐夫函:答复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
1948年6月17日 …… 261
№16370,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
1948年6月21日 …… 262
№16374,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7月2日 …… 263
№16375,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7月3日 …… 265
№1637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
1948年7月4日 …… 266
№16378,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
1948年7月14日 …… 267
№16379,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
1948年7月14日 …… 267
№16380,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 268

№16384,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
1948 年 7 月 28 日 …… 269
№11415,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 年 7 月 30 日 …… 270
№11429,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 年 7 月 30 日以后 …… 272
№16387,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
1948 年 8 月 4 日 …… 273
№16388,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
1948 年 8 月 6 日 …… 274
№16396,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
1948 年 9 月 9 日 …… 275
№08993,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
1948 年 9 月 10 日 …… 276
№16397,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
1948 年 9 月 11 日 …… 277
№08998,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
1948 年 9 月 12 日 …… 277
№09013,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
1948 年 9 月 18 日 …… 280
№16399,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
1948 年 9 月 20 日 …… 280
№20275,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
1948 年 9 月 20 日 …… 281
№09014,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
1948 年 9 月 23 日 …… 282
№1640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1948 年 9 月 28 日 …… 283
№20274,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
1948 年 10 月 4 日 …… 283
№08997,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
1948 年 10 月 6 日 …… 284
№16406,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
1948 年 10 月 16 日 …… 285
№09002,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

1948 年 10 月 17 日 …… 286
№16407,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 年 10 月 17 日 …… 286
№16408,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 年 10 月 17 日 …… 287
№16411,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 年 10 月 21 日 …… 288
№16412,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
1948 年 10 月 25 日 …… 289
№16413,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
1948 年 10 月 27 日 …… 289
№16415,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
1948 年 10 月 30 日 …… 290
№16416,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
1948 年 10 月 30 日 …… 292
№16417,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
1948 年 11 月 6 日 …… 293
№16419,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
1948 年 11 月 17 日 …… 294
№16622,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
1948 年 11 月 18 日 …… 294
№08994,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
1948 年 11 月 18 日 …… 298
№16421,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
1948 年 11 月 19 日 …… 299
№1642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
1948 年 11 月 21 日 …… 300
№08995,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
1948 年 11 月 23 日 …… 300
№14178,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
1948 年 11 月 23 日 …… 301
№16426,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
1948 年 11 月 24 日 …… 302
№16606,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
1948 年 11 月 25 日 …… 303

№16427，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
1948 年 11 月 26 日 …… 306
№08996，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
1948 年 11 月 26 日以后 …… 307
№16428，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
1948 年 11 月 26 日 …… 307
№16430，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
1948 年 12 月 7 日 …… 308
№16431，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 年 12 月 9 日 …… 310
№09015，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
1948 年 12 月 10 日 …… 311
№16432，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
1948 年 12 月 13 日 …… 312
№08999，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
1948 年 12 月 16 日 …… 313
№09018，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
1948 年 12 月 16 日 …… 315
№09001，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
1948 年 12 月 17 日 …… 318
№09003，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
1948 年 12 月 18 日 …… 319
№09016，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
1948 年 12 月 20 日 …… 320
№16435，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
1948 年 12 月 22 日 …… 320
№09004，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
1948 年 12 月 25 日 …… 321
№09005，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
1948 年 12 月 25 日 …… 322
№09049，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
1948 年 12 月 27 日 …… 323
№23387，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
1948 年 12 月 27 日 …… 325
№09019，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

1948 年 12 月 28 日 …………………………………………………… 326
№16437,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
1948 年 12 月 29 日 …………………………………………………… 328
№1643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 年 12 月 30 日 …………………………………………………… 329
№09021,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 年 12 月 31 日 …………………………………………………… 332
№09022,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 年 12 月 31 日 …………………………………………………… 332

1949 年

№16051,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
1949 年 1 月 1 日 …………………………………………………… 334
№09023,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
1949 年 1 月 5 日 …………………………………………………… 335
№1644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 年 1 月 6 日 …………………………………………………… 338
№16442,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议
1949 年 1 月 7 日 …………………………………………………… 339
№09026,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系
1949 年 1 月 8 日 …………………………………………………… 340
№1644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
1949 年 1 月 8 日 …………………………………………………… 340
№164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
1949 年 1 月 9 日 …………………………………………………… 341
№16446,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
1949 年 1 月 10 日 …………………………………………………… 342
№1644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
1949 年 1 月 10 日 …………………………………………………… 345
№0253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0 日 …………………………………………………… 346
№0253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1 日 …………………………………………………… 347
№16052,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
1949 年 1 月 11 日 …………………………………………………… 347

№16449,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
1949年1月11日 …… 348
№0253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2日 …… 349
№16451,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
1949年1月12日 …… 350
№16450,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
1949年1月13日 …… 352
№02537,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4日 …… 352
№0253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年1月14日 …… 354
№16452,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5日 …… 355
№16453,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
1949年1月15日 …… 356
№09045,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
1949年1月17日 …… 357
№16454,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
1949年1月17日 …… 357
№1645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
1949年1月17日 …… 359
№16461,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
1949年1月17日以后 …… 360
№3438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
1949年1月23日 …… 361
№10238,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
1949年1月27日 …… 361
№34385,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年1月28日 …… 364
№3438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1949年1月28日 …… 364
№34387,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
1949年1月28日 …… 365
№3438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年1月28日 …… 365
№34389,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 366
№16465,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
1949年1月30日 …… 367
№09028,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
1949年1月31日 …… 370
№34390,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
1949年1月31日 …… 371
№16466,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
1949年1月31日 …… 375
№09029,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
1949年2月1日 …… 381
№34391,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
1949年2月1日 …… 381
№34392,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
1949年2月1日 …… 382
№34393,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
1949年2月1日 …… 385
№16467,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
1949年2月1日 …… 386
№16468,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
1949年2月1日 …… 390
№34394,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1949年2月2日 …… 393
№34395,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
1949年2月2日 …… 394
№34396,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
1949年2月2日 …… 396
№16469,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
1949年2月2日 …… 397
№34397,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
1949年2月3日 …… 401
№34398,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
1949年2月3日 …… 403

№34399,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
1949年2月3日 …… 403
№34620,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
1949年2月3日 …… 404
№16470,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年2月3日 …… 405
№16471,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
1949年2月3日 …… 409
№34400,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
1949年2月4日 …… 413
№34401,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
1949年2月4日 …… 414
№34623,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
1949年2月4日 …… 415
№34624,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
1949年2月4日 …… 415
№34402,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
1949年2月4日 …… 416
№34621,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
1949年2月4日 …… 416
№34403,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
1949年2月4日 …… 418
№34404,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
1949年2月4日 …… 419
№34406,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
1949年2月4日 …… 420
№16472,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
1949年2月4日 …… 420
№34407,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
1949年2月5日 …… 426
№34408,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
1949年2月5日 …… 428
№16473,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
1949年2月5日 …… 431
№16474,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1949 年 2 月 5 日 …… 437

№16475,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
1949 年 2 月 5 日 …… 439

№34622,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
1949 年 2 月 6 日 …… 439

№34410,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 2 月 3 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
1949 年 2 月 6 日 …… 441

№16476,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
1949 年 2 月 6 日 …… 441

№16477,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
1949 年 2 月 6 日 …… 447

№34405,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
1949 年 2 月 7 日 …… 449

№16478,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 年 2 月 7 日 …… 449

№16479,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
1949 年 2 月 7 日 …… 453

№16481,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
1949 年 2 月 11 日 …… 455

№16483,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
1949 年 2 月 15 日 …… 456

№1648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
1949 年 2 月 16 日 …… 457

№16485,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
1949 年 2 月 20 日 …… 458

№16486,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
1949 年 2 月 21 日 …… 459

№16487,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
1949 年 2 月 27 日 …… 460

第一卷(1945.1—1949.2)

目　录

1945 年

№11963，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
1945 年 1 月 12 日 …… 19
№11967，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
1945 年 2 月 3 日 …… 20
№11971，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
1945 年 2 月 14 日 …… 24
№11976，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
1945 年 3 月 2 日 …… 26
№14614，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
1945 年 4 月 15 日 …… 27
№11994，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
1945 年 5 月 10 日 …… 31
№11999，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
1945 年 5 月 23 日 …… 35
№12 000，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
1945 年 5 月 24 日 …… 37
№12004，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
1945 年 6 月 7 日 …… 38
№12006，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
1945 年 6 月 8 日 …… 40
№12013，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
1945 年 6 月 19 日 …… 42
№12017，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
1945 年 6 月 29 日 …… 46
№12021，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
1945 年 7 月 2 日 …… 49
№24960，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 年 7 月 5 日 …… 59

№24961,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
1945 年 7 月 7 日 …… 60
№12033,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
1945 年 7 月 9 日 …… 61
№12036,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
1945 年 7 月 10 日 …… 68
№14459,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
1945 年 8 月 25 日 …… 69
№14448,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
1945 年 8 月 27 日 …… 70
№12100,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
1945 年 8 月 30 日 …… 71
№14453,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
1945 年 9 月 2 日 …… 74
№13296,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
1945 年 9 月 2 日 …… 74
№12112,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
1945 年 9 月 6 日 …… 75
№12113,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
1945 年 9 月 6 日 …… 77
№12114,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
1945 年 9 月 7 日 …… 79
№09894,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
1945 年 10 月 5 日 …… 81
№09893,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
1945 年 10 月 10 日 …… 83
№14435,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
1945 年 10 月 18 日 …… 86
№12157,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
1945 年 11 月 7 日 …… 91
№12163,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
1945 年 11 月 17 日 …… 93
№12170,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
1945 年 11 月 25 日 …… 94
№00594,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

1945 年 12 月 29 日 …… 96
№00595,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1945 年 12 月 30 日 …… 99
№12194,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5 年 12 月 31 日 …… 109

1946 年

№16062,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
1946 年 1 月 1 日 …… 111
№16063,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6 年 1 月 2 日 …… 112
№12197,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
1946 年 1 月 3 日 …… 113
№2000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
1946 年 1 月 7 日 …… 121
№16067,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1946 年 1 月 8 日 …… 122
№16070,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
1946 年 1 月 14 日 …… 124
№1607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
1946 年 1 月 16 日 …… 125
№16079,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
1946 年 1 月 30 日 …… 128
№1608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
1946 年 2 月 6 日 …… 130
№16083,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
1946 年 2 月 12 日 …… 134
№16086,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
1946 年 2 月 21 日 …… 136
№13317,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
1946 年 2 月 22 日 …… 138
№14449,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
1946 年 2 月 22 日 …… 140
№16108,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
1946 年 4 月 10 日 …… 141

№1612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1946年4月26日 …… 142
№13270，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
1946年5月4日 …… 144
№13271，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
1946年5月8日 …… 145
№13272，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
1946年5月11日 …… 154
№16135，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
1946年6月24日 …… 156
№16137，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
1946年6月27日 …… 156
№09129，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
1946年7月24日 …… 159
№16152，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
1946年7月25日 …… 161
№16153，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
1946年7月31日 …… 162
№16157，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
1946年8月29日 …… 164
№16164，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
1946年9月10日 …… 166
№16173，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
1946年9月19日 …… 168
№16181，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
1946年10月6日 …… 169
№16184，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14日 …… 169
№16191，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4日 …… 171
№16192，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6日 …… 172
№09967，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
1946年11月11日 …… 176
№16201，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

1946 年 11 月 15 日 …… 178
№16702,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1946 年 11 月 25 日 …… 181
№16203,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1946 年 12 月 4 日 …… 182
№16204,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
1946 年 12 月 5 日 …… 183

1947 年

№09896,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
1947 年 1 月 6 日 …… 185
№16230,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
1947 年 1 月 28 日 …… 189
№16237,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
1947 年 2 月 20 日 …… 190
№10052,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
1947 年 3 月 3 日 …… 191
№20268,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
1947 年 6 月 12 日 …… 194
№16270,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 年 6 月 15 日 …… 195
№16271,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
1947 年 6 月 18 日 …… 195
№16274,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
1947 年 7 月 1 日 …… 197
№16276,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2 日 …… 197
№20270,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4 日 …… 198
№16277,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5 日 …… 199
№16284,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
1947 年 7 月 14 日 …… 200
№16301,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
1947 年 9 月 26 日 …… 204

№16302，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
1947年9月29日 …… 206
№20269，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
1947年10月25日 …… 209
№09024，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
1947年12月10日 …… 210
№16308，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7年12月11日 …… 213
№16311，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12月16日 …… 214
№16312，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12月17日 …… 215
№09109，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
1947年12月30日 …… 215

1948年

№16313，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1月3日 …… 218
№13290，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年1月23日 …… 219
№09919，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
1948年2月 …… 236
№16326，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
1948年2月18日 …… 238
№1633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
1948年3月30日 …… 239
№09898，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
1948年4月2日 …… 244
№16646，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
1948年4月2日 …… 246
№16339，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
1948年4月3日 …… 249
№16342，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4月12日 …… 249
№16344，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

1948 年 4 月 17 日 …… 250
№0902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
1948 年 4 月 20 日 …… 251
№16345,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8 年 4 月 22 日 …… 252
№1372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 年 4 月 26 日 …… 253
№1635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 年 4 月 29 日 …… 254
№1635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
1948 年 5 月 10 日 …… 255
№16355,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
1948 年 5 月 10 日 …… 255
№1635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
1948 年 5 月 10 日 …… 257
№16361,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
1948 年 5 月 27 日 …… 257
№16365,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
1948 年 6 月 4 日 …… 259
№16369,维辛斯基致库兹涅佐夫函：答复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
1948 年 6 月 17 日 …… 261
№16370,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
1948 年 6 月 21 日 …… 262
№16374,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 年 7 月 2 日 …… 263
№16375,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 年 7 月 3 日 …… 265
№1637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
1948 年 7 月 4 日 …… 266
№16378,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
1948 年 7 月 14 日 …… 267
№16379,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
1948 年 7 月 14 日 …… 267
№16380,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 年 7 月 17 日 …… 268

№16384,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
1948年7月28日 …… 269
№11415,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年7月30日 …… 270
№11429,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年7月30日以后 …… 272
№16387,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
1948年8月4日 …… 273
№16388,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
1948年8月6日 …… 274
№16396,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
1948年9月9日 …… 275
№08993,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
1948年9月10日 …… 276
№16397,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
1948年9月11日 …… 277
№08998,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
1948年9月12日 …… 277
№09013,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
1948年9月18日 …… 280
№16399,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
1948年9月20日 …… 280
№20275,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
1948年9月20日 …… 281
№09014,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
1948年9月23日 …… 282
№16400,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
1948年9月28日 …… 283
№20274,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
1948年10月4日 …… 283
№08997,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
1948年10月6日 …… 284
№16406,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
1948年10月16日 …… 285
№09002,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

1948 年 10 月 17 日 …… 286
№16407,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 年 10 月 17 日 …… 286
№16408,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 年 10 月 17 日 …… 287
№16411,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 年 10 月 21 日 …… 288
№16412,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
1948 年 10 月 25 日 …… 289
№16413,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
1948 年 10 月 27 日 …… 289
№16415,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
1948 年 10 月 30 日 …… 290
№16416,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
1948 年 10 月 30 日 …… 292
№16417,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
1948 年 11 月 6 日 …… 293
№16419,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
1948 年 11 月 17 日 …… 294
№16622,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
1948 年 11 月 18 日 …… 294
№08994,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
1948 年 11 月 18 日 …… 298
№16421,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
1948 年 11 月 19 日 …… 299
№1642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
1948 年 11 月 21 日 …… 300
№08995,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
1948 年 11 月 23 日 …… 300
№14178,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
1948 年 11 月 23 日 …… 301
№16426,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
1948 年 11 月 24 日 …… 302
№16606,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
1948 年 11 月 25 日 …… 303

№16427,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
1948年11月26日 …………………………………………………… 306
№08996,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
1948年11月26日以后 …………………………………………… 307
№16428,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
1948年11月26日 …………………………………………………… 307
№16430,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
1948年12月7日 ……………………………………………………… 308
№16431,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年12月9日 ……………………………………………………… 310
№09015,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
1948年12月10日 …………………………………………………… 311
№16432,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
1948年12月13日 …………………………………………………… 312
№08999,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
1948年12月16日 …………………………………………………… 313
№09018,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
1948年12月16日 …………………………………………………… 315
№09001,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
1948年12月17日 …………………………………………………… 318
№09003,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
1948年12月18日 …………………………………………………… 319
№09016,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
1948年12月20日 …………………………………………………… 320
№16435,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
1948年12月22日 …………………………………………………… 320
№09004,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
1948年12月25日 …………………………………………………… 321
№09005,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
1948年12月25日 …………………………………………………… 322
№09049,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
1948年12月27日 …………………………………………………… 323
№23387,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
1948年12月27日 …………………………………………………… 325
№09019,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

1948 年 12 月 28 日 …… 326
№16437,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
1948 年 12 月 29 日 …… 328
№1643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 年 12 月 30 日 …… 329
№09021,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 年 12 月 31 日 …… 332
№09022,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 年 12 月 31 日 …… 332

1949 年

№16051,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
1949 年 1 月 1 日 …… 334
№09023,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
1949 年 1 月 5 日 …… 335
№16441,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 年 1 月 6 日 …… 338
№16442,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议
1949 年 1 月 7 日 …… 339
№09026,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系
1949 年 1 月 8 日 …… 340
№16444,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
1949 年 1 月 8 日 …… 340
№16445,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
1949 年 1 月 9 日 …… 341
№16446,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
1949 年 1 月 10 日 …… 342
№1644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
1949 年 1 月 10 日 …… 345
№0253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0 日 …… 346
№02535,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1 日 …… 347
№16052,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
1949 年 1 月 11 日 …… 347

№16449,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
1949 年 1 月 11 日 …… 348
№0253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2 日 …… 349
№16451,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
1949 年 1 月 12 日 …… 350
№16450,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
1949 年 1 月 13 日 …… 352
№02537,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4 日 …… 352
№0253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 年 1 月 14 日 …… 354
№16452,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5 日 …… 355
№16453,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
1949 年 1 月 15 日 …… 356
№09045,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
1949 年 1 月 17 日 …… 357
№16454,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
1949 年 1 月 17 日 …… 357
№16457,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
1949 年 1 月 17 日 …… 359
№16461,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
1949 年 1 月 17 日以后 …… 360
№3438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
1949 年 1 月 23 日 …… 361
№10238,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
1949 年 1 月 27 日 …… 361
№34385,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 年 1 月 28 日 …… 364
№34386,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1949 年 1 月 28 日 …… 364
№34387,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
1949 年 1 月 28 日 …… 365
№34388,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 年 1 月 28 日 …… 365
№34389,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 年 1 月 30 日 …… 366
№16465,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
1949 年 1 月 30 日 …… 367
№09028,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
1949 年 1 月 31 日 …… 370
№34390,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
1949 年 1 月 31 日 …… 371
№16466,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
1949 年 1 月 31 日 …… 375
№09029,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
1949 年 2 月 1 日 …… 381
№34391,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
1949 年 2 月 1 日 …… 381
№34392,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
1949 年 2 月 1 日 …… 382
№34393,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
1949 年 2 月 1 日 …… 385
№16467,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
1949 年 2 月 1 日 …… 386
№16468,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
1949 年 2 月 1 日 …… 390
№34394,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1949 年 2 月 2 日 …… 393
№34395,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
1949 年 2 月 2 日 …… 394
№34396,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
1949 年 2 月 2 日 …… 396
№16469,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
1949 年 2 月 2 日 …… 397
№34397,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 401
№34398,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 403

№34399,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
1949 年 2 月 3 日 …… 403
№34620,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 404
№16470,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 405
№16471,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 409
№34400,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3
№34401,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4
№34623,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5
№34624,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5
№34402,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6
№34621,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6
№34403,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8
№34404,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
1949 年 2 月 4 日 …… 419
№34406,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
1949 年 2 月 4 日 …… 420
№16472,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
1949 年 2 月 4 日 …… 420
№34407,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
1949 年 2 月 5 日 …… 426
№34408,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
1949 年 2 月 5 日 …… 428
№16473,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
1949 年 2 月 5 日 …… 431
№16474,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1949 年 2 月 5 日 …………………………………………………………… 437
№16475,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
1949 年 2 月 5 日 …………………………………………………………… 439
№34622,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
1949 年 2 月 6 日 …………………………………………………………… 439
№34410,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 2 月 3 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
1949 年 2 月 6 日 …………………………………………………………… 441
№16476,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
1949 年 2 月 6 日 …………………………………………………………… 441
№16477,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
1949 年 2 月 6 日 …………………………………………………………… 447
№34405,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
1949 年 2 月 7 日 …………………………………………………………… 449
№16478,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 年 2 月 7 日 …………………………………………………………… 449
№16479,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
1949 年 2 月 7 日 …………………………………………………………… 453
№16481,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
1949 年 2 月 11 日 …………………………………………………………… 455
№16483,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
1949 年 2 月 15 日 …………………………………………………………… 456
№16484,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
1949 年 2 月 16 日 …………………………………………………………… 457
№16485,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
1949 年 2 月 20 日 …………………………………………………………… 458
№16486,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
1949 年 2 月 21 日 …………………………………………………………… 459
№16487,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
1949 年 2 月 27 日 …………………………………………………………… 460

1945 年

№11963

斯克沃尔佐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宋子文访苏及美国的参与

（1945 年 1 月 12 日）

机　密

由于赫尔利向蒋介石递交了委任国书，今天我正式拜访了他。赫尔利在自己的住处，躺在床上接待了我。看到这种情况，我对他说："您的秘书应该事先通知我您生病了，那么，我就不会打扰您了，我完全可以过两三天来祝贺您递交国书。"赫尔利说，他根本没有生病，躺在床上，只是为了不去参加英国大使举行的午宴。

赫尔利说，最近周恩来将要到重庆，继续与国民党进行谈判。谈到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谈判的问题，赫尔利说，蒋介石曾经断然驳回了中国共产党通过赫尔利向国民党转达的那些建议，宋子文也激烈地反对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协定。但是现在，蒋介石却在实施中共建议，并谎称这些建议是自己首先提出来的。另外，宋子文也改变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以亲共产主义活动家的面目出现。"我真是完全不明白这些现象，"大使说。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赫尔利说，他已经知道了宋子文即将出访莫斯科，他非常关注宋的这次出行。"因为在宋子文与苏联政府领导人会晤期间，将解决与中苏关系有关的问题。"赫尔利打算在宋子文动身去莫斯科之前回美国。在返回中国时，他打算途经莫斯科。赫尔利希望在莫斯科与我们的领导人会面。

接下来，赫尔利狠狠地骂了英国人一顿。然后他说要预先通告我一个天大的秘密。赫尔利说，英国请求美国以租借的方式，向他们提供能够组编两个航空大队的 B－24 轰炸机，以便将这两个航空大队部署在昆明。英国人还请求提供水陆两用飞机。他们请求提供轰炸机的理由是：英国陆军部队在实施"夺取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的行动时，必须借助这些轰炸机的帮助。赫尔利对于"夺取泰国"这一表述极其愤怒，他称英国人是帝国主义分子，千方百计地想吞并另一个主权国家——泰国。赫尔利说，华盛顿已经就向英国提供用于组建部署在昆明的航空大队轰炸机事宜征求了他的意见。按照赫尔利的说法，他既反对允许英国人进入昆明，也反对向英国人提供那些轰炸机和水陆两用飞机。

赫尔利还讲述说，英国大使塞穆尔称他是"红军的先进代理人"，就因为他对红军做出了

高度评价。赫尔利说，塞穆尔还散布谣言，说我们大使馆正在从事着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赫尔利邀请我共进午餐，并说，他希望这顿午餐成为苏美友好的午餐。但是，他不愿意邀请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澳大利亚人、比利时人或者荷兰人出席这样的午餐，“因为他们都是帝国主义分子”。

我的看法是：

1. 中国人已经把宋子文即将出访苏联的事情通报给赫尔利。也可能，中国人还请求美国人在与我们进行谈判的时候支持他们。鉴于这一点，赫尔利打算去找罗斯福，并向他提出在莫斯科谈判时支持宋子文。由于不希望宋子文脱离自己的控制，赫尔利计划返回中国的时候经过苏联，并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一直逗留在那里。也可能，赫尔利还打算参与宋子文与我们的谈判进程。从另一方面来讲，利用在宋子文出访莫斯科期间，自己也一直逗留在那里，赫尔利希望制造一种三方谈判的印象，中国人可能会利用这一点达到宣传的目的。

2. 一方面美国同英国及其自治领的矛盾，另一方面美国同在华的法国人、比利时人和荷兰人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化。美国人在同自己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竭力想把我们拉到自己一边。赫尔利今天接待我的时候，以“生病”的理由拒绝了与英国人共进午餐，这是有意强调与我们的良好关系。我认为，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加强美国与自己在华敌人进行斗争中的地位以及使我们与在华的美国的敌人之间产生某种猜疑和纠纷。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T. 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6, п. 244, д. 14, л. 56 – 58

№11967

斯克沃尔佐夫致莫洛托夫函：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

(1945年2月3日)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B. M. 莫洛托夫同志：

谨以此函，向您汇报1945年1月中国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和现象。

一、1945年1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进行的谈判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使国民党感到极度不安。因为无论是在中国的

所有进步阶层中，还是在国外，中共的这个要求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有鉴于此，国民党领导层做了许多努力，以便建立一个能够使国内外社会舆论的注意力从联合政府问题上转移开的某种组织。对国民党一些著名活动家（王世杰等人）的建议进行讨论的结果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建立一个政治委员会，在该委员会成员中，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可各派 2 名代表，再加上外交部长、军事部长和财政部长。在政治委员会中，只有 4 名委员可能会成为国民党的反对派，因为所谓的“无党派人士”，都是从那些与国民党分子志同道合的人之中挑选出来的。按照国民党的意图，这个委员会能够使所要求建立的联合政府丧失活动能力。

1945 年 1 月 15 日，国民党指使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了自己提出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希望尽快使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议生效。蒋介石在当天（即 1 月 15 日）邀请了一些国民党人士和民主同盟的领导人左舜生（他还是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等参加自己的午宴，并向他们宣布了关于建立由上述人员组成的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当左舜生弄清政治委员会将是行政院的一个组织机构，且只能是一个协商性质的机关，它的所有决定都必须获得一系列机关的批准之后，他声明说，他不能同意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这个政治委员会。国民党分子进一步劝说左舜生派民主同盟的代表参加政治委员会的尝试也没有获得成功。

最突出的一点是：国民党只是极力争取民主同盟参加这个委员会，而同中国共产党并未进行有关这一问题的任何谈判。国民党打算争取民主同盟的同意且公开宣布成立政治委员会，然后再建议中国共产党派自己的代表参加该委员会。他们企图利用共产党拒绝参加委员会这一点来反对共产党。

延安方面立即识破了国民党的诡计。1 月 24 日周恩来同志飞抵重庆。在抵达重庆之后，周恩来发表了声明，说他来到这里是为了与政府和其他各阶层人士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具体措施的。周恩来说，他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建议，召开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会议，该会议应该成为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联合政府的预备性协商会议。他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以下几点要求：1. 取消国民党一党制专政；2.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司令部；3. 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存在；4. 取消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各项法律；5. 取缔特工机关（国民党的情报机关）；6. 释放政治犯；7. 承认一切抗日的队伍；8. 取消对特区的封锁；9. 承认各解放区以民主方式成立的政府。

这个声明还被刊登在 1945 年 1 月 25 日的《新华日报》上。第二天（也就是 1945 年 1 月 26 日），《新华日报》刊登了民主同盟 1945 年 1 月 15 日的呼吁书，该呼吁书就其实质来说是重复了周恩来声明的头 7 条内容。此外还提出了如下要求：1. 取消集中营和法西斯组织；2. 实行公开的金融政策，由代表机关讨论和批准财政预算；3. 保证人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增加军饷，帮助灾区的居民；4. 立即停止国民教育的国民党化；5. 加强与苏联的友谊，加强与英国、美国和其他盟国的关系。

无论是周恩来同志的声明，还是民主同盟的宣言，就其实质来说，都反对国民党所通过的关于建立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国民党分子直截了当地说，周恩来到此就是为了进行反对

建立政治委员会的斗争的。在1945年1月的最后几天里，国民党分子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猛烈攻击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毫无疑问，国民党报刊坚决反对建立联合政府的声明，证明蒋介石已经动员自己的力量进行反对建立联合政府建议的斗争。

美国人，尤其是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竭尽全力地促使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宋子文前往莫斯科之前达成某种协定。他们还威胁说，如果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没有达成协定，罗斯福是不会来中国的。

目前，国民党的观点是建立政治委员会，并千方百计地辱骂那些建议成立联合政府的人，而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则坚持成立联合政府，并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以说明按国民党计划的构想建立政治委员会是没有必要的。

二、1945年1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给自己的各级组织下达了一系列指示，加强反对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所有自由活动家的工作，并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关于共产党罪行的通报》，通报重复了国民党在15年期间一直散布的那些谎言。在本报告的这个月，国民党变本加厉地进行自己的反共活动，在一些地方展开了逮捕活动，还发生了国民党军队进攻新四军小分队的事情。

我们倾向于认为，目前对反共宣传活动的加强，是为了使反对成立联合政府问题的斗争尖锐化。

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通过了关于在1945年5月5日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预定将在会议上讨论如下问题：1. 修订抗战和进行国家建设的规划；2. 国民党对反对党的态度；3. 召开国民大会和实行宪法；4. 选举领导机关。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三次全体会议，将赶在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召开。

国内政治局势的尖锐化，迫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重新审核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关于在战争结束之后一年内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大会的成员将是那些早在1936年就被国民党指派或者网罗到一起的人。大会的这些组成人员将不会反映出人民的想法，因此，中国的进步阶层要求对国民大会的成员进行重新选举。

四、1945年1月上旬，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又恢复了战事。在南方，日本军队从广州方向，沿广州—汉口铁路线采取了进攻行动。1月26日占领了广东省政府的驻地——韶关(广东)。这批日本军队继续向北推进，打算与那些从河南方向南移的日本军队汇合。大概，这些日本人将在最近的2—3周内会合。在这种情况下，广州—汉口的整个铁路线将处于日本人的控制下。目前，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认为美国的空降兵部队可能于1945年3—4月间，在中国的沿海地区登陆。日本军队开始从河南向东部进攻，企图清除中国整个东南部地区的中国军队。日本人的作战行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

中国政府声明说，日本人的这些战斗行动对它来说并不可怕。由于中印公路的开放，中

国总的军事形势已经有所改善,沿着这条公路他们每月将会获得10万吨军用物资。这条公路的开放在中国新闻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五、1月份,日本在重庆的间谍分子加紧了破坏行动。目前这些活动是针对美国机关的:1月19日他们焚烧了美国大使馆的大楼;1月22日焚烧了无线电台和美驻华武装力量参谋部的办公处所。

六、中国报界极其关注即将召开的苏联、美国和英国三大国的领导人会议。他们表示希望在这次会议上,附带制订出击败日本的计划。中国人写到,在临近会议召开时(指的是1945年2月底),欧洲的战争将会结束,苏联将会表明自己对于参加对日战争的立场。国民党的情报机关还散布谣言,说苏联已经开始积极准备参加与日本的战争了。为了使自己的谣言具有说服力,他们还声明说,苏联军队正在向远东地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调运。远东的红军舰队,正在进行演习,准备参加对日战争。为了对付苏联的行动,日本人也在向东北地区频繁地调集部队。

七、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取得的成绩,引起了中国绝大多数活动家、外国外交人员和中国报界极其广泛、热烈的评论和称赞。①在这些赞扬中也能听到一种担忧的声音,即红军将会第一个冲进柏林。实际上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不希望我们的军队第一个冲进柏林。

八、由于新疆发生的起义事件,反苏宣传活动仍在继续着。中国人,尤其是受蒋介石委托前往新疆调查哈萨克人起义原因的卜道明,在自己朋友的小圈子内声明说,起义分子从苏联获得了武器,其中包括小口径步枪。

与此同时,中国人还希望就新疆省贸易和经济合作事宜与苏联达成协议。在此附上的中国政府的建议是卜道明新疆之行的产物。中国人非常清楚,没有我们的参与,他们是无法满足新疆居民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的。他们希望将我们的货物运入新疆,以此来减少当地居民的不满情绪。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T.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3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5, п. 237, д. 11, л. 34-40

① 1945年1月,苏联红军开始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役。——编注

№11971

斯克沃尔佐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建立联合政府谈判

(1945 年 2 月 14 日)

机 密

周恩来同志今天在大使馆用过早餐。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工作十分繁忙，于是在就各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礼节性问候之后，马上询问他这次来重庆取得了什么成果。周恩来把自己起草的关于与国民党代表谈判总结的声明草案给了我，以此作为对我的答复。草案内容如下：

“我在重庆逗留了 3 个星期。这段时间，我与国民政府的代表、行政院代理院长宋子文博士、王世杰博士和张治中将军，进行了多次交谈。

为了动员和联合中国人民的所有抗日力量，使他们努力与我们盟友的行动协调一致，战胜日本侵略者和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计划。同时，为了讨论实现这个计划的具体措施，我还向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中国民主同盟提出建议，以政府的名义召开各政党代表参加的大会，正式讨论和决定关于以何种方式取消国内一党制的管理、如何将目前的政府改组为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同时制定共同的纲领，以便使国民政府利用类似的措施实现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计划。

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原则，承认一切抗日党派和组织的合法存在，确保人民应有的一切自由，承认一切抗日队伍和以民主选举方式在解放区和占领区成立的地方抗日政府，真诚地支持华盛顿公约、莫斯科宣言以及开罗会议所制订的使日本遭到彻底失败的计划，建立独立、自由、富强、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以上这些无疑应该成为联合政府的政治内容。

国民政府的代表只是接受各党派代表会议的形式，但是改变了其名称。至于在代表大会的内容(工作)方面，则存在着重大的分歧。

中国共产党提议的程序可归纳如下：召开各党派代表的协商会议，宣布立即取消一党制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最高联合指挥部；在该政府的领导下筹备召开国民大会和成立立宪制政府。这样的程序可使中国走上民主化道路。

国民党当局提出的程序可归纳为以下几点：召开代表会议而不是各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继续维持一党专政，吸引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到由一党(即国民党)管理的政府中，召开国民大会，其成员是在去年就已经选举好的，并通过以前制定的宪法或者对其进行修改。这种程序是一党制专政的继续。

如果一党专政不被取缔，那么，政治制度和政策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队伍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被动员和联合起来。这样一来，在这个党的管理下，无论策略

有何种改变,也不可能有利于民族事业。

由于存在这些重大分歧,我应该返回延安,向我党中央委员会汇报。

在谈判期间,我曾向国民政府的代表建议,为了改变目前的政治状况,国民政府首先应该释放爱国的政治犯,宣布取消一切旨在压制人民自由的法律,停止特务机关的一切活动,撤出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八路军、新四军的队伍。但是,从国民政府代表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只有在签署协定之后才能研究这类问题。

所有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在此次谈判中两党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尽管如此,军事形势和全中国人民的要求以及联合国的希望仍然是:中国一切抗日力量应该立即联合起来,以便尽快打败日本。因为如果目前还不这样做的话,那么,所有人都会感到不安和恐慌。

我们可以坚定地相信,全体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政党,一定会找到尽早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的。

美国大使赫尔利将军在近几个月的谈判期间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热情的帮助,赢得了极高的评价。但直到目前为止,谈判仍未取得任何成果,这使美国的声望也受到了损害。”

对于这份声明草案,周恩来同志补充说,昨天,也就是1945年2月13日,这场谈判闹剧终于落下了帷幕。蒋介石接见了周恩来、王世杰和赫尔利,对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蒋介石声明说,革命给予了他权力,他将把这种权力转交给人民,而不是什么政党,并且只能通过国民大会进行,而不是某种党派之间的协商会议。

周恩来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政治党派代表的是人民。蒋介石回应的是,这些政党并不代表中国人民。

周恩来同志说,在最重要的政治问题上,国民党不想做任何让步。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的关系,周对此的答复是,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人协商他们的工作,因为它自己单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情的。

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赞同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他们还制定了在这个问题上与中国共产党共同行动的纲领。在回答了我的相关问题之后,周恩来同志说,参加国民党左翼分子集团的人有:孙科、覃振、邹鲁(他认为邹鲁是最近几年变成“左倾”的)、王昆仑(纲领的作者)、钟天新(Чжун Тяньсинь)、李烈钧。周恩来同志说,国民党的左翼分子需要道义上的支持。按周恩来同志的话说,于右任和冯玉祥持动摇不定的立场。周恩来同志尤其尖锐地批判了宋子文。他称宋是美国资产阶级的买办,并指出,宋子文经常出现在赫尔利的住所里,在与赫尔利交谈时,他担心孙科的竞争力,说孙是亲苏分子(关于这一点是赫尔利告诉周恩来的)。周恩来同志认为,只有当宋子文本人失去权力的时候,他才会成为蒋介石的对立派。

我向周恩来同志询问,今后将如何开展民主化管理运动。他的回答可归纳为:有3个因素能够把政府推向民主化,即:1. 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的存在;2. 人民的要求;3. 国

际局势。

就此结束了会谈的主要内容。会谈大约进行了50分钟。

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
T.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2月14日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3，л.66－70

№11976

斯克沃尔佐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中苏关系问题

(1945年3月2日)

今天孙科是在大使馆里用的午餐。午餐结束之后，在会客厅里我说，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推测，已经没有任何希望表明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同盟提出的要求做出让步了。孙科回答说，蒋介石只是表面上做出将不进行任何让步的样子，但是，形势将迫使他向民主主义分子做出一系列的让步。

接着，孙科指出，最近周恩来和董必武应该来到重庆与国民党继续进行谈判。

随后，孙科说，今天中国共产党驻重庆的代表王若飞探访了他，并向他询问了——最近一段时间流传的关于他将前往莫斯科的说法是否正确。按照孙科的话，他是这样答复王若飞的：关于这件事他一无所知。

此后孙科指出，先前大家都知道宋子文将于2月底访问莫斯科，但是，现在他似乎又不去了。孙科问我：关于这件事我是否知道些什么。我告诉他，我国政府已经通知傅秉常大使，由于展开了重大的军事行动，斯大林大元帅需要在前线待上很长一段时间。因此，我国政府表示最理想的是，宋子文能够在4月下旬或5月份来莫斯科。

孙科问我在什么报刊上发表了克赖诺夫关于批评中国目前局势的文章。我回答他，这篇文章是在《消息报》上发表的。① 孙科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希望在苏联报刊上多刊登一些关于批评中国缺乏民主的文章。他说，这样的文章将会给国内的民主运动以很大的帮助。对此他还补充说，美国也批判中国缺乏民主，并且比苏联报刊批评的还要尖锐。孙科说，苏联报刊

① 指П.克赖诺夫在1944年12月1日《消息报》发表的文章《关于中国的局势》。——编注

最好是根据蒋介石在宪法实施促进委员会会议(3月1日)上的讲话,发表一篇批判性的文章。孙科还叙述了自己的构想:在苏联报刊的批判性文章中,不应该表明自己倾向和同情哪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而是从对两个党派态度一致的立场出发进行批判。

孙科还问我,B. M. 莫洛托夫是否参加旧金山会议。我告诉他说,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本次谈话的最重要的内容就这些。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T. 斯克沃尔佐夫

文件共3份,抄送:莫洛托夫同志、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29, п. 205, д. 11, л. 82-83

№14614

斯大林与赫尔利、哈里曼会谈纪要:对华政策

(1945年4月15日)

斯大林同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和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的会谈纪要

1945年4月15日

与会人员: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和美国大使馆二等秘书 Э. 贝茨。

赫尔利说,在离开美国之后,他突然听到了关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

赫尔利说,总统委托他同斯大林大元帅谈谈关于中国的局势。他(赫尔利)上次在莫斯科时,曾同莫洛托夫谈过此事。莫洛托夫公开阐述了苏联对中国问题的立场,并告诉他(赫尔利)一些宝贵的信息,这些信息都是正确的。首先,他(赫尔利)想对中国局势做简要分析。他(赫尔利)同中国的“人造奶油式的共产党人”进行过会谈。他(赫尔利)同斯大林会晤的目的是弄清楚苏联的立场,因为美国将不得不同苏联在中国事务上进行合作。上次莫洛托夫说过,中国共产党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他们是一群努力要在中国进行改革的人。莫洛托夫还谈到,苏联政府不希望中国出现内部争斗和国内战争。莫洛托夫说,苏联想同中国建立一种更加密切而和谐的关系。但是,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让中国当局停止对苏联在华公民的歧视和排挤。莫洛托夫还谈了1936年在蒋介石身上发生的不愉快的事件。显然,在这一事件中,苏联政府向蒋介石提供了巨大的帮助。他(赫尔利)同莫洛托夫曾谈过这次会

谈，而且为了让蒋介石相信苏中两国具有友好的关系，费了许多时间。最后，蒋介石说，他将派特使前往苏联同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以便同苏联建立更加密切与和谐的关系。蒋介石还谈到了派自己的儿子去苏联的事，他是在苏联受的教育，参加了苏军，娶了俄国女人做妻子。

蒋介石允许他(赫尔利)去延安同共产党人——中国的活动家举行会谈。他(赫尔利)发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家努力在反日战争中同国民政府进行合作。中国共产党人相信，他们的信念同中国民族主义者的信念是相符的，他们也是孙中山关于成立民族政府思想的拥护者，中共还向重庆派遣了自己的代表团。他们声明，如果成立了联合政府，他们就准备参加，并准备移交自己的军队归政府统一指挥。中国共产党人同重庆政府代表就这一问题进行过会谈，谈判双方深入探讨了一些细节问题。同时，这几次谈判给人的一个印象——前景是光明的。当参加旧金山会议的邀请发出去以后，中国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他们被告知，这是各国之间的会议，而不是各政党之间的会议，如果他们想派出自己的代表与会，中国共产党应被吸收到中国代表团中来。共产党人要求允许他们也指派代表。蒋介石同意这样做。现在参加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中将有来自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赫尔利说，我们在蒋介石面前坚持让他在统一中国共产党人的武装力量和联合中国各民主党方面做出让步，以便把日本人赶出中国。谈到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会谈时，他(赫尔利)向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通报了这一内容，他(赫尔利)同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经常举行会谈。

他(赫尔利)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和苏联政府能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实现联合和团结。

斯大林感谢赫尔利通报的消息，并表示，苏联政府将采取一切措施促成中国武装力量的统一。

赫尔利对斯大林的话表示感谢，他说，在伦敦他同丘吉尔见过面，丘吉尔也同意在中国军事力量统一方面提供帮助。

斯大林问，赫尔利是否知晓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形成的关于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文件?

赫尔利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蒋介石是否知晓这份文件?

赫尔利做了否定的答复。

斯大林问，关于罗斯福的应当由谁来向蒋介石通报这一文件的计划，赫尔利是怎么考虑的。罗斯福在克里米亚答应通过赫尔利或者其他人去做这件事。

赫尔利表示，今天他正好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谈此事。罗斯福把文件的内容告诉了他(赫尔利)，并事先提醒他说，在斯大林大元帅没有发出相应的信号之前，他(赫尔利)不能向任何人谈关于文件的事。他(赫尔利)现在想知道，斯大林是否想让他(赫尔利)尽快把这份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还是暂不告知。总统去世后，他(赫尔利)收到杜鲁门的电报，电报中重申了罗斯福就此问题的指示。

斯大林说，在克里米亚，罗斯福表达一种担心，如果文件的内容让中国一些领导人知晓，他们会因文件的内容而产生分歧。如果赫尔利认为需要等等的话，那么，他(斯大林)不反对

这样做。他(斯大林)建议赫尔利自己决定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的时间。问题在于,苏联军队在远东集结和为战役做准备需要2—3个月的时间。显然,准备工作不可能早于7月上旬完成。当准备工作完成后,他(斯大林)就不担心公布文件的后果了。因为到时候,他(斯大林)已经为苏联参加反日战争找到了借口。但是,在此之前,需要考虑到日本人可能会发起挑衅,他们现在在满洲部署有一些军队。

哈里曼问道,当宋子文来莫斯科时,他(哈里曼)认为,将不得不把文件的内容告诉宋子文,因为这份文件事先规定了要签订苏中条约。有鉴于此,现在就向蒋介石通报文件内容是否合适。

斯大林回答说,宋子文将在旧金山会议结束之后来莫斯科,大概不会早于5月末。当然,需要现在就把文件的内容告诉蒋介石。但是,由于准备需要必需的时间,他(斯大林)还认为,在宋子文来莫斯科之前就把消息告诉蒋介石是不可行的。

赫尔利回答说,如果没有斯大林大元帅的事先提示,他是不会把这一消息告诉蒋介石的。当他(赫尔利)认为到了可以这样做的时候,他会通过哈里曼大使向斯大林大元帅通报这一情况。

斯大林说,这样最好。

赫尔利说,现在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提及1942年自己同他(斯大林)的会谈。他(赫尔利)当时说过关于首先进行太平洋战争,然后再进行欧洲战争的必要性问题。斯大林大元帅让他放弃了这样的想法。如今的事件表明,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是正确的。

然后,他(赫尔利)感谢斯大林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期间允许他参观苏联军队。斯大林大元帅还允许他在高加索逗留。对此,他(赫尔利)对斯大林大元帅非常感激。前线之行使他(赫尔利)对苏联红军产生了极好的印象,他曾向总统和马歇尔将军谈过自己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说,太平洋战事进展得比我们预期的要好。

赫尔利说,他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动用被占领地区的资源。他(赫尔利)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事情果然如此。

斯大林回答说,日本人没有足够的运输船只。

赫尔利说,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使用夺取的资源。

哈里曼说,他想弄清楚两个问题:第一,他想知道,中国人将要发动的战役对苏军的作战行动具有什么意义?

斯大林回答说,他对现在中国的军事状况知之甚少。但是,如果中国人能拖住日本人,防止其由南向北撤退,破坏日本人的后方和炸毁桥梁,这将会给苏军提供不小的帮助。

赫尔利说,在此他想向斯大林大元帅谈几句关于中国军队目前的状况。中国军队装备不好,吃的也不好,但是,当史迪威将军向缅甸调过来5个师和优秀的指挥官后,他们仗打得很好。另一方面,装备很差的中国军队在日本人的猛烈进攻面前撤退了。

斯大林说,中国人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优秀的指挥官。中国士兵本身拥有非常好的作战能力。

赫尔利说，同国民政府的军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训练有素，善于作战。

斯大林回答说，这是可信的。同国民政府的部队相比，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很少贪污受贿。

赫尔利表示，无论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中国国民政府，都极大地扩编了他们所指挥的军队。例如，中国共产党人就证实，他们现在拥有 800 万兵力。实际上，他(赫尔利)认为，他们拥有的兵力不越过 150 万。

斯大林说，这可以称作是“中国人的策略”。

赫尔利笑着说，这是非常准确的评价。

斯大林说，中国军队中营私舞弊盛行。如果吃掉一个师或旅团，那他们的指挥官在占领中国的某一个地方后会立即向居民课税。这些师或旅团的指挥官会把赋税中的大部分放入自己的腰包。结果，居民对军队很不友好，不愿意供应粮食。

赫尔利说，斯大林说得完全正确。目前在中国的美国人正在极力纠正这些恶习。其中，蒋介石本人表示在这方面要充分合作。美国人成功地说服蒋介石撤了他内阁中的 3 名部长。

斯大林说，蒋介石是一位大公无私的人，可能他对他的国家出现的事一无所知。

赫尔利同意斯大林的观点。

赫尔利说，目前美国人正着手装备和训练 36 个中国师。如果中国军队能成功实现统一的话，再加上中国共产党人的部队，那么，中国总共将拥有约 40 个师的训练有素和善于作战的军队。

斯大林说，这一数量的军队对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来说足够了。

哈里曼问道，新疆方面有什么消息?

斯大林说，在新疆，乌鲁木齐居民不断起义，掀起了反对仅占新疆居民人口 5%的汉族人压迫的斗争。另一方面，至于双方军队的人数，回族人有 300—400 人，而汉族人有 600 人。那里正开展大规模的斗争。

赫尔利说，他还没去过新疆，不能对那里的情况进行评价。但是，他(赫尔利)期待返回中国后能去那里看一看。

赫尔利感谢斯大林的谈话。

哈里曼说，他有一两个问题请教斯大林。杜鲁门总统打算履行克里米亚关于波兰问题的协定。当然，遗憾的是，总统近来不能回复斯大林大元帅的信。波兰问题是重要的问题，美国政府认为必须尽快解决。他(哈里曼)建议，当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时，他(莫洛托夫)将同斯退丁纽斯和总统讨论这个问题。美国政府期待能找到共同语言来解决它。总统在给斯大林大元帅的信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同斯大林大元帅的观点有些分歧。他(哈里曼)不知道，斯大林将给总统什么样的答复。但他(哈里曼)受政府委托表达这种期待，莫洛托夫在华盛顿讨论关于莫斯科委员会的问题，指的是成立实质性的，而不是形式上的新政府，也就是说，不是换一块招牌就可以的。美国政府认为，波兰政府推荐的那些人士应该是：第一，准备同苏联进行合作的人；第二，赞同克里米亚协定的人。

斯大林说，他不能赞同哈里曼在关于成立完全新型的波兰政府的问题上的后一种意见，

因为华沙政府已经在波兰活动，并有同德国人作战的自己的军队。阿尔齐舍夫斯基①还没有同德国人作战。

哈里曼说，新的波兰政府并不是指要吸收阿尔齐舍夫斯基，也不是指吸收萨佩格②主教，只是建议邀请他作为波兰天主教阶层的代表进行协商。

斯大林说，波兰问题委员会应该在我们三大国领导人的一次会议到另一次会议之间进行工作。现在，我们三个国家的代表——斯退丁纽斯、艾登和莫洛托夫已经在旧金山。哈里曼和赫尔利也将在那里。他们可以讨论波兰问题。

哈里曼说，这么说，莫洛托夫将进行一次艰苦的谈判。

哈里曼请求斯大林允许在波茨坦的美国人的飞机可以飞往美国基地，以及今后允许美国飞机在苏联领土着陆。

斯大林说，关于在波茨坦的美国飞机问题，他已指示准予通行。至少后面的问题，美国飞机着落是好客之举。但是，他（斯大林）要求，今后这些飞机不能给阿尔齐舍夫斯基的代理人空投货物、武器。

哈里曼说，他对斯大林的这些话感到吃惊，因为这样的行动违反美国政府的政策。他（哈里曼）感谢斯大林大元帅提供的关于供今年研究的具体情况的情报。

斯大林同志答应向哈里曼转达这样的情报。

记录人：B. 帕夫洛夫

РГАСПИ，ф. 558，оп. 11，д. 374，л. 77－84

№11994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谈话纪要：赫尔利访苏情况

（1945 年 5 月 10 日）

摘自 A. 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在我对赫尔利进行正式访问时，经过短暂的礼节性的寒暄之后，他向我讲述了如下内容

① 托马什·阿尔齐舍夫斯基，曾是波兰社会党“自由、平等、独立”派领导人之一，1944 年秋担任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编注

② 萨佩格，波兰著名宗教领袖，1946 年任红衣主教。——编注

(以下援引的是赫尔利以第一人称讲述的内容)：

"我是一名共和党人，罗斯福总统是民主党人。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我是罗斯福总统的反对派。在战争最初日本人进攻的战斗中，我两次负伤。此后，我回到美国，并反对总统采取的关于'先欧洲，后亚洲'的决定。我曾坚信，战争首先应该从亚洲展开，因为使日本人有机会巩固自己在所占领的太平洋国家里的地位，从我的观点来看，这就意味着今后无法将日本人从这些国家驱逐出去。我考虑的是以下两个基本因素：第一，太平洋地区殖民地国家的居民仇恨欧洲人，仇恨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欧洲人所实施的那个冷酷无情的制度。一部分居民会把日本人看作是自己的解放者。第二，如果给日本人时间使他们建立起对那些被占领国家绝大多数居民的剥削制度并开发和利用这些国家最丰富的物质资源的话，那么日本的经济实力就会迅猛地增长，其结果是根本无法战胜它。我向罗斯福总统坦率地讲述了这一切，从我担任军事部长职务时起我就非常了解罗斯福总统。

罗斯福总统认真地听完我的讲述之后对我说，虽然你的话有很多是正确的，但是，决定已经做出，在政策方面将不可能有任何变动。我回答罗斯福总统：虽然我根本不赞同所做出的决策，但是，在这场战争中我将支持总统。于是，罗斯福建议我到苏联走一趟。总统说，关于红军、关于它的战斗力以及苏联领导人想的是什么，我们缺乏足够可信的信息。总统还建议我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莫斯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

我是1942年底来到莫斯科的。斯大林大元帅极其热情地接见了我。我毫不拘束地向他阐述了自己对于欧洲和亚洲战争的看法。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做的那些解释，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在很多方面成功地说服了我。现在，我应该说，当时斯大林大元帅对我所说的许多话，都准确地应验了。根据我对事态的理解，有许多还在不断地被证实。首先，斯大林大元帅向我详细说明了日本的情况，并使我确信，我对日本未来实力的担心是过于夸张了，没有德国，日本是无法发展军事工业的，尤其是飞机制造和核潜艇制造工业。第二，斯大林大元帅完全同意我的关于太平洋国家居民憎恨白种帝国主义分子的说法，并指出，我又过高地估计了日本人在这些国家建立剥削制度和开发利用这些国家物质资源的能力以及这些国家居民对日本人的喜欢程度。在与斯大林大元帅进行了几次交谈之后，我成为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支持者。在罗斯福总统交给我的所有问题上，我与斯大林大元帅完全达成了一致意见。尤其是众所周知，那时英国自己几乎没有武器，他们购买了我们的大部分武器，英国人反对美国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因此，我与斯大林大元帅达成一致意见：将一条叫特兰斯的伊朗公路直接控制在俄国人和美国人手中，不能让英国人经手，否则的话，供给苏联的武器就会被英国人扣留。

第二天早晨，当我拜会斯大林大元帅时，元帅问我对他还有什么要求。我说：'作为一名士兵，我非常希望参观红军队伍，并且是到您打算包围德国人的斯大林格勒地区。'斯大林大元帅对此非常吃惊，并问我是从哪里知道俄国人打算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包围德国人的。我告诉他我是猜测的，斯大林大元帅的这个问题使我坚信，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于是，斯大林大元帅打开了挂在他办公室里的军事地图的帷幕，并向我展示了即将在斯大林格勒附近开始

的摧毁德国人的作战计划。斯大林大元帅对我说,我是他允许参观正在作战的红军队伍的第一个外国人。第二天早晨,在8架歼击机的掩护下,我乘飞机前往斯大林格勒地区。

在斯大林格勒地区我结识了几乎所有的指挥员,我还到达了距德国人160公里处的后方坦克部队阵地,我对红军的战斗能力和战斗热情十分赞赏。我亲眼看到,红军是如何直接消灭了罗马尼亚和意大利的部队以及他们是如何有力地攻击德国人的。在返回莫斯科之后,斯大林大元帅又一次接见了我,他再一次问我还想看什么。我说,我想看一看在您和德国人之间你们所保留下的石油产区。斯大林大元帅向我保证说,俄国人从美国所获得的那些武器,已经很好地使用在将德国人与石油产地隔开的那一小块地区。现在,大元帅已经不再担心高加索石油区的安全了。第二天,我又乘机飞抵奥尔忠尼启则地区。在那里我看到了我们美国的飞机,并参加了一次红军从侧翼打击进攻的德国人的战役。同样,以在斯大林格勒时的那种心情返回了莫斯科。我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了热烈的感谢,并返回华盛顿。在华盛顿我向总统详细阐述了自己的印象,并高度评价了红军的战斗能力。随后,罗斯福总统致电斯大林大元帅,感谢元帅对我的热情款待。我强烈坚持关于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想法,但是,丘吉尔的方案取得了胜利。战斗行动在非洲开始了。我认为在非洲开始的行动是最愚蠢的想法,我们只能将责任归于顽固的丘吉尔。这场战役耗掉了我们巨大的力量和许多物资,并使我们在战略上完全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正如目前已经清楚的那样,如果不进行这场战役,如果立即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话,意大利就会像熟透的苹果一样,落在我们的手里。

不久,总统又一次召见我,并对我说,我们几乎没有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情况的资料。中国共产党人经常与俄国人保持联系,我们完全不了解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总统建议我再一次前往莫斯科,弄清楚俄国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态度以及俄国对于中国的立场。就这样,我再次来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我没有机会拜见斯大林大元帅,但与莫洛托夫先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会谈。我无法保证在此完全准确地引用莫洛托夫先生说过的话,但是,可以将他对形势分析的大意归纳如下:第一,不能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只是中国人民生活得非常艰难,他们极力想给自己创造一种还可以过得去的生活条件,而中国的共产党首脑人物正是因此而受到欢迎的。第二,俄国从来也没有帮助过,今后也不会帮助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武器,今后也不会提供。第三,在新疆事件过程中,是苏联的立场挽救了蒋介石的命运。尽管如此,蒋介石在对待苏联的态度方面仍然表现得颇有些忘恩负义。国民党正在系统地开展反对苏联的宣传活动。第四,虽然蒋介石有这样的举动,俄国在原则上仍然保持与中国友好的立场。返回华盛顿之后,我向总统汇报了莫洛托夫先生所做的这些分析。

此后不久,我作为美国驻华大使来到了中国。在这里我听到蒋介石、孔祥熙、王世杰、陈立夫等人多次抱怨,说俄国人正在帮助共产党人。于是,我向他们直接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允许我到延安去?这样我就来到了延安。在延安我证实了,莫洛托夫对我所说的一切都是非常真实的。不久我了解到,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荷兰以及其他国家都不希望中国的统一,并正在进行干涉和破坏这种统一的工作。通过与驻在重庆的这些国家的外

交代表进行会谈，我核实了自己获得的这些情报，这些情报资料是完全可靠的，这种破坏中国联合力量的工作正在进行着。我返回美国向罗斯福总统进行了汇报。罗斯福总统建议我前往伦敦，并就此问题与丘吉尔进行商谈。丘吉尔对我所说的话向我表明了，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不仅不追求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恰恰相反，他们将继续执行自己的帝国主义政策。丘吉尔对我是非常坦率的，并直截了当地对我说，英国对中国的统一以及它变成民主主义国家并不感兴趣。当我问他——英国是否将香港归还给中国时，丘吉尔回答说，有他活着就休想。于是，我向丘吉尔声明说，我不去中国，而是要返回美国，在那里我将公开发表演说，揭露英国在远东执行的帝国主义政策。经过长时间的会谈，我得到了丘吉尔的允诺：停止破坏中国统一的工作，虽然我没有成功地争取到他对美国关于中国统一的政策给予任何支持。在会谈结束时，丘吉尔嘲笑地对我说：'您真是一个怪人。他们在 5 000 年时间里都没能够统一，您想在 3 个月的时间里把他们联合起来。'我从伦敦直接飞抵莫斯科。

在莫斯科，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接见了我，我非常坦率地向他们讲述了我与丘吉尔会谈的整个过程，然后我直接向他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苏联是否愿意看到中国是一个民主的和统一的国家。斯大林大元帅和莫洛托夫向我保证说，这也正是苏联对中国的政策。他们对我说，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开展工作，苏联将会永远支持美国的这种政策。怀着这样的情绪我来到了中国，并考虑，为实现中国统一，目前我将做自己所能做到的一切。当然，我们是不能强迫中国实现统一的，但是，我们能够帮助他们实现统一。我认为，我应该保持与你们共同的路线。我坚信，美国和苏联在远东地区将会成为最好的朋友。"

在结束了这个冗长的故事之后，赫尔利突然请求我向他讲述一下，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做出了什么决定。

我回答说，我还没有掌握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情报，并表示怀疑，在这次会议上是否讨论了这一问题。

赫尔利向我保证说，他将会立即向我提供他所掌握的涉及苏联的或对苏联有利的任何情报。赫尔利说，在讨论有关苏联和美国在中国共同行动方面的任何问题时，他将非常高兴地看到我。接着，赫尔利说，在这次会晤过程中，他讲了很长时间，他请求我，下次会晤时，以同样的坦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我感谢赫尔利的诚恳，并说，下次我们将变换角色。

会谈到此结束。

出席此次会谈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 Б. С. 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А. 彼得罗夫

1945 年 5 月 10 日

文件共 3 份，送：В. М. 莫洛托夫同志、С. А. 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 年 6 月 7 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4, л. 120 - 125

№11999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各大国在华机构问题

（1945年5月23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赫尔利对我进行了回访。会谈一开始赫尔利将军就说，他这次拜访我，其目的就是使我对与蒋介石的会谈有个思想准备，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我即将与蒋进行会谈。

赫尔利向我讲述了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三次会谈的内容，尤其详细地阐述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态度的那些解释，即在第一次就此题目与B.M.莫洛托夫会谈时，莫洛托夫向他解释的那些内容。接着，赫尔利说，他坚信这些话是真实和诚恳的。“这样一来，我就了解了苏联的立场，但是，我从来也没有公开地说出这一点。因为应该说明这一点的是斯大林大元帅、莫洛托夫先生和驻华的苏联大使。但是，我一直都在劝说蒋介石，放弃自己在苏联对华政策问题上抱有的偏见。”

第一次出使中国时，赫尔利将军得到了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即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人。在重庆，尤其是在延安，他证实了，正如B.M.莫洛托夫所说的那样，他们（即中国共产党人）确实是“非常好的人，他们努力追求变革”。因此，在这一点上他千方百计地试图克服蒋介石那具有成见的想法。赫尔利说，他坚定地向蒋介石证明做出政治让步的必要性：“自然，在这个政治党派里存在着武装力量，是不能令人愉快的。但是，必须建立一个民主的基础来消除这种状况，以便使共产党人融洽地与蒋介石进行合作，并在共同的斗争中帮助他。”

在赫尔利看来，无论是在对待苏联，还是在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方面，蒋介石的立场都已经向好的方向转变了。

他（指蒋介石）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固执和难以接近了，也没有过多地、一味地指责中国共产党。如果共产党的军队将归属于国民党将军指挥的话，那么，他将同意承认共产党的军队。但是，共产党人只承认统一的、中立的指挥机关，也就是由美国指挥机关指挥政府军队和共产党军队。共产党人认为，如果他们同意由国民党来指挥的话，他们的军队将会在前线被日益消耗掉，他们将不会得到充足的和公平的供给。

赫尔利声明说，他为争取达成协定做了大量的工作。美国同苏联一样，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但是，美国自然不能武装一个政党，去对抗大家都承认的中央政府。在此，赫尔利指出，由于出版自由，在一些外国报刊上，尤其是美国的报刊中，发表了许多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真实的甚至是故意捏造的内容。自然，报纸也并不了解一切事情，某些记者指责他

(赫尔利)，说他只是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这些报纸的这种举动是挑拨性的行为，其宗旨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这一问题的新情报。作为自己努力对双方施加影响的例子，赫尔利指出，在决定关于参加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团成员的问题时，他给蒋介石发出了一封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电报，建议将中国共产党的4名代表列入代表团的组成中。蒋介石列入了其中的1名代表——董必武，毕竟这意味着蒋介石承认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接受了这个建议，这意味着他们承认中央政府。赫尔利说，他曾多次与蒋介石本人进行会谈，或者通过他的儿子、表侄和政府其他成员与其进行对话。

对于我的关于目前局势问题和中国统一可能发展的问题，赫尔利将军说，蒋介石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就与苏联关系的问题做了很好的讲话，随后在自己的讲话中，他又强调了必须加强统一，实行民主的措施，继续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因此，赫尔利认为，今后蒋介石将会预先采取相应的步骤，尤其是，赫尔利还预料说，近期蒋介石会邀请他——赫尔利，在谈判中继续进行调解工作。在谈到这一点时，赫尔利强调说，无论是宋子文，还是王世杰，都不可能直接同蒋介石说，也不可能向他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劝告他对中国共产党做出让步。赫尔利称自己是唯一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

以备我参加解决这个问题之需，并作为我即将与蒋介石进行会谈时给予的忠告，赫尔利说，在会谈之初，蒋介石讲话可能会很紧张、很冷淡，因为他是如此害怕俄国人和共产党人。赫尔利建议我，与蒋介石在一起时要委婉和慎重。接着他说，对蒋介石必须保持强硬的态度，绝不能对他过分地软弱(按英文的字面意思是："甜言蜜语地")，当蒋介石说他希望中国统一的时候，绝不能对他随声附和。接着，赫尔利向我表示，希望我向他通报自己与蒋的会谈情况。作为个人，赫尔利答应将不断向我通报他自己的每一个步骤和事态的发展情况。他确信，蒋介石一定会向他(赫尔利)通报与我的会谈内容。赫尔利声明说，在驻华的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之间，保持真诚和相互接触是必要的，因为我们两国在此有着共同的目标。

描述了在改善中国人对苏联人的态度以及消除他们之间的误会方面自己所做出的努力后，赫尔利说，作为对他所做的保证的答复，宋子文有一次声称，据说他(赫尔利)对情况知道得还不多。但是，他们(中国人)已经有了很多体验。按赫尔利的话，他曾经对中国人说，苏联和美国将是战后世界上两个强大的国家，如果在中国和苏联之间建立起友好和亲近的关系，美国不仅不会嫉妒，反而会非常高兴。对于中国人提出的他们应该怎样做的问题，赫尔利回答说，应该派一个人前往莫斯科协调解决各种问题。

赫尔利指明说，他曾有机会就蒙古、旅顺港和大连问题与蒋介石进行会谈。对于我的问题即蒋介石在这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赫尔利回答说，他(赫尔利)赞成在蒙古维持现状①，但蒋介石的立场应该由他自己来说明。赫尔利还指出，他曾向蒋介石证明，必须向俄国人提

① 在后来(1945年7月开始)进行的中苏谈判中，双方对在蒙古问题上"维持现状"的理解并不一致。中国人认为，"现状"即外蒙古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而苏联人认为，"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参见№07910文件。——编注

供一个不冻港,作为太平洋地区的一个大国,俄国应该拥有一个不冻港——旅顺港或大连。蒋介石似乎同意这一点,但同时又强调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损害中国的主权。

赫尔利把自己评定为"反帝国主义的英勇斗士",他抨击了英国帝国主义,说英国帝国主义正处于崩溃的前夕,而美国人已经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两次挽救了英国人。但是,美国人已经不愿意再这样做了。关于所有这一切,赫尔利仿佛直接对丘吉尔说过。在中国,蒋介石将会竭力争取英国放弃香港;美国,也可能还有苏联以及其他一些强国,都将会支持他,但是现在暂时还不应该直接对蒋介石这样说。让蒋介石自己去争取自己想要的吧。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认为,香港应该是中国的,中国的主权在那里应该得到保证。但是,蒋介石仍然准备保障英国人在香港的物质利益和安全。

我向赫尔利声明说,非常高兴与他会晤,他是一位非常懂得中国和苏联之间相互关系问题的人,并表示赞同,我们有必要在工作上保持经常接触。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 K. A. 克鲁季科夫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 年 5 月 23 日

文件 3 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 年 6 月 1 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3, д. 8, л. 140 - 143

№12 000

彼得罗夫与魏德迈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状况

(1945 年 5 月 24 日)

摘自 A. 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在就一般性的话题交谈之后,魏德迈[①]将军回答了我的有关问题。他说,如果给中国的士兵以良好的给养和武器装备的话,他们是很会作战的,可惜中国的军队人数太多了,目前

① 魏德迈 1944 年 10 月来华,继史迪威后为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兼蒋介石的总参谋长。——编注

正在努力裁减，以使它变得更好，更有战斗力，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利用现有的人力和财力。蒋介石已经答应给予帮助和合作，最低限度，在表面上他是这样做了。目前现有的军官学校、陆军学校和炮兵学校正在培训军事干部。

接着，魏德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诸如共产党军队的状况和装备情况如何，他还问我是否见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他说，共产党人主要以小股部队进行游击战争。关于未来局势，他说，我不能想象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将如何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为他们大概没有接受过这些方面的训练，不具备受过培训的军事干部，不可能大规模地投入在通讯、指挥和供给方面掌握复杂技术的军、师部队进行作战。魏德迈问我，是否掌握关于中国共产党军队装备情况的材料。

我对魏德迈说，关于这个问题他可能知道得比我要多，因为在延安有美国军队的代表。

魏德迈答复说，驻在延安的美国人，主要负责确保美国空军关于天气状况的常规情报。接着，他说，他很想去延安一趟，在那里逗留 7—10 天，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但遗憾的是他非常忙。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武官 K. A. 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文件共 3 份，抄送 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 年 6 月 1 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4, л. 134 - 135

№12004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中共在中苏关系中的地位

(1945 年 6 月 7 日)

摘自 A. 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6 月 7 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按照他的话说，他来访的目的是希望就中苏关系问题与

我进行一次非常坦诚的交谈。白崇禧开始谈到,他是苏联的老朋友,总是高度地评价苏联曾经给予中国的帮助以及对中国在各方面的真诚相待。白崇禧简述了我们与中国之间关系的历史,对于在1926年北伐时期和抗战最初阶段我们给予中国的帮助做了应有的评价。他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在最近一段时期里,中苏关系出现了一些恶化的迹象。白崇禧说,他非常希望能与我进行一次最坦率的谈话: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能使关于中苏友好的话题不致成为空谈,而确实变为真正的友谊。白崇禧强调说:"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我任何时候都可以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个人的建议,并且我的建议未必会无果而终。"我答复将军说,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即在我们两国关系中存在着一系列令人遗憾的不融洽,在此未必需要阐述迫使苏联停止对中国帮助的原因。我指出,苏联政府将欢迎中国政府为在两国之间建立起真正的友谊而采取的任何具体步骤。

白崇禧问:"我们应该做什么?苏联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我说,我只能表达一下我个人的立场:苏联人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上统一的、民主的主权国家。

白崇禧回答说:"所有这些都是基本的原则,如果考虑到苏联的整个政策,我们对于这些原则就会理解。请允许我向您提出几个问题,这些问题令中国的政治家们感到极度不安,我希望能得到您,一位带着友好使命再次从苏联来到中国的人对这些问题的最坦诚的回答。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令我们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大使先生,回答我的这个问题对您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您可能会说,您是一名外交官,国际关系问题是您的工作,而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属于中国的内部事务,您不想干涉中国的内部事务。也可能,您对于这样提出问题感到奇怪。而我们中国方面,非常希望听到您最坦率的意见: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持有什么样的立场。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我们完全不清楚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因此,我认为,对此问题坦率地交换一下意见对于两国都有益处。"

因为我急于出席一个招待会,不得不中断谈话,我答应白崇禧将军另找时间继续我们的会谈。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 Б. С. 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В. М. 莫洛托夫同志、С. А. 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4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3, д. 3, л. 128-129

№12006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及苏中关系

（1945年6月8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赫尔利将军说，他到我这里来带着两个问题。第一，他感兴趣的是，我与蒋介石会晤的情况，我与蒋是否进行了某种激烈的争论，我们之间是否出现了某种重大的分歧，这次会晤的气氛如何。赫尔利补充说，在这个星期里，可能是星期日，蒋介石将接见他。因此，他希望事先了解一下可能会出现哪方面尖锐的问题，也就是我与蒋介石会晤时可能出现的那些问题。第二，赫尔利向我通报说，他打算到延安去，以便继续进行关于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达成统一的谈判，并希望邀请我与他一同前往。

我说，是的，我会见了蒋介石总统，并与他就中苏关系等问题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谈话。在会谈过程中，我向总统表达了我们的、赫尔利也清楚的、关于必须保持和发展中苏之间睦邻关系的立场。

赫尔利开始证明，苏联和美国在远东地区政策一致的必要性。因为在亚洲地区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任何矛盾。因为我们在华的目的是一致的，我们希望中国统一。赫尔利认为，我应该同他一起到延安去，在那里我们能够与共产党人共同讨论形势，提出需要的建议。“如果我们一同前往延安，世界将会为之而惊奇！”赫尔利说。

在回答赫尔利我是否同意他的建议这个问题之前，我问他，是谁倡议恢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谈判的。他说，国民党向共产党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但是，中国共产党保持沉默，并以此表示，延安不会再相信国民党了。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是正确的。事实上，政府多次背叛和欺骗了他们。

赫尔利讲述他收到了毛泽东邀请他前往延安的电报。按他的话说，中国共产党不想再与国民政府对话，但对美国代表不会关闭大门，尤其是对他（赫尔利），因为他曾经帮助共产党人派他们的代表参加了旧金山会议。“共产党人将不会与政府进行对话，但是他们将会与我交谈，”赫尔利声明说。接着，他说了一些赞美的话，大体上是关于共产党人的，其中有一些话是赞美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的。他说，共产党人希望统一中国，但他们不愿意服从政府将军的指挥；他们同意服从中立的指挥机构——美国的或者是苏联的，但不是英国的，因为英国是帝国主义国家。

在答复赫尔利与他一同前往延安的邀请时，我指出，中国在政治上统一有利于一切爱好

自由的民族。赫尔利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是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我认为干涉这件事是不适宜的，也是不可能成功的。对此，赫尔利指明说，不久之前在干涉中国内部事务这方面他是有错误的，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我回答说，虽然他在这方面有错误，但没有任何人指责他在不久前为调解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所做的努力。

接着，赫尔利开始长时间地、详细地论证自己的策略。他说，当他在伊朗履行自己的外交使命时，也曾经遇到来自伊朗政府的许多责难。但是，仍然需要对这个国家的内政进行干涉，以便组织好向苏联供应武器的工作。赫尔利继续说："当我来到中国时，这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军事危机。因此，我参加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谈判，这不是干涉内部事务，而是干涉军事状况，干涉我们所进行的战争进程。干涉内政就是干涉战争，这是赢得战争所必需的。况且我们政府向我提出了请求——我能否帮助国民党与共产党人达成一致，而共产党人请求我——能否调和他们与国民党之间的矛盾。美国国会反对干涉内政，禁止我进行谈判，而罗斯福总统说：您自己看吧，可否为中国统一做点什么，能否调和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能否使中国的所有队伍联合起来，并对其进行统一的指挥。"赫尔利声明说，这种干涉是暂时的，不会持续到战后，因为和平时期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接着，赫尔利回忆起自己与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会谈的情景，在这些会谈过程中，他听到了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正确评价以及关于苏联没有帮助中国共产党人的声明。赫尔利再一次证明说，在亚洲地区美国与苏联之间没有任何矛盾。他仿佛已经对杜鲁门总统声明过，无论旧金山会议上出现什么争端，无论在欧洲和巴尔干地区出现什么矛盾，苏联与美国在远东地区是不会有任何争端和矛盾的。

在稍微停顿之后，赫尔利突然地、仿佛是无意中问到——我是否知道魏德迈将军打算到北部去。对于我的问题，即魏德迈出行的目的，赫尔利解释说：魏德迈前往北部是为了与苏联代表会晤；也可能，他还会访问延安。赫尔利补充说，对此应该严格保密，他告诉我这件事，是为了让我了解最新情况。魏德迈从重庆起程的日期还没有确定。

我问赫尔利——他打算何时到延安去。他回答说，可能在 6 月底，但也不一定；他力争拖延行期，是为了到那里时有较多的资本——来自政府方面更多的让步和建议。赫尔利不想两手空空地起程，像第一次那样，当时政府只对他说："试着公平解决这个问题吧。"因此，他打算先与政府进行谈判。赫尔利说，国民党非常害怕共产党人。宋子文、王世杰、程潜将军都对他说过，共产党人是不遵守诺言的，过去国民党曾经多次受到共产党人的欺骗。

赫尔利声称说，他将尝试劝说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人到重庆去。像从前一样，他打算劝说他们做出让步，同意在政府中担任提供给他们的职务，不管其数量如何。在赫尔利看来，最重要的是把双方的领导人聚集到一起，以便使他们开始在一起工作。赫尔利补充道，毛泽东像其他共产党员一样，并不反对蒋介石。

在结束会谈时，赫尔利问我，是否看了今天关于逮捕谢伟思和其他在华工作的 5 个美国人的报道，报道指控他们从事间谍活动。在回答了我的问题之后，他说，这大概不是特别严重的事情。当然，将会进行审讯并对他们做出判决。最终，这种判决将会反映出社会舆论对

他们的态度。

赫尔利称这6个人是小青年，他们干了既危险又愚蠢的事情——他们盗窃了机密文件，写文章咒骂美国政策，他们还攻击中国政府，企图推翻这个政府。他们之中的一个人甚至希望保护日本，他发表演说反对彻底摧毁日本。这些人觉得自己是"上帝"和"救世主"，他们希望拯救中国和日本。

赫尔利指出，在报纸上针对他们所执行的政策出现了许多虚假的内容。尤其令人不愉快的是，偷来的文件中的一些思想被歪曲了，为表明真实情况，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公之于众。在美国，由于出版自由，所有这些都能够得到发表。赫尔利还特别尖锐地谴责了《时报》记者艾萨克斯和其他报刊的记者。赫尔利声明说，指责他因某些权威人士在中国问题上持一些独立看法而解除他们的职务，是不公平的。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武官K.A.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6月8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16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3，п.244，д.12，л.130-133

№12013

彼得罗夫与白崇禧会谈纪要：关于中国统一问题

(1945年6月19日)

摘自A.彼得罗夫的工作日记

机　密

6月19日，白崇禧将军拜访了我，其目的是继续6月7日的谈话。会谈一开始，将军就向我提出了请求：根据在上次会谈结束时我的允诺，答复他当时提出的那个问题。

我问将军，他到底指的是什么问题。将军回答说："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问题已经具有国际意义。我非常希望您能给我说明一下，您对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的评价以及苏联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

我做了如下答复:“涉及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我觉得,将军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比我知道得更清楚。我认为,将军所掌握的情报资料,要比我从报刊上了解到的更详细。我非常关注当地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新华日报》,这份报纸足以充分地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和观点。尤其是不久前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更加充分地阐明了这些。因此,根据这些材料我能够判断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可归结为两个主要目的:第一,组建民主联合政府,这个政府将在国内实现政治上的统一;第二,加强反对日本的战争。众所周知,不仅仅是苏联,而且全世界一切联合的国家都希望看到中国成为一个民主的、政治上统一的国家。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以什么方式来实现这个统一,这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了。”

涉及苏联广泛的社会阶层对于中国目前状况的看法,它已经反映在最近苏联报刊公布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文章里,这些文章证明了苏联人非常关心中国在政治上的统一。这就是我在这个问题上能够对您说的全部内容。

作为个人,现在我想请将军说明一下自己对如下问题的看法:关于目前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问题,关于恢复谈判的可能性问题,关于国共关系的前景问题,关于在开始反攻行动和从中国驱逐日本人时这些党派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的问题。

白崇禧将军回答说:“您要知道,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有着自己的历史,谈到今天这两个党派之间的关系时,我不可能不简短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众所周知,还在列宁在世的时候,当苏联四面受敌的时候,当所有国家都把它看作敌人的时候,孙逸仙总理从自己的祖国,从桂林市给列宁发出了电报,表达了自己的好感。这封电报不可能不使列宁振奋,因为他看到在围攻俄国的众多敌人中,出现了一位清醒的政治家,这位政治家当时已经能够理解苏维埃的实质了。不久,苏联的第一位代表越飞来到中国孙逸仙总理面前。后来,在北伐运动期间,为了帮助中国,苏联的许多政治家和军事顾问来到这里。正如您所记得的那样,政治顾问是由鲍罗廷而军事顾问是由布柳赫尔领导的。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对于中国共产党持有真诚合作的立场,还通过了允许中国共产党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可以把那个时期评定为: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在国内真正合作和在外交领域保持友好关系的时期。后来,政府迁移到武汉,并开始向东部——上海和南京方面进军。我当时是首先攻入上海的那支部队的总指挥,因此,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切,并掌握着充分的情报资料。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是有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决定成立300万人的农民军队和一定数量的红军部队,并开始酝酿推翻现政府的计划。这显然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引起了分裂。接着,就开始了对日战争。国民党提出的口号是进行防御战争。共产党人在山西和延安也发表宣言,宣布自己支持防御战争和在军事政治领域服从中央政府的领导。我们自然乐意同意这种合作,因为这种合作能使国家在政治上统一和扩大力量以便同日本人进行斗争。尽管还存在着一些摩擦,仍然可以认为,在武汉政府时期这种国共合作是令人满意的。但是,当政府迁移到重庆之后,共产党人认为政府离他们远了,无法管理他们了,于是就开始千方百计地扩充自己的力量,袭击国民政府军,解除他们的武装,取缔地方政府机关。例如,鹿钟麟的

部队在河北讨伐日本人的同时，还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袭击，一部分士兵还被解除了武装。在山东，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封锁了道路，并解除了受到日本人攻击而撤退的省政府军的武装。在华中地区，面对日本绝对优势的兵力而撤退的韩德勤将军，遭到了背后的袭击，被共产党人抓获，后来被释放了。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众所周知和无可争辩的事实。我当然不愿意说，共产党人是同日本人商量好并按照日本人的命令行事的，但在客观上他们利用了日本人的攻击行动。很遗憾，这就是造成目前中国国内困难状况和难以评定国共两党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我还应该指出，这些冲突一直持续到今天，尽管我们对此保持着沉默，甚至在我们的军队遭到失败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对这一切保持着沉默，是因为国际社会对我们经常表现出不满，认为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却不能利用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不能够战胜中国共产党。"

我指出，分析历史事实会把我们拉得很远，我请求将军更详细地说明一下，目前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和政府的军队在什么地方，发生了多大规模的冲突。

白崇禧一边指着地图上的地点，一边回答说："最大规模的冲突在河南省的西部地区，在那里共产党大约有 3 万人的军队，他们越过了黄河并向西部进军。第二大冲突地区是在湖南省和江西省交界处，共产党的军队在这里有 2 万多人，他们强渡过长江，占领了一个县级城市。由于这些军队的逼近，在从潮州市向北的广东省东部地区的共军部队也积极活动起来。除此之外，冲突还发生在从高州向北的广东省西部地区，在浙江省的西部，沿北平—合肥铁路向西，在安徽省的东部地区也有大规模的冲突。所有这些都是冲突新的发生地，而像在江苏省、山东省和北方原有的冲突地区，我就不说了。在那些地区小规模的冲突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共产党人吹嘘说，他们有 90 万人的常规部队、300 万人的民兵。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的确，目前，共产党人拥有 30 多万支步枪，包括破旧的和老式的品种。应该说，在开始防御战争的时候，他们只有大约 3 万支步枪。他们靠什么补充了这么多的武器？共产党人吹牛说是靠从日本人手中缴获来的。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指望日本人你是不可能得到这么多武器的，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共产党人是通过解除地方保安团和国民政府军队的武装才获得了这么多的武器。很遗憾，这些都是事实，而共产党人竭力使这个问题复杂化。共产党人经常扬言说，他们，也只有他们，才能够与日本人作战。这只是宣传，因为他们既没有大炮，也没有自动化武器，与日本人作战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众所周知，在与新四军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并没有出其不意地进攻，而是准备进行战斗行动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在此我向将军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先发起进攻行动的。

将军回答说："叶挺没有执行把自己的部队向北部撤退的命令，而是把部队向南方调动。国民军封锁了他的去路，发生了冲突，共产党人被打败了。现在，共产党人正在重新扩大自己的势力，通过解除地方部队和国民政府军的武装，在我上述提到的那些地区组建共产党的部队。"

我回答将军说，我很难弄懂中国目前存在的如此复杂的局势，我非常感谢将军，他能够按照地图给我讲解了一些地方的情况。

白崇禧将军问道:“大使先生,您这次路过了新疆。您的关于新疆混乱的意见令我非常感兴趣。当然,我们也掌握了关于这方面的情报,但我仍然很想了解一下,归您领导的各地领事人员和那些客观视察员们是如何评价在新疆出现的那些事件的。”

我回答说:“根据我从领事们那里获得的情报,目前新疆的秩序非常混乱,在穆斯林人(哈萨克及其他民族)和中国军队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白崇禧说:“新疆暴动的核心力量不是哈萨克人,而是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众所周知,数万名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在革命期间从西伯利亚逃到了中国。他们之中的大部分人在新疆安顿下来,并利用了盛世才。这是一些极具军事才能和训练有素的人,是一支强大的力量。我们关心的问题是,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持有何种立场。苏联是否允许这些人返回苏联,是否还把他们看作是苏联公民?”

我回答说:“苏联对于俄罗斯的白卫军分子的立场是世人皆知的。这些人抛弃了自己的祖国,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参加过反对苏联的斗争,我们不承认这些人是苏联公民。我们只允许那些证明自己清白的人返回苏联,我们破例接受他们加入苏联国籍。”

白崇禧问:“苏联对于外蒙古持有何种立场。”

我回答说,我们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关系非常友好,我们与它保持着外交关系。

在会谈结束时白崇禧说:“我非常关注世界和苏联的报刊,您在今天会谈时所提到的那些文章我都知道。我觉得这些文章:第一,过多地使用了来自共产党人的情报消息;第二,观点非常偏颇。让我来列举一下事实。文章中断言说,国民党军队不同日本人作战,而只有共产党的军队与日本人进行着真正的斗争。请看一看我们在缅甸的远征军,看一看我们那些从云南向缅甸进攻的军队取得的成绩吧,请看一看在海南西部、广西和其他地区的作战情况吧。文章中还断言说,国民党的军队不断地向共产党的军队实施进攻。我希望自己是一个公正的人。自然,我们的军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当他们遭到攻击时,他们也会进行抵抗。如果文章中说的是相互的冲突,那么还情有可原;可是,说的都是国民党军队实行进攻行动,那么,这就是极大地歪曲了事实。当然,我多半指的是英美的报刊。我明白,不应该提出关于大使为新闻记者承担责任的问题。但是,如果苏联报刊能够客观地评价中国所发生的事件,那么,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为中苏间的友好事业服务,并有助于吸引4.5亿中国人民倾向于苏联。如果能够在这方面做点什么,那就太好了。”

接着,白崇禧向我讲述了国共两党谈判的前景事宜。他说:“涉及恢复与共产党谈判的可能性问题,事情是这样的:众所周知,在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到重庆期间,共产党人提出了过多的要求。这些要求基本上可以归纳为两点:解散现政府和建立统一指挥部。大家都知道,国民党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政党,在军政阶段结束之后,已经转入了宪政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命运的全部责任都落到了国民党的肩上,在转入民主阶段(民主政治)之前,任何组建联合政府的想法都是不可思议的。统一指挥部也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府,不可能还建立什么统一的指挥部。从这两个原则出发,大元帅驳回了中国共产党的要求,谈判暂时中断了。目前,国民党正在努力争取采用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大约

在10天以前，已经给延安发出了电报，建议恢复谈判。据我所知，还没有收到对这封电报的答复。与此同时，国民参政会代表团目前正在筹备前往延安的行程。我们努力追求恢复谈判。我个人希望，很快就在今年的11月份召开国民大会，届时国民党将把政权移交给人民，国民大会将成立统一的民主政府，这个政府将实现国家的统一。”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的二等秘书 Б. С. 伊萨延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25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33，п. 244，д. 14，л. 151－157

№12017

斯克沃尔佐夫与王若飞会谈纪要：关于战后中国政治格局

（1945年6月29日）

机　密

6月29日，中国共产党驻重庆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们使馆，并通报了如下内容。昨天，他与美国大使赫尔利进行了长达3个小时的会谈。在此次会谈过程中赫尔利声明说，最近两天蒋介石接见了他并向他表示，同意向共产党人做出政治让步，以便使中国达到统一。按赫尔利的话说，蒋介石准备改组目前的政府，接纳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加入政府，并希望就此问题与延安开始谈判。作为个人来说，赫尔利打算劝说蒋介石成立最高司令部，参加这个司令部的应该有国民党的3位代表、中国共产党的3位代表以及其他党派的3位或者是3人以上的代表。令赫尔利遗憾的是，共产党人没有接受建议派自己的代表到重庆继续已经中断的谈判。王同志回答说，在赫尔利从美国返回，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之后，延安已经无法接受他的邀请了。因为这个声明给中国共产党留下了极其恶劣的印象，它鼓励了国民党中最反动的部分。感到自己背后有美国的支持，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并加强了与共产党人的斗争。在赫尔利的声明发表之后，国民党军队攻击共产党的正规部队和游击队的挑衅性事件频繁发生，目前，在许多地区存在着严重的军事冲突。

接着,王若飞同志对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对美国政策的改变感到失望和惊奇。他提醒赫尔利,在他访问延安的时候,是他(赫尔利)本人提出的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协定草案,其中包括5项内容,中国共产党表示同意这份草案,但是,过了一段时间赫尔利本人又放弃了它,上述提到的他于今年4月2日在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发表的声明,可以证明这一点。

赫尔利回答王同志,在这方面发生了误会,是新闻记者哄骗了他,他们所发表的赫尔利的声明是经过歪曲的。至于他本人提出的那份协定草案,正如赫尔利说的那样,他并没有放弃这份草案,目前他正在全力以赴地坚持这份协定草案。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将这一点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赫尔利的答复是肯定的。赫尔利声明说,他赞成实行原来的草案,这份草案一定会被实现的,只是不能立即,而是要逐步实现。

正如赫尔利向王同志声明的那样,蒋介石原则上是同意这份草案的,只是反对其中的某些措词。例如,蒋介石建议用"各党派的政府"取代"联合"政府的说法。

对于王同志的问题——他能否劝说蒋介石首先实现上述草案的4点内容,作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协定的先决条件:1. 给予言论、报刊、集会等方面的自由;2. 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化;3. 取消对边区的封锁;4. 释放被关押的政治犯。赫尔利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并声明说,蒋介石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接着王同志讲述了在与赫尔利会谈之后,他又与邵力子和王世杰见了面。邵力子对他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召开的例行会议表示不满(赫尔利也通报了蒋介石对此有些不安),并劝说中国共产党派出自己的大会代表。接着邵力子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接受蒋介石关于谈判的建议。王世杰声明说必须立即开始谈判,并请求尽快派出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

王若飞回答王世杰,在这方面他将不可能做任何实际工作,因为没有谈论任何具体的内容。

从与赫尔利和王世杰会谈的情况中,王若飞同志得出了以下结论:蒋介石实际上不打算做出任何让步。他只是希望与中国共产党开始谈判,以便做出一种样子,即为实现中国统一,他做了自己能做到的一切。指望对外使用这个政治花招,并正好安排在斯大林同志、杜鲁门和丘吉尔的柏林会晤之际,因为在那里会晤的重要问题之一,必定是关于中国的问题,蒋介石希望借此表明,中国的一切事情进展顺利。

王若飞同志说:"赫尔利如此卖力地帮助蒋介石上演这场新的闹剧,是因为美国想扶持蒋介石,并加强他的地位。这是早就计划好的步骤,其真实目的是扼杀中国共产党。"

接着,王若飞同志讲述了不久前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的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在宣传工作领域,中国共产党将以更加尖锐的方式抨击国民党,但同时并不超越一定的界线:不威胁推翻当局。在政治方面,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将争取与国民党在民主的基础上达成协定,另一方面将发展国内的民主运动,扩大和巩固自己的力量,将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成立人民委员会。其目的是:第一,在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情况下给予坚决的回击;第二,使蒋介石明白,如果他不同意进行民主改革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是能够找到其他方法实现改革的。随后,王若飞同志讲述了自己与孙科的会谈情况。

在这次会谈中，孙科通报了宋子文与我们的大使已经前往莫斯科的情况。中国代表团此行的目的是，要签署一个期限为20年的中苏条约。按照孙科的话说，这个条约将不晚于1周以后签署。在雅尔塔会议召开期间，他就曾预测：在那里讨论的问题大体上是关于远东的，特别是关于中国方面的。签署这个条约的想法是罗斯福提出来的，他向斯大林同志做了这样的建议。按照孙科的话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决定是今年6月中旬正式转告蒋介石和苏美驻重庆大使馆人员的。根据孙科的推断，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协定将包括如下几点内容：

一、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的领袖。

二、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中国领土的完整。

三、苏联、美国和英国承认对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四、苏联参加对日本的战争，苏联军队将进入东北地区。解放后，东北将移交给中央政府。该协定还有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附属文件：

1. 在结束对日本的军事行动之后，苏联军队将撤离东北地区。

2. 承认外蒙古的现状。

3. 在东北地区向苏联提供一切权利和利益，即1904—1905年战争之前沙皇俄国在该地区享有的那些权利和利益。

4. 南满铁路和中东铁路将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

5. 旅顺港将租赁给苏联。将宣布大连为国际自由港。

此外，在斯大林和罗斯福之间还达成了一个由如下几点内容组成的协定：

(1) 苏联和美国军队进入朝鲜。在驱逐朝鲜的日本人之后，将对朝鲜建立苏联、美国和中国的三国保护制度。

(2) 苏联军队占领日本的北部，美国军队占领日本的南部。

(3) 将萨哈林南部地区归还给苏联。

蒋介石同意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建议，但是反对如下两点内容：1. 蒋介石不同意以租赁的方式将旅顺港转交给苏联，因为这将造成危险的先例；2. 蒋介石原则上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但是反对将这一点写入任何一种文件里。

按照王若飞的话说，孙科断言说，短期内在莫斯科一定会签署以雅尔塔协定精神为依据的中苏条约。王若飞反对孙科所说的以下两点内容：1. 苏联承认蒋介石是战争时期中国唯一的领袖；2. 苏联对日宣战，将朝鲜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交给反动的国民党政府。王若飞同志证明说，在中国民主化及其类似方面，如果没有专门的补充条款和条件的话，苏联是不可能通过这两点内容的。

王若飞问到，在莫斯科是否真的将会签署孙科所说的那个中苏条约。我回答他说，看来，宋子文在莫斯科将会提出关于签署条约的问题，但是话题指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条约，我们这里还不清楚。

随后，王说，孙科在与他会谈时，表达了今年下半年在远东地区即将发生决定性事件的看法。王同志声明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中，也表

达了这一观点,并号召全体党员加强思想准备,迎接这些重大事件的到来。

关于国民党对待中国共产党的立场越来越强硬这一点,王若飞同志声明说,国民党加紧准备武装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只能说明:在日益增长的中国共产党的力量面前,国民党感到非常虚弱和害怕。国民党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能战胜我们的话,那么,今后他们就更无法对付我们了。

会谈是在我们大使馆里进行的。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阿纳尼耶夫同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T. 斯克沃尔佐夫

1945年6月29日

文件共3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6月30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4, л. 99 - 103

№12021

斯大林与宋子文第二次会谈记录:关于签署中苏条约

(1945年7月2日)

绝　密

1945年7月2日

苏中莫斯科谈判期间И. В. 斯大林与中华民国外交部长和行政院院长(宋子文)所举行的第二次会谈记录。

(其他)与会者:

苏方:B. M. 莫洛托夫、C. A. 洛佐夫斯基、A. A. 彼得罗夫和B. H. 帕夫洛夫;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会谈伊始,斯大林同志便问宋子文,是否知道三巨头(英、美、苏三大国代表)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就远东问题所达成的协议。

宋子文答,美利坚合众国已向中国政府通报了该协议的内容。另外美国人还向中国通

报了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局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所指的是否就是由蒋经国向苏联驻中国大使所转达的那些内容。

宋进一步明确道，自己所指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向中国政府通报的关于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形势的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这的确是他的看法，不过，自己的这一观点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付诸行动，那就是中国政府接受自己在克里米亚会议协议中所提出的那些建议。

宋说，自己希望能够对该协议中的所有内容进行讨论。苏联大使已与蒋介石进行了两次会谈，苏联政府可能已经了解了这些会谈的内容。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蒋介石已经说了，我们目前还无法来解决外蒙古问题。宋子文接着说，我们认为目前有必要将这一问题暂且搁置，即不打算在此次谈判中涉及这一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外蒙古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如果日本占据了外蒙，便可轻易地击溃苏联在远东的阵地。还在战争爆发以前，日本人便企图侵入外蒙古的哈桑湖地区。如果苏联无权保护外蒙古领土，那么苏联的整个远东地区都随时面临着丧失的威胁，而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形，对中国也是不利的。

斯大林同志继续道，甚至在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情况下日本军国主义仍存在死灰复燃的可能。历史表明，日本人——是一个相当强悍的民族。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并签署了凡尔赛和约之后，所有人都以为德国军国主义再也不会复兴了。可是仅仅过了15—17年，德国就重新恢复了军力。与此类似，日本即使表面看来已经认输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也会效仿德国和重复德国的所作所为的。在这种情况下苏联需要拥有动用本国军队去保护外蒙古领土的权力，而这也是为中国利益着想的。如果苏联强大，中国也就会强大起来。另外，斯大林接着说，蒙古人民共和国也不愿意并入中国版图。蒙古人非常想获得民族独立。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中国最好能让外蒙古分离出去，否则外蒙古就可能成为中国内政的一个重大不安定因素——外蒙古将联合所有蒙古人以谋求整个蒙古民族的独立。这将对中国更加不利。

斯大林同志说，当在克里米亚三巨头会议上签署相关协议时，苏联政府有两个指导思想：一是为了加强自身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苏联打算联合中国，以两国之力共同打败日本。在这方面涉及的问题主要包括：关于旅顺港、中东铁路、南萨哈林岛和外蒙古，等等。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加强苏联的战略地位，以便使苏联成为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可能盟友。不过，无论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旅顺港，还是中东铁路，苏联在这些问题上都不想获取任何利益，只是希望借此来加强自己反对日本的战略地位。二是苏联人民已经征战了4个年头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只有当自身受到攻击之时，才有必要投入战争。而在没有受到他国进攻的情况下，苏联无缘无故地首先发动战争，这样的战争人民是不会参与的。如今，我们要进攻日本，这就要首先取得人民的理解。我国人民在打了这么多年仗之后已经非常疲惫，他们非常希望得到休息。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要发动进攻，就必须向人民说明我们这样做的理由。而关于这些理由，斯大林同志认为，也就是他在克里米亚协议的相关文件

中所列举的和我们现在正在谈论的。斯大林同志强调,上述两点思想便是他想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向宋子文指出的。

宋子文说,自己认为斯大林大元帅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外蒙古问题在当前中国所占据的重要地位。中国目前正处于极端困难的时期,国内形势非常严峻。在事关国家一部分领土的问题上中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公开表示让步。宋子文说:“我们目前最好还是不要提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就像俗语所说的,让这条睡着的狗继续睡着吧。”如果我们承认了蒙古人民共和国——这一当年曾被苏联政府承认为中华民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的独立,那么也就无异于动摇了中国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在此,宋子文援引了斯大林同志所说过的话,即他希望维护中国局势的稳定。

综上所述,宋子文请求斯大林不要再给中国雪上加霜了。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目前不愿意涉及外蒙古方面的问题。

不过,宋子文又说,中国支持斯大林大元帅关于对南萨哈林及其附属岛屿的处理意见。宋问斯大林,其所提出的关于大连国际化的建议是什么意思?

斯大林说,我的意思是该港口应成为国际性的口岸,所有国家的商船都可以到该港停泊,但苏联享有优先权。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应当达成一个特别协议。

宋子文问,确保苏联的优越地位是什么意思呢?

斯大林同志答,苏联的优越地位主要反映在港口的行政管理机构和为苏联船只设立专门性港埠等方面。而中苏两国就这一问题所签署的新协议应当是对1898年中俄协定内容的完善和重复。斯大林说,为此,我们最好都事先对1898年协定有所了解,以便在谈判中能对其内容做些许修改。①

宋子文说,自己曾问过杜鲁门,关于克里米亚协议的意思是不是将中国大连港设定为自由港。对此,后者做了肯定的答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连港的行政管理就应当采取中方管理或俄—中共管的模式。

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港口的主人应当是俄国人和中国人,而所有涉及大连港行政管理方面的问题均应在两国所签署的特别协议中有所体现。

宋子文问,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是否已起草了相关文件。

斯大林做了否定的答复并再次强调,必须采用旧的协议文本,并对其中内容做必要的修改。

宋子文说,旧的协定业已过期,再者该协议文件是中国与沙俄签署的。中方的想法是,把大连港作为一个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的港口。援引苏联多次对中国东北主权的承认,宋子文宣称,大连港的行政权理应属于中方。

宋询问道,苏联所谓的关于应确保苏联在该港口的优先权是指什么呢?是与谁相比较

---

① 1898年3月,中国清政府与俄国签订条约,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水面租给俄国,为期25年。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741—742页。——编注

才这么说呢？

斯大林答，自然是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相比的。宋子文道，如果按您上面的说法，苏联在中国的领土上甚至比中国人所拥有的权利还要多。斯大林同志说，可能吧，关键是大连和旅顺口都是太平洋上的不冻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确保苏联在上述两个港口的权益而修建，并因此具有了重大的战略意义。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斯大林同志是否打算由俄国来负责和组建大连港的行政管理机构。斯大林同志答，自己的意思是组建某种类似于苏中联合会的机构，该机构主席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港口的负责人应当是俄国人。至于港口的经营收入则由两国平分。斯大林同志强调，苏联并不赞成在大连建立俄国租界，而是想与中方一道共同负责该港口的行政管理活动。宋子文指出，港口未必会成为赢利性质的企业，因此所谓两国平均分配运营收入的问题也就无从谈起了。

对此斯大林同志指出，起初我们必然要为港口所需要的各种设备进行投资，之后就将可能获得相应的利益和回报。在打败了日本之后，中国将会出现商品荒。日本已不可能向中国输入商品，因为它所遭到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中国的工业发展薄弱，而要发展到一定程度尚需 10—15 年时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也是有限的，苏联将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供应商。在中国需要进口大量商品的情况下，中国的每个港口都具有了举足轻重的意义，其中便包括大连港。它不但要承担进口苏联商品的工作，而且还要担当将中国的某些原料出口到苏联的重任。因此，那时大连港毫无疑问将在中苏贸易方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宋子文说，中方认为该港口应当从事贸易，但未必会赢利。斯大林同志说，由此可见中国对获得利润不感兴趣，对此，宋回答说，他对获得利润感兴趣，但利润不是来自港口，而是来自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宋解释说，由于大连将成为一个自由港，因此，我们无法在那里征收海关税和其他税。

斯大林同志指出，据他所知，海关税和其他税收是中国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斯大林同志又说，关于大连的问题双方还需进一步商议。

宋子文说，在开放的港口我们可以征取一些税务，但数量非常有限，目的只是为了维持港口所属设施的正常运营。

斯大林同志指出，在克里米亚会议所达成的协议中并没有明确指出大连将是一个自由港，只涉及其国际化问题，即该港口将对其他国家的船只予以开放。

宋子文问，如果能够对经过该港口的商品征收税务的话，那么这些商品税无疑会对中国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这些收入将在中俄两国间平均分配，对此我们将签署相关协议。

不过，宋子文认为，如果我们将对经过大连港的商品征税的话，那么，大连也就无所谓开放型的贸易港口了。因为中国其他港口也完全可以担当大连港同样的职能——进口外国商品和对外出口中国商品。

斯大林同志答，我们并没有一下子便把大连港的职能限定死，即仅作为贸易性质的港

口,关于这方面问题我们尚需做更为详细的讨论。

接下来,宋子文提出了关于旅顺口的租赁问题。他希望签署关于中俄双方共同经营该港口的协议。并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国非常不愿意租赁旅顺口,但中国准备(与苏联)共同使用该军港。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蒋介石大元帅的意见,关于该军港的使用问题他正考虑采用其他模式。总而言之,在这个问题上苏联所提出的意见绝不会对中国不利。

接着,宋子文问,苏方关于成立(中俄)联合公司负责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管理事务的意图是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答,该公司将负责上述铁路的运营。针对宋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答,谁建筑了铁路,铁路的所有权便属于谁。

宋问,是否仍维持1924年旧协议中关于中东铁路的相关规定,即从铁路建筑完成之日起60年后该铁路的所有权将归中国。宋子文还提醒道,根据该已有协议之规定,中国政府可以赎买中东铁路的所有权。①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相关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为了明确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和管理方面的相关规章制度,因而有必要成立苏中联合公司,而所有经营收入由两国平均分配。

而对于宋子文再次提出的谁将是中东铁路的所有者的问题,斯大林同志答,在中方赎买以前该铁路的所有者是苏联,之后其所有者将是中国。斯大林同志强调,在中东铁路的建筑过程中,中国的投资是微不足道的。

莫洛托夫同志也插话道,当时中方的投资只占该铁路建筑总投资中的很少一部分。

斯大林同志又补充道,在中方赎买前,该铁路由苏联和中国共同管理。关于宋子文提出的双方共同管理该铁路的期限问题,斯大林同志说,他认为应当延长旅顺口的使用期限和压缩中东铁路的使用期限,以便将这两处的期限统一规定为40—50年。

宋子文说,关于铁路的问题他仍需做进一步的研究。宋子文接着问,苏方所谓应保证苏联在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使用上的优先权具体指什么呢?

斯大林同志说,这与关于大连港的使用情况比较类似。不过,确保苏联使用上述铁路的优先权不应被理解为苏联可以优先利用其来运输本国军队。

宋子文问,难道斯大林大元帅不打算用这些铁路来运输苏联军队吗?

斯大林同志答,在与日本军队发生战争的情况下,当然需要使用其来运输苏联军队。

宋子文说,在战争情况下,中国理所当然会欢迎苏联使用这些铁路来运输其军队。我关

---

① 1924年5月31日,中苏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其中规定,中东铁路主权在中国,苏联允诺中国赎回中东铁路及所属一切资产,并将该铁路一切股票、债券移归中国。同日签订《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管理办法规定:中东铁路设10人理事会,中苏各派5人,理事长由中方选派;设5人监事会,中方2人,苏方3人,会长由中方选派;设局长1人,由苏方担任,副局长2人,中苏各1人。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北京: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23—434页。——编注

心的是苏方在和平条件下是否还会使用其来运兵。

斯大林同志说，和平条件下便没有这个必要了。只是当日本军力恢复再次向苏联发动进攻、苏中两国已签署了互助条约并在中国政府提出要求的情况下，苏联才会经东北铁路派兵。

宋子文对斯大林的上述答复表示同意，并指出双方应就以上所述签署相关协议。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宋先生不担心苏联会通过这一方式来占领北京吗？……

宋子文给予了否定的答复，并回敬道，在这方面不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已经有了与外国军队打交道的经验。

随后，双方的谈判转入下一个议题——关于千岛群岛。宋子文说，中国非常支持苏联提出的关于将该群岛重归苏联版图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千岛群岛归属苏联，那么福摩萨①和其他领土也将重归中国。我们就可以从东、南、西三个方向钳制住日本。

宋子文接着说，在苏中两国最终将要签署的协议中，中方不希望看到其中的第二条，即恢复苏联在1904年由于日本所发动的背信弃义的进攻而丧失的那些权益。因为原相关条约中所规定的旅顺口和大连的租赁期限已过，而中东铁路也业已被当时的沙俄政府卖给了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该关于恢复苏联权益的条款并非针对中国，而是朴次茅斯条约。主要是为了更猛烈地反对日本，而不是中国。因为那里目前都是由日本人在统治着。我们并不是想恢复沙皇俄国时期对中国所拥有的那些权益，而只是希望苏中两国在其他一些基础上再来签署一个条约。三巨头在克里米亚会议上所签署的文件并不是条约性质的，而将这一条款列入文件中也并非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日本。

宋子文指出，1924年苏维埃俄国首次承认中国为拥有平等权利的国家并宣布废除一切以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斯大林同志说，看来这就是为何张作霖当年要拘捕中东铁路经理的理由了。此举可能也就是表示感谢的一种特殊方式了。

作为对宋子文所提问题的答复，斯大林同志说，可以缩短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的期限，但要稍微延长苏联租用旅顺口的期限，以便将苏联使用它们的期限统一确定为40—50年。期限一到，所有的就都结束了。

宋子文说，有必要准备一张旅顺口的地图以便在上面标明苏联所使用区域的范围。

斯大林同志说，必须尽快准备这样的地图。

宋子文说，蒋介石认为，苏联使用旅顺口和中东铁路的期限最好确定为20—25年。

对此斯大林同志答，这样的期限有点太短了，要考虑到我们还要在旅顺口建造基地，为港口安装各种设备和设施，这些都需要时间。斯大林同志指出，沙皇政府与当时的中国所签

---

① 即台湾。——原注

订的为期25年的协定实际上是一个骗局,并已有了提前延长这一期限的打算。沙皇政府计划在旅顺口站稳脚跟之后再实施下一步行动。而苏联并没有类似的想法。

接下来,宋子文将话题转入关于两国签署友好同盟条约方面,并说中国非常希望与苏联签署此类条约。

斯大林同志指出,蒋介石以前便提过关于此类条约的事,但当时我们还无法签署这样的条约,而只是到了现在才有了签署该条约的可能。

作为答复,宋子文询问苏方目前是否已有了现成的条约草案。斯大林做了否定的回答并指出,这首先得看中方是否能够接受我们如今正在讨论的这些原则,只有在中方接受苏联建议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着手准备相应的条约草案。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中方尚需要苏方对所提建议逐一做出解释的问题,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就自己所提建议的每一点当然都要对你们做出解释。他本人也做好了向中方做出解释的准备,但双方至少有必要首先就一些原则性问题达成共识。

宋子文将话题重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并问道,为何斯大林认为不能让中方独立负责铁路的行政管理?宋子文向斯大林保证,中方一定会确保苏联的全部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并不相信这样的保证。斯大林强调,他的意思很明确,也并没有说让俄国人独立负责铁路所属区域的行政职能,而是俄—中双方共管。

针对宋子文所提出的此举可能涉及中国的主权的问题,斯大林同志指出,我的问题并不涉及东北,而只涉及那些铁路、旅顺口和大连港。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将组建什么行政机构来管理东北呢?到时候是否在那里会出现一个省政府,是否还会像张作霖时期一样,在东北出现中央政府和奉天政府共治的局面?

宋子文说,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统一中国,因此是不会允许独立的政府在东北存在的。

宋子文问,苏方想与中方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等干线,是否还包括相关的铁路支线呢?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考虑到要向这些铁路干线供应所需要的煤炭,那么在必要情况下苏中联合公司也会经营相关的铁路支线。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关于煤矿可以独立经营而其所生产的煤炭可向铁路出售的意见,斯大林同志答,双方应协商联合使用相关铁路支线的问题,并将协商结果写入协议。

宋子文说,如果上述铁路由中苏两国共同经营,那么双方都会极力促进铁路的正常工作和业务繁荣,因而煤炭的供应是绝不会出现问题的。

随后,宋子文又将谈判话题转到了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上。他说,中方认为这个问题是目前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宋子文问斯大林:为何苏联政府在这个最困难的问题上不能满足中方的要求?

斯大林同志指出,是蒙古人自己不想并入中国版图。斯大林强调,自己能理解中国政府的困难处境,只是苏方在这个问题上也别无良策。另外从他的观点来看,这些困难并非是中国不能克服的。要知道,苏联政府已在关于旅顺口的问题上向中方做出让步了,而中国人也

理应在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向苏方做出相应的让步才是。

宋子文强调，在中国目前是不宜提出关于外蒙古的问题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外蒙古问题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如今在两国签署同盟条约之时双方便应充分和全面地考虑所有问题。战争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我们坚信如果外蒙古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不论对苏联还是中国都是一个比较好的结局。当受到日本的军事威胁时，苏联就有权派自己的军队进入外蒙古领土。因此，斯大林同志说："不应该留下这个小脓疮，现在就应该把它除掉。"

宋子文指出，这个小脓疮的存在并不会让中国感到不舒服，中国从来没有对苏联派兵进入蒙古领土表示过抗议。

斯大林同志重复道，蒙古人民共和国希望现在就能最终确定自己的地位。而事实上不论是对中国还是对苏联，外蒙古都不过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只是由于它所占据的特殊的地理位置才对苏联具有了重大意义。

针对宋子文的一再要求——苏联方面应认真考虑中国政府对外蒙古问题的态度，斯大林同志说，他个人认为目前解决蒙古问题只有一条可能的出路，即允许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至于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则可以放到打败日本之后再说。斯大林同志指出，由于日本的战败中国将获得一些新领土，到那时再宣布关于蒙古独立的事就不会对中国民众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了。

宋子文说，自己会将这一问题面呈蒋介石，并再次请求苏联政府在随后一段时间里充分考虑和体谅中国政府解决蒙古问题的苦衷。解决蒙古问题的关键在于，蒙古的独立问题可能会立刻引发如何处理西藏的问题。例如，在一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关于太平洋问题的国际会议上，丘吉尔提出了关于解决西藏独立问题的建议，而当时在场的宋子文被迫与之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斯大林再次强调，所谓解决外蒙古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巩固国防。要知道，如果以蒙古人民共和国领土为基地，日本人便可以轻易地切断位于赤塔地区的西伯利亚铁路大动脉，由此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将可能落入日本之手。

斯大林同志指出，我们是无法在中国的领土上一直保留自己的军队的，如果我竟然会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有些匪夷所思了。外蒙古问题与旅顺口问题有所不同，这是一个更为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宋子文问，苏联方面是否欢迎被派遣到苏联军队中的中国政府代表，这些人将参加在东北地区的作战行动。

斯大林同志答，蒋介石可以派自己的代表到我们的作战部队以便在东北地区组建和开展中国的行政管理事务。

斯大林同志询问道，国民党是否打算吸收中国社会中其他进步阶层的代表参与政府的工作。

宋子文宣称，关于这一问题，他希望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外交家来完全坦

诚而公开地与苏方交换意见。他强调,中国政府已经在一些方面发生了变化,而今后这种变化将会更多。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曾经打算与共产党达成协议,建议成立某种类似于军事内阁的机构,并邀请国民党以及中共党员共同参与主持该内阁的日常工作。平心而论,国民党是很想促成此事的,因为斯大林大元帅也曾对赫尔利说过——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普通的农民和极力实现国家民主改革的爱国者。

斯大林同志答,中国共产党人的确是一些很不错的爱国者。

宋子文继续道,国民党在对待吸引国内民主分子参与国家政治的问题上是严肃和认真的,自己便曾有过亲赴延安与中共谈判的打算,但共产党却不想进行此类谈判。宋子文说,国民党希望建立统一的军队和统一的中央政府。如果中共能满足中央政府的上述要求,那么中央政府便自然会邀请其参加军事内阁,并允许其在政府中担任相应的职务。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提出的关于吸引进步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问题并不是只针对共产党人而言的。斯大林同志认为,战争期间中国内部一批新的社会和自由主义力量会成长起来,这些人都应当被吸收和参与到国家的管理中。在中国应当有一个以国民党的影响居主要地位的政府,但仅靠国民党将难以应对中国当前的局势。因此,从中国的长远利益考虑,国民党在领导政府的同时,最好还能让其他一些民主分子参与政府的活动。斯大林同志指出,当然这些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而自己只不过因为关心中国的命运而谈一点个人意见。宋子文对斯大林同志的上述意见表示感谢并再次强调,中国政府和国民党吸引国内自由主义分子参与政府工作的意愿是真诚的。只是国民党希望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因而不愿意组织联合政府。

斯大林同志说,国民党希望在国家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的愿望是合乎常理的,这一愿望是以中国整个历史发展的经验为基础的。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内部是否还有其他一些类型的民主党派。

宋子文答,实际上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再无其他党派。虽然中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党,但其成员人数很少。还有中国青年党,但其支持者都是四川省内的大地主,如刘文辉。还有一个所谓的民主联盟,但其成员主要是共产党人、民族—社会主义者和青年党党员,成立该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与中央政府作对。当然中国也有很多自由派分子,但他们并没有建立政党组织。

双方的话题转入了关于朝鲜的问题,宋子文说,在旧金山会议上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争论得很激烈,斯大林同志对该体制持何意见。

应斯大林同志的请求,莫洛托夫同志对上述问题做了答复。他说,宋子文多数情况下也参加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知道该想法是由美国人首先提出的。莫洛托夫本人对美国人所提出的问题的理解是这样的,即托管或者由个别国家,或者由国家集团来实施。具体就朝鲜领土的托管而言,美国人建议由四个国家——中国、英国、美国和苏联——负责。莫洛托夫本人对此有些看法。他认为,由上述四国对朝鲜领土实施联合托管就使问题复杂化了,

为此就必须在实际执行中另辟蹊径。不过，苏联政府原则上同意美国人关于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曾与罗斯福和丘吉尔谈过关于朝鲜的事，并陈述了自己对该问题的看法，即在实施托管制度的情况下外国军队不得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强调，如果实施托管制就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朝鲜领土，那是他无法接受的。对此，罗斯福表示同意，并说，为了确保外国军队不进入朝鲜，将由上述四国代表组建一个小组以监督和确保朝鲜的政治发展沿着所需要的方向前进。斯大林同志指出，托管制只具有临时性质，目的只是为朝鲜的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决创造条件。截至目前，关于朝鲜问题我们还未通过任何正式的决议，只是在一些原则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

宋子文问，将由谁来负责维持朝鲜国内的秩序，是否需要组建某种类似于警察局的机构，因为该国可能目前正处于无政府的状态。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该国的国内秩序目前由朝鲜人自己承担。

宋子文说，他对朝鲜人目前是否有能力实现独立持怀疑态度。

斯大林同志说，正因为如此才要对朝鲜领土实行托管。斯大林同志问，未来中国是否有意将朝鲜并入自己的版图？

宋子文答，中国没有这方面的打算，因为朝鲜民族与中华民族是不同的民族，它自身有着悠久的历史。

斯大林同志再次提醒说，他反对在朝鲜组建警察组织和外国军队进入朝鲜。斯大林同志指出，关于托管制的问题以后还要讨论。在对托管制度的理解上我们与英—美还是有所区别的：我们认为这是通向朝鲜国家最终独立的一个步骤，而英国人认为其最终目标是朝鲜的殖民化，美国人(如罗斯福)对托管制的理解与我们的比较类似。至于罗斯福之后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对此持何态度，斯大林说，他还不清楚，目前美国人对该问题的看法已与英国有些接近了。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只有中国和我们所提出的关于领土托管的草案中，把独立作为领土托管的目的，这也是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得到通过的。

宋子文说，罗斯福似乎要求对所有殖民地都实行托管制。

莫洛托夫同志同意这一说法并指出，赫尔利还在1943年10月便提出了与此观点类似的文件草案，但相关国家断然拒绝讨论其草案。

斯大林同志说，丘吉尔闻听这一草案之后竟然放声大哭起来。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美国人起初虽然在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上有所让步，但如今又走了回头路，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变得格外谨慎起来。

斯大林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推测，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可能与在野的共和党所持立场有关。

莫洛托夫同志提醒道，还在莫斯科会议期间，赫尔利便曾建议讨论关于领土托管制的问题，但该建议遭到艾登的断然拒绝，理由是没有时间了。当时，苏联代表团已有讨论该问题

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对杜鲁门的印象如何?

宋子文答,杜鲁门给他的印象是坦诚、平易近人,是一个很不错的领导者,可能应当比罗斯福更为果敢,虽然后者的政治眼界无疑比前者更为宽广。

斯大林同志又问宋对斯退丁纽斯有何印象。

宋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斯退丁纽斯已经离开了国会,其职务由贝尔纳斯接任。后者是美国政府中比较有才干的人物之一。

斯大林同志问宋,对斯退丁纽斯的个人能力有何评价?

宋子文再次强调,斯退丁纽斯的伦敦之行实际上已经表明其政治生涯宣告彻底终结。

此次会谈持续 2 小时 15 分。

会谈记录: A. 彼得罗夫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2, л. 3 - 17

№24960

伊扎诺夫与乔巴山会谈记录: 外蒙古独立问题

(1945 年 7 月 5 日)

摘自 И. А. 伊扎诺夫的工作日记

绝 密

与乔巴山元帅的会谈记录

1945 年 7 月 5 日

在克里姆林宫的会谈之后,乔巴山请我去他居住的别墅,以便详细谈一下已举行的会谈情况,并解释一下会谈中他尚不太清楚的个别地方。

我们去了之后才知道,原来乔巴山已完全且准确地理解了克里姆林宫会谈期间所涉及的所有问题。

当讨论到在克里姆林宫看到的苏中两国声明草案——关于承认蒙古的国家独立时,乔巴山说:"是的,我们需要国家独立,但我们不想与中国人维持友谊和友好合作的关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坏的民族。他们曾压迫我们,欺骗我们,焚烧和抢劫我们的蒙古包,打死

我们的牧民。如今在内蒙古、阿拉善和鄂尔多斯，他们仍然在对蒙古人做这样的事。”乔巴山说：“我明白关于与中国人合作的宣言中所写的那些话，话都是好话，经过斯大林同志的修改后其内容会更好。”

在详细讨论了宣言草案之后，乔巴山声称：“我很清楚宣言的意思。我们将像一个独立国家那样，向中国人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将向全世界表明：中国人当年是怎么欺侮我们；他们现在又是怎样在继续欺侮仍留在他们那里的蒙古人的。”

当话题转到军队和即将前往蒙古的普利耶夫将军时，乔巴山表示希望让鲁宾将军的军队也留在蒙古，因为自己与他在工作上已有了相当的默契，而他对蒙古军队及其军官也相当了解。

乔巴山详细地谈了自己对莫斯科、机场欢迎仪式尤其是克里姆林宫会谈的印象。他说：“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未如此地激动过。在机场我认出了莫洛托夫同志——就在他向我走来的时候。当经过仪仗队时，我的腿和手都在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在克里姆林宫，我见到的是一个与平时完全两样的斯大林。他一直坐着，我目不转睛地望着斯大林同志的脸。于是，我的情绪再次激动起来，而我的答话也经常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形。”

苏联驻蒙古公使

И. А. 伊扎诺夫(签名)

文件3份，送：斯大林同志、莫洛托夫同志和档案室

АВПРФ，ф. 6，оп. 7，пап. 38，д. 560，л. 4－5

№24961

斯大林宴请乔巴山时的讲话：保持苏蒙友好关系

(1945年7月7日)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乔巴山

1945年7月7日，И. В. 斯大林同志设午宴招待蒙古人民共和国首相乔巴山元帅。当时参加此次午宴的共23人(名单参见附录①)。午宴地点是在大克里姆林宫的叶卡捷琳斯克大厅。

---

①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该附录。——编注

其间,斯大林同志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内容如下:

斯大林同志的讲话

有一段时期,蒙古人曾在如下一个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即自己应当与哪个国家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还是苏联。许多蒙古人——如达旺,便赞成与日本的友谊。

我建议为那些最终改变了主张并做出正确决定——蒙古需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蒙古领导人干杯。这些人如今都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导者,而那些曾支持与日本结盟的人则目前都到了日本人控制下的东北,同事们的数量不到原蒙古人总数的五分之一。

祝蒙古领袖们健康!祝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

午宴后观看了电影《胜利大阅兵》。

此次午宴和电影观赏共持续了2小时20分钟。

АВПРФ, ф. 6, оп. 7, пап. 38, д. 560, л. 6

№12033

斯大林与宋子文会谈记录:外蒙古、中东路和新疆

(1945年7月9日)

绝　密

参加此次会谈的出席者:

中方——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和蒋经国;

苏方——B. M. 莫洛托夫、C. A. 洛佐夫斯基、彼得罗夫和帕夫洛夫。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中方是否有什么新消息?宋子文答,自己向蒋介石通报了谈判陷入僵局以及斯大林同志关于希望消除中苏之间所有未解决的问题,以便两国从现在开始在不可能发生任何冲突的条件下展开友好合作等情况。宋子文说,今天才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在向苏方通报蒋介石的回电内容之前,宋子文想首先介绍一下与此次谈判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以便斯大林大元帅在此基础上能够对蒋介石向苏方做出的那些难得的让步给予正确的评价和判断。当宋子文离开华盛顿回国之际,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

中苏两国谈判中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他曾对杜鲁门说过，中国和苏联可以在不经讨论的情况下解决关于外蒙古的问题。当时他对"现状"的理解就是：中国在法律上拥有外蒙古的主权，所有的问题只是在于中国无法实施这一主权。杜鲁门和斯退丁纽斯均对宋子文关于"维持现状"一词的解释表示赞同。在重庆时，宋子文也与蒋介石讨论过关于外蒙古的问题，他们两人都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竟然会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宋子文认为，在涉及有关将中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分离出去的问题时，斯大林大元帅应当充分体谅中国民众的民族情绪的巨大力量。宋子文说，他并不想把蒙古和东北相提并论，但这里只想列举一个事实以表明中国政府对领土的一贯态度。众所周知，中国的国力与日本相比是较弱的，中国也没有改变国际格局的奢望。但即便如此，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在东北的主权问题上做过任何让步。1933年，当宋子文刚刚从一个国际经济会议上回来，日本天皇便邀请其去他那里讨论关于东北的问题。天皇说，如果中国放弃对东北的主权，日本就会因此而感到满足，并从此与中国相安无事。宋子文当即便拒绝了日本天皇的要求。日本为达到目的，又专门派遣当时担任日本外务次长的重光葵前往横滨，企图说服宋子文再次去东京。但宋子文拒绝了这一行程。上述事实可充分证明一点，即中国人对本国领土的主权有一种异常强烈的本能意识，如果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这就意味着对这种民族本能意识的背离，从而实际上也就是将自己置于社会舆论的对立面，置整个国家的安全于不顾。宋子文指出，以上所述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斯大林大元帅能够正确评估蒋介石为苏中友好的长远利益所做出的那些牺牲。

接下来，宋子文朗读了蒋介石的来电内容："在遭受了最重大的牺牲之后，为了执行孙中山先生的主张和在未来与苏联建立牢固的合作关系，中国政府带着最诚挚的意愿，积极地谋求与苏联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并消除两国间所存在的一切分歧和纷争。兹提出如下三点建议，并要求在该三点建议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管理的完整以及中国的真正统一。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对中国表现出自己的支持，给予实际的帮助，并对中国的如下三点建议做出完全肯定和具体的答复：

"一、中国政府将对斯大林大元帅履行尊重中国在东北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的义务表示感谢。"

斯大林同志插话道："难道中国政府还会期待对东北持其他态度吗？"

宋子文继续翻译并朗读电报：

"为了共同利益，中国愿意共同使用旅顺港，以便在那里修建海军基地。中国准备使大连成为一个开放的港口，期限为20年。至于旅顺口和大连港的行政管理，理应由中国负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中国对东北的主权和保持中国东北领土的完整。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主要干线可以由中国和苏联共同经营，所得经营利润两国均分，但上述铁路的所有权应属于中国。至于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均不属于两国联合经营的范围。两国联合经营上述铁路的期限为20年。

"二、去年，新疆发生了叛乱，结果导致中苏之间的联系中断。目前，两国间的贸易仍无

法正常进行。有鉴于此,中国政府希望苏联政府能联手整肃新疆的无秩序状态以恢复两国间的正常贸易联系。至于阿勒泰山脉,它隶属于新疆,理应成为该省的一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所组建的个别军事和行政机构的存在,导致中国的军事和行政无法由中央政府统一调度和领导。我们希望,苏联给予中国的一切援助,包括政治、物质或精神等方面,均只针对中国中央政府。

“鉴于外蒙古问题已成为中苏谈判的障碍,从两国共同利益和整个世界长远福祉的角度出发,在日本被打败和上述三点建议得到苏方满足之后,中国政府准备给予蒙古独立。但是,为了避免今后可能发生的误会和冲突,该行动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实施为宜。在举行了全民公决之后,中国将宣布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外蒙古与中国的疆界应依据中国旧地图上所标注的边界进行划分。中国政府希望苏联能够充分体谅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中国政府的诚意——以此牺牲来确保两国间的和平和牢固的合作关系。”

斯大林同志说,自己手上应当有一份翻译成俄文的蒋介石的电报,以便对其所提建议认真考虑。

宋子文答应今晚便将该电报的译文呈送给斯大林。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否会把满洲和蒙古做比较。

宋子文答,自己在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愿意做这样的比较。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实际上是将它们做了比较的。

斯大林同志说,是不能把满洲和蒙古进行比较的,因为满洲都是中国人,而在蒙古并没有中国人。

斯大林同志指出,维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就意味着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因为它从1921年起便像独立国家一样存在着。苏联希望维持“现状”的意义,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立即得到中国政府的认可。

宋子文说,这些都是无谓的争论。宋子文强调中方的观点是:维持外蒙古现状,即意味着承认中国对这部分中国土地拥有主权。

斯大林指出,可您所谓的主权实际上已停止存在24年了。

接下来,斯大林同志就蒋介石电报中的各主要内容逐一做了分析。关于东北,斯大林同志说,我们已经发过相关声明,即我们完全承认中国对东北拥有主权。至于中国共产党,我们既不会支持,也不会帮助他们,以前就没有想过要这样做。中国只有一个政府,如果在其境内还存在着第二个政府的话,那只能属于中国内部自己应当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以前我们便帮助过蒋介石,这种帮助以后仍会继续。如果我们有必要给予中国帮助的话,那么这种帮助一定是给蒋介石政府。这种情况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我们希望诚实地做事和真诚地与中国结盟。关于旅顺口、大连和铁路的使用期限问题,我认为上述20年期限不能使我们满意,有点太短了。我们准备做一些让步,将这一期限确定为30年,这也是我们的最后决定。至于旅顺口的行政管理问题,这需要加以认真考虑。港口的主人理应只有一个。旅顺口形式上可以被纳入与其相邻的辽东半岛的辖区范围,但港口本身的主人应当只有一个。

宋子文指出，我们现在所谈的问题只涉及旅顺口，并不包括辽东半岛。

斯大林同志解释道，自己指的是与旅顺口有关的固定区域。

莫洛托夫同志说，我们认为旅顺口所包括区域的边界应依据1898年中俄协定所划定的范围来加以确定。

斯大林同志指出，根据该协定旅顺口共包括有两个区：其一，直接隶属于旅顺口的区域；其二，所谓的中立区域。我们拒绝承认中立区，但是我们想保持这个区域，使其归属于旅顺港。就上述整个区域而言，其行政负责人可以由中国人担任，但旅顺口本身的行政领导一定应当是苏联人。这里我们指的是驻扎在那里的苏联军队的指挥官和卫戍部队司令，等等。关于铁路问题，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将这些铁路立即交由中方管理，而蒋介石在来电中正好违背了我们所要求的这一原则。要知道，这些铁路都是由俄国人修建的，用的都是俄国人的金钱。中国人的投资只在铁路总投资中占了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且还是在铁路建筑完工之后返还的。

宋子文指出，我们已经说定，关于业已过去的事实现在不应当再提。大家都知道，最初俄国拥有上述铁路的期限被确定为80年，随后该期限又被缩减为60年。如果以后者为限，从开始之日起算至今，60年满期也仅剩几年了。再者，众所周知的是，这些铁路已被苏联卖给了日本。①

宋子文继续道，很遗憾，面对目前这种情况，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是无能为力的。两国其实都无权使用上述铁路，虽然两国现任政府在这件事上都是无辜的。

斯大林同志说，根据蒋介石的电报，似乎我们对这些铁路已没有任何权利了，反而是中国向我们提供了使用这些铁路的机会，就像是给予恩赐。可事实是，当年这些铁路都是用俄国的钱建造的。不过，斯大林同志说，我们还是决定同意你们的建议，即两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

斯大林同志接着谈了关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全民公决问题。他指出，举行这样的民意公决可不会对中国有利。

宋子文指出，举行该民意公决只是想为中国政府找一个台阶，以便减轻其在国内所受到的压力，并对中国民众有个交代。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您所提到的关于外蒙古的旧地图究竟是什么样的？

宋子文答，中国人有这样的老地图，上面明确显示外蒙古属于中国的一部分。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希望展示这样的地图的请求，宋子文答，自己参加此次谈判时并没有随身携带这样的地图，因为当时并没有想到外蒙古问题会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老地图上所标注的旧边界与新边界有何区别？

---

① 俄国在日俄战争失败后，于1905年9月与日本签订“朴次茅斯和约”，将辽东半岛租借权和中东铁路南线及相关权益全部转让给日本。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经过长期交涉，苏联政府不顾中国国民政府的强烈反对，于1935年3月将中东铁路及其一段支线以1.4亿日元的价格卖给了伪满洲国，而伪满政府则将铁路委托日本人经营。参见郑长椿：《中东铁路历史编年(1895—1952)》，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277—292页。——编注

宋子文再次表示遗憾，并说此次莫斯科之行并未携带这份老地图，随后双方可组建一个边界委员会来研究和解决关于外蒙古的边界问题。

斯大林同志问，关于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转交给中方的那些关于两国友好、互助条约和协议的草案，中国代表团有何意见？

宋子文答，上述条约和协议的各条款中有很多地方与蒋介石在来电中所提出的诸原则有出入。蒋介石希望中国代表能准备自己的相关草案。关于两国友好和互助条约草案，苏联和中国所提草案的差别并不太大，看来只需双方批准即可。关键问题在于，根据中国的宪法，条约生效并非从双方签字之日起，而是从两国互换批准证书之时起算。关于中国自己所编制的草案，宋子文说，中国代表团借鉴了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条约的模式和内容。

斯大林同志将话题又转到外蒙古问题上。他问道，中方建议把对蒙古独立的承认延至打败日本之后，对此如何理解。斯大林同志提醒道，在上次会谈期间苏方曾建议中方应立即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而将宣布之日放到日本被打败之后。

宋子文说，在打败日本之后才举行公决，尔后再由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宋子文强调，这就是说，问题实际上已经解决，但解决问题的方式还有必要做认真研究。宋子文保证，中国政府在解决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问题上绝没有跟苏联要滑头的打算。

斯大林同志指出，这里并不涉及诚信的问题，目的在于让双方把所有问题都搞清楚。如果现在能把问题搞得相当清楚，我们就会与中方一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

斯大林同志问宋子文是如何计划的，是否现在就打算与苏方达成协议，或者将这一问题的解决延期进行？宋子文说，如果时间允许，他是很想现在就与苏方把所有问题都达成协议的。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们还有 3 天时间，因为 12 日以后他就必须准备参加即将举行的柏林会议。斯大林同志问，如果宋子文不反对的话，本次谈判将由莫洛托夫同志代表苏方继续进行。

宋子文答，对此他这方面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只是希望再就一些主要问题与斯大林同志会面和商谈。

接下来，会谈转到关于铁路的问题上。

宋子文提出关于煤矿的问题。他认为，鉴于中国政府将会保证上述铁路的燃料供给，因此就没有必要将煤矿也划入上述铁路的辖区范围。

斯大林同志指出，所有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都不能与这些铁路分隔开来。斯大林同志又说，在上次会谈期间他已经讲过，苏方并不觊觎使用与上述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但他并没有指那些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有关的企业。苏中两国关于铁路的协议应当以双方共同拥有这些铁路的原则为基础。中国人与俄国人一样都可以成为这些铁路的所有者，而经过 30 年之后这些铁路的所有权将完全属于中华民国。而当中华民国完全拥有了这些铁路的所有权之后，与这些铁路相关的铁路支线和企业也都将归属中国。斯大林同志个人认为，中方理应只对这些铁路的正常运营感兴趣，因此没有理由对他的上述观点表示

异议。

宋子文说，中国人认为铁路充其量只不过是交通类的企业，其主要职能便是确保苏联与大连和旅顺口相联系的一个通道。而所有其他为这些铁路提供服务和物资供给的企业理应由中国人掌握。

针对宋子文提出的、斯大林同志认为究竟哪些企业无法与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相分离的问题，他答应稍后再向中方提供这些企业的清单。

随后，宋子文将谈判的话题转到关于铁路的维护方面。他认为，保卫铁路的责任理应由中方承担，因为如果由苏联政府组建自己的护路队来负责铁路的保卫工作，实际上已意味着外国军队进入了东北境内。

斯大林同志对宋子文的上述说法做了纠正。他说，我们用以护路的人并不是军队，而是铁路宪兵。

宋子文说，中方坚持认为这些铁路应当由中国人来护卫，否则中国的主权便会遭到破坏。

斯大林同志指出，他个人认为，为了保护铁路，苏方应当派遣苏联指挥人员和少量俄国护卫，以便与中国人一起承担起护路的职责。

宋子文指出，如果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周围驻扎着俄国军队或宪兵，就必然会引发两国之间各种各样的纠纷，最终导致中国的主权遭到侵犯。

斯大林同志指出，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范围，因此根本就不会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侵犯，苏方组织铁路护卫队也根本不会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众所周知，铁路交通秩序是应当加以维护的，铁路上的资产也应当有人去保卫。上述铁路属于治外法权区域，这是人所共知的。不过，即使在这些区域内，中国的司法权也是仍然会发挥应有效力的。斯大林接着又说，当然，如果实践证明中国铁路护卫人员纪律性很高，那么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再研究。不过，我对此持怀疑态度。

宋子文向斯大林同志保证道，我们一定会完整地确保上述铁路的安全，中国政府将会用自己最好的士兵来组建护路队。

斯大林同志指出，至少在初期，比如1—2年间，铁路护路队的指挥人员应当是苏联人。

宋再次强调，中国政府不希望在本国领土上保留有外国军队。宋子文特别请求苏方研究关于铁路保护的问题，并充分考虑蒋介石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应会认真考虑这一问题。

宋子文问，斯大林同志对新疆持何态度，苏联是否会帮助中国来消除新疆境内的混乱状态？

斯大林同志问，您所谓的帮助是指什么呢？难道是希望苏联派遣军队去新疆？

宋子文说，目前新疆境内存在大量的匪帮，他们所使用的武器都来自苏联边境地区。中国希望剿灭这些匪徒。

斯大林同志说，这些消息未必正确。他问，中国政府是否打算给予新疆当地居民一定的

权利。

宋子文答,中国政府有这样的打算。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关于新疆的局势严重到何等程度的问题,宋子文答,这些包括有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的叛乱者们占领了伊犁边疆区。中方目前正极力解放那些被叛乱者们占据的地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政府的愿望是完全合法的。不过,斯大林自认为,解决新疆问题的最佳手段还是给予新疆少数民族一定的政治权利。承认这些少数民族拥有——哪怕是一些最基本的——权利是必要的,否则新疆便会始终处于混乱状态。宋子文对上述观点表示同意,并说当前中国政府希望首先夺回被叛乱者所占据的国土。

针对斯大林同志提出的问题——这些叛乱者们是否想脱离中国,宋子文答,他们想宣布成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共和国或其他与之类似的东西。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些在边境地区的叛乱者果真如此作为并动用了武器的话,那就理应予以清除。

宋子文指出,叛乱分子所使用的武器非常精良,这些武器甚至连中国都没有。

斯大林同志问,这些武器是不是印度输入到那里的?宋子文答,中方还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只知道其所使用的武器均来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这也未必,有必要认真核实一下。

宋子文请求斯大林同志向他保证,苏方将会尽全力阻止叛乱者从苏联境内获得武器。

斯大林同志说,也可能这些武器都是中国官员自己贩卖的,因为这些交易往往利润都较高。

宋子文答,叛乱者所使用的武器质量都比中国官员的好,我们现在已拿到了叛乱者所使用武器的子弹。这些弹药中国根本没有。

宋子文接着问,关于中国共产党,斯大林同志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希望苏联如何作为呢?很明显,中国政府希望苏联不要武装中共,并将所有对中国的援助都直接交给蒋介石所控制的政府。

宋子文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继续说,他同意这样做并问,是否中国政府还希望苏联解除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武装呢?

宋子文说,如果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这样的要求,就有些荒唐了。宋指出,中国政府目前正极力试图以政治手段来解决共产党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指出,如果能通过政治手段来解决国共之间的关系问题,那是最好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是些不错的爱国者,他们与日本作战非常英勇,战绩颇佳。

宋子文说,中央政府正极力促成国内各党派的团结,以便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政府。

斯大林同志答,这是完全合乎常理的愿望,因为一个国家中理应只有一支军队和一个政府。

宋子文请求苏联向中国政府提供道义上的支持。

斯大林同志问，这种道义上的帮助具体指什么呢？

宋子文答，苏联报刊上发表了很多诋毁中国政府的文章，而此举当然不会对中国政府有益。宋子文希望苏联政府能对这些报刊加以限制。

斯大林同志指出，中国报刊上也写了很多不利于苏联的东西。

宋子文指出，我们可以就有关限制本国新闻媒介的问题相互协商。

记录：A. 彼得罗夫

АПРФ，ф. 45，оп. 1，д. 322，л. 28－38

№12036

中国代表团致苏联政府函：要求苏方提供书面保证

（1945 年 7 月 10 日）

责成胡世泽先生转交 A. A. 彼得罗夫，1945 年 7 月 10 日。

译自英文

根据蒋介石大元帅在给宋子文先生所发电报中提出的三点意见，我们希望苏方就该三点意见向我方提供相关书面保证。该三点意见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中国对东北的主权；

二、中国共产党；

三、新疆。

A. 彼得罗夫译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扬、贝利亚、马林科夫、维辛斯基、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 06，оп. 7，п. 35，д. 506，л. 33－34

№14459

丘维林致华西列夫斯基报告(摘录):第八十八旅人员的分派

(1945年8月25日)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丘维林少将给苏联元帅 A. M. 华西列夫斯基(1945年7月任远东苏军总司令)报告的摘录

1. 截至1945年8月25日的第八十八旅①:

军官,149人

军士,358人

士兵,1 847人②

总计,1 354人

2. 民族属性:

中国,373人

朝鲜,103人

那乃,416人③

俄罗斯,462人

3. 请从由中国、朝鲜、其他北方民族、俄罗斯等民族组成的(第88)旅中派878人供第二方面军使用。

4. 请派215名中国游击队员、64名前满洲国④的士兵前往满洲工作。其中,115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司令和助手,153人作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40人作为一般当地居民。⑤

5. 从94名苏联籍中国人中挑选最优秀者担任红军部队的翻译,其余上了年纪的人复员。

6. 派98名朝鲜游击队员、15名在苏联的朝鲜人前往朝鲜从事如下工作:47人担任卫戍司令部副职,15人任翻译,37人为地方保安团和其他机关的成员。⑥

7. 请旅负责人派下列人员到卫戍司令部任副职:

周保中——中校、旅长,前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派往长春市;

张寿篯——少校、政治副旅长,前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派往哈尔滨市;

---

① 第八十八旅,全称苏联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又称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其主要成员是撤退到苏联远东地区的抗联残部,成立于1942年7月。周保中任旅长,张寿篯(李兆麟)任政委,崔庸健任参谋长,冯仲云任政治部主任,下属4个营。——编注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847人。——译注

③ 那乃人,即生活在苏联远东地区的赫哲族人。——编注

④ 指伪满洲国,全书同。——编注

⑤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⑥ 原文如此,数字疑有误。——译注

金日成——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一支队支队长，派往平壤市①；
王效明——大尉，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吉林市；
姜信泰——大尉、第四营营长，前抗日联军第二支队支队长，派往延吉市；
金策②——大尉、第二营政治副营长，前北满省委书记，派往咸兴市；
冯仲云——上尉、旅政治部主任，前北满省委委员，派往沈阳市。

8．请对下属人员给予颁发国家勋章、奖章的奖励：50 名游击队员因其在抗日斗争中的积极表现；25 人因其培训该旅中国和朝鲜军官的忘我工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的部分工作人员，因其协助满洲游击队抗日并将他们组建为红军的下属兵团。

9．请允许将派到市卫戍司令部担任副职、助手的中国和朝鲜的士兵提升为军官，而对担任大城市卫戍司令部副职的军官则授予更高的军衔。

远东苏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
丘维林少将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上校

已选派下列人员供各部队司令部使用：
远东第一方面军——164 人；
远东第二方面军——80 人；
外贝加尔方面军——100 人。

ЦАМОРФ，ф. 2，оп. 19121，д. 2，л. 3－5

№14448

安库季诺夫致普尔卡耶夫报告：为第八十八旅官兵授勋

（1945 年 8 月 27 日）

第 034 号，1945 年 8 月 27 日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安库季诺夫上校致信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普尔卡耶夫

① 报告摘录者在此处加了一个说明，认为原报告作者将 Кэйдзио(汉城)错读为 Хэйдзио(平壤)。
② 原文为 Цзинь Чэ，是中文的音译，一般俄文写作 Ким Чак。——编注

上将：

鉴于游击队在对满洲里日军进行积极、长期的斗争，在人员培养上认真而英勇的工作及在军事训练、政治素质上的突出表现，对第八十八旅的军官、准尉、军士和列兵给予表彰：

——授予18人“红旗”勋章，包括：1. 旅参谋长米林斯基中校；2. 旅长周保中；3. 营长金日成大尉。

——授予6人“一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反侦处(锄奸)处长拉科夫斯基少校。

——授予22人“二级卫国战争勋章”，包括：旅部第一支队长波利卡尔波夫少校、政治处副处长马利杰夫。

——授予48人“红星”勋章，包括连长阿法纳先科夫上尉。

——授予31人“勇敢”奖章。

——授予131人“战斗功勋”奖章。

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副处长
安库季诺夫

注：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1945年9月9日的嘉奖令于当日执行。

ЦАМОРФ, ф. 32, оп. 11473, д. 45, л. 173－177

№12100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前景

（1945年8月30日）

机　密

在互致问候和就共同的话题进行简短的交谈之后，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关于国共两党之间谈判前景的问题时，周恩来声明说，根据全部情况判断，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打算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初步观察使我们有理由相信，国民党领导人可能同意做出一些政治上的让步。当然，很难预料，这从根本上能够解决多少中国重大的政治问题。我们不可能指望蒋介石做出过多的让步。在任何情况下，无论这种让步采取何种方式，它对于国民党政权的益处，将永远会多于对反对党的益处。目前，蒋介石已经开始竭力缓和国民党极端‘右派’分子的强烈反应，他对于共产党问题的解决，可能从表面上看对共产党人有利，但是，实际上，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

量被消灭的结局。”

接着，周恩来同志向我通报说，国民党指派了4人进行谈判：张治中、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中国共产党方面参加谈判的人员有：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是双方通过了如下日程和谈判程序：

一、国家改造的共同问题

二、急需解决的问题

1. 接受日本投降；

2. 解除日本军队的武装；

3. 调解何应钦军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争议问题。

三、共同的政治问题

1.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

2. 关于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的问题；

3. 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

4. 关于解放区的问题；

5. 关于军队的问题。

四、决定通过的会晤和谈判程序

1. 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预备性的谈判；

2. 毛泽东、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会面；

3. 与此同时蒋介石与毛泽东可能进行会谈；

4. 根据毛泽东和蒋介石后来会谈中提出的具体问题，周恩来和王若飞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会晤。

8月29日，除蒋介石与毛泽东的一般性会谈之外，周恩来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还进行了会谈，就几个最重要的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

周恩来说："张治中向我声明，由于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中国的军队将改组为国防军，未来国防军的总数量应该是20个(或40个)师。他说，与此同时，还规定改组共产党的军队。对于我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军队应该由几个师组成，张治中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研究，不过目前已经决定，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实行统一的指挥和装备，这是不可动摇的。"

接着，在双方谈判过程中，还触及了边区的问题。

周恩来说："张群指出，国民政府计划将边区变成单独的省，同时保留它的相应的行政管理体系。对于我的问题——关于对待敌后解放区的问题国民政府是如何决定的，张群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讨论。"

随后，周恩来讲述了张群就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向他阐述的三个观点。

周恩来说："就准备和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存在如下意图：

"(1) 取消以前选举的国民大会代表；

“(2) 对大会代表进行新的选举；

“(3) 保留以前的代表和补选新的代表。”

与此同时，张群还强调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应该就此问题预先达成完全的理解，避免大党(国民党)给小党(中国共产党)以压力以及小党可能制造的反对大党的骚乱。应该加入到政府中，而不是推翻政府。

除此而外，还触及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周恩来特别提到：“张群声明说，关于政府名称的问题只是形式方面的问题，因此，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使用‘联合政府’这一名称。张群指出，目前他们正在研究关于这个政府的性质的问题，认为政府有两种类型——英国的和美国的，即在保留一党的主导作用的条件下，允许反对党加入政府。更具体地说，这指的是在最高国防委员会下建立专门的政府机关，或者是成立战时内阁类型的政府，以便在‘过渡时期’管理国家，在国民党看来，这个‘过渡时期’指的是在日本投降和国民大会召开之后的一段时间。”

在与张治中、王世杰、张群和邵力子进行初步会谈时，周恩来强调指出，甚至是那些初步的和大概的草案，也能使人有理由认为，蒋介石大概已经决定在某些政治问题上做出某种让步。但是，现在就做最后的结论还为时尚早，因为谈判才刚刚开始。

周恩来强调说：“有鉴于此，我们将面临着一个极其重大的任务。18 年来，我们党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斗争，我们目前面临的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我们应该从武装斗争急剧地转向和平建设。应该说的是，不仅是广大的党员群众，而且还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并没有完全准备好在自己的工作中完成一个 180 度的大转弯。战争的结束和日本的投降，对于我们来说是出其不意和突然的事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战争会这么快地结束。”

周恩来指出：“因此，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能够从您那里获得我们制定方针所必需的情报以及客观评价中国业已形成的局势和采取相应的具体措施所必须的意见。”

我说，我认为周恩来同志在党政工作方面经验相当丰富，他本人将能够正确地评价中国目前的局势，并采取正确的措施。

随后，周恩来同志就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某些章节的内容和说明，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我根据条约、协定的条款和章节原本的含义作了相应的解释。对于他的问题——是否还有某些文件是在莫斯科中苏谈判期间签署的，但目前尚未公布，我回答说，没有这样的文件。

出席此次会谈的还有 H. 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 年 8 月 30 日

文件共 3 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和大使馆档案室

1945 年 8 月 30 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4, л. 205 - 208

№14453

丘维林致索罗金函：第八十八旅人员在满洲和朝鲜的安排

(1945 年 9 月 2 日)

丘维林致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索罗金中将函

苏联武装力量远东司令部总司令向贵处派遣了前满洲游击队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这支游击队近 3 年来是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旅的一部分。

在苏联占领满洲国和北朝鲜期间，为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管辖区的秩序，并扩大卫戍司令部在当地的影响，可以让他们在省会和县城卫戍司令部的合法机构中担任军事代表的副手，也加入地方保安团，或者只是作为当地的居民。

共给您派了 80 人。

丘维林

1945 年 9 月 2 日

ЦАМОРФ, ф. 2, оп. 17582, д. 2, л. 23

№13296

中共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致斯克沃尔佐夫函：请求帮助

(1945 年 9 月 2 日)

亲爱的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1. 请原谅我们与你们进行这种横向联系。我们是 1941 年 10 月 1 日由中共中央第三战区山东代表处派到东北地区从事党的工作的中共干部。1944 年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围剿行动，我们与上级的联系渠道被切断，时至今日我们仍无法得到中央的书面指示。我们对当前国内政治形势知之甚少，也不知在当前条件下我们在东北应采取何种立场，不清楚是否仍应开展地下斗争，或者在合法、半合法状态下开展工作。鉴于此，请兄弟党给我们指示。

2. 在红军进入东北之后，当地国民党分子便开始散布关于红军和中共的谣言，称共产党

员为匪帮。在哈尔滨,目前这些国民党分子还向我们的工作人员发动武装进攻,其目的就是想摧毁我们的党组织。因此,我们的干部也积极行动起来,建立了自卫武装以保护党组织。

此外,我们请求兄弟党能允许我们前往中共中央以获得相应的指示和指令。如果无法实现这一目的,那就请让我们通过电话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

3. 我们正打算在哈尔滨建立中—苏文化关系协会。

4. 在我们城市的三棵树区有一座满洲所属工厂。目前,该工厂已被我们的人所控制。为了保卫工厂,我们现在手中有 10 支步枪,但要持有这些枪械需要得到红军的批准。为了方便工作,我们请求兄弟党批准我们拥有这些枪支。

5. 我们的领导干部均配有武器,但兄弟党不允许有人佩带武装,为了避免与红军发生误会,请就此情况向相关部门发出指示。

6. 我们党的主要工作是开展宣传工作,但我们没有编辑部,也没有印刷厂。兄弟党是否指示编辑发行机关,以便在这方面向我们提供帮助。

7. 联共(布)党员同志,红军指战员初次来东北,因此对当地的风土民俗不是太熟悉,为了有利于你们开展工作,可以使用我们的干部。我们已准备尽一切力量向你们提供这方面的帮助。

8. 鉴于部分红军战士违反纪律,并做出了一些让当地居民恐慌的事,我们的干部是否可以就促进当地形势、提高党和军队的政治威望等问题向你们反映自己的意见?

衷心地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斯大林同志致敬!

向斯克沃佐夫同志致敬!

中共中央第三山东支局东北委员会

1945 年 9 月 2 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 4 卷,第 811—812 页

№12112

彼得罗夫与赫尔利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美苏对华政策

(1945 年 9 月 6 日)

机 密

9 月 6 日,我拜访了赫尔利。在礼节性的寒暄之后,我请求赫尔利告诉我关于目前在蒋

介石与毛泽东之间正在进行的谈判的情况。赫尔利指出，当他与毛泽东一起从延安返回时，中国人认为，他(赫尔利)将交给他们一份准备好的关于解决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关系的计划，但是，他(赫尔利)认为，对谈判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更好一些。

按照他的话，毛泽东要求将包括首都北平在内的5个省转交给共产党人，以便使他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和供养自己的军队。赫尔利补充说，在他去延安旅行期间，他在那里会见了一位英国人林迈可，此人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赫尔利声明说，共产党人永远不会同意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这似乎再一次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分立主义的倾向得到了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支持，这些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执行的是自己的传统的政策："分而治之。"

赫尔利说，他收到了哈里曼的电报，电报中说哈里曼与斯大林进行了会谈。斯大林似乎声明，如果中国人允许在中国建立两个政府的话，那么，他们就是愚蠢的。以此为出发点，赫尔利建议说，苏联和美国应该共同发表一个声明，说他们希望看到一个统一的中国，并以此来冷却共产党人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的要求得到了某些大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的支持。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赫尔利回答说，他希望谈判有一个良好的结局。

在赫尔利看来，谈判薄弱的环节是，国民党的代表没有能力与共产党人进行谈判，因为张群完全是个新人，而张治中总是被一些琐事所吸引，从而把整个事情搞复杂了。宋子文和王世杰为避开参加谈判，到国外去了。谈判的优势落到了具有巨大智慧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边。

赫尔利再一次重申，如果谈判陷入僵局的话，那么，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应该公开声明自己支持国民政府。

我只是简单地说了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应该自己进行相互协商，并达成双方都能够接受的协定。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三等秘书M.贾丕才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彼得罗夫

1945年9月6日

文件共3份，送：B.M.莫洛托夫同志、C.A.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8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2, л. 218－219

№1211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国共谈判问题

(1945 年 9 月 6 日)

机 密

9 月 6 日，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和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我们之间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在回答我的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谈判进行得如何时，毛泽东讲述了以下内容。目前可以认为谈判的第一个阶段已经完成，在这个阶段，概括地讨论了政治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问题。在交换意见过程中，双方仅仅涉及原则问题，而把一些具体问题先搁置一边。

谈判非常清楚地表明，国民党和蒋介石本人极力追求彻底保留自己从前的政治立场，确保继续实行一党专政，并争取获得中国共产党的让步，然后借助于武力，实现对共产党所在的地区和军队进行封锁。在与张群、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以及蒋介石本人进行会晤和会谈时，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任何不同于国民党以前立场的新提案。

毛泽东说："我们赞成立即召开(在谈判结束之前)由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会议，以便讨论和解决国家最迫切的问题。但是，国民党的代表坚持在国共两党谈判结束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与此同时，他们还力求发表一个专门的公报，在其中将阐述我们之间谈判的结果，然后允诺召开各党派间的代表会议。"

对于国民大会，国民党仍像从前一样要求保留旧的代表，这些代表都是在 10 年前选出和指派的。蒋介石只是同意从共产党和其他党派中增选一定数量的代表。

毛泽东指出："国民党断然拒绝了对国民大会的代表实行普遍选举。蒋介石打算保留原有的代表作为参加大会的主要人员。他只同意将很少的中国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列入会议代表的名单里。换句话说，蒋介石指望保持国民党在国民大会里的统治地位。"

毛泽东说，准确地讲，正如谈判所表明的那样，关于联合政府的问题基本上已经被取消。这指的是保留由国民党领导的"国民政府"和允许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一些代表加入政府机关。

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不愿意建立名副其实的联合政府。顺便说一句，张群曾经声明，他们只能够同意共产党和其他党派的代表加入政府。但是，只有当国民党在政府中占领导地位的时候，这一点才能够实现。

在谈判期间还触及了关于改组最高国防委员会的问题。但是，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只有在保留国民党统治地位的条件下，才能够设想解决这个问题。

关于使其他党派合法化的问题，被国民党归纳为所谓的"政治建设"。在会谈期间，国民

党代表没有反驳中国共产党关于使各政治党派合法化的要求，但是，也没有表示赞同。他们提出了一个不明确的措词——“政治建设”，认为在这一政治建设过程中，这个问题会找到自己的解决办法。

在关于释放政治犯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毛泽东说，我们要求释放所有政治犯，也就是说，我们想争取大赦。但国民党则坚持先提出共产党特别希望释放的政治犯名单。由此可见，他们想把事情归结为仅仅释放一小部分人。

毛泽东说，当谈判涉及取消特务机关时，张群和国民党其他代表企图证明，秘密工作机关并不是中国特有的制度，世界各国都有各种不同秘密警察，因此，未必需要完全取消特务机关。

毛泽东强调说：“他们打算保留特务机关，给他们以新的名称。国民党准备称这些机关为秘密警察局。当然，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会采取一切措施，保留目前仍然起着作用的盖世太保制度。”

还初步讨论了领土和行政管理问题。

毛泽东指出：“如果国民党同意将除特区以外的 5 个省——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和热河的行政管理权移交给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同意放弃华南和华中的解放区，那里共计有 4 000 多万居民和我们的 30 多万人的军队。我们还允许国民党对一些重大的城市，如北平、天津、青岛、济南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干线实行监督。同时还规定国民党的代表可以参加上述省的行政管理机关，而同样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也应该参加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广州、青岛和其他城市的市政机关。”

在会晤和会谈期间，双方还就军事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共产党争取保留 48 个师(或者是 60 万人)。但是，蒋介石声明说，他最大限度只能同意中国共产党保留 12 个师的兵力。

毛泽东说：“借口防止发生国内战争，蒋介石要求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都要进行裁员。因此，他只同意保留共产党的 12 个师，而当时我们说出的数字是 48 个，这之间的差距太大了。”毛泽东指出：“在最万不得已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能会做出让步，同意保留 25 个师。但是，这个数字是我们的极限，低于这个数字是不可能答应的。”

谈到关于拖延在华日军投降书的签署问题时，毛泽东强调指出，目前有充分的理由可以做出结论：在国民党和日本人之间存在着默契与合作。不应该怀疑，这种合作的首要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同时，国民党当局还使伪军的地位合法化，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正规军部队。毛泽东指出，这样一来，中国共产党将同加倍的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力量进行斗争。目前，蒋介石已将这些军队装备完毕。

在谈判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参加接受日本投降的问题，但是，时至今日，国民党方面没有给予任何答复。

在会谈结束时，毛泽东同志描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今后谈判中的做法，形成了自己的基本的战略原则。

“我们早就知道，我们的许多要求不可能被国民党接受，我们已经准备做出让步。但是，我们将尽一切努力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不得不做出让步的话，那么，我们也将尽可能慢

地、带着巨大的抵触情绪去做这种让步。这种让步只可能在基本条件,即我们的具体利益不受到损失的情况下,才能够做出。我们将不会偏离我们切身利益所在的那些界线。这样一来,我们的策略可归结为:进攻和退却同时进行。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最大限度的让步是受我们事业的具体利益制约的。”

在会谈期间,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尤其是王若飞同志,都很关心我们对于一系列问题的评价和看法。例如,他们极其关心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的行为将会如何:美国将坚守中立呢,还是积极地给予国民党军事援助?他们还非常关心苏联方面的立场:如果美国将帮助国民党军队消灭共产党军队的话,那么,苏联将会采取何种步骤?在会谈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多次强调了业已形成的局势的复杂性以及国民党与共产党目前进行的谈判的极其重要性。毛泽东指出,目前正确地确定方向对他们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们既不了解在中国爆发国内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方面的立场,也不了解苏联方面的立场。毛泽东还说,朋友们的忠告和建议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在会谈期间我多次强调说,苏联非常希望看到中国在政治上统一,两党的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 H. B. 罗申和 H. 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 年 9 月 6 日

文件共 3 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 年 9 月 17 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3, л. 220 - 224

№12114

彼得罗夫与蒋经国会谈纪要:国共谈判、新疆局势、苏中关系

(1945 年 9 月 7 日)

机　密

9 月 7 日,蒋经国拜访了我。

蒋经国说，按照蒋介石总裁的请求，他希望就一系列问题与我进行交谈，在他看来，这些问题涉及双方，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蒋经国说，蒋介石与毛泽东之间的谈判还在进行。但是，现在双方已经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军队和行政管理问题是最困难的问题。关于军队的问题，蒋介石向中国共产党建议：通过改组和部分转业的途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应该拥有12个师。与此同时，这些师应该服从陆军最高统帅部的指挥，由中央政府提供各种给养和武器。共产党人不同意蒋介石的这个建议，并坚持共产党的部队应该由48个师组成。按照蒋经国的话说，蒋介石不可能同意共产党方面的这个建议，因为他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在中国，总的来说，尤其是在共产党人那里，供养着如此庞大的武装力量没有什么意义。关于行政管理问题，共产党人要求黄河以北各省的省长应该任命共产党人担任，而在黄河以南的各省里，副省长和省政府副主席的职位应该由共产党人担任。按照蒋介石的意见，这些要求正好代表着将中国分为两个部分——两个国家。蒋经国说，蒋介石同意共产党人加入到政府中，同时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部长职位，允许他们参加省、区、县政府以及国家机关的其他部门。但是，实现这一点需要共产党人在所有部门里与中央政府的代表很好地合作。蒋经国说，除此而外，共产党人还坚持，蒋介石在北平行辕司令部的副指挥职务由共产党人担任。蒋经国说，目前双方已经处于困难的境地。但是，尽管如此，谈判仍然有希望获得圆满结束，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蒋经国问我，我是否已经获得了关于谈判过程的更为详细的情报。

我回答说，昨天毛泽东拜访了我，并向我通报了关于谈判的大致情况。对于蒋经国的问题——我如何评价谈判的前景，我说，根据我的看法，谈判应该继续下去，并通过双方相互的让步达成一致意见。

二、蒋经国通报说，中央政府获得了来自新疆的令人惊慌的消息。整个阿勒泰地区已经被暴动分子占领。暴动分子还将自己的势力扩展到新疆省的其他地区，尤其是在迪化(乌鲁木齐)以西的乌苏地区，频繁地进行军事行动。根据朱绍良将军的通报，暴动分子在乌苏地区使用了炮兵和空军。与此同时，他们的两架飞机于9月5日轰炸了乌苏城。朱绍良通报说，他已经掌握了暴动分子使用的炮弹和手榴弹的样品，这些样品证明，这些武器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说，此外，暴动分子没有飞机。他以此来暗示，轰炸乌苏地区的那两架飞机也是苏联生产的。蒋经国提请注意，双方应该关注尽可能快速地稳定新疆地区的局势，双方需要商量一下，如何解决局势问题。就中国而言，中国政府准备在近期内公布一系列改善新疆省行政管理的建议。这些建议还有协助消灭新疆省的暴乱行动的目的。蒋经国还援引了在莫斯科会谈期间与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谈内容，在会谈时大元帅曾经允诺，苏联当局将同走私运输武器经过中苏边界的行为进行斗争。

我否认了仿佛在暴动分子那边活动着的是苏联飞机的怀疑，并对蒋经国说，对于新疆事件，苏联将严格遵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第5章的内容，以及关于三个问题的著名信函中的条款，其中记录了新疆事件纯属中华民国的内部事务，苏联不打算干涉中国内政。

三、蒋经国问，罗申将军是否将前往南京，以便出席驻华的日本军队投降书的签字仪

式，这个仪式将于9月9日举行。与此同时，蒋经国强调说，蒋介石非常希望苏联代表能够出席这个仪式。

我对蒋经国说，罗申打算前往南京，并于9月3日到了机场，由于天气不好，飞机没有起飞。接着，罗申就病倒了。他目前身体状况如何，我还没有得到准确的消息。

四、蒋经国通报说，近日，中国当局的代表和东北地区各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打算前往新的工作岗位所在地。蒋经国请求，让苏联驻东北地区的军事当局在上述人员的行程方面给予协助。尤其理想的是，苏联当局能够向他们提供飞机，利用这些飞机可以从北平向长春、沈阳和东北的其他城市调动一批行政管理人员。蒋经国说，国民党将正式提出这个问题。我答应给予可能的协助，并向驻东北地区的苏联军事当局通报中央政府工作人员面临的行程以及给予他们相应帮助的必要性。

五、我向蒋经国通报说，今天夜间，重庆的一小股匪徒对苏联武官的办公室和武官助手安德烈耶夫的住宅进行了偷袭，其结果是诸如打字机一类的东西被偷走。我对这股匪徒偷袭苏联机关的无耻行径表示震惊，并请求蒋经国召集重庆最优秀的侦察人员对此事件进行调查。蒋经国答应立即采取措施，以便吸收最有经验的侦察人员立即展开调查工作。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年9月7日

文件共3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1945年9月20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4, д. 13, л. 226-229

№0989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国共谈判的准备工作

(1945年10月5日)

今年10月5日，周恩来和王若飞两同志来访，我和他们进行了以下内容的谈话：

周恩来应我的要求，概述了当前国共谈判的结果，讲述了国共双方代表准备签署的谈判纪要的内容。谈判纪要反映了现在谈判中双方讨论过的所有重大问题——不论是两党已经达成谅解和协议的问题，还是仍有争议的问题，都逐条做了记录。周恩来答应把会谈纪要原稿寄给我们，供我们参考。

我问，依他之见这次国共谈判的结果会是怎样的。周恩来指出，现在中共代表力争解决三个任务：1. 签署谈判纪要；2. 发表联合公报；3. 让蒋介石同意毛泽东回延安。

周恩来接着说，当然，解决这三个问题对双方都有利。由于中国目前的局势，国民党希望发表联合公报，因为国共关于达成谅解和协议的联合声明，对龙云的表现和云南的事态会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回答。从另一方面说，发表联合公报也是国民党手中握的一张向美国要贷款和援助的牌。

周恩来说："然而，签署会谈纪要和发表联合声明，对共产党更为有利。共产党将得到非常有力的政治武器，可以充分用来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任何企图。共产党也将承担不少责任，采取许多措施，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共产党从不背弃自己的诺言。至于国民党，会谈纪要和公报将使国民党不仅在中国社会舆论面前，而且在联合国面前，承担巨大的政治责任。"

周恩来在评论当前政治局势时说，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以下两个重要因素决定的：第一，红军在中国领土上的存在；第二，伦敦外长会议的失败。

周恩来指出："考虑到这两个国际现象，蒋介石今后很可能加紧秘密的反共反苏活动。与此同时，当然，他的亲美倾向进一步加强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等于说，国民党会公开宣布对共产党进行围剿或内战已经开始。如果期待蒋介石方面的行动很不顺利是不对的。他有许多机会可以发动国内战争，不必履行任何手续。例如，不排除蒋介石下令要求共产党军队撤离某一地区或重要交通干线。如果我们稍有怠慢，将被看作违抗最高统帅部的军令。蒋介石这样做的后果是非常明显的：国民党军队可以开始军事行动，实际上这将是内战的开战。"

周恩来强调说，尽管如此，国民党今后的军事政治方针将取决于该党的强点与弱点的对比关系。例如，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最大的弱点是兵力不足。

周恩来继续说："在南京地区有日伪军 27 万人，而国民党军队不超过 3.5 万人。只要指出这一点就够了。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打算派军队到华北和东北去，而且要挑选精锐的军队派到那里去。由此，自然产生一个问题：从哪里调遣军队。退一步说，即使国民党能够搜集到必要的军队，那么又会出现第二个困难，即运输问题。重庆政府研究了运输军队的现实条件问题，结果表明：在最好的情况下，通过空运和海运把军队运到上述地区需要一个多月，也就是说，在这个期限内我们也可以做许多事情。国民党政权的第二个弱点是，许多地区的政治形势不稳，不能不考虑新疆、蒙古、东北以及云南的很不稳定的局面。不应忘记，龙云有 7 个师的军队驻扎在云南边境以外，而且其中一个师是他亲生儿子指挥的。当然，现在很难设想这些军队今后的态度如何。考虑到昆明的混乱局面，绝对不会令人放心的。在谈论国民党的弱点时，还应当考虑到强大的共产党军队的存在这个事实，国民党军队在同这支军队的武装冲突中已多次有机会领教它的战斗力。"

周恩来接着强调了苏美相互关系这个国际因素的重要性。周恩来把蒋介石视为"苏美关系的挑拨者"，他指出，在正统的国民党人看来，苏美友好关系的存在是不可能的和不能容许的。

周恩来说："蒋介石在执行反苏政策方面远不是孤立的。美国当前的统治集团正在给早已

公开奉行亲美路线的重庆政府以大力援助。在评价驻华美军的行动时,我们不能排除美军直接参加中国内战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低估美军在准备和发动这场战争过程中的作用。毫无疑问,美国人正极力最大限度地保证国民党军队各种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

然后,周恩来和王若飞向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他们很想知道苏联对美军在天津和北平地区登陆的立场。我回答说,美军在中国的存在不是新问题,也不是出乎意料的事。他们又问:如果美军试图在张家口、长春和东北的内陆地区着陆,苏联将采取何种态度?我说,现在很难预见这种形势发展的一切具体细节。

最后,周恩来问我,为了对付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捣乱,在保证毛泽东同志在重庆停留期间的安全方面,中共从我们苏联使馆可以得到哪些实际帮助?

我说,周恩来同志在提出这类问题时,应当考虑一个外国驻华使馆所处地位的复杂性。

参加谈话的有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和费德林同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 п.248, д.7, л.120-123

№09893

彼得罗夫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等问题

(1945年10月10日)

因毛泽东要回延安,我于10月10日设宴为他饯行。应邀出席宴会的还有周恩来、王若飞。苏联方面出席宴会的有:使馆参赞米克拉舍夫斯基同志、武官罗申少将、一等秘书费德林和列多夫斯基同志。在宴会前和宴会上,我们就各种问题进行了畅谈。

第一个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如何评价蒋介石和中共代表谈判的结果,毛回答说:"不能说结果很好或好,但也不能说结果很糟。结果要比伦敦外长会议好一些。"

毛泽东说,关于谈判的联合公报将于10月12日发表。他还强调指出,这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他说:"如果国民党食言,联合公报将是我们进行宣传的某种依据。"

接着,毛泽东介绍了谈判的进展情况。他说,谈判过程可划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谈判基本上正常,已经决定发表联合公报,但是这时美国大使赫尔利干预谈判,发表联合公报一事就告吹了。第二阶段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其特点是谈判进行得非常艰难、紧张。蒋介石的代表采取了拖延谈判的方针。看到这种情况,在第一个阶段对国民党代表保持克

制态度的共产党代表，开始采取了进攻的方针，无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在军事方面。

在政治方面，延安利用一切宣传手段，开始尖锐地抨击国民党。在军事方面，中国共产党采取了重大军事行动，结果击溃了胡宗南将军的7个师。采取上述措施的目的是给国民党施加压力，迫使它在谈判中做出让步，这一目的最终达到了。通过争论，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协议，但是国民党是否履行协议还要走着瞧。有些问题没有解决，还要进一步谈下去。毛泽东离开后谈判将继续进行。周恩来同志留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继续谈判。

我问：延安的情况怎么样，那里是否知道谈判的情况和结果？毛泽东回答说，延安的同志了解情况，但不是全部，20个师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还不十分清楚。同时，这个问题又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做出的主要让步。

毛泽东说，他认为能够使人们相信而且能够证明，为了胜利让步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毛还说，除此之外，我们代表团还有一个重要的论据能够说服同志们赞同做出的决定。这一论据是：关于改组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让步是形式上的让步。我们同意将师的数量压缩到20个，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裁减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一份文件、没有一次谈话讲我们的师应是什么编制，应有多少人，因此，我们可以组建任何编制的师，可以是1万人的师、2万人的师，也可以是3万人的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师就编什么样的师。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发现中国共产党组建的师比他的师人多，他能同意吗？毛泽东回答说：为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将成立一个由总参谋部、军事部和第十八集团军代表组成的专门军事小组。

罗申同志又问：蒋介石是否会给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提供军需？毛回答说，中国共产党将力争，但对结果不抱希望。

接着，我问，蒋介石从西昌回来后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对他的态度明显好转，他变得比较客气、和善、坦率，不固执了，这一次他同意就谈判的初步结果发表联合公报。

毛泽东还说，蒋介石在和他单独谈话时说："国家的命运操在你我手中(即操在蒋介石和毛泽东手中)，若我们之间不能达成协议，那我们就有罪于后人。"在这次谈话中蒋介石称："共产党不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上策。今后它只用政治手段就能在国内赢得政治权利。"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人从不拒绝由国家统一军队(如果蒋介石的话是指国家统一军队的话)，还说，如果允许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拥有像美国民主党那样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可以放弃武装力量。

我又问毛泽东：目前蒋介石依靠国民党中的哪个政治派别，其中哪个政治派别在他身边占有更重要的位置？毛泽东回答说，关于这个问题，不能说蒋介石不论在对外政策方面还是在内政方面都依靠某一个政治派别，这是因为目前他还没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思想政治目标，或者说还没有一个能够左右其他一切的主心骨。在内政方面，蒋介石自己也不知道该走哪一条道路：是走独裁的道路还是走国家民主化的道路。在外交政策方面，蒋介石不知道倒向谁：倒向美国还是倒向苏联。考虑到苏联的国际影响力，蒋介石还没有拿定主意完全倒向美国。尽管如此，他也不可能完全倒向苏联。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由如下因素

确定的: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力量、苏联的国际地位、新疆的状况和驻在东北地区的红军。在对外政策方面,蒋介石求助于"政学系",他和这一派解决与对苏关系有关的问题。在内政方面,特别是在对付我们方面,他利用CC派和黄埔系。在解决其他问题时,他谁都会利用。因此,无法得出蒋介石现在依靠哪一个政治派别的结论。

我问,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的政策今后会是什么样的政策?他回答说,他的政策将带有两面性:一方面是他表面上竭力妥协,而另一方面是他会继续进行反共的军事准备。他正在搞军事准备,而且很快就能准备好,到了那个时候,在领土、军事和政治问题上,蒋介石显然会试图逼迫共产党接受他的条件。毛泽东说,国民党军队会试图把共产党从他们占领的地盘上挤出去。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也正在三个主要方面加紧做应战的准备。毛接着又说,蒋介石不会履行达成的协议的,那时,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共产党不得不消灭国民党的几个师,譬如胡宗南的七八个师,共产党能够做到。

罗申同志问,如果蒋介石继续让他的军队向前推进,以实现包围共产党的军队,以切断共产党军队通往东北道路的计划,具体地说,共产党的军队怎么办?毛泽东同志回答说,共产党不怕国民党的军事进攻,蒋介石并不拥有足以打垮共产党的力量,如果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地盘进行军事进攻,那么共产党就要应战国民党军队。

对于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蒋介石的武装力量会沿各个地区分散。例如,胡宗南的军队集中在主要的方向上,他的16个军部署在从新疆到东北的沿线上。只有两个军的主要力量越过了黄河,并前往太原地区。11个地区的部队将集中在2个地区:近11个师的兵力将在平汉铁路沿线向北集结,第二个地区是在徐州集结并向北推进。其中一部分向山东地区分散。要集结这些部队,使他们形成一个拳头,需要时间。

罗申同志问,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由空投到天津和北平的美军先头部队作掩护,蒋介石率兵北上,津浦线和平汉线成为蒋介石军队的主要运动方向。毛泽东回答说,这将是美国对中国内政的公开干涉,这是中国共产党唯一担心的一件事。毛泽东接着询问在场的人,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和共产党的军队作战。

我和罗申同志回答说,现在很难说美国人会不会公开干涉中国事务,因为从国际方面考虑,这样做,对他们不利,他们这样做,只会失败。

然后毛泽东问,如果美国开始出兵共产党占领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我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和平的途径妥善调解局面,尽量避免和美国人发生武装冲突。我又补充说,与此同时,必须在报刊上报道这些事实,进行反对美国公开干涉中国事务的宣传。

对于我的问题——国民党会不会向东北派兵,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这样做会遇到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困难是在华北地区有共产党的军队。只有在蒋介石与中国共产党就所有未决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才能到东北去,否则,中国共产党是不会让国民党军队到东北去的。

对于罗申同志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蒋介石的军队何时能够结束镇压共产党人的

准备工作，毛泽东说，在他们看来，蒋介石的军队将在11月中旬完成准备工作，11月份就应该预防蒋介石的重要进攻行动了。毛泽东接着补充说，在此之前我们将完成自己的全部准备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总的来说，国民党在谈判中表现如何，毛泽东回答说，国民党代表对谈判没有准备，他们没有自己预先准备好的方案，提倡议和唱主角的基本上是共产党，是他们提出了经过斟酌和认真研究的建议。国民党扮演的角色归结起来就是千方百计地竭力推翻中国共产党的建议。美国大使赫尔利扮演了主要角色，他是蒋介石的常务顾问。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39 - 44

№14435

卫戍司令简明手册：苏联卫戍司令部在满洲和朝鲜的任务

(1945年10月18日)

远东第一方面军党的政治工作部

目　录

前言　第3—4页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第5—13页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第14—17页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第18—22页
附件　卫戍司令第一号命令，第23页

前言

满洲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它于1931年被日本占领。从那时起，日本就对此地进行掠夺，并控制了这里的所有经济。日本金融资本将此地变成日本的粮食和工业原料基地。日本利用满洲有利的战略位置在当地建立起反苏军事桥头堡。

英勇的中国人民为抗击日本的奴役进行了14年的斗争，但是中国军队无法单独战胜敌

人,将其赶出自己的国土。战无不胜的红军及其伟大的盟国一道支援中国。友好的中国人民通过红军获得了大量援助。

红军在满洲、在东方举起了解放被压迫民族的战斗旗帜,他们同中国、美国、英国的军队一起给予日本帝国主义以致命打击。军国主义日本被击溃、投降。

满洲在关东军被击溃及摆脱日本的奴役之后,苏联红军卫戍司令在最初的日子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头几批红军解放者代表肩负着建立满洲解放区安定秩序的光荣任务。

本手册就是要阐释卫戍司令的任务和责任。

第一章　卫戍司令部的组织—行政活动

卫戍司令的岗位。在国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一职是非常重要的军事岗位。卫戍司令的责任是:保障城市的良好秩序,保护现有资产和物品,设法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生活以满足居民的日常经济需要,并为红军部队完成任务创造一切条件。为了红军的需要,应在解放区的重要城市建立军事代表部门。在这里,一切都应当服从军事上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应当保持警惕,一切都要服务于军队的需要,服务于彻底消灭我们已经解放的满洲的所有残余敌人的需要。

卫戍司令的隶属。(城市)居民点的卫戍司令,由集团军、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委派,并负责处理与军事警备区指挥员的联络。

卫戍司令直属卫戍司令管理部。

如果(城市)居民点已处于方面军的后方,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卫戍司令则转属方面军,或者被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指派的人代替。

卫戍司令的权利和责任。首先担任红军解放城市的卫戍司令是当地第一批苏联军事部门、民政部门的代表。

卫戍司令的任务是:

1. 通过组建内部秩序、保护居民和(个人、集体)财产安全的方式保障城市(居民点)的正常生活。

2. 没收居民的武器和无线电设备。

3. 快速准确地核查所有居民。

4. 将敌人奸细一网打尽。

5. 协助红军的反间谍活动。

6. 尽快消除所有目标首先是道路上的地雷。

备注:为此,卫戍司令成立了城市排雷总部,任务是查清所有布雷区,并采取排雷的紧急措施。工程兵受其指挥。

7. 保卫城市免受市内及其周边地区残敌的侵犯。

备注:为此建立了与城市驻军指挥部各执勤分队的联系。

8. 提供防火措施。

9. 保护重要目标和缴获物资。

备注：保护这些目标的任务交由卫戍司令直属部队。

卫戍司令因上述责任而具有以下权力：

1. 颁布有法律效力的命令、指示。

2. 追究命令、指示违反者的责任。

卫戍部队条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在工农红军军人中的权力。方面军或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对地方居民的权力。

卫戍司令的建筑物悬挂苏联国旗。

卫戍司令颁布的主要文件。在被苏联红军解放的城市中执行任务的卫戍司令可以颁布法令。这些法令应当阐述红军对该国家的主要政策，并具体规定苏军占领区居民的义务和行为规范。城市或其他居民点的卫戍司令应在命令中简洁明了地提到对当地政权和居民的所有要求，以及遵守法令规定的举措。

首批命令规定了卫戍司令部的一切实际活动，包括：

履行自己的责任。

解散一切亲日政治团体及其组织。其所有成员都要接受卫戍司令的核查。命令中要指出，拒绝核查将被视为与间谍、破坏活动同罪的敌对活动。

所有警察(包括秘密警察、政治警察)和宪兵，以及其他非军事化组织须向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无卫戍司令部就向红军驻军登记。拒不登记者将被逮捕。

没收已被解散团体的所有资产问题。包括逃避红军并隐藏起来的团体领袖、成员、职员的个人财产。

企图隐匿、销毁或攫取属于上述团体和个人所有财产的人，将以战时法令对其实行惩处。

所有以前敌方的军人都应立即到卫戍司令部接受审核，拒不执行者将按间谍和破坏罪论处。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禁止收藏、购置或生产刀械、枪炮、炸药和无线电设备。

所有公民都应检举旧制度下的帮凶。隐匿、破坏军事代表的命令和知情不报者将追究同谋罪。

卫戍司令的所有命令都应当执行，并且具有法律效力。拒不执行将被视为反红军的敌对行为。所有工商业、经济部门的领导及其员工都应留在原处继续其活动，否则将受到怠工、战时法令的制裁。

命令中有专门条款规定，允许各类必需的营养品可按红军到来前的价格自由贸易，禁止投机倒把。

同时，卫戍司令应当严令取缔各类走私及走私品交易。

卫戍司令应当与驻军指挥官(有驻军司令部的地方)一道设立防止指战员与当地居民过度接触和交往的制度，以防军队疫情的发生。

卫戍司令规范所在居民点的公民行为，并制定相应的惩治措施。

卫戍司令应当限制居民的外出时间。没有卫戍司令认可,居民不得在城市(居民点)之间流动。卫戍司令应当采取防范各族居民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不和的措施。

卫戍司令与除奸机关应在邮电局督察员的协助下检查邮局、电报信函。

卫戍司令应当组织当地居民修理道路、桥梁,拆除受损建筑,清洁城市,重建面包房、电站、输水管等基础设施。为此,卫戍司令应发布旨在吸引居民参加劳动的专门法令。其中应当指出:

1. 何种年龄、何种性别的居民参加。

2. 报到时间和集合地点。

3. 随身之物中哪些应被征用。

第二章 卫戍司令部的经济活动

弃置资产的考察。卫戍司令必须尽快查清城市及附近农村敌人的弃置资产。查明价值后应立即对其加以保护,以防偷盗。

可通过调查居民点、寻访卫戍司令部辖区乡村的方式进行。为此要就地招收熟悉本地情况和资产状况的居民。参与调查的人包括军事代表及其副手、助手,以及经过他们授权的人。

弃置资产的审核。如果说我方专门的军事代表负责审核、转运战利品(军事设备),那么居民点卫戍司令部则要负责核查、保存和正确使用其他一切资产。包括原料仓库、粮食、燃料、工厂设备、工商企业、地产、有价证券,以及日本人、满洲当局及随同其外逃者的资产。准确核查所有这些资产有助于这些资产的正确使用并防止被盗。

弃置资产的使用。卫戍司令应制定在红军所需的诸如邮局、电报局、电话局、电站、修理厂、银行、理发店、食品厂、贸易机构等机关和企业开展工作的措施。

为此,应当查明和立即招收留在城市中的所有专家。

在农村,需要收集所有遗留下来的牲畜,招收当地居民加以照料。

卫戍司令按照集团军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用现有资源保障地方居民的粮食供应。

防火机关。卫戍司令应采取灭火、防火的紧急措施。他要组建当地的消防队,维修、封闭、保护消防水龙头,保证消防水道畅通。

医疗措施。卫戍司令应当:1. 采取清洁街道、院落的紧急措施。2. 建设流行病医疗站。3. 隔离所有流行病患者并将其安置到医院。4. 监测水库并对其加以维护,注意配水站的情况。

工作中对居民的使用。为保证这些工作,卫戍司令应招收地方居民和留在城市中的专家参加工作。

招收可采取征召的方式,并发布命令。招收居民的目的是清理道路、桥梁、拆除街垒和路障,以保证我军顺利通过,保证城市交通。

安置红军部队宿营。按照部署计划,在有卫戍司令部的城市部署的部队,应在卫戍司令的帮助下行事。

卫戍司令应登记所有不在城市中的部队,并设定其宿营地点。如需要将军队与当地居

民分隔开来，军事代表就要组织当地居民搬迁到专门划拨出来的住处。

第三章 政治工作、群众文化工作

揭露敌人的宣传。卫戍司令的首要工作是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为此，卫戍司令应当与在居民中有专项工作任务的集团军或方面军的政治机关保持密切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组织集会、会议、讲座、谈话，通过大功率扩音器宣传红军在满洲的解放目标。

卫戍司令要协助我国政治机关颁发出版物(报纸、传单、小册子)，揭露敌人有关红军和苏联的宣传，阐述我方对中国的友好政策。

卫戍司令应采取措施，消灭敌人张贴的标语等。

积极分子的选拔。卫戍司令应当从当地居民中选拔积极分子。可从下列人等中产生：

1. 旧制度下的受迫害者(政治犯等)。

2. 反对旧制度的民主活动家。

3. 积极支持红军对敌斗争的游击队员。

选拔积极分子应当同“除奸部”保持密切联系。要知道，敌人是狡猾的，他们会留下间谍，掩护在册嫌疑犯和被镇压者。

积极分子的使用。可以在卫戍司令的一切活动中使用甄选的积极分子。积极分子可以：

1. 在当地居民中开展宣传。

2. 查明敌视红军的人。

3. 帮助难民和当地贫困者。

4. 进行经济重建。

需要同积极分子一起工作，对他们宣讲红军对他们国家的政策、任务、措施的本质等。

应对积极分子的所有工作加以经常性的严格监督。

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措施。卫戍司令应当与红军政治机关合作，在当地居民中开展以下政治工作和群众文化工作：集会、会议、报告、放电影、音乐会、戏剧表演、分发报刊传单小册子等。卫戍司令应当随时准确知道集会的地点及其举办者、集会任务，并对其活动进行监督。禁止没有红军代表参加的集会和会议。

用城市现有的乐手组建乐队。

召开音乐会、戏剧表演，需经卫戍司令认可。节目内容要经卫戍司令审查批准。

应以放映反映苏联生活、红军斗争的苏联文献片和苏联文艺片为主。

应当组织红军文艺活动音乐会。

旧制度下的城市报纸已经封闭，其资产和印刷基地由卫戍司令没收并转交新成立的报纸机构。

应当收养孤儿并送交保育院。

无线电广播。无线电广播是红军上级机关的事情。但如果居民点有无线电中心站和转播网，卫戍司令就可以加以利用以便传送命令和指令。未得到特别指示不得进行其他广播。

关于宗教和神职人员问题。卫戍司令的命令中的第一特别条款中规定，可以到任何寺

庙和教堂祈祷。

附件：

第一号命令

为了(某市、县、村镇、乡村)的正常生活和秩序，(某市、县、村镇、乡村)卫戍司令命令：

1. 所有民事机关继续履行各自的职责。

2. 所有商业、企业主继续其经营。商品、食品的价格维持其在红军到来前的价格。没有特别法令不得出售酒类。

3. 地方机关和居民应为学校、医院、诊所和其他文化、交通机关和企业提供和平支持。

4. 寺庙、教堂的祈祷活动照常。

5. 当地居民应当向卫戍司令部交出所有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和资产以及无线电设备。

6. 属于日本人及其军事当局的所有仓库及其现有财物应当交苏联指挥部管理。

7. 外出时间是当地时间5时至21时。

8. 夜间有必要的灯火管制。

卫戍司令

ЦАМОРФ，ф. 32，оп. 11318，д. 196，л. 90 - 102

№12157

希金致马林科夫报告：恢复东北地区的中苏友好协会

(1945年11月7日)

第793号

И. 希金给联共(布)中央Г. М. 马林科夫报告：关于在中国东北各大城市建立苏中友好

协会并建立由友好协会管理的文化宫的合理性问题。

如今，在东北一系列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均建立了一些苏中友好协会。

建立苏中友好协会的目的在于密切中国与苏联的文化联系，并在东北居民中开展相应的文化教育工作。该协会的纲领和章程为自己所确定的任务是：传播关于苏联的真实信息，揭露亲日分子的虚伪宣传，让中国人民了解苏联的科学、文化和艺术。

首批协会组织于今年8月末和9月在东北建立。目前，这些协会已开展了大量的组织筹备和宣传工作。例如，在沈阳市组织的协会会议上便有120位该市社会各界代表出席，其中包括作家、艺术家、中学生、工业家、商人、工人、大学生、医生和职员。与会者们一致拥护与苏联建立紧密的文化联系。会议还通过了一个宣言，阐明了协会的目标和任务。会议还选举了组织委员会，其成员包括了民族知识分子代表——作家、艺术家、中学教师和工人。

今年10月10日，在长春市，当地苏中友好协议在市体育场召开了一个群众集会，以庆祝1911年中国民主革命34周年，与会者达到8 000人。

就在同一天，沈阳市也召集了一个有25 000人参加的群众性集会。各阶层代表在发言中均对红军解放沈阳表示了感谢，并强调必须密切与苏联的文化和经济联系。与会者们向斯大林同志和蒋介石发送了慰问电，并决定将沈阳市一些最繁华的街道改名为斯大林元帅、红军、孙逸仙和蒋介石，等等。

在赤峰市由苏中友好协会组织的群众集会上，与会者达到15 000人以上。

鉴于苏联军队即将撤离东北，因而有必要在东北一些大城市建立一些文化宫。这些文化宫已成为我们对东北居民施加影响的载体，因而最好能由苏中友好协会负责管理。而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也可依靠这些文化宫来开展自己的工作。在一些城市，如长春，苏中友好协会已拥有一些巨大的楼房设施，完全适合在这些地方设立文化宫。

我们认为，应当指示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和大连等东北比较大的城市设立此类文化宫，因为这些城市既拥有必要的物质条件，同时在居民中也拥有大量的(拥护苏中友好的)积极分子。

И. В. 希金[①]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3, п. 246, д. 42, л. 4－5

① 希金，时任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主任。——编注

№12163

彼得罗夫与孙科会谈纪要：东北军事和政治局势

(1945年11月17日)

机　密

11月17日我拜访了孙科，此次拜访的目的是庆祝孙逸仙诞辰80周年。

在互致礼节性的问候和寒暄之后，孙科谈到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他声明说："当他两天前从南京返回重庆时，接到通报说，东北地区的局势已经严重复杂化了。按照熊式辉的话说，苏联军队早于按计划拟定的期限提前撤离了营口，非政府军队已经进入那里。长春机场也处于非政府军队的控制下。最终，北平—沈阳的铁路线已经不能工作。这样一来，中央政府根本无法向东北地区调动国民军队了。据说，非政府军甚至已经潜入长春。他们切断了电线，封锁了供水管道，以此中断蒋介石行营的水电供应。在这种情况下，熊式辉被迫从东北召回了行营的全体工作人员。"

接着孙科说："熊式辉向我通报说，在他到东北的最初几天里，也就是10月13—25日期间，一切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非常好。但是，自10月26日起，苏军司令部对他的态度逐渐恶化了。原来，一些没有受任何人委托的人企图在东北组建军队，这种情况引起了苏军司令部的不满。熊式辉向我声明说，他与这些人没有任何关系，他对这些人的行为不负责任。"

强调自己对目前的局势已绞尽脑汁，孙科说，他产生了一个想法，是否应该更换那些被派往东北工作的人员，因为熊式辉和他的同僚们没有胜任赋予他们的使命。他补充说，关于这一点他还没有对蒋介石说。

对于我的问题——在孙科看来，是什么导致东北局势的尖锐化，孙科回答说，在他看来，如此尖锐化的局势是国民党与共产党分歧的结果。

孙科问我，美国人在北平、天津、青岛和秦皇岛登陆，这是不是导致局势更加严重化的因素？

我回答说，在我看来，某一国家的人民，应该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独立解决自己国家的内部问题。

孙科说，他完全同意这种看法。随后，他触及关于国民党军队与共产党军队发生军事冲突的问题。孙科说，国共谈判没有获得成果，主要是由于两党之间互不信任。

接着他强调指出，在蒋介石与毛泽东进行谈判期间，国民党与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及解放区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甚至就连接受日本军队投降这样的问题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为取得解除日本人武装的权力而发生的斗争，导致了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武装冲

突。孙科说："国内战争不是摆脱困境的出路。应该停止流血事件。我赞成一切争端问题应该根据民主的原则，通过和平的途径来解决。"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孙科回答说，他希望政治协商会议能够成功地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建立类似国共统一阵线那样的某种组织。

反过来，他关切地问，我是如何评价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景的。

我说，我同意他的关于争端问题应该通过和平途径解决的意见。我补充说，当毛泽东前往重庆参加谈判时，两党还有希望就合作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但是，谈判没有取得这样的结果。我强调指出，目前只好期待政治协商会议会解决一切争端问题，并阻止国内战争。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 M. C. 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 年 11 月 17 日

文件共 3 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86 - 88

№12170

米克拉舍夫斯基与王若飞会谈纪要：中共在东北的行动

(1945 年 11 月 25 日)

机　密

11 月 25 日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他请求我向他通报一下谈判的细节，正如报刊报道的那样，苏联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举行了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

我说，大使和外交部长王世杰关于东北问题没有进行过任何谈判。对此王若飞强调说，显然，他们之间进行过某种谈判，因为马利诺夫斯基元帅 11 月 17 日向在东北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指挥部下达了命令，命令他们从长春、沈阳和哈尔滨撤出自己的部队，并且不能阻碍国民党军队进驻长春和沈阳。

我声明说，对此我一无所知，并强调说，与东北有关的一切问题，按工作程序应该在当

地，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熊式辉将军之间解决，我建议王若飞直接找王世杰弄清楚这些问题。

随后，王若飞又关切地询问——美国军队是否将会进入东北地区，如果是这样的话，苏联将持怎样的立场。

我说，目前就这个问题还很难下结论。根据现有的情报资料，美国人在北平—天津—秦皇岛集结了大批军队，大概是准备尾随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一旦美国军队进入东北地区，那么，如果有必要的话，苏联大概会与中国政府进行对话，因为东北地区是中国的领土。

涉及华北和东北地区的军事状况，王若飞说，国民党军队已经占领了山海关，并向葫芦岛靠近。在该地区的战斗中，国民党投入了 4 个军 6 万多人。目前，共产党的军队集结在绥中地区，准备与国民党军队决一死战。最残酷的战斗正在山东、苏北和河南地区进行着。王世杰曾经在自己亲信的小圈子里说，在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之前，蒋介石打算给共产党的军队几次沉重的打击，以此来摧毁中国共产党的战斗精神。共产党人正在准备给予还击。不仅如此，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他们将进行几次反对国民党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以便遏制蒋介石。

随后，王若飞讲述了 11 月 17 日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地区各民族代表大会的情况。代表大会的结果将于下周公布。代表大会将成立东北地区联合自治委员会，将选举张学良担任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张作相(现在北平)、李度[①](现在重庆，是满洲派的首领)、张学思(张学良的弟弟)和林枫(共产党员)。与此同时，在东北各地区将成立人民政府。阎宝航(青年农民联盟的领导人之一，现在辽北)将被推荐担任辽北省政府主席职务。高崇民和刘澜波将相应地担任安东省政府主席和副主席职务。

接着王强调说，中国共产党有足够的力量阻止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地区(目前，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拥有 4 万人的正规部队和大量的地方队伍)。王若飞问到，在我看来，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是否应该占领长春铁路，或者允许国民党向那里派驻自己的警备队伍。

我说，根据中苏间的协定，长春铁路是商务线路，显然，国民党是不可能利用它来进行军事行动的。同时我强调说，为了不使自己遭到中国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反对，中国共产党最好不要这样做(即占领长春铁路)。

在会谈结束时王若飞说，尽管目前的局势不利于中国共产党，尤其是国民党的军队占领了山海关，但是，共产党人并不害怕。的确，美国人帮助国民党，这种情况使共产党人感到不安。但是，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做好准备，坚决击退国民党和美国人的进攻。

作为结束语，我请王若飞保持谨慎，并指出：最近一段时期，有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不考虑国内现有的局势，试图与苏联大使馆、武官处和其他机构建立直接的联系。我提请注

---

① 原文拼写为 Ли Дучунь，疑俄文原档案笔误。——编注

意：这种做法会引起有关机构的注意，他们一直在紧紧监视着共产党人的行动，我建议王若飞据此做出应有的结论。

出席本次会谈的还有大使馆二等秘书 M. C. 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Л. 米克拉舍夫斯基
1945 年 11 月 25 日

文件共 3 份，送：B. M. 莫洛托夫同志、C. A. 洛佐夫斯基同志、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7，л. 134 - 136

№00594

洛佐夫斯基致斯大林报告：关于蒋经国访苏

（1945 年 12 月 29 日）

无论蒋介石还是蒋经国，在事先与我国大使的历次谈话中均未说明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抱有何种目的。然而，根据间接得到的消息可以断定蒋经国莫斯科之行的主要政治目的。

蒋经国将就东北的政治局势、日本在东北企业的经营、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东北的开发、将整个东北交还中国政府民政和军事机关等问题进行谈判。蒋经国显然还有一项任务：在谈判的开头或末尾就美国在华地位问题安抚苏联政府。据说蒋介石并不愿意向美国提供任何比苏联优先的特权。他只想利用美国对国家实行经济改造。毫无例外，蒋介石向美国人也做了针对苏联的类似声明。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蒋介石既想利用苏联，也想利用美国，尤其想利用两国之间的矛盾，以巩固国民政府，并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范围内改造中国。

我们研究了蒋经国在谈判中可能提出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提出的问题。

（一）

一、关于中国的政治危机。蒋经国将竭力争取我国以武力或施加道义影响迫使共产党军队停止争夺东北和华北。蒋介石并不相信他在接管东北民政权力后能以自身的力量控制它。他同样明白，无论日军还是伪军均无法有效管束东北和华北的居民。因此，蒋经国不仅

会提出延缓撤出我国军队的问题,而且会提出从政治道义上援助蒋介石政府,以此对付来自左面的危险。

二、关于经营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中国人知道,我们从东北运走了大量设备。他们想拖延并中断就此问题的谈判。他们笼统表示原则上同意共同经营一批日本企业。根据种种情况判断,中国人同意共同经营的只是那些设备已被运走的企业,同时附带提出运回设备的问题,作为共同经营前日本企业的条件。中国人会这样提出问题:或者归还运走的设备,或者我们从美国运入设备,但这就意味着美国资本将渗入东北。

三、关于苏联资本和技术力量参与开发东北。中国在与我国军人的谈判中对此已有主张。并且犹如在第一个问题——归还设备问题上一样,如果我国不参与东北的经济开发,不向东北的工业提供技术设备的话,中国人明确暗示美国资本将会对东北进行渗透。蒋介石已由其亲信表示,他不打算让美国资本进入东北,为此他想得到一定的补偿:或者归还被运走的设备,或者从苏联输入新的设备,并得到我国的技术援助。

四、关于内蒙古。中国人对于蒙古人民共和国和内蒙古人民之间业已建立的联系十分不安,蒋经国可能会提出不让蒙古人民共和国对内蒙古施加任何影响。众所周知,该地居民向往蒙古人民共和国。

五、关于新疆形势。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请求苏联对起义者施加影响,使其满足于已做出的让步,因为不可能同意起义者代表力争的广泛自治。据说蒋介石准备妥协,但他无论如何不会把新疆交给穆斯林管理。

六、关于大连港。蒋经国可能会以蒋介石的名义提出中国政府不同意我国对于苏中条约中关于大连的解释。①因为大连是中国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港口,蒋经国将会代表蒋介石暗示,中国只好请求美国帮助建设营口、葫芦岛或其他某个离大连不远的太平洋港口来与大连相抗衡。

也许,中国人还会提出向日本索赔、中国长春铁路的章程和资产以及订立新的贸易条约等问题,但这是次要的,而非主要的问题。

(二)

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应该提出哪些问题呢?我认为应该提出以下问题:

一、中国政府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尽管已在10月20日举行全民公决,中国政府仍拖延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人这样做不仅仅是由于他们想对我国施加压力,使我国尽快撤军,而且主要是由于他们指望利用苏美之间可能的麻烦,以便不执行协定中这一条

① 1945年8月14日关于旅顺、大连的中苏协定根据雅尔塔协定规定,大连港为国际自由港口,但向苏联提供“优先权”。苏联方面凭借这一点,对大连港及其设施实行了全面控制,实际上未让中方以任何方式参与管理和使用。外国船只,尤其是中国船只顺道进入大连港必须经过苏联当局的特别批准。这就如同出租给苏联政府的旅顺海军基地一样,该港口对中国和外国船只是完全关闭的。对此,中国及其他国家政府多次提出抗议,但均未奏效。——原注

款。否则，无法解释中国政府为何拖延这个问题。王世杰对该问题的解释显然站不住脚。因此我们有必要坚决提出这个问题，并力求中国政府尽快宣布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卜道明[①]于12月26日转告米克拉舍夫斯基，中国将尽快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这就是说，中国人已经注意到三国外长会议上达成的协议。[②]

二、中国长春铁路的守卫。我军从东北撤退将使我方人员和整个中长铁路陷入绝境。如果说我国军队驻在东北尚有袭击、抢劫和破坏行为发生，那么我国军队离开后将会如何？铁路将无法运行，我方人员将在那里挨打，车辆将被推翻、被抢劫。不仅土匪和原伪军士兵会这样做，国民党军队为迫使我们离开东北和放弃中长铁路也会这样做。根据条约规定，中国政府应该保证护路。但中国政府自身难保，更不能保护长达2 700公里的铁路。我们应该提出将我国铁路护卫队保留两至三年，直至中国政府根据苏中协定组成他们的护路队予以替代时再撤回。

三、关于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如果说战前中国的主人是英国人，部分地区是日本人，那么现在中国的主人将是美利坚合众国。美国既想渗入华北，亦想渗入东北。对苏联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我们刚刚使我国的边界摆脱了邻国日本的压力，因此我们不能允许东北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

四、关于东北的经济合作。只有在我国积极参与东北经济活动的情况下，方可杜绝外国资本进入东北，因此我国必须：

1. 力争设立一批经营前日本在东北企业的苏中公司。

2. 把设在大连的大型船舶修理厂列入共同经营之后，要在实际上对整个大连港以苏中共同经营的方式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3. 加速设立为全东北服务的苏中航空公司。

4. 制订铁路税率，以便使中长铁路与西伯利亚大铁路紧密联系在一起，等等。

（三）

关于蒋经国。正如蒋介石企图在美苏之间耍手腕一样，蒋经国作为昔日的联共(布)党员，也想在蒋介石和我国之间耍手腕，他会把自己装扮成苏联的无私朋友。蒋介石若不是对自己的儿子有百分之百的信心，那是不会派他前来的。蒋经国为了更好地、更容易地贯彻其父亲拟定的政策，甚至准备批评蒋介石。蒋介石的亲信并不喜欢蒋经国，这不仅因为后者以前是左派，而且因为他是蒋介石政治遗产的觊觎者。事实上蒋经国是一个平凡的人，因此丝毫不能和宋子文那样的生意人和政客相比。结论：蒋经国未必负有同我国签订任何协定的使命。他前往莫斯科只是为了谈谈，并且可能的话，为蒋介石本人的来访

---

① 卜道明，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亚西司司长。——编注

② 指1945年12月16日至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苏联与美、英在中国问题上达成协议，“一致同意：必须在国民政府下建立一个团结而民主的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原注

打下基础。

副外交人民委员
С. 洛佐夫斯基

АПРФ, ф. 3, оп. 86, д. 146, л. 20 - 26

№00595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中苏关系诸问题

（1945 年 12 月 30 日）

1945 年 12 月 30 日 21 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中国大使傅秉常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递交了蒋介石的一封信。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军队是否已进驻沈阳，如果尚未进入，那么是谁妨碍他们进驻？也许，是共产党人？

蒋经国回答，中国军队尚未进入沈阳，但很快就会进入。共产党人对此并无妨碍。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想谈什么。

蒋经国回答，蒋介石请他对苏军进入东北粉碎日本军阀从而加速日本投降以及对苏军在恢复东北行政机关的工作中所给予的援助，向斯大林大元帅表示谢意。

蒋经国说，蒋介石向斯大林大元帅派出自己的私人代表是出于以下考虑：

一、他认为战后苏中关系正在密切起来，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这种关系应该日益加强。如果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得到满足，即在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实现全面的相互了解，苏中关系就能够并一定会得到加强。蒋介石认为，任何误会都只能使问题复杂化，同时，分清是非将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蒋介石认为有一些问题不应通过外交渠道解决，因此蒋介石派他(蒋经国)前来会见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讨论苏中关系的各项问题。

三、蒋介石让他(蒋经国)向自己的私人朋友斯大林大元帅表达他的敬意和信任，并向斯大林大元帅征询他对中国的看法以及他所抱有的任何疑虑。同时请他谈谈，他对蒋介石现阶段所奉行的哪些政策有不同意见。

他(蒋经国)本人则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以下问题：

第一，他想就中国的统一问题进行商谈。在同日本人进行了 20 年的斗争之后，中国面

临的问题是如何防止日本施展阴谋并实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20年来，日本总是处心积虑要消灭中国人民。因此国民党和蒋介石着意解决民族问题。正如斯大林大元帅所知，中国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蒋介石一方面力求集中国之力于抗日战争，另一方面也力求统一中国。现在日本已被击溃，因此可以着手国家的民主化、国家的统一并解决社会秩序问题。一旦中国统一了，所有这些问题均能顺利解决。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取决于同中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调整。蒋介石承认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可以共存，后者无意取消中国共产党。国共两党政治路线之间并无矛盾。应该直截了当地说，如果共产党与国民党并存于世，这将使国民党免于腐败并促使它更快地进步。但为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共存，必须让中国共产党放弃消灭国民党的图谋。

蒋经国说，在国民大会于5月份召开之前，决定在不改变国民政府的结构和法律地位的条件下邀请中国共产党代表参加政府。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中国政府对三国外长会议通过的有关中国的决议持何种态度。

蒋经国说，他尚未看过这些决议。斯大林同志回答说：三国外长一致同意，中国必须在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统一和民主化，广泛吸收民主人士进入国民政府所有机关，停止内战。

蒋经国回答说，正如他所认为的，这与蒋介石的意见一致，因为决议中提到在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下实现民主化。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可以参加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国防委员会。

另一个问题就是共产党军队。中国共产党建议政府允许共产党军队保留16至20个师。这个建议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谈判时提出的。蒋介石同意保留16至20个师的共军并保证其安全。但是，既然谈到中国的统一，军队就应该统一，即统一指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人不应该将自己的武力用于分裂国家。另一个条件就是国家行政的统一，要求共区隶属于中央。蒋经国记得，斯大林大元帅在接见宋子文时谈到，中国的统一要在保持国民党的领导地位，但有广大民主力量参与的情况下实现。①

蒋经国表示，在蒋介石看来，苏联关心中国的稳定和统一，因此他请斯大林大元帅就此发表意见，并说出他可能会有的疑虑。另一方面，蒋介石请斯大林大元帅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与国民党合作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曾有3名代表驻共产党人所在地延安，而美国在那里曾有30—32名代表。②苏联政府已从延安召回了所有的代表，因为他们不同意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苏联政府不明白，重庆谈判为何中断了。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共产党人并不从属于俄国共产党人。共产国际已不复存在。俄国

---

① 指1945年7月中苏条约谈判时斯大林与宋子文的谈话。——编注

② 这里所说的三名驻延安代表是彼得·弗拉基米罗夫(化名孙平)、奥尔洛夫(化名捷列宾)和梅利尼科夫。弗拉基米罗夫1942年5月作为共产国际联络员和塔斯社随军记者来到延安，奥尔洛夫和梅利尼科夫作为医生和联络员于1946年1月飞抵延安。他们于1949年11月奉命回国。美国驻延安代表是指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即迪克西使团。——编注

共产党人很难进行调停,因为他们不想提出最终会被拒绝的建议。况且中国共产党人并未请求提供建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将迫使中国共产党人遵从他的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并不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情况如何。他们目前并未请求提供任何建议。以前,苏军刚刚进入东北并且苏联政府尚有3名代表驻延安时,中国共产党人曾经通过这些代表请求向他们提出建议,于是他们得到了答复:俄共中央①认为,中共代表应该去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人没有料到会提出这一建议,于是在共产党人中引起大乱。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中国共产党是带着何种计划赴重庆的,只知道谈判已遭到失败。

斯大林同志说,当共产党人想转移到东北时,苏军司令部并未放行,因为苏联政府并不想干涉中国的内政。一般说来,外国军队干涉中国事务于蒋介石不利,因为这将导致中央政府权威的削弱。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失败的原因并不清楚。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去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想要什么,是中国的苏维埃化还是两个政府并存。

斯大林同志说,他并未料到,中国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人会有麻烦,共产党人会阻止中国军队调动。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的观点已在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中以及在同中国的条约中阐明了。苏联政府在这两份文件中声明,它承认蒋介石政府是中国的合法政府。如果中国国民政府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这对于政府是有好处的。然而,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苏联政府在这方面能做什么呢?他们认为不能有两个政府、两支军队,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不同意这一点。

蒋经国说,蒋介石认为,倘若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在旁人看来,这个问题有损于苏中两国之间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明白这一点,因为许多人都说,苏联政府劝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同蒋介石达成协议。

蒋经国指出,斯大林大元帅的威望能对中国共产党人产生影响。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中条约业已公布,但是,看来中国共产党人并不重视这一文件。三国外长会议公报也已公布,今后事态将会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是否赞同。看来是不会的。

蒋经国问,如何更好地解决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应该再次会面。

蒋经国答复说,周恩来一行30人已经抵达重庆。

斯大林同志问蒋经国,是否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到重庆是为了谈判?

---

① 原文如此,正式名称应为联共(布)中央,下同。——编注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并说需要解决问题，目前的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在内蒙古，中国军队[①]与中央政府军之间确实发生了战斗，中国共产党人还宣传这样一种观点：既然宣布了外蒙古独立，他们将力争使内蒙古独立。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很愚蠢，并说，苏联政府不能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行为负责。

蒋经国说，不妨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建议。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是否想得到建议。如果他们征求建议——对此还无从知道，那么，会给他们提出建议。曾有一次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并去了重庆，但未达成协议，从那时起再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他对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②]的数量的建议持何种想法。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知道中国共产党人拥有多少师及什么样的师。苏联政府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消息，有时是截获无线电通讯，他(斯大林同志)并不知道，所有这些报道是否可信。他并不知道这些师的数量。

至于国民党，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蒋介石是正确的。在一个国家内不能有两个政府和两支军队，在这一点上他是正确的。如果蒋介石有意让共产党人管理几个省份，在他(斯大林同志)看来，这是可行的，当然，这是蒋介石的事。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并未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建议，苏联政府对他们的行为不满意。中国共产党人未征求过建议。

蒋经国问，倘若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苏联政府将如何对待。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政府将按照他(斯大林同志)对蒋经国所述精神向他们提供建议。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为中国的统一需要做些什么。

斯大林同志答道，需要同共产党人谈判并问清他们的要求。斯大林同志问，为何重庆谈判遭到失败，为何共产党军队和中国国民政府的军队之间发生了战斗？

蒋经国答称，他对此并不知情。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对此更不知情。

蒋经国答复说，在重庆谈判中共产党人要求将位于黄河以北所有省份，即热河、绥远、河北以及承德划归他们领导。蒋介石认为，这等于把国家一分为二。这是谈判中的主要分歧。至于共军同国军之间发生的战斗，则有种种原因。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划分成两部分当然不妥。

蒋经国请斯大林同志考虑一下他阐述的内容。

斯大林同志答道，倘若中国共产党人不向苏联政府征求建议，他们是不会提出建议的。苏联政府不想陷入其建议被拒绝的尴尬境地。

蒋经国说，需要同中国共产党人达成协议。

---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中国共产党军队。——编注

斯大林同志说,双方互相做出让步,才能达成协议。中国共产党人知道,苏联政府坚持与他们不同的观点。中国共产党人清楚,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在中国共产党人征求建议时,提供了意见。他们去了重庆,但没有谈成。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是谁的错。他(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再也不会来征求建议了。他们知道苏联政府不同意他们的做法。

蒋经国说,由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很快便会召开了。

斯大林同志说,也许,共产党人前往重庆正是为了参加这个会议。

蒋经国回答道,当然,谈判主要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进行。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倘若中国共产党人正式向俄共中央委员会提出要求,是会向他们提出建议的,但中央委员会自己则不愿将其建议强加于中国共产党人。

蒋经国答道,正如他所认为的,大家都关心这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抱有某种秘而不宣的想法。他(斯大林同志)认为,共产党人赴重庆是为了证明不可能同蒋介石达成协议,此外,看来毛泽东并不相信蒋介石,而后者也不相信毛泽东。

蒋经国说,蒋介石和毛泽东进行了十分友好的交谈。

斯大林同志说,是这样,但同时双方军队之间却发生了战斗。看来,中国人的习气就是这样。苏联政府对此难以理解。

蒋经国说,他想同斯大林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苏中关系的问题。有些人认为,正在进行反对中国国民政府斗争的中国共产党人背后有一个苏联。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们的想法不对。

蒋经国表示,苏中关系史开始于"十月革命",苏中之间的关系在1923—1924年最好。当然,现在的情况与1923—1924年相比已经发生了变化,因此很难采用原有的方式,但蒋介石认为,恢复1923—1924年间存在过的苏中关系符合双方的利益。

斯大林同志指出,那时并没有条约。

蒋经国说,这是发生在孙中山还在世的时候,这是在北伐前夕,当时建立了黄埔军校。蒋介石认为,虽然现在时代变了,仍应该恢复那时苏中关系的精神。形式会不一样,但蒋介石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一点。现在中国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可以建立密切的联系。与1923—1924年情况不一样,当时锋芒针对英国,部分是针对日本。现在苏联与英、美已经结成同盟,其实与英、美结盟的还有中国,因为中国曾与英、美一起对日作战。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中国政府要苏联反对英国?

蒋经国笑着说,当然,这根本谈不上,但中国政府想恢复1923—1924年的苏中关系。中国政府力求使这种相互关系变得比现在更亲近。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这个问题得到解决,那么事情就好办了。苏联政府愿意建立最亲密

的关系，建立这种关系的基础就是中苏同盟条约。

蒋经国说，1923 年中国在其政策中遵循三项基本原则：(1) 联合苏联；(2) 联合工农；(3)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融合。现在第一项和第二项原则仍然有效，但第三项原则已失去意义，它已被吸收共产党人参加管理的原则所取代。

蒋经国说，要是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就好了，并问，在斯大林同志看来，是什么事妨碍达成协议。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也许是领袖彼此不信任妨碍了吧。也许，朱德或毛泽东认为蒋介石在欺骗他们。领袖之间谈判时缺乏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如何重新建立这种信任。

斯大林同志提出，美国人不一定就信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不一定就信任美国人。但当俄国人同美国人彼此达成协议时，双方之中每一方都相信，对方会履行这一协议。谈判时需要的就是这种信任。他(斯大林同志)不相信，如果签订了协议，还会撕毁它。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同国民政府之间的分歧已经厌倦了。

斯大林同志表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分歧的激化都得由中国人民承担后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苏联政府是否同意与中国建立最密切的关系。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同意这样做。

蒋经国说，蒋介石要他向斯大林大元帅转达一项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参与旨在反对苏联的活动。蒋介石表示，只要他掌权，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

对此，斯大林同志请向蒋介石转达谢意，并表示只要苏联政府没有任何后顾之忧，他们对中国将同样行事。美、英情报机关散布消息说，以苏联为一方，以英、美为另一方，很快就会发生战争，这是制造假情报。美国人和英国人不会将其军队投入新的战争，因为没有目标。日本被打败了，战争使人民厌烦了。英、美任何一届试图动用其军队的政府必然要垮台。出于同样的原因，苏联政府也不能将军队投入战争。也许，美、英两国情报机关散布假情报是为了吓唬苏联和中国。但他(斯大林同志)仍感谢蒋介石作此表示。他(斯大林同志)过去任何时候和现在都相信中国不会反对苏联。同样，他(斯大林同志)也可以向蒋介石保证，苏联不会反对中国。过去苏联不止一次地说应这样做，而且苏联将坚决地继续与中国一道前进。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所说的不是现在，而是长远的未来。

斯大林同志说，那就更好了，因为经过 20 年、30 年或 40 年，当然就不知会出现什么情况了。

蒋经国表示，下一个问题就是教育中国人民。蒋介石拟定了一个教育国民党党员和青年学生与苏联亲善的庞大而广泛的计划。蒋介石希望中国人与苏联友好相处。应该说明，目前中国人的情绪并非都对苏联友好。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要他转告，在今后的国际事务中，中国将事先与苏联商量，并与苏联达成协议，以便提出一致的主张。

斯大林同志说,至今中国代表总是反对苏联人。例如,在旧金山和伦敦就是如此。在旧金山关于谁主持会议的问题有很大争议,美国人决定应当由美国代表主持会议。苏联代表团提议由四大国代表轮流主持。在讨论该建议时,中国代表反对苏联代表团。

蒋经国答道,今后中国人将保持与苏联主张一致。当时蒋介石要竭力摆脱伦敦会议的困境。①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久前才得知此事,看来,还未对蒋介石的建议做出答复。

莫洛托夫同志说,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在等待结果。

斯大林同志回答说,虽然如此,最好还是给予答复。的确,当时情况不明。苏联政府不知道事情将如何了结。美国人和英国人为一方,苏联政府为一方,都坚持各自的立场。在莫斯科他们才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

蒋经国说,下一个问题涉及东北。蒋介石十分感激苏军司令部在恢复东北政权机构中提供的帮助。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同一位中国代表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东北曾经是进攻苏联的基地,并强调东北今后不应再成为这种基地了。因此,蒋介石委托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大元帅保证,东北永远不会成为反对苏联的基地。中国军队开往东北只是为了维持当地的秩序。中国政府不准备在中苏边界驻军。

蒋介石在与彼得罗夫的一次谈话中说过,他准备在苏联与东北边界建立美国与加拿大边界那样的制度。至于东北的政治举措,蒋介石说,东北十分邻近苏联,那里的一切都需要重建,在那里开始实行民主化比较容易。

关于东北经济,蒋介石提出坚持门户开放政策,但依然保持苏联在经济方面的主导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东北的主人、东北主权的所有者应该是中国。苏联在东北不谋求优势地位。

蒋经国答复说,中国政府愿意向苏联提供这种地位。

斯大林同志对此表示感谢。

蒋经国说,东北有苏联想要得到的产品,另一方面,东北需要苏联的经济援助。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将从东北购买自己必需的产品,并给东北以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再谈谈苏中合股公司。苏军司令部认为,东北所有的企业都是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表示,只有为日本关东军服务的企业才算战利品。按照战争的法则,这样的企业是战利品,因此,苏联政府并不是希望得到所有的企业。

---

① 指1945年9月11日至10月2日在伦敦举行的苏、美、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的一次例会。外长会议是1945年根据波茨坦会议“就和约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的决议建立的机构。会上,在苏联代表团同其余与会者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引起分歧的问题之一是有关中国是否应参加对德和约并参与拟定对曾与德国结盟的其他欧洲国家的和约问题。中国坚持参加这些活动,美、英、法支持中国,苏联反对,理由是中国并未参加对德作战。苏联政府担心在解决战后欧洲和约问题时中国与西方列强主张一致,从而使苏联处于更为孤立的境地。——原注

蒋经国说，为避免向苏联移交作为战利品的企业而在居民中可能产生的不良印象，蒋介石建议换一方式解释这些企业的移交。蒋介石建议说，考虑到苏军消灭了日本关东军并为此遭受了损失，为重视中苏友好关系，中国政府将把全部企业的一半移交给苏联。

莫洛托夫同志说，看来蒋介石不想将这些企业作为战利品移交给苏联。蒋经国对此表示肯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在波兰就是这样做的，波兰同中国一样都是盟国。苏联政府在波兰并未触动波兰企业，但那里有德国人组建的企业。当德国的西部遭到轰炸时，德国人认为，他们的企业在波兰将是安全的，红军离波兰尚远。苏联政府宣布这些德国企业为战利品，但是他们并未从工厂将所有设备运走，而是将这些设备的大约一半留给了波兰人。战争的法则就是如此，一些国家不利用战争法则，另一些国家则利用战争法则。

斯大林同志答应考虑蒋介石的建议，并将做得使中国丝毫不会感到屈辱。

蒋经国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向中国代表提交了应由苏中合股公司管理的140家企业的清单。蒋经国说，斯大林大元帅知道，中国没有重工业，因此蒋介石希望这些企业的若干部分留归中国掌握。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可以研究，并说他不熟悉该问题。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不想只建立一个苏中公司，最好建立分属某些工业部门，例如机器制造业、冶金业等部门的若干苏中公司。当时日本人只有一个开发东北资源和经营东北企业的公司，蒋介石建议的目的在于竭力避免给人留下仿效日本体制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答道，这可以做到。

蒋经国表示，蒋介石同意组建几个苏中合股公司，但希望合同在苏军撤出以后再签订。同时蒋介石同意留下目前正在那些企业工作的苏联人员。

斯大林同志说，谈判现在可以继续进行，协定可以晚些签订，不过越快越好，因为资产可能会不断遭到盗窃。

斯大林同志说，苏军司令部接收了某些设备，但没收这些设备并不妨碍工厂恢复生产。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政府是否还要请求苏联政府延期撤军？

蒋经国回答道，延迟到2月1日撤出苏军，是中国政府的最后一次请求。

蒋经国说，还有一个问题，即关于赎回纸币的问题。①

莫洛托夫说，关于此事的协定业已签署。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谈谈新疆。中国政府从苏联大使那里得到消息，叛乱者代表请苏联驻伊宁领事在解决冲突问题上进行调停。叛乱者代表已经去过乌鲁木齐。中国政府极其关心尽快解决新疆问题，因为一旦停止同苏联的贸易，中国北方将在经济上处于困难境地。叛乱者提出11项条件，政府基本上已经认可。业已达成协议。新的新疆政府将由25名成员

---

① 指苏联军队驻东北期间苏军司令部在当地发行的一种专用纸币，根据中苏条约，中国政府有责任向居民赎回这些纸币。——原注

组成,其中15名成员由新疆居民选举产生,10名成员通过任命。但现在叛乱者代表又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央政府军在一个月内撤离新疆。当然,中央政府要从新疆撤出军队,但中央政府不想在条约中指明,军队将在一个月内撤出,因为这有损于中央政府的威望。

莫洛托夫问,叛乱者代表要求撤走哪些军队?

蒋经国回答道,他们要求撤出那些派到新疆来镇压叛乱的军队。

斯大林同志问,蒋介石是否希望让苏联政府出面调停?

蒋经国答复说,蒋介石愿意让苏联政府充当调停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苏联政府将尽力而为。叛乱者不会拒绝苏联政府的调停。斯大林同志允诺在得到苏联领事的报告后给予最后的答复。

蒋经国说,现在他要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问题。蒋介石委托他向斯大林大元帅坦率表示,中国对中、苏、美之间的合作感兴趣,因为三国结盟不仅对远东,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凡到过中国并同蒋介石谈过话的美国代表中,没有任何一位对苏联有过不友好的评论,尤其是马歇尔将军。马歇尔将军说过,他完全信任斯大林大元帅。发表种种评论的不过是那些竭力为自己捞取资本的人。蒋介石表示,他希望苏、中、美三国结成同盟。

斯大林同志表示,蒋介石是对的。

蒋经国说,但是,由于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原因,中国与苏联较为亲近。中国直截了当地表示,中国期待着美国的经济援助,但在政策上将坚持自主权。

斯大林同志说,这是正确的。

蒋经国表示,中国不会相信挑拨离间的人。

蒋经国说,现在他想就驻华北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说几句话,美军在华北的存在是由早在日本投降前签订的协议规定的。计划预定登陆的美军有7个师。被日军逼到南方的中国中央政府军在日本投降后尚未来到华北,为了解除日军武装,才让美军登陆的。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日军还未被解除武装?斯大林同志说,在长春25名苏联军人就解除了日军两个军的武装。斯大林同志说,日本人不会抵抗。东北全部日军在10天内就被苏军解除了武装。应该更大胆地行动。解除日军武装很容易。

蒋经国表示,美军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就会撤出。

斯大林同志表示,苏联政府不愿让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盘。看来,美国人也并未打算去那里。无论美军、英军或其他外国军队,都不应当允许他们进入东北。

蒋经国答复说,美军不会进入东北,并再次重申,他们一旦完成自己的任务将全部撤离中国。

斯大林同志表示,外国军队出现在中国将损害蒋介石的威望,反之,如果中国没有外国军队,蒋介石的威望会更高。

蒋经国表示,美国政府声明,他们将帮助中国建立武装力量。但他(蒋经国)应该声明,这仅仅是宣传而已。

斯大林同志指出,美国人已在中国南方帮助中国人组建了几个师,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蒋经国说,关于如何更好地对付日本人,蒋介石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现在要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人不愿意这样做，各国都反对苏联政府坚持设立该委员会的建议。

莫洛托夫指出，王世杰在伦敦对这项建议表示同情，但希望不要在伦敦讨论这个建议。

斯大林同志说，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将在东京设立盟国对日管制委员会。蒋介石提出的问题将在委员会上解决。至于苏联政府，则主张不仅要解除日本武装，而且要销毁在日本生产军舰和武器的工业部门。这就是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与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不俘虏日军，苏联政府则俘虏了日军。他(斯大林同志)曾对美国人说过，麦克阿瑟至少应该下令逮捕 8 000 至 10 000 或 12 000 名将级军官和陆海空军将领。现在美国人正在逐一审讯他们。

美国人的考虑与苏联政府不同。美国人现在对待日本就如上次世界大战后对待德国，当时德国保留了军官团和将级军官，他(斯大林同志)多次对美国人说过，要他们俘虏日军，但美国人答称，他们没有地方关押俘虏。无论如何，苏联政府坚持不给日本人留下将级军官。苏联政府的政策就是如此。

蒋经国表示，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日本人。

斯大林同志说，中国人民是好样的，但领导人也应该是好样的。

蒋经国说，他记得斯大林大元帅说过，日本人可能东山再起。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这是可能的，日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而且充满复仇心理。日本希望东山再起。为了防止此事发生，应该俘虏 50—60 万军官以及大约 12 000 名日本将级军官。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没有经历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他们不完全明白。中国经受过日本的占领，苏联则经受过德国的占领，同时还经受过日本的占领。因此中国和苏联明白，必须把敌人置于不能再打仗的境地。美国人则不明白这一点。他(斯大林同志)希望他们将来会明白这一点。

蒋经国问，目前日本的警察情况如何?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日本，有日本警察。

蒋经国说，日本人有可能把警察变成军队。

斯大林同志表示，日本人当然要竭力在警察中安排军官骨干，不过，一旦苏联代表抵达东京，他们将努力制止这种状况。

蒋经国表示，他的全部问题已经解决。在会谈结束时，他(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转达宋子文的问候。

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问，中国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问题是否已经解决?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关于承认外蒙古独立的决定将在 1 月初中国政府迁往南京后公布。

会谈持续了 1 小时 40 分钟。

B. 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ф. 45，оп. 1，д. 322，л. 98 - 121

№12194

彼得罗夫与蒋介石会谈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5 年 12 月 31 日)

1945 年 12 月 31 日。蒋介石及夫人为欢迎马歇尔举行了午宴,同时邀请了我及其他苏联客人(米克拉舍夫斯基、罗申、费德林)出席。午宴结束之后,他请我们留在他的官邸里。一杯茶过后,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会谈：

谈到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结果,蒋介石对会议的工作做了肯定性的评价……①

对于我的通报,即蒋经国于 1945 年 12 月 30 日受到了 И. В. 斯大林的接见,出席会晤的还有莫洛托夫和傅秉常,蒋介石对此表示非常满意,同时他还表明自己对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谢意,感谢他在确保中国军队接受东北地区的行动中给予的帮助。

随后,根据他自己的倡议,蒋介石希望谈谈中国国内的局势问题。他指出,目前,中国国民政府已经采取了措施,以便争取停止国内的武装斗争,恢复交通线路和确保接受日本军队投降工作的顺利结束。

谈到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蒋介石指出,根据全部情况判断,中国共产党人已经制订了自己的军事和政治计划,其出发点是：国民党仿佛极力追求以武力摧毁共产党的军队。蒋介石强调指出:"实际上,我们绝不追求消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中国与许多国家有区别的就是,在中国各政党和派别的武装力量可以和平共处。我们允许东北军、西北军存在——它们的革命品质是非常优秀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这种论断的最有力的证据。"

接着,蒋介石声明说,各种军队共同存在成为可能,只有在一个条件下,即"一切武装力量,不管其属性和派别如何,都应该严格地、准确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自然,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可能取得国内军事上的团结统一"。

谈到目前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的谈判,蒋介石指出,国民党已经向共产党提交了自己的关于停止国内军事行动的草案。该草案规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由这个三人小组来确定停战的条件。参加三人小组的应该是：一名国民党的代表、一名共产党的代表和马歇尔将军——作为第三方,即调解方。

关于马歇尔将军的使命蒋介石从纯军事角度做了解释：据说,马歇尔拒绝参与中国国内的政治问题,但同时又宣称,自己已经做好准备,在交战双方停战方面帮助中国。

蒋介石问我是如何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前景的。

我说,苏联人民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已经充分地反映在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决定中,同时我还强调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民主的中国,不仅有利于中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各国

---

① 此处的省略号是原文就有的。——编注

人民的团结。

在会谈结束时，蒋介石试图证明，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严格地执行最高统帅部的命令的话，那么，这将为它开辟一条参加最高军事和行政机关的道路。对此，蒋介石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他强调说，这指的是中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最高国防委员会——也就是说该委员会有可能改组为“高级政治机关”，以及参加行政院。但是，蒋介石不能不承认，对于他们参加上述机关的比例问题“还没有具体的说法”。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1945 年 12 月 31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п. 248，д. Ки－032，л. 1－3

1946 年

№16062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王若飞会谈纪要：停止内战问题

（1946 年 1 月 1 日）

机 密

1946 年 1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军队总参谋部首长叶剑英同志和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代表王若飞同志拜访了我大使馆。大使委托我接待了他们，对此，我解释说大使因病不能接待他们，并与他们进行了时间不长的会谈。

他们声称，他们刚刚收到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有关停止内战建议的答复。在这个答复中，蒋介石建议双方讨论有关停止内战问题，并让美国总统杜鲁门本人的代表马歇尔将军一起参加（同时，他们转交了一封蒋介石的书面答复）。有鉴于此，中共代表团面临一个问题，即应不应该同意参加与马歇尔的谈判，因为这意味着美国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由此共产党人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马歇尔将努力对中共代表团施加压力，以迫使他们向蒋介石让步。这个问题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中讨论了很久，但代表团什么决定都没有做出。在迅速向延安请求指示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代表决定同时与苏联大使商量。

叶同志和王同志声称，想从大使馆得到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判断马歇尔与周恩来最近一次会谈，马歇尔和蒋介石企图在谈判过程中涉及东北问题。中共代表团认为，正因为这个问题与苏联利益有关，因此讨论这个问题时应有苏方代表参加。

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阐述了这两个问题后，再三请求将这件事报告大使，并请给他们极其需要的忠告，因为与中央政府代表的会见就要在第二天举行。

我向大使报告此事后，根据指示向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传达说，重庆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应该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去征求意见，听取指示。看来，他们一定会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民主团结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中涉及的所有问题。我告诉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们，苏联大使馆不可能给他们任何的建议。有关东北的问题，我对叶剑英和王若飞同志声称，谈论这个问题目前还太早，正因为中央政府也好，马歇尔也好，尚未正式提出这个问题。

会谈进行了 30 分钟。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A. 列多夫斯基（签名）

1946 年 1 月 1 日

文件送：C. A. 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 年 1 月 23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2，л. 20 - 21

№16063

彼得罗夫与章伯钧等人谈话纪要：国共关系问题

（1946 年 1 月 2 日）

机　密

1946 年 1 月 2 日在大使馆进午餐时，我同（第三党领袖）章伯钧、（《大公报》记者）高集（Гао Цзи）和（《时事新报》记者）邵家林（Шао Цзялин）进行了如下谈话：

1. 对我提出有关民主联盟是否已完成对政治协商会议准备工作的问题，章伯钧答道，民主联盟已挑选出一个 9 人代表团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工作，并拟订了行动纲领。代表们每天都会晤，以便对政治协商会议上准备提出讨论的所有问题能协调好立场。要求国家民主、团结，建立联合政府，把军队移交给国家，改选国家议院代表，重新研究宪法草案等，是我们纲领的重要因素。

2. 我对新闻界关于政府建议成立三人委员会[①]来研究停止内战问题的评价感兴趣。高集说，国民党和共产党自己完全可以毫无困难地达成停止内战的协议，为什么还要外国来干涉中国内政。把马歇尔引进委员会是撕毁莫斯科会议关于中国的决议。

对这个问题，邵家林回答说，马歇尔在委员会可以促进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争议问题的解决。因为处在国民党的压迫下，中国人不可能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外国朋友就应该来帮助。

邵家林请求我能更经常地接待新闻记者。他说，关于苏联我们知道的很少，因此，我们不能够对各种各样的谣言和诽谤进行反驳。例如，不久之前，散布着关于红军在东北的最难以置信的谣言。假如您或者您助手中的任何一位，能够对记者进行新闻发布，打破这些谣言，那该多好啊。

我说，我将永远高兴在我们这里接待新闻记者，并和他们交谈他们所感兴趣的问题。

---

① 指由国民党代表、共产党代表各一人和马歇尔组成的委员会。——编注

在谈话时有二等秘书贾丕才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C. A. 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2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8, п. 38, д. 596, л. 22

№12197

斯大林与蒋经国会谈记录:东北经济合作等问题

(1946年1月3日)

И. В. 同志与蒋介石之子蒋经国的会谈记录

1946年1月3日23时

莫洛托夫、帕夫洛夫(外交人民委员部)、傅秉常(中国大使)在场。

蒋经国向斯大林同志和莫洛托夫同志祝贺新年,并祝愿他们在新的一年里取得新的胜利。

斯大林同志表示感谢。

莫洛托夫同志表示感谢并向蒋经国祝贺新年。

斯大林同志说,他与苏联军人进行了电话交谈,他们不同意不把服务于关东军的日本企业宣布为战利品。如果这些资产不被视为红军的战利品,苏联军人会感到屈辱。他们希望像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及其他被红军解放的欧洲国家处理德国资产一样地处理这些资产。这样做,中国方面毫无损失。作为战利品的企业将在平等的基础上由中苏双方联合经营,并且为了经营这些企业,可以按照不同的工业部门设立几个公司。

蒋经国说,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议正是这样,不过只是方式有所不同。

斯大林同志表示,中国方面提出的方式使苏联军人感到受屈。他们说,他们流了血,因此,应该把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企业视为红军的战利品。

斯大林同志说,应该就地具体确定,哪些企业是日本人为了替关东军服务而设立和经营的。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考虑为中国拨出某些重工业企业。马利诺夫斯基元帅说过,

这个问题应由专家研究。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当然专家们可以就地解决这个问题。

蒋经国表示，他的莫斯科之行的任务在于力求使斯大林大元帅和蒋介石之间取得完全谅解，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坦诚而友好地阐述自己对中国国民政府最近实行的政策和措施的意见。蒋介石希望斯大林大元帅谈谈自己有哪些疑虑和不赞同的地方。斯大林大元帅的意见对于蒋介石所领导的政府制定政策将十分有益。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本人不熟悉中国的基本国情，并不了解中国发生的事情。苏联政府不明白，为什么迟迟不解除日军武装，为什么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不能达成协议。毛泽东是个与众不同的人，而且是个与众不同的共产党人。他在农村到处活动，避开城市，对城市不感兴趣，他(斯大林同志)对此不理解。他(斯大林同志)不理解，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为什么不能达成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能对任何人表示不满，因为他不知道这是谁的过错。他(斯大林同志)不掌握实情，因此，他只是有些疑问。既然他(斯大林同志)缺少事实根据，他能提出什么建议呢?

说到苏联政府的对日政策，斯大林同志说，他已经说过，需要设法使日本不能作战，需要俘虏日本军事骨干并销毁军事工业以及有可能开工满足军需的工业。

至于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则是友好和支持中国国民政府的政策。这在发表的公报中已经公开表明了。

他(斯大林同志)认为，蒋介石打算奉行的中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苏联不能给中国以大量经济援助。蒋介石可以期待美援，因此他奉行对美友好的政策是正确的。

他(斯大林同志)坦率地说出他知道的事，并询问他不知道的事，即有关解除日军武装和蒋介石、毛泽东之间的协议。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为何拖延解除日军武装。苏军司令部迅速解除了日军武装，因此，只要愿意可以迅速解除他们的武装。

蒋经国答道，起初中国政府没有掌握解除日军武装的足够兵力。

斯大林同志指出，解除日军武装几乎不需要任何兵力。

蒋经国表示，现在中国政府有了兵力，并将消灭日本人。苏中条约是针对日本的，因此斯大林大元帅可以放心，中国在其对日政策中将以防止日本东山再起为出发点。至于解除在华日军武装，这一任务由于地理上的原因，以及中国军队过去曾被日军挤到南方地区这一情况而难以完成。

斯大林同志问，美国人为何不解除日军的武装，日本人并不会反抗，因为日军已经宣布投降了。

蒋经国说，在他看来，中共与政府之间的协定未能签订是由于双方领导人互不信任。

斯大林同志表示，有些让步是必要的，但究竟是哪些，这应由双方自己决定。

蒋经国说，他从广播中听到了国民政府向中共所做的建议。

莫洛托夫同志叙述了报刊上关于国民政府建议和中国共产党人建议的报道。莫洛托夫同志指出，对这些建议还不完全清楚，但是根据国民政府的建议可以看出，在中国共产党人

和国民政府之间签订协议应当依照的程序制定出来之前,中国政府不同意停止对共产党人的军事行动。

蒋经国说,中国人民对达成协议十分关切,因为内战是可怕的事。

斯大林同志表示,在苏联,人们都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

莫洛托夫同志说,美国魏德迈将军声明:美军司令部打算增加美军 4 000 人,以保障中国军队向东北调动,并维持沿途秩序。

蒋经国说,魏德迈这个声明是早在杜鲁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之前,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之前发表的。

蒋经国说,目前的主要困难在于北平与南京之间铁路不通,因为铁路已被共产党的部队切断,甚至在北平与天津之间 100 公里的路段,火车也要走一两天。需要尽快达成协议,才能恢复铁路交通。

斯大林同志说,共产党人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协定将改善中国人民的处境并将促进贸易的发展。

蒋经国同意这一点,并说,中国人已经打了许多年仗,因而饱受战争之苦。

莫洛托夫同志指出,中国人民对战争已经厌倦了。

蒋经国说,中国尤其饱受贫穷之苦,他(蒋经国)认为,在这次战争中苏联和中国遭到的苦难比其他所有国家都多。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可以向他说出自己对蒋介石的政策的疑虑。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他不了解实情,他很难说出什么。他(斯大林同志)没有疑虑。他有过一些问题,已告诉蒋经国了。

蒋经国说,在中国所有人都持必须使中国民主化的立场。

斯大林同志答复说,这样很好。

蒋经国说,关于中国民主形式的意见尚未形成,因此他(蒋经国)想知道,斯大林大元帅对中国民主的形式有何想法。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现在是不是共和国,中国有没有帝制派。

蒋经国回答,中国是一个共和国,目前中国没有帝制派。

斯大林同志说,共和国比较接近于民主。

在苏联没有敌对的阶级,因此苏联可以存在一党制。在中国,除国民党和共产党外,其他政党亦应存在。中国有这样的政党吗?

蒋经国回答,其他政党很少。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将选举原则引进中国。政府应该对国会和总统负责。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哪种议会制度适用于中国:一院制还是两院制。

斯大林同志问,中国是否还保留各省的政府。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答复。

斯大林同志说,他不知道,中国存在哪些派别,是赞成一院制还是赞成两院制,但应将法

国、波兰、南斯拉夫、英国和美国那样的选举方式引进中国。议会应当由选举产生，而政府应该由议会任命并经总统批准。在美国，总统同时也是总理。在法国则是另一种情形。法国由下院和上院选举总统，虽然总统也能参加政府会议，担任主席，但他不是总理。不过，法国和美国的制度都符合民主原则。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可以接受南斯拉夫和波兰现有的方式。

斯大林同志说，南斯拉夫和波兰像法国一样实行两院制。苏联同样有两院，两院享有平等权力。例如，联盟院可以推翻民族院通过的决议，反之亦然。在英国则有不同，英国有下院和上院，但贵族院拥有比众议院更大的权力。在美国有参议院和众议院，其中参议院有更大的权力。他(斯大林同志)不知道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

斯大林同志问，院是怎么回事?

蒋经国答，院类似于议院。

斯大林同志说，议院的名称可以根据民族特征酌定，但议院应该是由选举产生的机关。

蒋经国问，如果两院出现分歧，在苏联是怎样通过决议的?

莫洛托夫同志答，在这种情况下便召集两院联席会议，决议由多数票通过。

蒋经国问，在斯大林看来，在未来的中国政府中，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应成什么样的比例?

斯大林同志答，在欧洲，一个政党拥有的部长职位取决于它在议会席位的数目。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由获得多数票的政党党员组成。例如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工党获得多数，于是他们组成了只有工党党员参加的政府。但英国人和美国人要求在其他国家，例如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波兰的政府中要有反对党代表。当他(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和美国人，他们为什么不允许反对党代表进入自己的政府时，他们耸耸肩膀。

在法国又是另一回事，法国现行的政府组织法比较接近民主制，因为获得少数票的政党代表同样参加政府。倘若不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转向非法斗争；倘若允许他们参加政府，反对党就会遵守法律。在这种情况下，允许反对党代表参加政府有好处。

斯大林同志还举了匈牙利的例子。匈牙利小农党得票超过半数，但该党让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及自由党代表进入政府，不过为自己保留了多数部长的职位。

蒋经国答复说，他认为中国自己不应该采用英国现行的民主方式。他(蒋经国)认为，在现阶段，所有民主党派的代表均应参加中国政府。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目前如何估量国共两党的力量对比。

斯大林同志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丘吉尔和艾登曾认为，保守党将获得多数。艾德礼[①]说他对多数并不抱希望。他(斯大林同志)自己认为，保守党在选举

① 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1883—1967)，1935—1955年为英国工党领袖，1945年7月至1951年10月曾出任首相，组织工党政府。——编注

中将得到多数,但胜利者却是工党。中国没有选举,因此难以弄清人民在想什么。想必国民党应得到多数,但是什么样的多数,他(斯大林同志)很难说。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国民党和共产党能够共处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共处。

斯大林同志答,若有自由选举,共产党会存在下去,国民党也会。例如,苏联在和美英资本家和睦相处,未同他们打仗。国民党同共产党尤其应该和睦相处。当然,两党之间会有竞争,但国共两党将存在下去。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对国民党有何意见。许多人不满意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苏联政府也不满意国民党。在东北还散发有国民党署名的传单。这些传单中有号召杀死俄国人的内容。当然,这会引起苏联政府的不满。

蒋经国说,这可能是日本在东北的挑拨。

斯大林同志答道,在逮捕散发这些传单的中国人时,他们表示,他们是加入国民党的军人。国民党有两副面孔,一副是合法的,另一副是非法的。在东北从事非法活动的国民党人在长春、沈阳、大连散发的传单中号召居民将苏军从东北赶出去。国民党的这些行动引起了苏联政府的不满。苏联政府在自己的国家内不允许有反对蒋介石的表示,因为苏联政府同他签订了条约,因此政策方针应该只有一个。也许,国民党内存在不同派别。

蒋经国答复说,国民党内确实存在各种派别。国民党内既有资本家的代表,也有地主的代表。然而,说到东北的国民党组织,他(蒋经国)清楚记得,蒋介石已下令给国民党在东北的组织,解散从事反苏宣传的国民党组织,甚至逮捕这些组织的成员。

蒋经国说,应当注意到,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斯大林同志说,这一点他知道。也许,东北还有自称国民党员的冒名者在活动。但是国民党未正式同散发反苏传单的组织及其活动划清界限。

蒋经国答道,东北的许多国民党组织已经被解散了,并再次重申,东北的情况十分复杂。

蒋经国问,对国民党,斯大林同志还有什么话要说。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需要建立使其他政党能够与国民党共存的宽容制度。

蒋经国答道,中国情况十分特殊,蒋介石由于没有足够的力量,所以奉行的是曲线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这样的政策很难长期执行。

蒋经国答道,蒋介石还没有足够的力量。

斯大林同志问,难道共产党人比蒋介石更强大。毛泽东宣称他有150万军队,而美国人认为他只有60万。

蒋经国说,当然,这些数字被夸大了。

蒋经国说,许多人认为蒋介石亲日。实际上他做了与日本作战的准备。他(蒋经国)想让斯大林大元帅明白,蒋介石竭力追求新事物。

斯大林同志说,他知道蒋介石有困难,并问,战争期间是否提拔了年轻干部。

蒋经国答道,中国新的军令部长出自年轻干部。

蒋经国提出,他认为,斯大林同志应该关心国民党,因为国民党当时是在列宁协助下建

立的。

斯大林同志答道，国民党将作为一个全国性的自由政党而存在下去，认为共产党会吃掉国民党的人将是错误的。国民党当然是比共产党更为广泛和更有影响力的政党。

蒋经国说，他认为如果共产党存在下去，对国民党是有益的，因为共产党的存在将防止国民党腐败。

蒋经国说，需要改组国民党。

斯大林同志说，选举将使国民党趋于完善，因为在选举过程中将进行人员淘汰：优者留下，劣者走开。

蒋经国说，战争期间提拔了许多新人。

斯大林同志说，如果是这样就好，因为中国仍然是老人在露面。

蒋经国说，最后他想同斯大林大元帅讨论八年战争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中国经济问题。中国期望摆脱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答道，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需要有本国的工业，不能只热衷于贸易。假如苏联没有工业，那德国人就把苏联打垮了。由于苏联拥有工业，战争期间才能够每月生产 3 000 架飞机、3 000 辆坦克、5 000 门大炮、40 万支步枪、20 万支冲锋枪。中国需要有自己的工业，中国既有原料，又有勤劳的人民。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正在争论应该更加注重农业还是工业。他(蒋经国)认为，苏联在对德战争中获得胜利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私有制。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美国存在私有制，美国工业还是十分强大的。

斯大林同志说，为了发展农业，必须建立工业，修筑铁路，建立化肥厂、汽车制造厂等。中国尚未开采石油，但在新疆有石油，在南方也应该会有。需要组织石油勘探和开采。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是否认为，中国有可能借助外国资本发展自己的工业。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可以借助外国资本较快地建立工业。在苏联，由于一切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建立工业并不难。中国实现工业化比较困难，因此中国需要从海外各大国获得贷款，否则工业化将延缓许多年。

蒋经国说，中国人担心再次处于半殖民地国家的地位。

斯大林同志说，需要奋斗。中国是个大市场，因此外国将竭力把自己的商品打入中国。进口商品是需要解决的，但同时不应允许外国将任何条件强加于中国。例如美国人不久前曾向波兰提供两亿美元贷款，但提出这些钱要按照美国人的意愿使用的条件。波兰人认为这项条件侵犯了波兰的主权，未接受贷款，并坚持美国贷款要由他们自己酌情使用，而不是按美国人的愿望使用。当然外国会要求中国不要发展自己的重工业。为了不受奴役，需要斗争，中国有条件进行这种斗争。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如何看待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答道，外国想要苏联打开门户，但苏联政府让他们见鬼去。但中国是一个弱国，形式上只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门户开放是外国对半殖民地国家的一贯要求。

斯大林同志说,美国人曾向苏联政府提出将门户开放政策运用于东北。苏联政府答复美国人说,苏联政府不是东北的主人,并说,关于此事应该去找中国。美国人对这种答复感到十分震惊,但还是容忍了。

蒋经国问,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讨论过门户开放政策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并补充说,苏联代表在雅尔塔会议上表示,这是中国的事。

蒋经国说,杜鲁门通知中国政府说,苏联政府不反对在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

斯大林同志说,倘若中国同意门户开放政策,苏联政府不表示异议。但苏联自己在中国不要求任何门户开放。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可向中国建议的?在现阶段中国难以拒绝门户开放政策,因为中国在战争期间遭受了沉重的苦难和破坏。但稍后中国需要关闭门户以便建立自己本国的工业。

蒋经国说,目前中国在经济上处境确实十分艰难。他(蒋经国)认为,除苏联以外,谁也不愿意中国复兴。

斯大林同志说,他理解这一点。日本人使中国一贫如洗。苏联政府知道,德国人是什么样的强盗。

蒋经国问,苏联和中国如何才能互相帮助。

斯大林同志答道,苏联将帮助中国建立自己的工业,并且同中国进行贸易。如果中国的大豆、稻米很多,便向中国购买。还有棉花,某些原料,少量的钨及其他。作为交换,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某些机床、机器,并派专家给予援助。

东北是拥有铁路网的十分发达的工业地区,日本人曾想把东北变成自己在大陆上的工业基地。

蒋经国说,在东北的中国居民中没有专业干部。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人是有能力的人民,因此他们一定能学会。

蒋经国说,许多中国青年被派到美国学习。

斯大林同志说,这并不坏,同时表示,中国需要自己的工程师、技术员、机械师、金融家、经济学家及农业专家。

蒋经国说,长春铁路的运营需要许多中国的专业人员,因此他(蒋经国)想问斯大林大元帅,他对派中国青年到苏联学校,尤其是运输学校学习有何看法。

斯大林同志说,虽然有困难,但这能做到。

蒋经国问,斯大林同志认为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苏联是否适宜。

斯大林同志答道,中国经济代表团可以来苏联参观工厂。

蒋经国说,他想请斯大林大元帅关注新疆的局势。过去那里曾有许多苏联专家。他(蒋经国)认为,需要恢复原来的状况。

斯大林同志答道,盛世才开始逮捕苏联专家后,苏联政府将他们从新疆召回。如果好好对待苏联专家,那么可以再派他们回到那里,他(斯大林同志)最近将查明此事。

蒋经国说，现在盛世才已不在新疆。[①]

蒋经国说，中国经济是否能在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同样的经济基础上得到发展，因为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封建残余，存在资本主义关系，与此同时还有集体农庄。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集体农庄。

蒋经国说，有人告诉他，蒙古人民共和国有发达的工业，那里的人民生活得很好。

斯大林同志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皮革制造厂，修筑了铁路，还采取一些措施开采矿藏。蒙古人民共和国没有其他工业。当然现在蒙古人不再是从前那样的野蛮人了。但是，中国不能与蒙古那样的落后国家相比。中国可以成为头等大国。至于经济形态，中国不同于蒙古，不是畜牧国家。在中国，农业的精耕细作十分发达。中国珍惜每一块土地。中国拥有建立自己的工业所需要的一切。蒙古不珍惜土地。蒙古人从事畜牧业，而且他们是缺少文化的牧民。那里冬天牲畜没有饲料保障。蒙古是一个游牧国家，是一个落后国家。因此，无论在社会方面和经济方面都不能把中国和蒙古相提并论。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基础是畜牧业，而在中国则是农业。

蒋经国问，对于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政策，斯大林同志有何意见。

斯大林同志说，希望中国政府有自己的而不是别人的东北政策，这种政策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也不受其他国家操纵。蒋介石知道这一点。

斯大林同志问，英国人是否无意将香港归还中国人？

蒋经国做了肯定的回答。

斯大林同志说，罗斯福曾强烈主张将香港归还中国，并且当时曾就该问题与丘吉尔激烈争论。

蒋经国答道，英国人目前并不打算将香港交还中国人。

蒋经国说，后天他将飞返中国，并问斯大林同志是否愿意通过他向蒋介石转达什么话。

斯大林同志答道，他将转交一封信给蒋介石。

会谈持续了 1 小时 30 分钟。

B. 帕夫洛夫记录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22, л. 123 - 140

---

① 为了调整与苏联的关系，1944 年 9 月蒋介石将盛世才调离新疆，让他出任国民政府农林部长。——编注

№2000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汇报中共的情况

(1946年1月7日)

亲爱的菲利波夫[①]同志!

顺利抵达延安的毛岸英已向我转达了您给我的良好祝愿。为此,也为了您所发来的诸多礼品,请允许我向您表示深深的谢意！另外,我也非常感谢您和联共(布)向延安派来两位医生!

我的病是神经极度疲劳症。这主要是由于自己20多年来缺乏足够的休息所致。近一段时间我休息了两个来月,健康状况有所好转。如今再有苏联医生的医治,我相信自己的病会好的。我打算休息更长一段时间。

在我休息期间,我的日常工作由刘少奇同志接替。他完全可以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5位书记之一,也是我党建立25年来未犯过原则性错误的人之一。15年前他曾两次到过莫斯科,在我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

1945年4月间召开了(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其间就我党若干历史问题通过了决议。孙平(弗拉基米罗夫)同志随身带走了一份全会决议,如果像他说的那样,他现在应当已经将该决议转交给您了。而您,在看了这份文件之后,将对中共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您可以把这份文件让一些可靠的中共党员看,但请警告他们不得将其中内容向外人泄漏。

最近5个月来,中国共产党的工作规模与去年相比扩大了两倍,我们急需工作骨干。据毛岸英说,您打算将所有现在莫斯科的中国同志发送回国。为此,我向您表示感谢。但我请求,只派遣那些业已成熟——有工作能力的同志回来,而那些你们工作上仍需要的同志,请继续留在莫斯科。请转告李立三同志,让他经张家口回延安。请将其他同志派往满洲里、齐齐哈尔、哈尔滨,以便他们找到中共中央北满地下机关,后者将为他们安排相应的工作,那里特别需要他们去。据毛岸英说,高福,即袁牧之,想暂且留在莫斯科。那么,可以暂时不派他回国。年轻人,正在上中学,暂时让其继续在苏联学习吧。

经过几个月艰苦的斗争,目前以和平方式停止中国内战和解决各种问题的希望越来越大。我们在重庆的代表团正在努力使这一希望变为现实。现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力量是一样的。如果国民党要继续这场战争,即使他将在一些地区赢得一些胜利(如在位于两军交界的沈阳、热河和河北省等我党群众基础薄弱地区),但在中国其他广大地区,他就不敢肯定会战胜我们。因此,还是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即国民党同意我们关于停止内战的建议。总体来看,中国问题依然跟从前一样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斗争仍要走很多弯路和曲折,

---

① 菲利波夫是斯大林与中共联系时经常使用的化名。——编注

中国共产党仍面临很多艰难险阻。对于这一切，我们必须有充分的估计和思想准备。我们尤其应当对美国亲自插手国共两党间实际问题后所导致的后果有充分的预见。不过，我们党的方针是坚定不移的，那就是在极力团结国民党的同时，与其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党的和平-民主路线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在三大强国莫斯科会议之后，国际形势也越加有利于我们。中国定将会有一个光明的前途。我们对这一切充满信心。近几个月来我们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今后我们应巩固这些成绩。关于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党已做了整体性的安排。国民党报纸上宣传说，贺龙、萧克和其他一些同志都被打死了，这真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可信。

委托楚查耶夫少校将此信当面转交给您。收信后，请确认。

致以同志式的敬礼！

毛泽东

1946年1月7日

延安市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695, л. 30 - 36

№16067

费德林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1946年1月8日)

机　密

今年1月8日在我们使馆共进午餐时，我和马歇尔进行了一次交谈，内容如下：

马歇尔在讲到完成自己使命时强调说，在与中国各界代表进行这类会谈的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难题。这些难题使他解决面临的任务大大复杂化起来。首先马歇尔表示自己对那样的状况不满，他认为所有的中国对话者都只是倾向于毫无实际根据的空洞议论。所有的中国人，没有一个例外，都坚持一个意见，就是必须实现国家民主化，但是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提出达到此目的的具体道路。缺乏实际解决民主问题的现实态度，不仅不能拉近民主，而且相反，会使中国远离国内现有的民主。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否等待国民党的民主改革，是否认为国民党是一个能够引导中国走向民主、和平、繁荣的政党时，马歇尔指出，他深信中国的民主化是不可避免的和必须

进行的。同时,他强调,以他的观点,国民党完全能够通过渐进的道路把中国引向民主体制。马歇尔强调,国民党作为拥有最多群众的党,注定要在中国的民主化命运中起决定作用。

马歇尔在评价中国民主同盟时声称,这个组织的缺点在于缺乏群众基础,这个同盟好像有5—6万人,这个数字与中国4.5亿居民来比,简直微不足道。民盟第二个缺点是他们的队伍缺乏统一性。参加这个同盟的各个党派和社团之间有争斗,在追逐官运的土壤上产生相互敌视,让己方成员掌握决定权的企图在同盟中引起了内部矛盾,这些矛盾把他们本来就脆弱的组织性撕得粉碎。最后马歇尔说,评价民盟的领导成员,与其说他们先进,还不如说他们特殊,民盟追求在中国达到民主自由,但他们的领导人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欲达此目标的实际道路。

在回答我的问题——民盟的组织性薄弱是不是中国执政党现行政策的结果时,马歇尔说,这大概可解释为国民党实行一党政策的结果,而这种状况更加有利于强大的国民党,而不利于组织涣散、杂乱无章的民盟。

在评价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力量时,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是中国其他社会力量中最有组织性和最有目标性的政党。尽管如此,在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难道能适合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马歇尔说,不要忘记,中国农民占国家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比谁都更少会对诱人的政治口号感兴趣,他们只追求减轻自己的税赋负担和兵役,这些税赋和兵役一直是使中国农村破产和贫穷的原因。普通的人民都厌倦战争,在他们中间不可能有普及武装斗争、推翻现有制度的思想。

在回答我的问题——他是怎样设想中国的民主化过程时,马歇尔声称,在这方面中国面临着很多困难。中国在几百年里形成的这种落后和无组织状况下,未必能期待在国内建设政府和法治机构时,可以很快地引进民主形式。例如,马歇尔说,在不可能指望采取全面选举措施的情况下,如何能够指望进行广泛地选举国民大会的代表。按马歇尔的观点,既然在现在的条件下不可能进行广泛的全民选举,中国的民主化就应该走由上而下开始改革的道路,以此来打基础。

在整个会谈过程中,马歇尔不止一次地高度赞扬菲律宾的民主化成就。为此,马歇尔强调说,菲律宾人民应该好好地感谢美国。在这个时候,他说,美国在菲律宾几乎都用命令方式开始履行自己的文明使命,建设民主化基础。在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应把菲律宾的例子看成是美国在中国政策的延续时,马歇尔说,虽然美国在这里的立场有些不同,但个别的原则也可能适用于中国。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H.T.费德林(签名)

文件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9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3, д.22, л.34-36

№16070

彼得罗夫与阎宝航会谈纪要：东北军事政治形势

(1946年1月14日)

机　密

今年1月14日在我们大使馆接待时，我和东北社会活动家阎宝航进行了会谈，内容如下：

我问，在重庆有哪些东北的组织。阎宝航回答说，他参加了两个组织——东北政治建设协会和东北文化协会，这两个组织是进步的和民主的组织。阎宝航还指出，其他像“恢复和平时期东北协会”等那样一些组织，是国民党控制的组织，是按CC派集团的授意工作的。

对于我的提问，阎宝航说，东北政治建设协会领导小组，包括他自己，应该在今年1月15日拜访马歇尔，因为马歇尔在了解了领导小组对东北目前形势的观点以后，请这个小组去会谈。阎宝航声称，在自己给马歇尔的书面请求中，这个小组提出了下列几个要求：

(1) 停止用武力接收东北；

(2) 给东北人民民主权利和自由；

(3) 从东北撤走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队；

(4) 在东北建立民兵；

(5) 释放张学良。

关于张学良，阎宝航强调说，熊式辉在蒋介石第一次来东北作报告时，他就要蒋注意，张学良的命运继续使东北人不安，东北的很多活动家不止一次地向熊式辉提出有关张学良今后地位的问题，他们不掩盖自己希望张学良回到东北的愿望。蒋介石当时说，张学良的问题要重新考虑。但是，阎宝航声称，当马占山将军拜访蒋介石，并问他张学良命运问题时，蒋介石并未把它当一回事。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5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0, л. 4

№1607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内战与和平

（1946 年 1 月 16 日）

机　密

对于我的问题——“停火”命令发布后，在前线是否停止了进攻和战斗，周恩来回答说，战斗基本上停止了，但在某些方向和个别地方，国民党部队在继续推进，特别是在共产党部队比国民党部队弱的地方可以看到，如傅作义的军队从西面进入了热河省，第九十四军和五十二军的部队继续从东面向赤峰和多伦方向挺进。在山东省，那里共产党部队比较强，国民党停止了军事活动。

我问北平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开始工作了没有，周恩来答，军调部已经开始工作了。为了部署部队和将命令传到战场第一线司令部，派了 15 架飞机到各个不同的地点，但有 1 架这样的飞机在赤峰上空飞行时，于 1 月 15 日降落在赤峰机场，被红军的部队扣留了。为此，周恩来迫切要求向红军指挥部告知这一事实并释放这架飞机。因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各种会议上证明，在赤峰驻有红军部队，并控制着赤峰和多伦。飞机被红军部队扣留可能会导致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努力都落空。

有关中国共产党执行停止军事活动命令情况，周恩来指出，他们的薄弱环节是延安与自己在前线部队的无线电联系。由于缺乏受过训练的干部，以及军队的分散性，无法做好这项工作。

对于我的问题——马歇尔对国民党部队在某些方面继续进攻和没有停止军事活动如何反应，周恩来答，他（周恩来）也就这个问题与马歇尔会谈过，马歇尔对他说，他（马歇尔）也获得了有关共产党同样活动的消息。周说，在前线还是继续有部队在活动，在某些地方还有冲突，而在一些地区不经战斗就夺取了一些据点。但是，马歇尔说，所有有关这些情况他已经都报告了蒋介石。除此之外，周还指出，国民党派在军事调处执行部的郑介民将军（侦查厅厅长），对情况非常了解，他拥有与所有部队的通畅的联络网，并利用这个优势向蒋介石和马歇尔报告共产党部队违反命令，他总是进行大规模的反共宣传。周还说，美国的上校伯劳乌特通知说，目前双方都有错，都违反命令。尽管命令在 1946 年 1 月 13 日晚上生效，但不是所有地区都收到了命令。因此，个别部队仍在继续进行军事活动。周声称，1 月 13 日他收到延安的通知，说国民党正在进攻热河和其他一些地方，而共产党部队进行了反击。但是，也有共产党部队转为进攻并占领某些居民点的情况。有时候共产党军队不得不将国民党政权从他们侵占的居民点里赶走，周说，尽管如此，战斗行动基本上已停止了，而国民党并没有放弃将共产党部队赶出最重要居民点的意图。因此，在山西、山东、热河，国民党部队继续向前

行进。周恩来说，他已经给延安发电报，要司令部采取适当的措施，尽量不违犯命令，以便共产党有可能用政治手段收回那些国民党部队在命令发出后占领的居民点，这样还可以促使国内军事政治状况的稳定。

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共产党军事状况的问题时，周强调，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共产党管辖的地区迅速扩大，这就使共产党部队的驻地分散，武装力量分散。

部队散在广阔的地区，会导致纪律松懈，并在一些战线引起混乱。所有这一切都降低了共产党部队的战斗力。如果说以前这些力量都集中在一个拳头中，共产党部队能顺利地打击国民党军队，那么现在这些军队则在一系列前线地段遭到了失败。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游击队和正规部队战斗力相当强大，但是缺少炮兵和其他武装，不能够坚守住已攻占的阵地，只有在组建了强大突击部队的地区才有可能进行进攻战役。

缺乏经过技术培训的军官，使共产党甚至没有能力使用最近获得的武器、大炮和坦克。

在评价重庆的状况时周强调，国民党企图稍为打开一点未来民主大厅的门，但是进入这个大厅的必经之路，是要解除共产党武装。玩弄民主辞藻现在成为国民党政治的特点。国民党企图用"改组国民政府"、"以民主人士补充各级政府组织"、"提供地方自治"等辞藻来获得国内和国外社会舆论的好感。但是，国民党没有采取任何实际的措施。周声称，蒋介石不得不讲民主是因为外界对他有压力，这些压力来自国际舆论、国内各种党派和组织、中国社会以及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人民。蒋介石必须做出某些让步，周举例说，当蒋介石不想在把赤峰和多伦留给共产党部队的问题上让步时，马歇尔是这样给他压力的：在蒋介石坚决拒绝退出这些居民点时，马歇尔对蒋介石申明，如果他不让步，内战将不能停止，这样就会引起三大强国的干涉。结果，蒋介石好像当即就签署了将赤峰和多伦让给共产党部队的命令。

接着周指出，讲到民主，国民党同时仍继续自己原来的政策。蒋介石宣布四点民主纲要以后，没有迈出任何实际的步伐。相反，还发现有镇压政治犯的情况。周强调，民盟坚决站在敦促蒋介石实现其宣布的诺言的立场上。民盟得到了共产党的支持。

对于我提出的有关国民党提出了哪些具体措施以及共产党对此所持立场的问题时，周回答说，国民党除颁布声明以外，什么新的东西也没有提出。但颁布的东西则表明，国民党企图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保存绝对多数。如果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是民主应该在所有政府机关中实施，那么国民党却主张民主只能在某些改组的国民政府的基础上实施。在国民党中有一种意见，即所有的政府各部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领导类(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不能让民主分子参加进去；第二类是教育部、社会部、经济部、食品部，对这样一些部，其领导可以有其他党派的代表参加；第三类是农业部、司法部、鉴定委员会及其他各部，在这些部可以允许民主分子参加。这就是现在进行中的会议的幕后背景。

周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立场与国民党的立场完全不同。中国共产党主张民主宪法，在这个宪法的基础上应该进行民主改造。但国民党企图保持五五宪法，这个宪法实质上是一部专制的宪法。根据幕后谈判判断，国民党倾向于做出某些让步。这种情况之下，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对于我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什么样的、

与国民党对立的具体纲领,周回答说,共产党还没有提出自己的纲领,虽然这个纲领的基本原则很清楚:(1) 实现真正的民主宪法;(2) 实现政治军事分治,限制总统和内阁的权利;(3) 给予省级政府自治权;(4) 同意中国共产党有20个步兵师。

中国共产党在不提高自己军事方面要求的同时,将为实现扩大政治纲领而斗争。因此,将有非常严肃的政治斗争。这时,周指出,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而青年党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对罗申的提问——马歇尔将军是什么立场,周回答说,他与中国共产党保持着积极的联系,关心所有的军事和政治问题。毫无疑问,他对所有的事都很在行,但目前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周说,根据他的观点,马歇尔正等待军事命令的结果,看来,有了结果他会开始显示有关政治问题的极大积极性。

接下来,周讲述了不久前建立的张群、张治中和周恩来三人小组。1月15日,三人小组交换了关于研究军事问题初步意见,1月16日国防部副部长林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作了关于改组中国军队的策略性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这个军队将由90个步兵师和10个骑兵旅组成。军队的总人数为180万人,其中40万人是军官。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在这个数字之内。

周指出,张群在私下谈话中告诉他,共产党军队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兵力对比应是1∶6,他暗示共产党军队应该是16个师,而不是20个师。周补充说,张群和张治中现在还没有阐述自己的观点,只是说中国军队的改组应该在6个月的期限里完成,而共产党军队的改组应该在2个月内完成。

我问,政治协商会议有没有对讨论的问题做出什么具体的决议。周回答说,到目前为止没有做出任何具体的决议。现在还在进行辩论。有鉴于此,成立了5个小组,从事对各种问题的研究和准备提出建议。

我问,国民党对各级政权机关的选举怎样看待,周指出,目前国民党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选举,但在他们的代表中出现了让步的倾向,允许在8个解放区进行县长的选举,或许还允许选举边区的全权代表。但是,关于这一问题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声明。

对于我的提问——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什么立场,周声称,为了以政治手段开始进攻和保卫民主权利,现在正在试探国民党的弱点,使中国共产党得以保住赤峰和多伦。至于说中国共产党的自治,则在察哈尔和热河省获得了独立自主的权利,并在山东和河北获得了参政权。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想保留某些边区的行政权。如果蒋介石不想把察哈尔和热河提供给中国共产党,并拒绝中国共产党在山东和河北参与行政管理,那么,我们将不得不在宪法问题上为赢得胜利而斗争。

在回答周的提问——对目前形势如何评价时,我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该寻找和平解决所有军事和政治问题的道路。

周说,中国共产党就是沿着这个方向在做,在解决上述问题时,一直采取十分谨慎的立场,同时对美国人更加特别小心。周说,他非常清楚,美国人过去总是站在蒋介石一边。因

此，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道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必须绕过的暗礁。对中国共产党来说，与美国人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新问题。接着周强调，遗憾的是，在日本投降以后，有些负责的工作人员，甚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都没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例如，他们认为红军应该进入东北，并把它转交到中国共产党手里。他们不懂得所有国际形势的复杂性，即使了解，也极其肤浅。周说，当他在延安看到那些电文时，就更加清楚了。

在会谈结束时，周声称到1946年10月①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已得到极大的增强，在那时与蒋介石讨论各种各样问题都比较容易。那时是中国共产党胜利的阶段：国民党军队被分割开来，并遭到了失败。现在的作用起了变化。现在不得不寻找所有的道路，以便达到折中地解决问题。周强调说中国的形势很困难，要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工作和努力。

Н. В. 罗申、Л. М. 米克拉舍夫斯基和 Н. Т. 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月18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0, л. 5－11

№16079

费德林与郭沫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30日)

机　密

1月30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会谈，其内容如下：

众所周知，郭沫若是共产党提名，经蒋介石批准，作为政治协商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的。

我请求郭沫若与我交换他对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印象，讲述一下在协商会议上各种不同党派和组织代表的表现。

郭沫若评价目前国内政治形势时说，由于政治协商会议的成立及其工作开展，现在正呈

① 原文如此，应为1945年10月。——编注

现出中国民主运动的转折时刻。现在可以断定具有一系列民主措施这一事实，至少有国民政府正式宣布的正式记录。

在宣布民主自由同时，郭沫若指出，可以改组中央政府，准备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宪法，统一指挥，军队国有化，等等。

但是，郭沫若强调，现在国家政治生活的进步，遗憾的是，它不是根本性的，不是持续进步的，而是带有临时性和局限性，因为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外来原因，而不是内在原因。

郭沫若声称，现在的民主是表面的，是外来的，是外国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施压的直接结果。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杜鲁门的声明和马歇尔使团到中国，在蒋介石周围造成了难以容忍的国际条件，并使他面对必须拒绝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因为真正的民主将导致国民党制度的彻底毁灭，但是在马歇尔使团面前却摆出了完全不同的任务。看到人民群众的政治积极性，共产党日益增长的威望以及在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美情绪的加强，担心在中国实现真正民主可能性的美国的统治阶层，不能不采取应急措施，来预防对他们极不愉快的结果。因此，马歇尔使团的主要任务是不能允许中国共产党军事和政治影响的进一步扩大，这对美国来说是主要的危险，因此要束缚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分子的活动，支持蒋介石保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

事实证明，马歇尔顺利地完成了这一主要的任务。政治协商会议的初步结果有力地证明，蒋介石的民主改革只是表面的，相对的。他们的虚假民主和表面的特点，通过具体分析可以看得很清楚。

比如，尽管决定成立一个由 40 名成员组成的国务委员会，但国民党占据其中 50%的席位，而剩下的席位大部分都是亲国民党的青年党、无党派人士，可能有部分民主人士。

其次，国民党保持自己具有作为老代表参加国民代表大会的权利，因此可以保证自己在国民代表大会上拥有绝对多数的表决权。

第三，在武装力量国家化的过程中，主要是解除共产党的武装，因为蒋介石为自己保留了 90 个师的正规军，这些师都是由经过考验、最忠于他的部队组成的，而对这些部队而言，“在军队中禁止党派活动”却是一句空话。

第四，在任命政府重要负责岗位时，国民党为自己保留了最重要的各部部长的职位，如外交部、内务部、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等。这样，即使那些次要的各部都由民盟的代表负责，整个国家机器仍然掌握在国民党干部手中，因此领导只是形式上的。

这样，郭沫若强调说，民主阵线实际上争取到的东西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的实际价值大大低于表面的价值。从本质上说，现在的变化与其说是符合民主运动的利益，倒不如说是符合国民党的利益。因此可以说，郭沫若指出，尽管存在着实现民主的可能性，但蒋介石的领导地位变得更加巩固了。现在蒋介石不仅被看做是国民党及其政府的领袖，而且被看做是在中国社会不同党派和社会团体合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政府的首脑。国内外社会舆论对蒋介石领导地位的承认，为他获取其他大国，首先是获取美国的资金和物质援助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而获得这些援助将会稳定国内的经济局势，也会使蒋介石的地位更加巩固。

在评价各种党派和组织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的表现时，郭沫若指出，除国民党 9 名代表外，对国民政府的纲领表示支持的有：青年党(5 人)，这个党，根据可靠消息，得到了张群的一大笔贿赂；无党派人士代表：王云五、胡霖、傅斯年、钱永铭、莫德惠、李烛尘。在无党派人士代表中，只有一个邵从恩除外，他采取独立的立场。

郭沫若说，民盟代表团的成员有：黄炎培、沈钧儒、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张君劢，他们自始至终都坚定地站在统一立场上，在为民主纲领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一等秘书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0, д. 32, л. 47 - 49

№1608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形势

(1946 年 2 月 6 日)

机　密

2 月 6 日，我接待了周恩来，并与他就有关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和国内政治形势的问题进行了会谈。

我问道，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团体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否满意。周恩来回答说，在当前的情况下通过一些决议，这是在谈判过程中可以获得的最大收获。周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正式的看法。朱德在延安的报纸《解放日报》上刊登的文章中已阐述了这些看法。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还有正式的指示，其中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结果做出了评价，并提出了今后的任务。

周恩来接着说，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是民主运动的第一步，是摧毁国民党专政的开始，今后民主运动便有了继续发展的机会。可以说，现在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从武装斗争转向政治斗争、议会斗争，因而，必须改变工作的形式和工作的方法。周强调说，从一些文件来看，这些决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是，这些成果必须用实际行动来巩固。不能不承认，今后在实践中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还有很大的困难。

关于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果的原因，周恩来指出，之所以能够取得这些成果，只是因为

外部对蒋介石有很大的压力。如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确定,中国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和应该做什么;马歇尔将军在重庆也对蒋介石构成了巨大的压力,他的口袋里装着20亿美元的借款支票,发放5个师的装备以及为中国提供若干飞机和船只的命令。

讲到落实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时,周恩来指出,摆在我们眼前需要克服的有一系列困难,首先要击退国民党右翼的攻击,他们已开始进行撕毁这些决议的工作。国民党在最近召开了三次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一次会议在1月30日召开,在这个会议上CC派代表尖锐地批评国民党代表。参加这个会议的蒋介石声称,不应该低估这样的事实,客观上共产党是帮助了国民党。蒋介石指出,假如没有共产党,不知道国民党将会怎样;假如没有共产党开展的工作督促国民党,不知道国民党是否还能存在下去,甚至不能排除国民党瓦解的可能性。今年1月31日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会第二次会议,在这会议上,同样提出了反对国民党代表团同意向民主派做这样大的让步。谷正纲、张道藩、朱家骅等人的发言极端尖锐,谷正纲声称国民党将没有前途,国民党代表团背叛了孙逸仙的原则,等等,张道藩也做了类似的发言。比这更大的喧闹是在2月4日的会议上,这次会议蒋介石没有参加。CC派代表感受到了自由,演出了一场把会议变成公开谩骂的闹剧。但是最后,会议参加者还是得出结论,目前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决议是蒋介石批准的,所以只能在可能的范围内进行批评。孙科、邵力子、张群、王世杰都遭到了尖锐的攻击,谴责他们背叛了孙逸仙的学说,特别是张道藩的发言毫不妥协。当有人说,这些决议得到了蒋介石的赞同时,张道藩和萧同兹问答说,对蒋介石也要“刮胡子”。[①]从发言者的说话中可以知道,如果所发生的一切对蒋介石来说毫无价值,因为蒋介石仍然留在领导位置上,那么不知道,他的其他战友会怎样……

周恩来讲,不久之前,陈果夫拜访蒋介石,并请他解释,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么大的退让。蒋介石好像回答说,退让是因为美国的压力。

综合国民党反动集团的行动,周恩来说,很可能再过两至三个月他们又会再次抬起头。

我问,他们会不会在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上活动。周恩来说,在这个全会上,大概会大打出手,但他们不会成功的。但是,周恩来指出,在马歇尔离开以后,他们能够比较顺利地行动。现在他们开始活动,收集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签名,作为对全会的准备。这些签名不仅在重庆收集,而且在偏远地区收集。任务在于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召开之前将这一切提供给蒋介石。

按周恩来的说法,军人集团表现出的积极性也毫不逊色。例如,胡宗南在西安召集他的将军们,试图搞清楚他们对政治协商会议的看法和态度。当他听到他们中大多数人对政治协商会议表示赞同时,立刻严厉批评、谩骂他们。后来,胡宗南又召集了相当数量的各级军官,并要求希望政治协商会议取得成功的人举手,结果大多数人都举起了手。当他要反对的

① “刮胡子”,原文“сбрить усы”。俄文没有这种说法,估计是文件作者直接引用发言者的用语或手势,即“刮脸”——替他感到害臊。——编注

人举手时，只有几十个人举手。胡宗南大骂所有出席的人，骂他们是寄生虫，不懂得中国发生了什么。

但是，周恩来指出，这并不表示在军队中没有人想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现在在上海和南京地区正在召开军事领导人会议，参加的有何应钦、白崇禧、汤恩伯、徐永昌、顾祝同、胡宗南等人。他们集中在那里，是为了研究蒋介石提出的问题——怎样对军队实行控制。对于他们召开的会议的结果，可以总结如下：

(1) 保持行政权力和军事权力的统一；

(2) 在和平时期保留对一些地区和剿匪司令部的指挥权，从他们的观点来看，这是为了与“匪徒”做斗争，并稳定解放区的秩序；

(3) 不允许其他党派的代表到国防部、征募局、作战局去，不仅不能领导这些机构，而且也不能在这些机构中工作；

(4) 保留国民党军事院校。

这样一来，周恩来说，如果在第一阶段国民党要求共产党的军队国家化，那么现在共产党则要求国民党所有的军队国家化。

接着，周恩来谈到了保密局人员所采取的措施。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这些机构应该废除。因此，国民党现在正在迅速改头换面，建立各种各样的部队，如警察部队、交通警察等。有些国民党员提出在“特务”中建立政党、协会等。特别机构的全部工作人员共有20万人。

周指出，国民党右翼斗争的积极方法之一还应算上这一招，即他们那些维护者企图把孙科、邵力子、于右任、王世杰等人排挤出领导层。共产党方面就采取了某些预防的措施。周说，他2月1日拜访了蒋介石，让他相信，中国共产党将采取一切措施来实现已经做出的决议。周指出，共产党准备重新改组自己的军队，将其数量减少到20个师，并取消党在军队中的工作。周要蒋介石相信，共产党准备真诚地、经常地与国民党合作。周表示希望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在重要问题上互相交换情况。接着周强调，有关共产党参加政府一事，共产党希望还能参加各省的政府。蒋介石对周声称，在他去延安前，他(周恩来)与张治中、马歇尔应该拟订一个解决军事问题的草案。

会谈中周请求在国务会议的组成中，共产党应该有10个代表，这样才能保证共产党的否决权。然后，周对蒋介石声称，国民党和共产党必须停止敌对宣传，用这样的方法来减少双方困难。周指出，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军队及其他组织的不满，如果不采取措施消除这些困难，这不会对国民党有什么好结果。最后，周对蒋介石说，困难越少，他(蒋介石)就越容易领导国家和人民。

蒋介石回答说，国民党准备长期合作，不会允许改变决议。他强调说，这些政治协商会议的成果之所以有可能获得，就是因为是他(蒋介石)渴求达到的。蒋介石说，如果中国走上新的道路，那么就会提高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威信。

周说，他从邵力子那里了解到，王世杰与他谈话时说到，在周与蒋介石会谈时，“双方相互给对方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关于国民党代表个人在政治协商会议和谈判时的活动的评价，周说，王世杰做了很多工作，他比较执著，不急于做出决定，能清醒地进行评判并善于做出让步。张群是一个容易走极端的人，他要么大大退让，要么顽固到什么让步的话也听不进去。邵力子——没有实权，没有什么靠山，因而他缺乏独立性和勇气。

讲到拟订国务会议成员名单的问题时，周说，大概位置的排列，看来是共产党 8 个，民盟 5 个，青年党 3 个，无党派人士 4 个。周说，他怀疑蒋介石是否会同意给共产党 10 个名额。然后，他强调说，国民党在选拔自己的代表时面临着一系列的困难。在是否让国民党元老进入国务会议的问题上，蒋介石进退两难，例如，孙科、于右任、冯玉祥、孙逸仙夫人等，因为他们的左倾观点会令蒋介石陷入十分窘困的境地。周声称，共产党努力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前公布名单，并坚决主张国民党也公布名单。

关于部长的分配问题，周说，目前尚无肯定的意见，但是对于无党派，国民党好像准备给 3 个位置；司法部、教育部和农林部和一个委员会；除部长外，还将建立 4 个不管部部长职位。

对于我的提问——按周恩来的看法，蒋介石是打算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还是会拖延这些决议的实现，周回答说，这个问题是复杂的，但蒋介石今后的表现将依赖下面事实的发展：如果能够促使蒋介石退让的国际压力继续存在，而同时共产党也不削弱自己的努力，那么他将继续他在政治协商会议上采取的政策，也就是说，去实施会议的决议。如果说压力消除，共产党又削弱了自己的工作，而国民党右翼则加强了自己的压力，那么不能排除蒋介石将从已确定的道路上转向。如果蒋介石看到共产党在努力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开端，并感受到共产党方面的压力，那么，他未必会抛弃自己的决定和诺言。

接着，周说，从马歇尔的行为来看，可以说，现在美国人做得很好，他们努力帮助中国整顿秩序，制止混乱。在这方面，他们既帮助了国民党，又帮助了共产党。尽管如此，这仅仅是事情表面的和暂时的一面。他们(美国人)竭力想为自己将来在中国的统治建立基础。中国共产党明白这一点，因此努力利用他们现在采取的措施，以便加强自己的地位，尽管看起来在以后会遇到一些困难。至于如何评价马歇尔第一阶段的工作，即在中国停止军事行动和执行已经下达的命令所采取的措施，应该说，如果不是美国人这么积极地介入，那么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到现在为止都不会停火。在美国人帮助下，周强调说，共产党保住了赤峰。

周告诉我，马歇尔拟订了下列各种计划：在和平时期改编军队，组成 50 个师的计划；在和平时期应征措施法草案；以军团为独立单位集中供应军需品，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军需供应计划。周指出，马歇尔对他说过一个想法，为了部署共产党军队，应该事先考虑到他们主要驻扎在中国北方，部分在东北、中原和南方。马歇尔想建议蒋介石，用以下方式作为试验：一个军团以共产党 2 个师和国民党 1 个师组成，由共产党指挥；一个军团以国民党 2 个师和共产党 1 个师组成，由国民党指挥。

除此之外，马歇尔还有一个想法。他想建议蒋介石，在中国驻日本占领军的组成中，最好有一个共产党军队的师。周恩来说，他同意这个想法，并通报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马歇尔的建议是这样，从延安青年中组成一个模范师派往日本，他们完全是美国武器装备和

服装，也让美国人看看共产党军队的面貌。

对我的提问——蒋介石对马歇尔是否满意，周回答说，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说，他认为马歇尔为人客观，头脑清醒，精力充沛。对我的插问——蒋介石想不想念赫尔利，周回答说，这不大可能。赫尔利是一个市侩，他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他不是政治家，而是一个商人。周说，从另一方面，大家都知道，1月20日马歇尔拜访蒋介石，在与他谈话中声称，已经过了10天，还没有看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的结果，而他(马歇尔)很快就要回国了。蒋介石对他说，结果会有的。但马歇尔刚刚离开，蒋介石就大发雷霆，用拳头狠狠地敲打桌子。如果这件事，再加上由陈果夫为蒋介石起草的声明，那么就可以做出结论，即美国是真的给了蒋介石施加了很大的压力。

我问，T. B. 宋作为总理[①]，实际上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起什么积极作用，这如何解释。周回答说，现在T. B. 宋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经济事业上，与政治相比，这会给他带来极大的个人收入。周说，T. B. 宋在政治上没有原则，他所有的愿望就是在国外获得荣耀和为自己增加资本。有材料说，在改组政府时，他未必能保持自己的位置。有消息灵通人士传言，他可以作为特别大使到美国去，因为要在那里解决贷款问题。

大使馆顾问 Л. М. 米克拉舍夫斯基、武官少将 Н. В. 罗申和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11月9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0，л. 16－22

№1608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民党的政策

(1946年2月12日)

机　密

今年2月12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

① 原文如此。T. B. 宋指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编注

周恩来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讲述了关于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积极活动，他们将自己的精力用于撕毁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上。他说，CC派煽动在国民党里组织新的派别，自称“革新派”。这个派别为首的是谷正纲、张道藩、萧铮、赖琏、萧同兹、胡宗南及其他附和CC派的人。那些“革新派”拥护者举行了座谈并得出结论说，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们应该采取下列措施：

(1) 废除国民党的总裁制度，蒋介石除了中华民国主席外，不应该再担任党的领袖。

(2) 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民主。

(3) 重新考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组成。

(4) 限制国民党元老在国务会议中的名额。

周指出，“革新派”企图在今年3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中全会上提出并坚持自己的纲领。除此之外，周恩来强调，“革新派”拥护者将进行反对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作为自己的任务，他们的这种斗争简直就是流氓行为。举例来说，今年2月10日，应该在重庆一个广场举行的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群众大会，被CC派领导的秘密警察的流氓干涉所阻挠。

至于蒋介石对“革新派”的态度，周声称，蒋介石的立场是双重态度：他不反对反共活动，但反对攻击国民党。蒋介石赞成各种派别在国民党内活动，但不得越过政治协商会议合法决议的界限。

接着周恩来对我讲了有关他和张嘉璈的谈话。他指出，总的来说，张嘉璈的表现比熊式辉好。周发现，当叶剑英在北平访问熊式辉，想与他商谈东北问题的时候，后者却强调，这个问题带有外交性质，因此他没有什么可以谈的。当张嘉璈在重庆访问周恩来时，也涉及东北问题，前者声称这是政治问题，应该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张嘉璈对周恩来说，东北的形势用政治手段来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但是事情本身要求双方不可避免地只能用政治手段来解决。

关于对苏联在东北政策的评价，张嘉璈强调，苏联对解决东北经济和政治问题十分关心，因此不急于撤出自己的军队。苏联得到了自己在远东边界线的安全和长期不受侵犯的保证。

对于红军部队拖延从东北撤离，张嘉璈指出，这不会引起中国中央政府方面的特别反对，因为苏联军队的过早撤离可以被共产党和其他武装力量利用去占领地盘，并在东北造成军事和政治上更加复杂的状况。

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在红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政治和经济问题的解决也会拖延，因为根据蒋介石给张嘉璈的批示，蒋不准备在苏军部队撤离东北之前解决政治问题。

谈到中苏经济谈判，张嘉璈说，在苏联做了那些很大让步之后，蒋介石在原则上同意就这一问题提出的方案。唯一困难的只剩下发电站的管理问题了。现在经济合作的问题已递交蒋介石，蒋让经济部来研究，这个部应该综合处理整个东北经济问题，并做出最后的结论。

周恩来告诉我，张嘉璈对共产党关于东北军事政治问题解决道路的观点感兴趣。周恩来对张说，这些问题应该按双方协商的道路来解决。其中包括，共产党不反对派遣由军调部的国民党、共产党和美国代表组成的军事小组到营口去实地搞清情况。关于政治问题，共产党建议改组蒋介石在长春的行辕下属的政治委员会，重新考虑9省省长问题，并进行县级领导的全民选举。周还指出，尽管共产党这样提出了问题，国民党至今为止尚未表达自己的观点，其中包括派军事小组到营口去的问题。

有鉴于此，张嘉璈声称，国民党拖延回答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对共产党的合法化和加强其在东北的地位不感兴趣；其次，国民党不相信苏联会赞同派这样组成的小组去营口。至于政治问题，张家璈强调说，那就应该遵守基本的条件，即要保持蒋介石的面子，解决所有的政治问题应该是互让的。因此，张嘉璈说，共产党不应该拒绝暂时的妥协，然后可以继续重新考虑所采取的决定。

大使馆一等秘书费德林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2月14日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0，л.24－26

№16086

希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众对苏联的态度

(1946年2月21日)

机　密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从日本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和红军在这领地上的进驻，从根本上改变了内部政治状况，并掀起了当地居民广泛的民主运动。解散了所有日本和亲日本的组织，形成了当地的政权机关，共产党组织合法化，建立了群众民主联盟和协会：有工人的，知识分子的，青年的，妇女的。民主组织和地方自治开始出版了25种报纸、6种杂志和3种通讯刊物。

以友好态度对待苏联的最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在东北11个城市里建立了中苏友好协

会,团结了2.5万名成员。这些协会在居民中进行群众政治工作,普及苏联和红军的影响。这些中苏友好协会出版了4份报纸、3份杂志,除此之外,他们还在居民中分发和传播书本、小册子和苏联领导人照片。

在东北的我军政治机关在帮助当地民主组织的工作时,还在中国和苏联居民中进行宣传解释工作,散发了将近1亿份传单、标语、条幅、小册子、肖像和明信片。在城市和农业区组织群众大会。进行关于苏联和红军的几百场报告会和演讲。在东北所有的城市里放映苏联电影。红军歌舞团在居民中进行演出。

由于所有这些措施,我们在东北的影响大大增长。居民基本群众都对红军和苏联怀着友好的感情。

国民党分子在这段时间里对民主组织的活动,特别对东北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制造了很多障碍。最近,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东北,国民党分子活跃起来,积极从事反动的和反苏的活动。现在他们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宣传,而是越来越广泛地对民主组织,特别对中苏友好协会的领导人采取威胁、逮捕和暗杀的手段。在四平出现了传单,国民党分子要求取消中苏友好协会。国民党中最反动的分子传播谣言说,随着中国政府军队进入,所有协会的积极分子都要被消灭。结果,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明显地收缩了。

考虑到我们的军队将从东北撤离,为了巩固和加强我们在那里的政治影响,建议是否有必要采取以下措施:

1. 用吸收在东北的苏联公民和中国社会的著名人士积极参加协会工作的方法来巩固和发展中苏友好协会,并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与这些友好协会的正式联系。

2. 在长春、大连、哈尔滨和沈阳建立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文化宫。通过这些文化宫在中国居民中组织文化教育工作,巩固苏中友好和普及对苏联生活的知识。

3. 在中长铁路管理局的苏联机构下设文化教育部,其目的是为东北的中国和苏联居民出版中文和俄文报纸,登载东北无线电广播电台有关苏联的新闻,并出版有助于中苏友好协会工作的报纸。

4. 苏联新闻局加速在东北各大城市建立代表处。

5. 在莫斯科的外文出版社开始出版中文版的苏联文学期刊,以及优秀文艺、经济和政治类书籍,并且在大连市也出版上列书籍。

6. 由于莫斯科对华广播听不清,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无线电推广和无线电广播事业委员会,应加速建立从哈巴罗夫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无线电台的对华广播。

7. 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电影摄影事业委员会应加速用中文字幕和华语配制苏联电影,并大大增加寄往东北的影片。

8. 派遣某些著名的苏联学者、作家、新闻工作者和苏联艺术家到东北去公开讲演和演出。

9. 责成国际书店联合公司在东北各城市出售俄文版苏联报纸、杂志以及文艺、经济、政治书籍。

呈此报告，请您决定。

И. В. 希金

印章：洛佐夫斯基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61，д. 94，л. 17－18

№13317

斯大林与乔巴山会谈纪要：外蒙古与苏联、中国的关系

（1946 年 2 月 22 日）

1946 年 2 月 22 日 22 点

出席会谈的人员：B. M. 莫洛托夫和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公使伊万诺夫。

以下是乔巴山提出的供讨论的问题：

1. 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和互助条约的签订。

乔巴山详细地论证了签订条约的必要性。他说，现存的 1936 年 3 月 12 日的关于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间的互助议定书，今年已经到期，尽管目前还没有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进攻的直接危险，而最危险的敌人日本已经被粉碎，但是，仍然可以预料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侵略意图。

在预见到中国可能对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侵略的意图的情况下，蒙古人民共和国政府希望与苏联签订一个条约，其内容类似于现存的 1936 年 3 月 12 日的互助议定书，可补充 1—2 条关于两国之间进行文化和经济合作内容的条款。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斯大林同志说，根据互助议定书，我们(苏联方面)应该从蒙古人民共和国撤回自己的军队了。乔巴山请求无论如何不能这样做，因为红军部队留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将是国家安定的最好保证。

在讨论了与即将签订的条约内容有关的一切问题之后，斯大林同志建议把 1936 年 3 月 12 日的互助议定书变成条约，在条约中保留议定书中的所有条款内容，并对新文件重新进行签字。关于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可列入单独的协议中。

乔巴山接受了斯大林同志的建议。

2. 关于在内蒙古和联合的兴安岭省的蒙古族部落中的工作。

乔巴山通报了关于一些地区的蒙古游牧点的情况，这些地区在地理位置上属于中国的

组成部分。按照乔巴山的意思,在这些地区需要开展宣传鼓动工作,以便准备把蒙古族居民从中国分离出来,归入到蒙古人的境内,建立独立的蒙古族国家。乔巴山说,目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对于内蒙古和兴安岭保持中立态度。

斯大林同志: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需要与中国进行一场新的战争。现在是否需要这场战争呢?

乔巴山:是否可以在那里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呢?

斯大林同志:可以悄悄地进行。

3. 关于在确定外交关系方面蒙古人民共和国与中国的相互关系。

乔巴山希望协商在什么基础上建立这种关系。他表示担心中国人可能会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搞阴谋,并询问是否能够拒绝他们在蒙古人民共和国设立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您不能允许他们走得太远。由于国内缺乏干部,不应该急于设立领事馆。以此理由您可以拒绝中国人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开设自己的领事馆。

斯大林同志还提出了一个问题:蒙古政府是否有意与中国人进行贸易往来?

乔巴山:不,中国人可能会欺骗我们。我们不愿意也不会与他们进行贸易往来,再则,如果我们需要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苏蒙贸易代表处进行。

对于斯大林同志的问题——蒙古方面是否已经有了派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的人选,乔巴山先是阐述了对于候选人个人品质方面的一些要求,然后说出了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书记苏伦扎布的名字,并竭力获得斯大林同志对于这个任命的预先支持,即给予肯定性的回答。但是,他没有达到目的。

(备注:乔巴山希望让苏伦扎布到远离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这个任命将会受到苏伦扎布本人的反对,并会在中央机关引起不满情绪。为减轻这件事的难度,乔巴山希望得到斯大林同志这样的回答,以便使他能够在乌兰巴托说:"斯大林对我说的,任命苏伦扎布前往中国担任公使职务。")

斯大林同志详细地询问了1945年的情况,其结果是蒙古人民共和国损失了300万头牲畜,还询问了蒙古人民共和国畜牧经济的管理方法和牲畜种类,并给予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这些都是来自高加索和其他地区的经验。他还向交谈者传达了这样一种思想:为了消除——而这多少是可能的——自然灾害给畜牧业发展造成的危害,应该组建保护牲畜的场所,组织国家对井水的监督,建立灌溉大田以便给牲畜创造牢固的饲养基地。

接着,谈话转到了畜牧产品方面,当斯大林同志了解到,在战争年代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奶油制造业得到了发展,他问乔巴山,蒙古人民共和国能否卖给苏联黄油。

这个问题对乔巴山来说是意想不到的,也是不愉快的问题,因为要具体解决这个问题,需要蒙古人民共和国方面投入很大的物力和人力。希望回避这个问题,乔巴山开始列举各种理由(有些甚至是不正确的),以便不直接拒绝向苏联出售黄油的问题。

斯大林同志大概明白了这一点,简短地说:"如果你们不能的话,那就不需要了。"

在会谈过程中,乔巴山还触及关于建设从纳乌什基到乌兰巴托的铁路的问题。斯大林

同志说，这条铁路可能在第二期工程中建设。

记录：伊万诺夫(签名)

РЦХИДНИ，转引自(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

№14449

阿尼金提交的情况说明：解散第八十八特别旅

(1946 年 2 月 22 日)

关于解散远东第二方面军第八十八特别旅的情况说明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情报部(PO)部长 1945 年 10 月 12 日的电报，我被派往哈巴罗夫斯克接管第八十八旅。

抵达前实员：军官 197 人，中士、列兵 662 人。其中长期在外 256 人(在满洲的中国人)。由于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原因应复员 211 人。

根据远东第二方面军 1945 年 10 月 15 日第 046/042 号令解散这支部队。

按照组织动员处的计划，解散前队伍中的全部人员派往其他部队(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大机场、哈巴罗夫斯克第 100 号仓库)工作。军官则由远东第二方面军干部处管理；政工人员受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管理。

在满洲的军官、中士和列兵(中国同志)复员。按照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军事委员会的指示，部队的公文、档案和关于游击运动的信函转交给外贝加尔-阿穆尔军区政治部。

关于驻扎区维亚茨科耶村所有粮食和资产的登记册及解散部队的文件转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部队的旗帜送往莫斯科市博物馆。

部队于 1945 年 12 月 11 日彻底解散。作为委员会主席，我和其他成员——该旅政治部主任谢廖金中校、代参谋长亚特采列夫签署的两份解散命令已交远东第二方面军组织动员处。

委员会主席、中校

阿尼金

1946 年 2 月 22 日

ЦАМОРФ，ф. 2，оп. 12378，д. 1，л. 68－69

№16108

费德林与郭沫若谈话纪要:国共斗争激化

(1946 年 4 月 10 日)

机 密

今年 4 月 10 日,我和作家郭沫若进行了一次谈话,内容如下:

在谈及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时,郭沫若指出了国共两党之间斗争进一步激化的事实,这种斗争是围绕着军事和政治问题展开的。他指出,这一斗争的根据,仍然是中国民主化的原则问题——国民党领导人曾千方百计地要破坏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并且阻止国内的民主化进程。现在,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新的武装冲突的条件正在成熟。在华北,特别是在东北,形势越来越紧张。美国对中国的援助不仅不能缓和这种白热化的气氛,反而给国民党提供了加强反共斗争的条件。

郭沫若指出,马歇尔和魏德迈离华返美以及给中国政府提供巨额美国贷款,为国民党加紧准备发动内战创造了有利条件。郭沫若在分析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如果美国不能把中国作为反苏的进攻基地,那么它至少会以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苏联影响的扩大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发展。

在谈到中国反动分子的反苏活动问题时,郭沫若讲述了教育部副部长朱经农于 1946 年 4 月 8 日为重庆几所大中学校的学生所作的报告。朱经农在报告中强调,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着两种帝国主义,即英国模式的白色帝国主义和“苏联赤色帝国主义”。朱经农在叙述“赤色帝国主义”的恐怖时,力求使听众相信,红军在东北的恶劣行径,使中世纪的可怕暴行为之黯然失色……①

针对朱经农教授这种对苏联的恶意污蔑和伪科学的诽谤,郭沫若撰文揭露了他们为其党的利益而利用其在政府中的高位进行粗暴诽谤的行为。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洛佐夫斯基、第一远东司、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15 - 16

---

① 原文如此。——原注

№1612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东北的军事和政治形势

（1946 年 4 月 26 日）

机　密

4 月 26 日，周恩来到访。周恩来说，近日举行了最高国防委员会会议。会上，蒋介石声称，他将竭尽全力拿下长春。国民党正在积极准备攻打长春，目前在长春地区集结了国民党军队的 6 个师。在美军帮助下，他们往东北调遣了六十军和九十三军，往北平调遣了另外 2 个军。据周恩来说，共产党军队正在加强四平—长春一线，但是如果国民党把更多部队增派到长春，那么形势可能会更复杂。

至于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正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蒋介石坚决表示，只有在国民党军队拿下长春的时候，他才会同共产党谈判。俞大维、徐永昌和秦德纯力图说服马歇尔，如果长春继续留在共产党手里，那么他们将巩固自己的阵地，到时候东北的大门不仅会对国民党而且也会对美国人关上。4 月 25 日马歇尔邀请周恩来并问道，他能否为改善东北的状况提出具体办法。马歇尔设想，如果共产党方面同意东北的某些地方由国民党军队控制，那么他会更有把握达成国共和平协定。然而，周恩来说，他没有任何具体建议。周指出，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东北问题上对国民党做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再做出让步。况且，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对 1946 年 2 月 25 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中规定的东北国共力量比例不满意。延安方面认为，将来国民党和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应当是对等的。

马歇尔由于担心完不成他的使命，美国也“丢面子”，决定通过张君劢、张澜及其他民主人士做工作，他请他们说服中共不要想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目前根本问题是政治问题。

周恩来对民主人士说，中共并不打算在东北建立一党统治，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合作，但他们不允许把东北变成反共的基地。他强调，目前的根本问题是铁路交通问题。

马歇尔深信，国共两党都不愿意互相做出让步。马歇尔于 4 月 23 日向国共双方代表提出了关于东北问题的协议草案，蒋介石否认了这一草案，至于共产党方面，他们向马歇尔表示，原则上同意该草案，但需要进行一些修改，他们坚持要完全停止在东北地区的军队调动。因此他们认为草案第一项中所说的“将对停止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调动提出进一步的指令，下述情况除外”一句中“下述情况除外”字样应删除。

共产党方面认为,2月25日关于改组军队的协定应当重新修订。因此,草案第二项所说的“关于东北地区各方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要根据1946年2月25日改组计划做出。占领地带将由‘三人小组’确定。派往东北的六十军和九十三军的调动将告结束”,这段话应改成:“关于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下一步的安排问题将由‘三人小组’决定。”

周恩来表示,现在说不上接收主权,因为苏联军队已撤出东北。因此,共产党方面提议从草案第三项中删除“为了接收主权和保证主要铁路的安全”的字样。草案第三项应该表述为:“东北地区各方面军队今后的调动必须得到‘三人小组’的特批。”

草案第四项共产党方面完全同意。

马歇尔先对周恩来对第三项的意见给予回应。他说,草案中所说的国民党军队在东北调动是为了接收主权并没有实质意义,因为这一调动只有得到“三人小组”同意才能进行。

接着,周恩来指出,马歇尔承认共产党在东北的力量壮大了,因此他才会同意修订军队改组的协定以及其他已通过的决议。

我问周恩来,目前蒋介石对苏联、中共和美国持什么态度。

周恩来回答,蒋介石对苏联持敌对态度,他害怕苏联;对中共他是敌视的。至于他对美国的态度,不能说他们之间不存在分歧。但是目前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欺骗美国人,以便获得美国的经济援助。

我问周恩来关于美国给中国提供借款的情况。

周恩来回答,美国原则上同意借给中国5.6亿美元,但是在国共两党内战停战之前,他们大概不会提供这笔借款。

周恩来说,马歇尔告诉他,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期将撤离中国北方。马歇尔建议让国军调两个军到中国北方以便接收因美军撤退而留下的据点。共产党方面反对国军两个军调往北方。

周恩来说:“美国人大概真的将从中国撤离,因为他们不便直接支援蒋介石打内战;他们将用迂回的方法支援蒋介石。”

谈话最后涉及张学良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在东北建立临时政府,并在改组蒋介石东北行辕及其属下的政治和经济委员会之后,释放张学良。周恩来不久前收到了莫德惠转来的张学良的信。根据来信看,张学良对中共态度很好。周补充说,无论如何,在原东北的高官和将军中,张学良最正派,而且可以说,他对中共和苏联都持友好态度。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 Л. М. 米克拉舍夫斯基和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洛佐夫斯基、大使馆档案室

1946年4月16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43 - 47

№13270

科瓦廖夫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中共、日共和朝共人员情况

(1946 年 5 月 4 日)

机 密

致 A.C. 潘友新同志：

《调 查 报 告》

以下为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的人员数量：

(1) 截至 1945 年 4 月，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共计为 121 万人(取自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毛泽东在 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期间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

(2) 据 1946 年 4 月 16 日《时事》通讯社的报道，日本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为20 000 人。

(3) 朝鲜共产党的党员人数共计 60 000 人。其中 30 000 人在南朝鲜(根据苏联驻汉城的总领事于 1946 年 2 月 10 日的通报)，30 000 人在北朝鲜(根据苏联武装力量政治管理总局第 7 局 1946 年 3 月 1 日的通报材料)。

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①太平洋司司长

E. 科瓦廖夫

1946 年 5 月 4 日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3, л. 41

---

① 自 1943 年 5 月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联共(布)中央(1952 年 10 月以后改称苏共中央)成立了专门负责与各国共产党联络的机构，其名称及分工变化比较复杂，据查，基本情况如下：1943—1957 年，称联共(布)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ЦК ВКП(б))和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全面负责与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在此期间，其名称又有变化，1943 年 6 月 13 日至 1945 年 12 月 29 日称联共(布)中央国际政策部(Отде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ЦК ВКП(б))，1945 年 12 月 29 日至 1948 年 7 月 10 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ЦК ВКП(б))，1948 年 7 月 10 日至 1949 年 3 月 12 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联络部(Отдел внешних сношений ЦК ВКП(б))，1949 年 3 月 12 日至 1952 年 10 月 13 日称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ВКП(б))，1952 年 10 月 13 日至 1952 年 10 月 27 日称苏共中央对外政策委员会(Внешне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1952 年 10 月 27 日至 1953 年 3 月 19 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1953 年 3 月 19 日至 1957 年 2 月 21 日称苏共中央与外国共产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иностранн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1957 年 2 月以后该部一分为二，负责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партиям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1988 年 10 月改成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而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系的称苏共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вязям с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ми и рабочими партиям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стран)，简称苏共中央联络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又称苏共中央社会主义国家部(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по соцстранам)，苏共中央第二国际部(2-ой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КПСС)。

№13271

格缅德尔致科瓦廖夫报告：满洲政治局势尖锐化的原因

(1946年5月8日)

将“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的报告(27页,2份)寄给科瓦廖夫同志,以补充“关于满洲政治形势”的报告。

附退还原件38页。

Б. 格缅德尔(签名)
1946年5月8日
第822号

附件：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

近一段时间以来,满洲的局势急剧尖锐化。在苏军于4月初从沈阳和长春开赴南满之后,以中央政府军为一方、以八路军和东北民主联军为另一方的战斗开始激烈起来。

战斗在长春以南的四平街和公主岭地区,以及在沈阳东部、东南部和南部的煤炭钢铁基地抚顺、本溪、鞍山地区进行。上述各据点有100多个县级市,包括控制在人民武装力量手中的“满洲国”首都长春。据中国方面的资料,长春约有50万人口。政府军由第一军、第六军、第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和第九十四军组成,驻扎在沈阳,并且掌控着沈阳至天津的铁路沿线。通过这条铁路,政府军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美国运来的武器装备。近来中国政府向南满战区空降了8个军：第六十军、第九十三军、第九十七军、第五军、第二军、第五十四军、第四十八军和第五十三军以及一个军事工程团。这样,政府集结了由30个师、3个保安团和1个军事工程团组成的总计51.2万人的军队,占政府军总兵力的1/3以上,来对抗满洲的人民武装力量。

所有上述驻满洲的部队都受过美国军官的特别训练,司令部驻有美军教员和顾问,还有美国武器和技术装备。中国飞行员在美国飞行员的指导下操纵美国飞机,进行了一次超大规模的集结。此外,政府军的侧翼渤海湾方面,由美国海军第七舰队防护,并以“租让”的方式转交给中国,但仍由巴尔比来指挥。去年11—12月,政府军同八路军在满洲冲突期间,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美国海军陆战队进行了一次大集结。今年在南满发生的

冲突中，美国军队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进去，但向中央政府军提供了决定性的物质和技术援助。

尽管拥有大量的武器和技术装备，但前一阶段战役的结果，政府军并未取得优势。4月9日，在沈阳南部的本溪争夺战中，第六军的第十四师被全歼。4月16日，在塔湾(Дава)战役中，第八十七师被全歼。而在4月26日，新编第一军第三十师在四平街战役中被全歼。4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攻占了长春，歼灭国民党大部分部队，俘虏7 000余人。蒋介石命令杜聿明等无论如何也要拿下长春，日前正集结部队准备新的战役。八路军和驻在四平街、公主岭、本溪等地的东北民主联军不断遭到炮击和空袭，但他们仍在坚守。

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希望通过马歇尔将军——他为了就满洲问题进行谈判和达成具体协议而再次来到中国——进行调停的一切新尝试，都被蒋介石拒绝了，军事冲突愈加尖锐化。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究竟是什么呢？

国民党反动报刊以及英美的反动报刊试图这样描述事件，似乎问题主要在于中国共产党得到了苏联的支持，阻碍中国政府接收满洲和确立主权。

国民党报纸《……》①不久前刊登了杜撰的苏联同中国共产党签订的条约，这一杜撰的说法被中国国民党其他报纸大肆宣扬。英国报纸《星期日泰晤士报》5月6日还试图把满洲局势恶化的原因推在苏联身上。报纸评论员斯克鲁杰伊托尔表示："部分红军是这样安排事情的，当他们放弃长春和哈尔滨时，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就可以进入这些城市。"因此，他写道："国民党政府面对的问题是，如果它想得到这些城市，就不得不进行战斗。"

斯克鲁杰伊托尔对苏联进行诽谤，说"苏联想削弱中国，阻碍中国的统一"，还建议美国人直接、坚决地干预满洲事务。他声明说："美国人不得不采取更为强硬的立场，如果他们想反对这种策略的话。"

但实际上，反动报刊还是承认了局势恶化的原因。这些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与中国人民及其民主力量之间巨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国民党政府完全不顾今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努力保持和追求国民党在全中国建立专制制度。而中国人民和民主力量努力实现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满洲问题的决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在民主协商的原则基础上改组国民政府的决议。

在满洲，这一基本矛盾从一开始就具有极其尖锐的性质，因为国民党政府过去不愿、现在仍然不愿让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适用于满洲，不希望赋予满洲居民以民主权利，试图使用武力在满洲确立国民党专政制度。

自然，满洲居民强烈抗议这种政策。由于红军进入满洲并打败了日本占领者及其傀儡，居民拥有了广泛的民主自由，这也就激起当地居民为保护和巩固这些自由而同蓄意干涉这些自由的中央国民政府任命的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斗争。

---

①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字迹不清，无法辨认，均以删节号标示。——译注

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出版的省报《工商日报》,刊登了中央政府在满洲任命的中国政府高级官员。文章中写道:

“被派到满洲的人并不了解地方形势,并且与当地的居民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必然引起普通民众的反抗,因为我们在满洲委任了一些老满洲干部,他们根本没有参加过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在14年间他们也完全没有帮助过自己的同胞反对日本侵略者。他们只考虑自己的从前的资本,并希望自己的资本能重新恢复昔日的景象,根本不考虑满洲居民是否会高兴地欢迎他们。因为我们的目标是满洲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那么,这不仅会恶化我们与市民的关系,而且一定会削弱我们同苏联的友好关系。”

的确,所有或者几乎所有被任命的满洲政府官僚和国民党党务工作者都是根深蒂固的反动分子。在国民党中居主导地位的法西斯集团“CC派”(以陈立夫和陈果夫为首)早就开始挑选他们了,他们从那些在1931年至1932年间将满洲拱手奉送给日本侵略者的满洲旧地主、军阀、官僚中创建了满洲分部,并把他们派到了中国的中部地区。中央政府驻满洲的所有省级官员都属于这一集团,其中包括:徐减哉(辽宁)、关吉玉(松江)、高惜冰(安东)、刘翰东(辽北)、郑道儒(吉林)、吴潮涛(合江)、韩俊杰(黑龙江)、彭济群(嫩江)、吴焕章(兴安)。

关于他们中有一些人可以说得更具体一些。比如,安东省省长高惜冰在1928年至1930年间,曾担任东北边防局局长,并积极参与了中苏之间在中东铁路的冲突。1934年至1935年间,他又领导新疆教育部和吐鲁番特别办公室,在那里他也从事反苏活动。现在他和齐世英(Цзи Ши-ин)、王寒生(Ван Хань-шэн)都是CC派组织东北分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这个法西斯集团在满洲问题上的计划明确地反映在该集团于1945年11月25日在重庆组织召开的所谓东北同乡会会议上,这次会议由王寒生主持。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其他决议的内容如下:

“坚决(向东北)派遣平叛部队,以清除内部叛乱和消灭土匪。建造一座附属于平叛部队的慰安楼(可以认为是秘密杀人的处所)。

“针对《新华日报》发布一则警告(中共中央代表就满洲问题发布了一个声明,一些满洲民主人士也发表了一些声明)。

“发布反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袖的声明。

“就上述事宜向国民政府寻求帮助(也就是需要立即阻止上述计划)。

“赞同杜聿明将军(被派往满洲的政府军指挥官)的行动。”

(塔斯社1945年11月25日报道)

事实证明,接收满洲的上述官方机构都支持这一解决满洲问题的计划。

从一开始,被派来接收满洲防务的政府军都被赋予了“平叛”的使命。能证明这一点的首先就是这支军队的指挥官的组成。这支军队的指挥官杜聿明将军以前是驻守昆明市的守备部队的长官。1944年他被特地派往昆明,镇压不断高涨的大学生和中国民主同盟组织的民主运动。关麟征(Гуан Лин-чжен)将军命令他的部队维护昆明的秩序,关麟征将军在

1945年11月曾下令向反对内战、反对美国干涉中国的大学生游行队伍开枪。作为对中国舆论界发出的抗议的回应，官方的报刊报道说，他好像已经被解除了职务，并将得到惩处。但是他不仅没有得到惩处，反而被任命为由杜聿明将军配属的第五十二军军长，并被派往满洲。

从杜聿明部队的行动一开始，就可以发现这支部队的"平叛"使命。这支部队没有按照同苏联军事当局达成的协议被空降到沈阳和长春，其指挥官以缺少棉衣为由，认为使部队经过河北-热河-辽宁一线从八路军占领的解放区到沈阳的计划更好一些。在这一问题上，这支军队的参谋部制定的计划没有考虑到要同八路军司令部就军队通过这些地区达成协议。这支军队的指挥部的计划恰恰是希望在途中消灭八路军的部队，夺取上述解放区居民赢得的民主成果。出于这些考虑，杜聿明将军和熊式辉将军拒绝了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多次提出的关于他们在长春设立参谋部的建议，并且他们认为，把自己的参谋部设立在……更好一些，从这里他们可以指挥作战，从南面"占领"满洲。

尽管确实希望和平解决中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其中包括满洲问题，中国政府应当考虑到如下事实：满洲居民遭受了日本侵略者14年的殖民统治，他们不可能不利用伪满洲国覆灭的机会，在中华民国的范围内建立起民主自治制度。中国政府也应考虑到，满洲居民不能容忍把权力交给那些他们曾亲眼目睹与日本侵略者合作并背叛了自己祖国的人。但是这两点中国政府都没有考虑到，并特别向熊式辉将军下达命令，禁止当地居民建立任何形式的自治机构，同时任命一些当地居民都熟知的、曾公开与日本侵略者合作的人到沈阳、长春、哈尔滨市的权力机构中任职。正如《长春日报》在1946年1月13日关于中央政府在满洲的人员任命的社论中所指出的：

"满洲人民急切地期待着中央指派官员到我们这里工作。但是，当我们得知，曾与日本人积极合作的一些叛徒被任命到一些重要岗位上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失望呀！在东三省被日本奴役之后，涌现了许多爱国者，他们与敌人进行了斗争。但是，叛徒忘记了他们是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听从日本人的命令。可以说，在日本人统治时期在我们的地区占据重要职位的人都是叛徒。而所有受到排挤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和志同道合者。可以根据这一点挑选人员担任国家公职。如果允许叛徒到国家机构工作，那么就不能保证他们不再次同敌人合作。"

《光明日报》(全满洲苏中友协机关报)对中央政府的指责更为直接，它在1946年1月9日就沈阳权力机构人员的组成作了如下报道：

"沈阳是南满最重要的工业中心和政治中心。沈阳权力机构的组成应当为东三省许多市县做出表率。但是，对沈阳市长董文宇(Дун Вэнь-юй)的任命却不是这样，他挑选的市府官员是从北平带来的，其中一些人都是反人民的。

"比如，被任命为市府高级秘书的蔡雨田(Цай Юй-тянь)是华北'自治'时期河南省一个较大的县的县长。他是否曾同日本人进行过合作，这让人深感怀疑。市府监察部部长王志全(Ван Чжи-цюань)在日本人统治时期是北平保安局的一名局长。除了上述人员之外，沈

阳市府中还有原‘满洲国’机构中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王崇古(Ван Чун-гу)、刘元春(Лю Юань-чунь)、王北超(Ван Бэй-чао)等,他们都曾在‘满洲国’担任要职,而现在又在得到解放的沈阳市占据重要职位。不仅市府的职员,而且所有居民,在得知那些过去曾与日本人合作的人担任了要职之后,都对此深感不满。”

熊式辉却为这种情况进行辩护,他在1946年4月26日沈阳市党政军工作人员的招待会上宣称,政府对原“满洲国”的一些官员是宽宏大量的,因为满洲的局势是特别的,对这些人的态度不能像在内地一样。

中央政府在沈阳和其他城市中任命一些曾与日本人进行合作的官员,这不是偶然的。这主要是因为它曾委托一些较为反动的分子接收满洲,在日本侵略中国时期,这些人是臭名昭著的亲日分子,他们与日本侵略者进行合作。比如,被蒋介石任命到东北担任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将军,就是亲日的“政学系”中的一员。如下一份以《党内寄生虫阴谋简况》为题的材料对这一集团作了介绍,这份材料是在国民党于1945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散发的。

“当时老政学系成员与军阀勾结,对孙逸仙进行威胁。而新政学系成员支持与日本人及其傀儡保持秘密的联系,对党国造成了危害。在汪精卫南逃之前,他们答应使他成为党的领袖并同他保持联系。

“在敌人占领了独山(贵州省)之后,这一集团甚至企图背叛党国,甚至与敌人及其傀儡合谋。在和平时期他们攫取了政府的高级职位,而一旦国家遇到灾难,他们就制造各种混乱。一些担任高级指挥的人支持这一集团,他们犯下了各种罪行……”

前交通部长张嘉璈就属于这一集团的领导人,他被特命为经济委员会的代表和中长铁路的经理。1944年他在美国杂志《国际咨询》(1月)和《国际关系》(8月)发表文章,表示希望美国投资,保证美国资本在中国占统治地位,支持与美国资本合作,共同管理中国铁路,提出了关于中国铁路的现状和发展前景的详细报告。

政学系在中国政府的官僚机构中占据统治地位。把这些人物安排进满洲的政府中,这证明,这些人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工业原料开发问题上的垄断地位,并且明显企图依靠自己与日本官员在以前建立起来的联系来接受日本的工业企业(作为赔偿)。关于这一点,应当注意《国民公报》在1945年1月20日的如下报道:与这一集团有关的一些人士向政府提出了要求,要求把满洲所有重要的矿场的所有权部分或完全转交给他们。

与政学系相竞争的“CC派”法西斯集团也企图保证自己在满洲的垄断地位。根据《参考消息》1945年第13期的资料,“CC派”得到了“大沽”铁器制造厂、“花花”丝织厂、“大华”工业公司、“华西”建筑公司、中国矿业公司和矿业银行,在1943年在交通银行方面占据了统治地位,交通银行曾是政学系集团的主要支柱。他们现在又控制了农业银行、中国矿业协会等经济机构。

满洲的工业原料丰富,这个法西斯集团渴望得到这些资源的程度,丝毫不逊于亲日的“政学系”,正像1945年9月4日在西安《工商日报》指出的那样,还在重庆的时候,这些团体

的代表就为了满洲官员的职位进行争斗，以确保对我们的贸易和工业的垄断。显然，这个经济基础支配着这些在中国政府官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团体。他们在满洲建立了残酷的专制制度，如不这样的话，他们就不能保障国外资本特别是美国资本得到规定中的服务。近些年，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以上论述中可以看出，在红军解放满洲后，当地的居民和民主力量很快成长起来，他们并不打算同对他们进行专政的反动地主、买办、高利贷商人和国民党官僚分子和平相处。当他们明白了这些反动分子在满洲的政治路线之后，他们不顾熊式辉的命令，立即大规模地在各县、市、省建立政权机关，并依靠武力进行控制。这样，在1946年3月期间，在辽宁、松江、安东、吉林、浑江和哈尔滨等100多个地区都建立了临时人民委员会，选举政府官员，讨论和通过起义纲领，打算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当地居民不想承认政府派遣的官员。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做出了选举民主自治机关的命令，以民主方式解决农业、工业、商业、贸易问题以及发展文化和教育事业等。建立民主机关，没收日本占领者和前政府官员的土地无偿分配给农民；对工业企业实行国有化；扶助农业和小作坊；在民主政权的监督下鼓励小企业主和小商贩；通过发放临时贷款的方式帮助农民恢复农业生产。

与此同时，在中共中央东北局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共著名军事、政治活动家的领导下，当地居民改革和巩固了自己的武装力量，以便对抗国民党中央政府军。

应该指出，东北人民武装部队早在日本占领时期就着手这样做了。1932—1934年为了与驻东北的日本占领者进行斗争就成立了一些游击队。1935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各游击队联合组建了三个军：东北民主联军第一路军驻在南满，由中共南满委员会领导；第二路军由周保中领导在东满地区活动；第三路军由李兆麟任总指挥，由党的相应委员会领导。1938—1939年在哈桑湖和哈勒欣河战役期间，这些人民军队从后方对日本关东军进行了打击。关东军和“满洲国”政府军使用残酷手段对他们进行连续的大规模进攻。但是日本军队并未消灭这支军队。在迎接红军进入东北时，这支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参加了粉碎“满洲国”政府军和关东军的战斗。由于当地民众大量的志愿者参军，该部队得到了壮大。此外，还在1940年，南满在就出现了一支由萧克将军领导的部队。在此前一年内，这支部队消灭了河北-热河一带广大地区的日本关东军，而此后突进到了辽宁省的南部。自从红军进入东北，一部分八路军从南方给予了红军巨大的支持，并且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根据地，使得该地区政府军消失了。

满洲局势尖锐化的根源也是国民党反动分子同关东军和日本傀儡的残余部队相勾结进攻东北居民民主力量的结果。根据新华社驻通化县城(沈阳东180公里)的报道，2月3日，日本法西斯和傀儡地下组织在所谓东方临时军政委员会的领导下进行了叛乱。国民党地方委员会书记孙耕晓成为该组织的核心人物，他把日本关东军第129师司令部的前军事长官田友(藤田)①招募到自己身边。叛乱被当地居民的武装力量镇压下去了。通化市公安

① 田友是藤田实彦的别名，曾任关东军第一二五师团的参谋长，又称“大胡子参谋长”。——编注

局逮捕了孙耕晓和田友,在审问时他们承认,国民党辽宁执行委员会是暴乱的主要组织者,领导人是书记李宽成,为了发动暴乱,他通过日本特务向孙耕晓提供了10万美金用于组织暴乱,还答应在起义成功时向日本人再提供10万美金。

田友在自己的证词中承认,暴乱得到了来自沈阳及其组织的财政支持,并得到了被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指示。暴乱的目的是为了推翻东北自治民主政府,帮助政府军清除东北居民的民主力量。

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在长春、哈尔滨、四平街、抚顺和其他一些城市一些叛徒的活动活跃起来,其活动明显具有政治性质。在这些城市中对同红军合作的中国人进行了大规模的暗杀活动。被逮捕的人员中有许多人有国民党党证,他们自己说他们属于在中央政府和国民党东北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镇压团"。1946年3月12日,经过多次暗害行动,在哈尔滨杀害了中苏友协主席李兆麟——前东北民主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3月13日《哈尔滨日报》在头版头条写道:

"李兆麟被残忍地杀害完全是中国反动集团事先精心策划的。这一事件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分子遗留人员亲手制造的事件,其目的是为了破坏中苏友好条约。这一恐怖行动完全是中国反民主的和具有反动情绪的分子所为,不能不认为是直接针对民主中国的,针对在同日本占领者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中国人民的犯罪行为。"

1946年3月15日,中苏友协支部地方委员会主席于树中在四平街被害。这一暗害行动完全是中国警察所为,不久前当他携带行李准备乘坐火车时被警察扣留。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国民党反动分子在东北积极开展反苏恐怖活动。在日本关东军和傀儡政府军队被打败后,一些残余分子携带轻武器躲进山里,拒绝交出武器。这些拼凑起来的匪徒继续向卫戍部队发动进攻,时而还进攻红军。但是,从1945年11月下旬开始,这些匪徒的活动明显具有了组织性。问题在于这些反动的国民党的走卒得到了政府和派遣到东北的中央政府军司令部的支持,赋予其行动以政治性质。在东北经常有一些号召杀害苏军被俘人员的传单出现。2月,一些苏联军官和士兵在哈尔滨、沈阳、鸡西、营口和其他一些城市被杀害。苏军撤出沈阳后,当地的中国当局制造了一系列的残害苏联公民的事件。1946年3月14日,一股中国武装部队突袭了不久前从红军中复员的士兵的房间,把他杀害后扔到上百公里外的地方。3月15日,另一位苏联公民杰明被杀害,3月16日,在一个煤场的杂物中发现了他的尸体。苏军从长春撤退后也出现了类似的事件。4月20日在长春发现了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诺沃肖洛夫和奥加涅索夫的尸体,之前他们曾被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士兵带走。诺沃肖洛夫的尸体在对外贸易代表处院内大楼的汽车下被发现,他胸口上有三处伤,头上有一处伤。奥加涅索夫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4月16日,对外贸易代表处工作人员克里沃夫在去取货的路上被子弹击中了腿部,无法继续前行。一位中国军官走到了他的跟前,掏出了手枪在他身旁射了几枪,边射边说:"苏联狗崽子,这就是国民党军官送给你的礼物。"4月20日,在益发合榨油厂内的一口老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亚历山德罗夫、罗曼诺夫斯基、库尔金和布罗维茨基同志的尸体,他们的年龄都

在19—24岁。国民党士兵在4月15日把他们从粮食出口公司的仓库内带走，在严刑拷打之后杀害了他们。被发现时，他们的尸体遍体鳞伤。死前他们的双脚都被绑了起来，用刀子砍过，然后用滚热的水烫过，他们的四肢被砍了下来，身首异处。在这座工厂的另一口井内发现了粮食出口公司工作人员伊万诺夫的尸体，他也遭受了那样的残酷折磨。他是被人用砖头砸在头部砸死的。

中国军官把苏联对外贸易代表处的工作人员召集起来，向他们宣读了上海发来的关于消灭苏联人的命令。这证明，国民党军官和警察只是执行中央的计划和命令。典型的是，中国国民党法西斯分子的所作所为就像德日法西斯一样，他们企图毁尸灭迹，掩盖自己的罪行，但这是徒劳的。

国民党法西斯分子还采取了杀害在东北的中国政府官员的手段，目的是想以此恶化苏中关系和引起国际冲突。如1月16日他们策划了暗杀中国工程师张莘夫及其随员的行动，张莘夫一行是受中国政府委托去接收抚顺煤矿的。1月9日，张莘夫及其随员们完成了此次接收任务，正如中国报界所说的那样，苏联驻旅顺军事当局对此进行了协助。1月16日，从抚顺去沈阳时，张莘夫及其随员在辽西车站遭到武装匪徒的袭击。匪徒把他们带往距车站11.5公里的地方残忍地杀害。所有的尸体均已火化，除了张莘夫工程师的尸体推迟火化外。正如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

"有根据认为，暗杀张莘夫工程师及其随员的行动是满洲的匪徒精心策划的，其目的是为了破坏苏中关系。"

中国的反动报刊据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中国政府没有阻止这种挑拨行动，反而鼓励反动报刊的活动。自然，这使破坏者深受鼓舞。

近一时期东北局势尖锐化的根源是这样的。国民党报刊和盟国的反动报刊强调应该把东北问题同全中国的内政问题分离开来，实际上，东北问题是现阶段中国总的内部矛盾的一个缩影。众所周知，由中国各政党代表和社会各界非党人士组成的政治协商委员会讨论了中国基本的内部政治问题，政治协商委员会于1月31日通过了关于重组民族政府的决议、关于改编民族部队的决议和号召成立民族委员会通新宪法的决议。顺便提一下，1月10日，由美国驻中国特别大使马歇尔将军、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将军和中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在协商的基础上发布了冲突各方停止军事活动的命令，并在北平建立了该委员会的军调部。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多次坚持说，这一命令适用于东北，以便三方委员会的军调部可以派遣代表进入东北。在三方委员会就民族部队改编原则和程序达成协议后，马歇尔将军在回国前夕，3月初建议向东北派遣三方委员代表。蒋介石极力反对这样做，但最后在3月27日，各方还是达成协议实施马歇尔将军的这一建议，派遣代表去东北。正当他们到达沈阳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就做好了进攻人民武装力量的准备。但是，沈阳的警察局极力阻挠他们的工作，这一代表团中的约40人被拘禁。经过美国代表和中共代表抗议，他们才没有被拘禁，但他们失去了同北平进行联系的设备。为了联络他们曾带有无线电台，

但军事作战区域禁止他们使用。此外,国民党机构还在沈阳出版的《中苏日报》和《和平日报》1946年4月4日的社论中对三方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威胁,一旦他们卷入冲突,将对他们采取严厉的措施。这些报纸在当时就承认,政府军将对"非法武装力量",也就是对东北的人民武装力量开展大规模的进攻。结果三方委员会的代表在东北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以吉伦将军(代替马歇尔元帅)、陈诚将军(代替张群)和周恩来为代表的三方委员会决定亲自前往满洲。该委员会应当在4月5日到达沈阳。但是国民党代表、国防部部长陈诚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前往,因此三方委员会就没有成行。

还在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前,国民党就决定在3月初撕毁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并制定旨在镇压民主力量的"解决东北问题"的计划。

国民党当局这一暗中破坏的做法和撕毁协议的行为受到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反对,他们坚持履行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要求所有达成的协议必须实施,其中包括适用于东北。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由周恩来于4月5日在长春的记者招待会上进行了阐述(这一讲话的全文见第____号公报)……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必须制止任何军事行动,如不这样就不能使相关各方开始政治谈判。

1946年5月4日,《大公报》刊登了来自南京的消息,报道说,5月3日,周恩来在当地报纸记者招待会上阐述了共产党在东北问题上的立场:

"继续进行谈判的前提条件是停止军事行动。至于政治问题,周恩来表示,共产党人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是民主的和联合的。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共产党反对把东北变成反苏和反美的地区,共产党人认为,这一地区应成为国际合作的基地。至于经济问题,所有的公用事业以及属于政府和私人企业主的企业都应该恢复生产,免受惩罚。周恩来表示,为了取得和平和安全,必须立即改编全国武装。"

共产党的立场得到中国民主联盟和东北所有民主派社会活动家的支持。例如,东北老社会活动家宁武1946年2月28日向新华通讯社声明说:"东北问题只能以政治协商委员会的决议阐述的方式解决。"东北另一位知名社会活动家阎宝航声明说:"如果在东北实现了民主,所有的问题都能立即得到解决。"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说:"应该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在东北也应建立所有政党和集团都参加的政治制度。"(引自1946年3月1日的新华社消息)

1945年12月25日,《东北文化报》发表文章,描述了在重庆的东北文化协会,该协会把东北无党派知识分子联合了起来。

文章说:"我们认为,东北政府采取的一切措施应该考虑到其不符合实际的一面。接收东北并凭借武力进行报复,这种措施是收不到效果的。毫无疑问,企图仅靠中央政府200—300万人来解决占全国八分之一人口的东北问题,最终将会失败。我们认为,解决东北问题完全取决于各方是否都参与进来,无论是不同的党派,还是独立的党派,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独立都可以加入。"

马歇尔将军已返回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了新的和平解决东北

问题的建议。5月2日，马歇尔将军在南京同蒋介石大元帅进行了座谈，同他讨论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条件。但是，共产党和民主联盟提出的关于停止军事行动的建议被蒋介石拒绝，现在的军事行动正在以更大的规模展开。有鉴于此，伦敦《泰晤士报》1946年4月24日在头版头条刊登的对东北问题的评价非常令人感兴趣。

报纸上写道："来自满洲的消息。如果不向那里提供紧急援助，满洲就会出现国内战争的危险，中央政府同共产党不久前达成的协议也会破裂。中央政府无疑会引用俄中条约的内容，按照这项条约规定，俄国军队解放满洲后应该转交给政府军队进行管理。另一方面，共产党对自己在居民中的威望充满信心。满洲现在处在大地主的影响之下，这些大地主同时也是将军、省长，甚至是匪徒。

"这些政治和经济力量在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共产党认为，反对少数阶级专政的情绪将会扩大自己在居民中的影响。统治阶级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央政府身上，中央政府坚持俄中条约给它提供的权利。共产党人反对这样的观点，他们不允许这样做，以便用武力开展人民运动。"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3, л. 42 - 69

№13272

莱基奇科致潘友新报告：关于东北地区的局势

(1946年5月11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

A. C. 潘友新同志：

根据您的指示，就东北地区的局势问题向您作如下内容的通报。

1. 在红军部队离开沈阳地区之后，国民党军队在这个地区，在3个方向上向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展开了大规模的进攻行动：沿沈阳、长春经过四平(重点打击的地方)的铁路线；沿沈阳、海龙、吉林经过抚顺(煤矿)的铁路线以及在安东[1]和营口的主要方向上，以打通沈阳至大连(大连港)的铁路。

参加这次针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军队的进攻行动的国民党7个军的兵力，呈楔形状态部署，其最高点在四平市，左翼在热河市的东南地区，右翼在营口地区。国民党军队和

① 今丹东，下同。——编注

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战线，环绕着这个楔形通过。

目前，最重大和最激烈的军事行动，在四平地区和本溪湖方向上。

2. 国民党军队兵临四平市，并占领了沈阳和营口的铁路，参加这些战役的国民党军队是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些部队完全是美式武器装备，他们全部接受过在美国教官指导下的培训。

除此而外，借助于美国海军的帮助，国民党分子才能把自己的绝对优势的兵力集中到东北地区的这几个方向上，以实施针对中国共产党军队的行动。

美国人还对东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提供了巨大的援助，向这些部队全面提供各类军事给养。

美国人对国民党军队最实质性的帮助，是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干涉中国共产党军队在山海关、沈阳铁路线的最重要枢纽站上的部署。例如，美国小股的警备部队部署在山海关、葫芦岛、锦州和沈阳地区。北平、天津，包括塘沽港地区，也处于美国军队的控制之下。占据着这些地区，美国人阻碍八路军华北队伍与自己在东北地区的部队的联系。

3. 除了上述所说的占据着沈阳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国民党正规军之外，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在东北地区通过非法途径，组建了由“满洲国”军队的残余分子、红胡子分子(地方对匪徒分子的称呼)和所有亲日分子参加的队伍，这些亲日分子由于自己的背叛行为曾经受到人民政权的打击。这些国民党的非法队伍被召唤同东北民主力量的武装部队进行斗争，他们还通过秘密的方式在各地方建立国民党政权，并给在东北地区的红军部队制造令人难以忍受的环境。

由所谓的东北光复军司令部，对在东北地区组建非法武装力量的工作实施总的领导。现已查明这支队伍是由地方的军队——第一、第二、第三、第十一和第十五军组成的。所有这些部队都是由独立的支队组成的，他们分散在东北广阔的地域里，主要是矿区，尤其是东北的东部地区。

目前，这些地区的绝大部分已经被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封锁。这些非法武装力量总计有8—8.5万人。

附东北地区地图——只给收件人。

上校莱基奇科

1946年5月11日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013, л. 70－72

№16135

洛佐夫斯基致对外贸易部函：辽东半岛的经济状况

(1946年6月24日)

外交部获悉，由于东北地区的国内战争，辽东半岛的原料和燃料运输在3个月前已中断，因此，担负20%任务的大连市工业企业被迫停止生产。5万名从业工人中近期有1万名下岗。近70%的工人失业。苏军司令部已指示工厂厂长要给下岗人员尽可能保留一半工资和粮食配额。粮食供应状况依然紧张。目前辽东半岛仅有居民半个月的粮食储备。希望从山东省(共产党军队控制地区)通过中国商人用工业品交换获得数千吨粮食，如果中国中央政府在美国军舰帮助下成功包围山东，那么这条获取粮食的通道将被关闭。大量失业、食品供应不足和物价飞涨，造成辽东半岛民不聊生。国民党反动分子利用当地的困难进行反苏宣传。

请告诉我们，外贸部在给大连运送粮食、原料和燃料方面有些什么办法。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洛佐夫斯基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34, п.254, д.32, л.66－66об

№16137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国共力量对比等问题

(1946年6月27日)

机　密

6月27日周恩来到访，我与周恩来会谈内容如下：

谈到中国国内局势问题，周恩来说，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状况类似苏联在国际舞台上

的状况：苏联力图保护小民主国家的利益，而英国和美国却拉后腿；中国共产党保护解放区的利益，而国民党企图消灭解放区，况且在国民党反对中共的斗争中，美国完全站在蒋介石一方。

提到美国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声明中所说中共曾向美国提出要求为其军队提供武器和教官一事，我问周恩来上述声明是否属实。

周恩来回答说，援助中共军队的问题是在讨论整个中国军队重组纲要时提出来的，当时谈到国民党军队缩减到50个师，而共产党军队缩减到10个师，并提出对总共60个师提供同等援助的问题。然而，由于蒋介石方面的反对，这一问题并没得到解决。

后来中共没有再提这一问题。当提出对中国军援的法律草案时，现在又谈起上述问题。美国官方人士关于援助扩大到共产党10个师的声明，是为了表明美国对似乎很需要这种援助的中共的公正态度，并以此为其对国民党的援助辩解。

我表示想了解周恩来对国共谈判和两党关系前景的评价，周恩来回答说，蒋介石一方面同中共谈判，另一方面借助武装力量对中共施加压力，以达到使其把军队撤离主要铁路干线地区和大城市的目的。他企图把中共军队赶往黑龙江、嫩江和兴安的荒漠地区，使他们失去哈尔滨、牡丹江、白河、安东、通化、察哈尔、热河、威海卫、烟台、江苏北部和安徽北部。在此前提下，他同意把延安、张家口地区、山西东南部、山东省的泰安和临沂地区留给中共。蒋介石的计划其用意是切断中共的交通线，割裂中共的各个根据地，并剥夺解放区人民已获得的自由权利。

中共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一计划。中共准备在某些问题上做出让步，例如，同意授受停战的建议，把部队撤离前线20里，并恢复交通，但其前提条件是目前掌握在中共手中的交通线仍由其控制。国民党政府可以实施这些交通线的一般管理，但不能派去军队。

国民党提出赋予美国人仲裁权，尽管它清楚知道共产党是不会同意的，它企图挑起中共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共产党人识破了国民党的这一伎俩，采取了相应的反击措施。否决了关于仲裁的建议，共产党人对美国人做出了小的让步，是为了把他们争取到自己的方面。例如，同意赋予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成员在某个调停组发生分歧时向军调部和“三人小组”报告的权利，调查争议问题的权利以及对军调部命令执行情况检查的权利。国共谈判中的障碍是军队的改组和部队的部署问题。中共不同意把军队部署到国民党建议的那些地区，那里的税收收入很少。中共同意重新部署自己部队的前提条件是：共产党军队撤出的那些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仍留在中共手里，直到改组政府和建立民主体制，同时国民党不派部队到这些地区。例如，中共将从烟台撤出自己的军队，这并不意味着国民党可以把自己的军队派进去并在那里建立自己的行政管理机关。离这个港口不远的共产党军队可以在任何时候用武力制止国民党夺取这一港口的企图。共产党人也可以同意把江苏北部的驻军减少到2个师，但不允许国民党往那儿派军队。

值得注意的是，马歇尔认为中共的这一计划也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之一。

周恩来声明：中共中央准备向国民党做出让步的只有哈尔滨，无论如何不包括东北的其他地区。中共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强攻夺取哈尔滨不会成功。林彪将军6月6日前已准备好撤离哈尔滨的命令。然而，周恩来成功地争取到停战，因此至今哈尔滨仍在中共手中。现在中共同意放弃哈尔滨，而国民党不得派军队进驻。市长必须是无党派人士，进入市政府的应当包括当地市民代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放弃哈尔滨对中共不会造成严重损失，如果它因此能保住安东、齐齐哈尔、牡丹江和洮南。

马歇尔非正式地提出，国民党可以同意三省(兴安、嫩江和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由共产党人担任。但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考虑派出自己的人员或至少由当地无党派人士担任另外两省——合江和松江省政府主席。

接着谈到东北各方军队力量对比的问题，周恩来说，中共要求允许其在东北拥有5个师(根据重组军队协定是1个军含3个师)，而国民党有5个军。

综上所述，周恩来表示，国民党不会接受中共提出的条件。按国民党的计划，共产党人必须让出苏北地区、山东半岛、热河和察哈尔以及通往北平、天津、安东、牡丹江等地的要冲。共产党人也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因此，国民党将采取武力。

蒋介石准备进攻济南地区和苏北。实施这些战役将由汤恩伯、杜聿明和孙立人的部队来承担；这些战役的作战计划已经制定。

说到东北，首先攻击的是哈尔滨，也可能是安东。

周恩来接着说，马歇尔非常清楚，中共不会接受国民党的条件，国民党也不会接受中共的条件。他还知道，内战重起可能导致三个大国对中国事务的干预，这对美国将是不利的。因此，他既对中共也对国民党施加压力，力图迫使他们互相做出让步。共产党人准备对国民党做出某些让步，这也使马歇尔感到欣慰。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并强调它不想考虑马歇尔的意见。这样，破坏谈判的责任就要由蒋介石承担。然而，蒋介石未必会在巴黎外长会议结束前就开始全面内战。他对他的军队是否能顺利完成摧毁中共军队的任务也没有完全把握。因此，蒋介石在向中共发起进攻之后还会力图留有后路。

我询问国共在东北以及在整个中国的力量对比。

周恩来回答说，共产党人不得不放弃大城市和主要铁路干线。在山东、河南、河北和山西省，国民党军队将遭到重创。在热河省和苏北，共产党军队将受到挤压。蒋介石最终能拿下哈尔滨，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将力图收复一些其他城市。

周恩来说，国民党的进攻计划完成期限为5个月。周恩来承认蒋介石能夺取主要铁路干线和大城市，但他不能消灭共产党军队的有生力量。

会谈接着又涉及国民党各派别对内战的态度问题。周恩来说，百分之九十的国民党将领赞成内战。他们把内战视为自己的救星，因为军队整编将使他们失去地盘。主张内战的还有CC派分子和部分三青团员。政学系人士的态度有些不一样，他们反对内战，因为战争的延续会使国内经济状况更糟。因此，他们认为，国民党应当通过政治上施压以获得中共的让步。至于孙科，他一般采取犹豫不决、摇摇摆摆的态度。冯玉祥和李济深的态度要明

朗得多。例如,冯玉祥表示,共产党人要准备内战并打消蒋介石打仗的念头。他建议那些立场动摇的所谓“灰色”将领们要以高树勋将军为榜样,即转身中共方面。

我问周恩来,蒋介石是否准备出国。

周恩来回答说,美国政府想邀请蒋介石访美,马歇尔将军的顾问司徒雷登曾问起中共对蒋介石出国的看法。周恩来当时回答,蒋介石一旦出国,那么反动分子会立即重开内战。

对于我关于宋子文状况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宋子文受到来自CC派、政学系和孔祥熙方面的攻击。然而,蒋介石不大可能除掉宋子文,因为宋得到美国的强大支持。关于可能罢免王世杰的传闻也没有根据。王世杰的确不断受到CC派分子的攻击,但他得到宋子文和陈诚的支持。过去王世杰是中国政府中亲英派的首领,现在他的观点有些改变。他现在是中国亲英美温和派的民族主义者。

周恩来在回答我关于中国各界对解决新疆冲突的反应的问题时说,政府人士不反对同伊宁达成的协议。但是,在当前国内政治形势下,过分强调这一问题对国民党不利。

周恩来对张治中给予肯定地说,他是蒋介石手下最正派的人之一。张治中前往乌鲁木齐对中共在与国民党谈判问题上是一大损失,他在谈判中起了正面作用。蒋介石可能把他召回南京,以便让他找到国共之间的共同语言。

会谈时在座的还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以及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3份,送:莫洛托夫、洛佐夫斯基、档案室

1946年7月8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8, п. 38, д. 597, л. 86 - 91

№0912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东北地区的内战局势[①]

(1946年7月24日)

……

苏联内务部通过谍报手段,获得了以下关于东北军事行动的情报。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根据今年7月20日的情报，八路军的部队得到了加强，在6月下半月和7月里，在与苏联交界的东北黑河、东安(Дунань)等地区继续与国民党军激战。此外，在三江、牡丹江和间岛等地区也在进行个别军事行动。

结果，八路军部队基本上歼灭了国民党部队，收复了国民党以前占领的所有城市和其他居民点，完全控制了上述各地区。

被消灭的国民党残余部队遁入森林，进行土匪活动，反对人民革命军。

黑河地区

根据内务部哈巴罗夫斯克区边防军境外谍报，国民党对黑河市(省会)和瑷珲镇(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以南30公里)发动了进攻。

国民党部队在王群林(Ван Чун-лин)指挥下占领了黑山和东宁镇(绥芬河车站以南40公里)，带着大批东西退回哈尔滨。

位于牡丹江(省会)的人民革命军军校学员按照统帅部的命令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间岛地区

今年6月底，人民革命军部队在纳尔干(Нарькан)和瓦克米克(Вакмик)地区(符拉迪沃斯托克以西150公里)发起进攻，消灭了国民党军第八师。

西满各地区

根据内务部边防军太平洋谍报机关的情报，从今年6月底起，在哈尔滨市和佳木斯市(三江地区中心，离西南方向的哈尔滨290公里)地区发现，人民革命军正加紧向牡丹江地区调动。在哈尔滨—牡丹江一线(沃罗雷洛夫市西北195公里)集结的人民革命军部队达20万人。

在吉林的长春(新京)也发现类似调动，部队调向间岛地区。今年6月24日，从上述地区向珲春市(符拉迪沃斯托克西南130公里)调去约3万人民革命军部队，带有技术装备、弹药和工厂设备。

经过连续战斗，人民革命军部队占领了同江市(比罗比詹市西南110公里)。

6月底，人民革命军第一师在新山镇(比罗比詹市西南225公里)粉碎了国民党部队。

现在，人民革命军第八独立团驻新山镇。城里部队10 000人。其中4 000—6 000人是战斗之后从长春(新京)调来的。

东安地区

根据内务部太平洋地区边防军的谍报，人民革命军正在东安地区进行激战，目的是夺得国民党的根据地。

ГАРФ，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д. 138，л. 291－294

№16152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关系及苏联的态度

(1946 年 7 月 25 日)

机 密

7 月 25 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我与司徒雷登会谈内容如下:

司徒雷登说,他已经与蒋介石谈过,并了解他的心情,在采取行动之前他想同周恩来谈一次。他补充说,他应在 7 月 25 日与周恩来见面,但是后者提出推迟会见,因为他从开封回来后感到很累,在那里他参加了黄河改道问题的谈判。同时,在昆明爆发并扬言扩展到上海的恐怖浪潮引起的神经紧张,导致陶行知的健康状况恶化,他的心情也不好。

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在与他谈话时保证,在解决军事问题之后解决所有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怀疑共产党方面是否会相信政府的诚意。

我说,依我看,军事问题和政治问题应当同时解决,这是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规定的。先解决军事问题,后解决政治问题的建议不能不引起哪怕缺乏经验的政治家的怀疑。

司徒雷登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蒋介石并没受到反动分子的很大影响。他想建议蒋介石独立行事,但是作为蒋介石的朋友,他似乎不能违反众所周知的规则,并建议他拿下某个反动人物。

我说,我感到不理解的是,虽然国民党内有不少温和的自由派人士,然而中国政府的政策正在受到一帮反动分子的强烈影响。

司徒雷登说,看来问题在于,这些反动分子更接近蒋介石,因此他们能对他施加自己的影响。

接着,谈到陈立夫的问题。司徒雷登说,陈立夫未必能持续其反动活动:或许他会看到自己在国外名声不好而放弃原来的观点,或许蒋介石认为他的这位忠实信徒带给他的弊大于利而抛弃他,或者至少不再听他的意见。

我问司徒雷登如何评价孙中山夫人不久前的讲话。

司徒雷登回答说,孙夫人的讲话很有代表性,这一讲话反映了由于国内政治危机而产生的社会各界的担忧。

对我所说孙夫人在国内外尤其在美国享有盛誉的意见,司徒雷登认为,在美国孙中山夫人的知名度没有蒋介石夫人大,很长一段时间她保持沉默,因此她似乎淡出了美国舆论的视野。

会谈结束时司徒雷登表示,希望中国人民将走出困境,因为他们已不必再与日本人一

类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也不必再与清王朝打交道，而只要解决中国自己的问题。

针对上述说法，我说，正因为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是纯粹的中国问题，所以最好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这一问题。

司徒雷登对我的意见没有再说什么。

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大使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88

№16153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内战的形势

(1946年7月31日)

机　密

7月31日我应约接待了周恩来。我与周恩来进行了如下谈话：

周恩来谈到中国各个战场总的情况时表示，目前最大的战斗在4个地区展开：苏北、湖北、山西和山东。苏北3周的战事表明，国民党不能进行持久战。国民党的5个军与淮安以南的共军作战，3周时间伤亡万余人，仅夺取了3个大的居民点。

在湖北省，国民党的11个军企图包围和消灭6万人的共产党军队。然而，后者冲出包围，撤退到该省西北部，并在那里休整。

在山东省，国民党军队挤压当地人数不多的共产党部队，并占领了胶济铁路线(青岛—济南)三分之二的地区。

在山西省，共产党人取得了很大胜利，对阎锡山部队给予了沉重打击，重创了胡宗南的3个旅并夺取了6个大的居民点。

此外，在松花江地区，国共军队也进行了交战。在河北省北部、在北平—沈阳铁路沿线还发生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参战的事件。周声明，美国人的这些赤裸裸的行为有明显的威胁性和挑衅性。周说，完全有理由断定，内战将进一步扩大。国民党在热河省调集了大量军队，并将在古北口地区以及从朝阳地区向承德发起进攻。

周恩来接着指出，蒋介石想把共产党的军队从以下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赶走：大运河地区、胶济铁路、津浦铁路、承德等。这样，蒋介石可能感到更自信，到那时再同中共进行和谈。然而，中共不会把这些地区交给蒋介石，如果他们撤退，那么同时也要占领一批其他重要据点。在这种情况下，内战将具有持久性，并会暴露出国民党的弱点。蒋介石开始明白，国民党军队不够强大。有关这一点，在他不久前于桂林召开的政府公务员会议上的讲话中可以看出，蒋介石说："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战争是这一革命的一个阶段。我们未必能活到革命的最终胜利。"

涉及与国民党的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共产党人要求尽快无条件停止内战并根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改组政府。周恩来指出，政府改组后才谈得上解决其他政治问题。周强调，蒋介石在拖延这些问题的解决。

谈到马歇尔的态度，周恩来说，马歇尔完全站在蒋介石一边。按照马歇尔的意见，目前状况是可以容忍的，并给予了双方考验自己力量的机会。马歇尔认为，如果国民党想从共产党手中夺取一些重要据点，那就应给它机会借助武装力量争取达到目的。如果它做不到，那就在两党之间进行和平谈判。

周恩来指出，总有一天共产党人会向马歇尔说："您未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和平没有成为现实。您必须寻找到停止内战的其他办法。"

周恩来说，需要让马歇尔和司徒雷登感觉到，他们的现行政策不会带来好结果：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蒋介石准备靠武力夺取的那些战略据点。如果马歇尔和司徒雷登现在不采取行动，那么他们的使命就不会取得成功。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此问题的看法。

我指出，似乎没有必要向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宣称，如果他们不采取行动就会一败涂地，马歇尔知道，他的使命面临威胁，但他的态度是由美国援助国民党的总政策决定的。

周恩来回应说，马歇尔相信蒋介石所说的话，即在他从共产党手中拿下一些重要据点之前他是不会放心的。共产党人想告诉马歇尔，他的态度是错误的，因为共产党人不会交出这些据点。他(马歇尔)为什么允许蒋介石去冒这个险？周恩来说，共产党人会谨慎行事。他又补充说，他已对司徒雷登说，如果中国取得和平，美国人也有面子；如果美国的调停无果而终，这对它的威信将是重大打击，如此等等。

据周恩来说，司徒雷登担任大使后感到中国的情况很复杂。司徒雷登相信，蒋介石关于和平的承诺将会实现。他曾问过周恩来，共产党军队能否撤离苏北，周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又有一次，他建议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控制的阵地之间建立中间地带并由美军进驻，周恩来认为这不现实，并回绝了这一建议。

周恩来补充说，在与司徒雷登谈话中有时涉及一些大的问题。有一次，司徒雷登问周恩来，要使蒋介石不害怕实现和平，应当做些什么。周恩来回答："至今你们一直在帮助蒋介石，而现在你们帮助中共争取和平。你们要对蒋介石施加一定压力，促使他走向和平。只有你们能做到这一点。"

我问周恩来，马歇尔是否对蒋介石施加了一定压力，以使他更容易沟通。周恩来回答说，马歇尔对蒋介石施加了影响，但他所提出的条件并不符合共产党人的要求。美国对华

政策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希望中国实现和平，以便为经济扩张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他们不希望停止内战，从而导致蒋介石的敌人的强大。

谈到蒋介石对美国的态度，周恩来说，原则上蒋介石无条件地站在美国一边，但也不排除他有些“任性”，特别是当美国人对他施加压力时。周恩来补充说，有一次马歇尔对他说，他认为不宜对蒋介石施加太大压力，因为这可能引起他的意外的“任性”。但是周恩来指出，从马歇尔的表情可以看出，他似乎害怕对蒋介石的过分压力会促使后者出访莫斯科。

接着周恩来想了解我对把中国局势问题提交苏美英外长会议或联合国安理会讨论的条件是否成熟的看法。

我问，共产党人考虑通过什么渠道来办这事？

周恩来回答说，他们将以中共名义或通过某些民主组织和知名社会活动家来做此事。周恩来补充说，中共方面想派代表参加巴黎和会，但王世杰声称，中国派往和会的不是代表团，而只有一个代表。现在看来，共产党人被欺骗了，他们可以要求有权向和会派出自己的代表。况且，这位代表可以向各国宣告，当中国代表团坐在会议的圆桌旁时，在中国正进行着内战。

最后，由于莫斯科会议的决议没有得到履行，可以把问题提交三国外长会议讨论。

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非常害怕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国际机构讨论。于是，陶希圣受蒋介石之托在《力行日报》(Лисин Жибао)发表文章，对《大公报》进行严厉的批评，因为《大公报》表示担心，现在国外对中国内政进行干预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说，周恩来谈及的问题很大，需要全面考虑。

会谈时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杰卡诺佐夫、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91-95

№1615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的进程

(1946年8月29日)

司徒雷登在私人助手傅泾波陪同下主动来找我。

简单聊了几句后，司徒雷登说，他一直记住自己曾做出的承诺，即与我保持友好关系并

让我了解中国国内政治谈判的进程。但是过去的一个月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因此他没感到必要谈这个问题。接着司徒雷登说,近几天出现了局势改善的迹象,因为蒋介石接受了他和马歇尔的关于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这一会议应当解决改组行政院和改组政府相关的问题。司徒雷登指出:"召集上述'五人委员会'对我们来说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出路。"

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形势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处于非常复杂和危急的状态,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五人委员会"工作的前景。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认为蒋介石同意他的建议成立"五人委员会"是谈判可能取得进展的保证,而一个月前司徒雷登与蒋介石在桂林见面时蒋介石还不同意这一建议。当时司徒雷登还要求有机会与每方各两名权威代表见面,并一起具体逐一讨论存在的分歧。司徒雷登指出:"目前还难以确定将会有什么结果,但我希望局面会有所进展。"

我问司徒雷登,对于政府改组的重要政治谈判将在日益加剧的内战条件下展开这一情况,他是否感到有些奇怪。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将开始谈判的条件是完全不正常的,但是现在没有其他办法。他说,我们为制止军事行动已经做了许多,6 月份两次宣布停火。局势已很危急,为了取得进展,应当做些什么。司徒雷登指出,我早就想试一试我参与下的双边谈判方式。我们将讨论具体问题。首先要解决各个小党代表数量比例的争议问题。先要找到国共两党协商的基础,然后就比较容易与另外 3 个党派(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和无党派)商谈了。司徒雷登总结说,这样,整个局势就可能出现转机。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总统对未来的谈判是什么态度,召开"五人委员会"是否意味着总统的立场发生了某些变化:蒋介石已准备在争议的问题上做出让步,顺利解决国会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已经有了保证,那么原先的军事方面的要求是否已被总统取消。

司徒雷登回答说,最高统帅的真实意图他不清楚。以前最高统帅关于共产党军队从各地撤出提出了五点。司徒雷登说,据我理解,蒋介石在其 8 月 14 日的讲话中至少完全放弃了五点中的最后一点,即关于东北的一点。司徒雷登强调说,他和马歇尔一直力图说服蒋介石让他们能首先解决政治问题。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蒋介石对我们说:"你们干吧。"

司徒雷登说,他相信建立国务委员会后将容易改组政府,一旦建立起代表全民族和包括所有主要党派代表的联合政府,这个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将能自行解决其他重要问题,因为全国的军队和地方机构均受其管辖。

我问司徒雷登,建立国家最高权力机构这样一些重要问题的讨论,是在国内不仅没有完全的和平,而且甚至没有宣布停火的条件下进行的,难道他不认为这是非常不合逻辑的?

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这些条件不仅不合逻辑,而且简直是荒谬的。但遗憾的是,现在要消除这种不正常情况没有任何办法。问题是,由于多年的斗争,两党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现在他们几乎不可能消除互相猜疑和担心。他们在各方面互不信任,并力图保护自己不受来自对方的意外攻击。现在蒋介石要保证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的安全。他提出的每一条都有自己的理由。共产党人不想在某些地方做出让步,因为他们相信,随后又会要求他们在别处做出让步。共产党人死死盯住,不让对政治协商会议

(ПКО)决议进行修改。他们认为，如果他们在政治协商会议的任何一项决议上做出让步，那么随后就会要求他们在另一些决议方面做出新的让步。在这样一种互不信任的条件下，需要争取有所变化以促进整个气氛的改善。只有出现这种转机，才能提出和解决复杂问题。司徒雷登总结说，我们找不到恢复中国所有需要的其他和平办法。

我指出，中国的确需要和平，大家希望中国成为和平民主的国家。

司徒雷登的私人助手傅泾波立即插话说，司徒雷登将很高兴得到我的有关谈判的某些建议或忠告。

我说，对中国局势的观点我刚才已经讲了，我不打算对司徒雷登和马歇尔提出什么忠告，他们自己很清楚，中国需要什么。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和马歇尔执行华盛顿的指令，竭尽全力改变中国的现状并力图为中国人做有益的事，对他们给予友好援助，但至今未施加任何压力。

司徒雷登指出，我们的愿望只有一个，就是把中国人联合起来。

我表示将第一批庆贺中国敌对党派和解和全国联合，我问司徒雷登，共产党人对召开“五人委员会”的计划持什么态度？

司徒雷登回答说：“现在大家希望和平，只是需要克服猜疑。”他还指出，共产党人一个月前赞成他的计划，这段时间以来他们只是等待蒋介石同意这一计划。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大使馆三等秘书 K. A. 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113－116

№16164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军事政治局势问题

(1946 年 9 月 10 日)

机　密

9 月 10 日周恩来到访。

应我的请求,周恩来简要介绍了中国各战场的军事形势。周恩来表示,中共的基本任务不是保卫像承德市这样一些据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周说,中共在这方面任务完成得不错,近两个月来,在同中共军队作战中,国民党军队伤亡和被俘人数20万。主要战役在5个区域开展:在江苏北部进行了7大战役,消灭了8万多国民党官兵;在陇海铁路一带不久前打垮了国民党军的一个师,并包围了近一个师;在胶济铁路沿线;在山西和(北)平—(天)津铁路以东地区。

周说,共产党人自己放弃了承德,因为如想保住承德,则会造成军队在侧翼的重大损失。

周指出,近期国民党准备在徐州和开封地区采取重大军事行动,但共产党人坚信,国民党军队在这一地区将遭重创。在热河省共产党军队将采取行动摧毁国民党在承德、朝阳和古北口之间的交通线。

周说,据延安统计,国民党用了160万军队对付中共,也就是说,动用了85%的军队。中共指挥部提出的任务是在未来6个月内消灭这些部队的三分之一。

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军队有生力量的补充,在1 000名国民党军队预备役人员中,能上前线的一般不超过500人,这些由预备役人员组建的师,很容易被共产党人消灭。

周说,除了李先念的部队着实被打散之外,国民党军队在任何一次战役中都没能重创过中共军队的一个排以上。国民党报纸关于中共军队倒向国民党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

会谈时在座的罗申少将指出,国民党的目标是进攻张家口,并在这条战线集中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他还补充说,国民党从山东调来了部队,并从台湾调来一个师。周恩来说,为了开始对张家口的进攻,国民党军队必须在热河省以南筑好防御工事,并补充预备役人员。

综上所述,周指出,中共目前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是稳固的。会谈接着涉及"五人委员会"问题。周恩来说,提出成立"五人委员会"的建议时,无论国民党还是美国,都没有保证停止内战。而且,尽管成立了"五人委员会",蒋介石实质上没有放弃五项要求,并继续坚持要中共军队撤离一系列重要地区。

周恩来说,9月10日马歇尔提出新的建议让中共讨论,这些建议实际上是蒋介石五项要求的翻版。

周恩来把马歇尔给他的信转交给我,那封信里谈到这些新建议。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少将和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127

№16173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谈判及苏美立场

(1946年9月19日)

1946年9月19日我回访了司徒雷登。

我与司徒雷登进行了下述会谈：

司徒雷登说，他为争取中国和平尽了全力，但这方面令他很失望。尽管他有许多理由，共产党方面还是拒绝参加"五人委员会"，该会议是他(司徒雷登)为讨论改组政府问题而建议成立的。共产党方面坚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为此召开"三人小组"。然而，蒋介石总统表示，只有在"五人委员会"达成改组政府协议的条件下，他才会同意恢复"三人小组"的工作。

接着，司徒雷登指出，他对苏联将与美国一起参与解决中国问题没有失去信心。

我表示，苏联不可能干预中国内政并严格遵守莫斯科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我强调，苏联认为上述会议的其他参加者也应执行这一决议，中国政府也应关注这一决议。

我指出，坦率地说，如果双方处在同等情况下，那么中国问题是能够解决的，而国民党不断得到第三方的援助这一情况，使中国国内政治形势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进一步恶化，导致内战加剧。

接着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评价华莱士①最近一次讲话？司徒雷登说，他完全同意华莱士讲话中关于苏联的那一部分内容。他指出，美国人缺乏想象力，他们不会设身处地为别人考虑，例如，在讨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问题时，他们会忘记，如果苏联提出把巴拿马运河交给国际托管，他们会很不高兴。

我指出，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想象力不够，而在于美国不愿意理解苏联的目标和切身利益，苏联只是致力于一个目标：保证持久和平与各国人民的安全，其中包括自己领土的安全。

会谈的实质部分如上所述。

会谈时在座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1，л. 125

---

① 华莱士(Henry Wallace)，时任美国副总统。——编注

№16181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报告：民主联军代表访问滨海边疆区

(1946 年 10 月 6 日)

机 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马立克同志：

今年 10 月 3 日，中国民主联军合江军区代表团从东北到达格拉芙斯克村(边疆区伊曼市以西 4 公里)，代表团成员为：中国共产党安东省委书记吴瑞辉(Ву Жунхэн)、第三旅政委张伟潘(Чан Вэньпан)、团长王清河(Ван Чинхэн)以及中国民主联军总参谋部军工处副处长陈枚山(Чэн Мэньшэн)。

受中国民主联军东北军司令员林彪的全权委托通报，在放弃哈尔滨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将于近日到达鸡西市。牡丹江市、东安市和鸡西市将成为中国民主联军的主要战略基地。

同时，中国民主联军代表还请求给予他们弹药、无线电设备和燃料的援助。

做出上述表示后，中国民主联军的代表返回了东北。

中将斯达汉诺夫[1](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4，д. 30，л. 27

№16184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 年 10 月 14 日)

机 密

10 月 14 日司徒雷登进行了以下会谈：

---

① Н. П. 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总局局长。——编注

司徒雷登应我的请求谈了自己对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评价，他说，国共谈判可能在近期恢复。近日蒋介石会发表呼吁书，将提出较为温和和合理的建议。司徒雷登指出，另一方面，不仅我们美国人，而且中国民主同盟、中国青年党以及中国的其他小党都坚持要让周恩来回到南京。与听美国人意见相比，周恩来更会听取这些小党的意见。

司徒雷登补充说，谈判一旦恢复，他和马歇尔将只起顾问作用而不会积极参与谈判。

谈及蒋介石最近的建议，我指出，所有人不能不感到困惑，因为停火建议发表仅仅过了两天，在张家口地区的政府军就发起进攻并拿下了张家口。

针对我的上述意见，司徒雷登谈了以下内容：

10月6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争取到蒋介石同意在张家口地区停止军事行动。蒋介石承诺一旦周恩来回到南京继续谈判，他就发布停止进攻张家口的命令。同时蒋介石表示，一旦关于国务会议和国民大会问题谈判取得初步结果，他即发布全国范围内停战的命令。但是，周恩来坚决拒绝接受张家口地区停火的建议。会谈接着涉及国民大会问题。司徒雷登说，周恩来在其声明中提出关于恢复宪法起草委员会工作的建议。然而，司徒雷登指出，该委员会成员之间还存在一系列严重分歧。有些成员坚持权力集中在中央，而另一些成员主张建立联邦共和国，并实行各省的自治。关于行政院是否必须向立法院汇报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达成协议。据司徒雷登说，该委员会主席张君劢对他宣布，宪法草案80%已经完成。司徒雷登说，如果委员会恢复工作，而委员会成员认为11月初之前来不及完成宪法起草工作，那么国民大会就可能延期召开。司徒雷登强调，最主要的是要停止军事行动，并迫使所有政治派别在和平与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已成熟的问题。

会谈最后我问起报纸关于近期将签订中美贸易协定的报道是否属实。

司徒雷登回答说，在他被任命为大使之前该贸易协定就已经准备签订了。

他补充说，他(司徒雷登)没有参加谈判，只是建议该条约必须在全国停火后签订。

会谈时大使馆二等秘书贾丕才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34，п.253，д.21，л.233 - 235

№1619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 年 10 月 24 日）

机　密

10 月 24 日，在司徒雷登为我举行午宴前，我与他进行了有关中国国内政治局势问题的会谈。

司徒雷登表示愿意和我谈谈当前形势，并告诉我，共产党代表和“第三势力”代表从上海回到了首都，这表明谈判有了显著进展，尽管谈判目前仍带有非正式性质。

司徒雷登说，根据他所掌握的前期材料，“谈判参加者没有重大分歧”，且“蒋介石总统提出的八条与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十一条没有多大区别”。司徒雷登强调：“我和马歇尔在蒋介石最高统帅做出让步前对他施加了压力。”“第三势力”代表对这些条件也是满意的。司徒雷登认为，主要分歧在政治问题上，关于共产党和民盟在国务会议上席位的数量，关于政府改组和召开国民大会的程序。司徒雷登说，国务会议席位分配问题可以这样解决：除了中共和民盟 12 名代表之外，国务会议的 4 名无党派人士中的 2 名由一贯执行政协会议协议的人士担任。

司徒雷登不止一次地强调，政府和共产党在观点上的分歧并不大，谈判取得成功的主要障碍是传统的怀疑和互不信任。司徒雷登特别强调，马歇尔和他现在力图保持中立：“我们努力促使谈判成功，但不进行干预。不过，我和马歇尔时刻准备参加‘三人小组’和‘五人委员会’。”

我指出，离国民大会召开的日子不多了，我问司徒雷登，他对国民大会召开这个问题怎么看。他回答说，国民大会看来将正式召开，但他认为，大会将推迟到谈判结束。同时司徒雷登指出，蒋介石认为他定的国民大会召开日期是正确的，因为这是根据先例并在他的职权范围之内。先例就是，司徒雷登说，最高统帅蒋介石定下国民大会在今年 5 月 5 日召开，这是去年年底做出的决定，并得到政协会议全体一致通过。况且在所定日期之前一个多月，蒋介石根据惯例已宣布召开国民大会。此外，总统没有可能与政协党委会或其他类似机构协商，因为这些机构目前都停止活动了。

我问，这样会不会使国民大会变成一党召开的会议？司徒雷登回答：“是的，这是可能发生的，这将是非常不愉快的事。各方要努力使这种情况不发生。我们希望谈判成功，我们希望共产党和其他党派参加国民大会。”

我援引了报刊相互矛盾的解释后问道，他如何评价在中共和民盟代表到达南京进行谈判当天蒋介石出走台湾这件事。司徒雷登解释说，蒋介石早就想去台湾，只是因为等候周

恩来而推迟了一些时间。司徒雷登说，蒋介石曾会见过各党派的代表，今后谈判他可能不参加，何况再过几天蒋介石就回到首都了。司徒雷登补充说，马歇尔随时可能发电报给蒋介石，谈他回到首都的必要性。

我表示惊奇的是，在政治谈判这么关键的情况下军事行动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出现了新的进攻。我指出，政府军的军事计划与军事行动自然只会加剧怀疑和担忧，正如司徒雷登所说的，阻碍谈判成功的怀疑和担忧。司徒雷登表示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还说马歇尔将军会尽一切可能阻止战火扩大。同时司徒雷登试图证明，美方千方百计努力制止国民党扩大战火并停止给政府军援。司徒雷登表示，当马歇尔3月份回美国时，他认为他能解决中国问题。马歇尔力图在华盛顿采取各种具体措施以援助中国。司徒雷登说，然而后来情况再一次恶化，战火重燃，我们运用了手中所有的手段对中国政府施压。5 000万美元的货款没有提供，近几年来没有给中国提供任何武器。尽管不久前签订了将“美国剩余物资”移交中国的协定，实际上近几个月不会有任何物资运往中国，已经购买的船只也要过几个月才会移交。司徒雷登说，关于“美国剩余物资”的协定在3—4月间就已签订。我们这段时间一直拖延着，等待形势的改善，等到情况明朗。中国可能完全失去这些物资。

司徒雷登强调，在中国的美军数量很少，总共近1.3万人。

会谈至此中断，因为客人应邀入座就餐。

大使馆三等秘书克鲁季科夫会谈时在座。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1，л. 213-216

№16192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会谈纪要：中国政治局势

(1946年10月26日)

机　密

10月26日，我邀请周恩来到我处谈谈中国国内政治局势。在回答我的提问时，周恩来表示，国内政治局势很糟，军事行动将继续，显然，中共与国民党之间将全面破裂。周对自

已返回南京作了如下解释：

1. 必须面对“第三势力”(民盟)的要求。

2. 需要给“第三势力”进行直观教学，同时要让群众看到目前不可能妥协。周说，他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国民党和中共在观点上的分歧太大了；占领张家口，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和蒋介石八条的提出，实际上已经意味着破裂。国民党和美国人夸大了这八条的意义，把他们变成是“让步”，实际上没有任何让步。

他们所说的“让步”指的是：

1. 同意建立国民党和中共联合驻军的地区，但是这并不是让步，因为在政协会议期间已经达成这方面的协议。

2. 声称宪法草案在完全拟定后提交国民大会审议。然而这一决议也已在政协会议上通过。国民党还声称，这些条件中没有任何新的要求，这不符合事实。新要求可列举如下：

(1) 国民党不同意给共产党方面让出长城以内被他们抢占的地区，同时要求中共军队撤出东北并进驻黑龙江省、兴安省、嫩江省一部分和延吉的据点。

(2) 国民党要求我们承诺领土上的让步(如哈尔滨)，而与此同时它不同意交给共产党方面已承诺让步的那些地区(恢复1月13日在全国和6月7日在东北的战线)。

(3) 此外，国民党要求共产党做出新的让步，这些让步共产党以前就没有同意(如苏北解放区)。

周说，主要分歧围绕着驻军和地方政权机关问题。

周说，关于第一个问题国民党还没提出具体要求，但是马歇尔在与他谈话时已透露出，这方面的要求依旧，即要求中共军队不驻扎在这些省份，诸如江苏、热河、山东和察哈尔大部等。

关于地方自治问题蒋介石是这样理解的：只有在中共军队驻扎的地方可以搞自治。他认为，如果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某县或省的主要城市，那么全县或全省的权力就都归国民党，完全不考虑农村居民的情况。

根据国民党在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得出一定的结论：目前的谈判面临失败的命运。

周说，他现在没有与政府代表进行直接接触，而是通过“第三势力”与政府代表打交道。周补充说，政府在政治问题方面的立场是明确的，关于军事问题，在蒋介石回来之前陈诚不会做出答复。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美国态度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继续帮助蒋介石，尽管他们仍然做出姿态保持中立，但他们的中立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周表示，美国人不是考虑到停止内战是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是认为中共军队正在遭受挫折，因此停止军事行动对中共有利。马歇尔建议我们接受蒋介石的条件以争取和平，如果我们不接受，他就给蒋介石提供再开打的可能，以便迫使我们接受这些条件。

近期进行了大规模战斗，经过20天交火，国民党抢占了张家口之后又占领了19个城

市。周接着说，目前大规模战斗在下列地区进行着：

1. 在东北，国民党从三方面攻打安东；
2. 在山东，从胶济铁路区和从海上向烟台进攻；
3. 在苏北，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台和涟水；
4. 在平(京)汉铁路；
5. 在同蒲铁路，胡宗南部队在发动进攻。

周恩来指出，中共军事上受挫很大程度上是政治原因。国民党在全面破裂前不停步，手中掌握着军事主动权，进行全面进攻，在所有需要的地方集中自己的军队予以打击。我们为了争取和平进行了部分防御战；国民党军队在外线展开进攻，我们被迫在内线进行防御。在他们没有开打的那些地方，我们也没有打(如西北地区)，在他们停止军事行动的地方，我们也停了火(如东北)。

周表示，如果把占领张家口看作是破裂的象征，"第三势力"现在的努力将无果而终，最后导致破裂。我们将转入主动的军事行动，并在对我们有利的地方予以回击。

回答我的关于中共军事形势的问题时，周恩来强调，必须考虑时间因素的重要性，如果从短期看，军事优势仍在国民党方面，因为它依靠军事力量，并提到美国的支持。不过近期国民党遇到了人力资源方面的严重困难。中共依靠人民群众，中共军队的基本作战方法是运动战，而国民党坚持阵地战。周说，其原因不在于我军不善于打阵地战，而是在于我们弹药不足。例如，在四平我们坚持了40天，但为此消耗了大量弹药，以这样的代价坚守四平不值得。我们拿下了大同，但每个战士只剩下了三粒子弹。因此，我们被迫采取运动战战术：切断敌人的后方交通线，包围和消灭其小股部队，消灭其有生力量。3个月来，在苏北、华北、陇海铁路和其他地区进行的这些战斗中，我们消灭了国民党新组建的25个旅。

周强调，国民党军队的力量仅在于武器方面，他们的士气很低。中共军队真正的受挫是在与傅作义部队作战中，我们对其力量估计不足。

周说，国民党军队最薄弱的一点是人员补充不足。目前，国民党已经开始在60个征募区征召60万人。

中共军队的主要困难是供应匮乏。周指出，中共军事上的挫折在军事方面不具有特别意义。不过，他强调，失去一片地区还是会给农民群众的情绪带来影响。国民党的优势是美国援助，但是这种援助并不是无条件的，而且只是物资方面的援助。美国人直接参与作战的情况很少见，除了同美海军陆战队的接触外，其他情况没有发生过。美国空军或其他军种的人员直接参战可能性很小。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是有限的，但是它毕竟是重要因素，否则国民党的情况就会完全不一样。

周恩来总结说，这样，国民党和中共各有自己的优势和弱点，因此，军事行动不可避免地具有持久性。国民党和美国人想尽快结束战争，我们却指望打持久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不得不放弃安东、烟台，甚至可能放弃延安。

我指出，由于现在军事行动发展迅速并不利于中共，我很想听听他对双方实际军事力

量的看法。周援引说,他只掌握老的数据,他说,国民党军力不超过 200 万人。至于中共的力量,他则闭口不谈。

参加会谈的罗申少将问道,国民党军队能否占领山东、安东、哈尔滨,然后集中兵力占领延安?需要多少时间?

周回答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在 3 个月之内可能占领延安。

罗申同志说,根据他的计算,国民党在主要战线有 85 万人,包括广大的后备力量。可以投入这些战线战斗的有 250 架飞机,这些飞机将从北平、开封、太原、天津和徐州等机场调来。飞机全部装上炸弹,而且地面部队配备好弹药,需要 4 个月。

针对罗申同志所说的国民党一旦拿下烟台、安东等地将得到很大的军事优势,而中共将遭受重大的军事和政治损失,周恩来表示,所有这些地区的丧失只对后方地区和国际舆论有政治意义,而对中共及其军队不会有影响,因为共产党放弃这些城市并不是由于它不能守住,而是不想为此付出代价。中共军队将保持自己的实力和士气。所有这些城市共产党并不是打下来的,而是日本投降后占领的,甚至延安是西安事变后获得的。周说,中共不过是回到不掌握任何城市的老样子。他又补充说,如果出现妥协的可能,那我们会签订协议,如果妥协成为不可能,而且敌人想继续打,我们将奉陪。我已向"第三势力"代表声明,所提出的妥协方案比我们通过战斗得到的少。

我问,中共中央是什么态度,是如报刊所说的那样,这是最终的态度吗?周回答说,中共中央没研究过其他建议,中央的要求甚至比他在南京所讲的还要高;中央委员会的态度归结为两点:恢复 1 月 13 日前的阵地和执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共中央认为,如果要打,我们奉陪,而一年以后形势定会起变化。关于改组军队的决议可能被撕毁,现在不能提出废除决议的问题。

接着,周强调,中共不可能再作任何让步。他说,中央已经两次召回他,但他还是留下来,为的是做好离去的准备(人员安排等)。

周说,我们将继续战斗一年或几年,对国际形势的变化我们不抱希望。我们的任务是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削弱国民党。国民党的 180 个旅不可能覆盖全国,我们将在其所有薄弱的地方进行打击。

我问周恩来,他如何评价没有战火的四川、云南等后方省份的形势。

周回答说,在这些省份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在增长,主要是由于征召入伍和收税。现在中共在这些省份还不能展示自己,但是在谈判破裂之后,共产党将在那里开展活动。

罗申同志问,中共在谈判破裂之后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是要全面打垮国民党,还是像现在这样要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充分的民主?

周回答说,中共斗争的政治目的仍然是建立联合政府和实现真正的民主,共产党人将促使国民党朝这方面走。

我问,"第三势力"代表中有谁持有像中共一样的态度?

周说,完全同意中共立场的人数不多,章伯钧(第三党)、沈钧儒(救国联盟)、郭沫若,他

们不同意妥协。往下就是中间派，他们相信有妥协的可能，并努力通过劝告双方（更多是劝说中共）让步来寻求达成妥协。在"第三势力"确信国民党不会做出他们所期望的让步时，他们又再会劝我们让步，而一旦遭我们拒绝，他们才会知道妥协是不可能的。

我问，孙科是什么态度？周回答说，孙科要为自己的宪法寻找办法，因为如果国民大会开得分崩离析，那么宪法是搞不出来的。

谈判召开国民大会问题，周指出，存在两种可能性：国民党和中共的关系完全破裂和召开国民大会，或者是另一种情况——大会召开又马上延期。不管哪一种情况，它都是毫无结果的。

对当前国际形势简单交换意见之后，我提出关于陈立夫近期献媚苏联大使馆的问题，周回答说：美国人只帮助蒋夫人、宋子文和陈诚；陈立夫感到屈辱，因此他宣称自己是"亲苏"的。

我请周恩来谈谈"国民党民主同志"小组的情况。

周说，这一小组从其态度看是不错的，但非常薄弱，因为国民党本身的谍报系统非常厉害；这一小组中最知名的成员是陈铭枢、郭春涛、谭平山、侯外庐、王昆仑、李济深。

我指出，近来，连国民党报刊也表露出对美国对日政策的不满，我问周恩来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周回答说，国民党自认为是美国的老儿子，但麦克阿瑟却将这一角色给了日本，因此国民党对麦克阿瑟的这一政策深表不满。

会谈时在座的有武官罗申少将、大使馆一等秘书 B. C. 伊萨延科和三等秘书 H. A. 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34，п. 253，д. 21，л. 88－97

№09967

列多夫斯基与叶剑英的谈话纪要：民主联军的运动战

（1946 年 11 月 11 日）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A. M. 列多夫斯基与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分部工作人员叶剑英

将军1946年11月11日会谈的备忘录。

在我们总领事馆的午餐会上，叶剑英说：

一、共产党决定不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国民大会。其他所有政党都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并坚决支持中国共产党的立场。

二、蒋介石发布的有关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无效的，因为他没有预先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协商。该命令已经发到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在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人三方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宣称，他们不承认该命令，因为命令上没有周恩来和马歇尔的签名。美方也没有坚持中国共产党必须执行这个命令，他们也与中国共产党持同样的意见，即这一命令是单方面的，所以其他方没有执行的义务。

三、中国共产党此时对停止军事行动不感兴趣，因为战事的发展对他们有利而对国民党不利。叶剑英断言说，尽管丢失了许多城市，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态势改善了。

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目的是通过运动战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按共产党指挥部的计划，每3个师要消灭国民党的1个师。共产党人正在顺利地完成此项计划。经过4个月的战斗，共产党消灭了国民党34个师。用运动战的战术时，共产党有可能打算放弃占领的某些城市。指挥部选择这种战术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考虑到这种情势，共产党军队总部决定：(1) 为了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决不为了个别地区采用大规模的防御战；(2) 尽量使国民党军队分散开；(3) 在某些国民党指挥比较薄弱的地方集中力量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军队。

为了分散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总部在北平和其他地区进行了一些战役。

共产党军队总部向自己提出的近期目标是：消灭蒋介石60个师，以使军事力量的优势转到自己方面来。

这一计划已经趋向完成——已经消灭了国民党的34个师。

叶剑英后来还说，共产党人的武装比以往大有改善，因为他们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中，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北平的军调部实际上已经无所事事。对吉伦的任命使美国分部的编制更大了。到今天为止，在吉伦的指挥下共有4 000名美国人，其中大多数是海军陆战队。美国人进行特务活动，与国民党合作，并帮助国民党分子与共产党作战。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A. 列多夫斯基(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а, п. 264, д. 26, л. 10 - 11

№16201

彼得罗夫与周恩来谈话纪要：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

(1946年11月15日)

11月15日我会见了周恩来。他就要到延安去了，希望和我见面。

我问了有关民盟和党外人士参加国民大会的事。周恩来回答，政治协商会议的党外代表部从恩和郭沫若拒绝参加会议。民盟也不参加大会，甚至中国青年党到目前为止还没拿出自己的代表名册。周补充说，中国青年党的领导人已经决定参加大会，但一方面迟迟不交名单，想以此在国民党面前提高自己的身价；另一方面他们懂得，如果其他政党不参加大会，他们就会显得很难堪，所以他们在努力劝说张君劢及其支持者成为大会的代表。

周恩来讲，张君劢的麻烦事最多。他一直动摇不定，现在带着动摇思想到上海去了。昨天在和张君劢谈话时，国民党代表允诺，在行政院改组后给他的政党在那里安排两个位置。蒋介石向他宣布，拟拆分一些部，有两个划小的部可以给社会民主党。比如说经济部，有人建议分成两个——贸易部和矿业部，交通部分为铁道部和邮电部，水利委员会改组成水利部。11月14日，张君劢在南京召开了一个自己政党的要员会议。在会议上，大部分人表示要参加大会。张知道，如果开会时曾琦(中国青年党领导人)坐在身旁，他会感到不愉快。所以他满怀犹豫地去了上海，想和上海的拥护支持者商量一下再做出最后的决定。在民主党的主要领导人中，反对参加大会的是张东荪，他是该党在华北地区的领导人。中国共产党向中国民主同盟声明，不必特别害怕分裂，因为分裂只会使同盟巩固，使同盟摆脱动摇分子。当然，周恩来指出，要继续努力，制止张君劢。但假如他决意要分裂，也不会有特别的损失。

我问了关于黄炎培的立场。周恩来回答说，黄炎培与同盟的立场相同，他不参加大会。

谈到当前中国共产党的立场和行动问题，周说，共产党人的立场简单明了——他们不承认这个大会，认为它的召开破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破坏了停战协定和军队的改组。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些协议的破坏者就是所有同意参加大会的人。周宣布，我们肯定地说，10个月来我们虽然在争取和平和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上做出了努力，但是却没有取得如愿的结果。现在很清楚，事情正走向继续和扩大国内战争。以前的会议基础被破坏了，现在正面临着战斗。假如有可能恢复谈判，那么只可能在新的基础上进行。这样的基础就是召开新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在这个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青年党和参加过大会的政治协商会议其他代表的作用将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于是否在南京保留中国共产党代表处的问题，周恩来回答，为了保持联系，董必武留在南京。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下不多。关于他们的情况，今晚就要和

马歇尔谈。

对于是否可以认为现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破裂的问题,周恩来回答说,彻底破裂还没有,但一切都将取决于国民党今后的立场。

周补充说,如果国民党对延安开始军事行动,那么董必武留在南京的问题需要斟酌了。

对于参加谈话的罗申少将提出的问题——国民党军队在西安北面和黄河北岸集结的消息是否确切,周恩来回答,在西安北面地区集结了胡宗南的第一师、第七师和第二十七师,而往延长(Яньцы)方向运动着的有马鸿逵的5个骑兵旅。

周恩来反问国民党进攻延安的可能性。罗申同志回答,根据手头现有的信息,战斗预备队已就地集中,兵员补充到百分之百。然而,他指出,有消息说,国民党企图用和平的手段来压制中国共产党,所以有可能国民党部队不会接到转入进攻的命令,而只是守卫已占领的阵地。

周恩来指出,国民党显然会采取封锁、施压以及和平谈判的手段,当一切徒劳无效时就会开始进攻,在很多方面国民党的最后决定都取决于美国。

对于我问的最近马歇尔的表现情况,周回答,马歇尔努力劝说无党派人士和社会民主党参加大会,向他们允诺将停止战争,通过民主宪法。司徒雷登设了个大骗局,当他说服胡霖(《大公报》的出版人)提出参加大会的无党派人士名单时,允诺大会延期开幕。胡霖不想参加大会,但给他的压力有来自美国人的,也有来自蒋介石和政学系一伙人的,他和这伙人的关系密切。因为担心《大公报》的命运,结果胡霖投降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像其他“无党派”代表一样,没有亲自登记,而是委托雷震去的。

在分析“无党派”代表立场的同时,周讲述了拜访蒋介石请求改期召开大会的事。当莫德惠、胡霖和其他代表(共6人)来到蒋介石那里时,蒋介石板着脸冲着他们叫,你们的改期要求意味着扼杀国家。当时代表们都慌了神,但莫德惠还是代表大家开始请求改期,并引证说明,如果不这样做就难免破裂。这时蒋介石“软了下来”,并宣布他同意让步,但有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参加大会,并建议其他人也这样做。这次拜访后,所有到过蒋介石那里的代表分别来到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处,他们抱怨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问到傅斯年的立场时,周回答说,他公开支持国民党,辱骂中国共产党,为此,连胡霖也骂了他。

周接着指出,值得严重关注的是最近“政治学”派的活动——政学系分子认为,现在夺取政权和建立内阁的时机来到了。因此张群紧急动身回国,张嘉璈也在南京积极展开活动。他们指望建立“联合”政府,政府中的在野党由中国青年党和社会民主党来担当,然而他们的如意算盘打错了。首先,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参加,联合政府将纯粹是个假象,因为上面所讲到的两个党没有任何力量,怎么也不可能成为在野党。其次,他们没有考虑到,CC派和黄埔派会采取一切手段,不让成立这样的政府。周补充说,此外,“政学系”错误地期望美国方面的支持。

对于周提出的怎样看待当前中国形势的问题,我回答,形势相当严峻,最成问题的是

中国至今没有和平与民主。我说，无论国民党在大会上通过怎样的宪法，宪法通过后中国共产党将都会相当困难。我指出，我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留在南京是好现象。

周说，看来中国还要经历武装斗争和稳定中国形势的时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这要取决于国际形势。

我说，从与周恩来的一系列谈话中我得出的印象是，中国共产党并不总是能正确评估蒋介石的武装力量的。周回答，对敌人的力量估计不足当然是有害的，然而在计算蒋介石的力量时，应区别其纸上的力量和实际的力量。譬如，交通系统的破坏，动员号召能力薄弱，给养困难，还有国民党军队的训练差以及战斗士气低下，这一切大大削弱了它的实际力量。

周接着说，回延安以后，他将向中共中央汇报自己的观点，形势的发展预计有两种可能：

(1) 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大城市和铁路线。国民党在那里建有军事堡垒，中国共产党的技术力量薄弱，想占领是困难的。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就转向持久的游击战。这是下策。

(2) 继续执行消耗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战术。中国共产党用半年或一年时间共计消灭 50—60 个国民党旅(蒋介石全部军队的 1/3)，这样，达到某种平衡后，就转入反攻，夺回丢失的阵地。

在第一种情况下，要是共产党人被赶往农村，转为反攻将会比较复杂，为此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可能许多年，直至新的世界大战前夕。

周说，他看不到与蒋介石实现妥协的可能性，要是共产党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同意参加大会，那么他们就要负起新的政治责任，而蒋介石反正要继续发动内战，共产党就会处于更为不利的境地。

罗申同志指出：根据最近的一系列战役情况，我确信，中国共产党军队的战略侦察不差，但战术侦察很弱。对此，周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不可不仔细考虑下面的事实：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不是现代化军队，它现在正处于转折阶段。况且，它的武器装备很落后。至今在军队里游击思想占主宰地位，大同、张家口和四平的战斗就说明了一切。周补充道，关于城市问题，在政治上没有解决，这一事实起着一定的影响。日本投降后，提出了“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口号，中国共产党很容易地夺取了许多城市。在这些城市中，在国民党军队开始进攻前，共产党员和工人之间的关系刚刚开始建立。现在我们是否应该保卫这些城市——尚未决定，所以我们的军队离开城市走向农村。此外，周恩来指出，我们没有保卫城市的基础，因为补充武装力量的主要来源是俘虏，而只有在野外的战场上才能获得俘虏。关于周恩来的离开时间和迫害共产党人的可能性问题，周回答，如今他不会请求马歇尔派飞机飞往延安，至于迫害问题，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已有准备。按他的说法，迫害只能涉及地下工作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正式代表蒋介石还不敢碰。

参加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武官罗申、大使馆二等秘书弗拉迪金和塔斯社驻南

京办事处主任 H. 普罗岑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34, п. 253, д. 21, л. 172 - 178

№16702

列多夫斯基与吉伦谈话纪要：中国国内政治问题

(1946 年 11 月 25 日)

在我们总领事馆吃午饭时，吉伦将军说，中国人要解决内部政治问题是非常困难的。在解决这些问题时，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敌对两党都各不相让。按照吉伦的说法，互不相让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相互极不信任，都害怕因自己一方让步后被对方击溃。吉伦说，中国人没有责任感，没有担负起其该负的责任。在北平警备司令部里双方经常签署文件，在签署前双方都有不同意见，一方声明不接受一些条款，另一方不接受另一些条款，但最后还是签了。美国方面毫无办法，只得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签字下面签了字，虽然早知道这些协议和文件是不会有任何实际意义的。

吉伦以肯定的语气叙述了关于美国军队在德国与苏联军队会面时的感想，并强调了必须巩固苏美友谊。他宣称，苏美之间没有任何严重的分歧，世界和平取决于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合作。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列多夫斯基(签名)

文件送：马立克、第一远东司、彼得罗夫同志、总领事馆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а, п. 26, д. 264, л. 16

№16203

彼得罗夫与马歇尔会谈纪要：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1946 年 12 月 4 日）

今年 12 月 4 日我邀请马歇尔将军共用午餐。用餐后我们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了短暂交谈。

我问马歇尔，他对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大会有什么看法。他说，这个开端做得很好，因为国民政府提出的新宪法草案与 1936 年的草案相比，向前迈进了一大步。马歇尔指出，现在很难预见最后的结果，国民大会如今的工作给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然后谈及了大会上的所谓“反对派”。马歇尔强调，反对派成员是 CC 派和黄埔集团的支持者。他们确定的任务是达到通过 1936 年的旧宪法草案，并坚决反对在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基础上议定的新草案。马歇尔说，法西斯化的军界和国民党反动分子继续在捍卫自己的旧立场。他们一开始就是反对者，反对政治协商会议，反对和平谈判，反对用政治手段解决问题，反对寻求折衷的道路。马歇尔指出，这些反动势力一开始就力图破坏他（马歇尔）在中国的调停使命。现在以陈立夫和孔庚为首的反动分子反对大会通过民主宪法，因为新宪法会削弱他们现有的势力。

接着我询问了一下目前国民党和共产党谈判的情况。援引中国报界相互矛盾的报道，我问马歇尔，事情的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他指出，虽然召开了国民大会，但重开谈判的道路还是敞开的。确实，马歇尔说，共产党的行为仍然不明。他强调，两星期前左右他给周恩来发出了备忘录。当时周正准备去延安，在备忘录中，马歇尔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直率的问题：共产党认为他（马歇尔）是否还有作为中间人进行调停的必要。但至今，马歇尔说，他没得到对此问题的答复。

在分析国民党和共产党相互关系的同时，马歇尔不止一次地指出，用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毫无结果的主要原因在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形成的不信任且彼此猜忌的屏障已无法逾越。然而，马歇尔强调，共产党人在散播对美国调停人的不信任。马歇尔说，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成了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的心理疾病，这会给和平解决中国的军事和政治问题带来严重破坏。

我说，类似的不信任和相互猜疑并不都是毫无依据的。对此马歇尔说，如果说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不信任是合理的，那么对美国调停人的态度未必能证明是正确的。马歇尔指出，共产党人的反美宣传（指的是批评他的使命），总的来说是不公正的。接着马歇尔说，很遗憾，共产党人经常毫无根据地向未经查证的目标开火。例如，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的时候，他（马歇尔）是坚决反对进攻的，并努力使他们停止进攻，要求蒋介石取消进攻的命

令。但他的努力毫无结果，就是因为中国人不重视他的意见。马歇尔说，他不得不请求杜鲁门立即将他从中国召回去。同时，他指出，共产党人不知道这件事，也没有必要知道，因为他(马歇尔)认为，为自己的无能为力去辩解是多余的。原因在于，这样做一点也不能促进敌对双方谈判的结果。

马歇尔本人没有对我提出任何问题。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а，п. 264，д. 21，л. 19－21

№16204

费德林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民大会及国共谈判

(1946年12月5日)

今年12月5日，中外汉语通在中央图书馆会面时，我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举行了短暂的会晤。起初我们讨论了关于在中国报纸上刊登的举行国民大会的问题。我强调，中国报界并未清晰地反映国民大会的现实情况。通常，报纸新闻带有片面性，编辑部的文章只是反映政府的观点。

司徒雷登说，不管报界的行为如何，有一点是清楚的，蒋介石为国民大会能通过民主宪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我问他，怎么评价提供国民大会审议的新宪法草案。司徒雷登说，这个草案超过了他的预想，总的来说，它是成功的，而它的基本原则，可以肯定地说，比1936年的旧宪法草案的原则更民主、更先进。对于我提出的国民大会会有怎样的最后结果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新草案引起了最有政治影响力的CC派以及与它结盟的以孔庚为首的保守派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内最反动分子的相当强烈的反对。新宪法草案的反对者共有400人，组成了强烈的反对派，并将反对的矛头指向蒋介石所捍卫的民主原则。大会的工作进行得很活跃，完全可以期待非常好的结果。中国报界现在正大写特写国共两党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我援引报界的话，询问这些党派之间相互关系的现状。司徒雷登指出，由于双方就召开国民大会问题产生分歧而暂时中断谈判，不能视为双方关系的决裂以及和平谈判的终止。他强调，很多事情将取决于国民大会正要通过的宪法的性质，取决于双方是否进一步

努力以政治手段解决争论的问题。目前的国内政治局势，司徒雷登说，人们可以乐观地评价恢复和平谈判的前景。这次和谈应该可以从讨论国会问题开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参赞

费德林(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а，п. 264，д. 22，л. 22 - 23

1947 年

№09896

彼得罗夫与董必武的谈话纪要：中国军事和政治形势

（1947 年 1 月 6 日）

今年 1 月 6 日我邀请中共中央委员董必武共进早餐。我们进行了如下内容的谈话。

对于我的问题——他如何评价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董必武回答说，决定这个形势的基本因素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军队之间的军事行动。按不久前从延安来的一位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的说法，中国共产党已准备好了对特区的进攻给予反击。对特区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 11 月 12 日到 20 日，但后来在动员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反击并作了必要的防御措施后，延安的危险过去了。董必武说，中国共产党军队的一系列战役迫使胡宗南从主要进攻路线上将自己的军队抽回一部分。没有了补充，没有了增援，这些军队没有能力开始重大的进攻战役。即使胡宗南开始进攻，也不可能有重大成果。董必武说，我们注视着他所有的力量调动，破坏他集中军队的计划。除此以外，胡宗南的大问题是后方不巩固。由于苛捐杂税多，人民群众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情绪在高涨。同样需要指出，共产党李先念将军与陕豫湘边境地区地方武装之间的关系已调整好了。因为不满中央的政策，这些地方武装不阻止共产党军队通过他们占领的地区，这就改善了中国共产党的境况。

我的意见认为，按照董必武的话分析，对边区不存在直接的威胁，蒋介石不会展开进攻，不仅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且是出于自己薄弱的军力考虑。董必武回答，事情正是这样的。

谈到现时蒋介石的政策问题，董必武说，通过了宪法以后就需要等待。为了向外界展示一个“民主”中国，蒋介石会重组政府。他的主要目的是继续获得美国的援助。同时他企图显示自己的“宽大胸怀”，在国民大会里给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留有位置，他打算在改组后的政府里给共产党好位置。

对于我的关于不久前政府公布的大赦意义的问题，董必武回答说，这个大赦与通过的宪法一样具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它不涉及政治犯。过去中国共产党曾按邵力子和张嘉璈的请求释放了部队在东北抓获的许多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同样请求释放许多被捕的中国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其中有著名的作家和翻译家金任（Цзинь Жэнь）等。这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向邵力子和张嘉璈声明，如果他们感到没有能力达到释放这些人的目的，那么最好不要向国民党当局说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名字，因为这会引起对他们的迫害。事情如预料的那样

发生了，除了金任被释放，但不能离开长春外，其他人都遭到杀害。董必武顺便告诉我，现在国民党俘虏中不仅有中将，甚至还有上将。

我问董必武，有关改组政府、谁参加政府的问题，他的意见如何。董必武回答，中国青年党和民社党，同时还有不少无党派社会人士，肯定会参加政府。这种不会有任何新东西的改组未必会在中国有政治效果，但是在国外会产生一些影响，会迷惑某些人。

我问，国民党在恢复与共产党和谈和改组方面采取了哪些步骤？董必武回答，自从周恩来回延安后，有关恢复和谈问题国民党方面没有提出过任何建议，哪怕是口头形式。

董必武告诉我，1月7日他要拜访张治中，感谢张把去年被盛世才逮捕的几十个中共党员释放并送往延安。然后，董必武谈到了莫德惠的立场，并叙述了他试图进行斡旋的想法。

被蒋介石抓住话柄的莫德惠没有出席国民大会，拒绝参加主席团。但国民党还是迫使他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在不久前与董必武谈话时，莫德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最终应该达到停战，他愿意做调解人，还要把一次也没有参加国民大会会议的中国青年党的李璜以及民主党主席张澜请来一起参加。董必武告诉他，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鲜明的，它的观点是解散非法召开的国民大会，恢复1946年1月13日时的战场状况。董必武问他，国民党的立场是什么，有什么可以谈判的？莫德惠不得不承认，他不清楚国民党的立场，并说，看来和他谈过话的张群也不清楚。后来董必武建议，莫德惠最好别卷入这件事，因为不仅他，甚至与蒋介石亲近的张群也什么都不知道。

谈到共产党的立场，董必武表示这个立场仍然没有改变，没有任何改变，也不可能有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已置于不可能再退让的境地。国民党力求恢复主要铁路干线：津浦路、平汉路、胶济路和陇海路。控制了这些铁路后，国民党就有可能自由调动军队和运送武器装备，还可把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割裂开，分隔成孤立的几小块。如果中国共产党无法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那么它将继续进行武装斗争，消灭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不让国民党有喘息的机会，使其无法准备后备力量和得到美国人的补充援助。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能相当顺利地解决这一任务。1月2—4日山东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有两个旅被困，一个旅已被歼，另一个旅将在短时间内被消灭。国民党将自己最后的预备力量调往前线。不久前有一个旅从海南岛调到了山东，第六十四师(过去的军)从广东开往北方，一个师从台湾开往苏北。

我问，最近马歇尔是否还采取过某种步骤使双方接近。董必武回答，周恩来离开后，他和马歇尔没有见过面，只与司徒雷登有过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中司徒雷登说，他不理解中共的立场，不理解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而中共为什么不停止，为什么共产党不参加三方委员会。董必武回答他说，这样提问题是有倾向性的，因为司徒雷登企图把继续国内战争的罪责推在中国共产党身上，而实际上真正的罪人是国民党。它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现在又在决定一个重要问题——拟订宪法。至于国民党停止了军事行动的问题，司徒雷登在讲这种话前应该先问问蒋介石本人——国民党军队的军事行动真的停止了吗？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看待马歇尔的沉默，他回答，实际上蒋介石最近的一切活动都是马歇尔策划的。召开国民大会也是美国人策划的，现在他们在怂恿蒋介石改组一个没有共产

党参加的政府。按照美国人意见,国民大会上需要反对派,这个反对派便马上由国民党组成了。接着,董必武叙述了能证明马歇尔和蒋介石相互充分信任的两件事。司徒雷登在与民主党秘书长梁漱溟谈话时,装出一副对此什么也不清楚的样子,他问梁,现在怎么办。梁建议询问第三方,并力图和美国人一起调停这个问题。司徒雷登对此表示赞同,并答应与马歇尔和蒋介石谈谈,然后书面告知梁漱溟谈话的结果。当梁没有等到允诺的回答时,他打电话给司徒雷登,后者表示一切正常,因为蒋介石正在使国家民主化。也就在那段时间,司徒雷登在桂永清将军那里吃饭时,同样明确地回答了徐林正的问题。董必武带有结论性地说,这就证明在夺取张家口和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上,马歇尔和蒋介石之间存在充分一致的协议。

董必武问我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的看法。我回答,我也不认为国民大会通过的宪法会带给中国人民利益。我说,当宪法在没有最大的反对党参加的情况下通过时,很明显蒋介石自己懂得状况的复杂性,因为很难无休止地将所有的人牵着鼻子走。我指出,国内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发展将在美国人的压力下进行。这一点从杜鲁门 12 月 19 日声明中就可以看出。

然后董必武谈到了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之间相互关系的复杂性。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很清楚,要斗争,对和平不能抱有幻想。但民主派还生活在幻想中,而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对他们说,现在和平是不可能的。

董必武说,在上海召开的民盟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任务是要找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和解的道路。董必武认为,民盟的这些尝试是徒劳无益的,他们坚持不懈的努力只能损害中国共产党。民盟认为,双方的让步才是通向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取得协议的道路。初一看,这好像很合理。然而在现时形势下,当中国共产党处于无法继续让步的情况时,这种所谓的"双方让步"的要求是单方面地向中国共产党施压。董必武向民盟的领袖们说明了这一点,他们也无法不同意。此外,董必武还说,作为调停人,自己先需要弄清,蒋介石的实际政策是怎样的,这种政策的结果和后果是怎样的。当问到民盟的领袖们是否知道蒋介石想要什么,他的政策引向何方时,他们不得不说明,他们不知道。此外,根据与张群、王世杰和邵力子的谈话可证实,他们也不知道这一点。

董必武接着指出,在和民盟的关系方面,中国共产党对待党外不同人士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对那些与共产党接近的人,如邓初民、章伯钧、沈钧儒,共产党讲得比较坦率,他们也能听取共产党的话。对这些人可以说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诚实的,中国共产党渴望得到它;另一个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要的。帮助蒋介石建立这个虚伪的世界,不仅会给中国共产党,也会给民主派本身带来危害。对其他一些人,如罗隆基、黄炎培等,共产党说起来有点不一样,会向他们证实,民盟的和平建议正中蒋介石下怀,因为中国共产党已无处可退,继续退让将会导致中国共产党被消灭。

我问,孙科和邵力子表现怎样,董必武回答说,他们没有任何独立的见解,并完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在行动。

董必武接着说,如果说以前蒋介石表现得充满自信,想在美国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力量,

那么现在他的自信心正在丧失。因此。对共产党说来，危机时刻已过去。美国人知道蒋介石已没有能力继续进攻了，蒋介石本人对此也清楚。国民党军队的“胜利”被过分夸张了。因为他们占领的大部分城市是中国共产党为了保存力量而主动放弃的。1946 年最近 6 个月来国民党军队死、伤和被俘的损失达 40 万人，再加上逃跑的部分共 60 万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补充的一共只有 16 万人，而且训练水平很差。在国民党军队训练薄弱的情况下，美国的武器和技术装备是完全没有效果的。由于道路状况不好，无法保证弹药供应，这种有效程度更进一步降低了。

我问董必武，他怎样评价中苏关系。董必武说，由于出现了反美游行，某些国民党分子企图把这运动引向反苏运动。很多人把现在的反美学生运动硬加在共产党身上。然而，虽然中国共产党在一些学校中有影响，但它没有足够的力量去组织如此庞大的运动团体。在许多学校里国民党分子企图破坏反美游行，建议他们“扩大”运动，提出了把所有外国军队从中国召回去的要求。特别是傅斯年在不久前的讲话中就讲了这一点。按董必武的看法，现在国民党达不到目的，他们想同去年一样玩弄学生的爱国主义情绪，把他们引向反苏运动。尽管如此，董必武指出，来自国民党的挑拨完全可能存在，特别在东北。

出席谈话的大使馆参赞费德林问董必武，朱学范的立场和在中国劳动联合会里的地位如何，董必武作了如下讲话：

朱学范是国民党党员，与 CC 派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中国劳动联合会主要依靠国际工会组织的帮助生存着，在其走上国际舞台后，朱学范一方面努力把联合会做成自己的政治工具，另一方面开始逐渐离开 CC 派分子，甚至将自己的组织置于他们的对立面，因为他清楚，让联合会完全服从国民党反动集团，会导致国际援助停止。此外，对他的行动影响最大的压力来自内部，来自联合会工作人员核心小组，这些人员中有不少进步分子。CC 派分子看到联合会正在脱离他们的监督，就开始对朱学范施加压力。当这一步不能如愿时，他们就确定了消灭这个组织的方针。在社会事务部系统里有个工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要求联合会与它合并。朱学范自己只是被选为委员会理事会的候补委员。他仍旧拒绝服从 CC 派分子。这时 CC 派分子就着手成立消灭联合会的组织机构，先从重庆组织开始，在那里逮捕了联合会的领导成员，而那里的资产由委员会的机构“接收”。在许多城市里他们都这样做了。朱学范表示了抗议，被捕者释放了，但是资产没有返还。由于不断地施压，朱学范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遭到 CC 派特工暗杀未遂。在他离开香港到上海后，联合会被“改组”了，实质上意味着被消灭了。现在朱学范在香港建立了中国劳动联合会新的中心。

出席谈话的有大使馆参赞费德林和二等秘书弗拉迪金。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а, п. 264, д. 21, л. 26 - 34

№16230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国共两党对抗前景

(1947年1月28日)

机 密

1月28日我回访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经过礼节性的谈话后，我问司徒雷登，他怎样评价中国国内政治局势。

司徒雷登说，最近没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他还没有从马歇尔那里收到因国共两党之间恢复和谈的努力明显失败而发出的新指示。司徒雷登指出，他没有任何明确的期望和计划。他说，双方从内心深处诚恳地希望马上实现和平、团结，但他们对"民主本质的认识非常肤浅"。按司徒雷登的看法，双方更多的是忙于有关未来的安全、地盘等方面的交易，因为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心、害怕、怀疑，结果使得为达到上述目的的斗争复杂化了。

我问了关于政府改组的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他尚不知道国民党与小党之间最近谈判的结果。最近政府将改组，吸收小党代表参加。这时司徒雷登说，在和蒋介石会谈时他多次表示赞同，在改组时要把好的、有能力的人引进政府，但希望蒋介石不要阻挠大部分小党加入政府。司徒雷登表示这样改组只是初步措施，并不具有重要性，在共产党没进政府前，不会解决任何问题。

我提出，最近一段时间，尽管国民党迈出了"和平"的步伐，但军事行动正在加剧。司徒雷登同意我的意见，他说，他现在十分被动。

后来司徒雷登指出，很可能过几个月后，情况将会改善，那时候双方将会比较容易被说服。

在接下来的谈话中，司徒雷登就香港问题谈了其个人看法。他说，英国人应该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将香港归还中国。从他们方面来说，这应该是明智的、有远见的举措。在巩固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力方面，这一举措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利益。他们可以用20年过渡期作为条件，只要慢慢地放弃各种各样的特权。司徒雷登说出了自己的预想，英国人很可能无法将香港控制到20年期限结束。

会谈实质部分到此结束。

谈话时出席的有苏联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1月31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а, д. 21, п. 264, л. 60－61

№16237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美苏对华政策

（1947年2月20日）

机　密

2月20日司徒雷登来拜访我，他说，他来是因为就要出发去中国南方(广东、香港、海南岛)。

谈话一开始司徒雷登就主动说，至今他未收到马歇尔将军的任何有关中国局势的指令和评述。他说，按其个人的估计，马歇尔将军现在正在仔细权衡中国问题，考虑美国人的情绪和国际关系的综合情况，然后再做出他的决定。

司徒雷登接着强调说，中国政府正处于严重危机状态，需要美国的大量援助。

对于我所问的中国政府在克服危机方面采取的特别措施的有效性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这些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因为军事支出照样无法弥补。照他的说法，国民党领导人现在已不像10天前那样被经济崩溃的威胁所惊吓，不过，防止全面崩溃还是不可能做到的。虽然政府还能真正采取一些特别措施，但无法扭转整个局势，只能将结局推迟几周或几个月。司徒雷登指出，政府希望到时候美国的对华政策完全确定下来，它就可以获得财政援助。

我指出，因为顾维钧访问马歇尔将军，记者们已经提出美国援助的建议，特别是大量借款的梦想。

司徒雷登说，除了报纸的报道，他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消息。他自己经常开导中国政府领导人，要他们更多地相信自己的力量，坚决地争取解决国内问题，不管有无外部援助。照司徒雷登的说法，这是为克服互相怀疑，保证各方合作所必需的。

谈到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恢复谈判的可能性时，司徒雷登说，虽然最近没有什么新的情况，但他感到，双方有恢复谈判的愿望。所以最终形势并不是毫无希望的。中国人很会讨价还价，他们现在正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这时候司徒雷登补充说，双方特别急不可待地等待着莫斯科外长会议。

我问司徒雷登，他认为是否有可能，在莫斯科哪怕是非正式地讨论一下中国问题。司徒雷登说，他认为这不仅可能，而且如果不讨论反倒奇怪了。他附带说明了一下，这仅是他个人的看法。司徒雷登还说，马歇尔将军与斯大林大元帅会讨论所有与苏美有关的国际问题。司徒雷登最后说，如果苏美之间能达成完全的、真正的互相谅解，那么中国问题就可以看得乐观一些了。

谈话时在场的有大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彼得罗夫(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д.21, п.264, л.74－75

№10052

彼得罗夫与罗隆基会谈纪要:关于中国局势

(1947年3月3日)

3月3日,中国民主同盟的一位领导人兼发言人罗隆基拜访了我。

罗隆基称,他是受民盟的委托,专门从上海前来与我见面的,并就民主人士认为具有重大意义的当前一系列问题征求我的意见。

罗隆基预先说明,他只想与我秘密交谈。他说,民盟已经正式委托他告诉我,民盟希望将中国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他解释说,政府坚决反对将中国局势问题提交给莫斯科外长会议讨论,因为该会议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中国政府的这种意见已经通知了所有有关国家,并为政府当局的机关广为宣传。但是,民盟的意见毫无疑问是与反民主政府的意见不一致的,民盟将欢迎在莫斯科国际会议上讨论解决中国冲突的途径问题。

随后罗隆基说,民盟还想弄清苏联对三国(苏联、美国和英国)斡旋解决中国问题的可能性所持的观点。他解释说……①这种调停至少不可能是不公正的,是不会有偏见的。

最后,罗隆基说,民盟想弄清,如果民盟在莫斯科会议召开之前发表一个声明,表明自己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苏联是否认为是适宜的。罗隆基,也就是民盟,对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可能性赋予巨大的意义,所以在确信自己的要求与苏联的立场保持一致之前,不能发表任何轻率的要求和声明,因为苏联是中国民主派唯一的始终不渝的拥护者和支持者。罗隆基强调说,如果民盟的言论得不到苏联的支持,它只会败坏组织的名声,给政敌以可乘之机,并加强政敌的立场。

罗隆基说,他认为,我作为一个大国的大使,可以给中国民主主义组织一些忠告,因为民主主义组织自己有能力分析目前复杂的国内政局和国际局势。他请求考虑民盟的立场并对它予以关注。

接着,我指出,至少现在中国的局势不能不让人觉得有点奇怪:一方面国民党以中国人

---

① 该档案复印件多处缺行或字迹不清,无法译出,均以省略号表示。——译注

民的名义广泛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自己对即将举行的莫斯科会议的立场，而另一方面，一些政党、社会团体和一些活动家却保持沉默，不发表自己的观点。奇怪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民盟不表明自己的立场之前，他们不会表明自己的态度。至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他们明白当前局势的重要性，想确信他们的立场不是与苏联的立场背道而驰的。现在，在上海已经成立委员会，正在起草决议和宣言，如果这些决议和宣言得到苏联的支持，就会立即发表。

当我问到罗隆基所谈的那些民主党派和力量的统一战线有多广泛、人数有多少时，罗隆基回答说，上海的情况令人十分满意，民主统一战线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以外，还包括 14 个民主团体、学生组织以及上海工业区的一系列组织、工会和许多进步的无党派人士。

我问罗隆基，中国共产党对该问题持什么意见。罗隆基回答说，民主统一阵线不是一个正式的政党，但民盟的领导人曾与共产党人就此问题举行过多次会议。今天早晨罗隆基还会见了董必武，并且在与我谈话之后，将会再一次会见董，以便向他报告此次谈话的结果。之后董必武将动身去延安。

随后，罗隆基再次直接向我提出了关于苏联对三国出面调停的看法的问题。

我回答说，根据 1945 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苏联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苏联的这一立场……是苏联改变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的依据。

鉴于这一意见，罗隆基继续说，民盟预见到在莫斯科会议上讨论中国问题的两种有利方案：其一，较为理想的方案是：莫斯科会议确认 1945 年莫斯科会议的决议，迫使美国人放弃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停止对国民党的一切援助。当民主力量与反动政府一对一的时候，民主力量将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但是，罗隆基指出，因为担心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民盟期望三国出面调停，这种调停毫无疑问将受到中国民主主义者的欢迎，并且无论如何不应被看作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任何时候，我也不会到您这儿来，请求您去干涉中国事务的，”罗隆基这样指出，并解释说，当一个人的房子着火了，人们来帮助他救火，这就不能看作是对这个人私人生活的干涉。他宣称，我们相信，三国调停将会是公正的。罗隆基在谈到周恩来不久前在延安发表讲话，反对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部冲突时，他解释说，当时民盟尚未与董必武谈话，只是后来才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反对三国调停？董必武解释说，中国共产党将不会把三国调停看做是干涉，并且也不会反对三国调停……如果我认为有必要把他今天阐述的民盟的立场报告给本国政府的话，那么，我可以说，罗隆基完全是被正式授权进行这次谈话的。

罗隆基继续说，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期间，保持我国大使馆与中国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将是很有必要的。罗隆基建议说，在南京要有一名民盟的代表。

我回答罗隆基说，我任何时候都将高兴见到这位代表和同盟的其他人士，除此之外，我的助手会常常去上海，所以，罗隆基所说的在南京要有一名专门的民盟代表，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我就改组政府和美国扮演的角色等问题，询问罗隆基的意见。

罗隆基指出,民盟对政府改组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不会参加政府。随后,他专门谈了美国和司徒雷登个人在改组国民党政府中作用的问题。

罗隆基说,大家都认为,当前的政府改组是按马歇尔在离开中国之前制定的计划进行的。罗隆基提醒道,马歇尔曾在他著名的关于中国变化的声明中呼吁建立一个由……组成的政府。罗隆基指出,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而且我们拥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司徒雷登大使本人正在帮助招募政府人选。

罗隆基说,我可以私下告诉您,不久前司徒雷登去广州时,中途曾在上海停留,在那里他与一系列政治活动家见了面。他也与我和张君劢谈了话,而且与我和张君劢的谈话完全不同。司徒雷登说服张君劢参加政府,并对他说,国民党很快就要把共产党从有交通线的地区赶到偏僻的农村地区。司徒雷登对张君劢说:“您明白,……农村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他以这种方式来说服张君劢,只有进入政府,张才能免遭失败。罗隆基说,民盟是从自己一个姓叶的成员那里得知这一谈话内容的,姓叶的人很受司徒雷登的信任,因为他曾经是他的学生,也是张君劢那个党的活动家,在这次谈话时,他担任司徒雷登的译员,随后他将这次谈话的内容向民盟作了全面报告。

我问,为什么张君劢本人不参加政府,罗隆基说,因为他的党积极反对政府改组,所以他个人参加政府什么也改变不了。罗隆基说,目前美国人需要的不是个别人物,而是尽可能多的政党,以造成政府民主改组的印象……很快将成为财政部长。我们现在可以说,在……党团与张君劢的民社党之间有着合作关系,罗隆基说,政府改组完全是按马歇尔的计划进行的。

我问罗隆基,应该如何理解宋子文的辞职,为什么在政府改组时,最积极的亲美人士去职,而去职的时机正是组建对他有利的政府的时候?

罗隆基回答说,宋子文几乎在……年时间内就不受美国人赏识了。他的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美国资本无阻碍地征服中国经济造成了困难。而且,宋子文最近进行的一些变革是在没有知会美国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这使美国人十分生气。这样一来,宋子文的辞职就不会与美国人的愿望相矛盾了。罗隆基说,宋子文的敌人很多……孔祥熙以及一些无党派人士也反对他。众所周知,胡适是被宋子文解除驻美大使职务的,所以现在,当宋子文被解除职务以后,产生了让胡适参加政府的想法。从这个方面讲,宋子文的辞职也是十分理想的。

罗隆基继续说,美国人帮助蒋介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他,而是想利用他在中国建立反苏进攻基地。罗隆基宣称,根据他所掌握的情况……政府的改组会千方百计地加强,以便在会议开幕前完成。我问罗隆基,他如何解释国民党从上海、南京及别的地方驱逐共产党代表的事。

罗隆基回答说,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好战分子做得太过火了。他们走得比美国人所预料的还要远。罗隆基列举了国民党反对给共产党代表和组织出示去延安的指令,以这个事实为例来证明他所说的这一点。

对于内战前景如何的问题,罗隆基说,国民党政府有三个薄弱环节:一是非常困难的经

济形势；二是士气非常低落，士兵不愿意再打仗了；三是人民的反对。他指出，但是，现在国民党一切都依靠美国的援助。美国的援助继续把中国的民主力量置于一种非常危险的境地。罗隆基说，明天他将与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举行会谈，届时他将询问英国外交官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隆基说，史蒂文森是一个典型的职业外交官，不过是一个“大使阁下”而已。罗隆基说，他在会见董必武之后将回到上海去，他请求，允许在他离开之前再就今天没有涉及的问题交谈一次。我告诉罗隆基，我随时都将非常高兴见到他。

谈话时大使馆一等秘书担任译员。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5卷，第1052—1060页

№20268

巴拉诺夫致斯大林函：转交四平战役部署的情报

（1947年6月12日）

И. В. 斯大林同志：

向您呈上费德洛夫同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记录，有关中国共产党军队准备进攻四平事宜，四平街乃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中共包围的一个重要据点。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巴拉诺夫

致巴拉诺夫同志：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东北中共军队指挥部正重新部署部队，并准备进攻四平市（一个在哈尔滨—长春铁路线上被共产党部队包围的重要据点），拟定于本年6月13—15日攻克该市。

在攻克四平的战役中，中共部队将有5万名官兵参加，与此同时，将有7万名士兵被派去阻击可能从长春和沈阳去支援四平驻军的国民党增援部队。这支四平驻军由常规军5个团、2个保安团组成。拿下四平之后，共产党部队准备攻打吉林，接着攻打长春。如果这些战役取得成功，共产党军队将有15万人进攻东北南部。

东北中共部队副总指挥高岗坚决要求把弹药交给共产党部队使用，特别是日式75毫米、41毫米、38毫米、91毫米炮弹。为了接受这些弹药，高岗准备亲临任何一个边境站点。按他的话说，为了进行所有战役，中共部队指挥部应需拥有1 000发炮弹，否则不能保证进攻成功。同时，不能中断进攻，因为国民党司令部会利用喘息机会，调遣增援部队，组织对

北满的反攻。

П. 费德洛夫
1947 年 6 月 12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5 - 6

№16270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 年 6 月 15 日)

致捷列宾①：

请转告毛泽东，联共(布)中央认为，他可以不需要任何邀请书前来莫斯科。如果毛泽东认为必要的话，那么，我们认为最好通过哈尔滨来办理。如果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派飞机前往。

请电报告知同毛泽东的谈话结果及他的愿望。

Ф. 库兹涅佐夫②
1947 年 6 月 15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23

№16271

彼得罗夫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苏美对华政策

(1947 年 6 月 18 日)

机　密

就议定的题目谈话之后，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估计中国的当前形势。司徒雷登回答

① 捷列宾，А. Я. 奥尔洛夫的化名，联共(布)中央派往延安的医生和联络员。——编注
② Ф. 库兹涅佐夫，时任苏军情报部部长。——编注

说，中国的形势十分危急。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脆弱。这种状况在军事、经济、心理各方面都能观察到。经济危机日益加重，金融困难引起对政府的不信任，对政府不信任的增长本身是最重要的心理因素，它影响着军事力量，在政府的圈子内增长着失败主义情绪。这样，所有一切都交织在一起。

我觉察到，当前好像没什么能改变这种状态。司徒雷登从自己的角度说，国大上通过了三个决议：两条包含着对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第三条是对国大常务委员会的。这些决议提交行政院，行政院应该制订较为广泛和具体的方案。如果下次会议(看来在6月20日)能形成明智的决定，而在决定中将审议中共党人能接受的条件，那么，到那时将打开通向和平解决所有问题的道路。司徒雷登附带说明，他对此仅抱着微弱的希望，尽管看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谈到中国内政事件的发展前途时，司徒雷登指出三个可能的方案：第一，蒋介石可能会走激进改革方案，致使各党派有可能在联合政府的框架下回到共同合作。如果蒋介石真的具有洞察力、勇气和决心，他现在做还不迟，应该快一点走这一条路。第二，无党派的自由活动家，如胡霖、胡适等人号召国民党的一部分民主人士和共产党人建立联合体制。第三，内战不结束，经济危机将变得愈来愈深刻，国内产生一片混乱，有一些强悍的行政长官将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地方权力，等等。

我指出，可以估计政府未必打算走第一条路，因为，如关闭自由派报刊、镇压大学生运动等事实，正好证明了他们与此相反的行径。

司徒雷登同意这个意见。他又说，中国有强大的反对党，与此同时，中国有另一个弱点：中立的中间派组织一盘散沙、无组织性并相互矛盾。

我问司徒雷登，他如何看待新改建的张群政府。司徒雷登回答说，政府中有不少自由主义倾向、精明能干并保持独立的人士，但仍和过去一样，蒋介石控制着所有的人。接着，在谈话过程中司徒雷登表示，蒋介石应该进行坚决的、实质性的改革，否则，他应该让位于其他人，而自己去国外或隐退。

顺便谈到美国对华政策问题时，司徒雷登说，当前条件下，美国被迫拒绝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对此，我说，根据各方人士的说法，得出一个印象，对中国政府的援助很快就能实现。我指出，在美国尽管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相互矛盾的，但是根据这些看法，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这问题很快就要得到解决了。

司徒雷登说，围绕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问题，在美国进行着尖锐的争论，并有很大的分歧。很多人赞成给中国政府援助，另一些人表示反对。有些人认为，即使鼓舞一下中国政府进行改革，帮助政界人士和公众舆论克服失败情绪，也需要给中国政府援助。对此问题，司徒雷登本人至今没有得到任何指示。

我说，从马歇尔前不久的声明中看出，他也主张给中国援助。司徒雷登回答说，马歇尔的确很想给中国援助，但是问题的症结在于，以怎样的方式和在什么条件下提供这个援助。美国政府仍然主张给整个中国援助，但只能是在众所周知的条件下。

使馆二等秘书克鲁季科夫出席了这次谈话。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A. 彼得罗夫

文件共3份,送:B. M. 莫洛托夫、Я. A. 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а, д. 21, п. 264, л. 185-187

№16274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推迟毛泽东访苏

(1947年7月1日)

致捷列宾:

您有关毛泽东的事宜和有关前线形势的报告已收到。

1. 由于当前军事战役情势,又因毛泽东不参加战役会对战役带来不利影响,我们认为毛泽东暂时推迟前往苏联是合乎情理的。[①]

Ф. 库兹涅佐夫
1947年7月1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24

№16276

特鲁边科夫致斯克沃尔佐夫等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年7月2日)

机 密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T. Ф. 斯克沃尔佐夫同志

① 原文到此结束。——编注

苏联外贸部外汇管理局局长 Ф. П. 贝斯特罗夫同志
苏联财政部外汇管理局副局长 В. В. 拉夫罗夫同志：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不反对用苏联外贸部副部长克鲁季科夫同志建议的方式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

但是，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认为，向东北青年代表团提供卢布和捷克克朗必须办理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

有了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后，所需捷克克朗款项将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银行在布拉格支付给东北青年代表团，或根据该团需要，一部分款额将以克朗现金方式在莫斯科支付。

该团最后如需把捷克克朗带出，必须具备苏联财政部的许可证。

苏联国家银行管委会外事业务办事处主任
В. 特鲁边科夫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а，п. 273，д. 114，л. 15

№20270

马立克呈莫洛托夫请示：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 年 7 月 4 日）

呈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向我们提出要求：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50 人)途径莫斯科前往布拉格参加 7 月 20 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本人认为，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请求可以满足。

该代表团所需费用约 20 万卢布和 177.55 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缺少有效外汇换取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本人认为，同意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苏联外贸部和苏联国家银行按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款额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法结算是恰当的。外贸部和国家银行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法，但是，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拨给以上捷克克朗和苏联卢布款额，必须具备政府的许可证。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有关的命令草案。

请您指示。①

Я. 马立克

1947年7月4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年7月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 同意苏联外贸部按与北满东兴公司的合同,以提供货物形式,向派往布拉格国际青年联欢节的青年代表团拨出20万苏联卢布和177.55万捷克克朗。

2. 预先通知苏联外贸部,在7月份的外汇计划中支付177.55万捷克克朗,把它补充到1947年第三季度计划中。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0а, п. 273, д. 114, л. 11 - 12

№16277

马立克致莫洛托夫函:资助东北青年代表团

(1947年7月5日)

B. M.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馆领事雷斯科夫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联军司令部通过他向苏联政府请求,希望允许东北解放区青年代表团(7人)路经苏联去布拉格参加7月20日开始的世界青年联欢节。

我认为,应该满足民主联军司令部的要求,同意由10人组成的代表团路过。

代表团的费用约6万苏联卢布和40万捷克克朗。由于民主联军尚无有效货币换取苏联

① 1947年7月10日,该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获得批准。——原注

卢布和捷克克朗，我认为较为合理的是，同意该司令部按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从东北向苏联提供食品的方式进行结算。苏联外贸部和国家银行都不反对这样的结算方式。为了解决向代表团支付上述所需苏联卢布和捷克克朗的款额，必须有苏联部长会议的指令。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相应的指令草案。

听候您的指示。

Я. 马立克

1947 年 7 月 5 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7 年 7 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1. 同意苏联外贸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签订的条约，用货物结算形式，向赴布拉格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支付 6 万苏联卢布和 40 万捷克克朗。

2. 规定苏联外贸部于 7 月份的货币计划中补拨 40 万捷克克朗到 1947 年第三季度的计划中。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а，п. 273，д. 114，л. 13 - 14

№16284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向东北民主政府供应工业品

(1947 年 7 月 14 日)

1. 要求各部和主管部门于 1947 年 11 月 1 日前按附件一向外贸部提供超出 1947 年出口储备额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

2. 要求汽车工业部于 1947 年 11 月 1 日前，向外贸部运送 400 辆吉斯—5 运输汽车，可减少 1947 年 5 月 7 日签署的苏联部长会议 1428 号决议审定的、由联盟中央分配到各州售

予集体农庄的数量。该条款按附件二执行。

3. 要求外贸部从1947年第三季度进口款项中向橡胶工业部运送300吨天然橡胶，用来制造计划外的汽车外壳，可减少向国家后勤部提供的该原料数。

4. 要求苏联交通部和国防部按附件一和附件二，凭交通部通知，用军用交通工具向东北提供货物。

5. 批准对外贸易部为全苏粮食出口公司驻满洲代表处和分公司确定的1947年人员编制为35人。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Я. 恰达耶夫

附件一：

拨给苏联外贸部储备外售予东北的工业品、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药品和医疗设备

军用电缆50千米

棉布几千米至1万米，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的供应数

毛料200米，国家后勤部提供

吉斯牌汽车400辆，可减少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供应数

摩托车15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自行车3 000辆，减少对居民的供应数

滚珠轴承4 500台，减少苏联部长会议储备数

砂轮500个，转子300支

汽车附件30万卢布

普通汽车轮胎5 000套，计划外生产

“巨人牌”汽车轮胎(大型载重车用)5 000套，可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自行车轮胎1万套，计划外生产

橡胶靴2.5万双，减少对国家后勤部供应数

定向电台4座

功率10千瓦收发报电台，减少对塔斯社供应数

军用整流器2 000台，各种用途的电话机3 200台

电灯泡(用于照明、轮船、交通信号以及其他用途)12万支
各种功率的电力发动机60台
青铜锭、巴比特合金、铜板、锌版
各种规格和用途的管子
金属丝(钢丝、弹簧丝和其他类型的)
消防车
压缩机和其他各种机器制造机械
铣床和其他车床、钻头等
各种交通设备(交通部)
传动皮带、涂胶皮带、变压器带、各种用途的电线、电气机械、闸刀开关、开关等
重油、润滑油等
造币纸、新闻印刷纸、拷贝纸等
各种化学原料，各种酸、油漆、染料、溶剂等

附件二：

1947年减少出售给各州及加盟共和国集体农庄的汽车总额清单

	原定数量	减少数量
车里亚宾斯克州	256	30
库尔干州	626	40
巴什基尔州	350	25
契加洛夫州	488	40
古比雪夫州	368	26
萨拉托夫州	500	36
沃罗涅日州	400	20
罗斯托夫州	606	30
库尔斯克州	500	25
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577	36
鄂木斯克州	700	35
新西伯利亚州	700	35
斯大林格勒州	500	22
共　　计		400

附件三: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1947年7月21日)

提供给东北的苏联原材料和货物清单
(支付价值为200万的铁路枕木)

棉布,4 000米
制装用棉花,300吨
缓燃导火线,100万米
密封容器,100万件
阿芒炸药,300吨
火柴,2 000箱
烟草(马合烟),20吨
糖,500吨
大马哈鱼,200吨
驼背大马哈鱼,200吨

附件四:

1949年提供给满洲的苏联货物、设备和原材料清单

运输汽车,3 000辆
汽车外壳,1.52万件
汽车附件,价值1 910卢布
航空用汽油,1 500吨
汽车用汽油,2.38万吨
拖拉机用和照明用火油,1.084万吨
油和润滑油,1.183万吨
其他石油制品,5 070吨
拖拉机,205台
黑色金属轧件,7 300吨
轧制件,2 050吨
有色金属轧件,2 100吨
电线,47.8万米

动力电缆，41.8万米
电动机，1 443台
金属切割机床，657台
棉布，1 500万米
帆布，15万米
棉花，1.5万吨
羊毛短袜，100万双
药品和医疗器材，价值5 580卢布
造币纸，7 000吨
打字纸，1 580吨
新闻用纸，2 930吨

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主任
M. 波马兹涅夫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4

№16301

齐赫文斯基与张东荪、吴晗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苏关系

（1947年9月26日）

机　密

致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通金同志：

兹送上驻北平总领事和华北民主同盟领导人张东荪和吴晗两位教授会谈纪要。

附上述所提内容3页。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 Л. 齐赫文斯基

附件：

应我们的邀请，中国民主同盟秘书长张东荪教授在中国民主同盟华北分部主席

成员吴晗教授陪同下,拜访了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在与总领事的会谈中发表了如下讲话:

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要把中国的内战夸张成国际冲突。不能排除国民党内的极端派分子对大连发动进攻的可能性,其目的是挑起中苏的冲突,把问题交给联合国审议,以及把美国拉进对苏联的战争。国民党政府在所有的报刊上不断地进行反苏宣传,特别注重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进行反苏宣传。在这方面,由于苏联在对华政策方面的消极态度,国民党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比如,1946 年 2 月国民党人在掀起的反苏运动中,有两次成功地把中国的教授和大学生们争取到自己一边:

(1) 昆明西南联大的 130 名教授里有 110 名在国民党人起草的要求苏联军队撤出中国的决议上签了名;

(2) 北平几乎全体教授和大学生出席了纪念在东北被打死的张莘夫工程师的追悼会,同意要求苏联归还从东北运走的工业设备。

现在国民党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的宣传旨在破坏苏联对外政策的威信,希望社会舆论相信,中国对外政策中的反苏方针是正确的。

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对苏联知之甚少,但是知识界的一些进步分子是非常同情苏联的,他们团结在民盟中,内心反对国民党,只是又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然而,对于苏联 1947 年 3 月以后对华政策所采取的消极方针,他们感到十分不安,因为这离开了苏联以前在三国外长第一次莫斯科会议上公开声明的政策——旨在在中国建立和平民主政府而进行国际干预的政策。

与此同时,中国知识界的这些进步分子看到,尽管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失败,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要用武装力量彻底粉碎国民党的战争机器,可能还是要拖到 1949 年初。这是在美国不给国民党积极援助的情况之下,反之,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彻底失败则可能要到更迟些时候才会来临。

眼看中国人民在这场骨肉相残的战争中损耗着自己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遭受着痛苦和灾难,我们,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代表,要求尽快地看见中国的和平——不是美国式、国民党式的和平,而是民主的和平,最终要迫使国民党放弃自己的独裁专政。

故而,我们把全部目光投向苏联,在正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上,苏联为和平而斗争赢得了中国民主人士的热烈称赞。

我们认为,苏联改变自己对华的消极政策为积极政策,不仅能够帮助中国人民制止内战,而且能让国民党如今在中国制造的反苏舆论全面地、一致地转向对苏友好。

我们所提出的苏联对华新政策的建议,实质如下:

由于正在举行对日和会,苏联应公开照会美国指出,必须由民主中国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而不是由曾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于 1945 年 12 月共同谴责的、缺乏民主的、不能代表中国人民的那个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大会。故而,苏联应要求美国同意共同落实第一

次莫斯科会议通过的旨在制止威胁世界和平事业的中国内战的对华决议。即使美国拒绝了苏联的这个建议，它还是会让中国人民知晓，并且会引起中国人民的广泛好评，并掀起新的反美运动。

在苏联政府同意这样改变自己的对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将通过民盟尽早开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保证在上海和北平对美苏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建议获得赞许和欢迎。

这个建议目前只是由我们二人提出，但是我们保证它会得到民盟的一致通过。

我答应张东荪和吴晗教授，把他们和我的谈话内容以及他们提出的建议通报给苏联外交部。我同时声明，苏联的对华政策自1945年三国外长的莫斯科会议以来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苏联的对华政策表明了对中国主权以及严格不干涉其内政的原则的尊重。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馆秘书季托夫出席了会谈。

苏联驻北平总领事
C.齐赫文斯基(签名)
1947年9月26日

文件共3份，送：马立克、通金、档案室
1947年10月27日

АВПРФ, ф.0100, оп.40а, п.264, д.23, л.59－62

№16302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谈军事形势

(1947年9月29日)

机　密

兹报告如下：

我收到了毛泽东于1947年9月1日致中国特区全体党、政、军组织的电报，该电报系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捷列宾从毛泽东那里收到并转给菲利波夫的。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军事行动中，消灭了国民党正规军97.5个旅，78万人，伪军、保安部队以及地方军队34万人。总计112万人。

我们这一伟大胜利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致使敌营人心惶惶。我国全体人民为此胜利而欢欣鼓舞。这一切已经为彻底粉碎敌人的力量和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

1. 战争第一年的军事行动:

国民党从自己正规军的248个旅中派出218个旅,人数为160万和约50万人的特种军队(海军、空军、炮兵、坦克和工程部队)、伪军、警察部队和保安部队来对付中国的解放区。我们的军队由于在内线作战中正确地选择和运用了战略方针,不惜牺牲,以超过30万人的伤亡以及损失大片土地的代价,在各处掌握了主动权,因此它能把112万人的敌军分割开来并予以消灭。

不但如此,我们的东北部队在热河省、河北省东部、山西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开始战略反攻后,收复了一些老区和占领了大片新区。

2. 我军在战争第二年的基本任务:

实施全国总反攻,即在外线打击敌军的任务,将战争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去。

在内线尽可能地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的反革命战略——它要在解放区的土地上作战,目的是破坏和消耗人力和物力资源,使我们没有可能进行持久战。

将战事转移到国民党统治区将会遇到一系列困难,因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建立新的根据地需要时间,要不断进行运动战来消灭敌人的力量,要动员群众进行土改,建立新的政权机构,要把人民武装起来。这些困难可以也必须克服。敌人迫不得已将更高度地集中自己的力量,而这就使得我们有可能在广阔的领土上开展运动战。在那里,运动战将会成功,因为这些地区的人民群众同情我们,憎恨国民党制度。

3. 保证在国民党统治区作战成功和夺取彻底胜利的根本条件:

(1) 要善于选择攻击的决定性时刻。要以不屈不挠的坚定性和勇敢精神去进行胜利的战争。

(2) 坚定地贯彻争取广大人民群众的政策,满足他们的需求和利益,使他们支持我们的军队。如能贯彻这些条件,我们一定会胜利。

4. 至今年8月底的敌军状况和我们的武装力量:在南线有157个旅,在北线有70个旅,在国民党后方有21个旅。总计仍是248个旅。正规军150万人。特种部队、伪军、交通部队、警察部队、保安部队120万人。

非战斗的军事机关编制100万人。总共为370万人。(在南线顾祝同指挥下有117个旅,程潜等人指挥下有7个旅,胡宗南指挥下有33个旅。)

顾祝同集团军的117个旅之中被消灭和遭重创的有63个旅。其中部分军队尚未进行补充。

顾祝同集团军的这些部队中,仅有54个旅没有遭受到重大损失,没有受到过毁灭性打击。目前顾祝同的军队只有32个旅可用于运动战。余下的全部用于防卫。

程潜等人指挥的集团军——7个旅只有打保卫战的能力。他们之中有1个旅在和我军的战斗中遭受了重创。

在胡宗南指挥的集团军的(其作战区域在兰州以东,宁夏—榆林偏南,临汾—洛阳偏西)33个旅中,被消灭和遭受重创的有12个旅。只有7个旅能打运动战。余下的只能用来防御。

北方前线有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东北的26个旅中，被消灭和受到重创的有16个。

在孙连仲集团军的12个旅中，有8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

在傅作义集团军的10个旅中，有2个旅受到了重创。

在阎锡山的15个旅中，有9个旅被消灭或受到重创。余下的也只能打防御战。

国民党在后方只有21个旅。其中8个旅在新疆和甘肃省西部，7个旅在四川和西康，2个旅在云南，2个旅在广东(被消灭的第六十九师)，2个旅在台湾。

在湖南、广西、贵州、福建、浙江和江苏没有一个国民党正规军的士兵。

今年国民党为了补充自己的军队，借助美国人的援助计划动员了100万人，同时训练了几个重新组编的旅和团。

如果我军依然照战争上一年那样，能够继续平均每个月消灭8个旅，那么战争第二年就将消灭96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今年7月和8月里已经消灭了16个半旅)。这种情况将会进一步削弱敌军，并使它的战略机动能力跌落至最低点。这将迫使敌人在国内全线转入防守。他们将到处遭受到我军的毁灭性打击。

动员百万新兵和训练旅、团新军都挽救不了国民党。抓壮丁和买壮丁，这就是他们动员的方法。国民党采用这种途径未尝能达到如愿的结果。大批士兵开小差和战争转移到国民党地区，将削减它的人力和物力资源。

5. 我军作战行动的性质依然如故，即主要打击孤立的敌人，一个战役消灭一个或几个旅，就如同2月在莱芜、7月在山东省西南部曾发生过的情况。紧接着要集中大规模的兵力消灭强大的敌人，控制中小城市和大量的农村。

最后，夺取大城市，彻底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这就是我军作战的主要特点。集中优势兵力来保证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包围敌人，不让他们逃出一个，并将他们消灭。

在特殊的情况下，允许全力迎头进攻敌人。同时包围进攻敌人的一翼或两翼，以便用局部消灭和彻底歼灭敌军的方法，我们便有可能快速重新部署自己的兵力，来消灭敌人其他的部队。

不打无准备的仗，不打无把握的仗。为了达到成功，必须在每一仗的力量对比上占有优势。

要大力发挥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

要尽量迫使敌人来回奔走，这会让我们有可能进行运动战。同时，必须更加重视教会部队打阵地战和进攻设防点。

为了保证夺取城市和敌人的主要据点，要组建大量的炮兵和工兵部队。

要坚决进攻和夺取所有防御薄弱的城市和设防地区。对防御力量一般的中等城市，则要在有利的形势下才发动进攻和夺取。

暂时不动敌人防御力量强大的大城市。

利用从敌人那里缴获的武器装备充实自己的力量，利用俘虏的士兵(80%—90%)和有限数量的尉级军官。

通过国民党统治区的资源和俘虏来补足自己军队的同时,部分利用老解放区的人力和资源。这点特别同南方前线的部队有关系。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无论在新、老解放区都要进行土改。(这是夺取全国持久战胜利的基本条件。)

发展工业生产,厉行节约,加强军工建设。动员一切为了前线,为了保证胜利。

只有遵守这些条件才能顺利地进行持久之战并取得胜利。

6. 以上所指各点是上一年的作战总结和我们未来的战略方针。

希望全体领导同志把这封信发下去:军队里发到团级指挥官及以上各级,党组织里发到区委委员及以上各级,政府机构里发到行政管理处级及以上各级,为的是要让所有同志了解自己的任务并坚决地、丝毫不动摇地去完成任务。(此信系密件,阅后烧毁。)

上将 库兹涅佐夫(签名)

1947年9月29日

文件共10份,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3-9

№20269

巴拉诺夫呈苏斯洛夫请示:派医生为林彪治病

(1947年10月25日)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M. A. 苏斯洛夫同志:

本年9月29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高岗致函驻哈尔滨苏联总领馆说,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林彪的健康状况不佳,因此高岗请求临时从苏联派遣神经病理学家和心血管疾病专家为林彪的病情进行诊断。

本人认为,支持高岗的请求并派遣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代表、哈巴罗夫斯克医学院教研室主任 Ш. И. 拉特纳教授和新西伯利亚医学院 Д. Т. 库伊莫夫教授前往哈尔滨是合适的。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发现有损这两位同志名誉的信息。

以上事宜已取得苏联卫生部长 Е. И. 斯米尔诺夫同意。

附上决定草案。[①]

联共(布)中央办公厅副主任

Л. 巴拉诺夫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8

№09024

库兹涅佐夫致斯大林报告：毛泽东来电谈中国局势

(1947 年 12 月 10 日)

绝　密

致 И. В. 斯大林同志：

我报告：

我们从情报总局在中国边区的一名工作人员捷列宾那里得到了 1947 年 11 月 30 日毛泽东同志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

“一、人民解放军(从 7 月至 10 月)4 个月的反攻结果是 38.5 个旅的国民党正规军被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包括非正规军在内)的损失是 45.2 万人。在这段时间内俘虏了 53 名将军。因而，敌人平均每个月损失 9.5 个旅，或者 11.3 万人。截至上个月，即今年 7 月份以前，敌人每个月损失 8 个旅，或将近 9.3 万人。

二、在整个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进攻战暂时停止了。我军将主动权掌握到自己的手中。人民解放军以 50 个旅 40 万人挺进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我军在这个区域赢得了当地居民的拥戴。我们以为，我们将会在保障军队的冬衣问题上遇到困难，但是这个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军队的粮食供应是依靠当地居民和从敌人那里缴获来的贮备食品来完成的。军队的武器和弹药主要是靠缴获的物资来保障的。有生力量的补充是依靠俘虏并部分地依靠我后方的预备队。

三、在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我军驻扎在下列地区：刘伯承和邓小平率领的野战军

① 在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个草案。——编注

驻扎在大别山,陈毅和粟裕率领的野战军驻扎在江苏、山东和安徽三省的交界处,陈赓和谢富治率领的野战兵团驻扎在湖北、河南和陕西三省的交界处。

近几个月,其任务是:

(一) 切断平汉路、津浦路及陇海路的铁路线,并将其毗邻的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二) 在明年秋天之前准备好下一步的渡江(长江)战役的条件。

四、西部的3个省——陕西、甘肃、宁夏以及东部的山东和江苏是南部战线的侧翼。这里的战况已有很大好转。

整个西北部地区,除了甘肃省东部的2个县和同宁夏交界的3个县以及榆林、延安、甘泉和富县之外,敌人都被我们肃清了。在这一战线上,我军有10个旅,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在甘肃省南部渭河战线上转入了进攻。

在江苏省的北部苏北游击区,我们有6个旅的正规军,这6个旅不仅能够遏制住敌人的进攻,而且将迫使敌人退却到长江下游的北岸。

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被我们收复。山东省东部地区的形势得到了根本改观。在这里,我们有15个旅的正规军。在即将到来的一年里,我们将收复我们失去的山东省和江苏省的地区。

在南部战线,在山西省的南部和河南省的北部还剩下少数城镇在敌人手中。在这里,我们有2个旅,已经包围和封锁了这些城镇。

五、在南部战线敌人共计有162个旅。其中的大部分已经被我们击溃。这些军队的精神状态非常消沉,军官们手忙脚乱,惊慌失措。

这些军队中最有作战能力的是蒋介石的第五师、第十一师和第七十四师,广西桂军的第七师和青海军队的第八十二师。这几个师中,只有第七十四师被我们歼灭了。其余的4个师(11个旅)没有和我们进行过大的战役。南部战线的国民党军队虽然装备精良,但是却没有能力阻止我军的进攻。

在北部战线,在中长铁路、北平—奉天铁路、北平—绥远铁路和北平—汉口铁路的北部地区沿线驻扎着国民党军队的70个旅。在最近几个月,这70个旅遭受了重创,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将不能投入战斗。在上述地区,我们有55个旅。其任务是切断北平—奉天和北平—绥远铁路线并将东北和中国的北部地区连接成一个统一的区域。

在包括新疆在内的国民党的后方地区,驻扎着16个旅。还有20个旅受过美国人的训练并得到了美国人的装备。

六、人民解放军有140个旅的正规军,90万人。地方部队为6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有50万人。共计200万人。

国民党部队总共有248个正规旅,总人数为150万人,地方部队和包括海军在内的特种部队共120万人,后勤部队和机关为100万人。共计370万人。

七、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里的我们的党组织成功地领导了群众性的工人和大学生

的斗争。在我党的领导下，海南岛地区、广东、广西、福建、浙江省及安徽省的南部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八、美国人和蒋介石企图通过宋子文与我们开始和平谈判，这个企图是一个阴谋诡计，其目的是迷惑广大群众。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蒋介石，都担心我军可能会强渡长江，虽然目前我们还没有这种打算。

在香港的李济深将军、在美国的冯玉祥将军以及其他对蒋介石抱有对立情绪的人，与美国人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将来他们会被美国人利用做有利于美国和蒋介石的事。我们对待这类人的策略是对他们不抱很大的希望，不指望利用他们为革命做事。

九、随着中国民主同盟的解散，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也不存在了。在民盟的成员中有一些是同情我党的，虽然其大多数领导人是动摇分子。他们是在国民党的压力下解散了同盟，因此证明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将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①

十、由于美国人和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在中国人民面前已昭然若揭，所以 1947 年 10 月 10 日我们发布了《人民解放军宣言》和《土地改革纲领》，这些都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过去，中小资产阶级在蒋介石的影响下抱有错误的观点和期望，认为美国将会改变对中国的政策，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倾向于只通过武力来解决中国的政权问题，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都不会被消灭。因此，中国将会形成两权对立的格局，那时，中国共产党将统治中国的北部，而国民党将统治中国的南部。接下来，按照他们的观点，还有解决当前危机的第三条道路。现在，这些错误的观点已经不复存在。国民党失去了中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广大群众现在拥护我党。目前的形势是这样的：在最近的 4 年时间里蒋介石政权将会被消灭。中国已经掀起了新的革命高潮。

毛泽东

1947 年 11 月 30 日”

Ф. 库兹涅佐夫

1947 年 12 月 10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3 - 17

① 在这段话的旁边，斯大林在阅读时加有双重竖线。——原注

№16308

费德林与邵力子谈话纪要：关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7年12月11日）

机 密

12月11日在我们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邵力子之间进行了如下谈话。

邵在答复我有关对当前中国国内政局看法的问题时，他强调指出，战争现在愈演愈烈，按照国民党的倡议停不下来的可能性不大，虽然目前还有极少数人相信能够使用武力压倒共产党人。

邵说，尽管政府遇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而寻找出路、摆脱困境的种种努力实际上几乎全部失败，国民党担心动摇自己的统治地位，不允许在中国建立一个有共产党人和其他民主党派参加的真正的联合政府。很多国民党领袖十分害怕，如果共产党人达到合法参加联合政府的目的，他们就会夺取全部权力。邵补充道，无论是对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破坏，还是发动全面内战，正是这种恐惧心理所造成的。

我继续问：他对选举国大代表的看法如何。邵答道：虽然还没有最后总结，但是已经举行的选举情况清楚表明，人民对选举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几乎是无动于衷。这种情形不用说是多添了一条理由，说明要在指定的日期里召集国民大会是没有可能性的，或者至少是没有意思的。

接着，我表示想知道一下邵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看法。他着重指出，中国正经受着非常严重的经济动荡：因为外汇亏缺不可能继续进口洋货，在许多稻米产区发生了严重的粮食危机和饥荒，中国货币灾难性地贬值，市场物价不断上涨，这一切正在引起极其严重和危险的后果。

至于战局的情况，邵承认，共产党军队不久之前的进攻战役使他们的地位明显地得到了改善，而使政府军处于十分不利的局面。但是，邵指出，中共的这一暂时性的优势也可能产生消极性的后果：目前，如果恢复和平谈判的话，中共会比政治协商会议时提出更加苛刻的要求。

我问邵：他如何看待中国眼下的前途。邵说，他深信内战停不下来，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国内和平也恢复不了。在目前已经形成的局面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中共，都不具备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可观的抑或全面的优势，并顺利结束这场战争。现在需要来自外部的干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试图调停斗争双方的美国的威望又不够。要恢复中国的和平，邵着重指出，只有在苏联参与和友好促进之下才有可能。

我指出，我们从来不会拒绝加强同中国的友好睦邻关系，就如同我们从来就是尊重中

国的独立和主权一样。而在中国国内现实的问题上，我们奉行的是中国人的事情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原则。

对此，邵在答话时指出，这里讲的并非是干涉内政的话，只是对友好关系的促进。根据邵的思路，我们应该理解只有中国国内政局才具备的这一特点，考虑到这一点，苏联应该对正在发生的事件予以自己的影响。“我应该承认，”他补充说，“如今的中国政府显然不可能接受苏联的批评，虽则很可能这个批评是完全公正的。”

我仅指出，不能接受客观的批评未必是一件好事。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同志、马立克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40а，п. 264，д. 21，л. 229－231

№163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12月16日）

致捷列宾：

关于毛泽东1948年访问莫斯科的通报请对毛泽东答复如下：

“苏联政府将欢迎毛泽东前来苏联访问，对于他同中国的通讯联络和个人的无线电自然会予以保障。”

收到电报和毛泽东对该电报的反应，请从速电告。

库兹涅佐夫

1947年12月16日

АВ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25

№16312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7年12月17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报告如下：

1. 电报于当地时间12月17日零点35分(莫斯科时间12月16日19点35分)收到。

2. 我于莫斯科时间12月17日7点30分，未带翻译，亲自向毛泽东本人转达了所嘱托事宜。

3. 毛泽东对转达的情况十分满意。他当即说："很好，现在我可以在那里待上3个月或半年。"他说，他54岁了，他早就想去，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已经去过那里，他列举了许多人：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叶剑英、王明等。他问我，有无指示让我和他同行。

在我提出还有什么要问的以及有关拟定他的动身日期的问题时，他答道，无须再问什么了。

至于动身日期，他说在占领平绥路之后，那时就可以走了。现在不能让蒋有喘息的机会，要击溃他。接着，他转到当地的一些话题上去了。谈话至此结束。在交谈时他十分活跃，神情很满意。他建议我还是留在这里。

捷列宾

1947年12月17日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26

№09109

克鲁格洛夫致斯大林报告：溥仪请求留在苏联生活

(1947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同志：

被关押在哈巴罗夫斯克市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里的被扣留人员、原伪满皇帝溥仪递交了给苏联政府的呈文，请求让他留在苏联生活。

溥仪在呈文中表达了他对苏联政府的感激之情，感谢让他作为苏联公诉的证人出庭东京审判，从而为他提供了"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的机会。溥仪在呈文中写道：将来"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

与溥仪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一起，还收到了他两个侄子给苏联政府的呈文。他的两个侄子——爱新觉罗·毓章(1922年生)、爱新觉罗·毓彦(1919年生)，都关押在内务部第45号特别监狱中。二人原来都生活在溥仪的宫廷里。毓章和毓彦在声明中请求留在苏联生活，以便"有机会学习新的科学成就并同溥仪一起工作"。

溥仪呈文的照相复制件和呈文的俄文译文附后。

呈文原件存在苏联内务部。

苏联内务部部长

C. 克鲁格洛夫(签名)

1947年12月30日

附件：

请　愿　书[①]

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②]政府：

余兹再三以最大诚意与热烈之希望，恳请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俾遂余能长期居住于苏维埃联邦内，得以研究新学识。此余唯一之夙愿，故不顾繁渎，更申言之。余今年已四十有一矣，回忆幼时，曾为中国之皇帝，后又被迫为满洲之傀儡皇帝，统计余之生平，皆在腐败官吏、野心军阀以及帝国主义者之包围压迫下。身受其蹂躏、榨取者亦既半生矣，完全陷在黑暗悲惨之环境内，真乃呼吁无门、离脱无术也。兹幸在一九四五年因苏联邦之仗意〔义〕出师，一举而击破根深蒂固之日本关东军，不独解放全东三省之人民，即余亦因此而得脱去日本军阀之桎梏，此余精神上之生命复活也。

迨至一九四六年蒙苏联邦当局允许余赴东京而为对裁判日本战争犯罪人法庭之证人，因得一洗十余年来之积恨耻辱，此更余所引为意外之欢喜及幸福者也。此皆苏联邦之所赐也。

故余对于既拯救余之生命并允许余为精神上之刷洗两事，实为余极端感激而不能忘者。是以此后余愿以一介人民之资格，愿对于苏中两国人民之永远亲爱、永久团结、永久幸

① 此件为溥仪呈交苏联内务部的中文原文复制件。——编注

② 原文如此，现在通常译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下同。——编注

福事项,愿尽余全心全力,而努力前进。此即余感谢苏联并愿酬报苏联之处者也。

以上乃余之至诚决意,是以再三申请,敬候核夺焉。余并经此重表余至大之谢意,并敬祝斯大林大元帅之福祉并健康。

并敬祝

全苏维埃联邦人民之福祉及永久之繁荣

溥仪

1947年12月9日

ГАРФ, особая папк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д. 171, л. 523 - 528

1948 年

№16313

奇斯佳科夫致马立克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 年 1 月 3 日）

致马立克同志：

按照您的委托，我研究了兹韦列夫①同志给米高扬同志的信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整顿辽东半岛货币流通的决议草案。

鉴于目前辽东半岛流通的货币极度疲软，不能再用作支付手段，同时因为必须健全货币流通以使其适应商品流转的需要，苏联财政部关于发行新的货币和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建议不会引起异议。

关于进行货币改革的条件问题，要在苏联财政部提出具体拟定的建议之后才可能给出结论。

A. 奇斯佳科夫②

手写批注：

给通金同志——经济司和奇斯佳科夫同志个人在这个问题上是无能为力的，请搞清情况，抓紧在今天 1 月 5 日提出建议。

马立克

1 月 5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8，д. 59，л. 1

---

① 兹韦列夫，时任苏联财政部长。——编注

② 奇斯佳科夫，时任苏联外交部经济司副司长。——编注

№13290

普霍洛夫致苏共中央报告：情报局会议后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年1月23日)

巴拉诺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以下资料：《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共36页，2份。

H. 普霍洛夫

1948年1月23日

手写批注：

送E. Ф. 科瓦廖夫同志。

……①，1948年1月23日

归档。该资料已经用于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的影响的情况说明。第二份附件已经在工作中销毁。

E. 科瓦廖夫

1948年2月17日

附件：

禁止公开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中国的局势

前言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中国民主阵营，进行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武装和政治斗争，但是，这种斗争并不具备公开的政治目标——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国民党制度和把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只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才提出了这个目标。的确，中国人民解放军早在1947年7月就开始了自己的反攻行动。但

① 手写签名字迹潦草，无法辨认。——编注

是，它的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争取和平、独立和民主的宣言，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才公布的。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存在着“第三势力”(民盟和国统区的其他民主团体)，它总是希望两个对立的阵营——共产党和国民党——能够和解，其出发点是：它的关于在国际范围内两大阵营——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有可能和解的理念。在九国共产党会议之后，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幻想破灭了，“第三势力”在中国失去了一切根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民盟的禁止，给了它彻底的打击。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在完全消灭封建的和大富农以及教会土地私有制的基础上完成中国的土地革命。当时，大部分小地主和富农分子以及神职人员和与土地私有制有关系的小官吏，还保持着中立的态度，在一系列场合下，他们甚至还倾向于民主阵营的要求。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由于1947年10月10日公布了中国共产党新的土地纲领和在全国开展了土地革命，这些人与反动派阵营加强了团结。但是，与此同时，大量的农民、贫雇农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租赁土地的中农们，都坚决地加入了土地革命最积极的骨干分子阵营中，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民主阵营获得了巨大的力量和实力。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美帝国主义分子全力以赴地帮助蒋介石，他们认为中国的共产党人没有能力推翻蒋介石。现在他们仍然确信自己的非常错误的打算。但是，他们已经不可能再用以前的老办法来帮助蒋介石了。目前，在“更有效地”使用给国民党政府提供的军事援助和财政贷款事务方面，他们正在加强自己的监督。为使国民党中国的一切资源隶属于自己，他们正在狂热地寻找着帮助蒋介石的新方法。这种“新的方法”必然会导致美国对中国的军事侵略，加重对中国的奴役，将会更加暴露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所以，这些方法的结果是更加促进中国反帝和民主革命的高涨，目前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

这样一来，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削弱反动派的阵营，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展开进攻行动。

一、反响和宣传工作

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在中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中国共产党对于会议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在1947年10月12—16日期间，解放区的一切共产党报刊和民主报刊，尤其是在东北地区——《哈尔滨日报》、《东北日报》、《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都在塔斯社报道材料的基础上，发表了公告、宣言和关于成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协议的全文。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的其他出版物中，发表了《真理报》10月10日祝贺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社论。10月16日，解放区的所有无线电广播站都对此做了报道，在所有民主刊物上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的喉舌——新华社的每日国际述评，阐述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和在贝尔格莱德成立的情报局。其中谈到：

“宣言、九国共产党代表的发言和在会议上交换的意见，是对争取和平斗争的事业的最

伟大的贡献,具有极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华沙会议是对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以及他们在其他国家的走狗的一次沉重的打击。这次会议使他们陷入惊慌,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嚎叫——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他们不明白的最重要的一点在于,共产党在世界各国的力量已经增长到如此程度——共产国际从来没有起到过如此伟大历史作用。如果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那么,在目前来说这并不是前进,而是后退了。"(摘自1947年10月16日的《大连日报》)

10月20日,在《大连日报》、《关东日报》以及东北地区出版的其他民主刊物里,发表了正式的宣传材料,这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局宣传部提出的名为"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几个问题"的材料。在这份宣传材料中,驳斥了国民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中伤,对以下4个问题进行了答复:1. 为什么成立共产国际? 2. 为什么解散共产国际? 3. 九国共产党会议是不是共产国际的复兴? 4. 为什么要建立九国共产党情报局? 例如,在回答第3个问题时谈到:"参加会议的仅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它仅局限在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参加,与此同时,像英国这样重要的国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的复兴'呢? 为什么情报会议只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参加? 这是因为,这九个国家在地域上相互联系,此外,这些国家,尤其是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欧洲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们直接处于来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战争贩子的最恶毒的威胁。至于说意大利和法国,他们是深受美帝国主义压迫的目标。所有这些国家都有着共同的利益,他们之间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是本国人民利益的最忠诚和有最力的保护者。他们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建立了情报局以交换情报和交流经验,以便保卫和平,不给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自己国家活动的机会。情报局并不具备中央领导机关的权力,除参加会议的九国共产党之外,它不与其他任何国家的共产党发生关系。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阻止新的战争的发生。怎么能说这是'共产国际'呢?"

1947年10月26日,东北地区的所有刊物都发表了关于"现代国际形势研究的提纲",这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东北局根据九国共产党会议宣言和日丹诺夫同志的报告编写的。该提纲分为如下章节:1. 世界两个阵营的划分;2. 帝国主义阵营;3. 民主主义阵营;4. 全世界人民的任务;5. 关于九国共产党会议。例如,在最后一章中谈到:

"在关于欧洲九国共产党华沙会议的报道发表之后,帝国主义阵营的报刊也掀起了所谓的'共产国际复兴'的喧嚣。在此没有任何东西令人吃惊的。第一,希特勒和日本帝国主义在战争开始之前以及所有的帝国主义分子在战争结束之后,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因为所有国家的共产党都是本国人民的代表,是帝国主义实行侵略计划的主要障碍。帝国主义分子反共产主义的造谣攻击,只能暴露他们是和平和民主的敌人。第二,各个国家的一切反动力量已经联合起来了。不久前召开了19个国家的社会党与工党的两次代表大会,这些工党已经恢复了自己的共产国际组织作为中央领导机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九国共产党不可以召开自己的会议,并成立情报局以交流经验呢? 难道只有反动力量可以为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而联合起来吗? 难道进步力量不应该为交流经验和阻

止侵略而联合起来吗？第三，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公报明确地谈到，情报局的成立完全不意味着恢复具有中央领导权的某种世界共产主义机关，即类似于从前的共产国际的组织。事实是这样的：共产国际组织于1943年就被解散了。实践证明，它的解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刺激了所有国家的工人和人民运动的积极发展。如果恢复共产国际组织，那么，这就是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但是，这正是反动派集团不可能也不想明白的。”

在提纲中，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重大意义进行了详细的说明：

“1. 会议向全世界证明：共产党人过去和今后将永远是为争取自由、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平和民主而斗争的最忠诚最可靠的战士。2. 世界各国的反动派已经联合起来，组成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阵营。九国共产党会议撕下了他们的假面具，打碎了他们手中造谣和欺骗的武器，揭露了他们的罪恶计划。因此，这次会议是对以奴役各民族为目的帝国主义政策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一切帝国主义分子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造谣攻击，都证明他们受到了极其痛苦的打击。3. 华尔街老奸巨猾的政客们决定奴役全世界人民，而其他各个国家的反动派集团紧随其后。全世界人民应该保卫自己的民族独立、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全世界的和平。因此，代表本国人民利益、民主和和平的各国共产党的联合，是这项事业的胜利和粉碎帝国主义计划的首要保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欢迎这种联合的原因。4. 九国共产党会议明确指出了：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已经聚集在社会主义的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周围，这些力量已经得到了巩固，今后将会继续得到更大的发展，而争取和平和民主的斗争将在全世界范围内更加顺利地发展。”

在1947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期间，在中国解放区的一切共产主义和民主刊物上，都发表了日丹诺夫同志的“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

除此之外，10月14日，在《大连日报》和东北地区的其他刊物上，都公布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的反响。在解放区的民主报刊上，每周都发表新华社题为“欧洲局势”的述评。其中表明了欧洲国家民主力量的增长和他们反“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例如，在1947年10月9日的述评中，表明了西欧国家由于经济危机而发生的工人运动的规模，以法国、意大利、英国、奥地利、比利时和荷兰共产党为首的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在西德进行的反对“马歇尔计划”的斗争情况。同时还系统地阐明了希腊民主力量的斗争情况以及与中国相邻的殖民地和从属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情况。

遗憾的是，我们还没有掌握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中国的北部和中部解放区出版的宣传材料，因此，我们也无法评价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在这些地区的宣传情况。我们还没有收到关于总结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口头宣传的工作情况的材料(演讲、小组会议、军队里的政治学习、群众集会，等等)。也可能，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远远不够。看来，在那些共产党和民主报刊被禁止的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还不能令人满意。在国统区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被宣布是非法的，任何群众聚会和会议都会遭到禁止。10月16日，在香港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刊物——《群众》杂志和《晨报》中，公布了九国

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不加注解的全文(完全有这种可能：这些杂志的编辑部远离党的中央机关，不可能表达出党对会议的正式意见，没有来自党中央的立场)。

国民党报刊和国民党的官方机关，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掀起了巨大的造谣攻击运动，把这次会议和成立情报局，描绘成"共产国际的复兴"，甚至是"共产国际从地下走了出来"。国民党分子开始进行"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而欧洲和美国的一切资产阶级情报电讯社立即效法这种虚假的宣传。与官方的诽谤宣传相反，中国共产党中央驻香港的代表乔木，于1947年11月22日作为广东报刊的代表声明，国民党报刊的这种报道"纯属虚构"，而国民党的报纸仍然继续发表关于"东方七国共产党会议的详细情况"。例如，《中央日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南京政府的机关报)于1947年11月29日报道说："这次会议讨论了以下几个问题：1. 在远东地区成立共产党情报局；2. 远东地区各国在其争取自治的斗争中相互合作；3. 不断地进行共产主义革命。"而国民党警察的报纸《猎报》(Лебао，在上海发行)于12月19日在对"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细节进行报道时，胡言乱语地说了一些反苏维埃的谣言，以至于在上海的美国机构都承认这是国民党法西斯分子制造的谣言，并表示意见："成立这样情报局的同时，一定会发表政治声明，因为它的使命是进行公开的工作和宣传。"(塔斯社，1947年12月19日)

国民党政府之所以需要这种"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愚蠢谣言，显然是为了把中国旨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反动派的人民运动说成是"莫斯科提出来的"运动，并使自己的美国主子确信，在给国民党提供军事和财政援助方面美国是最慷慨的。

而中国的民主同盟丝毫没有表现出自己对于九国共产党会议的态度，也就是简单地采取了默认这一事实的立场，但是，在遭到来自国民党政权——宣布它为非法组织——的镇压之后，它制定了新的纲领，积极进行反对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斗争。

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重复了国民党针对九国共产党会议进行的诽谤性宣传。

反映中国"中立的"中等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大公报》是最大型的和最有影响力的报纸，它的立场具有某种耐人寻味的含意。在1947年10月18日的那一期中，在涉及关于欧洲几国共产党情报会议公报的内容时，这张报纸写道："实际上，不幸的事件是，随着胜利而来的是美国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结果——实力政策。美国想利用自己的美元和原子弹统治全世界，而同时苏联又以它的斗争意志，试图扩大自己的'铁幕'范围，它们之中谁也不愿意做出丝毫的让步。"

在把成立情报局描绘成是"共产国际的复兴"的同时，《大公报》还强调指出："采取这个步骤是为了抗衡'马歇尔计划'，因此，它具有反美的性质。"《大公报》重复了关于"共产国际复兴"的诽谤性谣言，但是，同时又在同一期发表了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和关于成立情报局的协议的全文。如果考虑到国民党统治区禁止一切民主刊物出版，广大读者多亏了《大公报》才读到这些辉煌的文件的话，那么，这个事实的重大意义就非常明确了。《大公报》在上海出版10万份，此外在其他一系列国民党的后方城市里也独立发行。

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

九国共产党会议对于中国总的形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路线产生了影响。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自己的1947年12月25日会议上，讨论了关于“目前局势和我们的任务”的问题(毛泽东的报告)，为党和全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密切结合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向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发出的关于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斗争的号召，勇敢地、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革命。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用如下词句表达了自己对于这个重大事件的态度：

“反帝阵营的一切力量联合起来，共同前进。欧洲九国共产党建立了情报局，并发出了斗争的号召，呼吁全世界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计划给予坚决的抵抗。这些号召鼓舞了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给他们指明了斗争的道路，坚定了他们对于胜利的信心。这些斗争的号召，使全世界的反动分子陷入了惶恐不安的境地。东方各国的一切反帝力量应该联合起来，以便在自己的国家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分子的斗争，并以解放数以万计的东方各国被压迫的人民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摘自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参见塔斯社1948年1月3—5日的报道。)

1947年10月中旬，在发表九国共产党会议公报、宣言以及有关在贝尔格莱德成立情报局的协议全文的同时，还发表了献给1911年中国革命36周年的人民解放军宣言。在这份宣言中，第一次提出了关于推翻蒋介石政权、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国的口号。在这个基础上，中国的民主力量公开开始了针对国民党政权和帝国主义殖民者的政治进攻行动。

宣言指出：

“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主要的有如下各项：

“(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二)逮捕、审判与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

“(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各项自由。

“(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

“(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及其他首要战犯的资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

“(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乡村田地，由乡村人民按照人口及田地之数量、质量，平均分配使用，并归其所有。

“(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及自由加入中国联邦的权利。

“(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联合世界上一切

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土地革命、彻底根除封建土地私有制和实现在农民中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的道路上，迈出了最重大的一步，这是进行反帝和民主革命的基础。正是因此，关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3亿农民与工人阶级联盟的问题得到了彻底的和坚决的解决。正如新华社所报道的那样，在中国的所有解放区里，召开了土地大会，拥护1947年9月中旬通过的“主要的土地纲领”，在平等分配土地和资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措施。1 000万农民——雇农、贫农和中农——都分得了地主、寺院和教堂的土地和资产，并剥夺了富农分子的土地和资产。这个因素极大地瓦解了在国内战争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并促进了国民党后方各省的人民起义运动。中国报刊报道了人民起义运动的发源地：广西省南部、江西省和广东省交界地区、福建省、江西省的北部和南部、云南省的东北和西北地区、浙江省的南部、四川省的中部和东北部地区。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根本没有能力镇压这些运动。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更加大规模地进行了人民解放军对国统区的军事进攻行动，这些行动变得更加积极，主要是政治目的更加明确了。从10月中旬开始，随着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宣言的发表(参见上文)，人民解放军在自己的进攻行动中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全国各地的国民党政权，推行土地革命，占领长江流域的关键性战略要地，为最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政治中心而做好准备工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10月至1月)，人民解放军在实现自己的战略任务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军迫使国民党的军队“撤离”吉林和长春，并攻占了其重要堡垒——沈阳。夺取沈阳就预先注定了蒋介石在南满地区整个集团军的命运。正如北平所报道的那样(塔斯社1月20日消息)，蒋介石第五军的2个师，带着自己的全部武器和指挥官，转向了沈阳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一边。

在指出人民解放军在江苏、山东、河南、安徽各省战场上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时，战区司令部军事观察员于今年1月19日通报说：“由于12月份这个战场上进行的战斗行动，不仅陇海铁路、平汉铁路被切断了，而且就连河南省的首府开封也陷入孤立境地，人民解放军的队伍已经直接逼进国民党军队在郑州的指挥中心，除此而外，在夺取国民党的军事基地许昌、洛河和驻马店的战斗中，还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3万多人……在这个广阔地区的整个国民党军队已经被打得七零八落。国民党的整个第五兵团已经被击溃，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国民党主力部队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军事观察员还强调指出了在这个最重要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被大规模地瓦解的情况。“被包围的国民党士兵以整排、整连甚至是整团的方式投降。发生过这样一件事：被击溃和被瓦解的第三师第八团的整个队伍，在平汉铁路地区转向人民解放军一边。1月18日，人民解放军冲破了国民党军队在大别山(位于汉口的东北部地区)的封锁线，歼灭了国民党士兵和军官8 000多人，攻占了与最重要的工业中心——汉口相毗邻的地区以及与南京相毗邻的地区。与此同时，人民解放军的大批队伍从河南的西部地区挺进四川省，另一些队伍强渡长江，进入了湖南和江西省境内。”

这样一来，在欧洲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进攻行动的结果是，夺取了一系列决定性的战略要地，为确保今后攻占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的政治中心创造了条件。

三、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

九国共产党会议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了中国的民族民主统一战线。

毛泽东说："目前，我们的新的民主统一战线，已经比过去的变得更加广阔和更加密切了。这种情况不仅与我们的土地政策和我们对城市居民实行的政策密切相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与那个总的政治局势密切相关，这种政治局势可用人民解放军的胜利、国民党从进攻转入防御、人民解放军从防御转入进攻和中国革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来评定。现在，人民已经看到，推翻国民党的统治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人民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身上，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

目前，少数民族也坚定不移地加入到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的队伍中。

内蒙古自治政府主席云泽①在自己的新年讲话中，号召内蒙古人民在1948年实现平均分配土地，根除畜牧业地区的封建剥削制度，以便改善内蒙古游牧部落的生活水平，组织自由牧场。与东北地区人民解放力量共同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应该完善和扩大自己的骑兵队伍。全体内蒙古人民的财政、经济和实力，应该用于推翻蒋介石的专政制度，从而达到解放内蒙古人民的目的。

属于"第三势力"的中国民主同盟，在去年10月遭受国民党政权的禁止之后，坚决改变了自己原有的立场，中国青年党和中国社会民主党自1946年11月起，就一直处在与国民党的同一个阵营里。它是国民党中的民主派别，1948年1月初脱离国民党，并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

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国民党当局禁止的不仅是这一个政党，还有一系列小党和群众性组织也遭到了禁止，其中包括：农工民主党(曾经是第三党派)；救国会；农村建设协会；职业教育协会；国家民族改造协会；以著名的工业家章乃器和胡厥文为首的民族工业者政治团体；争取和平和民主斗争的人民组织团体；华南民主促进会。此外，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内在联系的，还有一些工会、妇女、学生组织和国统区的其他群众性组织以及海外华侨人士。民盟组织共计有10万多名成员。

同盟的一位活动家邓初民写到，它(同盟)是"第三种力量，属于这个力量的还有民族资本家、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分子"。

南京政府关于禁止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通告指出，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原因是，同盟似乎已经变成了"共产党的分支机构"和"帮助共产党人实现旨在暗中对抗全国总动员纲领的地下活动"(《南华早报》1947年10月30日)。国民党保密局借口说，它仿佛已经掌握了

① 云泽，即乌兰夫。——编注

“文件证据”,证明“中国民主同盟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已经就采取共同行动推翻政府方面达成了协议”(同上)。

但是,中国民主同盟的文件驳斥了国民党保密局的这些断言。

在国民党政府召开了自己的“国民会议”,并大规模地展开了针对中国解放区的军事行动之后,民盟制定了自己的行动纲领,其内容如下:

“1. 坚定不移地走和平、民主、团结和统一的道路,全力以赴地实现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2. 与一党专政和国民党执政当局的虚假民主进行坚决的斗争,反对现政府的违背大多数人利益的措施和行动。但与此同时,同盟并不追求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现政府,而只是用和平斗争的手段,号召和组织人民群众,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回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中指明的那条道路上。3. 在反对一党制、争取完成政治协商会议决议的斗争问题上,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但不参加共产党的军事行动。4. 争取与美国和苏联进行合作,力争在外交领域里与他们合作。5. 力争实现土地改革,发展民族资本,建设独立的、真正的人民经济,进行反对官僚、买办资本和大地主的斗争,捍卫工人和农民的利益,改善人民的生活条件。6. 对于任何政治问题的态度要从人民利益的角度出发;在国民党与共产党的争端之中,不能仅局限于扮演调解人的角色和保持中立立场,而是要捍卫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并依靠后者的力量。”(《文汇报》1947 年 1 月 8 日)

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目标,是力争建立一个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联合政府。

文件中还谈到:“我们所指的并不是虚假的、参加其中的只有个别党派的联合政府,而是坚持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一切政党将在平等原则的基础上参加到这个政府里,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就没有可能阻止国内战争和在中国确立和平。”

这样一来就非常清楚,国民党政权与之打交道的只是以中国民主同盟为代表的这样的党派,即这个党派根本就没有打算鼓动人民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起义,而直到最近它仍然遵循着和平劝说国民党反动分子的立场,企图在大规模和平行动的压力下说服这些反动分子回到实现已经签署的政治协商会议决议以及 1945 年 12 月莫斯科三国外长就中国问题达成的协议的轨道上。但是,当中国民主同盟对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劝说和吸引群众放弃反对国民党政权的急进斗争手段时,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却从来都没有放弃使用一切恐怖手段对付这个和平的政治组织。1946 年 5 月,著名的民盟活动家王仁和李文仁在西安被害;1946 年 6 月,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在昆明市杀害了中国民主同盟的两位领导人李公朴教授和闻一多教授,并焚毁了它的书店和出版社。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之后,特别是在民盟拒绝参加“国民大会”之后,这个组织的 2 万名普通成员和在各地的工作人员,都遭到了搜查、逮捕和毒打。1947 年 7 月 11 日,国民党当局根据虚假的指控——指控其贩卖鸦片和从事亲共产党的活动,在西安处死了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的领导人杜斌丞。与他一起被处死的还有中国民主同盟的 19 名工作人员。

南京政府的宣传和新闻部长董显光在 1947 年 11 月 5 日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发表声明,并代表政府做出允诺:“民盟的成员将不会遭到逮捕,他们将充分享受法律的保护,只要

他们不破坏国家的法律。”但是，第二天，在英国的一家报纸(《南华早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报道：国民党的秘密警察对上海、南京、汉口、广州、北平、天津、重庆、成都、西安以及其他城市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普通成员和工作人员进行了大规模的逮捕。民盟主席张澜被软禁在家中。民盟的领导人罗隆基试图获得在美国大使馆的避难权，在那里他向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声明说，跟踪他的国民党特务威胁要杀死他。11月5日，民盟在上海的办公室布满了警察，警察从外面包围了整个大楼，不允许里面的任何人离开大楼，同样也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大楼。10月28日民盟领导人罗隆基答《上海日报》记者问时声明说：政府宣布的关于民盟是“非法”的命令，直接威胁到了2万多名民盟成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置于国民党秘密警察的监视之下。接着他还说：“最奇怪的是，政府对待民盟组织的态度，同对待共产党人的态度一样，尽管大家都非常清楚，民盟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种类的武器，甚至连普通的手枪都没有，可是共产党人却拥有武器，并借助于军队进行反对政府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在组织对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恐怖和迫害活动的同时，向其领导人提出了最后的通牒，要求民盟或者放弃自己的纲领，谴责共产党，在立法院“选举”时与政府合作，或者“自行解散”，否则就将对民盟实施“关于镇压共产主义暴动分子全国总动员令”中相关的条款。根据这个条款内容，一切阻碍国内战争进行的党派和组织，都是非法的，并属于被禁止的对象。面对这种恐怖的压力，该组织的领导人认为“自行解散”中国民主同盟要好一些。

民盟主席张澜在就“自行解散”发表的正式声明里——发表在1947年11月6日的中国报纸上——谈到：“中国民主同盟自成立之日起，一直在为争取国家的民主、和平和统一工作着。不幸的是，国内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和残酷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再继续为国家效力了。”(《南华早报》1947年11月6日)

在民主同盟遭到禁止之后，所有真诚的中国民主人士和爱国人士——他们不属于任何党派和团体，不属于任何阶级和阶层——清楚地认识到：在中国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势力”生存的地方，他们只剩下一种办法与反动派进行清算——也就是：坚定不移地采取中国民主同盟至今仍然制止群众采取的那些“极端的措施”，来回答国民党反动分子的暴力行动。

民盟领导人之一的马叙伦教授早在1946年12月上海群众集会时发表的讲话，已经传遍了整个中国。他说：“从今天开始，有的只是民主人士和反民主人士，‘第三势力’这应该是过去的术语了。”而现在“第三势力”确实已经成为过去。民盟中央委员会的16位委员成功地冲出了国统区，来到了香港。他们以其华南的分支机构为基地，在香港恢复了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月5—15日期间召开了民盟中央第三次全体会议，正如香港的报纸《华乡报》所报道的那样，民盟拒绝承认其解散的命令，并制定了新的纲领：与中国一切民主的爱国的力量一起共同行动，坚定不移地进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斗争。

与此同时，所谓的“国民党民主团体”也采取了重大的步骤，脱离国民党，并加入到民主阵营中。今年的1月初，该组织在香港成立了自己的“革命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有：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廖仲恺的妻子)、蔡廷锴、柳亚子等人。委员会提出的纲领是：“推翻反

动专制的蒋介石政权,实现和平、独立和民主。”正如身在美国的冯玉祥在纽约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声明的那样:“革命委员会准备与为推翻蒋介石政权而斗争的一切民主力量进行合作,其中包括与共产党的合作。”

民主力量的联合和人民解放军的胜利进攻,促进了国统区的群众性革命运动。

受到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九龙的胡作非为的刺激(杀害了两名抵抗英国警察的中国人,英国警察强行驱赶居民离开指定为英国机场的地区),1月16—18日,在上海和广州爆发了大规模的群众反帝游行示威活动,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国民党政府。1月18日在上海,有1万名大学生和中学生参加了游行队伍,他们高呼口号:“英国军队滚出九龙!”“美国军队滚出中国!”“我们要为九龙遇难的弟兄报仇!”“打倒不保护自己人民的政府!”“中国的美国将军越多,中国人民就牺牲得越多!”“我们反对剥夺我们人民权利的美国人!”“我们反对出卖福摩萨!”“打倒叛徒!”“和平万岁!”“打倒腐败的政府!”“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专制!”1月16日,游行活动在广州市的沙面地区形成了高潮,焚烧和破坏了许多英国的建筑。其结果是驻广州的英国总领事馆大楼、英国情报部机构、英国“巴特尔菲尔德·安德斯瓦耶尔”公司和香港航空公司的大楼均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有几个英国公民和中国公民受伤。

这些群众运动已经成为一种信号,即华北地区的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目前已经得到华南地区反国民党和反帝国主义革命的补充,全国范围内的伟大革命的转折已经来临。

四、对苏联好感的增强

可以列举出无数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民群众对苏联的好感极大地增强了,不仅是在中国的解放区,而且在国统区也是如此。在中国的解放区里,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因为共产党的报刊和一切宣传工具,经常系统地报道苏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里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并详细地说明苏联的和平政策。除此之外,4 500万的东北居民和内蒙古居民还经常记得:是苏联和苏联红军把他们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的。中国解放区的整个社会各界,极其隆重地庆祝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在所有的城市和乡村里,人们进行了集会和游行活动。这一天,解放区的所有报刊都发表了关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对中国的重大意义的文章。还有许多其他的证据,可以证明中国解放区人民群众对苏联的热爱和好感。这并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我们想提请注意的是:中国国统区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在增强,而在这些地区国民党的报刊和无线电广播,每日都在诽谤苏联,千方百计地唤起人民对苏联的仇视。

我们所掌握的关于对苏联好感极大增强的证据,都是取自于《大公报》读者的回应文章以及读者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来信,很难说这些读者属于共产党或者与苏联有什么联系。例如,有一位化名为“C. O. C.”的读者,在1947年11月15日给《中国每周评论》杂志编辑部的信中写道:“地方的英文报纸和中国报刊,在庆祝俄国十月革命30周年的文章中,都竭力绕开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实,那就是:苏联工业已经达到了1940年时的水平,

也就是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尽管法西斯的野蛮行径和破坏，给苏联的一些重大工业中心和农业地区造成了巨大的损失，而社会主义制度只用了两年时间就医治了战争的创伤，使生产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苏联做到了这一点，虽然它在战争中损失的物质财产和人员伤亡，要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大，无论是敌国还是盟国。当别人都在谈论原子弹的秘密时，我写的则是像工业化这样的'小'问题，因为我真诚地相信，工业化比所有的原子弹和秘密武器起的作用都大。俄国的原子能就开创了社会主义的人民的力量。这个秘密美国人至今还没有发现。应该在1950年完成的苏联五年改造计划取得的成绩，对于全世界来说，比任何计划、学说、会议和集团都重要。"(《中国每周评论》1947年11月15日)。该杂志还通报说，在苏联十月革命周年的时候，中国国统区的绝大多数报刊都举行了庆祝活动，他们考虑到群众的情绪，不得不强调改善中国与苏联之间关系的重要性。

《大公报》在祝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0周年的纪念文章中写道：

"希望苏联在资本主义世界面前投降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今天的苏联已经强大到足以在国际政治中起作用了。苏联已经实现了人类理想的主要部分，也就是：建立和实行新的经济体制。当然，它应该珍惜所取得的成就，努力继续进步。我们，中国人，应该研究和理解苏联，我们不应该介入美苏的矛盾中，以便能够成为这两个超级大国相互关系中的桥梁，为世界带来和平和拯救整个人类。"

五、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的策略

中国的新局势令美国和英国帝国主义分子感到惊恐不安，更不用说在他们那里寻求保护和救助的国民党反动派了。

美国政府在8月底向中国派出了魏德迈将军，他的特别任务是弄清国民党政府的现状。在外出巡视活动结束之后，魏德迈向美国国务卿转达了自己的建议，并坚持给蒋介石政府以援助。

按照新加坡1947年11月14日《华侨日报》(中国民主同盟机关报)的话来说，魏德迈报告中有以下两点内容：

"1. 必须强行建设亚洲大陆铁路线，从广州湾半岛(广东省的南部地区)，经兰州(甘肃省)，到达新疆省的乌鲁木齐市。按照魏德迈的意见，在与苏联发生战争时，可利用这条铁路线向中国的西北部地区运送武器和粮食，如果发生战争的话，中国北部的港口可能会被封锁。

"2. 广东省和以广州市为中心的中国南部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确保了华南地区粮食和工业产品的供应，为中国政府进行肃清整个华北和东北地区共产党的全面进攻行动提供帮助。"

继魏德迈之后，美国的一系列"顾问"、"外交使团"、"代表团"、国会议员、实业家和反动派活动家，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作为"专家"和新战争贩子，威廉·布里特访问中国之后，在美国发表了致美国人民的"关于中国的报告"。在报告中，他建议向中国提供13.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这些款项应该在3年期限内拨给蒋介石，以用于"针对苏联采取措施，预防它夺取中国"。

1947年10月8日,洛艾维尔·鲁克斯中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总负责人——来到上海,1945年11月前,他一直担任盟军驻德国最高司令部副参谋长。他与张群和蒋介石就准备向中国提供各种设备和粮食等物资的新协议问题进行了谈判,这已经是在取消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之后。

1947年10月11日,以国会装备委员会主席斯特尔林格·库尔为首的美国国会议员代表团抵达中国。

《南华早报》写道,他们的任务还包括"视察美国陆军和海军基地及设施"。

库尔在返回美国之后,在报刊上发表通报说,"中国的共产主义威胁是现实的"。同其他"观察员"一样,他要求美国立即给蒋介石政府提供援助,并以此"挽救中国,使其远离共产主义"。

10月29日,"观察员"瓦尔特·扎特——共和党人、美国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委员——孤身一人来到中国。在回到美国之后,扎特于11月10日向美国报界通报了自己与麦克阿瑟谈话的内容。正如《南华早报》于1947年11月12日报道的那样,麦克阿瑟向扎特声明了如下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获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计划,无论在朝鲜,还是在日本,都是不可能实现的。"扎特本人也声称:"在美国的对外政策没有决定和没有最后明确之前,亚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制定自己的计划。我们应该监督亚洲的秩序,否则,美国不得不在日本保留大规模的武装力量。"扎特说,"我认为,如果共产党人在中国取得胜利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彻底地失去日本和朝鲜。因此,美国应该迅速地找到解决自己对华政策的方法。"

在魏德迈和其他"顾问"向国务卿提交了建议之后,美国已经非常清楚,在没有美国紧急援助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是没有能力保持住自己的政权的。

众所周知,在日本投降之后,蒋介石已经得到了美国的数额为40.83亿美元的援助。除这笔款项之外,美国还按照1946年7月国会通过的计划,转给蒋介石政府271艘军舰。正如1947年12月14日在青岛召开的新闻记者招待会上通报的那样,美国海军司令库克海军上将"已经在1947年向中国转交了100艘舰只,今后还将转交271艘"。

在美国顾问的监督下,美国的资金用于装备了南京、上海、成都、北平、天津、西安、昆明、徐州以及其他地方的空军基地。美国军事顾问人员小组也从1 000人增加到5 500人。

美国人在台湾岛为蒋介石训练了10个师的新部队,此外还在南京、汉口、西安和韶关训练了20个"自卫"旅。1947年夏季,美国人给蒋介石提供了1.3亿发子弹,而在1947年12月,又把美国在天津、大沽和其他地方的军事仓库所储备的所有武器弹药全部转交给了蒋介石政府。

12月8日签署了美中"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应把自己"多余的"军舰和干船坞转交给蒋介石政府。这些舰只的一部分已经根据租借法案转交给了中国海军舰队。这个协议规定,应向美国海军提供租借权。这个协议还规定,美国应提供价格优惠的技术,并提供在中国组建和供养海军机构方面的咨询。

10月27日，中国外交部次长刘师舜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署了“关于援华的中美协议”。

该协议由10章组成，它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美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奴役。在这个协议的第一章写道：“将给予中国援助的那个计划，包括了这些物资的种类和数量，并规定了这些物资的购买、保存和与此相关的运输服务和航运服务，上述各项由美国政府根据美国国会于1947年5月31日第80次会议通过的第8号法令以及对其修改和补充文件来确定。援助的物资包括粮食、药品、成衣、制衣材料、化肥、燃料、种子，等等。”

在第三条中指出，“美国政府机关应保证美国货物的购买、保存、运输，并抵达中国。一切物资均应在美国购买，只有美国政府专门批准的商品，可在美国境外购买”。

第二章的第一条指出：“美国代表对美国政府根据这个协议提供的一切物资进行直接的监督和控制。”第二条指出：“用于援助而进口的美国的一切商品，免除税收，包括这些商品在各地出售之前的海关税。”

第三章的第三条写道：“在中国所收入的资金将用于那样一些目的，即由美国政府确定的那些项目。”

第五章的第二条说：“中国政府将允许并将千方百计地协助美国代表监督物资的分配工作，将允许并协助这些代表为视察目的而进行的旅行。”

第六章的第一条指出：“中国政府将允许美国报界和无线电广播界的代表，不受新闻机关检查，自由报道关于美国援助物资分配情况的消息。”

第七章的第二条指出：“中国政府根据美国代表的请求，立即提供与其援助有关的任何进出口物资的运输、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情报。”

这个协议证明：美国已经考虑到蒋介石政权垮台这个事实，并确信他已经没有能力完成美国统帅部的军事计划，因此，不仅把一切事情的实际管理权利，尤其是给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装备的事务，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而且还准备了自己的侵略中国的武装力量。

关于这方面还有以下事实可以证明：

1. 12月底，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个军，抵达在青岛的美国海军基地，并继续向这个地区增补兵力。很有可能，他们的任务是占领胶济线铁路。

2. 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库克海军上将，最近在为蒋介石制定“准备中国海军舰队”的各种计划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1月17日召开的蒋介石参谋部会议上，他提交了这些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讨论了关于“作为水路交通命脉的长江的防御”问题。不难猜到，这个计划的基础是美国军舰打着“中国海军舰队”的旗号进入长江流域。美国与蒋介石之间在12月8日签署了“海军协议”，根据这个协议将把“多余的”美国军舰转交给中国，这个协议为上述措施预先做好了准备。众所周知，1927年英、美、日的军舰进入长江流域，这在镇压革命过程中起到了重大作用。现在，这个措施是作为“保卫”蒋介石在上海①、南京和汉

---

① 原文是Манхой，按照文意应是指上海(Шанхай)，这里疑为俄文打字错误。——编注

口的重要基地来实施的。

此外,为反对人民解放军,还准备了有美国海军陆战队参加的登陆战役,并在台湾专门培训了日本陆战部队。

3. 1947年11月,美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给蒋介石拨出了1947年第三季度的石油产品定额,数量是137 295 950升,其中航空汽油756 000升,汽车汽油56 700升,煤油37 800 000升,汽油和酒精12 199 950升,液体燃料的副产品29 840 000升。(《南华早报》,1947年11月28日)

这些巨大数量的燃料并非蒋介石军队的需求,而是为在中国聚集和储备美国武装力量所必需的燃料。

美帝国主义分子继续在思想战线上向中国渗透。1947年10月,国民党与美国签署了关于在中国成立专门的"教育组织"的协议。美国人把这个"教育组织"的管理和财政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该组织的委员会由2名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和2名在华的美国实业界人士组成,总负责人是驻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

国民党政府向这个"委员会"派出了5名自己的顾问人员,但是,他们在该组织的活动方面是没有发言权的。根据这个协议,美国人有权在中国的中等和高等院校从事思想教育活动,他们还准备了由中国青年组成的代理机关。作为教师在中国院校里工作的有美国的传教士,他们其中许多人穿着中国的民族服装,按照使中国服从于美国帝国主义的精神,来教育中国的青年人。

在像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沈阳、北平、昆明、台北(在台湾岛上)这样的城市里以及其他地方,美国的情报机关在工作时享有特权。这些美国情报机关的情报,不受国民党宣传机关的新闻检查。在中国,像上海、青岛、南京等地,都设有美国的无线电广播站。

目前,美国的电影在中国占垄断地位。仅第四季度(1947年11月至1948年1月)就有80多万米的电影胶片进入中国,并在中国的重要工业中心和省会城市里播放。

最近一段时间,在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南京以及其他城市里,充斥了许多侦探、淫秽和其他内容的"作品",美帝国主义分子通过传播这些东西来愚弄中国居民。在中国还大批量地发行了《时代》、《幸福》、《科利尔》①等杂志及其他刊物。在上海和青岛及其他大城市里,还出版了由美国实业界和政治界控制的报纸。在上海出版了《上海邮政晚报》和其他一些刊物。

与此同时,在美国的美国当局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同盟和"革命委员会"这些坚持推翻蒋介石政府的民主组织的人士进行迫害。

美国报刊提出了关于冯玉祥命运的问题,因为美国政府剥夺了他在美国的避难权,并打算把他交给国民党当局,而在香港的英国当局查封了"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和其他发表了反对蒋介石政府政治声明的民主团体。

---

① 《科利尔》(*Collier's Weekly*),美国人彼得·科利尔于1888年创办的周刊,以调查性新闻报道为主。——编注

由于担心失去在中国的经济地位以及美英之间的矛盾，英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的政策与美国的政策是有区别的。有理由认为，英国当局在保持对蒋介石“正常的”态度的同时，还支持在香港的李济深，其目的是在政治上压制蒋介石。1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吴铁城，专门代表蒋介石前往香港，以便“预防国民党的分裂”。他与在香港的英国当局进行了谈判，要求制止李济深和其他民主团体在香港的活动。此后，国民党的分裂还是发生了，并成立了国民党左派分子的“革命委员会”，而香港当局尽管禁止民主团体在香港发表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声明，但仍然允许他们公布自己的纲领。

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这就是李济深的“革命委员会”不支持中国人于1月16—18日在香港和广州举行的反英国当局的游行活动(参见上文)。这说明了他对英国当局持某种友好的态度。

与此同时，尽管利用国民党的报刊发表了蒋介石政府关于广州“事件”和谴责这一“事件”的通报，英国驻华代表仍然声明，保留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英国利益”的权利。

六、蒋介石的计划

至于蒋介石根据新形势制定的计划，除了把赌注押在美帝国主义分子的援助上之外，他还采取了如下措施：

1. 试图依靠地主和富农分子加强各省的地方“自卫”，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了新的土地纲领，这些地主富农分子(大的、小的)已经无一例外地加入到他的阵营中。

2. 他从居住在西康、云南、青海、贵州等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中，为自己的部队招募新的力量，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契约，而这些部落的人数在全中国也只有3 000万人。

问题在于，这些部族是最落后和最黑暗的。在他们那里占优势的是畜牧业，而不是农业。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土地纲领，正如蒋介石所认为的那样，对他们不会产生影响。说到最使这些部落感到不安的民族问题，蒋介石与这些部落的封建上层统治人物订立的契约的目的也正在于此，蒋打算“吸收”他们的代表参加自己的政府。这些部落的一位代表陈季楚(Чень Ди-чжу)专门来到南京，与蒋介石进行了会谈，而蒋介石则打算利用这些部落“镇压共产主义的暴乱”。南京政府于1月18日下达命令：批准这些部落“加入镇压共匪行动的委员会中”。

3. 国民党委员会在所有的城市里，开展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活动，其目的是“鼓舞人民的精神”和“使人民参加到镇压共匪的运动中”。

根据以下事实，就能够评定这个运动的结果：1月19日，也就是1万多名学生举行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和反对蒋介石政府示威游行活动的第二天，国民党在上海进行了“鼓舞人民精神”的游行活动。正如国民党电讯社“中央新闻社”所报道的那样，所有民主人士乘坐三辆大卡车，沿着全城散发国民党的传单。

结论

1. 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会议对中国的形势产生了影响，它有助于更加明确地划分出两个

阵营力量的界限,加强民主阵营,并促进民主阵营的力量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阵营的进攻行动。

2. 在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改变了自己的政治路线,它为自己的党和人民指明了勇敢和坚决地开展反封建和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方向。结果,人民解放军于1947年7月开始的军事进攻行动,首先扩大了规模,其次获得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国民党政权和实现独立和民主。

中国共产党转入实现新的土地纲领——虽然土地革命开始于9月13日(中国共产党土地会议),也就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前的几天里,但是,按其实质来说,这种转折仍然与会议提出的任务密切相关,况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是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公布新的土地纲领的(10月10日)。

3. 在九国共产党会议召开之后,中国所谓的"第三势力"停止了自己的存在,在反动派的压力下,它被迫转向积极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国民党内部也发生了分裂。中国人民对苏联的好感大大增强了。

4. 美帝国主义分子在中国准备武装侵略行动,因为他们给蒋介石提供的"一般性的"财政和其他物资"援助",已经不可能挽救他了,而英帝国主义分子正在编制与李济深及其集团有关的某种暂不明朗的计划。根据所有这些情况可以清楚,他们已经考虑到蒋介石的倒台是不可避免的前景了。

5. 蒋介石指望那些地主和富农分子——他们在中国共产党公布了新的土地纲领之后加入了蒋的阵营里,并试图把中农中的上层分子拉入到自己的阵营中。但是,这也并不能补充蒋介石政府的力量,因为这些人在中国农村里占极少数,不可能用他们组成一支军队。同样,蒋介石还指望利用土著民族,作为反对共产党人战争的炮灰,但这注定是要失败的。

6. 至于中国共产党对九国共产党会议材料的宣传情况,可以说,它对会议做出的反应是正确的,它还利用会议的文件,更广泛地动员自己的人民,积极地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斗争。

但是,宣传工作的安排,还不能满足国内革命运动高潮新阶段的任务。尤其是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在那里一切民主刊物都被禁止了。

应该指出,(共产)党没有对国民党关于"成立了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虚假宣传给以应有的回击。显然,这是因为党本身拥护成立这个东方情报机关,这正如毛泽东在1947年12月25日中央会议上说明的那样。

科甘(签名)

1948年1月23日

РЦХИДНИ, ф. 17, оп. 128, д. 1173, л. 1－37

№09919

斯拉德科夫斯基致米高扬报告：长春铁路及苏中合营企业

(1948年2月[①])

А. И. 米高扬同志：

现就卡尔金[②]和先科夫两同志给马林科夫同志关于中长铁路和东北苏中合资企业问题的信，谈谈我的意见和看法。

一、为中长铁路培训干部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运输学院、一些运输学校和东方学院培训铁路干部的建议值得重视。不仅为中长铁路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令人不满意，而且为其他部门和团体培训东方学干部的情况也令人不满意。

似应：

(一)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工学院、哈巴罗夫斯克学院以及中央的几所高等工业学校中设置研究中国和朝鲜政治经济的课程，采用这些被研究国家语言的简明教学大纲。

(二) 扩大莫斯科市东方学院的远东各系(首先扩大中国系和朝鲜系)。还应恢复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的东方学研究所(1932—1933年关闭)，该所最近几年是以国立远东大学东方系的形式存在的。

我们认为，苏联远东地区的青年比苏联中部地区的青年更乐意进东方学高等院校，况且远东的地理位置本身也有利于苏联远东地区的大学生研究远东各邻国。

(三) 责成远东地区各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向中部地区的党和苏维埃组织学习，向远东地区临时外派的工作人员作指示，向他们布置任务。

二、在东北工作的干部的物质生活状况

由于通货膨胀、国产商品匮乏和进口商品很少，我们在东北的工作人员物质生活很困难。似应：

(一) 为在东北的苏联工作人员制订硬通货工资(美元)(此条同样适用于在朝鲜和日本的工作人员)，并按美元汇率用当地货币支付工资。

(二) 按工作人员在苏联的原职务，向他们留在国内的家属支付全额的苏联工资。

(三) 为在远东国家工作的人员规定按百分比增加的工龄津贴，每满一年增加20%—25%。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文件的具体日期。——编注

② 卡尔金，时任中长铁路副董事长。——编注

(四) 不仅发放东方语津贴(20%),还应发放所在国知识津贴(通过专门的所在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知识大纲考试)。

(五) 铁路部门或领事馆为在东北出差的苏联工作人员办学校。

三、中长铁路的法律问题

在卡尔金和先科夫两位同志历数的最迫切的法律问题中,没有提到以下几个基本的法律问题:1. 如何看待苏联铁路管理机构在中长铁路的存在;2. 我们继续不参加铁路的管理和经营是否妥当。

由于中长铁路理事会和中长铁路管理局的官方(国民党)代表逃离东北,铁路局只剩苏联一方。苏方绝大部分铁路员工回国,致使苏方实际上已停止参与铁路的管理。铁路现在完全由中方民主政府管理(东北铁路局)。

我们不参与铁路管理的后果是,中国人独自经营"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共同资产"(1945年8月14日条约语),更不用说我们从铁路运营中(边境站至哈尔滨段和哈尔滨至满洲里段自1947年3月1日起正常运营)得不到任何好处了。我们认为,继续推迟参与铁路管理可能导致的后果是,将来中国人(甚至包括民主政府的人)会认为自己有了本事,会反对我们参与管理。有鉴于此,尽快解决我们实际参与铁路管理的问题较为妥当,况且中长铁路全线现在已经解放。

四、中长铁路的出赁地问题

我们认为,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提出的关于恢复俄罗斯林业主沃龙佐夫一家和斯基捷尔斯基一家租赁的林场和煤矿中原属中长铁路的股份权问题,对我们有很大的利益。

若以中长铁路的名义提出该问题为时过早,那么,应由某个苏联单位或者秋林公司获得上述原俄罗斯林业主的权利。

五、大连港的地位问题

苏中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大连港协定明确规定了该港口的地位。由于不明确其在中长铁路中的地位,发生了某些违背该协定的情况(港口管理者未经中长铁路领导的任命等)。

六、"其他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在信的"其他问题"一节中指出,对我们从东北获得的档案和经济资料没有进行任何研究工作。

对此还可补充说,我们还没有从事东北问题的专门科研机构。

应在大连港和哈尔滨建立由15—20名科学工作者组成的经济处,责成他们搜集和汇总经济资料,并将资料分类,以"东北工作参考通报"的形式出版。

七、对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的问题

卡尔金和先科夫两同志建议成立一个委员会,为政府起草与中长铁路以及在东北的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活动有关的决定,我们认为这一建议是正确的。

我们还认为，关于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设置领导中长铁路工作的专门机构这一建议是正确的。不过，最好是在国外资金、产业和物资管理总局内成立领导东方所有苏联企业和合营企业的东方局，在东方局下设铁路处。

M. 斯拉德科夫斯基

АВПРФ，ф. 0100，оп. 42а，п. 301，д. 1，л. 3－6

№16326

佐林致戈列夫函：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给刘宁一汇款

(1948年2月18日)

机　密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
戈列夫同志：

据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通知，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汇7 000美元去巴黎给中国驻国际工会联盟代表刘宁一。汇款可以转入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

请通知苏联国家银行能否接受该交托事宜。

苏联外交副部长
B. 佐林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 41，п. 278，д. 55，л. 1

№1633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局势和中共任务

（1948年3月30日）

绝 密

致斯大林同志：

我现将我们在中国特区的工作人员捷列宾同志转交的毛泽东致菲利波夫同志的电报报告如下：

中国的局势

一、近几个月来，我们处在新的条件下，集中精力解决了一系列的政治和战略性质的任务，审查党的队伍，反对我们党内的右倾，特别是党内的“左”倾。

众所周知，在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发生右倾，在和国民党决裂时期发生“左”倾，这些都使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情况变得复杂了。“左”倾目前主要表现在不能正确对待中农、富农和地主的问题上，在那些再次被解放的地区，对孤立富农和地主的问题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工会运动中片面突出工人阶级眼前的利益，拒绝和自由资产阶级的党派及进步绅士的合作。在工作中草率行事，并企图超越阶段。去年，在所有的解放区均以某种形式发生过“左”倾，在个别情况下甚至带有危险性和冒险性。但是纠正这些错误对我们并没有产生严重困难，近几个月，这些错误已基本消除。

右倾主要表现在对敌人的力量估计过高，害怕美国方面会一直增加对国民党的援助，害怕战争拖延下去，对国际民主力量估计不足，缺乏勇气和决心去发动群众消灭封建制度。这些人没有发现我们党的内部已经出现了混乱，也没有看见他们工作作风上的毛病。但是这个倾向不是主要的。对于走上这条路的党员，比较容易使他们承认自己的观点错了。

近几个月来，我们在发动的几个战役，在自己部队的新式练兵，在扩大新解放区，在土改，在审查和清理我们党的队伍，以及在争取小党的工作中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这些问题中出现的错误倾向大部分都已消除了。

这一切让我们有可能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二、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内部的民主分子和一些小党派，对国民党和美国还寄予一定的希望，不相信我们党和人民有力量、有能力战胜一切国内外的敌人，认为要走某种第三条道路才能解决国内这场危机。正是这样，使他们处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当国民党对他们来说是突如其来发动进攻的时候，他们全都陷入了困境，并处于依附地位，结果就失

去了在群众中的威信。这迫使他们于 1948 年 1 月接受了我们的口号，发表声明反对蒋介石，反对美国，声明与中国共产党联盟，对苏联友好。上述党派代表现在聚集在香港。我们对他们采取的是团结的政策，同时批评他们的错误观点。

我们认为，在我们建立中央政府的情况下，他们有代表参加这个政府将是必要的和有益的。

这些党派的主要缺点是他们完全不在工人和农民中间进行工作，也很少去做大学生的工作，脱离群众，结果这些党派的作用就微乎其微。他们习惯生活在大城市里，从来没有表示过要到我们解放区去的愿望。但是，尽管如此，他们所代表的一个社会阶层(自由资产阶级)对我们说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把这一阶层从自己的视野中放过。我们应该把它吸引到我们一方来。我们认为，以后当我们有了巨大的成绩，占领了诸如沈阳、北平和天津这样的城市，当我们的胜利和国民党的失败变得清清楚楚的时候，我们将邀请他们来参加中央政府。只有到那个时候，他们才可能会表示出到解放区来并与我们合作的愿望。

三、今年我们不打算成立中国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个问题尚未成熟。在今年行将举行的国民大会上，蒋介石还将当选为总统，而当我们取得更大的成绩时，他的威信就会动摇得更厉害。我们将扩大我们的领土，将要夺取 1—2 个最大的城市，当东北、华北、山东、苏北、河南、湖北和安徽各个地区连成一片的时候，那就到了迫切要成立中央政府的时候了。

显然，这大约是 1949 年要发生的事情。

现在我们正在把晋察冀、晋冀鲁豫和渤海(山东)地区联合起来，使它们处于一个党的机构(中央华北局)、一个政府和一个军事指挥部的领导之下。这一广阔领土包括了陇海铁路以北、津浦铁路以东和以西、平绥铁路以南和山东渤海各地区，居民人数近 5 000 万。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已进行了联合，在最近期间里将最终完成。石家庄市将是这个地区的中心。这一切都让我们有可能把一系列领导干部投入到新解放区去。

四、我们的南线军队。

山东纵队——9 个旅，司令员许世友，副司令员谭震林。

苏北兵团——7 个旅，司令员韦国清[①]，副司令员陈丕显[②]。

在黄淮地区的部队——21 个旅，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

在豫鄂陕地区的部队——司令员陈赓，副司令员谢富治。

在江淮和汉水地区的部队——19 个旅，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邓小平。

西北野战军——12 个旅，司令员彭德怀，副司令员贺龙。

在晋南和豫北的部队——12 个旅，司令员徐向前。

1947 年 12 月，我们在 20 个月的战斗行动以来初次得以让部队休整，除了刘伯承的部

① 原文 Вэй Юци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② 原文 Чэнь Пиюа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队由于白崇禧指挥下的国民党军强大的兵团对大别山进攻还留守在阵地上。直到2月底，刘伯承的部分军队才撤到淮河以北地区进行休整。这段时间用来开展党政工作和进行部队的战斗准备。向部队解释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国民党对人民造成的危害和苦难，开展对军队的社会成分和部队战斗力的审查，对士兵和军官进行教育和再教育，对部分地主、富农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再教育或清除出军队。我们提高了部队工作的民主作风，提高了作战的战略、战术水平，围绕我们在土改、工业、贸易和对知识分子关系方面的政治措施，进行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这一切使得我们能把我们军队的革命积极性、纪律性和战斗力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上去。

目前，除了刘伯承那几支在2月底、3月初撤出休整的部队之外，所有部队都已开始新一轮的战役了，在2个星期的战斗里已经粉碎了9个国民党旅。

东北野战军——46个旅，司令员林彪。

晋察冀部队——18个旅，司令员聂荣臻。

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李井泉。①

冬季期间这些部队大部分都打过仗，而其余的进行了休整。

东北部队在3个月期间顺利地打了几仗，粉碎了8个国民党旅，而在敌人的一个师里，由于开展工作的结果发动了起义。这几仗，占领了以下几个城市：彰武、法库、新立屯、辽阳、鞍山、营口、四平街，并收复了吉林。整支部队在稍事休整后将对长春或北平、沈阳铁路沿线另外一些战略重点发动进攻，然后紧接着进攻沈阳。现在我们让敌人有可能重新占领我们早先已夺取的平沈铁路山海关—辽阳②段沿线的几个据点，以便今后更利于把敌人歼灭。

晋察冀部队在1个月的休整之后，开始了在平绥铁路地区的战役。

晋绥部队组成人数不多，它的活动仅限于牵制阎锡山的部队。

目前我们的军队有50个纵队或256个旅，总数为1 322 353人(一个纵队相当于一个整编师，而一个旅相当于国民党一个整编旅)。每1个旅由3个团组成，平均约为8 000人。

此外，还有民兵、警卫部队、后方军队机关和军事学校等，总数为1 168 968人(他们中战斗编制为80万人)。

我们军队总共有2 491 321人。1946年7月前我们只有28个纵队或118个旅的正规军，总数为71.2万人和66.5万人的非正规军，总共为127.8万人。由此可见，我们的军队扩大了，旅的数量扩增不是很多，而旅的人员构成大大增加了(从5 000到8 000人)。

国民党的正规军：

国民党军队从1946年7月，即从发动内战起，到去年夏季，只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现在国民党有104个师或279个旅。

---

① 原文如此。李井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委、晋绥军区政委。——编注

② 原文Лоян，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国民党军队的配置：

在北线。

在第一线占去了29个师或93个旅，他们中在东北13个师或45个旅，司令卫立煌，大本营在沈阳；在北方11个师或33个旅，司令傅作义，大本营在北平；在山西5个师或15个旅，司令阎锡山，大本营在太原。

在南线。

在第一线总共66个师或158个旅。他们中有：顾祝同兵团38个师或86个旅，大本营在郑州；白崇禧兵团14个师或33个旅，大本营在九江[①]；胡宗南兵团14个师或39个旅，大本营在西安。

在北方和南方战线的第一线国民党总共有106万人。

国民党在第二战线有9个师或28个旅。他们中有：在西北(兰州以西)有4个师或8个旅；在西南(四川、西康、云南和贵州)有4个师或10个旅；在东南(长江以南各省)有8个旅；在台湾岛有1个师(2个旅)。国民党第二线总共有19.6万人。

国民党旅和师的扩增是靠改编自己的地方傀儡部队为正规的师和旅。这些改编而来的师和旅分配在以下各兵团：

卫立煌兵团扩增了3个师(14个旅)，傅作义的部队扩增了2个师(6个旅)。

顾祝同兵团扩增6个师(9个旅)，胡宗南部队扩增2个旅。这就是国民党现在不是有93个师或248个旅，而是104个师或279个旅的原因。

至1948年3月15日前的最近数月的战斗中，我们消灭了6个师或29个旅，他们恢复不起来了，国民党也未必能给他们补充人员和武器。

事实上，国民党现在拥有98个师或250个旅。和去年夏季比较，国民党军队实际扩增了5个师和2个旅。

从国民党现有的250个旅来看，仅有118个旅没有受到过我们军队的重创。余下的132个旅不断遭受过毁灭性打击，他们现在的战斗力也是很低的。

国民党军队的总数是大大缩减了。如果1946年7月前国民党军队人数为430.5万的话(正规部队200万人，后方部队73.8万人，特种部队36.7万人，海军和空军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101万人)，那到1948年2月就变为365万人(正规部队181万人，后方部队56万人，特种部队28万人，海空军部队19万人，后方机关和学校为81万人)。这样，在这段时间里国民党军队的总数减少了66.5万人。

国民党军队在19个月里(自1946年7月至1948年1月)损失了197.7万人(2月和3月份上半个月的资料没有计算在内，但损失约合18万人)。这意味着，在同我们的战斗中，国民党军队不仅丧失了在战时动员起来的全部兵力(100多万新兵)，而且还丧失了相当多的原有兵力。而国民党正在采取一些与我们相反的措施，即他们不是为一些旅补充兵员，

① 原文 Цзяцзянь，疑俄文编辑时拼写有误。——编注

而是增加旅的数量。1946 年国民党每个旅平均有 8 000 人,而现在每个旅平均人数不超过 6 000 人。其结果是,随着我军解放的地区的领土扩大,为国民党军提供有生力量和粮食供给的基地将会不断缩小。

我们估计,再打一年仗,即到明年春天,蒋介石和中共的军队在数量方面将接近相等。

五、我们的任务和措施。

增长自己的力量,做到不依赖外援(当然,这并不意味我们不需要外援)。要坚定不移、充满信心地去打仗,不追求战线上的快速成功,力求每个月平均消灭国民党正规军 8 个旅,或一年达到 100 个旅(实际上,去年秋天我们已经超过这个数字了,今后我们可能将要取得更大的成绩)。在 5 年里,或者稍长一点时间里(从 1946 年 7 月算起)全歼国民党军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目前敌人很消极,几乎在中国的所有战线上都受我们的打击。只是在大别山区那里,敌人集中了 14 个机动旅,淮河以北集中了 12 个机动旅,在这些地区,主动权掌握在敌人手里,他们在那一带能发动进攻性的战役。这是因为我们从部署在淮河以北的我军编制里抽调了 9 个旅投入到其他战线去了。

在东北、西北、苏北和平汉线以西,从郑州到武汉的广阔地区,以及长江以北和淮河以南,都形成了有利于我们的局面。

为了尽快改变大别山地区的局面和在南方建立我们的根据地,我们打算今夏实施早先制订好的对南方的秋季攻势计划。为此要从陈毅在陇海线上的主力编制里抽调 9 个旅,近 9 万人的部队。我们计划在 5—6 月强渡长江,展开在浙江、福建和江西各省的战役。此外,从大别山和汉水地区抽调 2 个旅,1.5 万人的部队,在 5—6 月里必须开进湖南省。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实现我们设计的方案,并且没有特别的困难,我们将能够强渡长江。国民党军队会将 15 个旅向南移至长江以南的地区。这将会使他们失去在大别山和淮河以北两个地区的主动权。

毛泽东

1948 年 3 月 15 日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日丹诺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华西列夫斯基

АПРФ, ф. 45, оп. 1, п. 330, л. 18 - 28

№09898

罗申致马立克报告：中国局势及政治指示

(1948年4月2日)

Я. А. 马立克同志：

现将给苏联驻中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和关于中国国内局势的简报呈上。

正文共5页。

H. 罗申

1948年4月2日

关于中国国内局势问题的简报

一、军事方面

在美帝国主义的积极援助和直接参与下，蒋介石反动政府和国民党大约两年前发动了内战，内战已经蔓延到全国。国民党反动政府已经向战场投入了500万兵力反对民主力量。

在15个月内，中国共产党的军队一直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给了国民党以沉重打击。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损失了130万兵力和37个整编师的全部武器装备。在今后的作战中，主动权将继续属于中国共产党军队，国民党军队只能进行防御战术目的非常有限的个别战役。

蒋介石担心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预见到将要撤离首都，他与美帝国主义者一起正在华南建立根据地。最忠于他的代表人物之一宋子文已被派往华南执行这一任务。

二、内政方面

在中国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打击下，国民党政权已经不稳固，但是还没有达到灭顶之灾的地步。摆在民主力量面前的任务是：顽强奋战，消灭蒋介石的武装力量，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最乐观的估计，在时间上，战争还要打一年半至两年。

蒋介石军队在内战战场上的失败，对军事胜利的无望，以及经济危机和通货膨胀，使国民党和政府阵营内部产生了种种矛盾和摩擦。发展到今天，他们的机构内部已经有了敌对情绪、内讧，在解决国内问题上无法统一。

席卷国民党统治区所有经济部门的严重经济危机、通货膨胀不可遏制地加剧，高达2.25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的消耗，以及庞大的内战开支，使得国民党反动政权更加不稳定。

因大量工厂倒闭，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工人阶级、中下层国家机构官员和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极其艰难，军队中的条件十分艰苦，广大民众各阶层对现政权越来越不满。与此同时，民主力量在不断增长。为了对付民主力量，蒋介石加强了特务机构、反间谍组织、宪兵和地方保安部队。但是，尽管如此，华中地区处于地下状态的民主力量和在南洋诸国处于

合法状态的民主力量,成功地进行着巩固和扩大自己组织的工作。

三、外交方面

国民党反动政权通过其宣传网,竭力将它对付民主力量的不力和失败归罪于苏联。因此,这一政府在外交上奉行敌视苏联的政策和直接亲美的方针。

美帝国主义见蒋介石面临危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挽救和加强蒋介石政权,其基本的目的是挫败和消灭民主力量,奴役中国,把中国变成反苏的军事基地。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 罗申

1948 年 4 月__日

附件:

给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的政治指示(草稿)

一、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应当是有节制的。对会见政府人士不要表现出特别的积极性。在谈到苏中关系时仅限于指出,苏联人民过去和现在都希望与中国人民友好相处,已故的列宁和孙逸仙都说过这样的话,斯大林同志在和中国人士谈话时也多次指出这一点。根据 1945 年的条约,强调不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政策。

二、考虑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不稳固及各种弊端,必须注意蒋介石政府不得不在其政策中玩弄种种手腕。据此,要求你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采取的各种措施、军事和经济潜力状况、财政状况以及这些方面的种种变化。通过关于这些问题的详细报告和通报及时向外交部通报情况,是大使最为重要的任务。

三、密切注视政府机构内的不同意见和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弄清各派系的动向及其政治目的。

四、十分认真地研究美中关系,重点是美国人在以下方面采取的措施:1. 和蒋介石携手对付民主力量,通过种种渠道和隐蔽途径援助蒋介石政权;2. 美国资本对中国进行经济渗透,美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奴役;3. 准备把中国变成反苏军事基地;4. 为巩固蒋介石政府准备力量,做个别政治人物和团体的工作;5. 美国和国民党的组织联手限制我们在华的权益、搞反苏运动和采取反苏措施。

五、关注英美在华的关系,英美在远东问题、东南亚问题上的合作和矛盾。关注英帝国主义保护和维持自己在中国、远东和东南亚利益的努力。

六、认真观察民主、进步团体及其领导人奉行的政策、表现和采取的措施,摸清他们中思想进步而且能够大力促进中国民主运动加强的人士。重视与民主、进步人士交往和会晤,同时要保持谨慎的态度。

七、认真研究中国政府在签订对日合约方面的立场以及在确定这一立场时美国人所起的作用。在与中国各种人士的谈话中，历数日本侵略的事实和日本按美国的计划在军事上东山再起对中国的害处，强调中国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共同行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八、认真研究提出废除1945年苏中条约、将大连港和旅顺口归还中国问题的具体人士、团体和组织。若个别政府人士提出这一问题，大使应根据1945年条约、旅顺口协定和大连协定，坚决提出抗议，揭露这些人奉行的政策。

九、力争通过各种政府机构甚至通过间接途径，向蒋介石提出中国政府偿还供货债务的问题。与此同时，寻求与中国政府公司和私人公司发展贸易的途径。

十、关于新疆问题，争取让中国政府履行1946年6月6日与新疆伊宁人签订的协定。

十一、依据1924年的条约，坚决保持俄罗斯传教士团在华的资产以及维护在华俄罗斯公民的利益和资产。

十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苏文化协会、苏联对外文化协会、苏联国际书店和苏联电影出口公司等组织，积极在中国宣传苏联的生活和政策。

十三、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分化白俄联合会，其目的是使有可能参加苏联侨民协会的那部分侨民脱离白俄联合会。

十四、巩固和团结苏联侨民协会，注意加强在苏联公民中的政治教育工作。采取措施防止苏联犹太公民脱离苏联侨民协会，参加犹太复国主义组织。

十五、根据中央的指示，利用进步民主报刊揭露美国人和蒋介石政府中形形色色的反苏人士和团体在中国搞的敌视苏联的活动。

十六、密切注视中国的战事进程，研究国民党统帅部的计划和措施。

十七、就上述所有问题并根据外交部的任务，系统并及时地向苏联外交部通报情况。

АВПРФ, ф.018, оп.10, п.24, д.21, л.9-14

№16646

日本投降后美国给蒋介石援助的项目清单

（1948年4月2日）

译自英文，打字文本

根据1948年3月1日美国新闻处公报，日本投降以后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的援助和

贷款有：

1. 借贷(从抗日战争胜利至1947年6月30日),777 638 292美元。

2.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美国提供),465 800 000美元。

3. 美国对外援助,向中国提供款额,45 700 000美元。

4. 联合国救济儿童国际基金(美国提供),2 065 000美元。

5. 进出口银行贷款,82 800 000美元。

6. 根据中美合作机构协定转交的装备弹药,17 660 929美元。

7. 美国在中国西部的军事剩余物资,20 000 000美元。

8. 美国在上海和青岛的造船设备转交给中国,4 000 000美元。

9. 美国在战争期间建造的商船等剩余物资,16 600 600美元。

10.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结束后的开支,4 700 000美元。

11. 美国撤退时留在华北的船只和弹药(1947年4—9月),84 000 000美元。(注A)

12. 亚洲的17个太平洋岛屿上的军用剩余物资,824 000 000美元。(注B)

13. 国会交付的271艘船舶,800 000 000美元。(注C)

14. 1.3亿套轻武器用的弹药,6 566 589美元。(注D)

15. 太平洋群岛上标有"卖"给中国的物资,48 000 000美元。(注E)

16. 标有"卖"字样的150架运输机,41 400 000美元。(注F)

17. 国会贷款,1947年9月19日,18 000 000美元。(注G)

18. 1948年的援华决定,400 000 000美元。(注H)

总共,3 658 836 810美元。

社会舆论认为,上述美国军用剩余物资的数字被故意夸大了。例如,商船的价格(见第9项)达2 200万美元,根据对外政策委员会的计算,美国政府的统计夸大了550万美元。太平洋群岛和亚洲的军用剩余物资的价格(第12项)美国政府算成8.24亿美元。但1945年9月27日的《纽约时报》公布的公告说,在第12项范围内军用剩余物资,即在缅甸—印度区域内交给中国的剩余物资数目为5亿美元。

对外政策委员会的报告中说,在太平洋群岛与地区的剩余物资是8.65亿美元,总共加起来是13.65亿美元,美国政府提供的数字可能大了5.41亿美元。根据这个统计数字,上述范围内的总数应为4 205 336 810美元。

此外,在美国新闻处的上述公告中提到的两项的价格漏了。这两项是：

19. 在马利亚纳群岛上的弹药剩余物资,根据1947年1月7日签署的协定,以百分之一的价格卖给了中国。

20. 太平洋群岛上的军用剩余物资,根据上述1948年1月31日签署的协定的补充协定第15条,卖给了中国空军。

此外,至少还有4项,美国公开承认是给蒋介石的援助,但在美国提出的军事拨款中仍要支付。其中两项是这样计算的：

21. 美国向中国提供港口设置的海军贷款，1 500 万美元。(注 D[①])

22. 美国在华军事力量的支出——1947 年内的调停、培训和警卫任务等，1.1 亿美元(注 Y[②])。

其他两项的价格未计，这两项是：

23. 国民党第九军调往华北和东北的运输费用。(注 K)

24. 美国军事顾问小组在中国的费用。

这样，除了那些保密项目外，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大大超过了 43 亿美元。

注：

A. 统计的价格已在 1947 年 5 月 8 日国会的专门公告中公布。

B. 以 1.75 亿美元的低价卖给蒋介石。两个数字都公布在国会新闻处的公告中。

C. 1947 年 2 月 5 日，美联社援引的国会提供的数字。

D. 以 656 589 美元或者总值的 10%卖给蒋介石。这两个数字都出现在国会新闻处的公报里。

E. 以 600 万美元卖给蒋介石，根据国会新闻处的公报，占总值的 12.5%。

F. 以每架飞机 5 000 美元的价格卖给蒋介石，但国会新闻处指出，每架飞机的价格为 27.6 万美元。

G. 应马歇尔的请求，1947 年 12 月 19 日由国会提供。

H. 据 1947 年 7 月 3 日中美双边协议，蒋介石用 1.25 亿美元购买美国的军事剩余物资，用 2.75 亿美元进口商品。1948 年 10 月 12 日国会的声明说，军事剩余物资——飞机以 10%或更低的价格卖给南京政府。这一协议使南京政府至少获得 125 万美元的军用剩余物资。

I. 国会于 1947 年 11 月 15 日公布。

J. 由出版的《锻造新中国》做出的统计，由外蒙古协会发表。

K. 统计数字发表在 1948 年 4 月 2 日的上海《大公报》上。

翻译：沃洛霍夫、彼得罗夫、苏什科。

АВПРФ, ф. 434, оп. 3, д. 45, п. 21, л. 19 - 23

---

①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 I”。——编注

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注 J”。——编注

№16339

斯达汉诺夫致马立克函：保证中国工会代表团物资过境运输

（1948 年 4 月 3 日）

机 密

对 1948 年 3 月 31 日第 306/1ДВ 号函的回复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 А. 马立克同志：

我们已向内务部外贝加尔区边防军首长发出指示，允许中国工会代表团的一批印刷品和其他物资从哈尔滨越过苏联国境运送到巴黎去。

为了保证这批物质在代表团离开苏联出境时能获得放行，请通知我们，代表团大致打算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出境。

斯达汉诺夫中将[①]（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8, д. 53, л. 6

№16342

马立克致赫鲁廖夫和波斯科诺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 年 4 月 12 日）

机 密

第 343/ДВ 号

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 А. В. 赫鲁廖夫同志

---

① 斯达汉诺夫，时任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编注

苏联财政部副部长 A. A. 波斯科诺夫同志：

今年 4 月 1 日滨海边疆区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给你们电报[①]通知说，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给驻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②]的苏军司令部写信，在信中提出了关于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问题。

请将你们在执行苏联部长会议今年 2 月 25 日的决议时采取哪些措施以及对韩光提出进行货币改革问题有什么意见，告知苏联外交部。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 А. 马立克

1948 年 4 月 12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8，д. 59，л. 18

№16344

兹洛宾致马立克函：辽东半岛兑换纸币事

(1948 年 4 月 17 日)

机　密

对 1948 年 4 月 12 日第 343/1ДВ 号信函的答复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Я. А. 马立克同志：

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2 月 25 日第 375/144С 号决议要求苏军司令部(比留佐夫同志)在 2 月下旬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商议出一套关于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纸币的样本和制造纸币的订单等提案。责成苏联财政部在 1948 年 7 月 1 日之前，按苏军司令部和关东地区管理局共同取得的样本和尺寸制造新的纸币。

在两次电报提醒要从速寄出上述的提案、样本和订单后，比留佐夫同志在 1948 年 4 月 2 日发出 3624 号电报，通报了关东地区自治管理局副局长韩光信中关于纸币兑换的条件。

① 该电报尚未公布。——原注

② 所谓辽东半岛协议区，指旅大地区，即苏联根据 1945 年 8 月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实际占领和管理的地区。——编注

1948年4月8日A.H.柯西金同志发75号电报给比留佐夫同志,要求他立即将纸币兑换条件的提案、新的纸币样本及其订单寄出,同时还派遣区自治管理局代表来确认纸币样本的印刷方案,并签订订单。

关于进行纸币兑换的条件的提案将在收到比留佐夫同志寄出的提案后再作定论。

苏联财政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И.Д.兹洛宾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8, д.59, л.19

№0902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中共对其他政党的立场

(1948年4月20日)

绝 密

致捷列宾转交毛泽东:

我们收悉了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11月30日和1948年3月15日寄来的两封信。我们没有立刻对这两封信做出反应,因为我们需核查对于我们的答复所必要的一些材料。现在我们已经核查了这些材料,可以对这两封信做出答复了。

第一点,对1947年11月30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的情况通报,同意毛泽东同志对形势所作的估计。信中只有一处让我们疑惑不解,即"在中国革命最终胜利的时候,将仿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模式,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所有政党都应当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从而极大地巩固和加强中国革命"。

我们不同意这样做。我们认为,代表中国老百姓中间阶层和反对蒋介石集团的中国各反对派政党还将在很长的时期内存在。中国共产党应该与他们合作以反对中国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但必须保持领导权即领导地位。如果可能,还要让这些党派的某些代表进入中国人民民主政府。这一政府应宣布为联合政府,以便以此扩大这一政府在民众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走狗。应当指出的是: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之后,中国政府,按照自己的政策,至少在胜利之后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的时间长度现在还很难确定)内将是民族民主革命政府,而不是共产主义政府。

这意味着，暂且还不必实行整个土地的国有化和废除土地的私有制，没收从小到大的所有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的资产，以及不仅没收大地主的资产，而且没收靠雇佣劳动生存的中小地主的资产。有必要等一个时期再进行这些改革。

谨告知您的是，在南斯拉夫，除了共产党之外，还有其他党派存在，这些党派都是人民阵线的成员。

第二点，对毛泽东同志 1948 年 3 月 15 日来信的答复。我们非常感谢毛泽东同志非常详细地通报了有关军事和政治问题。我们同意毛泽东同志在这封信中所作的所有结论。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建立中国中央政府及吸收自由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的考虑是完全正确的。

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

斯大林

1948 年 4 月 20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28 - 29

№16345

捷列宾的密码电报：关于毛泽东访苏事宜

（1948 年 4 月 22 日）

来自捷列宾同志：

我报告：

4 月 22 日傍晚，周恩来和任弼时请我到他们那里去，并告知：5 月初毛泽东要到莫斯科去，出于保密，将不到朱德和刘少奇那里去。他将借口生病和休养在这里休息。

与毛泽东一起同行的有他的妻子和女儿，还有师哲。开始先乘车走，在敌占区 10—15 天内骑马，再乘车。

大概不到东北首府去，而是停在附近一个居民点，在那里召集一些负责人开会。他们问我：对此行程，我有什么指示，我去不去。他们请求以我的名义向您询问这件事。

我问，毛泽东是什么意见。回答说，他没有讲过什么。周恩来和任弼时认为不必去，要保证与您的联系。他们补充说，梅利尼科夫在这里当医生，我们需要医生，何况从保密角度看，这样更方便些。

把已经运抵目的地的无线电台立即运往这里。周恩来和任弼时在近日要到刘少奇那

里去。请您迅速做出指示，因为他们预计5月4—5日动身。

捷列宾

1948年4月22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27

№1372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年4月26日）

斯大林同志：

1. 我已收到您4月20日的来信，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

2. 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迁至河北省石家庄附近，并已经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合并在一起。

3. 我们行经陕西省北部和河北省西北部，在那里，我们与来自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中共中央晋察冀局的同志以及群众进行了会谈。一路上我们看到，整党工作、土地改革工作、重建工作以及发展农业和工业生产的工作，还有支援前线、救助难民的工作，无党派进步人士的工作，等等，都在沿着正确的方向进行。

日本投降后的两年中在地方出现的“左”的倾向，已经得到了彻底纠正，到处都能感受到一种新的工作风貌。

4. 我决定提前去苏联。我计划在月初离开河北的阜平县(石家庄以北100公里)，在军队的掩护下穿过北平—张家口的铁路(在这条铁路沿线，国民党已经集中了10万军队)。如果可能的话，我将在7月初或中旬到达哈尔滨，然后从哈尔滨到您那里。

陪同我前往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他曾多次去过苏联，对俄国比较了解。到哈尔滨后，我将再带上一位政治局委员陈云同志，他现在正在主管东北的工业和劳工运动，1936年他去过苏联。

除他们之外，我还要带上两名秘书、几个密码译员和无线电报务员。

我为这次访问苏联组织了这样一支庞大的队伍，是因为我想就政治、军事、经济及其他重要问题，广泛听取联共(布)中央同志的建议和指导；另外，如果您同意的话，我们计划在苏联实地考察有关军事、经济、政府及政党的问题。

此外，如有可能，我想到东欧和东南欧访问一下，以便研究一下他们的人民阵线工作及

其他工作。

我们计划访问 1—3 个月。如果您同意这个计划，我们就照此行事。当然，如果不能的话，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自己来。

5. 我的身体不太好。我希望住在这里的两名俄国医生（其中一人会说汉语）陪我一同前往苏联，然后再随我回来。捷列宾的电台和我们同行。（“以便在途中及时联系”，这是他说的而不是写的。——捷列宾）到达哈尔滨后，我们将把电台留在那里。

以上可否，请给我指示。

毛泽东

1948 年 4 月 26 日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30 - 31

№1635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提前访苏及其安排

（1948 年 4 月 29 日）

毛泽东同志：

您 4 月 26 日的来信已收到，同意您来苏联的计划。您想带谁来，您认为需要带几个人来，都可以。两位俄国医生应该与您一起来。我们同意留一部无线电台在哈尔滨。有关其他问题我们面谈。

斯大林

1948 年 4 月 29 日

АПРФ，ф. 38，оп. 1，д. 31，л. 32

№1635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推迟毛泽东访苏时间

（1948年5月10日）

毛泽东同志：

鉴于您行经的几个地区事态可能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傅作仪的军队开始进攻蔚县，也就是您打算上我们这儿来访问必然经过的一些地区的那个方向。使我们感到不安的是，您的出访是否会影响事态的发展，而且您的旅程是否有安全保障。

根据这一点，您是否应该把来访往后延缓一下。如果您决定不延迟动身日期，请您通知我们，在您的旅途中我们是否能协助一下。我们把我们的飞机派给您，这样做，您是否认为合适。如果同意，请告诉我们，何时把飞机派到何处。

等待您的回复。

菲利波夫

1948年5月10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33

№163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苏联驻华使馆的指示

（1948年5月10日）

1.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馆的立场应该是稳重的，而且与中国政府及其机构的关系是严格限定在政府方面的。大使、大使馆工作人员与中国政府及外交部的代表们的交往不应该越出官方的范畴。

2. 为了使有关维护苏联利益的一系列问题得以解决，大使应与政府集团中的进步活动家保持关系，这不排除有可能通过他们对与他们有来往的政府官员中的领导人物施加影响。

3. 遇到一些对中国政府有反对派情绪的活动家找大使求助，而一些政府方面的人士，要苏联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保持中立等问题，也来找大使。这时大使限定只能这

样回答——苏联政府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是根据1945年签订的苏中条约和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原则来确定的。

4. 大使应该坚定地捍卫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并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方面保持警惕性。

(1) 在政治方面：

个别人对苏联的敌对行为和攻击要及时给予反击，向中国外交部提出交涉，或引起政府活动家对此类情况的关注，或协同苏联外交部在刊物上发表声明。

(2) 在经济方面：

通过政府机构，包括在某些场合亲自会见蒋介石，要求中国方面按1945年与苏联签订的商务协定负起责任。

协助苏联商务代表处解决这些问题。

根据1924年的合同捍卫俄罗斯宗教使团在中国的资产，同时要维护居住在中国的苏联公民法律权益和私人资产。

5. 在对日合约的问题上，大使应当在与中国官方和非官方的会谈中都要反复强调，对中国来说，在这个问题上与苏联站在同一立场是十分必要的。

6. 考虑到一些民主的和进步的组织目前处于不合法地位，在与这些民主和进步人士会见时，要非常谨慎小心。在与这些人士会谈中，要以谨慎的形式来表露他们对蒋介石政府的态度，他们的计划和任务，要注意研究在中国南方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在香港的)中国民主同盟的活动。

7. 要注意美国人在中国的活动，要注意按以下几个问题把资料和事实揭露出来：

(1) 在反对中国民主力量的斗争中美国人帮助蒋介石，并参与其中。

(2) 美国资本往中国渗透的形式和数额。

(3) 在中国的反苏军事基地。

(4) 以损害苏联在中国和在远东利益为目的，与中国政府和蒋介石的组织合作(合作的实质、形式和方法)，同时还组织敌视苏联的组织活动，及其他措施。

同时，大使还应关注美国的政策和中、美、英之间存在的矛盾。

9. [①]更广泛地运用中苏文化协会、中俄文报刊、杂志、国际书店代表处、“全苏影片出口联合公司”及其他组织，以便对苏联的生活和政策在中国适当地进行报道。

10. 停办白俄在上海和天津的报社。

11. 认真和系统地研究中国政府在对内和对外政策方面的举措，中国的军事、经济情况和这些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这些问题要及时向苏联外交部报告。

12. 不要回避与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的大使们交往，要与他们保持政府方面的有礼貌的关系。有关中国共产党员和其他中国对内和对外政策问题，我们不与他们争论，不必对

① 俄文原件即缺第八条。——译注

他们开诚布公。在所有场合都声称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1, л. 362

№1635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对苏联的访问

(1948 年 5 月 10 日)

菲利波夫同志：

今天收到您的来信，非常感激您。

鉴于目前形势，把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日程往后挪一小段时间是合适的。

为了我上你们那里去的旅程，请你们派飞机或轮船到山东半岛来。但是，最近几天我身体不好(头晕，脑袋很不舒服)，不能经受飞机里发动机的震动声，需要作短时期的休整，然后才能坐飞机飞过来。飞机场和港口的地点待我问清楚后再告诉您。

毛泽东

1948 年 5 月 10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34

№16361

费德林与帕尼卡尔会谈纪要：苏美关系及中国民主运动

(1948 年 5 月 27 日)

机　密

今年 5 月 27 日，在印度大使馆的午餐会上我和印度大使帕尼卡尔就以下内容进行了

谈话。

在会谈中，帕尼卡尔大使感谢我们新闻社给他寄来英文版的新闻简报。据他说，他一直饶有兴趣地阅读这份报纸。利用这个机会，我问大使，苏、美两国的国务活动家就苏美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对此有什么看法。大使在回答我的问题时声称，他一开始就不太相信美国对这个问题会始终不渝。美国目前感到失魂落魄地恐怖，可能，与其说是由于意识到苏联的真正强大，还不如说是感到来自共产主义思想的所谓威胁。帕尼卡尔接着说，尽管害怕别的思想的人的行动有多可笑，尽管由于别的民族的社会和政治原则而产生恐怖是多么愚蠢，但对于现代的美国掌权集团来说，完全就是这么一回事。

然后我问，他对中国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有什么印象。帕尼卡尔说，根据他个人的观察，听到美苏谈判这一消息时，中国政府和国民党的活动家们流露出难以掩饰的绝望和不知所措的感觉。帕尼卡尔强调说，以他的观点看，美苏调整关系对中国人来说，意味着国民党希望利用美、苏之间的矛盾以便取得美国人帮助的计划落空了。国民党要继续进行反共产党的战争，美国人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至于中国报纸上说，中国对调整美苏关系很感兴趣，并准备做美苏之间的桥梁等各种议论，所有这一切都是口是心非。在这些虚情假意后面隐藏着他们暗中的打算和计划。

随后，我们又谈到了中国目前的局势。帕尼卡尔问我，对李宗仁集团的看法如何。我回答说，李宗仁及其支持者在中外报刊上发表的政治纲领具有民主性质。尽管如此，对这帮人很难评论，至今谁都没有掌握有关李宗仁及其组织的实际力量及其能力的可靠信息。

接着我问帕尼卡尔，他对中国国内的民主运动有什么评价，帕尼卡尔回答我的问题说，他可以和我一起交换自己在这方面的观感。不久之前，他和南京高等学校的一些教授们，大家都知道的，就是在刊物上发表了民主纲领宣言的教授们，座谈了一次。与这些教授的座谈中，帕尼卡尔接着说，他得以搞清楚：这个思想本身，将这个思想付诸行动，组织他们在刊物上发表宣言，所有这一切都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及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干的。尽管蒋介石的内政方针是指靠美国的，蒋介石与司徒雷登之间的私人关系来往密切，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司徒大使对蒋介石的影响还未能达到美国人想要的程度。就是说，蒋介石还没有全面地、无保留地执行美国在中国的方针。正因为如此，一方面，迫使美国人不得不依靠其他组织和人士来协助，包括李宗仁借美国的积极支持当选为中国的副总统——这已不是秘密，美国在中国的代表还对自由知识分子中的民主运动表示了同样的支持。并非只有这些南京的教授们发表宣言，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同样也大规模地采取了这一行动。另一方面，帕尼卡尔补充道，美国人努力把中国极端主义分子的首领陈立夫赶到美国去，趁他不在的时候，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迫使他在中国执行符合美国利益的方针。

这时谈话被打断。

苏联驻华临时代办

费德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 ф.0100, оп.41, п.276, д.19, л.25-27

№16365

罗申与司徒雷登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及苏美关系

(1948年6月4日)

机 密

6月4日我拜访了司徒雷登。在礼节性寒暄之后,我们进行了下列内容的会谈。

我表示对司徒雷登对目前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回答说,最近几个月来总的局势,特别是军事形势,明显地恶化了,并在继续恶化,而且不可能期待在不久的将来这种趋势会改变。关于改组政府,司徒雷登声称,在新政府里很少有新人,所做的更改不会产生重大影响。新总理翁文灏,毫无疑问,是一个诚实、有才华的活动家,是个绝对聪明和出色的学者。他担当起自己这样一个艰巨的职务是因为早就对他下达了这样的命令。不可能期待这样一位优秀的学者会创造奇迹,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政策,他也会像其他人一样,扮演一个命令执行着的角色。在中国,实际上还是保持着那个决定一切政策的人的个人专政。

当我说,我对那个新的行政院副院长不熟悉时,司徒雷登说,顾孟余是个优秀的活动家、有名的学者,战前他曾在许多部任过职。后来,因与国民党领导人有摩擦而离开政坛。因此,司徒雷登说,很高兴又看到这个人在政府里工作。我说,看来,现在他们把副总统李宗仁搁在了次要地位。

对这问题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对李宗仁当选不满意是人所共知的。按司徒雷登的看法,这正好说明了李宗仁在那时是很有力量和积极的人物,而蒋介石身边需要的是消极被动且听话的人。众所周知,没有给副总统委派任何职权。因此,他只能等待时机,看什么时候这总统的位置能空出来。

如果蒋介石有点瞧不起李宗仁和其他人,那他这样做,按司徒雷登的看法,不是出于亚洲人所固有的那种对有潜力的人的敌视,而是依据对自己坚定的信念——只有他(蒋介石)一个人才能负担起这样伟大的历史使命,而且他的责任就是消除那些可能妨碍他的使命取得成功的人,换句话说,就是消除那些违背他的意志的人。司徒雷登说,在这种情况下,中

国问题就是他一个人自己的问题。按司徒雷登说法，蒋介石往往对现实失去感觉，而开始相信他自己的一套计划，以为真的能在4个月内取得胜利，而不了解在国内进行根本性的改革的必要性。司徒雷登已多次对蒋介石说过，不管美国给中国政府多大的帮助，这些帮助不可能使他打垮共产党，因为要取得胜利，政府必须进行深刻的、能使整个生活全面更新的改革。蒋介石总是同意司徒雷登的说法，但是实际上，什么新的改革措施都没有。我问司徒雷登，蒋介石是否知道各地的实际情况，司徒雷登回答说，蒋介石知道事实，至少表面上知道事实真相，但不知道引起这些事实的真正原因，因为其下属把不可能隐瞒的事告诉了他，但避而不谈事情的真正起因。这样一来，蒋介石周围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大祸害。

后来，我问司徒雷登，他到台湾和南方之行后印象如何。提到这些地区拥有巨大的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之后，司徒雷登指出，现在虽然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成绩还不太大，因为到处都能感觉到工作组织得不好。宋子文在中国南部做了很多事，宋子文在自己的工作中特别依靠广东人，而不是中央派去的人。司徒雷登回答我另一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自然灾害的话，南方的收成一定会很好。

会谈快结束时，我对司徒雷登对苏美关系的看法感兴趣，司徒雷登说，依他个人的见解，过分的担心和猜疑是主要的祸害。这妨碍了克服出现的各种困难，他(司徒雷登)知道，美国人民不想打仗，看来，苏联也同样不想打仗。因此，必须要消除相互间的不信任。我指出了美国报刊和个别新战争贩子的挑衅性宣传，我说，在我们国家里不可能听到这样的言论。苏联人民所想的和所做的都是为和平而努力，以完成战后建设的任务。司徒雷登说，他个人认为，相当一部分美国报刊的立场是错误的，而某些人的发言中包含有荒谬的言论，但是这些都是双边关系的总的气氛所造成的。因此，必须从已形成的僵局中找出一条路来。他指出，苏联政府为改善苏美关系和解决最重大问题做出了很多努力。这时我问司徒雷登，依他所见，用什么方法可以改善苏美关系。司徒雷登回答说，看来，B. M. 莫洛托夫或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应该向马歇尔提出个人的真诚建议，讨论改善相互关系的途径。司徒雷登解释自己的观点说，美国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总统，而杜鲁门完全信赖马歇尔。他(司徒雷登)完全相信，马歇尔是千方百计想和苏联达成协议的，如果他认为有这种可能的话。

在会谈时还有大使馆一等秘书 K. A. 克鲁季科夫参加。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 罗申(签名)

分送3份：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6，д. 19，л. 39－42

№16369

维辛斯基致库兹涅佐夫函：答复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

(1948 年 6 月 17 日)

机 密

1948 年 6 月 27 日
第一远东司
第 572/ДВ 号

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
B. B. 库兹涅佐夫同志：

答复您 1948 年 5 月 19 日第 981c 号来信。

关于中国解放区工人联合会主席刘宁一向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提出的请求，告知如下：

1. 东北的民主政权曾请求派苏联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到东北来工作。根据政府的决议，一组这样的工作人员已出发到东北。

2. 东北的民主政权请求供应他们一台大型的无线电台的设备，现已满足他们的要求。

3. 如果梅林杨(Мэн Линян)请求允许他从苏联领土过境到东北去，将发给他过境签证。陈家康要到东北来的过境签证在早些时候已发给。

4. 研究了中国解放区派工人到苏联的企业来学习，同时还派一组工会干部来学习工会工作经验的问题，认为此事延后一些为妥。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A. 维辛斯基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7, д. 48, л. 9

№16370

佐林致柯西金函：给中国青年工人代表团拨款事

（1948 年 6 月 21 日）

机　密

1948 年 6 月 21 日
第一远东司
第 689/1ДВ 号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A. H. 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拨给他们 16 万苏联卢布，以便东北的青年工人代表团能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中国人想在奥特波尔车站拿到这笔钱。

苏联外交部请求对外贸易部能允许把上述这笔款子划入苏联与东北之间易货贸易费用支出账上。

苏联对外贸易部对这样的结算方式没有异议。

请审核提供建议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方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佐林

文件共 3 份，送：给应给的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问题已与米古诺夫（苏联外贸部）和契楚林（国家银行）达成协议。

Г. 通金

附件一：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 年 6 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对外贸易部按照与北满“东兴”公司订立的合同,将16万苏联卢布划入供货账上,发给东北要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青年代表团。

附件二:

第一远东司

1948年6月26日

第706/1ДВ号

苏联内务部边防司令

斯达汉诺夫中将:

东北民主政府请求能让东北青年代表团不受阻拦地越过苏联国境,随团带的有官方文件、中国领导人的肖像、奖章、摄影展览、中国地图、书籍、600面小旗、标题为《解放区农民的生活》的黏土模型,还有几盒药品(药箱)。东北青年代表团在今年7月底从哈尔滨到华沙去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苏联外交部支持东北民主政府的请求。请你(斯达汉诺夫中将)向边防战士发出相应的指示。

苏联外交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C. 戈伦斯基[①]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8, д. 55, л. 3-4; д. 53, л. 10

№16374

柯西金致莫洛托夫函: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7月2日)

机 密

B. M. 莫洛托夫同志:

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第375—144c号决议,建议苏军指挥部(比留佐夫同志)在20天期限内,与关东地区管理局协商出一份有关在辽东半岛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兑换的具体条件、新货币的样本、新货币的制造和订货等事宜的提案。

是年6月9日,比留佐夫同志发来第548/ПЭО号电报,通过与地区管理局副局长、中国共产党区委书记韩光商谈,达成协议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决定草案。

① 戈伦斯基,时任苏联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司长。——编注

决定的草案规定：

1. 以关东银行的名义发行面值为1元、5元、10元、50元和100元的新货币。

2. 把流通中的货币以1∶1的比值兑换成新货币。

3. 给在本地区内长期居住的居民，各个国家和社会组织，以及在本地区管理机构登记注册的商业、工业和其他企业兑换货币。

4. 停止已破损旧货币的流通，不得把旧货币兑换成新货币，销毁全部收回的货币。

比留佐夫同志同意地区管理局的方案，并支持他们关于向苏联财政部提出制造数额为100亿元的新货币的请求。在这笔款项中，通过兑换旧货币将65亿元投放流通，而35亿元留置作为关东地区管理局的准备金。

比留佐夫同志提出的一套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兑换的条件，我认为是不可行的。因为按1∶1的比值来兑换流通中的钱，不可能改善地区内货币流通的状况，实质上仅是把旧货币换成新货币的技术上的更换而已。

依据1948年2月25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布的第373—142c决定，货币改革除了采取一些一般性改善在协议区的经济情况的措施外，其目标应该是健全地区内的财经状况，稳定新货币，同时要稳定物价，进一步降低物价。我考虑到，按1948年5月收到的样版制造的新币要在10月份才能制成。我认为，建议比留佐夫同志在1个月的期限内，按以上指定目标把修订好的关东地区管理局在合同所在地区进行货币改革决定的方案呈交给政府，是比较适宜的。

在地区管理局的货币改革方案中，应该考虑到元的贬值和区的经济在支付资金上的需求，来确定新货币以什么比值来兑换目前正在流通的旧货币。

除此之外，向居民、企业和机构兑换新货币的数额，宜限定相应的数量。其中对居民应按照其所在的团体而对企业和机构应按他们开展正常活动所需要的资金为限额。

在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应拟订一些措施来整顿一下关东地区管理局的税收体系和财政工作。

同时，我认为检查一下进行货币改革的经济基础的准备工作是适宜的。为此，委托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的期限内把执行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2月25日第373—142c号《关于1948年辽东半岛协议区经济问题》决定的过程向苏联部长会议报告。

A. 柯西金

手写批注：

通金同志、A. 斯米尔诺夫同志，请给予建议。

B. 莫洛托夫

7月2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8, д. 59, л. 20 - 21

№16375

斯米尔诺夫和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辽东半岛的货币改革

(1948年7月3日)

机　密

B. M莫洛托夫同志：

1. 从实质上说，对A.柯西金同志提出的关于在辽东半岛的协议区进行货币改革的方法和条件没有异议。

我们认为，应该给比留佐夫同志发指令，让他根据苏联财政部对这一问题的意见提出在辽东半岛进行货币改革的新建议，没有必要颁布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一问题的新决定。附上给比留佐夫同志的草案。①

2. 整顿在协议区的货币流通与完成苏联部长会议今年2月25日第373—142c号决议中规定的经济措施是联系在一起的。有鉴于此，应当在对有关推行货币改革的程序和条件的建议予以讨论之前，掌握这一决议执行情况的材料。

既然对完成上述所指决定进行监督的工作落在赫鲁廖夫肩上，A.柯西金同志建议，要赫鲁廖夫同志在两周内向苏联部长会议呈送有关完成这一决定过程的报告，我们认为这是正确的。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对这个问题发布的命令草案。②

A.斯米尔诺夫(签名)

Г.通金(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9，л.23

---

① 在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原注

② 在公布的档案库中未发现该草案。——编注

№1637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安排

(1948 年 7 月 4 日)

致斯大林同志：

我的健康状况比前两个月好多了。我决定近期到您那儿去。

到你们那里去的路线有三条：航空、海路和陆路。但不管怎样，我们应该途经哈尔滨，因为我要和东北来的好些负责同志谈话。

我希望能坐飞机去，因为这样比较快捷，同时对我的健康状况比较合适，坐飞机可以使用石家庄和潍县①的两个机场。

在潍县的那个机场离大连比较近，也比较安全。这个机场在潍县的南面，在二十里堡(Эршилибу)站上，即潍县和坊子之间。

机场的资料：从北到南长 2 224 米，从东到西宽 368 米，起飞跑道长 2 000 米，宽 96 米。但这里，敌人的运输机每天从早到晚一昼夜从青岛、济南飞越潍县及邻近地区往返 6—7 次之多。

你们让飞机从大连到潍县的机场来接我们会有什么困难吗？飞机降落在机场后，要停 15—20 分钟，必须停留这段时间，以便我们能乘坐上去。

如果你们认为在潍县机场运送我们出去不合适，那么在石家庄的机场还要困难些，因为距离你们更远，而且国民党的运输机同样常从那里飞过。

在这种情况下，请考虑是否有可能派船只到山东半岛的一个港口，荣成(Жунчэн)、俚岛(Лидао)或石岛(Шидао)，把我们载到大连。

如果在海上运送我们也有困难，那只好考虑走陆路。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时机，即目前傅作义的主力部队正陷在河北省和热河东部的交界处的几个战役中，而平绥路上感觉相对较空，可以在部队的掩护和陪送下穿越平绥路，穿过热河省的解放区到哈尔滨。但是那段路我们要走一个月时间，在大热天里，可能因为我的病而在路上产生麻烦。如果能用飞机把我们从潍县的机场经大连(或其他点)送到哈尔滨，那么，我们就打算本月 15 日左右乘汽车从石家庄附近的驻地出发，大约过 1 周后到达潍县，在那里逗留 2—3 天。我们希望，飞机能在本月 25 日飞到潍县来运送我们。

飞机来的具体时间(日、时)可以在我们来到万县之后，用无线电与你们一起确定。

如果你们决定走海路来接送我们，那么希望船能在这个月底到达指定的港口。我们在这个月 15 日左右从石家庄邻近的驻地出发。

---

① 潍县，今潍坊。——编注

如果航空和海路接送我们都不可能,我们还是要在本月 15 日左右出发到北方去,但在这种情况下,要到 8 月中旬才能到达哈尔滨。我们一行共有 20 人(包括密码译员、无线电机务员、秘书),合计重量 3 000 多公斤(包括这里所有人员)。因此,如果使用航空路线,那必须派 2 架客机(运输机)来。以上所列的几条路线,哪一条最适合,请你们决定,并通知我们。

毛泽东

1948 年 7 月 4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35 - 36

№16378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再次推迟毛泽东访苏日期

(1948 年 7 月 14 日)

捷列宾:

请将下列情况转告毛泽东:

由于粮食收购工作已经开始,领导同志们自 8 月起分赴各地,要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1 月,为了有可能和所有的领导同志会面,因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请毛泽东同志把来莫斯科的行程改到 11 月底。

斯大林

1948 年 7 月 14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37

№16379

捷列宾致斯大林电:毛泽东同意推迟访苏

(1948 年 7 月 14 日)

兹报告:

7 月 14 日当地时间 14 时 30 分我将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任弼时作了翻译。

毛泽东微笑地听完后说道，“好，好”，然后请求把以下文字转交给您，此文是他口授，由任弼时翻译的。

“斯大林同志：

同意您在7月14日来电中讲述的意见，把到您那里的行程延期到10月底至11月初。

毛泽东

7月14日”

然后进行了短暂的谈话，将另文转告。

捷列宾

1948年7月14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38

№1638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推迟访苏的反应

（1948年7月17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报告，当我把斯大林的电报转交给毛泽东时我个人的印象和观察。

听了任弼时翻译的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后，毛泽东问：“难道在苏联把粮食收购工作看得这么重要么？连党中央的领导人都分赴各地去干这项工作？”我作了肯定的问答，任弼时也说是这样的。毛泽东又问：“苏联的农业收入占多大百分比？其收益比工业多，还是少？”我回答说：“确切地说，怎样一个百分比，我现在也不知道，但不管怎样，这个百分比是很大的。”我又补充说：“在苏联，粮食收购工作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后来，毛泽东和任弼时都说，大概，不久大老板要去休假了。

这句话他们是用自己的语言说的，但我听懂了。这之后，毛泽东口授了这份给斯大林的回电。

据我6年多来对毛泽东的了解，他在听任弼时翻译时的微笑和说的“好，好”，并不意味着他对电报满意。这一点看来是很清楚的。

依我个人看法，毛泽东认为最坏的情况是拒绝给他派飞机和船只，但这一点对他来说也不大可信，特别是派飞机是莫斯科提议的。

他深信,他必须现在出访。看来,出访对他本人来说是必需的,他急切地等待着回音。

7月13日,按纯粹中国的习惯,他口授完自己的信后,我问他什么时候发出这信,是否可以等一天。毛泽东回答,他请求7月13日发出。

他已经完全准备好动身了。

近日,我开始知道,现在他们为莫斯科准备了一系列材料,如国民党军队在前线的布阵地图、国民党军队编制的资料。据我看,还有关于自己的材料,有对国民党的侦察情报,有关它的结构的资料,有一些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和其他的资料。毛泽东的手提箱已收拾好了,还买了皮鞋(他和这里所有的人都是穿布鞋的),缝制了厚呢大衣。问题不仅是出访本身,而且日程他们也已决定,剩下的就只是如何走的问题。这样一来,他外表上现在很安详,有礼貌,并且很关切,这完全是中国式的客气。他内心真正的感受难以看到。从任弼时的整个外表看,令人清楚地感觉到他没有意料到要推迟出行。

梅利尼科夫对我说,7月15日毛泽东也同样问过他关于粮食收购的问题。

捷列宾

1948年7月17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39 - 40

№16384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关于访苏的想法

(1948年7月28日)

Ф. 库兹涅佐夫同志:

我把毛泽东自己提出的一小部分谈话转告您。

毛泽东说,如果在1947年,他本来并不急于到莫斯科去,现在1948年,形势变了,他想快点到莫斯科去。在那里他有很多事情要谈一谈,有一些问题他想请求给他出些主意,另一些问题需要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他提供一些帮助。

毛泽东要在莫斯科谈的几个问题主要是:

1. 关于与小的民主党派和团体(及民主活动家)的关系;关于准备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2. 关于同东方的革命力量的联合,同东方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之间的关系。

3. 关于对美国及蒋介石斗争的战略计划。

4. 关于恢复并创建中国的工业，(特别是)包括军工、采矿业、道路交通——铁路和公路。到那里谈谈我们(中国共产党)需要些什么。

5. 关于价值3 000万美元的银元贷款。

6. 关于与英、法建立外交关系方面的政策(路线)。

7. 还有一系列重要问题要谈。

综上所述，毛泽东着重强调："必须谈妥，以便我们的政策方针要与苏联完全一致。"

关于会谈的其他方面，我将另文简要地向您转达。

捷列宾

1948年7月28日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41

№11415

马利宁致林枫函：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年7月30日)

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林枫公民：

死者身后遗留财产的继承权，世界各国都有。苏联也不例外。苏联宪法(第十条)确保这一权利的实现，并且以此为根据，苏联民事法中有一个特别部分讨论了继承法问题。

1945年正式颁布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3月14日的命令，加强并扩大了继承权。

在苏联，可以依照法律和遗嘱实行继承。

依法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苏联公民死后，首先有权继承的是子女(其中包括收养的子女)、配偶、丧失劳动能力的父母及其无劳动能力并由死者在最后一年抚养的人员。

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优先于其他所有法定继承人的继承权，遗产应由前者平均分配。

第二顺序继承者是死者的有劳动能力的父母。

最后，如果在活着的继承者中没有上述两类继承者或者上述两类继承者不接受遗产，那么第三顺序继承者应是兄弟姐妹。

在苏联，依法享有继承者的人员就是这些。

不在遗产所在地的继承者可以亲自去接收遗产或通过代理人接收遗产。

依照遗嘱继承的基本规定如下：

任何当遗嘱没有改变继承的情况下都实行依法继承。

每个公民都可以通过遗嘱将自己的全部遗产或部分遗产留给拥有依法继承权的人中的一个或几个人，以及国家组织和社会组织。

但是，立遗嘱人不得剥夺自己未成年子女和其他无劳动能力的继承人依法继承他们应得的那份遗产。

当没有依法继承人时，可向任何人就遗产问题立下遗嘱。

遗嘱应由立遗嘱人签字并报送公证机关以便做出公证。

当遗产无人继承并需要管理时，公证机关可指定负责人照管上述遗产。

在继承人不出席以及继承人放弃继承权的情况下，遗产被认为无人继承并交给苏联政府支配。

苏联有关继承权的法律就简述这些。

这些法律无一例外适用于全体苏联人民，无论他们的所在地如何，也就是说，无论他们是住在苏联境内还是住在国外。

根据现有的国际协议，无继承人时，根据惯例和实践，国家一向在继承权问题上使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中国今年8月5日颁布了一项法律——"关于使用外国法律的条例"。完全执行这一原则。

甚至与苏联敌对的伪满洲国政府也执行这一制度。

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要实现其在境外发现的财产继承权，由直属外交部的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和相关的苏联领事馆承办。

律师协会委托当地的律师在领事馆的监督下直接办理。

领事馆采取措施，保护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为此对有关的组织或某些公民予以授权。

必要时，领事馆发给某些公民办理事务和出庭发言的全权证书。

领事馆有权接收那些通过法定程序被公认为属于居住在苏联境内的公民的财产，以便将其送往苏联，转交受益人。

如果法定继承人没有去接收苏联公民死后留下的遗产，那么这份遗产就应转交给领事馆处理，以便在找到继承人之前照管好这份遗产。

哈尔滨特别市的法庭在审理苏联公民的继承权案件中，最近越来越不按上述规定办事，不定期地拖延审理这些案件，同时在一些实质非常明显的问题上设置令人费解的障碍。

我认为，从当地民主法院对我们的态度上看，这一切纯属误解，因此请允许我向您表明自己的愿望：

一、必须恢复早先存在的制度，在办理继承权案件中应运用继承人国家的法律；

二、对继承人是苏联公民而被法院拖延办理的继承案，应使用上述原则迅速解决；

三、必须允许律师，或者一般苏联公民，作为在苏联境内的继承人代表参加审理这些案件，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出具对律师授权的证明；

四、在继承人未去接收已故苏联公民的遗产之前，必须将这些遗产转交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照管。

向您致以热诚的敬意！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1948年7月30日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1—1274页

№11429

马利宁致朱其文函：关于苏联公民遗产继承权问题

(1948年7月30日以后)

致哈尔滨特别市市长朱其文：

根据我们同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就保护在满洲的苏联公民继承权以及当地律师达维德·费拉基米罗维奇·戈兰斯基和亚历山大·西尔韦斯特罗维奇·涅格列维奇今后在这一工作中继续使用由莫斯科市律师协会外国法律委员会授予的全权这一问题的谈话精神，我请您，市长公民，将上述人士作为该委员会的代理人进行登记，并向他们提供有权不受阻碍地以该委员会的名义在当地中国民主法院办理一切案件的相关文件。

我方可以证明，苏联驻哈尔滨市总领事馆很熟悉戈兰斯基和涅格列维奇，他们每个人都代表该委员会工作了13—14年。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275页

№16387

佐林致莫洛托夫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

（1948年8月4日）

机 密

B. M.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通过驻哈尔滨的苏联总领事馆请求拨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16万卢布，以后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销账。与此同时，又报告说代表团随身带有5 500美元。

代表团团长蒋南翔到了莫斯科后，请求苏联国家银行把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用以支付代表团应付的款项。同时他表明，代表团所需要的兹罗提一个也没有，而代表团带的美元要用作交纳给世界青年联合会的会费。

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发来的第10225pc号命令中规定，拨给代表团16万卢布，但关于把这笔款子，或者其中一部分兑换成兹罗提，或把它汇到华沙，却只字未提。因为民主政权未提及这个问题，而我们认为可能代表团现有的5 500美元是预定用作在华沙的开销费用的。

我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在哈尔滨的民主政权会用提供货物来抵偿。我认为可以接受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要求，将150万兹罗提汇到华沙，可以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得到的苏联卢布来清偿这笔汇款。

请审核附上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这一草案是我与契楚林(国家银行)及米古诺夫(苏联对外贸易部)共同协商过的。

B. 佐林

手写批注：

致B. 佐林同志：不反对，要送到部长会议去。

B. M. 莫洛托夫

1948年8月7日

已经寄给佐林同志(连附件)第4829－м号。

决定：给斯克沃尔佐夫，要关注部长会议的决定。

B. 佐林

8月9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年8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150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6

№16388

佐林致苏联部长会议报告：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拨款事

(1948年8月6日)

机　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的请求，苏联部长会议允许给前往华沙参加世界青年工人代表大会的东北青年代表团拨划16万卢布，此款由东北向苏联供货来抵偿(今年7月28日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代表团到莫斯科后，由于没有外币，团长请求以上述16万卢布抵偿，兑换成150万波兰兹罗提汇往华沙。

注意到16万卢布的等价物由哈尔滨民主政府以供应货物来清偿，苏联外交部认为可以允许苏联国家银行为东北青年代表团承办把数额150万的兹罗提汇至华沙，然后用代表团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7月28日颁发的第10225pc号命令获得的卢布来抵偿汇款。

苏联外贸部米古诺夫和苏联国家银行契楚林对此无异议。

这问题已与 B. M. 莫洛托夫同志商定过。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的草案。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佐林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
第____号

1948 年 8 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允许苏联国家银行将一笔数额为 150 万波兰兹罗提的款项,以东北青年代表团团长蒋南翔的名义汇到华沙去,而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 7 月 28 日颁发的第 10225pc 号命令拨给东北青年代表团的苏联卢布来偿还这笔汇款。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8, д. 55, л. 9 - 10

№16396

戈伦斯基致佐林报告: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

(1948 年 9 月 9 日)

机　密

B. A. 佐林同志:

对苏联邮电部呈报的关于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书没有异议。但是条约—法律司认为协定的我方,应该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为妥。苏联与中国官方政府保持着外交关系,因此以邮电部的名义签订不合适。

附上给 И. Д. 普苏尔采夫同志的信稿。[①]

C. 戈伦斯基

手写批注：

同意。

B. 佐林

1948 年 9 月 10 日

把信寄出。

C. A. 戈伦斯基

1948 年 9 月 11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9，д. 72，л. 19

№08993

科马罗夫致莫洛托夫报告：组织恢复中长铁路的运行

(1948 年 9 月 10 日)

莫洛托夫同志：

遵照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5 月 17 日的命令(第 5970 号)，派 И. В. 科瓦廖夫[②]同志为苏联交通部的全权代表到中长铁路出差，帮助落实有关恢复中长铁路运行以及抽调当地干部成立恢复运行组织的措施。

该命令草案是 И. В. 科瓦廖夫同志起草的，已于今年 5 月 13 日送交卡冈诺维奇同志，并于当天在苏联部长会议常务委员会上讨论通过。

命令草案已于 5 月 15 日送斯大林同志签字。

交通部领导小组组长

X. M. 科马罗夫

АВПРФ，ф. 06，оп. 10，п. 53，д. 739，л. 1

---

① 参见以下№16397 文件。——编注

② 科瓦廖夫，时任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编注

№16397

佐林致普苏尔采夫函：与东北解放区建立电报联系事

（1948 年 9 月 11 日）

机　密

苏联邮电部普苏尔采夫同志：

对您呈报的关于在苏联和东北解放区之间建立电报联系的临时协定草案没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外交部认为应以邮电部滨海管理局的名义签订协议为妥。

佐林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9，д. 72，л. 20

№08998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转交林彪请求援助的电报

（1948 年 9 月 12 日）

莫斯科

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为证实我今年 9 月 10 日的电报(№300)，现将林彪请求我们派专家援助中国人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的来信原件和这一文件的俄文译文随信寄给您。

附上文所提文件和材料。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附件：

林彪的电报

（1948年9月10日从哈尔滨总领事馆接收）

斯大林同志：

我们高兴地告诉您，经过两年作战，在中国东北，我们已经解放了4 200万人口。敌占区被迫缩小，敌人现仅集中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大城市负隅顽抗，已被我军分割包围。

我们相信，我们即将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在解放区已经着手建设新生活：已经实行了土改，正在恢复铁路交通和工业生产。

在过去两年时间里，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恢复了几座林业、纺织、造纸和食品工业工厂，恢复了许多煤矿，采金企业也开始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您在恢复遭受破坏的中国东北铁路的事业中所给予的大力援助。所派来的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专家组帮助组建了恢复工作管理局和专门的铁道兵兵团。首批部队组建工作业已结束，部队正着手恢复被毁的铁路、桥梁，同时还进行专业训练。

在您派来的专家的领导下，我们对重要的遭到毁坏的铁路路段进行了详细的技术勘查，确定了遭到毁坏的程度以及进行修复的工作量，还确定了所需建材、设备和劳力数量。重点要修复的遭毁坏的重要线路总长1 800公里。

仅修复东北主要铁路线段就需近1 800公里钢轨、250万根枕木、3 500吨道钉、1 000吨电话线、3 000吨修复桥梁用钢筋以及其他技术物资和通信仪器、信号装置、给水装置、机车—车厢库。

仅边疆区铁路所需金属总量就近20万吨。为完成1948年的修复任务，所需钢轨我们打算通过拆卸不重要的路段钢轨来弥补。道钉完全没有保障。今年需2 500吨，我们手中仅有100吨，而且我们没有组织生产。枕木和木材我们发动地方上准备。

我们深感金属、设备、复杂的交通仪表和工业仪表短缺。

所恢复的工业企业由于缺少训练有素的干部、专门设备和材料，生产能力很低，现在只能部分保障战争和居民所需。

黑色和有色冶金、炼钢、化工、机械制造和其他重要的工业部门，由于没有当地专家和设备，至今仍未恢复。

为了保障日益增长的前线、铁路交通以及居民所需，我们必须恢复和使用作为我们经济基础的集中在通化、鞍山的冶金和炼钢工业企业，安东和吉林的有色金属和化工企业。

建在松花江上的最大的小丰满水电站竣工后将能够保障广泛利用其电能。

在哈尔滨市,在保存下来的原日本机车制造厂主厂房的基础上,可以迅速组织生产现在恢复交通和恢复工业所需要的工具和设备。

解决这些最重要的任务,我们至少要花两年时间。为此需要制定相应的东北国民经济恢复计划。

为了这一伟大的工作,我们缺少有经验的干部。

我们请求您派一批专家来,全面研究我们的经济并与我们共同制定统一的主要工业部门的恢复和实施计划。

为了尽快培养自己的专家干部,我们请您同意大大加强现有的中长铁路工业学院,并在您的帮助下扩大教师队伍。

为了完成上述任务,我们至少需要100名以上各部门专家:

1. 计划专家和整个国民经济专家10人;
2. 黑色有色冶金专家15人;
3. 煤液体燃料加工,硫酸盐、盐酸和硝酸制造专家6人;
4. 采矿工业,其中包括煤炭加工专家10人;
5. 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专家6人;
6. 森林采伐和木材加工专家6人;
7. 纺织专家5人;
8. 采金专家4人;
9. 水泥专家4人;
10. 造纸专家4人;
11. 混凝土大坝建筑和水电站设备专家8人;
12. 财政专家4人;
13. 军事铁路学校教员6人;
14. 以校长为首的工业学院教授、讲师12人。

我们再次对您表示衷心感谢,感谢您帮助解放了中国东北人民。

致以

布尔什维克敬礼!

林彪

9月8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8, л. 6 - 11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444, л. 3 - 11

№09013

缅希科夫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

(1948年9月18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马利宁同志来自哈尔滨的报告(1948年8月25日电报第28661号)，转达了中国人关于给予他们100万卢布借款，以支付中国儿童在苏学习和中国民主机构代表从苏过境费用的请求。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

外贸部认为可以满足中国人的要求，即给他们提供100万卢布的借款，并同意以(东北)元来偿还为他们提供的款项。在东北，我们支付交通部和外贸部工作人员的费用以及河运部运输和财政部的费用还需一大笔资金，1948年共达500万卢布左右。

卢布/元的折算，需用苏联国家银行为支付苏联国家机关在哈尔滨的工作人员工资每月所规定的汇率(1948年8月这一汇率是：1 246元/1卢布)。

M.缅希科夫[①]

第2-5/27848号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1

№16399

佐林致帕诺夫函：向民主政权提供制定经济计划的资料

(1948年9月20日)

机　密

致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

---

① 缅希科夫，时任苏联外贸部部长。——编注

A. Д. 帕诺夫同志：

由于要拟订东北 1949 年的经济发展计划，东北民主政权向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请求援助。请求向他们提供有关苏联发展人民经济的材料和制定五年计划的资料。

请通知苏联外交部是否可以把东北民主政权感兴趣的材料寄给他们。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佐林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7，д. 48，л. 10

№20275

通金致契楚林函：为中国领导人的孩子支付费用

（1948 年 9 月 20 日）

致苏联国家银行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契楚林同志：

中国东北民主政权通过哈尔滨远东银行分行转账到莫斯科 9.5 万卢布给世界工会联合会中国代表刘宁一和一群从中国来莫斯科学习的孩子。

根据苏联外交部在赤塔的外交代表叶廖明的通知，中国孩子已经到了赤塔，但是他们到莫斯科还缺 1.2 万卢布。

请求转账到赤塔外交代表叶廖明名下，以便将这些钱转交给所提到那群孩子们。

请告知随后的有关情况。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

Г. 通金

1948 年 9 月 20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8，д. 55，л. 11

№09014

通金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借款事

（1948年9月23日）

В. М.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用于支付在苏联学习的儿童的费用以及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中国人同意以货物或东北元偿还提供给他们的款项。

缅希科夫同志建议满足中国人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并同意以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

我认为，对东北民主政权关于提供给他们100万卢布的请求应该予以满足。但是，对于缅希科夫同志关于让中国人用东北币来偿还这笔款项的建议，我认为是不能接受的。

根据苏联国家银行的通报资料（契楚林同志），按照政府批准的外汇计划，1948年东北元的进项将超出我们在东北的开支。100万卢布兑换成我们并不缺乏的东北币，对于我们并不合算。

根据以上所述，我建议提供给东北民主政权100万卢布，并以提供货物的方式清偿这一数额，同时补充条件是：我们有权要求，按照苏联国家银行在我们收取款项时的外汇比价，收取上述指明的我们所要求的东北元数额。

Г. 通金

1948年9月23日

手写批注：

莫洛托夫同志已阅。

АВПРФ，ф. 06，оп. 10，п. 52，д. 734，л. 2

№1640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要求尽快访问苏联[①]

（1948 年 9 月 28 日）

9. 由于一系列问题需要亲自向联共(布)中央及大老板报告,为取得其指示,我打算按上次电报中指定的时间到莫斯科来。现在我暂时简单地报告以上这些。请您务必把这转告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大老板。真诚地希望他们能给我们作指示。

毛泽东

1948 年 9 月 28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42

№20274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修复中长铁路事

（1948 年 10 月 4 日）

致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A. 佐林同志：

中长铁路局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今年 9 月 30 日电报通知说,东北铁道部部长吕正操提出,请求将属于中长铁路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的、处在已解放的南段(石河—辽阳)的车厢和蒸汽机车接去进行修复,并拨出 20 节质量上乘的客车车厢给客运列车,同时为恢复在东北铁路南段的供水系统,修复大连生产的作为备用的 10 部全套供水联合机组,并转交给他们作为中长铁路资产。

对已解放的东北铁路南段的技术帮助,完全可能对中长铁路大连段现在的工作不造成损失,并且也是保证即将在瓦房店和烟台煤矿区进行共同采煤的需要。关于这一点,根据苏联部长会议 1948 年 6 月 21 日的第 9868pc 号命令,现在正进行与民主政权的谈判。20 节客车车厢和修理货运车皮和机车的转交条件和运营和修理费用的支付方法,将由中长铁路

---

① 该档案在俄国出版物上公布的是节录本。——编注

大连段领导与辽阳铁路局领导之间相应的协定决定。

请您根据这一问题的实质做出相应的解释，因为对中国人类似的请求，苏联外交部在今年春天曾给予否定的答复。1948年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发出指令，委托中长铁路局领导人与东北民主政权谈判并签订"共同恢复和经营抚顺和杨台(Яньтай)煤矿的协议"。协议是中长铁路管理局与东北行政管理委员会工业部之间签订的。

交通部副部长

Л. 马利克维奇

1948年10月4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9，д. 67，л. 11

№08997

莫洛托夫呈斯大林请示：林彪请求派遣专家事

（1948年10月6日）

斯大林同志：

林彪从哈尔滨来电，请求向中国东北解放区派不少于100人的苏联专家小组，人员包括计划、冶金、火炮、炮弹和子弹制造及其他工业部门，如财政、教育等各方面的专家。

10月5日，9人小组在交换意见时认为，不宜向中国东北派这么大数量的专家小组，目前应该着重研究以下几点：

一、令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负责准备派10名各个部门的苏联专家，具体部门将同林彪协商确定，同时把相应人选方案提交中央政治局批准。

二、苏联人员不应以顾问的名义，而应以专家的身份派到哈尔滨。

三、由我们在哈尔滨的总领事委任命一名非常有党政和经济工作经验的同志，此人应同派往哈尔滨的苏联专家和林彪保持联系。

四、以后往中国东北派苏联专家的问题，应等毛泽东来苏联时同他商量。

请批示。

В. 莫洛托夫

手写批注：

副本送马林科夫同志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1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2-5

№16406

高岗致斯大林函：请求苏联给予经济援助

(1948年10月16日)

机　密

斯大林同志：

为了在东北发展纺织工业，以满足我们军队和居民的需求，请求您允许在1949年运送2万吨棉花到东北来。否则，我们这里会出现很大的困难。

因此，恳请您能满足我们现在这一要求，这将给我们很大帮助。

致共产主义敬礼

高岗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第一远东司

第6353-м号

手写批注：

决定：有理由完全满足这一申请。

决定：费德林，请打电话给对外贸易部，米高扬查询前几年供应棉花的情况，看来，有可能提出一个在1.3万吨的基础上增加供应的问题(最初方案)。

М.Я.马立克

12月7日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11

№09002

波采罗布致洛吉诺夫函：转交林彪求援的信件

(1948年10月17日)

联共(布)中央

Л. А. 洛吉诺夫同志：

兹随此报告给您寄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通过外交邮件寄来的林彪于今年9月8日写给斯大林的信。

信的全文已由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总领事马利宁同志以密码电报第30433号于今年9月10日传来。

对林彪信的答复已由莫洛托夫同志征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于今年10月16日以电报(第20696号)发往哈尔滨。

附件一，林彪信的中文原文；①

附件二，林彪信的俄文译文。②

部长高级助理

波采罗布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8, л. 1

№1640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毛泽东访苏的时间

(1948年10月17日)

致捷利宾：

请转交给毛泽东下列内容：

您1948年9月28日的来信收悉。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了这封信件，这里的领导同志

① 档案收集者在档案馆没有找到林彪的中文信件。——编注

② 参见以上№08998文件。——编注

们会很高兴于11月底在莫斯科与您相见,这是事先已经讲好了的。那时,可以对所有的问题交换意见。

斯大林

1948年10月17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43

№16408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访苏要求

(1948年10月17日)

库兹涅佐夫同志:

看完师哲的译文,毛泽东马上问我:"是否可以认为,将会派飞机来?"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这件事,电报里没有提及这件事。以后,毛泽东说,如果不派飞机来,那他不可能按时到达。接着,他说,在7月份,他写过,有三条路,现在两条路——走陆路和水路已不可能了,只剩下一条路线——航空。他请求我问您,是否会派飞机来。

对我试图回避以我的名义来询问这个问题,他不满意。他这样说:"那就请您写上:毛泽东请求通知他,是否将派飞机来。"接着,他详细地说明了为什么那两条路已不能走的理由。

然后,他逐字逐句地口授,并由师哲译出下列内容:"请写下,在会谈时,毛泽东请求我(捷列宾),以我(捷列宾)的名义把与毛泽东关于赴莫斯科访问的会谈转达给您:

1. 陆路仍旧很艰难,这条路被敌人截断了,并且路途很长。水路,由于国民党的舰队加强监视和侦察,同样是不安全的。因此,决定请求派飞机来。

2. 在胶东铁路附近危险少一些,特别是,那里有一个很好的机场(毛泽东指的是潍县机场),时间在11月中旬是最适合。

当飞机已准备就绪时,请通知我们,那时,我们从石家庄附近的地区出发到机场去。这可以完全不用在哈尔滨停留,而直接飞到莫斯科去。"

在谈话中毛泽东说,在平绥路地区有战事,路途很长,又不方便,天气也对出行不利。他强调说,在哈尔滨他不仅无事可做,还不好露面。言下之意,指的是在那里有许多非党民主活动家。

他再三指出,启程的日子根据飞机的准备程度,由你们来定。他会在指定的日子到达

机场的。

他估算，一共应去18人，如果只来一架飞机，那将只能少带一些人去，这不太方便，但总归可以成行。

他建议把人和行李的数量与任弼时确定一下，人和行李的数量还和7月时确定的一样。如果有什么变化的话，但未必会有变化，他会马上报告的。决定不带陈伯达去，而叶剑英可能去。

总而言之，在最近的半个月里，每逢相遇，在方便的场合，毛泽东就再三强调，他必须出发，他已准备好出发，他将准时到达。

任弼时直接问，我是怎样看的，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他说，毛泽东写信说，飞机会在指定的日子抵达，他们知道，没有飞机，他们不可能在这个日期到达，等等。

10月17日发来的电报更进一步坚定他们的信心，他们把"事先已经讲好了的"这句话看成是会来飞机。他们的问题以及建议我自己以我的名义来向您询问，飞机是否会来，什么时候来，令我实在尴尬。

同时，他们准备在这里过冬，毛泽东和任弼时都已准备了取暖设备。对此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没有飞机，他们是不会走陆路去的。

我再次请求您，如果有可能的话，请就这个问题给我指明行动方针。

捷列宾

1948年10月17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44 - 45

№16411

库兹涅佐夫致捷列宾电：关于派飞机接毛泽东事

(1948年10月21日)

致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您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并要求转告他，11月中旬将派来两架客机，他和他的随从人员将被送往莫斯科。飞机飞来的日期和航线适当的时候会明确告知。

库兹涅佐夫

1948年10月21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46

№16412

苏联部长会议决议：关于向中国民主机构拨款

（1948 年 10 月 25 日）

机　密

1. 批准苏联财政部划拨给北满中国民主机构 100 万卢布，用于在苏联的中国儿童学习费用和给经过苏联中转的中国民主机构代表的开支。

这笔款项的 50％用东北元来销账，另 50％用粮食商品来抵偿。

苏联货币按外贸部的申请单，将 1948 年度收支平衡表上未动用的预支拨款来拨给。

2. 批准国家银行为在哈尔滨的苏联机构接受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交纳的东北元，按国家银行确定的汇率结算出 50 万卢布相抵的数额，与之结清。

3. 责成外贸部与北满的中国民主机构谈妥关于他们要以供应粮食商品来抵消剩下的 50 万卢布的账目。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И. 斯大林

АПРФ，ф. 3，оп. 65，д. 363，л. 1

№16413

佐林致柯西金函：向东北解放区代表团提供资金事

（1948 年 10 月 27 日）

机　密

致苏联财政部部长

А. Н. 柯西金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拨给去布达佩斯参加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中国东北解放区代表团 12 万卢布。

早些时候中国人曾经提出过请求给他们在苏联国家银行开一个100万卢布活期账户的问题。这个问题苏联部长会议正在解决中。

苏联外交部请求给苏联国家银行指示，给上述的那个代表团拨12万卢布的同时，让他们在解决给东北民主政权提供100万卢布问题之后，把这笔款项清偿。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佐林(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手写批注：

急件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8，д.55，л.15

№16415

赫鲁廖夫致莫洛托夫报告：处理辽东半岛日产情况

(1948年10月30日)

机　密

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B. M. 莫洛托夫同志：

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期间，日本人投资建造了各种企业、住房和办公楼。

日本人撤退之后，遗留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不动产至今未完全清理好。同时，这些资产中的一部分，已被当地的权力机构或一些个人占有了，或者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

除此之外，日本人在他们侵占关东地区期间抢占了相当数量的属于常住在这一地区的苏联公民的企业、楼房和建筑物。这样就使他们蒙受了相当的损失，而这些损失至今尚未清算。

由于必须准备好在对日和谈会议上讨论战时赔款问题所需要的资料，我们认为恰当的做法是：

1. 着手清点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所有日本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和办公楼及其他建筑物),不管是谁占有了这些资产。

2. 查明并着手登记居住在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的苏联公民因其资产被日本人侵占而遭受的损失,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

3. 查明在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协议区(关东地区)期间被日本人掠夺而至今尚未归还的苏联公民的不动产(企业、住房及其他建筑物),采取适当的措施将这些资产归还其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考虑到上述种种情况,委托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民政局,会同外交部在当地的领事机构采取以下措施:

(1) 把在辽东半岛协议区的所有日本不动产编写成册,吸引当地的苏联公民参加这项工作,在名册中应对不动产、财产有详细说明,表明其状况和价值,说明以前它们是属于谁的资产,而在登记时又为谁占有。编制该名册时不要中国人参加。

(2) 查明苏联公民被日本人掠夺去的资产,并把他们的损失、亏损及索赔款项一一登记入册。

(3) 查明所有未归还的资产(企业、楼房及其他建筑物),并采取措施把它们归还给法定的资产所有人。

在1949年5月1日之前做好上述工作。

恳请您能同意。

大将 A. 赫鲁廖夫①

手写批注:

交佐林同志审核。

莫洛托夫

11月8日

已发送佐林同志。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94, д. 99, л. 1-2

① 赫鲁廖夫,时任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编注

№16416

佐林致诺维科夫和赫鲁廖夫函：帮助东北民主政权转运货物事

（1948 年 10 月 30 日）

机　密

致苏联海运部部长

H. B. 诺维科夫同志

副本送苏联武装力量后勤部部长

A. B. 赫鲁廖夫同志：

根据滨海军区司令员比留佐夫同志的通知，关东地区管理局奉东北民主政权的命令，给旅顺港的苏军指挥部区去信，恳求：

1. 利用苏联远东航运局的运输工具帮助转运中国货物。在 1948 年第四季度要把 5 万吨货物从拉辛港运到大连港，并把 4 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2. 促成与苏联航运局签订一份合同，在 1949 年度把 37 万吨中国货物从拉辛港转运到大连港，再把 29 万吨货物从大连港运往拉辛港。

3. 组建大连苏中轮船公司，沿着大连到拉辛的航线转运货物，为此目的中方可以交出 2 艘排水量为 2 000 吨和 6 000 吨的轮船和货运量为 2 000 吨的几条小船(共计 1 万吨货运量)，同时希望苏方也能拨出总排水量不少于 1 万吨的船只。

4. 卖给民主政权 10 艘快艇(航速每小时不少于 20 海里)。每条船的货运量从 100 到 200 吨。

考虑到辽东半岛、北满和北朝鲜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多，同时大连和北朝鲜之间的货运量也在扩大。比留佐夫同志建议：

1. 按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规定，把 1 艘货运量为 6 000 吨的转交给专营在北朝鲜港与大连港之间转运朝鲜与中国货物业务的苏朝“海运”股份公司，因为“海运”公司现在所掌控的载重量(吨位)已不能保证完成在 1949 年的转运业务。

2. 建议远东航运局协助关东地区管理局完成把货物往返于拉辛港和大连港之间的转运业务。要注意的是，在第四季度北方地区航运期会缩短。

3. 为避免与中国国民党政府可能产生的纠葛，我们反对把快艇卖给民主政权，也不组建远东苏中轮船公司。

请对东北民主政权和比留佐夫的请求提出您的建议。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B. 佐林(签名)

文件共3份,送:第1、2份给收件人,第3份给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7, д. 48, л. 12 - 12об

№16417

马利克维奇致佐林函:向中长铁路派遣员工

(1948年11月6日)

机 密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B. A. 佐林同志:

为了给中国的长春铁路组织营运工作提供切实的援助,科瓦廖夫同志向联共(布)中央和交通部请求派遣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长春铁路来出差一年,由局长茹拉夫廖夫来调遣使用。

交通部请您对这个问题做出最后决定。

交通部副部长

Л. 马利克维奇

手写批注:

给通金,请回复,送给葛罗米柯同志。

B. A. 佐林

11月9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9, д. 67, л. 5

№16419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斯大林函：奖励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

(1948年11月17日)

致И.В.斯大林同志：

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在组建铁道部队，组织恢复东北的道路交通和运送军队(这促进了国民党在东北军队的覆灭)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林彪同志赠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位同志每人一辆缴获的汽车。

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您同意我们对上述两位同志的奖励。

中共中央东北局
1948年11月17日
于哈尔滨市

АПРФ，ф.3，оп.65，д.144，л.18

№16622

波格丹诺夫致外交部报告：解放军进入长春的情况

(1948年11月18日)

绝　密

送上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长春后的情况报告。

附件，共9页。

苏联驻长春总领馆副总领事
波格丹诺夫(签名)

兹报告：

1948年10月22日，苏联驻长春总领馆波格丹诺夫同志、总领馆秘书罗满宁同志、总领

馆司机乌格留莫夫(当地的苏联公民)来到长春市。与总领馆的工作人员一起来的还有苏联驻哈尔滨总领馆的译员萨茨同志、秋林公司分管干部的副董事长克赖涅夫同志(苏联外贸机构资产调查委员会负责人)。

这个委员会由 14 位当地苏联公民组成,分别代表以下机构:商务代表处、全苏粮食出口联合公司、苏联影片出口公司、远东银行、国际旅行社和远东对外运输公司。

根据中共当局的说法,1948 年 10 月中,在沈阳的蒋介石下达了给守卫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和第七军的命令,要他们放弃城市,突围并与主力会合。这个命令是从飞机上掷下的。接到这个命令后,第七军司令官(他也是郑洞国第一集团军的司令)召开了军事首长会议,研究执行命令的措施。

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没有出席会议,他派了自己的参谋长去参加。他同时派出两位军官去人民解放军政治部,提出如能得到投降的优惠条件,第六十军可以起义。人民解放军总部接受了曾泽生条件。

17 日晨,第六十军举行了起义,让出了自己的防地,即把半个城市让给了人民解放军。在这之前,第六十军司令部也把这事告知了第七军,请他们一同起义,但郑洞国拒绝了。见到大势已去,第七军的大部分军队也在 10 月 18 日至 19 日暗地里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让出了自己的阵地。郑洞国和 300—400 名军官和军士在自己的司令部——原中央银行大楼内负隅顽抗。第七军的其余部队于 10 月 19 日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就在同一天,郑洞国电告蒋介石说已陷入绝境。最初该军进行了抵抗,后来,到了 20 日晚间,他们提出将朝天开枪,让解放军将他们俘虏。但最主要的是不要把他们投降一事登报,因为他们在表面上还要装作忠于蒋介石的样子。

10 月 20 日清晨 6 时,郑洞国一部死伤 30—50 人后投降了。这样,即 20 日,整个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完全占领。在整个这场战役中,据不完全统计,国民党军队的第六十军被俘 3 万人,第七军被俘 2.45 万人。人民解放军几乎没有什么损失。第七军原有 2.75 万人,近 3 000 名士兵和军官在城里逃散了。第六十军连同全体军官一起编入人民解放军。应该说,这是临时性措施,考虑到沈阳也有相似情况,这一措施具有宣传性质。以后,预计会对军官进行清洗。部分国民党的部队直到现在还在不断投降。据人民解放军司令部的公告,有近万人(主要是宪兵、警察、秘密特务等)逃散了,看来还留在城市里。10 月 21、22、23 日,人民解放军部队在继续捉拿国民党的军官和其他骨干分子,其中包括长春市市长等人均已被捕获。某些机构和人员企图对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首长进行恐怖袭击。例如,市警察局局长的别墅受到扫射,有 1 名警卫受伤。警察局长的 1 名司机被打死,汽车被偷走。

这些以及其他情况的发生是由于解放军在夺取城市的时候组织不力,也就是对一些房屋和其他设施进行的检查和搜寻工作不够,因此一些重要的国民党军官和其他人经常继续在这些房子内居住。对可疑人物和证件疏于检查。所幸各区域已严格戒严,这在以前几乎没有做过。现在情况已有根本改变,市内已相对平静,尽管禁止晚上 5 点以后在市内走动。

起初,由于受国民党的宣传影响,整个城市几乎空无一人,留下来的居民不敢进城。

市中心未受重大破坏。郊区某些地方有些损失。宽城子要塞和铁路沿线居住点几乎全被毁坏。全市的照明、水和供暖都停止了，因为这些设施都被国民党破坏了。很多建筑被完全毁坏。部分机关、住房也遭破坏，长春铁路枢纽也受到相当严重的破坏。

自11月1日铁路各站间的交通恢复之后，长春—吉林的旅客列车已正常行驶。预计，在11月24—25日将恢复长春至哈尔滨的直通列车。

市领导机构受第一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管辖。邹大鹏(Чжоу Липэн)被任命为市长。10月22日同我们一起到达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全权代表程子华、长春市市委书记朱光等人。稍后还将有其他干部到达。

1948年11月1日前，市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领导机构的所有命令和决定均由军事委员会发布。军事委员会发布的第1号命令，通告居民不要破坏建筑、工业企业和装备，它们应被尽快投入使用。

全体工人和职员应往市管理局登记，并尽快上班。城市已转到民主政府手中的消息，已用命令向居民通告。第2号命令是关于国民党飞机袭击城市、组织防空的情况。随后的命令涉及建立城市秩序等其他措施。军事委员会和市政府已掌握了足够的食品(4 800吨)，主要是大米、食盐、玉米粉等。起初，对饥饿居民无偿发放食品。由于当局的有力工作，10月24—27日市区的大部分地区恢复了电力照明，实际上首先是机关的照明。10月底，某些地区已恢复供水，但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碰到很多困难，因为国民党把相当部分的供水系统破坏了。城市的供暖，尤其是机关的供暖，几乎都被破坏，起初是缺煤，后来是因为缺水，供暖系统被损坏，缺乏维修骨干。10月30日，市内8公里长的新的有轨电车线路通车。市内的邮局、电报已启用，国际、国内电话已开通。现在已有足够的粮食储备。

不过，中国当局还向秋林公司的代表提出了运进和供应面粉、食盐、灯泡、服饰用品等日用必需品的请求。近期，秋林公司将在这里开设分部。由于废止国民党的货币和发行人民币的原因，市内的商业几乎完全停顿了。商人和小商贩不了解哈尔滨的价格，不敢贸然抛售商品，以防吃亏。起初，商品和食品的价格都乱开，而且所有价格都比哈尔滨的市价高2倍。特别贵重的商品和黄金没有市价，直到现在还是没有市价。

市场上各种日用必需品几乎都有。旧货市场特别热闹，原国民党的士兵和军官在那里出售服装，主要是美国货(连衫裤、制服上衣、皮鞋、睡袋等)。

当局对私人贸易评价较高，它活跃了市场，补充了粮食供应。随着客运的开通，贸易有望进一步活跃。

现在市内有大量难民，主要是在封锁期间逃往附近农村的长春市居民。当局在埋葬居民和国民党士兵的尸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在封锁和挨饿的日子里，无助和饥饿的居民被国民党军队赶出市内。人民解放军部队为了避免疾病流行和防止特务潜入，也没让这些居民回到住地。这样，在城市附近形成了所谓“死亡地带”。据中方领导人称，在这一地带有近10万具死尸，其中包括病故和被枪杀的。为了防止瘟疫的流传，迄今已掩埋了2万多具尸体。国民党也曾掩埋了近3.5万具尸体。

通过传单和《长春新报》等,市内居民对中共的政策和前方的胜利都颇有了解。11 月 1 日以前,市内的驻军将完全调出。军事委员会也将停止工作,城市的政权都移交给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直接领导的市政府,因为长春市是“特别市”。

在检查总领馆馆址(以前是关东军司令官的别墅)时发现,所有地下室和部分副楼堆满了炮弹和其他弹药。按中方军官所说,要运走这些弹药,需要上百辆汽车。据中方人员称,总领馆大楼显然已经被装置了炸弹。大楼里一片狼藉,所有房间都塞满了杂物、武器、文件、装备、砂土等。不少房间的玻璃都被打碎,门窗受到破坏。有些地方用固定的隔墙或临时的隔板作了改造。修复大楼的具体预算另报。大楼的外表依旧。总领馆的院子很大,堆满了杂物,尽管有些地方遭到破坏,但总体上说依然完整。总领馆内部的建筑(值班亭和两个警卫室)全被破坏,车库已被改建,需要重新修建。总领馆内没有住房,仅有总领事的 1 套住宅。在 1945—1946 年间,在距总领馆主楼 100—200 公尺的地方,为总领馆的其他官员修建了住房。这些住房全部被毁坏,只剩下残壁和管道。仅有 1 幢有两套住房的别墅多少还算完整,但也需彻底检修。

10 月 24 日,在检查了总领馆馆址后,我们会见了市长。经过谈判后,市长给总领馆派来了警卫,还答应近期将运走馆内的所有弹药。同时,我们向市长提出请求,希望给我们提供一个临时场所,我们提出要 1945—1946 年间中长铁路副董事长卡尔金同志曾居住过的那幢别墅。据了解,这幢别墅已拨给中国恢复工作管理局使用,管理局当天就已根据命令进驻。由于市内局势不稳,当局在门口派了武装警卫。

除了总领馆的几幢大楼外,我们还视察了原沙皇时期的领馆大楼和馆址,满洲国总理张景惠的别墅和原关东军总司令部大楼。沙皇时期的原领事馆馆址内共有 13 幢建筑。沙皇时期的原领馆是 1 座两层楼的建筑,在国民党占领时期和现在均为医院。靠近领馆另有 6 幢楼,其中 4 幢大一些的是兵营,2 幢小楼是辅助设施(这里曾进驻军队和作为领馆工作人员的住所)。这些建筑约有 50%被保存了下来。

在这个区域内,日本人建造了 7 幢军营式的平房。这些房子现在只剩下残壁。这个区域坐落在远离城区的中国人居住区内(岗东路和镇虎屯街角),因此,我们和苏联的其他机构对此都不会有兴趣。所以,我们认为,待我们的所有权确定后(这是无疑的和无可争辩的),要使这些建筑免遭破坏,必须把他们租给中国当局。原关东军司令部大楼现为市卫戍司令部占用。原张景惠别墅现为部队占据。建筑物已很破旧,但整修后仍可使用。

尽管中国当局承诺要把总领馆内的弹药加以清理,并检查是否埋有地雷,但至今几乎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我们认为,他们就是怕干这件事,因为他们缺乏富有经验的扫雷人员。

据估计,要恢复领馆所属的大楼的正常工作,需要花费大笔钱——约 50 万外汇卢布。此外,总领馆的地区,虽从位置来看十分方便,但范围太大,需要大量警卫力量,至少要有 3—4 个 24 小时的岗哨。

我们现在占用的中长铁路别墅完整地保留了下来。里面还有些家具,照明和其他设施都正常。在这个建筑内完全可以满足办公和居住的需要。这幢别墅离市中心不远。

苏联在长春的贸易机构现在打算开设1间不大的秋林公司的商店，3家电影院和1所远东银行的分支机构。在长春的中长铁路沿线将设立5个营业区。

长春有个苏联侨民协会，与20位当地的苏联侨民有联系，这些人大都年事已高。我们来后，给他们提供了粮食、燃料等帮助。有劳动能力的人被安排到苏联机构(中长铁路、秋林公司)去工作。

苏联驻长春副总领事

П. В. 波格丹诺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82, д. 109, л. 1 - 8

№08994

佐林呈莫洛托夫请示：为中长铁路提供技术援助

(1948年11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马利克维奇同志报告，东北政权向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提出请求，请求把已经解放的中长铁路南段(石河—辽阳)的机车和车皮送大连机车车辆厂修理，同时再拨20节旅客车厢，拨10套给水机组给民主政权，以便恢复东北南部铁路的给水系统。

苏联交通部认为，为解放区铁路提供技术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无损于中长铁路大连段的工作，而且对于未来共同制订瓦房店和杨台(Яньтай)的煤矿方案也是必要的。关于此事，现在正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7月21日的命令(第9868рс号)同东北民主政权进行谈判。

客运车厢的交接条件、使用费用支付程序以及货运车皮和机车(火车头)的交接条件和修理费支付程序，可通过中长铁路大连段主任和辽阳铁路主任协商确定。

我认为，可以满足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

请您指示。

В. 佐林(签名)

1948年11月8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9, л. 2

№16421

卡尔金致通金函：向中长铁路派遣苏联专家事

（1948 年 11 月 19 日）

通金同志：

来信谈谈中国长春铁路中苏股份公司挑选干部和把干部班子配齐的事。

经过几次胜利的战役之后，中国人民民主联军把国民党的军队从东北赶了出去。中国长春铁路现在已经恢复运营了。不久火车就能通行无阻地从哈尔滨直达大连。在长春铁路沿线，那些以前被国民党盘踞的区域，过去和现在一直都没有中长铁路的苏方代表。在这种情况下，无法做到把长春铁路的全部资产，也就是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监管保护好，也无法确定由于战乱给中长铁路造成的物质损失。

中国的人民民主联军毫无疑问会经营那些已被解放的铁路区段，并使用中长铁路的资产，但所有这一切都应该根据 1945 年签订的中长铁路协定，遵循保障苏联利益的途径来进行。

在中长铁路的主管以及少量的苏联铁路工人在场的情况下，人民民主联军可以按照自己的目的使用中长铁路的北段，他们使用这段铁路两年的经验使得双方应有的相互理解得以确立，并顺利地解决了一些关于民主政权根据自己的目的在实践上使用中长铁路财产的问题。中长铁路的全部资产基本上保住了，已建立起应有的秩序，铁路运营正常。

中长铁路在南部区段的资产比在北部区段的要重要好几倍，因为在这一区域内铁路的交叉点很多，如长春、沈阳、四平街、大石桥、苏家屯等。集中了比较大型和有价值的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管理机构和各区的楼房、医院、大专院校、煤矿井等。

这种情况暂时要求苏方根据中长路北段现行的原则和相互理解的经验，保证对中长铁路南段资产的监管，以防它们被盗窃、破坏或者瓜分。

为了保证这个任务，需要在最短时间内调派不少于 500 个有各种专长的苏联铁路员工来中长铁路主管手下工作，这些人同时还会是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就像在东北北部地区那样。

派遣苏联铁路员工到中长铁路南区段来，将由他们领导的主要企业、工厂、车库、机车车辆修配厂、仓库等组成苏联和中国的共有资产。除了保证保障好这些资产不被损坏、偷盗之外，还保证了苏方的指挥站点，以后中长铁路产业的管理权等问题就容易解决了，并防止苏方的资产份额蒙受巨大亏损。

恳请您将以上提出的问题向外交部的领导报告，以便给交通部和其他相关机构发出必要的指示。

中将卡尔金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9, д. 67, л. 3－4

№16423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推迟访苏的时间

（1948年11月21日）

斯大林同志：

近日我偶染微恙，在苏联大夫的帮助下健康状况已略感好转，但尚需休息几天。此外，徐州城下的战斗正处于最激烈的阶段。同时还须组织唐山—天津—北平一带地区的战役。为此，只能把我前往莫斯科的日期推迟一下。原先确定在11月中旬启程，在11月底能到达莫斯科，而如今预定在12月份动身，即12月中旬或12月底才能到达莫斯科。

是否可行，盼您回复。

毛泽东

1948年11月21日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47

№08995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派遣专家帮助东北铁路恢复运行

（1948年11月23日）

机　密

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向东北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实际帮助组织铁路运营工作。

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支持民主政权的这一请求。苏联交通部同意派上述铁路员工小组，并已把这一问题提交苏联部长会议审批，同时还征询了外交部对于这一问题的意见。

鉴于这种情况，苏联部长会议有关机构起草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向东北派200名苏联

铁路员工的命令草案(附件)。

考虑到已经向东北派出了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工作人员小组帮助民主政权修复桥梁(现在该小组已结束工作),我们认为,同意派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去东北是适宜的(派出期限一年)。

请您指示。

A. 葛罗米柯

1948年11月23日

文件送:波特鲁巴奇、葛罗米柯(附上附件)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给以答复,外交部不反对。

莫洛托夫

11月24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9, д. 67, л. 6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9, л. 3

№14178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同意毛泽东推迟访苏

(1948年11月23日)

绝　密

文本第3号

续第50016号密码电报

情 况 说 明

上述(11月)23日电文的开头有如下内容:

毛泽东同志:

您11月21日来信收悉。

由于前方战事，情况有变，您把到我处访问的日期推迟几天，这个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当形势允许您能实现来莫斯科访问的愿望时，请提前几天把日期和地点通知我们。我们应该把我们的飞机给您派过去。

祝您早日完全康复。

菲利波夫

1948年11月23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48

№16426

葛罗米柯致马利克维奇函：向中长铁路派出苏联员工事

(1948年11月24日)

机　密

苏联交通部副部长

Л. П. 马利克维奇：

回复您今年11月6日发来的第4-2660c号信。

苏联外交部同意满足科瓦廖夫同志的请求，派出200名苏联铁路员工到中国长春铁路局出差一年，他们的工作由铁路局主管茹拉夫廖夫同志安排。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葛罗米柯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2, д. 67, л. 7

№16606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经济发展状况

(1948年11月25日)

绝 密

苏联外交部

莫洛托夫同志：

人民解放军完全解放东北后，南满的主要工业基地全部转入东北政治行政委员会的手中。

现在，东北的民主政府掌握了通化、抚顺、本溪湖和公主岭地区的黑色金属和煤矿的最大型基地。

根据现有的远非完整的资料(日本方面的资料)，通化地区的铁矿石蕴藏量有12亿吨。矿石的含铁量平均达35%—65%。这个铁矿石基地日本人未能全部开采。1944年，通化地区开采了45万吨铁矿石，差不多全部运往离通化350—500公里的鞍山和沈阳的冶炼厂去加工。

如果不算2个10—15吨的高炉和1个电炉(他们是用作生产实验和为了当地矿场的需要而开设的)，通化没有大型的冶炼厂和高炉。

特别要提到的是，离铁矿石产地4—5公里就有巨大的焦煤矿床，据日本人的资料，其蕴藏量达2.3亿吨。这就有可能在通化建设大型高炉的冶金工厂，可就地生产铁和钢。抚顺煤矿拥有5.5亿吨的蕴藏量，还有50亿吨的沥青。1944年，日本人开采了646.2万吨煤，占整个东北煤产量的25%。

日本人在抚顺煤矿附近建立了东北最大的工业联合企业，把沥青加工成各种技术用油和汽油。1944年，联合企业生产了19.1万吨原料油、6万重油、2.3万吨石蜡、1.2万吨硫酸铵和3 800吨汽油。

机械厂为煤矿生产了各种机器、装置、电气机车、客车车厢和运货车厢。

这一年，化工厂生产了2.34亿立方米蒙德煤气、1 975吨杂酚、80吨氧、23吨氢、30吨焦炭和500万立方米的城市用气等。

火药厂生产了1 700吨硝酸火药。

除了上述工厂外，还修建了铝厂、电灯泡厂和生产橡胶制品的工厂。

在本溪湖地区，铁矿石的蕴藏量达3.4亿吨，含铁量平均达32%。那里还蕴藏有1.9亿吨焦煤，铁矿石全部在本溪湖和沈阳的冶炼厂里加工。

公主岭铁矿矿床(在沈阳西北方200公里处)的蕴藏量近10亿吨。

除了上述铁矿和煤炭矿床外，在民主政府影响所及地区内还有鞍山、安东和沈阳等地的大型炼铁、炼钢厂、金属加工厂和机械制造厂。

由于在东北进行了3年的内战，相当数量的炼铁、煤炭和其他工业企业停止了生产，重要的装备和设施被国民党运往华北和华中地区，或者在战争中遭到破坏和毁灭。

通化的铁矿和煤矿矿井大部分被水淹没，或遭到破坏，矿井机械设备几乎全都不能工作。

目前，虽然部分保存下来的矿井每昼夜可以开采300—400吨矿石，但开采铁矿的工作未恢复。现在，通化每昼夜采煤不超过400—500吨。通化地区的资料详见附件。

抚顺煤矿的全部地下矿井都遭水淹。其中30%—40%曾遭地下火灾害。露天矿场也被水淹近半。这里1948年每昼夜的采煤量曾达1 500—2 000吨。矿井里的机械设备都遭水淹，可移动设备(电子机车、翻斗车和小型货车厢)需要修理和恢复。

据所获资料，机械厂、铝厂、煤气厂和车厢厂以及加工机械保养用油的综合厂的设施和装备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国民党由于没有硫酸铵、硫铁矿、铸铁件和矾土等原料和物资，未能使这些工厂投产。

只有车厢制造厂、汽车修理厂为完成军事订货而曾经开工。此外，焦煤厂和炼油厂的几个机组曾定期开工。

国民党人曾使抚顺联合企业的发电站恢复投产，这厂现在仍在发电，完全可以满足生产用电的需求。

抚顺联合企业曾花了2年时间专门在图里窝(Ту-Ри-во)、新台窝(Синтай-во)和罗锅袋(Ро-ко-дай)等地(在沈阳以南)的田地大规模植树造林，但都被国民党以军需为由而砍光。现在，煤矿企业将面临建矿和塔脚手架所用木材严重缺乏的困境。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1948年7月，国民党的工业部曾将抚顺联合企业转给私营的煤炭工业公司生产(这家公司有美国人参与)。该公司便着手从被淹的矿井中抽水，而且已经开始采煤，每昼夜达2 000吨。

1948年8月中旬，为了研究抚顺联合工厂赢利的可能性，派来了一个以名叫罗杰斯的美国人为首的委员会，还有381名曾在这个联合厂工作过的日本人。这个委员会仔细研究了联合厂，似乎表示了这样的意思，想要使联合工厂开足马力，在1948年进行大规模的投资没有意义，因为回收投资需要10—14年才行。

有关公主岭、本溪湖的铁矿和煤矿井，鞍山、沈阳等地的工厂，以及它们遭到破坏程度的详细资料，我们手头暂时还没有。我们将会采取措施，获取这些资料，以后再补充上报。

除了拥有大量的铁矿、煤炭以及其他矿藏外，必须指出，东北，特别是在它的北部，还有丰富的黄金矿藏，估计可达3 780吨。这些资料说明，在东北发展黄金工业的前景十分诱人。北满一带产量较高的地区有：

1. 呼伦贝尔以北，中长铁路和黑龙江之间的地区。

2. 黑龙江省北部,阿里呼里—阿林(Альхури-Алинь)大片地区。

3. 松江省和吉林省东部的穆棱河和松花江上游的绥芬河流域。

恢复东北的庞大工业和铁路需要大量的木材,北满有大量的木材资源,达37.16万立方米,其中针叶林有14.766亿立方米,阔叶林有22.424亿立方米。

虽然东北的木材蕴藏量十分丰富,但木材的采伐工业很薄弱。运往中长铁路各企业的大量建筑木材,目前完全用于修复铁路。1949年铁路对木材的需求量达145万立方米。仅仅中长铁路的木材需求都无法保证,而且还要恢复工业,况且这些木材仅够用6—7年。因此,特别需要同中国人在汉西雄(Ханси-Хсюн)地区和牡丹江的木材企业进行合作。

由于北满的民主政府中没有大型的冶金工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企业,所以南满工业的恢复问题对巩固东北的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方不止一次地说,南满是东北的鲁尔①。不恢复南满的经济,就无法使整个地区的经济向前发展。

中方仅靠自己的力量无法组织大规模的冶金、煤炭和机器工业的恢复工作。因为,第一,他们缺乏上述领域的中高级专业干部;其次,他们需要大量的大型工业装备和机械,这些都必须从外边输入。

众所周知,中共中央已经决定,并加紧准备在近期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进步党派的负责人,其中包括亲美的派别,也将参加政府。这些亲美人士无疑将会利用提供专家、供给机械装备和建立各种股份实业公司等渠道,依照他们"主子"的指示,力图在中国,首先在东北,推行扩大美国影响的路线。

据说,美、英把在沈阳的总领事馆保留下来。对我们来说,也不感到意外。这些领馆无疑将是推行上述工作的基地。

为了防止英、美在东北的扩张,为了巩固我们在这里的经济阵地,我们认为,应及时在这里同中方合作组建平等的股份企业,向他们派遣各类工业专家,提供工业设备。

根据苏联同中国民主政权已经签署的关于合力修复瓦房店和抚顺煤矿并使之投产的协议的例子,我们深信双方都乐意共同建立这类企业。

从我方来说,我们的注意力似应首先集中在诸如通化地区的铁矿、煤矿,抚顺的煤炭联合企业,鞍山的冶金联合企业,以及黄金工业、森林工业等东北的这类关键经济项目上。

如果上述问题能引起重视,我们认为最好能尽快向东北派出我们的高级专家,包括经济、地质、冶金、机械制造、采煤、林业等专家,让他们就地详细了解我们感兴趣的项目的情况,并为我方政府做出相应决定提供必要的资料。

附件,34页。②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签名)

---

① 鲁尔,德国的重要工业区。——编注

② 所收集的档案中没有发现该附件。——编注

文件送：莫洛托夫秘书处、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20卷，第932—935页

№16427

马利宁致莫洛托夫函：呈送高岗请求转交的材料

（1948年11月26日）

绝　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

随函向您呈上高岗转交给我的：

1.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把汽车送给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同志作为礼物的原信（及俄文译文）。

2. 中共中央东北局关于以科瓦廖夫为首的一组专家完成铁路恢复运营及组建了铁道部队事宜做出决议的副本。

3. 中共中央做出的关于采取措施修复东北公路的决议副本。

第三条关于中国共产党人要采取的具体措施的信息，容我随后向您补充报告。

随文附录。①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АВПРФ，ф.3，оп.65，д.606，л.17

---

①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这些附录。——原注

№08996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函：科瓦廖夫请示回莫斯科事

(1948 年 11 月 26 日以后)

莫洛托夫同志：

在 11 月 26 日给您的电报(直接接收)中，科瓦廖夫同志(在此之前同专家小组在东北)请求来莫斯科几天。从电报中看出，科瓦廖夫同志已在赤塔。所以，此问题应当立即解决。

葛罗米柯

АВПРФ，ф.06，оп.10，п.53，д.738，л.1

№16428

古谢夫致库兹涅佐夫函：尽快派遣医生为林彪诊断

(1948 年 11 月 26 日)

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
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您对向哈尔滨派去医生以帮助确诊林彪病情这一问题尽快做出决定。①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古谢夫(签名)

文件共 3 份，送：1 份收件人、2 份档案室

АВПРФ，ф.3，оп.65，д.582，л.145

① 参见以上№20269 文件。——编注

№16430

米高扬致斯大林报告：恢复苏新贸易和经济合作

（1948 年 12 月 7 日）

机　密

斯大林同志：

1946 年 11 月新疆省政府的领导人张治中向我们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转达了中国政府想让苏联和新疆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建议。

在经济合作方面，中方建议在新疆组建一个合资股份公司，在双方权益均等的原则下进行锡、钨及石油的勘探和开采。规定公司的董事长由中方指派，而执行经理由苏方派人担任。外贸部认为此建议可行，可作为谈判的基础。

在贸易方面，中方建议苏方的贸易业务由苏联的商务代办来办理，而中方的业务由政府的商务机构和私营公司来操作。这些经营外贸业务的公司须由政府核准。贸易可以用易货的方式，或者用共同协定的货币来进行。所买卖货物的清单双方应该预先商定好。除了要限定与我们进行贸易的公司的范围这一条件外，这一建议我们基本上是可以接受的。

1947 年 4 月对外贸易部对恢复与新疆的经济关系这一问题已经准备好了提案。但是既然外交部认为此时与中方就这一问题进行谈判是不合适的，外贸部就没有把提案呈交给政府。

在 1947—1948 年期间，在新疆的中国高级官员遇见我们的总领事时，不止一次地谈到与我们恢复贸易这个问题。在遇到我们驻新疆的商务代办时，他们也如此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尤其是今年 1 月，在新疆的中国外交部全权代表刘泽荣注意到商务代办的意见，即他认为现在就与新疆政府的商务机构开始做几宗易货贸易是不合适的，因而说出了这样的话："看来苏方对中国政府的建议是不会很快回复的。"

今年 11 月 1 日南疆部队司令部政治参谋蔡汉新（Цай Ханьсин）告诉我们在喀什的总领事说："新疆政府已经同意在这个地区组建 3—5 个与苏联和印度进行贸易往来的商务机构。"

今年 11 月底，很多有名的商人到乌鲁木齐来向我们商务代办处提议要把羊毛、生丝、制革原料、毛皮卖给苏联，以换取苏联的商品。在此情况下他们还引证说，他们一定能拿到新疆省当局签发的可以与我们进行贸易的许可证。

中方对与我们进行贸易如此有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在被他们控制的新疆地区正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所以可以指望他们会向我们做出让步，我们一定可以按我们能

够接受的条件进行与他们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

虽然张治中现在在南京,但是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与新疆进行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谈判可以与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全权外交代表刘泽荣先开始进行。此人在张治中在新疆时已经不止一次地向总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提出,要尽快答复中国政府对这问题提出的建议。

外贸部认为,不应该再推迟解决这个问题的谈判了,因为继续拖延未必对我们有利。

恢复贸易和经济合作会进一步巩固我们在新疆的地位,使我们和新疆居民的边境贸易以及苏联冶金工业部门在新疆阿勒泰和伊犁边境地区进行稀有金属的开采合法化。

除此以外,在商品方面,现在我们在边境地区采购的商品,今后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商品从新疆的中部和南部地区换来 5 000—6 000 吨牛羊肉、约 3 000 吨羊毛、约 60 万张小块皮革、40—50 万根肠衣以及干果和其他一些的商品,同时在这些货物中,部分商品还可以卖给其他国家。

外贸部建议与中国人的谈判依照以下的原则进行:

在经济合作方面,同意中方提议的在平均分配的原则下组建苏中股份公司。但要做到,这个公司不仅在新疆全部地区上有锡、钨及石油的勘测和开采权,还要有勘测和开采稀有金属的权利,讲妥除了要满足新疆内部需要的那部分产品外,我们还有权收购公司生产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产品。

在贸易方面,基本上采纳中方提出的建议,但还有一个条件就是要给商务代表处和苏联外贸机构提供自由选择客户的权力。在预先与中方谈妥与新疆的贸易和经济合作的基本条件后,最近一年期的相关协议和与新疆的贸易额的计划草案会呈报给你们的。

与在新疆的中国政府代表谈判事宜可以委托苏联驻乌鲁木齐的总领事 A. И. 萨维利耶夫和我们在新疆商务代办的 A. H. 伊夫琴科。

附上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草案。[①]

米高扬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达成协议。

B. 莫洛托夫

12 月 15 日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8, д. 58, л. 8 - 11

---

①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16431

罗申与史蒂文森会谈纪要：中国的政治局势

(1948年12月9日)

机 密

12月9日，英国大使史蒂文森休假回来后来拜访我。

史蒂文森告诉我，关于给阿列尼切夫发到香港去的签证的问题，目前伦敦不会给他以签证的。他借口说，一些英国代表因为他们的轮船和货物的缘故在摩尔曼斯克发生了一些急待解决的事，外交部拒绝了给他们发到摩尔曼斯克去的签证。

我问史蒂文森，我们的轮船来香港运货要卸下2辆小汽车，我是否可以期望香港当局会给这些小汽车发许可证，这些小车是要从香港开到广东去的。史蒂文森感兴趣了：为何目的要让小汽车到广东去。我回答说，外交使团的领导通知所有的代表说，中国政府要迁往广东，为保证自己的汽车运输，我要预先把车子送到那儿去。他感到奇怪，提了个问题："大使馆真的要搬到广东去？"这下轮到我问他了："英国大使馆会随政府一起搬过去吗？"对此，他们以坚决的口气申明：他绝不从南京搬迁到任何地方去。如果政府真的迁往广东，那他也只限于把自己的秘书和参赞派到那里去，或者把大使馆的职权委托给英国驻广东的总领馆。回答我的问题——什么理由让他这样做时，史蒂文森解释道：第一，中国政府迁离南京，将来形势境况如何是完全不可知的。第二，什么政府迁往广东？据他所知，各种不同的元(纸币)被运送到这个国家各个不同的城市、各个不同的部门，有搬到重庆去的，到台湾去的，也有到湖南去的。第三，在广东绝对不可能为使馆找到合适的处所，而住在指定的旅馆里他可不愿意——这种旅馆里没有电，没有电梯，总的来说，任何要用电的其他舒适设备都没有。第四，他申明，认为如果南京将被遗弃不顾的话，那么很难相信现任的中国政府还会存在下去。主要原因是，如果在南京将组建新的联合政府，那么还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得到入境许可，而这还与承认问题联系在一起。如果我们留在这里，在当地可以看得清楚一些：如何来处理这个问题。

接着史蒂文森问我，在蒋介石周围的人中，谁能劝他离开中国。我回答说，在他身边的人中未必能找出这样一个人来，敢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问题。这时，史蒂文森这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一大群国民党的活动家聚集在一起讨论这个问题，选出几个人当代表到蒋介石那儿去，并且这个代表团直接向他宣布："英国不再给我们提供援助，我们已经四面楚歌，在这样的状况下，您也很难干下去了。您累了，因此您也该去休息一阵子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代表团应当按照中国的所有仪式行事，吴铁城可以担任这一代表团的领头人。

我回答说,依我之见,不论吴铁城或者是其他什么人,未必能担负起这个使命,而且总的说来,这个代表团未必能获得成功。蒋介石是站在将战争继续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上的,而他周围的CC派集团也站在和他相同的立场上,所以蒋介石是不会接受任何谈话和建议的。这时我问史蒂文森,是否可能,美国会给蒋介石一大笔借款,或用军备来帮助他。他回答说,蒋介石从美国那里再也拿不到什么了。蒋介石夫人这次美国之行是以一无所获告终的。

说完这个,史蒂文森问道,孙科是否能组成新内阁?我回答,已经过了两个星期,目前他还躺在医院里,任何一个部的部长候选人都还未选好。这时我问他,按他的意见,谁可以入选孙科内阁?史蒂文森回答,新的候选人他也不知道,而且孙科没有蒋介石帮助不见得能做出什么事来。

我们的会谈到此结束了。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 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6, д. 19, л. 82 - 84

№09015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东北民主政权所赠物品

(1948年12月10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同志:

我报告: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为感谢在建立铁道兵部队、恢复铁路组织和修复铁路工作中所给予他们的援助,决定授予所有苏联专家每人一枚优秀奖章,此外还决定给我一部战利品汽车和两个花瓶。我对林彪、高岗和其他同志表示了感谢,但谢绝接受优秀奖章、汽车和花瓶。但我离开哈尔滨的这天,组织委员会主席李富春同志把装有花瓶的箱子带到了车厢里。我说不该这么做,他回答说:“我是受中央局的委托把花瓶送给您,如不接受,我们认为是瞧不起我们。”请您指示,我应该把花瓶交给谁。

И. 科瓦廖夫

手写批注：
可以把花瓶留给自己。

莫洛托夫
12月20日

АВПРФ，ф.06，оп.10，п.52，д.734，л.3

№16432

马利宁呈莫洛托夫请示：中共中央请求援助事

(1948年12月13日)

绝 密

莫斯科
致苏联外交部长
莫洛托夫同志：

在此向您呈上中共中央东北局请求派专家，支援设备及为恢复在东北的工业生产所需的物资清单。

清单是中国人编制的，为证实他们以上的需求，通过科瓦廖夫同志向我政府提出请求苏联在这些方面给予援助。

呈上清单(已从中文译出)，请予指示。

附件，5页。[1]

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马利宁

手写批注：
送给葛罗米柯(加上附件)，附件有5页。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7，д.48，л.62

---

① 在俄国公布的档案中，没有该附件。——编注

№08999

贝舍夫和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帮助恢复东北交通

（1948 年 12 月 16 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报告，东北民主政权请求把大连铁路枢纽车站上所停的中长铁路备用车辆（100 台机车、3 000 节货车车厢和 200 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同时把解放区线路上的车辆和其他铁路设备送到大连中长铁路机车修理厂、道岔和信号装置厂修复。

此外，民主政权请求帮助整顿临时恢复的中长铁路南段（奉天—瓦房店）的运行，那里存放着大批被毁的通信器材、信号装置、给水设备和车站设备，为此需把修好的列车、抢修车、中长铁路仓库的物资从大连运来，同时还要派铁路专家来。

茹拉夫廖夫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中国人的上述要求，请求满足这一要求，同时请求再额外给东北派 170 名苏联铁路专家和员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长春—奉天—石河—条约区边界）。

现在大连枢纽有修理好和准备使用的货车车厢 2 540 节、客车车厢 342 节、车头 114 个。它们是 1946 年春天从作战地区疏散到大连的。

如果铁路段恢复，那里还有修复好的火车，配有专家人员的抢修车。大连中长铁路仓库里有恢复通信、供水和其他铁路运营目标所需的材料和设备。

考虑到大连枢纽必须保持备用车辆以保障辽东半岛苏联部队的要求，可以把 50 个车头、1 500 节货车车厢和 130 节客车车厢交给东北铁路北段。

这一措施不能满足对北满铁路车辆的总的需求，因为人民解放军正加紧在东北南北调动，铁路上无车皮可利用。所以，往苏联运送粮食、煤炭、木材和其他货物（为此已占用 956 个车皮），没有充分的车皮保障。

从哈尔滨向大连运送货物，要想恢直通列车，还需增加车辆。

保障东北铁路车辆的补充来源，除从大连中长铁路备用车辆拿出一部分外，还可：

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制造 1 000 节新车皮，办法是利用大连保存的日本人留下的半成品车厢。为此所需木材可由东北北部提供；

把 1946 年从东北疏散到苏联境内的日本车皮运回东北，现在在远东铁路上，没有使用的日本车辆有：机车 66 台，货车车厢 842 节，客车车厢 112 节，此外还有 20 台德国机车。所有这些车辆都需要修理，可在哈尔滨进行，由民主政权出资。

运回这些车辆对远东铁路没有损失，因为把他们改成宽轨要花大笔资金和大批材料。以前改造过的机车仅作为机动机车使用，而车厢——作为地方交通的专用车使用。由于没有备件，修理它们非常困难。

因此，我们认为宜采取以下措施：

一、从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中抽 1 500 节货运车厢、50 台机车、130 节客运车厢给东北民主政权；利用日本留在大连的车辆半成品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为东北铁路建造 1 000 节货运车厢。

此外，从远东铁路战利品中抽 86 台机车和 1 000 节车厢交给东北民主政权。

二、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远东区派出修理系专列到条约区界限以外的中长路段进行修复工作；

（二）在大连中长路工厂为东北铁路修复车辆和生产设备；

（三）在石河站（条约区边界）同东北铁路交换车辆；

（四）给东北再派 170 名铁路员工。

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您批准。

Б. 贝舍夫

А. 葛罗米柯

1948 年 12 月 16 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关于长春铁路事宜的命令（草案）

（1948 年 12 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一、批准中长铁路苏联管理部：

（一）从中长铁路大连段储备中抽 1 500 节货运车厢、130 节客运车厢和 50 台机车给东北民主政权以组织东北铁路的运营；

（二）在 1949 年 5 月 1 日之前，按照同东北民主政权签订的协议，在大连机车车辆修理厂利用工厂现有的日本半成品和原材料为东北铁路建造 1 000 节货运车厢；

（三）在大连中长铁路工厂按照协议规定为东北铁路的机车和车辆进行大修、中修，生产信号和通信仪器以及道岔设备；

（四）从中长铁路大连使用区派出修复车专家队和必要物资，参加条约区之外的中长铁路段的工作。

二、批准苏联交通部：

(一) 在远东铁路，从战利品和1946年从东北运来的机车和车辆中抽86台机车和1 000节车厢交与东北铁路北段；

(二) 另增派170名具有专业的苏联铁路员工交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指挥，帮助组织中长铁路南段的运营，时间为一年，并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的命令(第5970-pc号)和1948年12月13日命令(第18-593pc号)之规定，给予他们所有权利和优惠。

三、第二(二)项所指人员出差的全部费用(苏联货币)500万卢布，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9月3日的命令(第12717号)之规定，在中长铁路运营收入中报销。

四、责成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保证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所有物资。条约区铁路和其他东北铁路之间车辆交换在石河站进行。

五、允许苏联外贸部、武装力量部和交通部沿东北铁路向大连运送或从大连运出自己的货物。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8, л. 25-30

№09018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铁路专家组在华工作情况

(1948年12月16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同志：

兹报告：遵照您1948年5月17日的指示，派往东北的苏联铁路专家小组组织并亲自领导了最重要的铁路线修复工作，其中包括吉林—长春、哈尔滨—长春、四平街—通辽、义县—锦州、梅河口—奉天—鞍山、锦州—山海关路段。

这一时期，共修复大、中型桥梁62座，其中东北中部的大型桥梁都进行了大修：哈尔滨至长春方向，松花江上桥梁970米，饮马河上桥梁320米，伊通河上桥梁200米；吉林至长春方向，吉林市附近松花江上桥梁420米，饮马河上桥梁190米。

上述铁路线的及时修复保障了人民解放军的迅速调动，首先是长春市重兵集结，然后是义县和锦州城下集结。

这些城市里的被围之敌——国民党军被歼之后，人民解放军部队又沿新恢复的铁路线调至新立屯—奉天和梅河口镇，这有力地促进了全歼东北国民党军。

由于铁路的修复，从今年11月25日起，奥特波尔—绥芬河—旅顺之间有了直达火车。

东北铁路的顺利修复是实施大规模组织措施的结果，这些措施是苏联专家制定并经中共中央东北局批准的。

根据这些决定建立了：

一、交通部恢复工作管理局和管理局修复处。

二、铁道兵兵团，人员3万人，下编4个旅、12个专业营和6个独立连。他们装备有相应的机械设备和工具，这些设备和工具是从东北就地找到的，部分是从苏联运来的。

在工作过程中教会了铁道兵道路修复方法。

三、修复工作供给机关和保障基地(负责枕木、木材、金属结构、道路固定件和小工具的供应)。

四、哈尔滨机车修理厂专门桥梁基地(负责修理和制作金属桥梁构件和专门桥梁设备)。

桥梁基地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按照苏联专家的设计建造了大型的80吨的悬臂吊车。所造吊车保障了许多大型桥梁的迅速恢复。

在哈尔滨修建了专门的军事仓库，为铁道兵修理、制作工具和设备。

除帮助修复铁路外，应毛泽东同志和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请求，我们拟定了交通部、铁路管理局和站段机关的机构和编制，该机构和编制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批准并已实施。

还对东北公路、大路和水陆交通状况进行了调查，并拟定了中共中央东北局修复和整顿这些交通的决定草案。

由于当地居民大批盗窃铁路物资，我们拟定并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和部队指挥部颁发了制止盗窃和回收被盗物资的决定。

根据中央局①的请求，我对以下问题提出了许多咨询意见：工业恢复和利用，制定财政计划，征收流通税，对酒类实行国家专营，国家和合作社之间实行非现金结算，不动产的义务保险等。

但是，由于缺少应有的专家，在制订国民经济计划和财政计划上，我们未能给予全面的帮助。

由于消灭了国民党部队和全部解放了东北，人民民主政府提出了迅速恢复东北工业和交通，把东北变成中国反对国民党的军事经济基地的任务。

因此，毛泽东同志，中共中央东北局林彪、高岗和陈云同志要求向您报告，他们急需以下几方面的援助：

---

① 原文如此，这里应该是指中共中央东北局。——编注

一、派各种工业专家和财政计划专家来。

二、修复东北以外的铁路，首先是山海关—天津、天津—北平、天津—济南、济南—徐州段铁路。恢复东北境内的给水系统、抽水设施和车站。

三、恢复奉天和东北境内其他军工厂并组织生产。

尽快恢复抚顺煤矿、鞍山和本溪钢铁厂的生产，建成小丰满大型水电站并开始供电，奉天、长春和哈尔滨地区的工厂都将用水电站的电。

四、在哈尔滨、长春、奉天和吉林建立学院、中等技术学校和军事学校，培养中国干部。

五、向军队派遣组织和训练的顾问以及部队后勤建设的顾问。

东北局特别要求强调指出，急需派专家来以取代一大批在东北许多极重要企业里工作的反民主和进行间谍工作的日本、英国和其他国家的专家。

按照我们的意见，为保障中国同志提出的要求，至少给中国派500名专家，包括计划人员、工程和工业恢复的人员以及开工组织的人员。

其中，燃料和电能工业40人、冶金和化学工业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林业和造纸20人、建筑材料20人、军事工业35人、轻纺工业20人、食品工业20人、地方工业和手工业8人、农业15人、交通(铁路、水运、航空、通信)116人。

国民教育13人、卫生保健55人、财政20人、贸易20人(内贸和外贸)、预算6人、会计10人。

专业技术学校和学院教师50人。

上述专家将有可能利用当地资料保障一些工厂的运转，待了解了全部情况后，再帮助制订企业全部恢复和生产计划。

如果您决定满足中国同志的要求，我认为必须在苏联部长会议下成立特别小组或委员会。委托该小组：

一、研究与帮助民主中国恢复和发展工业及交通的有关问题，制订统一的苏联有关机关和部门的实际措施计划，为苏联部长会议准备相应的提案。

二、研究经济、原料来源，研究设备、材料和信贷需求。

三、领导苏联专家的工作，帮助组织培训地方干部。

委托该小组研究同保障中苏中长铁路公司活动有关的问题。

И. 科瓦廖夫(签名)

1948年12月16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2, д. 734, л. 84-94

№0900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向中共提供经济援助事

（1948年12月17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一、林彪在今年9月10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请求向东北派100名苏联专家，其中包括国民经济计划专家和其他工业部门专家以及工业学院和军事铁路学校的教授和讲师。

我认为，对于东北民主政权的这一要求应当给予某种程度的满足。但这一申请还不详细，有许多地方还不清楚到底需要哪些专家，我认为必须征求林彪的意见，订正上述申请，然后才好决定，在多大程度上满足中国人的这一请求。

二、根据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和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的报告，东北民主政权在今年11月底，请求使用大连储备的中长铁路的车辆和设备以恢复中长铁路奉天—瓦房店段，使奉天—大连段通火车，同时还要求向大连中长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信号厂和道岔厂订货。茹拉夫廖夫同志和马利宁同志支持上述请求，因此，他们认为应再向东北派去170名苏联铁路专家。关于这个问题，我和贝舍夫同志联名打了报告，并附上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决定草案。

三、高岗在今年10月11日给斯大林同志的信中，要求给东北民主政权额外提供铁路设备和物资。

莫斯科于11月中旬收到这一申请并送交斯大林同志秘书处。

我认为妥善的办法是：外贸部和交通部共同研究这一申请并提出自己的意见。外交部不知道这两个部的意见，很难对这一问题提出什么意见。

四、高岗在今年10月16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要求为东北纺织工业提供2万吨棉花。

根据米高扬同志的指示，这一申请已纳入对东北出口计划，该计划将由对外贸易部提交苏联部长会议批准。

五、高岗于12月9日拜访了当时在奉天的雷斯科夫同志，请求保证鸭绿江上的电站(以前已交给朝鲜人)也为东北所用。我认为，对中国人的这一要求应该给予重视。但是，中国人应该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这方面的建议。什特科夫①同志同意这种意见。

六、除本报告中所列举的中国民主政权的请求，还有通过科瓦廖夫同志转达的其他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在12月16日寄给您的专门报告中陈述了这些要求。

我认为应该委托贝舍夫、科瓦廖夫同志和我把中国人的请求整理成一个文件，拟定中

① 什特科夫，时任苏联驻朝鲜大使。——编注

央对这些请求的决定草案，然后送您审阅。这一工作可在2—3天时间里完成。

可以把本报告中第二条陈述的中国人的请求单列出来，并拿出相应的方案提交批准，无须等其他问题的材料和决定草案拟定出来。

请您指示。

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7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8, л. 12-14

№09003

葛罗米柯致莫洛托夫报告：东北局给苏联专家嘉奖事

(1948年12月1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共中央东北局致信斯大林同志，说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建立铁道兵、修复东北铁路和部队调动工作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送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两同志每人一部战利品汽车。东北局请求斯大林同志同意授予这两位同志汽车。

随信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其中高度评价以科瓦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专家组以及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高岗通知中国人，苏联政府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高度评价苏联专家组在东北所做的工作。

至于打算赠予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汽车，最好是将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那里十分缺乏车辆，并把此事通知高岗。

附给中央信件的草案。①

A. 葛罗米柯(签名)

1948年12月18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0, п. 53, д. 738, л. 16-17

---

① 参见以下№09004文件。——编注

№09016

科瓦廖夫呈莫洛托夫请示：苏联专家在华工作延期事

(1948 年 12 月 20 日)

莫洛托夫同志：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今年 11 月 1 日的决定(第 16107 号)，在东北留下一个苏联专家小组——21 人，其期限到 1949 年 1 月 1 日。

整个专家小组都在集中精力恢复东北至华北前线的路段，撤走专家小组会给恢复工作带来不利影响。

请同意把专家小组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延长到 1949 年 3 月。

И. 科瓦廖夫

1948 年 12 月 20 日

第 308/1-c 号

АВПРФ，ф. 06，оп. 10，п. 52，д. 734，л. 5

№16435

费德林呈葛罗米柯请示：陈云请求派计划专家协助工作

(1948 年 12 月 22 日)

机 密

葛罗米柯同志：

10 月 3 日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第 12078/ш 号电报说，东北经济委员会主席陈云同志请求让 56 名搞计划的苏联专家到东北，以协助他拟订东北的两年经济发展计划。

我认为，现在正在审议林彪请求派搞计划方面的苏联专家的总的申请书(报告已呈交莫洛托夫)，那么，对科瓦廖夫同志发来的那份电报，就不应另外再作任何处

理了。

附上给斯米尔秋科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信函。①

请予指示。

费德林

1948 年 12 月 22 日

АВПРФ，ф. 0100，оп. 41，п. 277，д. 48，л. 67

№0900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中共东北局请求奖励苏联专家事

（1948 年 12 月 25 日）

斯大林同志：

中国共产党中央东北局给您写信告知，由于科瓦廖夫同志和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同志在组建铁道兵部队、恢复东北铁路运营和完成部队调运中所做的大量工作，人民解放军指挥部打算赠予他们二人每人一辆战利品汽车。信中请求您同意赠予科瓦廖夫和茹拉夫廖夫汽车。

随信还附有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议，其中对以科瓦廖夫为首的苏联专家组和以中长铁路局长茹拉夫廖夫为首的苏联铁路员工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我认为应委托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马利宁同志通过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高岗告诉中国人以下几点：

一、苏联政府已知悉中共中央东北局对苏联专家组在东北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二、由于民主政权现在交通工具十分缺乏，科瓦廖夫同志和茹拉夫廖夫同志请求把所说汽车留给东北民主政权使用。

В. 莫洛托夫

1948 年 12 月 25 日

АВПРФ，ф. 06，оп. 10，п. 53，д. 738，л. 18

---

① 在档案中没有发现该信函。——原注

№09005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苏联专家组延期在华工作事

(1948年12月25日)

斯大林同志：

按照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pc号)，被派往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中长铁路路段的苏联专家小组一行21人(来自科瓦廖夫同志小组)，将在东北停留到1949年1月1日之前。

由于中长铁路长春—奉天段修复尚未竣工，加之毛泽东同志多次请求科瓦廖夫同志帮助修复华北铁路，我认为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的停留期限必须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随报告附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请审阅。

科瓦廖夫同志支持这一方案。

B. 莫洛托夫

1948年12月25日

附件：

苏联部长会议命令(草案)

1948年12月____日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

兹对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11月1日命令(第16107pc号)做出补充：允许苏联交通部把援助恢复东北铁路运行的苏联专家小组21人在东北时间延长到1949年4月1日。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斯大林

АВПРФ，ф. 06，оп. 10，п. 53，д. 738，л. 19－20

№09049

苏联驻华使馆提交的报告：美国在华政策[①]

(1948 年 12 月 27 日)

在国民党军事失败形势下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

……从杜鲁门总统的整个对华政策看，停止给蒋介石政权提供援助不是意外之事。

……美国人所支持的军阀起的是压力机的作用，迫使共产党人在相互让步的原则下接受和平建议。如果共产党人拒绝接受以李宗仁为首的联合，不加入这一联合，这将帮合法政府和在它周围联合起来的军阀的忙。美国人镇压共产党人的计划就是这样。

……准备共产党人到来，把自己的外交代表和侨民留在解放区，这表明美国人准备在任何条件下，即使在新民主主义的条件下仍继续自己在中国的工作。

现在他们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保持这个国家互相残杀的形势，让反革命分子同民主派进行激烈的斗争，这些反革命分子在共产党胜利后将留在民主派里，他们的代表将力图钻进联合政府及其机关。美国资产阶级的中国学专家还断言，共产党的胜利不能很快使中国统一，在中国，地方军阀和阴谋家将和地方反革命匪徒一起长期活动。他们还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分化瓦解，认为中共具有土改党的特殊性质。民族主义和反动的经济政策是这种分化的思想毒剂。

美国人决心直接同共产党接触还表现在把其 255 名侨民留在被包围的北平这一事实上，其中 87 人是领事馆和经济合作管理处的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那里还留下了陆军武官、海军武官和汉语学校。燕京和清华大学的 13 名美国人留在了被包围城市的共产党所占领的地区。

鉴于共产党关闭了美国人在奉天的无线电台，一名副官毫不掩饰地指出，留下这个电台不是为了进行侦察活动，而是企图同中共取得联系。很明显，这种直接接触对美国人很重要，因为他们想促成和平谈判。对此，傅作义在北平附近和塘沽努力避免交战，还有其他一些征兆，已经表明了意图。

美国人加紧收集有关解放区形势的情报，对中共的经济政策，尤其是对外国资本的政策很感兴趣。12 月初，从开封来的传教士通报了情况；美国领事馆全体人员、军事顾问组、海军武官都听了通报。传教士对共产党的行动给予了肯定。

早就同中国有联系和密切关注这个国家的许多美国活动家现在积极地说服政府改变

---

① 该文件系摘录自档案馆的手抄件，文中省略号表示未抄录的内容。——编注

观点，重新看待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民族振兴和经济腾飞中的作用。欧文·拉铁摩尔就是其中之一，12月18日他在《中国评论周刊》杂志上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兴趣。著名女作家比尔·巴克主张援助整个中国，反对支持反人民分子。由于英国资本家在同中国新民主主义制度经济联系上的明确立场，美国实业界表现出明显的不安。美联社12月15日在(在华盛顿)报道中指出，尽管国务院对商界的要求继续保持沉默，但消息灵通人士透露，问题正在认真讨论中，"国务院官员表明了一种观点，即为了美国的利益，所有同全中国可能的新主人的政治和经济联系终究将得到支持"。

积极主张发展美中贸易联系的人在新的条件下持有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将是美国工业的市场，西方文化的目标，中国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将处于这种关系中，并且不会改变。

另一方面，研究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经济战方法的学者们近来也在美国报刊上发表言论。他们同时还指出，中国以前严重依赖外国贸易，现在中国特别依赖美向中国出口。按照这些人的意见，美国可在中国市场上控制一定的局面，诱发商品短缺或经济危机。那时共产党在经济上在很大程度上将依赖资产阶级，而反动派的政治阵地就会加强。除此之外，共产党也不能进行工业和交通建设，没有这些也就不会有国家经济的强劲发展和土地改革后产量的增长。此外，还提出了一种观点，即在共产党上台后，美国停止援助，国家商业中心将出现严峻的形势。美国人在经济封锁中国的计划中，完全没考虑这种现实的可能性——苏联的进口可取替资本主义的进口。

这里，美国的中国学专家认为，尽管共产党胜利了，但中国还将在经济上依附于美国，它的贸易政策将是国家生活和国家恢复的重要因素。这一政策是作为影响中国政治界的一种手段而谋划出来的，这一阶层中有直接接受美帝国主义文化的人，也有暗地追随这种文化的人。美国间谍机关急忙发展间谍网，到处准备渠道，与民主制度的敌人取得联系和提供帮助。

所有这些预测都有一个问题，即他们轻视了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民主革命的内部力量和能力。在经济前景上，这里有一个失误，它同美国人在预测中共与国民党的政治和军事斗争中所犯的失误类似，即他们轻视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巨大经验和东北经济改造、经济恢复的实践经验。

其他较为客观的观点是，由于自己的资本主义性质，美国不能充分有效地实施自己经济封锁中国的政策，这是因为：第一，有苏联同中国的经济合作；第二，有英国向这一市场的进攻；第三，复苏的日本工业产品将进入中国市场；最后，美国垄断集团自身方面的原因：由于世界生产的发展，世界市场变得狭小，在这种情况下，垄断集团面临危机形势的压力，政府出口调节的压力也会逐步增大。

苏联驻中国(南京)大使馆三等秘书

A. 马卢欣

1948年12月27日

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96，д. 117，л. 7－23

№23387

东北粮食总局致马利宁函：关于减免苏侨公粮的问题[①]

(1948年12月27日)

马利宁同志：

12月6日函敬悉。关于松江省尚志县石头河子苏侨公粮减免问题，经本局派员与松江省府、尚志县府联合调查，业已圆满解决。该地苏侨甚为满意。除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请参考外，相继函达，即祈查照为荷。

此致

敬礼

附抄尚志县粮食科报告1件。

东北粮食总局(印章)

12月27日

石头河区苏侨调查报告

该侨民住所为宝山村二十三里屯，距石头河区45里，共41户。人口：男41口，女26口，小孩19口，计86口。乳牛33头，马19匹，车19辆，蜂子65箱。耕地面积33垧[②]，内有菜地2垧，麦地2垧半，大麦1垧……[③]8垧，其余是苞米、黄豆。

该屯在1945年〔被〕日寇焚毁，住户(中苏)搬出该屯，1946年、1947年开始搬回原处耕种土地。但苏侨搬回该屯后，大部平地及熟地老早已被耕种，今年我县市民到该屯时，熟地仅有9垧。今年土评工作，因中苏言语不通，仅将苏侨土地丈量，并未评论等级。

此次出纳粮时，由侨民会代表保保夫已实际报到区公所，按每户耕作面积计34垧。因为此次地并未评等级，按苏侨代表保保夫报来共计产量1 369布袋(每布袋30斤)，平均每垧打40布袋，合41 070斤。按此产量合成税分20.54分，因中国人的每税分650斤，因此也按每税分来分配公粮，计13 351斤，并未实际调查灾荒减免。此次粮总来人，与本县派人前往调查，协同侨民代表保保夫到二十三里屯，实际了解并处理办如下：

实际耕地面积33垧，减去今年开荒8垧，大麦1垧，菜地2垧，自吃用麦地3.5垧，并未

---

① 该档案系俄国档案馆保存的中文本。——编注

② 垧，中国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各地不同，东北地区1垧一般合1公顷(15市亩)。——编注

③ 原件此处一词字迹潦草，难以辨认。——编注

收成，全部免征。下余19.5垧，内有别哥宝夫等3人独身，老年人2.05垧，全部免征；口路不洛夫3名因年老地被灾，免征1垧6.5亩；阿哈马拉也夫3亩，因残废免征，共计4垧。另有别里米诺夫6名，因年老无劳动力，地也弄不好，请求免征一半，计5.3垧减半(2垧6.5亩)。净余征粮12垧9亩。因苏侨都是好地，按该地区之中等级(该地土七级至十级)，八级算9厘5分，每垧应拿618斤，20.6布袋，折交苞米803斤。因为苏联种地不得法，不如我们种得好，因此，全都要求少交点。结果，每垧地只交750斤苞米。因他们都种的苞米，共计12垧9亩，共征9 675斤。

苏联人民没袋子，由仓库供100条袋子，5日内交齐。以上完全取得苏侨同意。

尚志县政府粮食科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19卷，第344—347页

№09019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同中共政权建立电报通讯

(1948年12月28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东北中国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提出建议，建议苏联和东北签订有关建立电报通讯的临时协定，而且已提出这一协定的草案。

苏联邮电部认为，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是盼望之中的事。邮电部看了中国人提出的协定草案后，没提出任何实质性的修改。

应该指出，从苏联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和民主政权代表关于这一问题的会谈中可以看出，中国人不仅对同苏联建立电报通讯感兴趣，而且对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如法国、英国和美国等国建立电报联系感兴趣，那里有各种中国民主组织。但在中国人提交的协定草案中，没有提出经过苏联建立过境通信的问题。

考虑到我们同东北建立电报通讯的兴趣，我认为可以同意中国人建立苏联与东北之间电报通讯的建议。苏联与东北之间的邮政联系已于1947年12月建立。东北经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联系的时机，我认为还不成熟。

但是，同东北签订关于建立电报联系的书面协定，可能被用来反对苏联，所以我认为宜委托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同东北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先达成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

的口头协定。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通过苏联同第三国建立电报通讯的问题,应对他们声明,这个问题特殊,可将来再讨论。

同苏联邮电部商量过的苏联与东北建立通信的条件草案附后。

如您同意,外交部可将此事通知邮电部,指出,它应给苏联部长会议提出相应提案。

请您指示。

A. 葛罗米柯

1948年12月28日

附件:

苏联与东北之间建立电报通讯的条件(草案)

一、通过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尔滨(经过绥芬河站)和赤塔—满洲里站建立电报通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根据双方协商建立其他电报交换站。

二、双方各自领土上的设备、线路和电报机修理费用由各自负担。

三、电报通讯24小时(昼夜)营业。

四、国际电信条约决定及其电报操作规程也适用于苏联与东北之间的电报交换,如果两者与本协定条件不矛盾。

五、在电报交换中,允许使用俄语、汉语、法语和英语。

明码电报应以拉丁字母拼写。密码电报只许政府间使用。

六、电报费用按字计算。由苏联发往东北和由东北发往苏联的电报按以下定价收费:每个字65金生丁,其中40金生丁归苏联所有,25金生丁归东北所有。

所指法郎为金法郎(1法郎等于100生丁),重10/31克,纯度0.900。

临时以当地货币收取的发报费全部保留在递交地电报机关,条约双方之间不进行结算。

政府间电报按普通电话定价低50%收费,而报刊社的电话、电报则低75%。

缔约双方之间交流的政府电报应在备注栏内有如下标志:

USSR,表示苏联

CHG,表示中国东北

七、条约双方邮局和电报局间的公务电报以及气象电报免费。

八、条约双方及其电报机关之间的文件、相互来信用俄文书就。

九、条约双方根据以后电报通讯的发展,有权通过相互协商修改和补充这一电报交换规定。

十、本临时协定一经条约双方达成协议立即生效,一直到被另外的协定取代为止。条约双方中的一方,可宣布本协定作废,但需提前两个月通知对方。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必须协商解决。

B. 莫洛托夫
1949年1月1日

АВПРФ，ф. 06，оп. 10，п. 52，д. 734，л. 14-16

№16437

罗申与托卡尔会谈纪要：中国形势及美国对华政策

（1948年12月29日）

机　密

11月29日，托卡尔准将[①]偕夫人来访问我。在谈话中他告诉我，目前在徐州地区形成了对国军非常严峻的局势。最新的报道说，似乎国民党的军队被装在两只口袋里：第一只口袋是徐州地区，那里共产党人包围了4个兵团；第二只口袋在宿县—蚌埠，在那里2个兵团被包围了。由此可以看到，蒋介石的主力部队都被包围了。接着他问我，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回答说，除了报纸上的消息，我什么也不知道。现在凭借报纸来判断战役的进展太困难了。我马上又问他，他对孙科被委任行政院长有何评价。托卡尔回答说，这样做绝对不会带来什么新气象，还是那么些人，那些体制。同时他补充说，他听说，好像美国人也有要组建联合内阁的意图，而且，似乎这个联合政府要比至今为止所有的政府都要强得多。

我问，新的联合政体又将追逐什么目标，致力于什么使命？而蒋介石会不会是新联合政体中的一员呢？

将军说，当然，那里没有蒋介石的位子。至于说新的联合政府的目标和使命，将是为停止战争、争取和平而努力的。

我问，那么是些什么人物进入这个新的联合政体呢？将军回答说，一些广西人是主要

① 托卡尔，时任印度驻华大使馆武官。——编注

人物，其成员有教授、自由主义分子、民主人士及许多其他人。

接着托尔卡说，他刚从上海回来，在上海，现在大家议论的都是关于孙科内阁的事，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候选人。有人指出：陈立夫、张群、上海市长吴国桢，还有一系列的党的工作人员要参加到新内阁里来。

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这时赴美是什么目的，托卡尔说，目的只有一个——要钱，要装备。对我的问题，蒋介石夫人是否能期望得到美国的援助，她的使命是否能顺利完成，将军回答说：现在美国人感兴趣的不是这个问题了，他们感兴趣的是蒋介石还剩下几个师。美国人测算下来看到，这些师已所剩不多了。这才是决定是否提供金钱和装备的主要的和关键的问题。如果蒋介石现在还拥有在实力和士气上与共产党数量相当的军队，那么援助是不会停止的。很简单，美国人是会拨款、送装备过去的。而如今问题是，后备队没有了，那么武器又该给谁呢？

双方感谢这次会谈，谈话至此结束。

H.罗申(签名)

文件送：莫洛托夫、马立克、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1，п.276，д.19，л.80－81

№164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1948年12月30日)

斯大林同志：

1. 您11月28日的电报我早已收到。①我将按照这个电报行事。到那时，等两个大战役阶段结束之后，我就到莫斯科去。

2. 徐州战役成功的战绩比我们原先期望的大很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击溃了国民党军队的35个整编师，其中包括4个起义并转到我们这边来的师，剩下在杜聿明指挥下的国民党19个师，已被我军团团围困在徐州的西南地区。他们没有可能逃脱，还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就可把他们彻底消灭。

从蚌埠沿北方向赶来支援的国民党部队整个兵团已被我军击退，并已退到长江以南地

① 参见以上№16424文件。——编注

区。蚌埠地区的残敌正在准备逃窜。

徐州、淮阴以及黄河以北的所有城市和乡村都完全处在我军的掌控之中。

杜聿明的部队有10多万人，盘踞在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他们已被我军从四面八方包围住。

在这次战役中，我们集中了陈毅、刘伯承率领的野战军的2个兵团，计60万人，以及来支援前方的民兵60万人，总共120万人左右。这次战役是以前在南方战线上进行过的战役中最大的一次战役。

部分敌人已被我们击溃了，正处于被我们歼灭状态下的是国民党精锐部队，在这次战役胜利之后，蒋介石已不再有一流的部队了。

3. 为了不让傅作义的48个师从平绥路战线逃跑，我们不等东北的部队休整好，就命令他们提前进军南方，协助我们华北的部队包围傅作义的军队，并把他们消灭掉。

到目前为止，傅作义军队中15个师已被我们消灭掉。已收复了山海关、唐山、张家口和其他广阔的地区，在北平、天津和塘沽(海港)，傅作义的主力(33个师)，还需要一个月，就可以消灭。

在这个战役中，我们使用了军队约90万人，为前线服务的民兵约40万人。这次战役是在北方战线所进行的大规模战役中最大的一场战役。

在9—10月在东北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中，我们使用了支前民兵共90万人之多。

4. 目前形势的发展已经比9月初我们在中央会议上预计的要快得多，已经不是先前预计的(从1946年算起)在5年内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现在可以在3年半的时间里基本上推翻国民党政权。但是，我们还是要坚持采取确有把握的行动措施。

在徐州、北平、天津等几个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部队的主力应该休整3个月，并占领孤城太原，然后向长江流域和辽阔的南方地区挺进。

5. 我们已挑选了5 500名干部，目前正在培训他们，以便在那些新开辟的地区进行工作。这项干部培训工作，要有计划地进行下去，我们有信心能把工作做好。

6. 在党员干部中间要进行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和一系列中国革命的具体政治措施的强化教育工作。中国革命发展越快，我们越是感到这项干部教育工作非常重要。

7. 国民党的统治已很难维持了，它的内部处于四分五裂、土崩瓦解的状态，国内广大群众日益倾向我们。自由资产阶级越来越开始动摇，在我们这里为自己找出路，追随国民党的人数日益减少。

8. 在最近几个月内，我们占领一系列大城市，那些大城市里的秩序很好，我们的各项政治措施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在这种情况下，对那些国民党统治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9. 中国民主联军的纪律大大提高了，增长了斗志，指挥员们对夺取国家政权的任务满怀信心。国民党的纪律涣散，国民党军队中叛变者的数量日渐增多。

在徐州、北平两大战役结束之后，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将不复存在，军队的数量将减少到

170个师,其中大多数的师是重新编组的,且战斗力低下。

10. 在政治协商会议和民主联合政府的口号下,各民主党派团体和香港、上海、北平、天津及其他大城市的人民组织的领导和活动分子,纷纷来到或将来到我们的地区。这些人中大多数是我们曾经邀请来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

11. 美国政府毫不掩饰的侵略政策已经失败,现在美国人企图由积极支持国民党转为支持地方上的国民党的军国主义者和南方当地的军阀,以便用他们的力量来抵抗人民解放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组织并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政治协商会议和联合政府,并在那里组建反对派联盟,从内部破坏人民革命阵线,其目的是使革命不能进行到底。

这个新的阴谋已有一系列表现。例如,他们派了一些外交工作人员和新闻记者到中国民主同盟右翼的领导人——罗隆基、张澜、黄炎培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此人正在来解放区的路上)那里去,为的是在他们中间进行挑拨离间和诱骗工作。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无论如何我们要做到不能让美国人的阴谋得逞。

12. 我们已经把一些同志,如高岗(东北局书记)、饶漱石(华东局书记)、薄一波(华北局书记)、刘伯承(华中军区司令员)、陈毅(华东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东北军区政委)、林伯渠(陕甘宁政府主席)等召到中央来开会,讨论1949年所有的策略问题(哪些部门或部队应该负责哪些方面,及其他准备工作),讨论了有关在1949年春准备召开的中共中央二中全会及其他问题。

不久,在会议结束之后,我就能动身到莫斯科来,并与您讨论所有的问题,然后,从莫斯科回来之后,举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会。

大约,明年春天要召开各个民主党派、团体和群众组织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并且将组建民主联合政府。现在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这样的政府,完成这件事的所有条件已经成熟。

恳请您把这份电报向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报告。

毛泽东

1948年12月30日

手写批注:

给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是以化名菲利波夫为收件人的。这样写是为了保密。(档案保管员)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49 - 52

№09021

贝舍夫致贝利亚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贝利亚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 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 贝舍夫

第26658лб号

手写批注：

转交莫洛托夫同志。

贝利亚

1949年1月4日

АВПРФ, ф. 06, оп. 11, п. 15, д. 231, л. 1

№0902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报告：运送东北粮食问题

(1948年12月31日)

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莫洛托夫同志：

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运输东北粮食的电报，我报告：交通部已指示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

加尔斯克及滨海铁路负责人，保障每昼夜换装和发走400节车厢，通过满洲里车站300节车厢。

为了尽快腾出绥芬河和满洲里等待换装的中国载粮车厢，允许使用交通部1 400节备用的空车皮，同时建议加紧组织挑选、准备和修理运粮车厢。

交通部长

Б. 贝舍夫

第M－8579C号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通知瓦休凯维奇同志。

莫洛托夫

1949年1月2日

АВПРФ，ф. 06，оп. 11，п. 15，д. 231，л. 2

1949 年

№16051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与东北恢复电报通讯事

（1949 年 1 月 1 日）

莫洛托夫同志：

中国东北地区民主政权通过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馆建议，签订关于建立苏联与东北地区电报通讯的临时协议，并提出了此项协议的草案。

苏联邮电部认为，恢复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电报通讯是需要的，在审查了中国人提出的协议草案后，邮电部没有提出什么实质性的修改。

应该指出，从总领事舍斯捷里科夫同志与东北民主政权的代表就此问题举行的会谈中看出，中国人关注的不仅是要与苏联恢复电报通讯，而且要与 3 个国家（即法国、英国、美国等）恢复电报通讯，在这 3 个国家中有中国各种民主组织的代表。然而，在中国人提出的协议草案中，没有经由苏联实现过境通信的条款。

考虑到恢复与中国东北地区的电报通讯对我们有利，我以为可以同意中国人关于恢复苏联与东北地区电报通讯的建议。苏联与该地区的邮政通信已于 1947 年 12 月恢复。

我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与某些第三国建立经由苏联的电报通讯不合时宜。

然而，鉴于与中国人缔结建立电报通讯的协议有可能被利用来反对苏联，我认为恰当的做法是：责成我国驻哈尔滨的领事与中国东北地区邮政局进行谈判，暂时以口头形式达成关于建立苏联与中国东北地区之间电报通讯的协议。

如果中国人再次提出有关经由苏联的过境通讯问题，应向他们声明，这是个特殊问题，可以另做研究。

现附上苏联邮电部同意的恢复苏联和中国东北地区通信的条件草案。

如果您同意，外交部可以通知邮电部，因为邮电部向苏联部长会议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请您指示。

A. 葛罗米柯（签名）

1949 年 1 月 1 日

手写批注：

葛罗米柯同志：应该协商。

B.莫洛托夫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第113期(2006年9月)，第237—238页

№09023

科瓦廖夫致斯大林报告：帮助东北恢复经济事宜

（1949年1月5日）

斯大林同志：

东北民主政权请求审阅他们制定的1949年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的计划，并请求帮助完成这一计划，提供专家、设备和物资支持。

根据东北政权计算，为制定彻底恢复和发展东北经济和组织生产的计划，至少需要500名苏联专家，其中：军事工业35人，燃料能源40人，冶金和化学30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35人，铁路和通讯116人，造纸和林业20人，建材业20人，轻纺20人，食品20人，地方手工业6人，农业15人，国民教育(包括教授和学院、学校教师)65人，卫生保健55名医生，财政信贷20人，外贸和国内贸易20人，综合和预算平衡6人，统计和会计10人。

对设备和材料大体需求如下：

军事工业

为完成1949年各种武器装备和弹药的生产计划，必须建立山炮和野炮制造厂并保障其设备，生产能力需达到日产炮10门；必须提供TNT炸药3 000吨，火药200吨，铜3 600吨，特种金属1万吨，自动车床150台，炮身钢管300吨，钨100吨，钼50吨，钡700吨，电线2 500米，电缆线5万米，皮线10万米，超强度线4万米和其他物资。

此外，中国同志要求满足他们1948年1月所提出的军事工业所需各种仪器和材料的要求。

冶金工业

根据东北民主政权提出的计划，1949年要恢复和利用42个矿山冶金企业(其中7个是铜工业企业)。首先恢复鞍山和本溪的冶金企业，到1950年生产能力要达到年产40万吨钢、1.2万吨纯铜。

为了完成这一明显提高的计划，需要大量的设备和材料，其中需把拆除运往苏联的鞍山钢厂的第一、第二车间，大型轧钢车间和小型轧板车间运回来，而且还需运来专门材料：

炸药900吨，铝100吨，工具钢300吨，润滑油500吨，绝缘线2万米，橡胶管2万米，传送带(皮的和帆布的)6万米，滚珠轴承200根，钢锯5 000米，电线6 000米及其他。

煤炭工业

民主政权计划1949年恢复22座矿井，采煤1 000万吨，炼焦10万吨。

为了这一目的需提供某些设备和器材：电力泵60台，涂橡胶皮带46 000米，电力车23台，滚珠轴承60 000个，钻机用的各种型号钢管51 000米，3立方米挖土机等。

交通运输

计划1949年完成主要铁路线的修复工作，其中包括部分中长铁路，长春—四平街—奉天和义县—承德—北平线。此外，按照毛泽东同志的要求，还制订了修复中国内地铁路的计划，其中包括：山海关—北平—天津—济南—徐州，徐州—南京—上海，北平—开封—汉口，北平—张家口—太原—西安。共长90 500公里。完成这一计划需要：

一、另外建立3个铁道兵旅，铁道兵总人数将达到5万人。

我们准备了3万铁道兵部队。人民解放军指挥部又拨给了1万人，用这些人成立了2个铁道兵旅。余下的1万人在1949年1—2月间将派往铁道兵部队。

二、为帮助领导中国东北和内地铁路修复工作和训练新编铁道兵部队，需派100多名铁路修复专家来此。

三、按照中国同志提出的申请提供设备和物资。在摸清内地钢轨情况之前暂不提供钢轨。申请中所列其他物资，必须在1—2季度提供。

电力工业

为满足1949年东北工业需求，需要50万千瓦电力。现在东北电站发电能力近30万千瓦。

民主政权首先要求帮助恢复小丰满水电站。为此需派20名苏联工程师来，把拆下来运往苏联的两个涡轮机组(共发电能力15万千瓦)、发电机、18个不同容量的变压器、导线、灯、蓄电池等运回来。

对林业、造纸、纺织、轻工业、农业来说，也提出了类似的设备和物资申请。

由于计划和申请是中国同志拟订的，没有吸收专家(铁路运输除外)参加，也没对工业的真正情况进行调查，我认为，最好暂时不要讨论他们的计划和申请，先派一个苏联专家组来东北调查军事、冶金、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化工和其他工业部门的情况，责成该小组到东北后用一个月的时间给苏联部长会议拿出方案。

联共(布)中央关于这一问题的决定草案附后。

至于对铁路设备和材料的申请，除钢轨一项需要核实，这一申请是现实的，所以我认为应该给予讨论和满足。

И. 科瓦廖夫

附件一:

联共(布)中央关于援助东北恢复工业的决定

一、任命______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负责援助中国民主政权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并组织工业生产等项有关事宜。

任命以下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冶金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军事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燃料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电力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造纸和森林工业副全权代表;

______为交通副全权代表。

二、责成部长会议全权代表到位后在一个月的时间里对冶金、军事、煤炭、电力、机械制造和化学等工业部门的情况进行调查,为苏联部长会议提出有关恢复和组织生产的紧急措施方案。

三、委托Г.М.马林科夫同志在两周时间里审阅部长会议副全权代表(按第一条任命)科瓦廖夫同志关于100名苏联专家小组(按照所附名单)的提案。该小组将被派往东北,归苏联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执行第二条所列任务。

四、出差人员在华全部时间工资及其家属薪水支付按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命令(第5970pc号)、1948年10月20日命令(第15188pc号)和1948年8月31日命令(第12-138pc号)办理。

五、援助东北恢复工业和铁路运输的措施通过中长铁路管理局实施。

附件二:

派往东北并由部长会议全权代表调遣的苏联专家清单

一、冶金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高炉专家2人、炼焦专家2人、采矿专家2人、轧钢专家2人、铸铁专家1人、鼓风机械师1名(以上凡所指2人处,其中有1名技术专家、1名机械师)。

二、煤炭专家6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露天采矿专家2人、矿井采矿专家2人。

三、电机专家4人、生产计划专家2人、水电站专家2人、火电站专家1人。

四、武器装备和弹药专家12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炮专家2人、炮弹专家1人、引信和雷管专家2人、装备专家1人、火药专家2人、火药纤维素专家1人、炸药专家1人、子弹专家2人。①

五、机械制造专家5人、编制生产计划专家2人、设备专家3人。

采矿和精炼专家3人、耐火材料专家1人、校准专家1人、厂内运输专家2人。

有色冶金共8名专家，其中生产计划专家1人、采矿专家2人、冶铜专家2人、轧材专家1人、铅专家2人。

森林造纸业专家4人，其中生产计划专家2人。

交通运输专家12人(铁路、水路和公路运输)，其中：计划专家6人(铁路运输计划专家4人、水运计划专家1人、公路运输计划专家1人)，水路和公路工程师6人。

轻工业：计划专家2人。食品工业：计划专家1人。

财政：专家2人。

综合和预算平衡：普通专家4人，统计专家6人。

卫生保健医生5人，其中：计划1人、内科1人、外科医生1人、鼠疫学家1人。

翻译——精通中文者10人。

技术机构、全权代表及其副职的工作人员12人，其中：秘书9人、速记—打字员1人、司机2人。

АВПРФ，ф. 06，оп. 11，п. 15，д. 231，л. 3-6、7-8、9-10

№16441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不应拖延建立联合政府

(1949年1月6日)

致捷列宾

复第1号文件

请转达毛泽东：

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感谢您提供的有关中国局势的报告，并祝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取得的成就。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我们同意这一观点。在目前

① 原文如此，人数疑有误。——编注

条件下建立这样的政府会加速国民党政府的崩溃,促使中国民主力量更进一步,有更大的发展。

您在电报中提到民主联合政府成立的日期定于夏季之事,我们有些疑问。是否可能产生这种情况,即国民党在美国人的帮助下,会掌握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动权,在夏季到来之前先建立自己的联合政府,将中国的一些民主政治人士吸引过去,以此影响他们团结在中国北方人民解放力量的周围。国民党可能会走这一步棋,特别是当他们感到企图让自己的爪牙参加民主协商会议以及以后的民主联合政治的阴谋遭到失败的时候。

因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事不宜拖延到夏季,而应该在解放北平之后立即着手进行。这样就会把一直在策划建立联合政府的国民党和美国人的如意算盘彻底打乱。

请电告执行情况。

斯大林

1949 年 1 月 6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53

№16442

葛罗米柯呈莫洛托夫请示:关于召开中苏航空公司会议

(1949 年 1 月 7 日)

机　密

我赞成通金同志的建议。在目前形势下,不宜召开中国在 1948 年 8 月 24 日照会中提出的苏中联合会议。①

请指示。

A. 葛罗米柯(签名)

1949 年 1 月 7 日

① 中方在照会中提出了重建中苏航空公司的问题。——编注

手写批注：

决定：致A.葛罗米柯。莫洛托夫已同意。

波采罗布

1949年1月7日，第9аг号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43，л.10

№09026

奥列霍夫致费德林函：利用苏联电报线路同美领馆联系

(1949年1月8日)

第一远东司司长H.T.费德林同志：

由于美国使馆一再请求——美国代办科列尔在1949年1月4日来信中已陈述过，请求提供奉天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信息和利用我们同奉天的通信渠道，兹请您告诉我们您对美国大使馆这一请求的看法。

外交部美国司司长

Ф.奥列霍夫(签名)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2，д.73，л.1

№16444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长江以北的铁路修复事

(1949年1月8日)

斯大林同志，您好！

十分感谢您派科瓦廖夫同志前来帮助我们恢复铁路和其他经济工作！

在科瓦廖夫同志和其他苏联同志的帮助下,满洲的铁路交通基本恢复。日前科廖瓦夫同志和中国同志制订了整个中国北部铁路,即长江以北3 000多公里的铁路,1949年的修复计划。如果在今年冬季之前这个计划能实现,那么我们将有1.8万公里铁路(包括满洲的铁路)可以运营。为实现这个计划,需要一系列最必要的材料,也需要机车、机器、工具、油和其他修复中国北部铁路的材料。除了我们自己能保证供应的以外,我们迫切需要得到你们的援助,即从你们那里得到大量上述材料,这样,我们才能开始铁路的修复工作。

随附两份订单,我们需要的这些材料上面已经提及。请您审阅这些订单,如能得到您的应允,并指示以贷款方式尽快装车发货,我们将不胜感激。

致以布尔什维克敬礼,敬祝您身体健康!

毛泽东

1949年1月8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7, л. 1

№16445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访苏的具体安排

(1949年1月9日)

斯大林同志!

最近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了。

我准备到您那里去。

为了缩短时间,我希望您派两架飞机到石家庄,最好是四引擎的。

来石家庄的飞机可以在18、19、20日中任何一天到达。

如果您认为技术准备时间不够,可以延后几天。飞机到达的具体日期最后由您决定,然后告诉我。

为了安全起见,飞机到达上述地点的时间最好是清晨。

与我一起访问的有21人。

毛泽东

1949年1月9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6, л. 59

№16446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谈中国局势和中共的对策

（1949 年 1 月 10 日）

致库兹涅佐夫同志：

向您转达 1949 年 1 月 7 日与毛泽东的会谈主要内容。

毛泽东听了第 0100 号文件①内容的传达。他在读完该文件的译文后说，他们的计划是这样的：

占领北平之后召开协商会议，然后，建立联合政府之事，可在占领南京、武汉、上海和其他城市之后，在秋季或冬季进行。

现在我的打算是这样的：中央会议还要开 3—4 天，之后，在 1 月 20 日我想去莫斯科，争取在月底到那里。

在莫斯科我准备待上 1 个月，要谈许多问题，包括对外政策的总方针、贸易和其他问题。

2 月底我准备返回中国，准备 3 月份召开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4 月份举行协商会议，但是最好有 1 个月的休息，为 5 月份会议的召开做好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夏季组建联合政府。

这项工作可能最好在占领南京、武汉、上海和其他城市以后完成。我们有信心，今年秋季或冬季一定能做到。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将不复存在，它将逃离大陆，首都将归属于我们。此时全国人民都已经看到，在中国只有我们的政府，苏联在外交方面可以更便于第一个承认我们的政府。这一切我们将在莫斯科进行最后商谈。

如果国民党要建立联合政府，我们也不害怕。也许，这甚至会更好一些。民主人士中不会有人靠向国民党这一边。国民党会像 1946—1947 年两次召开国民大会那样打出自己的牌，摊出自己的牌。

我们的牌则捏在自己的手中，没有任何人知道。也许有人会设想，猜我们将采取什么措施，但他们绝不会知道具体内容。我们会把手里的牌藏好。

目前，民主组织及其领袖不支持蒋介石的和平叫嚣，他们袖手旁观，不发表意见。

当前大多数民主人士在我们的区域内，他们愿意待在那里并向我们靠拢。如果在过去，我们邀请他们过来，他们是不愿意的，如今在我军取得胜利之后，只要稍作暗示，他们就会立刻过来。

如今上海只留下三个右翼民主人士——张澜、罗隆基和黄炎培，后两人也想过来，但我

---

① 即以上№16441 文件。——编注

们暂时没有邀请。

目前有许多著名的国民党人士,特别是搞情报的专家,设法找我们联系。

白崇禧问过我们,中共如有什么指示,他立即不折不扣地执行。我们只是口头上暗示他,希望他在汉口稳住自己的军队,不要影响我们的进攻。

我们对国民党第八军军长刘汝明讲过,留守在国民党指示的那个区里,我部队进攻时放我们过去。

汤恩伯也在找我们联系。

钟杰民(Чжун Цземинь)也想跟我们建立联系。

我们在西康省的无线电台好久没有广播,而现在第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每天找我们的人了解中共有哪些指示。

我们跟长江内河区舰队的许多战舰也有联系,进攻时他们会转向我方(关于傅作义,下面详谈)。

许多著名的情报人员,特别在我们公布战犯名单之后,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把重要的消息发给我们。

情况是这样的,如果我们现在向他们做出指示,那将会发生许多反蒋的起义,他们都会转向我方。就目前情况来说,这对我们不利,因为那时过来的国民党军队太多,很麻烦。况且,这些高级将领都想猎取高位,这些人不可靠。

甚至美国人也想跟我们接触,更不要说许多在香港的美国(和英国的)记者以及从北京转向我方的这些人,都要求允许他们去解放区看看,我们都拒绝了。但司徒雷登在前不久,即在载有美军的登陆艇进入上海之前,曾派人到香港找过我们。

来人说的话像是暗示,实际上就是要打听,中共是否允许将美国军队引进上海。我们拒绝了转达类似的请求,直接回答,中共总的来说原则上反对在中国境内驻扎外国军队。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军队,特别是步兵,要比国民党军队强。

此时我插话说,斯大林说过,步兵是战神。毛泽东马上回答说,我们向斯大林学习。

话题又转入了第0100号文件。他们在写文章,很好。这就是说,他们在关心我们,希望早日成立政府。我将跟领导人——周恩来、西弗、库图兹①和任弼时讨论这个问题。

我代表苏联谈到过对他们的帮助,举了一个例子。在满洲的苏联代表十分明确地提到,为何您不要求派遣铁路方面的工程师和工作人员。刚拍发完电报,人已经到了。看来,他们已经准备就绪,他们想着我们,关心我们。(这里我看见了两辆吉斯-150新型汽车。)

真的,我们是在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是需要援助,对此我们非常感激。

会上我对大家说,希望他们跟苏联和其他民主国家进行贸易。不过,我们卖给美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都是一些苏联不需要的东西。

---

① 西弗,刘少奇的化名;库图兹,朱德的化名。——编注

关于傅作义(我把谈话中提及关于傅的事归在了一起，整个谈话集中到这件事上)：

我们经常与傅作义进行无线电话联系，跟他进行谈判，并指出应该派谁来谈判。

当傅作义的10个师被击溃和他被列为战犯以后，他们情绪非常低落。他认为自己中了圈套，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是傻瓜(混蛋)。可是当我们向他口头(没有交给任何书面材料)传达六点(具体哪六点毛泽东没有说)后，他心中的石头落下了。

我们向他解释了为何要把他列入战犯名单的原因。

傅作义在中国东北做了许多坏事，人民仇恨他。如果不把他列入战犯名单，蒋介石会怀疑他跟我们有联系。

可是，如果傅作义能执行我们的指示，我们会向人民交代，他有功，人民会原谅他，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的名字从战犯名单中删去。

中共的基本要求是：

傅作义应该让中共军队通过自己的阵地进入北平，不破坏城市。以后他剩下的4个师编成1个军，从北平撤离到指定地点。他的军队不会受到攻击。

可是傅作义抓住了我们弱点，即我们不想破坏城市，他就跟我们讨价还价。因此，我们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天津则是另一回事，必须攻占。

毛泽东设想，占领天津，消灭杜聿明被围困的部分部队安排在1月份，夺取北平在2月份。然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到其他问题上。他说，外面到处都在说他是独裁者(这点他过去也跟我讲过)，是的，我就是独裁者。

“我、周恩来、西弗、库图兹、任弼时都是领导人，”他说，“离开延安后，国内大事是我们三人(我、周恩来、任弼时)负责。”

晚餐以后，毛泽东谈了1927年和1931年中共所遭受的许多困难。

他说，由于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四中全会做出的错误决定，中共占领的领土有十分之九丧失了，大部分军队受到挫折；他又说到，后来党员的人数因此大大减少了。

他说，有人攻击他，企图逮捕他、杀害他；他还说到，这种情况叶剑英已经提醒过。

提到党内斗争和党内分歧时，他说，只是到了第七次代表大会才达到了统一，这种统一是稳固的。告别时他感谢给他作了通报。他答应将与领导们一起进行讨论。

科洛廖娃(指毛泽东夫人)请我去她那里。她告诉我，她有许多病。后来我听到周恩来、任弼时陆续来到毛泽东家，就在他家开会讨论。

捷列宾

1949年1月10日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54－58

№1644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中国军事政治形势

（1949 年 1 月 10 日）

菲利波夫同志：

1. 你 1 月 6 日的电报已收到。[1]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完全失去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因此也失去了各种真正的主动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建立联合政府，不会有重大影响力。我们的联合政府可能在夏季建立，也可能稍稍提前一些，即春季，这样做不会有很大的困难。

2. 我军已彻底消灭了被围困在徐州附近的杜聿明指挥下 19 个师的国民党精锐部队。

3. 占领天津的准备工作已就绪。现决定：1 月 13 日攻打天津，占领天津后开始进攻北平，然后进攻太原和大同。

4. 今年春季我军主力将作休整，夏季可以南下，最迟 7 月底或 8 月初，150 万解放军正规军将横渡长江。他们在战斗意志和技术装备方面都将超过国民党军队。

到秋冬季我们有九成的把握，可以占领 9 个省，即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江西、湖北、湖南、陕西和甘肃的大部分地区，并占领以下城市：南京、武汉、宜昌、长沙、杭州、南昌、九江、安庆、芜湖、镇江、苏州、无锡、福州、西安。

至于上海，问题不在军事方面，我们深信，定能在今年冬季占领上海。问题在于燃料、粮食的供应和保障方面。是否采用强攻，我们还得考虑。

5. 代表团由毛泽东、任弼时和高岗等 21 人组成。我们期待您派飞机来接我们去莫斯科。现在我们急需前往您处。向您——我们的大老板和联共(布)中央汇报，并听取您对中国革命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指示。

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10 日

АПРФ，ф. 39，оп. 1，д. 31，л. 60－62

---

① 参见以上№16441 文件。——编注

№0253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0 日）

毛泽东同志：

1 月 9 日收到南京政府照会，建议苏联政府充当南京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停战和签订和约的调停人。类似的建议也同时发给了美、英、法三国政府。南京政府尚未得到上述三国政府的答复。苏联政府也还未予答复。一切迹象表明，南京政府的建议是在美国人的授意之下搞出来的。该建议的用心乃是要宣告南京政府赞成停战，主张实现和平，而中国共产党若是断然拒绝与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那就是主张将战争继续打下去。

我们考虑这样回答：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向赞成在中国实现停战和和平，但在同意充当调停人之前，苏联想知道另一方，即中共方面是否愿意接受苏联充当调停人。因此，苏联希望中共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关于和谈倡议的通知，并征得中共方面对苏联充当调停人的同意。我们考虑这样回答，是否同意，请告知。如果不同意，请告诉我们更为合适的答复。

我们还认为，如果征询您的意见，您应做大致如此的回答：中国共产党赞成在中国实现和平，因为挑起中国内战的不是中国共产党，而是南京政府，后者应对战争后果承担责任。中国共产党赞成同国民党谈判，但是不能让挑起中国内战的那些战犯参加。中国共产党主张直接同国民党谈判，而不要任何外国调停人。中国共产党尤其认为，那个派遣军队和舰只直接参与内战、反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外部大国不能充当调停人，因为这样的大国是不可能采取中立和客观的态度来结束中国内战的。我们认为，你们的答复大体上应该如此。

如你们有不同意见，请将你们的意见告知我们。

至于说到您的莫斯科之行，十分抱歉，我们以为，鉴于上述情况，您还得将启程的日期再推迟一些时日，因为在此种情况下您的莫斯科之行会被敌人利用来败坏中国共产党的声誉，攻击中共是依附于莫斯科的附庸力量。当然，这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苏联都是不利的。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 年 1 月 10 日

АПРФ，ф. 45，оп. 1，д. 330，л. 95 - 96

№02535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1 日）

如前电所述，我们草拟的你们对国民党建议的答复方案，其用意在于阻止和平谈判。十分明显，国民党不会在没有外国列强，尤其是美国充当调停人的情况下进行和平谈判。同样明显的是，国民党也不愿在没有蒋介石及其他战争罪犯参加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此，我们料想国民党会拒绝按照中共提出的条件举行谈判。其结局是，中共是赞成和谈的，因而他们不能污蔑中共蓄意继续国内战争。于是，国民党就成了破坏和谈的罪魁祸首。这样一来，国民党与美国的和谈花招就会被戳穿，你们也可以继续进行解放战争直到胜利。

早复为盼。

菲利波夫

1949 年 1 月 11 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97

№16052

贝舍夫致莫洛托夫函：从东北转运粮食

（1949 年 1 月 11 日）

根据瓦休科维奇同志关于来自东北的粮食货运转载的电报所述，现向您报告：交通部已向远东铁路局长和后贝尔及滨海铁路局长发出指示，责成他们保证昼夜不停地转载并以直达列车发送 400 节车厢的东北粮食，其中绥芬河车站 100 节车厢，满洲里车站 300 节车厢。

为了将在绥芬河车站和满洲里车站等待转运的中国载粮车厢限期卸完，允许从交通部的备用车厢中抽用 1 500 节带篷的空车厢，同时责成他们在装车前加紧组织好车厢的挑选、准备和修理。

交通部长

贝舍夫(签名)

1949 年 1 月 11 日

转引自《近代史资料》第 113 期(2006 年 9 月)，第 240—241 页

№1644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转交国民党政府的备忘录

(1949 年 1 月 11 日)

致毛泽东：

现转交南京政府关于调停问题的备忘录原件。

“忠于爱好和平传统的中国人民一贯致力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国内和平。只有当他面临残酷侵略时，才会被迫采取自卫，因此，全中国人民奋起武装抗日。在中国人民与同盟国的紧密合作下，最终取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胜利前夕，中国希望为全世界奠定和平的基础，用和平的方法解决国际争端，与同盟国一起积极参加了联合国的组建工作。因为中国人民深信，只有维护和平，才能真正保证人类文明的继续和发展。

日本投降后中国政府开始与中国共产党谈判，后来在马歇尔将军的帮助下，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可是最后由于双方观点没有得到真正的统一，很遗憾，军事行动又恢复了。虽然和平的努力暂时受到了挫折，可是我政府和人民永远不会对和平失去希望。

在三年中，由于战争灾难在继续，人民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无法言喻的痛苦，因此我政府无法实现在抗战期间考虑好的所有恢复和改造计划。如今，在人民受苦和生产下降的情况下，恢复和谈确实刻不容缓。当前世界，国与国之间需要相互联系、相互合作，只有这样，才能保障和平和世界的稳定。

一个国家的内部不稳定未必只影响这个国家。因此，中国政府竭尽全力避免由于中国内部的武装冲突而阻碍全世界和平的进步。

中华民国总统对此十分担忧。他在新年咨文中毫不犹豫地声明要恢复和谈。总统咨文公布之后，全国人民拍发了不计其数的电报支持咨文，表达了全国人民对和平的真正愿望。苏联政府过去很友善地关心中国问题，多次为争取和平做出了共同的努力。

中国政府谨此向苏联政府声明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并希望了解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上述愿望的观点。如果苏联政府对加快进行和谈提出建议，中国政府将万分感谢。中国政府后来又声明，如果苏联政府能从中调停，中国政府可以立即和中国共产党开始和谈。

同类的声明也发给法国政府、英国政府和美国政府。

苏联政府如能尽快做出答复，中国政府将感谢不尽。”

南京政府认为这个建议不宜公布。

菲利波夫

1949 年 1 月 11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63 - 64

№0253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2日)

菲利波夫同志：

1月10日电收悉。

一、我们认为，对南京政府建议由苏联出面调停以结束中国内战的照会，苏联政府似应作如下答复：

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直希望看到一个和平、民主和统一的中国。但是，如何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和统一，这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苏联政府本着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认为参加中国内战双方之间的调停是不可接受的。

二、我们认为，美国、英国和法国，特别是美国，尽管对参与结束中国内战的调停工作极感兴趣，从而达到使国民党政权保存下来之目的，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已经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信誉扫地，同时，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取得胜利已为期不远，国民党政权的覆亡也已成为定局。在这样的情况下，列强是否还愿意继续扶植南京政府，从而继续与人民解放军作对，看来都成为问题了。

只有苏联在中国人民当中有崇高的威望。因此，如果苏联在答复南京政府照会时采取您1月10日电文中陈述的立场，那么这将导致美国、英国和法国认为参加调停是义务(苏联参与调停是应当的)，导致国民党找到借口诬蔑我们是好战分子。

而对国民党不满和指望人民解放军迅速胜利的广大人民群众就会失望。

因此，苏联如果从国际关系的整体利益考虑，在复照中能够采取我们提出的立场，则我们殷切希望您能接受我们的建议。您若能这样做，那将是对我们的巨大帮助。

三、关于是否允许南京政府人员，包括战犯在内，与我们进行和平谈判，还需斟酌一番。目前，我们倾向于采取这样的立场：为使中国人民能够尽快地得到真正的和平，要求南京政府无条件投降。

战争是由南京政府挑起的，它犯下了滔天罪行，全国人民已不再信任它。为了尽快结束战争和实现和平，南京政府应该将政权交给人民。它没有任何理由存在下去。

我们认为，如果现在与张治中、邵力子等人进行和平谈判，并且以这些人的名义与我们一道组成联合政府，那么这刚好符合美国政府的心意。

而这样做却对中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部，造成很大的混乱，也会使我们现在所坚持的完全正义的立场遭到严重损害。

自1947年7月以来，我们一直细心地注意到谈判的欺骗性，只要国民党在军事上遭到失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就必然要求进行谈判，我们还注意到这种骗局将给中国人民带来何种程度的影响。

令我们深感忧虑的是：这种骗局将会给人民带来极大的影响，将迫使我们再一次做出政治上的妥协，也就是说不能不同意与国民党进行谈判。我们暂缓建立联合政府。这样做的一个基本原因，就是要使美国人和国民党分子打出他们所有的王牌，而我们则是在最后时刻才打出自己的王牌。

不久前，我们公布了战犯名单，共计43人，是以非正式形式(权威人士声明)公布的。人民解放军尚未发出缉拿这些战犯的逮捕令。

1月1日，蒋介石提出了和平建议。对此我们同样还是以非正式的形式(记者评论)作了回答。

总之，我们已为转折留有充分的余地，以便看一看中国人民和国际舆论对国民党的和谈骗局作何反应。

现在我们有理由拒绝接受国民党和谈，因为现在的情况是：中国阶级力量的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国际形势也不利于南京政府，人民解放军今年夏天就可渡江进攻南京。

我们似乎不再需要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在现在的形势下，采取迂回的政治手法弊多利少。

四、感谢您就如此重大问题征求我们的意见。您若不同意我的上述意见，或您对之有何修改意见，请告知。

毛泽东

1949年1月12日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00–103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65–67

№16451

莫洛托夫与傅秉常会谈纪要：中国政府呼吁和平问题

(1949年1月12日)

摘自 В. М. 莫洛托夫的工作日记

1949年1月14日

傅秉常说，今年1月8日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吴铁城向驻南京的苏联、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大使递交了备忘录，提到中国政府准备接受这些国家的有助于尽快恢复中国和平的善意帮助。日前傅秉常收到行政院长孙科和中国外交部代理部长的指示，要我亲自秘密通知

莫洛托夫下列事项：

1. 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和平的呼吁书写得很具体。蒋介石总统的新年咨文是为了团结国内的舆论界。目前在国民党内部经过多次协商，对和平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

2. 中国政府分发给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关于请求真诚援助中国恢复和平的呼吁书在行政院的会议上得到一致赞同。

3. 上述4个国家政府为恢复中国和平所作的真诚援助(这点在中国政府的呼吁书中已提到)不一定采取共同行动的形式。如果苏联政府愿意单独在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和谈问题上做出友善的帮助的话，中国政府将不胜感激。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收到了南京方面的备忘录原件，对此傅秉常已提及。该文件说，同类的声明发给了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他(莫洛托夫)想问大使，英国、美国和法国政府对这份呼吁书的反应如何。

傅秉常回答说，很遗憾，他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信息，可是他可以问问政府。

莫洛托夫说，他还有一个问题，中国共产党是否知晓中国政府给4个国家政府的呼吁书。

傅秉常回答说，他想，中国共产党应该知道这份呼吁书，因为在南京人们都谈起此事。可是他不知道共产党对此的反应如何。

莫洛托夫说，他认为这份呼吁书是秘密的。

傅秉常肯定这一点，但重复地说，在南京对这份呼吁书议论很多。

莫洛托夫指出，就是说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共产党是否知道，他们对此反应如何，连你大使都不知道。

傅秉常回答说，他没有掌握这方面的信息。

莫洛托夫说，苏联政府收到这个备忘录之后，认为必须认真研究研究。现在他们正在研究这个备忘录。

傅秉常希望苏联政府仔细研究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在方便的第一时间里把答复告诉他。

莫洛托夫说，他会汇报中国大使的这个愿望，持续15分钟的会谈结束。

文件送：斯大林、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罗申(南京)等同志，第一远东司

АВПРФ，ф. 06，оп. 11，п. 255，д. 15，л. 1－3

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88，д. 17，л. 3－5

№16450

捷列宾致库兹涅佐夫电：毛泽东对调停的态度

（1949年1月13日）

Ф.库兹涅佐夫同志：

这是答复的最重要内容。

毛泽东谈得很尖锐。他反对各种形式的调停，并反对中共参加任何谈判。

现在国民党会同意一切条件，但是谈判还是无法进行。

关于莫斯科之行。

看来，如果毛泽东在近期，最早1月底前，不能成行的话，可能他就无法去莫斯科了。

师哲讲得直截了当。

捷列宾

АПРФ，ф.39，оп.1，д.31，л.68

№02537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调停国共和谈问题

（1949年1月14日）

致毛泽东同志：

您关于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长电收悉。

一、倘若南京政府根本没有提出和平建议，倘若美国搞的这套和谈花招根本都不存在，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了。显然，这套花招是不符合我们意愿的，因为它可能会给我们共同的事业造成麻烦。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个花招出现了，它的存在是个事实，对这一事实我们不能视而不见，而必须予以重视。

二、毫无疑问，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的和平建议是一种欺骗政策。这是因为，首先，南京方面事实上并不想同中共和谈，与中共和谈就意味着国民党要放弃其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而放弃这一基本政策，就会导致国民党领导人在政治上的灭亡和国民党军队的彻底崩溃。其次，他们懂得，共产党不会与国民党和谈，因为共产党也不会放弃其消灭国

民党及其军队的基本政策。

那么,南京方面的企图究竟是什么呢?他们的企图不是与共产党实现和解,而是与共产党休战,暂时停止军事行动,以便利用休战作为喘息之机,整顿国民党军队,加强长江南岸的防卫,从美国调运武器装备,积蓄力量,然后再撕毁停战协议,向人民解放军发动进攻,并将破坏和谈的罪名转嫁到共产党的头上。最起码他们的企图是要阻挠共产党将国民党军队彻底击垮。

这就是南京方面和美国人目前所推行的欺骗政策的核心。

三、如何对付南京和美国的这种手法,可以有两种答复。第一种,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拒绝南京政府的和平建议,并宣布必须继续内战。但这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意味着,你们在桌子上亮出了底牌,把和平旗帜这一重要武器交到了国民党分子的手中。其次,这意味着你们帮助我们在中国国内外的敌人,让他们诬蔑共产党是继续内战的拥护者,而称颂国民党是和平的捍卫者。第三,这意味着你们给了美国在欧洲和美洲大造社会舆论的可能性,说无法与共产党进行和谈,因为它不想要和平,说在中国实现和平的唯一手段是组织大国的武装干涉,就像 1918 年到 1921 年的 4 年时间里对俄国所进行的干涉那样。

我们认为,对待忠诚的朋友采用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方式是恰当的,可是,如果与南京政府这样的政治骗子打交道,直截了当、毫不掩饰的回答可能是危险的。

是否可以采用另一种回答方式。这便是:第一,表示愿意在中国实现和平;第二,国共双方应在没有外国调停人参与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因为中国是个独立的国家,不需要外国调停人;第三,谈判应当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进行,而不是与挑起内战并因此而失去民心的南京政府进行谈判;第四,一旦双方就和平与中国的领导权问题达成协议,军事行动就应当立即停止。

国民党是否会接受这些条件呢?我们认为不会。一旦国民党不接受这些条件,那么人民就会明白,继续打内战的罪魁祸首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这样,和平的旗帜就落在了共产党手里。这一局面目前尤为重要,因为中国出现了为数众多的厌恶内战的人,他们愿意支持那些主张实现和平的人。

但假定——我们认为这种假定是根本不可能的——国民党接受了这些条件,共产党应当采取怎样的行动计划呢?

第一,不能停止军事行动,要建立中央联合政府机构,并将五分之三的(政治)协商会议席位、三分之二的政府部长职位留给共产党,而将余下的议员席位和部长职位分配给其他民主党派和国民党。

第二,应当把总理、总司令并尽可能地把总统的职位,都留给共产党。

第三,应当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这样建立起来的联合政府,是中国唯一的政府,而其他任何妄想篡夺中国政府地位的政府都是欺世盗名的叛乱集团,应予取缔。

最后,应当通过联合政府,不但向你们的军队,也向国民党军队发布命令,要求军队宣誓效忠联合政府,并保证立即停止对那些已宣誓效忠的军队采取军事行动,而对拒不宣誓

的军队继续采取军事行动。

国民党方面未必会接受这些措施，但是只要他们不接受，事情就会于他们更为不利，因为那样他们将会被彻底孤立，而这些措施也将在没有国民党人的情况下执行。

四、以上便是我们对事情的理解及给你们的建议。或许我们在前电中没能把我们的建议完完全全地表述清楚。

请你们把我们的建议仅仅看作是建议，而不是要求你们必须做这做那，你们可以接受这些建议，也可以不接受。你们尽管相信，拒绝这些建议是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的，我们仍将一如既往地做你们的朋友。

五、至于说我们对南京方面调停建议的答复，我们将根据你们的意愿来起草。

六、我们依然坚持认为，您最好暂缓您的莫斯科之行，因为目前您留在中国是非常必要的。如您愿意，我们可以马上派一位政治局负责成员到你们那里去，在哈尔滨或其他什么地方就你们感兴趣的问题进行商谈。

菲利波夫

1949 年 1 月 14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69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10－113

№0253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同意国共和谈的八项条件

（1949 年 1 月 14 日）

菲利波夫同志：

一、1 月 11 日续电收悉，我感到十分欣慰。在基本方针上（利用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我们与您是完全一致的。

今天，我们公布了我们同意与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这些条件是针对蒋介石 1 月 1 日在其和谈建议中提出的五项反动条件提出来的。[①]

几天以前美国人已经试探过我们的反应，想了解我们是否愿意在没有 43 个战犯参加的

---

① 毛泽东在 1949 年 1 月 15 日起草的中共中央致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我方提出之八个和平条件是针对蒋方五个条件的”，“双方的条件都是对方不能接受的，战争必须打到底。与新年献词毫无矛盾”。见《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年版，第 436 页。——编注

情况下举行谈判。可见,仅这一项条件,即在没有战犯参加的情况下举行谈判,已不足以戳穿国民党和平谈判的阴谋。

二、因捷列宾同志的无线电台很忙,请您吩咐你们在沈阳的同志把我们的声明转交给您。

三、在国民党发表和谈建议之后,国统区出现了极大的慌乱(用"动荡"更好——捷列宾),人民大规模地要求国民党恢复和平,谴责国民党提出的条件甚为苛刻。

国民党的宣传机关匆忙出来解释国民党为什么必须维护自己的合法地位和为什么必须掌握军队。我们认为,国民党内部的这种混乱(用"动荡"更好——捷列宾)局面还将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14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73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04 - 105

№16452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国共和谈问题

(1949 年 1 月 15 日)

毛泽东同志:

我们刚收到了您发来的简短电报,知悉我们对南京政府和谈建议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了"和平"运动。就是说,问题应该认为是解决了。[①]

菲利波夫

1949 年 1 月 15 日

АПРФ, ф. 39, оп. 1, д. 31, л. 74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18

---

① 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反应,可参考如下事实:1949 年 1 月 19 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特别加写了一句:"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78 页)——编注

№16453

费德林与陈进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府南迁问题

(1949年1月15日)

摘自H.T.费德林的工作日记

机 密

1月15日应中国大使馆参赞陈进的要求，我接见了他。

陈进声称，他受委托口头转达中国政府下列声明：

由于军事形势的变化，中国政府可能要迁移到南方。此时驻华的所有外国外交使团将会提前收到通知。为了让外国大使馆及使团能和政府一起迁离南京，我们将为使团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必需的交通工具。如果某使团认为有必要留在南京、上海、天津或北平以保护自己的公民和他们的商业利益，中国政府不会反对。我们已经在广州为外国使团准备了相当方便的住房，迁移是免费的。

转达完声明之后，陈进请我就此事向苏联外交部汇报一下。我答应了。

然后进行了简短的记录性会谈。

参加会谈的有三等秘书A.A.奥尔洛夫同志。

苏联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H.T.费德林(签名)

维辛斯基秘书处(印章)

速交(波采罗布)同志，应分发给……①

呈：莫洛托夫、维辛斯基、佐林、葛罗米柯同志，档案室

АВПРФ, ф.07, оп.22, п.220, д.36, л.1

① 原文如此。——编注

№09045

维辛斯基与傅秉常会谈纪要：答复南京政府备忘录

（1949年1月17日）

摘自维辛斯基的工作日记

机 密

22点我把傅秉常请到我处，受B. M. 莫洛托夫的委托，向他转交了对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调停的答复。大使允诺立即报告中国政府。我们的答复让傅秉常感到沮丧。他慌慌张张地三次重复同一句话“我将转告政府”。

会谈继续了大约30分钟。

帕斯托耶夫同志参加了会谈。

维辛斯基(签名)

文件送：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佐林、葛罗米柯、古谢夫等同志，第一远东司、第二欧洲司、美国司、第一欧洲司、档案室

手写批注：

维辛斯基已递交傅秉常，1949年1月17日。

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88，д. 17，л. 6－7

№16454

莫洛托夫致斯大林报告：对南京政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

（1949年1月17日）

斯大林同志：

呈上中国政府关于调停备忘录的复函草案。

请审阅。

莫洛托夫(签名)

文件送：贝利亚、马林科夫、米高扬、卡冈诺维奇、沃兹涅先斯基、布尔加宁、柯西金等同志

附件一：

给中国政府复函草案

1月8日中国政府向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递交了备忘录，希望苏联政府调停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和谈。中国政府也向法国、英国、美国政府发出了同样的呼吁。

苏联政府看过中国政府的呼吁书以后认为，有必要在此声明，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接受中国政府在呼吁书中提出的调停是不____的。①

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____②的国家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实现统一而不受外国干涉。③

附件二：

苏联给中国政府请求的复函

1月8日中国政府向驻南京的苏联大使递交了备忘录，呼吁苏联政府参加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和谈的调停。中国政府同时也通知，同类的声明也发给法国、英国和美国政府。

苏联政府详细地研究了中国政府的呼吁书后，认为有必要声明苏联政府过去和现在一贯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认为，接受中国政府在呼吁书中提出的调停是不适宜的。

苏联政府认为，作为民主和爱好和平的国家的中国，恢复国家统一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希望中国通过自己内部的努力，通过双方直接谈判，在不受外国干涉的情况下实现统一。

手写批注：

---

① 斯大林在空白处手写加上了“适宜的”。——原注

② 空白处原来的词被删去，斯大林手写加上了“爱好和平”。——原注

③ 在此处有斯大林手写的补充：“通过双方直接谈判，通过中国自己内部的力量。”——原注

批准。

B. M. 莫洛托夫
1月17日

附件三:

英国和美国拒绝调停中国内政

南京,1月16日(塔斯社)。据报刊报道,中国政府向英国、美国、苏联和法国政府呼吁,请求它们参加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最新消息,英国、美国政府拒绝了中国政府的调停请求。

手写批注:
送报刊、电台(今天)。

B. M. 莫洛托夫

АВПРФ, ф. 06, оп. 11, п. 226, д. 15, л. 1-7

№16457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欢迎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来华

(1949年1月17日)

菲利波夫同志:

1. 您1月14、15日拍发的两份电报均已收到。

2. 我决定暂时推迟苏联之行。

3. 我们非常欢迎您派政治局委员到中国来。

石家庄是他到达的最合适的地方,这个地方比较隐蔽,由此可直接到达我党中央驻地。在那里可以就一系列问题(目前最主要的问题是有关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等问题)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5位同志进行交谈。

石家庄到山海关的铁路交通尚未恢复,石家庄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至少需要20天。有许

多民主党派代表住在沈阳，如果途经沈阳的话，势必不能做到保密。因此你们的同志乘飞机来石家庄比较容易保密。

如果您同意这个方案，最好让他在1月底或2月初来。

毛泽东

1949年1月17日

АПРФ，ф.39，оп.1，д.31，л.75

№16461

沃伊诺娃致李立三电：关于请毛泽东为苏联共青团大会题词

(1949年1月17日以后[①])

中国哈尔滨

铁林大街11号

李立三收：

值此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请您组织毛泽东同志的贺词，并确认已收到我们的邀请函。

苏联青年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

沃伊诺娃(签名)

手写批注：

致高岗。请了解，毛泽东同志能否参加今年1月24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会议，请告之。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90，д.39，л.6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的时间是根据内容推断的。——原注

№343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访问

（1949年1月23日）

绝　密

斯大林1949年1月23日给毛泽东的电报

毛泽东：

在我们的电报中提到，联共(布)中央代表将在10天内抵达你们那里。他将抵达您在自己的电报中所指出的那个城市。

你们在莫斯科的常驻代表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派送。

斯大林

1949年1月23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54

№10238

潘友新与科伊的谈话纪要：关于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

（1949年1月27日）

1949年2月5日

第345号

谈话是在远东委员会办公楼由马克·科伊将军主动提出的。

马克·科伊简要介绍了远东委员会讨论战争赔偿问题的历史。他说，关于日本的战争赔偿问题已讨论了近两年。除了在委员会内及委员会下属的各委员会讨论外，这个问题还是美国和苏联政府间双边谈判的题目。尽管谈了这么长时间，委员会内外的讨论都没有带

来积极的成果。马克·科伊宣称，一段时间之前，当这个问题的讨论已明显进入死胡同的时候，马克·科伊曾建议自己的政府提出一个新的建议交远东委员会审议，希望这样的建议能成为远东委员会达成一致决定的基础。美国代表团于是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马克·科伊指的是 FEC-278 号文件)。马克·科伊指出，他认为，战争赔偿问题之所以没有进展，似乎完全是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意见分歧的缘故。其他国家，比如英国，也不同意美国的建议。他作为委员会的主席，曾与一些国家的代表进行个别谈判，但这些谈判也没导致积极成果。随后马克·科伊宣称，他理解苏联代表团的立场似乎是，从日本获得战争赔偿对苏联没有多大作用。他基本上相信，苏联是不会取走这些设备的，甚至“即使用银盘装着送到它跟前”，它也不会要。美国也对从实物上获得战争赔偿不感兴趣。

马克·科伊认为，这样，苏联和美国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立场首先都是从维护国家威望的考虑出发的。随后马克·科伊说，美国政府试图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基础也遭到了失败。但是，让这个问题悬而不决是不行的。其他国家希望快一点获得赔偿，然而用于赔偿的设备却纹丝不动躺在那里，正在变为一堆废铁。马克·科伊将军结束谈话时宣称，他认为推动战争赔偿问题得到解决只有一条出路。他认为，现在轮到苏联，它作为一个大国应争取主动，以提出一个新建议的行动做出一个勇敢姿态。当然，这样的建议要求做出一定的自我牺牲，但却会使远东委员会其余所有成员国刮目相看，并成为解决整个问题的开端。

在作这番声明时马克·科伊将军数次重复说，他不是作为美国代表，而是作为远东委员会主席说这番话的。

在回答马克·科伊将军时我宣称，从讨论战争赔偿问题一开始，苏联的立场就不是要使其他国家为难。众所周知，苏联对消灭日本军国主义的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因而有充分理由获得所有战争赔偿的 14%，即不到七分之一。遗憾的是，在讨论过程中发现，远东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份额。尽管苏联消灭了整个日本军队的三分之一，因而它有权坚持自己的要求，但苏联代表团为尽快解决问题，这时仍迎合其他国家而把自己的份额降低到了 12%。苏联代表团至今都不明白，为什么美国代表在自己的建议中要把对苏联的份额定得那么微小，先是 2%，后来也只有 4%。难道能把苏联对打败日本事业的贡献与诸如印度、法国、荷兰或者和英国相比吗？即使对这些国家，美国定的数字也比苏联的数字高得多。

对此马克·科伊回答，他本人没有参加美国政府内部在制订该建议时的讨论。但是，他推测，对苏联定的这个数字不是作为对苏联最公平的份额提出来的，而是考虑到，这个数字最接近其他国家为苏联定的数字。马克·科伊说，他判断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的情绪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苏联为自己参加对日作战已经获得某种报偿了，即苏联得到了萨哈林、千岛群岛以及日本在东北的国外资产。他本人作为远东委员会的主席，极力将日本的国外资产问题“保持在冻结状态”。他指出，对苏联定的份额本身并不是要给苏联抹黑。随后，马克·科伊宣称，目前战争赔偿问题已经以全新的形式摆在世人面前了，所以向苏联提供了做一个勇敢姿态的很好机会，这样的姿态不仅将对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和美国社会舆

论产生良好印象，而且将提高苏联威信。所以他建议苏联代表团采取主动，以新方式提出战争赔偿问题，从而使提出的方案能为所有国家接受。马克・科伊认为，只有苏联才有能力提出这种建议。马克・科伊重申，他不是作为美国代表，而是作为一个中立人士在这里讲话。

对此，我向马克・科伊宣称，远东委员会之所以不能解决战争赔偿问题，其原因恰恰在于，美国代表团从讨论这个问题一开始就采取了完全不正确的立场，给苏联定了2%的赔偿份额。美国代表团在对苏联获得赔偿份额问题上的这种立场，不可避免地导致了马克・科伊刚才谈的可悲结局。

我还宣称，我认为苏联代表团不可能在远东委员会提出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新方案。我认为必须使美国代表团改变自己关于苏联获得赔偿份额的先入为主的立场，并诚实地、客观地看待苏联完全合法的、公道的要求。美国还应该在分配战争赔偿时对其他一些国家持客观立场，因为他们明显地过分夸大了自己在消灭日本军国主义事业中的作用。如果美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正确的立场，那么这将是摆脱目前远东委员会所处僵局的唯一出路。

我声称，至于涉及萨哈林南部及日本在东北的资产的意见和谈话，那么，这类说法不仅无助于正确理解事物本质，而且会搅乱关于战争赔偿的问题，使这个问题的解决变得更加复杂。众所周知，关于萨哈林及其他领土的问题早已在雅尔塔会议就已决定，它不属于远东委员会的权限，至于在东北的资产，不过是苏联军队缴获的战利品。美国军队也在日本缴获了许多战利品，对这些战利品，任何人，包括苏联在内，都不打算暗中计算它的数量。我希望，不管是美国代表团还是任何别的国家和远东委员会的成员国，都不要把战争赔偿问题与战利品问题搅到一起。

对此马克・科伊回答，国会已经对战争赔偿问题进行了必要的调查，但没能对自己的立场做出其余代表团都能接受的改变。马克・科伊说，他坚信，现在只能采取某种快刀斩乱麻的勇敢姿态，并且只有苏联代表团能做出这种姿态。至于苏联代表关于美国代表团必须改善自己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立场之意见，他(马克・科伊)将报告自己的政府。

谈话持续了1小时45分钟。

A. 潘友新(签名)

文本共5份，送：莫洛托夫同志、维辛斯基同志、马立克同志、第二远东司、档案室

《俄国档案原文复印件汇编：中苏关系》第6卷，第1391—1396页

№34385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告知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年1月28日)

绝　密

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代表已于今天即28日抵达大连。他的姓氏是米高扬，党内代号是安德烈耶夫。他的姓氏需要保密。

斯大林

1949年1月28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55

№34386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时间和地点

(1949年1月28日)

绝　密

毛泽东1949年1月28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特别请求你们的代表于2月2日至5日抵达石家庄。这样较为妥当，因为有一个民主党派代表团来到我们这里，他们将在2月1日前离开石家庄。

毛泽东

1949年1月28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56

№34387

斯大林致捷列宾电：关于联共(布)代表到达的日期

(1949 年 1 月 28 日)

绝　密

捷列宾：

请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代表已经在路上了，并将于 1 月 29 日或者 30 日抵达他们那里。

斯大林

1949 年 1 月 28 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57

№3438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关于联共(布)代表的到达

(1949 年 1 月 28 日)

绝　密

急　电

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28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根据您指定的时间，你们的代表即在 1 月 29 日或 30 日到来。

关于民主人士的访问计划，我们可以另行安排。

中央书记处已委派朱德和任弼时同志迎接他。

毛泽东

1949 年 1 月 28 日 17 时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58

№3438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到达石家庄及与毛泽东的会面

（1949年1月30日）

А. И. 米高扬1949年1月30日致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①]：

抵达石家庄

今天，1月30日，一大早就在石家庄附近的机场着陆了。机场是带水泥跑道、日军样式的。飞机马上就向远东地区返航了。

朱德总司令，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主任任弼时和毛泽东的翻译师哲迎接了我们。

同毛泽东的会面

在乡间土道上颠簸了6个小时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地点。

毛泽东在询问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健康之后，把政治局委员叫到了自己这里，向我介绍了他们。他说：中央书记处由在座的五位政治局委员组成，除了他一个人之外，其余各位同志都在不同时期到过苏联。

除了毛泽东，书记处还有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任弼时。

此外，在吃饭期间和饭后进行了会谈。关于会谈的内容另行告知。

米高扬

1949年1月30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59

---

① 在西柏坡访问期间，为了保密，米高扬与斯大林的往来电报使用的都是代名，菲利波夫代表斯大林，安德烈耶夫代表米高扬。1960年9月22日米高扬在给苏共中央主席团关于访问西柏坡的报告（中译文见本档案集第九卷）中，附上了这些往来电报，其中的称呼和署名均已恢复。本卷所有关于西柏坡访问期间米高扬与斯大林之间的往来电报都是按照这些附件翻译的。——编注

№16465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国局势和中共历史

(1949 年 1 月 30 日)

绝　密

第一次与毛泽东会谈是在 1949 年 1 月 30 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以及毛泽东的翻译师哲。我方 И. 科瓦廖夫①和 E. 科瓦廖夫②也参加了会谈。

几句有关旅途情况的简短问答以后，毛泽东主动详尽地谈起了中国的军事状况。

中国的军事状况

毛泽东声称，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实际上可以算是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的人口有 2.6 亿人，解放区有 2.1 亿人。共产党军队有 220 万人，其中 120 万人在南京地区，90 万人(林彪部队)在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总共只有 110 万人，而且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等地区，因此机动部队很少。除了 4 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军人装备起来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或者已被消灭，或者已缴械投降。在武汉驻军的白崇禧曾派自己的代表到共产党的三个地方代表驻地进行谈判，已经达成了协议。白崇禧将两个师派到上海和南京，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职务。我们知道，蒋介石将行政院长的职务交给孙科，是为了将来他退休后，可以在幕后操纵政府。从共产党掌握的文件资料来看，蒋介石在退休之后还会继续指挥国民党军队，特别是在西安。国民党将在南方和浙江沿海地区组织反抗，不会再坚守南京和上海。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 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 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 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的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

① И. 科瓦廖夫，1948 年被派到东北帮助修复长春铁路，后任驻华苏联经济顾问组组长，联共(布)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编注

② E. 科瓦廖夫，米高扬访华时的随身译员。——编注

4. 也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2万人进行培训。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 还需要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人民解放军对南京的占领要推迟到4月份。当然，可以现在进攻，但成功的机会只有80%。到4月份成功的机会是百分之百。为了在南京、上海地区取得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北平的情况较复杂，需要一段时间来好好巩固。

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4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了一个由7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4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傅作义的部队有20万人，将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调到南京[①]的东北方向，另一部分调到南京的西南方向，在那里对他们进行改编。因为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击溃，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进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第二阶段，将反动透顶的军官清除出各师，声名狼藉者开除出军队，其他人送到政治训练班，一部分用于培训后备力量，大部分人将被遣送回家。第三阶段进行真正的改编，目的是将被改编队伍中的国民党分子打乱，掺和到人民解放军队伍中，每3个原国民党分子安排8名人民解放军战士。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入北平是危险的。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2—3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关于共产党对待自己的错误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说，他想跟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关于这一点，他说："请注意，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人赞同。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

---

① 原文如此，应为北平，见文件№34390。——编注

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20年的时间,并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党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

毛泽东补充说,他们经常犯错误,但也经常改正错误,并举了一个例子。1946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1946年却忘了。如果在1946年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1946年再版了1933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年①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话:“尽管中国比俄国落后,但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所有工人和许多英国工人都觉悟。”

用马克思主义教育中共干部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12部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我就问毛泽东,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12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这是否正确。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为斯大林健康干杯时,他强调指出,列宁和斯大林的学说是现今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此外,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当然不能。毛泽东指出,在他们那里,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

① 原文如此。这里显然是指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执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政策。——编注

进行了强烈的抨击。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1－6

№09028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问题

(1949 年 1 月 31 日)

美国司司长 Ф. Т. 奥列霍夫同志：

对于科列尔今年 1 月 4 日的来信我认为宜这样处理：

一、暂不给予回答，至少在一个月内。

如果他再提及此事，可以这样告诉他，就说苏联外交部还未收到现在在奉天的苏联代表的回音，他们还未告知美国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的情况。

二、上述期限过后，可以答复科列尔，复信应局限于这种意见：我们收到了有关美国驻奉天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平安无事的消息。

要拒绝科列尔向美国领事馆传递通讯报道的请求，推说没有满足这种请求的可能性。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 费德林

1949 年 1 月 31 日 17 时

АВПРФ，ф. 100，оп. 42，п. 292，д. 73，л. 3

№3439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形势等问题与中共代表的会谈

（1949 年 1 月 31 日）

绝　密
急　电

A. И. 米高扬 1949 年 1 月 31 日致 И. B.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现把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的会谈的内容通报给您。我们方面出席会谈的有翻译科瓦廖夫和我们负责中长铁路经济事务的全权代表科瓦廖夫。毛泽东的翻译师哲和科瓦廖夫同志进行了翻译。在就这次旅程进行了简短的问询之后，毛泽东主动开始详细谈论关于中国的军事形势。

关于军事形势、中共和国民党的武装力量

关于军事局势，毛泽东谈了如下内容：事实上，应该认为，中国革命的军事阶段已经结束。

国统区有 2.6 亿居民，而在解放区有 2.1 亿居民。

中共有 220 万军队，其中 130 万人在南京地区，90 万人(林彪部)在北平—天津地区。国民党军队共有 110 万人，分散在从乌鲁木齐到上海沿线，因此不易动员。除了 4 个师之外，国民党各师都被我们打败过数次，因此战斗力是较弱的。被美国人装备起来的国民党最精锐的一些师，要么被消灭了，要么被俘虏了。

在武汉地区部署了部队的白崇禧向中共在 3 个不同地区的代表那里派遣了自己的代表进行谈判，并且已经同他们达成了协议。

白崇禧在把他的两个师往上海和南京地区调遣。他要求李宗仁罢免孙科的行政院长的职务。

蒋介石的作用

我们知道，蒋介石让孙科担任行政院长的职务，是为了在自己退休之后依靠孙科掌握政府的实际权力。共产党人有一些材料证明，蒋介石在退休后继续领导着国民党军队，特别是西安的国民党军队。国民党将在南部的浙江沿海地区组织防御。

关于南京和上海市

国民党将不会为南京和上海奋力而战。

按照毛泽东的看法，从南京和上海的资本家、舆论界的情绪来看，可以按照北平的道路

获取这两个城市，也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不经战争夺取，而不使这两个城市遭受破坏。

但是，共产党人在制定计划的时候是从最坏处着想的。他们在进行着准备，在进行休整和军力准备之后夺取这两个城市。

关于进攻的准备

北平的和平解放使这些军队缩短了休整的时间。不仅需要时间休息，还需要时间：

1. 来消化数十万最近加入解放军的国民党俘虏，对其进行教育。

2. 整顿后方，恢复被破坏的、向前线提供供给的铁路。

3. 把现在生产的子弹和炮弹集中起来，因为储存得很少。对美式、日式、捷克斯洛伐克式和苏式武器的弹药的需求使得事情复杂起来。

4. 需要时间培训一些干部，对上海和南京地区进行管理，因为不能完全依靠当地的干部。目前在对 2 万人进行培训。

还需要一些条件来废除在华北的傅作义军队的国民党管理机构。

5. 还需要一些时间对上海和南京地区的经济管理进行准备。这里的粮食太少了，应当储存。我们还来不及为这些地区印制货币。

关于夺取南京

人民解放军应当把夺取南京推迟到 4 月。当然，现在可以转入进攻，但获胜的机会将达到 80%。在 4 月份获胜的机会将是 100%。

为了必定的胜利，需要把林彪的部队——最优秀的部队从北平地区向南部和西部派遣，以便使国民党没有机会从这里向南京地区增援。

北平地区的局势，对傅作义军队的改编

北平的局势是复杂的，需要一些时间来巩固这里。

傅作义的军队还没有撤出北平。我们想，明天，后天他们将会撤出。暂时仍然需要国民党军队守护仓库，维护城内秩序。

最近几天，我们将把我们自己的 4 个师开进北平，逐步替换国民党的防守。任命一个由 7 人组成的市联合管理处，其中 4 名共产党员，主任为叶剑英(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20 多万人的傅作义部队将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调遣到北平的东北，一部分调遣到北平的西南，应在这里对他们进行改编。

由于这些部队没有在战斗中被摧毁，而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向我们投诚的，进行改编的这一进程将是复杂的、有阶段的。

第一阶段需要一个月，在这一阶段不会进行任何的改编，所有的力量都用在宣传方面，从内部对其进行分化。

此后进入第二阶段，这时将把较为反动的军官从各师中排除出去。声名狼藉者应立刻从军队中开除出去，而其他人要被送往政治培训班，然后大部分人被遣送回家，而部分人可以用于对后备力量进行培训。

第三阶段将进行真正的改编，以便把国民党人混编、融入人民解放军——原国民党人

和人民解放军的比例为3∶8。

在这样的改编基本完成之前,把我军的主力调遣进入北平是危险的。

进攻的暂停

我提出如下问题:暂停进攻2—3个月能否使国民党得到喘息,以使其消除恐慌、积聚力量和组织抵抗?因为南京对和平条件的同意表明,他们是多么需要喘息的时间。对此毛泽东的答复如下:国民党的和谈企图不仅不会削弱共产党人,反而会使其力量得到了加强,并使国民党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以致其再也无法恢复过来。国民党还会组织抵抗,但不会组织起任何有力量的抵抗。一旦共产党结束准备并有把握地发动攻击,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就将被消灭。

关于组建联合政府的问题

毛泽东说,还需要3周的时间进行准备,来清除北平的敌对分子,以便在此之后把北平作为首都,组建联合政府。

我当时问他,在南京解放之后,是不是在南京组建联合政府更好一些。

毛泽东作出了否定的答复:首先是因为还不知道,这样会带来什么好处。第二,转到他们一边的9/10的活动家都认为,北平,而不是南京最适宜作为首都。第三,在同斯大林的通信中他得到了建议,应遵照这一建议,即在解放北平后在这里组建政府,不应拖延。

我说,我知道这封信,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联合政府最好是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那么他对此是同意的。因此我请求毛泽东说出自己对问题的实质的看法。

我说,尽管取得的胜利和北平的解放使得有足够的理由不必把联合政府的组建等到南京的解放,但如果在解放另一个首都之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话,在道德上的威望会更高一些。这不排除,北平而不是南京可以成为常设的首都。

毛泽东回答说,他本人支持我的看法,最好把联合政府的组建推迟到解放南京之后,在6—7月组建联合政府。

我回答他说,如果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联合政府,会增强其在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力量,那么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必要的拖延会削弱革命的力量。

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中还没有如此巨大的威望,能够对非党的群众具有号召力,也不能解决可以颁布法律的国家权力问题,而这是一切所必需的。

毛泽东表示同意这些看法,并说,4月可以夺取南京,5月或者6月可以组建联合政府。哪怕国民党人自己试图在此之前组建自己的联合政府,这也不会给共产党人带来损害,不能妨碍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组建。

关于联合政府组建的时间和地点问题,我们会再次讨论。如果您对这些问题有指示的话,请通知我。

关于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的常设代表

毛泽东问我,是否会在这里待很久。

我回答说,我认为,用4—5天来讨论问题就够了。

他问我，是否会任命一名联共(布)的常驻代表。

我回答说，我们的联共(布)中央同意满足您的请求，近期会任命常驻代表，并派往你们这里。我的这次到访是因为，为了共同的事业，你现在的访问被取消了，但你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一些问题希望现在就予以解决，不要拖延。

因此，我请求他谈谈他打算在莫斯科讨论的一些问题，我将通报给我们的联共(布)，我们现在就努力解决这些问题。以这种途径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他到莫斯科的时候解决。

关于毛泽东对莫斯科的访问

对于这一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想在联合政府成立并得到苏联政府的承认之后到莫斯科去访问。

关于中共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

现在他想同我讨论对外政策问题、军事问题、经济问题和对国民党的态度问题。

关于这些问题他说："请考虑到，中国是如此地落后于俄国，我们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会犯很多错误，如果以俄国的标准来看待我们的工作，那么，我们就一无是处。"

我回答说，或许这些话证明了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谦虚，却难以让人赞同。

如果是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领导中国国内战争 20 年的时间，并使其走向这样的胜利。

至于错误，则是每个积极活动的党都经常会犯的。我们的党也犯错误，但是，党要坚定地遵循无情揭露自己的错误的准则，以便吸取教训，不再重犯。毛泽东补充说，对于确实犯下的错误他们会切实地改正，并举了一个例子。1946 年中共中央在开展土地改革的时候犯了错误。当时才明白，原来他们早在 1933 年关于土地改革时记录下来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但在 1946 年却忘了。如果在 1946 年再看到关于这些错误的材料，就不会再犯这些错误了。他们在 1946 年再版了 1933 年关于土地改革的材料，公开向农民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承担了自己的责任，因为领导要对基层干部的错误负责，尽管领导自己没有犯下这些错误。

我指出，不能同意毛泽东的如下论断：如果用俄国的标准来看待中国革命，那么就一无是处。

第一，中国革命是伟大的历史事件；第二，不考虑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而运用俄国的标准是不正确的。

为证明这点，毛泽东说，1936 年中共在苏区表现出了教条主义，照搬了苏联的方法，这在当时造成了重大的失败。

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

毛泽东半开玩笑地说了如下一句话："尽管中国落后于俄国，我认为，中国的农民比美国工人和英国的许多工人都觉悟。"

他接着说，中共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对干部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以前他们认为，干部应当读完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现在相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干部在学习这些著作的同时，在进行大量的实践工作。因此，他们决定要求自己的干部读完 12 部马克思主义

著作。在举出了这些著作(宣言、从空想到科学、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等)之后,他没有再举出一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我就问毛泽东,他认为是否正确,在对中共干部进行党的教育的12部著作中没有一部是中国领导人的、对中国革命经验从理论上进行阐述的著作。

毛泽东回答说,作为党的一名领导人,他没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做出什么新的贡献,也不能把自己放在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同等的位置。

在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干杯之后,他强调说,列宁—斯大林的学说是中国革命取得目前的胜利的基础,斯大林不仅是苏联人民的导师,也是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导师。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不认为自己的理论著作有多重要,它们只是贯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说,对其没有任何的丰富。

此外,他还亲自向各地发送了措辞严厉的电报,禁止把他的名字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名字相提并论,尽管在这一问题上他不得不同自己最亲近的同志进行争论。

我回答说,这说明了毛泽东的谦虚,但不能对此表示同意。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不是被机械地加以运用的,而是考虑到了中国的具体条件,并以此为基础的。中国革命有自己的道路,它表现出了反帝革命的面貌。因此,对中共经验的阐释不是没有理论价值的,不会不丰富马克思主义科学。难道也能够否认有关中国经验的概括对于亚洲革命运动的理论价值? 当然不能。

毛泽东指出,为反对党的路线,王明的支持者对中国特点进行了强烈的抨击。

对此,我指出,通常民族分子会利用自己国家具体的历史特点,使他们的党对资产阶级进行全面改造,马克思主义者也应该利用这些特点,以便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式领导革命。毛泽东没有对此进行争论。

米高扬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60-67

№1646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当前的工作方针

(1949年1月31日)

与毛泽东的第二次会谈是在1949年1月31日。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И. 科瓦廖夫和Е. 科瓦廖夫也参加了会谈。

毛泽东谈了下面的事：

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说，成立政府的准备工作与清除北平的敌对分子有关，此项工作需要3周左右时间，然后才能在作为首都的北平组织联合政府。

我提出了如下问题：在南京解放之后，是不是在南京组建联合政府更好一些？对此，毛泽东作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理由是：首先，不知道这是否有好处；其次，转到他们一边的9/10的活动家都认为，北平，而不是南京最适宜作为首都；第三，在同斯大林的通信中他得到了建议，应遵照这一建议，即在解放北平后在这里组建政府，不应拖延。我说，我知道这封信，斯大林同志的看法是：如果毛泽东同志同意，联合政府最好是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那么他对此是同意的。因此我请求毛泽东说出自己对问题的实质的看法。我说，尽管取得的胜利和北平的解放使得有足够的理由不必把联合政府的组建等到南京解放，但如果在解放另一个首都之后组建联合政府的话，在道德上的威望会更高一些。这不排除，北平而不是南京可以成为常设的首都。

毛泽东回答说，他本人赞同如下看法：最好把联合政府的成立推迟到南京解放之后，在6—7月份成立。我回答他说，如果在解放南京之后组建联合政府，会增强其在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力量，那么在组建联合政府问题上不必要的拖延会削弱革命的力量。中国共产党人在人民中还没有如此巨大的威望，能够对非党的群众具有号召力，也不能解决可以颁布法律的国家权力问题，而这是一切所必须的。毛泽东同意这些看法，并说，4月可以夺取南京，5月或者6月可以组建联合政府。哪怕国民党人自己试图在此之前组建自己的联合政府，这也不会给共产党人带来损害，不能妨碍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组建。

关于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的代表机构

稍稍休息后，毛泽东提出了联共(布)中央在中共中央设立代表机构的问题。他要求派遣政治上成熟的同志作为代表，这样可以与他讨论双方感兴趣的问题。他要求给该代表处配备10人，其中有懂得汉语的同志，以便能够对中共中央发送的材料进行研究。

我回答说，我们的中央原则上同意设立这样的代表机构，现在正在挑选干部。

接下来毛泽东说，我在这里待4—5天时间太短了，他们要我在他们那里待上10天。但我回答说，争取在5天之内同他们结束所有问题的讨论。这时我告诉毛泽东，有两名定时炸弹和窃听装置的苏联专家同我一起到来，以便为中共提供帮助。毛泽东对我的这一通报非常满意，并感谢斯大林同志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

国内战争前线的局势和中共的武装力量

在谈到在汉口战场上的白崇禧部队时，毛泽东说，白崇禧是一个最阴险的将军，跟他斗比跟傅作义斗更复杂。但是我们准备战胜他，况且他对蒋介石采取两面派的政策。为了保住自己的脸面，他想在离开汉口时不被人认为，他是撤退或者投降了。因此在我们包围他之前，他会自己把汉口地区让出来，撤到广西省。他的代表与我们有联络，我们对白崇禧的心态有所了解。

后来毛泽东指着地图给我们讲述了一些战场的战斗情况，重复了昨天会谈中的一些事实。他说，目前他们的武装力量人数超过300万，如果加上经过政治训练的被俘的傅作义的部队，他们武装力量总人数达到310万。其中220万人是正规军。驻扎在北平—天津的林彪部队共有90万人，约有130万人在南京战场上。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何时准备拿下太原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他们将在今年2月底攻打阎锡山部队。

我问，他们何时准备强攻西安，毛泽东回答说，他们打算在攻占太原之后再进攻西安。他补充说，他们在前线的个别地区可以强攻，并很快夺取城市。但使情况复杂的是，他们急缺在政治上训练有素的干部，以便通过他们控制新的地区。

毛泽东说，他们正着手强攻长江的准备工作。打算调90万兵力到上海—南京战场，汉口战场也调90万人，35万人调到西安。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组建军事行政机关他们是如何考虑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他们准备建立军事部。

毛泽东继续说，今天，他们有3条战线：林彪部队作战的华北战线，陈毅领导的南京—上海战线，陈赓指挥的西安战线。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是哪个组织协调各战线的问题，毛泽东回答说，是军事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副主席是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

毛泽东又回到前线的问题，他说，3条战线共有4个野战军，其中包括14个兵团或57个军。每个兵团平均由3个军组成，每个军有3个师，而东北各军除外，在那里每个军有4个师。总共有181个师。军中的政治工作由军事委员会领导。每个军、师和团里都有党的委员会。部队里中共党员的人数约占30%。人民解放军的士气和政治状况是健康的，没有发现有转向国民党的现象。当然，部队中也有缺点，表现在无纪律和无政府主义方面。这是因为受到国民党的影响。现在我们正在对此进行强有力的斗争。我们召开党的会议，对发现的缺点进行尖锐的批评，不管对威望是否会有所损害。

军区的领导

毛泽东说，他们有5个中央局。

1. 中共中央东北局；2. 中共中央华北局；3. 中共中央华东局；4. 中共中央华中局；5. 中共中央西南局。

根据对党组织的这种划分，组建了5个军区，以便于党对军事工作的领导。军区的领导工作通常由中共中央相应的局来抓。

国民党的海军力量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福摩萨①的局势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蒋介石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在建立海军基地。但是蒋介石的这种企图遭到岛上600万人民的反对。为了巩固自己影响，蒋介石把以陈诚省长为首的备受信任的人员派到了台湾。毛泽东相信国民党的海军和空军

① 原文如此，即台湾，下同。——编注

迟早会转到人民解放军这一边。他说，已经派代表到国民党海军，特别是长江海军部队。已经有8架国民党飞机转向我们，其中有一架Б-34型的重型轰炸机于晚间在石家庄地区降落。在轰炸机的指挥人员中有3名共产党员。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在葫芦岛上是否有国民党海军的问题，毛泽东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说，现在国民党的海军基地在青岛、上海、广东、福摩萨和福州。

工人状况及其作用

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有从事地下工作的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在上海和广州都有，但人数不多。

我问起上海的工人状况及其作用，毛泽东回答说，共产党在农村中有深远的影响，在那里没有竞争者。但城市中情况不是这样，如果说在学生中共产党的影响很大，那么，在工人阶级中国民党的影响要超过共产党。例如，日本在上海投降后，共产党开始合法地工作，它对上海工人的影响是这样的：在上海的50万工人中有20万人受共产党的影响，其他30万人则受国民党的影响。

干部

现在主要问题是干部。我们挑选了约5.3万人，打算把他们派往前不久解放的地区。由于缺乏干部，我们无法管理城市的经济，因此不必急于占领上海。

我说，他只看到管理上海的困难，没有发现占领上海后的许多益处，到时候中国工业中心的一支50万人的工人大军将为共产党工作，他没有看到，这一工业中心的工人阶级会从自己的队伍中推选出许多宝贵的、对党忠诚的干部来加强党和革命的社会基地，对落后的中国产生影响。对此，毛泽东无言以答。

工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毛泽东说，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取得这样的优势。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我的这些话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青年、妇女工作

我问起了青年、妇女的工作问题。毛泽东回答说，这是他们工作中的最薄弱的部分。借此机会，我援引苏联的经验强调了青年和妇女工作对革命的重大意义。对此，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说，他们将采取一切措施加强青年、妇女工作。

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随后毛泽东提起了即将与南京政府进行的和谈问题。他说这件事不急,代表团尚未选派,成员名单也没有通知国民党政府。因为谈判的地点确定在北平,北平的傅作义投降部队还未清理完毕,整顿城市的秩序还需两周时间。事实上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在2月底可以开始。代表团将全部由共产党员组成,但他们打算与参加联合政府的其他党派协商,这是以前预先商量好的。中共中央大约在2月20日前迁到北平。

毛泽东说,去年11月份他们曾向联共(布)中央通报,人民解放军将在两年半时间内消灭国民党。就在最近6个月内,虽然我们还没有全部消灭国民党,但国民党已经处在灭亡的边缘。国民党彻底脱离了人民,威信扫地。它的和谈建议,是不得已而为之,要手腕,是要得到暂时喘息,以便积蓄力量与我们对抗。我们真诚地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他们不会接受这些条件,蒋介石跑到奉化,李宗仁接替他的位子,就是明证。国民党政府已名存实亡。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分别逃往各处,如在上海的孙科。CC派在加强对国民党的社会舆论的操弄。至于美国,似乎可以感到,他们不倾向支持蒋介石,将希望寄托在李宗仁、邵力子和张治中身上。国民党政府领导人逃离的这个事实,使英国、美国和法国只得声明不再干涉中国内政,尤其是英国人和美国人都声称,他们在等待人民解放军的到来。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已站在我们这一边。

国民党想与我们谈判,但和谈的第一个条件,也就是关于战犯的问题就吓坏了他们,在战犯名单中列出了100多人,而且还不限于名单中的这些人。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八个条件(李宗仁说他会接受),我们就委托他们执行这些条件。如果他们不接受关于战犯这一条,就免谈。

为了塑造出民主的形象,讨好我们,李宗仁提出了出版自由。但我们不会上当,我们清楚,斗争在继续,蒋介石背着李宗仁,通过参谋长顾祝同继续与我们作战。汤恩伯指挥的蒋介石嫡系部队仍然部署在上海—南京战线,陈诚在福摩萨岛准备军事基地,胡宗南部部署在西安,白崇禧部在汉口战场。我们知道,国民党不能组织起坚强的战线,但我们不能不估计局势,做好应付各种情况的准备。

关于外贸

毛泽东说,未来的联合政府将面临对外贸易的问题。他说,我们打算与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签订合同。

我说,这种考虑是正确的,并补充说,我们必须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过去这个问题没有提出来,因为我们不想让人理解为这是干涉民主国家的内政。可结果是民主国家在市场上相互干扰,直到他们请求我们通过相互签订条约的方式来调整贸易关系。我简要地谈了莫斯科六国会议①取得的成果。

① 1949年1月苏、保、匈、波、罗、捷六国代表在莫斯科举行了经济会议。会议讨论并决定:为了建立各人民民主国家与苏联之间更加广泛的经济合作,必须设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编注

回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虽然中国的资产阶级不愿意，但对外贸易要被垄断。我们首先要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进行贸易，只有这些国家不需要的产品，才出口到资本主义国家。

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

后来毛泽东转到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他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原则是在相互平等和相互帮助的基础上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

谈到抗日战争时期党的对外联系，毛泽东指出，当时这种联系局限于与在延安的外国记者，特别是与美国记者的被动交往。现在情况变了，因为人民解放军占领了诸如沈阳、天津和北平这样的城市，那里实际上面临着如何与所有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外国领事馆建立关系的问题。我们暂时不把他们当做是与我们有一定外交关系的国家的机构的代表。因此我们只限于保证领事馆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把他们当侨民来看待。

此后毛泽东提到在中国境内限制外国电讯社和出版社的权利的问题。禁止电讯社独自活动，外文报刊不得自由出版。现有的外国出版社必须向政府部门登记注册。

毛泽东指出，这些限制牵涉到苏联出版社在中国的利益，因此他想跟我们商量，以便使这些出版社的领导在名义上是中国的，实际工作由苏联公民负责。

在讲到外国企业时，毛泽东强调说，外国企业必须慎重对待，因为它们的资本和中国人的利益紧密交织在一起。他提醒说，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定。原则上这个决定仍有效，但实行时必须采取灵活的方式。

毛泽东说，毫无疑问应该禁止外国人使用无线电台，但个别情况可以例外。他举了一个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无线电台的例子：电台的密码我们已经掌握，再禁止使用对他们已经不利了。

毛泽东说，随着南京的占领会产生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问题。问题在于立即接受承认还是拖上一年半载之后。两种方法各有利弊。延缓时间对我们有利，这样我们可以放手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关系，使我们更加巩固起来，而接受承认则使美国、英国更便于进行破坏活动。为了赢得时间，我们不会要求美国、英国立即承认。

在继续谈论关于外国列强承认新政府的可能性的想法时，毛泽东说，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也面临着这个问题。毛泽东补充道，有消息说，美国准备承认我们，英国肯定跟在他们后面。这些国家承认的目的是为了进行反对我们的工作，同时为了和我们做生意。承认的益处到底何在？这将为我们打开通向别国和通向联合国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倾向第一种道路，即不急于建立外交关系，拖延一些时间，巩固自己。

最后，毛泽东请我根据共同事业的利益来阐明苏联对中共对外政策的实质问题所采取的立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7 - 16

№09029

费德林致奥列霍夫函：关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问题

(1949年2月1日)

美国司司长Ф.Т.奥列霍夫同志：

兹通知您，我们对我们1949年1月31日17时的信(第83/1ДВ号)作以下补充：第一远东司认为必须拒绝美国大使馆在1949年1月17日备忘录中所提出的请求——帮助美国驻大连领事馆代表乘车去奉天，理由是苏联当局没有授权可允许乘火车去东北。

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代理司长

Н.费德林

第88/1ДВ号

АВПРФ，ф.100，оп.42，п.292，д.73，л.4

№3439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就军事问题等与中共代表的会谈

(1949年2月1日)

绝　密

急　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1日致И.В.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

军事问题、承认联合政府问题

我尽力在我最近几次的通报中详细地转述谈话内容，但是，由于解码的困难，来不及解码，尽管有两个人为此工作。因此，接下来我不得不通报得更加简略一些。

1月31日，从晚上6点到凌晨2点我同毛泽东进行了第二次长时间的会谈。毛泽东详细地解释了军事问题，但重复谈了很多，谈论了军队的建设、在国内战争中最终取得胜利的战略计划，从各个角度讨论了国外大国对联合政府的承认问题，这明显是在说服我们在这一联合政府成立以后马上就予以承认。还谈论了其他的对外政策问题。

由于已经很晚了，并且为了对所提问题好好进行考虑，当轮到我说话的时候，我请求第二天再进行会谈。

详细情况另外电报告知。

关于联共(布)驻中共的代表处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出了关于设立联共(布)驻中共中央代表处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他请求派遣一名负责的政治代表，同其可以讨论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希望代表处能有10名工作人员，其中包括会汉语的人员，以便对中共中央提供的材料进行研究。

我回答说，我们的联共(布)中央已经原则上同意了组建代表处，正在挑选干部。

看起来，是出于东方的礼节，毛泽东说，我到这里4—5天太短了，希望能够待上10天。

我回答说，希望在5天内结束对所有问题的讨论。

米高扬

2月1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68

№3439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等

(1949年2月1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1949年2月1日致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中共的对外政策问题

现就对外政策问题进行报告。

今天上午12点，毛泽东的助手周恩来和朱德到了我这里，他们转告我说，昨天紧张的会谈使毛泽东非常疲倦，他感到不舒服，请求把原定的会谈推迟一天，而今天则同周恩来继续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晚上讨论军事问题。

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他阐述了中共同国外大国、主要是同美国对外交往的历史，阐述了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例外，同他们应该在平等和独立的基础上奉行友好政策。

昨天毛泽东和今天周恩来阐述的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主要归结如下：

1. 奉行独立政策，也不挑衅国外大国。

2. 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暂时不提他们的特权，但被国民党没收的日本的财产除外，这一点仍然有效。

3. 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对现有的领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奉行的路线是：不废除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剥夺它们开展活动的权利，并就此提出令西方大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不能容忍的条件，以使它们撤出沈阳，并且今后不允许它们在沈阳和哈尔滨恢复活动。

正如他所表示的，尽力用铁幕把毫不相干的大国关闭在满洲之外，苏联和人们民主国家除外。

为了显示平等相待，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应该在形式上停止活动，但可以非正式地进行活动。

4. 查封所有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意味着，苏联在天津和上海的领事馆为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应该在形式上声称，这些出版物是以某些民主的中国人士为首的。

5. 今后禁止国外传教士和记者到中国来(友好的除外)，国外的传教组织、医院、学校、文化和科学机构、援助机构必须进行登记。对它们进行控制，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

限制国外教会的地产及其附属产业，没收它们多余的土地。

国外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中国人，教材要得到政府的赞同，宗教课应当以自愿的方式授课。

把被揭露为间谍和违法的外国人遣送回去，而把情节严重的审判入狱。

6. 保留外国人在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除外。

7. 禁止所有外国人携带武器，外交人员除外。

8. 在中国境内禁止外国电讯社和通讯社的活动。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请求我们提示一下，应当为塔斯社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或考虑到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政府通讯社进行信息交流。

9. 继续在事实上孤立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武官和参赞，派自己的军官去监督他们，剥夺他们迁移和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

10. 包围被美国人占领的青岛基地，切断它与周边地区的一切联系，不采取军事行动达到让美国人撤离的目的，对美国驻留军队和进行空降的沿海战略要点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不管怎样，如果美国人破坏秩序，或反对我军，或反对政权，就应压制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

11. 对所有海关实行监督，使它们完全脱离外国大国。最初，关税保持不变。废除国民党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内港的优惠条件，规定只有经政府的许可才能进入内港。

12. 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无线电台。

13. 监督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会计制度，如果它们破坏法律，就追究它们的责任直到查封。

14. 关于对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承认问题，应当在两种可能的方案中进行选择，关于这一点他们会征询我们的意见。

关于对新政府的承认

根据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的资料，美国和英国准备承认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证明之一是，根据他们的资料，这些国家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在这一问题上使他们惊奇的是，只有苏联大使罗申随国民党政府到了广州。

第一方案

中国共产党争取让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应让苏联第一个承认新政府，因为根据他们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想在这一问题上抢在苏联的前面，目的是在中国的舆论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二方案

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以后再争取他们承认。

第二方案的好处在于，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更易于对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施加压力，不必顾及外国政府对新政府为剥夺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的反对。

在这一问题上，他们想了解我们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苏联和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在一年以后、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建立，或者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建立。

我答应中国同志向我们的联共(布)中央报告一切情况，中央会讨论并做出答复。而且时间紧迫。

关于对外国财产的态度

在昨天的会谈中，毛泽东在谈到外国企业时强调指出，对这些企业要谨慎，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

他提醒说，中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财产的决议，并在当时得到了共产国际的同意。这个决定至今原则上仍然有效，但在落实时要采取灵活的方式。

在谈话的开始，周恩来请我对毛泽东在昨天提出的这种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说，在外国财产的问题上，我们的看法是，把日本的、法国的财产收归国有，也可

以把英国的财产收归国有。

对美国的财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以便让美国知道,新政府将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掌握了中国的局势,可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再作决定。

在我谈了这些话之后,周恩来阐述了上述中共预先采取的立场的构想,根据这个构想,在新政府成立初期,不打算把外国财产收归国有。

关于罗申之行

关于罗申与国民党政府同去广州的问题,我解释说,这很合乎情理,因为目前我国大使被派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很自然,他要随中国政府去广州,并把部分使馆机构留在南京。实质上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没有损失,相反有益。

中共期待我们联共(布)中央对所提上述问题的看法。

我认为,需要在我离开前后作出答复,因为事态紧急。

米高扬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69-73

№34393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国共和谈及派遣苏联专家等

(1949年2月1日)

A. И. 米高扬1949年2月1日致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同南京政府的谈判、关于中共中央迁往北平

在1月31日的会谈中,毛泽东提到了关于同南京的和平谈判问题。

中共对此事不急。正式的代表团还没有任命,关于人员的组成也没有向南京方面通报。

因为谈判的地点定在北平,因此谈判暂时还不能开始,因为还需要2—3周使北平恢复秩序。

事实上谈判将在2月底开始。

代表团将只有共产党人组成。关于和谈,将同与中国进行联合的党派进行磋商,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已经同相关代表达成了协议。

毛泽东还通报说，中共中央将在2月20日迁往北平。

关于定时炸弹和装置的苏联专家

我通报说，有两名定时炸弹和装置的苏联专家同我一起到来，以便帮助中共。对此毛泽东非常满意。

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表示了感谢，感谢其对中共的关切。

米高扬

2月1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74 - 75

№16467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中共的对外政策

(1949年2月1日)

绝 密

1949年2月1日白天，毛泽东的副手周恩来、政治局委员朱德和翻译师哲到我这里，他们转告我说，昨天紧张的会谈使毛泽东非常疲惫，他感觉不舒服，请求将例会改天举行，而今天继续与周恩来继续讨论对外政策问题，晚上讨论军事问题。

在4个小时里，周恩来阐述了中共与外国大国，特别是与美国的对外关系，谈到了对外政策的原则和实践问题。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例外，同它们应当在平等和互相①的基础上奉行友好合作的政策。

我方参加会谈的有И.科瓦廖夫和Е.科瓦廖夫同志。

中共与美国的关系

在详尽通报中共的对外关系时，周恩来说，战争期间，直到1944年他们都没有对外联系。1944年美国史迪威将军派了一批美国观察员到延安，他们从1944年4月一直待到1946年3月延安沦陷之前。我们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由此开始。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那时已经奉行禁止美国干涉我国内政的政策。对待马歇尔我们也采取同样的政策。例如我们拒

① 原文如此，此处似应为“独立”，见文件№34392。——编注

绝参加中美调停委员会,因委员会受美国控制。此种情况下,我们要求遵守1945年12月莫斯科会议的决议。

在与马歇尔的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估计到美国想控制我们的部队。我们(在1946年2月)与美国缔结了改编军队的协议,因为这对我们有利。后来协议遭到破坏,国内战争又打起来了,我们的代表处撤离了南京。此时起我们开始有力地揭露美国。虽然我们中断了同美国的关系,但是他们还不断通过那些与我们有关系的人士想和我们建立联系。而我们也只限于听取美国人同我们建立关系的愿望。

至于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关系问题,尽管我们受到的损失比国民党大,我们只得到其提供给中国的所有物资的2%(5万吨),尽管我们也得到了许多宝贵的物资。我们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供应的氮肥来制造弹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里有许多间谍,但也有帮助我们的人。

此后周恩来说,与美国的军事冲突教会了我们许多东西。众所周知,还在日本投降之前美国就想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基地。苏军到达东北以后,日本投降了。美国开始逐步召回自己的观察员,后来从中国撤军了,可是它在军事上继续帮助国民党。在与国民党的冲突中,我们打死了一些参加国民党军事行动的美国人。第一次发生在1945年毛泽东和蒋介石重庆谈判期间。魏德迈得知一个美国士兵被打死后,向我们发出最后通牒,可我们回答说不了解这回事。第二次是在天津的近郊,一队美国兵借口寻找丢失的士兵,进行间谍活动。我军向他们开火。这次事件我们立刻通过无线电广播出去了,可美国人否认这一事实。第三次发生在天津—北平的道路上,当时美国兵蓄意进入我地区。互射中一个美国兵被打死。马歇尔向我们提出了抗议。第四次是在青岛地区,在与一群间谍分子的互击中一个美国兵被击毙,另外三个被俘。美国又向我们提出抗议,后来前来同我们谈判,签署了文件,承认他方应承担责任。第五次是在去年,一架美国侦察机想送一位美国少将在解放区降落,这个少将被我们俘虏了,自1947年5月份起他一直被关在山东,他不敢承认自己是将军。美国人装作不了解这一事件。第六次与美国人冲突是在天津机场地区,美国人在那里当国民党教官。我们的游击队员破坏了机场的军事目标。之后美国人召回了自己的代表。

总结上述事件时,周恩来说,我们不应挑衅美国人,但如果他们反对我们,我们将给予坚决的回击。我们在报刊上骂美国,因为这有助于用我们需要的精神对群众(工人、农民、学生)进行教育。

后来周恩来说,在战后的三年中美国在中国的威信扫地。总的来说,人民仇恨美国。诚然,也有部分人,甚至是部分进步人士还害怕美国的力量。

周恩来接着说,当我军去年占领沈阳后,在与美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驻沈阳的外国(美国、英国和法国)领事馆暗示我们,他们不愿撤走,想与我们建立真正的关系。我们清楚,这些领事馆留下来是为了对苏联和我们搞间谍活动。我们不想在沈阳见到他们,所以在采取措施孤立他们,给他们制造一些难以忍受的条件,迫使他们撤离沈阳。今后

我们将提出关于在对等基础上建立领事关系的问题。周恩来说，总之，我们要把美国攥得紧紧的，因为“我们与他们打仗，不与其他大国打”。美国破坏了我们的秩序，我们应该在自己的国家孤立他们。

关于对联合政府的承认

此时周恩来的发言转向对未来以共产党人为首的联合政府的外交承认问题。他先请我解释苏联大使罗申为何去广州。

关于罗申与国民党政府同去广州的问题，我解释说，这很合乎情理，因为目前我国大使被派驻中国的政府只有一个，很自然，他要随中国政府去广州。留下部分使馆机构在南京。实质上这对我们的共同事业没有损失，相反有益。

后来周恩来继续谈外国大国承认未来联合政府的问题。他请求我们对承认联合政府的两个方案提出建议，根据共产党通过民主党派领导人得到的资料，美国和英国准备承认以共产党为首的新政府，证明之一是(按民主党派的意见)他们的大使没有离开南京，没有随国民党政府迁至广州。

第一方案

中国共产党争取主要的外国大国立即承认新政府。这种情况下苏联要第一个承认新政府，因为根据他们的消息，美国人和英国人想在这一问题上抢在苏联的前面，目的是在中国的舆论界使其处于不利的境地。

第二方案

不急于争取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我们不反对，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战略我们准备持续一年半载，以后再争取它们承认。第二方案的好处在于，新政府可以腾出手来更易于对在中国的外国机构施加压力，不必顾及外国政府对新政府为剥夺权利、追究外国公民和外国政府的行动而采取的措施的反对。同时他们想了解我们联共(布)中央的意见，苏联和中国新政府的外交关系是否在一年以后、在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同时建立，或者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马上建立。

我答应中国同志向党中央汇报所有这些情况，中央会讨论并作出答复。

关于处理外国资产

在昨天的会谈中周恩来说，毛泽东在谈到外国企业时强调指出，对这些企业要采取谨慎态度，因为外国资本和中国的利益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周恩来提醒说，中共的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没收外国资本和资产的决议，对这个决议当时共产国际是同意的。这个决定至今原则上仍然有效，但在执行时要采取灵活的方式。周恩来请我对毛泽东提出的这种态度发表自己的意见。

我回答说，在外国资产的问题上，我们坚持对日本、法国的资产实现国有化，尽可能也包括英国的资产。至于对美国的资产应当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知道，新政府将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掌握了中国的局势，可以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时，根据形势和美国的态度再作决定。周恩来阐述了上述中共政策的预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

在新政府成立初期对外国资产不实行国有化。

对外政策的原则

后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论点阐明了中央的对外政策原则。

1. 奉行独立政策,也不挑衅国外大国。

2. 保护外国公民的生命、财产(暂不提他们的特许权),除已经没收的国民党资产外,这个政策继续有效。

3. 在建立外交关系之前,对现有的领事代表处和外交代表处奉行的路线是:不废除它们,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剥夺它们开展活动的权利,并就此提出令西方大国在沈阳的领事馆不能容忍的条件,以使它们撤出沈阳,并且今后不允许它们在沈阳和哈尔滨恢复活动。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尽力用铁幕把大国关闭在满洲之外,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除外。为了显示平等相待,苏联的领事机构也应该在形式上停止活动,但可以非正式地进行活动。

4. 查封所有外国人出版的报纸杂志。这意味着,苏联在天津和上海的领事馆为继续出版自己的报纸,应该在形式上声称,这些出版物是以某些民主的中国人士为首的。

5. 今后禁止国外人、传教士和记者到中国来(友好的除外),国外的传教组织、医院、学校、文化和科学机构、援助机构必须进行登记。对它们进行控制,将其活动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保护它们的生命财产。限制国外教会的地产及其附属产业,没收它们多余的土地。国外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中国人,教材要得到政府的赞同,宗教课应当以自愿的方式授课。把被揭露为间谍和违法的外国人遣送回去,而把情节严重的审判入狱。

6. 保留外国人在中国国家机关的工作,反动分子和敌对分子除外。

7. 在中国境内禁止外国电讯社和通讯社的活动。在这一问题上,他们请求我们提示一下,应当为塔斯社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在条约的基础上或考虑到我们与人民民主国家的经验与中国政府通讯社进行信息交流。

8. 禁止所有外国人携带武器,除外交人员外。

9. 继续在事实上孤立在北平和天津的美国武官和参赞,派自己的军官去监督他们,剥夺他们迁移和进行某些活动的权利。

10. 包围被美国人占领的青岛基地,切断它与周边地区的一切联系,不采取军事行动达到让美国人撤离的目的,对美国驻留军队和进行空降的沿海战略要点也采取同样的方式。不管怎样,如果美国人破坏秩序,或反对我军,或反对政权,就应压制他们,必要时使用武力。

11. 对所有海关实行监督,使它们完全脱离外国大国。最初,关税保持不变。废除国民党允许美国人不受限制地进入中国内港的优惠条件,规定只有经政府的许可才能进入内港。

12. 禁止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使用无线电台。

13. 监督外国企业、银行及其会计制度,如果它们破坏法律,就追究它们的责任直到查封。

谈到外贸,周恩来说,首先他们将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贸易关系。他们首先将自己的产品供应给这些国家,而多余的供应给资本主义国家。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他们是否想和日本进行贸易的问题时，周恩来说，这个问题尚未讨论过，但要认真考虑，并同我们商量。

在回答我提出的关于哪个党负责外交部工作的问题时，周恩来肯定地说，部长一定由共产党员担任，副部长可以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非党人士。因此，周恩来说，他们在天津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对各种对外政策的文件进行研究，以便外交部对今后的工作做好准备。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17－24

№16468

米高扬与周恩来等人会谈纪要：关于军事问题

(1949 年 2 月 1 日)

绝 密

1949 年 2 月 1 日晚，周恩来和朱德就军事问题向我通报情况，谈话进行了 3 个小时。中方还有翻译师哲参加，我方参加会谈的有 И. В. 科瓦廖夫和 Е. Ф. 科瓦廖夫。

伊斯兰教徒问题

会谈一开始提出了关于中国西北地区的伊斯兰教徒和个别国民党伊斯兰教徒将军特别是马步芳和马鸿逵的问题。

对于我提出的是谁在对他们进行支持的问题，周恩来在回答说，这些伊斯兰教徒将军得到了蒋介石和美国的支持。美国人想向青海和甘肃省的伊斯兰教地区渗透。随着我们取得了胜利，伊斯兰教将军和他们部队的状况越来越不稳定。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中国的伊斯兰教徒是否有一些要求，周恩来回答说，伊斯兰教徒想获得自治权；他又说，如果我们给予他们自治权，谨慎对待他们的宗教，他们会与我们合作。

周恩来着重指出，伊斯兰教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这表现在伊斯兰教将军的部队的内部关系方面。这些部队的指挥官是伊斯兰教徒，而普通士兵则是汉族人。对伊斯兰教部队我们目前采取的政策是：先是保存，后是逐步解散。我们无论如何不准备将他们建成民族部队。这一点只能在对他们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工作以

后，才能提出来。

对内蒙古的政策

周恩来在讲到傅作义时说，显然他属于西北军阀集团，但他的部队里大多数是汉人，不是少数民族。为了高价将北平和平地出让给我们，现在他正和我们讨价还价。

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的内蒙政策很容易被当地的蒙古居民接受。高岗曾受特别委托到蒙古去过，他因党组织所犯的错误，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错误在于对当地的蒙古亲王和喇嘛采取了“左”倾路线，没收了亲王上层人物的土地，至今他们手中没有大权和武装力量。可是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条件下可以让亲王参加蒙古地方政府，特别是那些年轻贵族的代表，我们还了解到，甚至有些年轻亲王还参加了共产党。现在内蒙有资格成立自治区。

国民党海军

蒋介石的海军基地在台湾(省长陈诚手下有 2 万人的部队)、福州、广州。海军有 271 艘舰艇，都是美国送的。

从接下来关于海军问题的谈话中得知，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没有一艘海军战舰，也没有一艘战舰转向他们一方。

国民党部队

接下来周恩来对各条战线的国民党部队作了一番评述。他说国民党的主力在上海—芜湖—南京战场。这里集中了约 58 个师，约有 38 万人。蒋介石尚未撤退，但已经准备由此向南，朝汉口和南昌方向逃离。这个战场的总司令是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将军。

国民党部队的第二战场在汉口地区，由白崇禧将军率领。有 32 个师，近 21 万人归他统率。白崇禧也准备通过长江撤到南方。

国民党部队的第三战场在西安地区，由胡宗南统率，有 36 个师或 19 万人。

蒋介石就依靠这些部队，总共 120 个师或 80 万人。因此，如果我们投入 181 个师即 200 万人打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经不起我们攻打的。

对国民党领导人(宋子文、张治中、邵力子)的评价

谈到宋子文，周恩来说，他在广州避风头，因为他不是军人，对我们来说不构成很大的危险。我们知道，他准备逃往美国。他充分利用自己的职位大发横财。蒋介石对他不满，因为他没有完成在南方组建 6 个师的任务，而我们则在海南岛建立了游击区并在那里控制了 5—7 个县。我们在江苏、安徽和浙江等省都有游击基地。

在评价张治中将军时，周恩来说，他当然是蒋介石的人，但正义迫使他改变；虽然他是蒋介石的亲信，可是他脑子非常清楚，他不能不看到新生力量的必然胜利。1927 年蒋介石实行反革命政变时，他离开了蒋介石并公开声明，他不会反对共产党。日本投降之后，他在支持蒋介石的同时又重申了这个声明。他考虑到苏联的力量，知道苏联是不好惹的，所以

一直讨好你们。在与共产党谈判时蒋介石利用了他的“亲苏”情绪。我们知道张治中急切想去兰州，其目的是在那里拼凑自己的力量，与我们联系，为自己在即将建立的联合政府中留个位子。他能否参加联合政府要看他是否肯交出自己的部队。如果交出，我们把他作为投诚我方的人员吸引过来。我们对他不抱幻想，我们知道，他是正统的国民党分子，如果他转到我们方面，可以预料，他将成为吸引不满分子的核心。应该注意，这个人千方百计想在苏联心目中造成良好的印象。

原驻苏大使邵力子比张治中好些，但也是蒋介石的追随者。他对苏联有些了解，但总的来说，摇摆不定。

我们与新疆民主团体没有联系。当时在新疆的共产党人都被盛世才逮捕了。现在我们派了一个不大的党员干部小组去那里工作。

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

提到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时，周恩来说，我们没有统一的后勤部和军需部，我们准备进行整顿。首先从统一军事工业开始。1948 年起军事工业才开始发展，且主要在东北。军火弹药工厂主要在沈阳和太原。我们现在生产炸弹、炮弹、炸药、山炮、机枪和榴霰弹。弹药最主要由沈阳的军火工厂供应。与过去几年相比，弹药生产增加了 50%。有些弹药我们从北朝鲜得到。

我们现在约有 90 万支步枪，5 万余支轻机枪，约 8 万挺重机枪，约 6 万支自动机枪，1 万多门加农炮和 6 000 多门迫击炮。我们现在缺少山炮和高射炮，高射炮我们仅有 108 门。因此我们希望苏联能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或捷式高射炮及弹药，以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

人民解放军的军需申请

周恩来说，我们感到缺少大量的反坦克炮，总共只有 150 门，因此请苏联供应我们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坦克的情况也不佳。现有的坦克大部分都是轻型的，最重的只有 15 吨。在徐州战役中我们缴获了 70 辆坦克，大多数都受损严重。原料也缺乏，我们想从苏联进口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我们还希望苏联派遣专家，供应生产武器的设备，同时希望派遣组织军队、组建军事院校、建立后勤部门（包括军事工业方面）的顾问。

我回答说，原则上我们同意在组织武器生产、派遣顾问等方面给予帮助，至于高射炮和反坦克炮我还不能表态，我将汇报给莫斯科进行研究。

周恩来继续说，他们希望从我们这里得到钢轨、汽油、约 5 000 辆汽车和其他一些物资。对此我回答说，这些申请要向我们的政府提出。

人民解放军的情报工作

在会谈中周恩来强调说，在对军事战役的领导中，情报工作特别是无线电截听非常重要。在这方面与国民党相比，我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周恩来说，我们能破译国民党，甚至美国的密码。

关于组织军事部

关于组织军事部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的打算是，在军事部中安排共产党员，可能军事委员会中会有部分国民党将军，这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而已。周恩来说，所有的军事问题将在不久以后北平召开的中共中央第二次全会上讨论。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25－30

№34394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1949年2月2日)[①]

绝　密

急　电

И. В. 斯大林致 А. И. 米高扬的电报(№0830)

(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

米高扬：

现把我们对毛泽东所提一些问题的答复转告给你，并把对其他问题的答复推迟到你返回莫斯科之后。请让毛泽东知晓我们的答复。

第一，在对各种情况进行仔细的分析、在对中国同志的看法进行了解之后，我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应急于成立联合政府。在组建政府之前，应当认真地在所占领的地方清除国内外的敌对分子，加强自己的干部，把部队和军事装备运达人民解放军的前沿阵地。这需要时间。究竟需要多少时间，应当由中国同志自己决定。

第二，中国同志通报说，中国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是比南京更适合的首都，这对我们来说是意外的，也是令人感到高兴的。当然，从战略上来说，相比南京，北平是更适合的首都。如果中共和民主党派的领导人认为北平较适合的话，那么就应把北平作为首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都。若干年后，如果形势需要的话，可以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第三，我们把罗申派往广州是为了进行侦察，以便他可以经常向我们报告关于长江以南局势的情况，以及国民党上层及其美国主子的情况。这对我们和你们来说都是有益的。美国人和英国人把一些次要的人员派往了广州，因为他们对广州的局势原本就是了解的，他们没有把自己的大使派往广州，因为他们想把这些大使派往中共的地区，当然，是作为自己的情报人员派去的。我们了解的事情就是这样。

第四，我们欢迎中共对所有在华的国外间谍机构和领事机构，对文化、医疗、电报、广播、报纸及其他机构采取的施加压力的政策。为此我们愿意取消苏联在华的各类似机构。

如果能从中国同志那里得到对苏联机构的一些相应的具体的建议就好了。

第五，关于其他问题在米高扬返回莫斯科后进行答复。

斯大林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76

№34395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等

（1949 年 2 月 2 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2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夺取大城市后出现的问题

向您通报关于工会工作、青年和妇女工作问题。

在会谈中，毛泽东抱怨说，在夺取大城市和大片的领土之后出现了许多棘手的问题。

比如，在解放区流通 9 种货币。必须把它们统一起来，但对这件事非常不了解，更不要说，由于缺乏纸张，来不及印制货币。

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反对投机、怎样稳定价格,该怎样实行票证制度。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他们都希望得到我们的帮助。

我指出,拥有正确的货币体系和银行机构,对于管理经济都是重要的,并且表示,我们愿意派遣货币和银行体系方面的专家提供帮助。

关于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关于罢工

我就此指出,必须关心工人的需求。工人希望新政权能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在此方面共产党应帮助工人。

不应禁止罢工,否则中共会失去工人的信任。

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意义不是由其数量决定的,而是由于它是一个新的阶级——拥有最先进的思想,未来都取决于工人阶级,它将不断成长,在社会中的意义不断增长,而其他阶级的影响将不断减少。

没有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的领导,农民的革命运动不可避免地会走向反动,成为资产阶级的工具。

毛泽东没有对此表示反对,他满意地强调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有的,在这里没有竞争者。在这方面,蒋介石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

在城市则是另一回事。在这里,如果说共产党在大学生中有强烈的影响,那么国民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要比共产党大。

比如,在上海,在战胜日本之后,当共产党合法活动之后,它对50万工人中的大约20万有影响,其余工人则站在国民党一边。

关于对工会的领导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在中国,工会工作由谁领导,毛泽东除了指出工联主席陈云之外,还指出了他的副手李立三。在这一问题上他指出,李立三在过去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有自己的派别,但现在的表现很好。托洛茨基主义者目前在我们这里没有任何的影响。

我说,在对工会的领导中,应当支持那些完全忠于党、同工人紧密联系的干部,不能允许一名托洛茨基主义者担任工会的领导。他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表现良好,这一事实证明不了什么,因为中国革命现在处于高潮。

一旦出现谁都无法保证避免的困难,托洛茨基主义者就会利用工人中的落后分子,用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现在不能让国民党在工人中取得这样的优势。

如果共产党能够在农村基本上取得独一无二的地位,那么它就更加能够,而且应该在工人中得到独有的影响,并把它们中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国民党头子排除在外。

这部分谈话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们没有反驳,并且觉得,这是中共最大的弱点。

……①

---

① 收集的档案中缺页——编注

中国革命的整个过程要求共产党人转向城市，一刻也不要耽搁。

我们联共(布)中央和斯大林同志本人将以自己所有的威望来帮助中共，帮助他们改进对城市的政策和对工人阶级的政策。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77－80

№3439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提供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等

(1949年2月2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在1949年2月2日致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武器弹药和军事专家的请求)

斯大林同志：

2月1日晚上，根据毛泽东的委托，周恩来和朱德用3个小时向我通报了军事问题。

我将把这些信息带回莫斯科。

总的来说，他们的请求归结如下：

1. 我们能否向他们提供一定数量的日式、德式和捷克斯洛伐克式的高射炮和炮弹，以便保卫北平、天津、沈阳和其他城市。现在他们有108门高射炮。

2. 我们能否提供一定数量的反坦克炮，他们现在共有150门反坦克炮。

3. 派遣专家并援助一些设备，以便生产武器。

4. 在商品流通中列入一些原料，其中包括用于生产弹药的三硝基甲苯。

5. 提供一些顾问来组建军队、军校，来组织后方，其中包括军事工业。

我回答说，我们在原则上同意对武器生产的组织提供帮助，并提供顾问，关于提供高射

炮和反坦克炮的问题无法答复,我将向莫斯科报告,进行商议。

米高扬

2月2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81-82

№16469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问题

(1949年2月2日)

绝 密

1949年2月2日白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向我详细通报了中国解放区的经济政策问题。

对方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我方有И. В. 科瓦廖夫和Е. Ф. 科瓦廖夫。

任弼时把他报告的经济问题材料分为四个部分:(1)财政;(2)商业;(3)工业;(4)农业。

一、财政

征税

任弼时在谈到解放区的财政状况时说,解放区有2.09亿人。纳税人是1.84亿人,其他人不纳税是因为他们住在与国民党的交界地区,或者住在刚刚解放的地区。有548万人(成年人)从事非生产性劳动,占纳税人总数的3%。

我们渡过长江以后,任弼时说,纳税的人数将会大大增加。从事非生产性劳动的人数将达到600万人。在从事非生产性劳动人的人员中有400万是军人以及对其提供服务的机关的人员,有200万人是党政机关干部和其他干部。工人不包括在这个范围内,这是可以理解的。正如以上所述,从事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人数的比例是在3%左右。如果超过这个百分比,我们就不能弥补开支。我们觉得,人民的纳税负担还很重,但是战争的需要使我们增加了开支。

他们认为,由于解放区的基本纳税人是农民,他们每年要从平均年收成的200公斤左右小米中拨出30公斤上交(按人头计算)。

谈到征税问题,任弼时说,他们过去采用累进税,现今,随着土地分配的实行,正在采用

级差税。在实施级差税的过程中，要估算近5年来的经济总收入和平均收成。税收按实物计算，以小米的价值为计量单位，以粮食、纺织品和牲畜(很少情况下)交税。一般来说，很少用肉来交税，因为畜牧业不发达。给士兵的肉的定量很少，每人每月500克，东北是800克，油每天2克。中国士兵的配给量实在太低，一个美国士兵的开支可以养活20个中国士兵一年。

税款收入项目有农民税——59.50%，商业税——13.9%，企业收入——19.8%，战利品收入——8.6%。他们认为，解放区现有的税收较高，比国民党的税收稍低一点。解放区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的城市税收低好几成。烟草、盐、火柴等物品的间接税收开展得还不够，因为他们现在才开始抓城市经济。

总的来说，解放区纳税人负担比国民党统治区要轻些。任弼时说东北的烟草税收是其价值的50%，而国民党统治区是80%。国民党地区盐的税收是其价值的10倍以上。

任弼时说，近几年来他们顺利地对酒类实行了垄断，他们准备对盐和烟草也实行垄断。

预算

任弼时说，预算收入我们是根据小米的价值，而不是根据货币来计算的。1949年国家的所有开支是1 500万吨小米，而收入是1 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即亏空2.5亿美元(根据实际时价)。用小米计算的方法只在解放区，不在国民党地区实行，而且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小米被认为是较为稳定的货物。

他们认为预算赤字的弥补可以通过下列3种来源实现(没有说明来源多少和来源种类)：

1. 增加城市的税收；
2. 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内债收效不大)；
3. 借外债(他们笑着说，在美国无法借到外债，只有向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发行了4次纸币。几乎每个解放区都发行了纸币。结果在华北解放区纸币发行量增加了4倍，在东北增加了25倍。因此物价飞涨，例如在东北物价提高了7倍，华东地区6倍多，西南地区8倍。

我提出了他们如何看待国民党货币的问题，任弼时回答说，国民党地区流通两种纸币：老法币和1948年8月19日实行货币改革以来流通的金圆券。根据国民党的法令，从1949年1月1日起法币停止流通，金圆券作为合法的纸币。起先，金圆券的汇率是1美元等于4金圆券。现在金圆券大大贬值。我们储备金圆券，任弼时说，是为了在国民党地区购买我们必需的物资。

国民党地区的价格波动得很厉害。货币改革到现在价格涨了1 250倍。国民党地区发行金圆券是为了榨取人民手中的黄金，但是众所周知，他们没有达到目的。

任弼时重新回到解放区的货币流通问题，他说，过去几乎所有的解放区都发行了八九种纸币，而且几乎在每个解放区，这八九种纸币又分成不同地方流通的纸币。当然，这对人

民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948 年 12 月通过了将解放区(除东北以外)流通的纸币兑换成解放区统一的货币——人民币的决定,这个决定已经实施。换算的方法是:山东省一个新元换算 100 旧元,西北地区一个新元换算 2 000 旧元。这样换算所有旧币需要 284 亿新元。如果上述的预算赤字得不到弥补的话,那么新元的发行量应该是 1 000 亿元,即新元将贬值 2/3 以上。他们认为,尽管解放区纸币价格下跌,但是解放区的下跌的程度比国民党地区小,人民还乐意接受。

由于必须发行纸币,他们感到缺少大量的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 1 万吨纸张,其中 7 000 吨自己生产,3 000 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二、商业

任弼时说,他们准备没收四大家族和大买办的商业企业,虽然他们尚不清楚这些企业的数量。他们只知道,他们的企业在天津、青岛和北平,属于谁的,数量有多少不了解,但知道宋子文在天津的纺织厂有 32 万个纺锤。

我问,他们是否有对官僚资本实行国有化的计划。任弼时回答说,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因为他们还没有资料,要没收哪些企业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大银行、大工业等)。

谈到对外贸易时任弼时说,如果说直到前不久他们的对外贸易仅仅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话,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使对外贸易服务于恢复经济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目前解放区正在通过东北与苏联、朝鲜和香港(通过大连港和北朝鲜)进行贸易。仅仅在 1947—1948 年,各种货物(主要是粮食、肉类、蛋类)的出口量就达到 59.8 万吨,占总出口量的 58.6%,而进口额是 293 亿东北元,64%进口货物用于军需,铁路和工业设备占 8%,民用需要占 28%。1948 年解放区进口了 3 000 台机器。

任弼时说,解放区的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将运往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只有它们不感兴趣的商品才供给资本主义国家,调换所需的货物。他们需要进口的商品的金额很大,这些金额可以用自己的商品换取。1949 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 25 万吨、植物油 5 万吨以及煤、盐、丝绸。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我们感兴趣的商品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在现在的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任弼时举山东省为例来说明 1949 年有些解放区准备出口的商品。1949 年上半年山东省各种出口商品的总额将达到 660 万美元。出口品种:花生油——28%,烟草——14%,黄金——11%,其他商品是粮食、鬃、海货和淀粉。

此后任弼时说,他们打算垄断外贸,主要的商品交易通过国家组织进行,在大的港口城市也允许进口业务通过私营企业进行,但必须在国家的监督下。在初期他们不准备签订国家之间的商业合同,只进行部分的贸易业务或易货业务。他们请我们派遣顾问,帮助进行外贸工作,因为他们担心犯错误。

我问,他们打算何时实行外贸垄断。任弼时回答说,很可能要在联合政府成立之后。

在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进行贸易的原则方面,我说,应该与莫斯科六国会议上达成

一致的原则相符。

三、工业

然后任弼时转到对中国解放区工业的评述。他说，根据约略的计算，全中国的煤蕴藏量为2 650亿吨，铁矿蕴藏量40亿吨。煤和铁主要在东北、华北和西北，这些地区都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东北的铁矿蕴藏量占全国的78%，山西煤的蕴藏量在占全国的51%。我们觉得，我们掌握了全国80%的煤和75%的铁。

1948年我们在东北开采了4 000吨铁矿，在华北开采了1.6万吨。① 1949年我们计划在东北、华北和华东开采更多的铁矿和煤。

我们手中掌握了77万多个纱锭，即全国纱锭的15%。我们拥有1.18万台纺织机，占全国纺机的23.9%。

过去东北每年的铁矿开采量为200万吨，而现在是15万吨；②过去煤的开采量为2 600万吨，而现在是1 000万吨。

全国森林面积的3/4(33亿立方米)在东北，日本统治时期开采了600万立方米。今年准备开采350万立方米森林。

任弼时强调指出，在国民经济计划中他们很重视东北，想把它变成全国武器装备的生产基地。东北应该能生产汽车、飞机、坦克和其他类型的武器。同时他还说，在发展东北工业的工作中他们希望得到苏联的援助。他列举了下列几种援助方式：

1. 建立苏中经济联合体；
2. 向苏联借款；
3. 向苏联提供租让企业。

任弼时说，开采沈阳、锦州附近以及热河省的稀有金属如铀、锰、铜和铝等需要苏联的援助。以前被日本人夺走了1吨铀。如果苏联对这些矿物感兴趣，我们可以提出共同开采或者租让给苏联。

任弼时强调说，开发东北工业需要业务水平较高的专家。在鞍山冶金联合厂他们只得利用日本专家。因此，任弼时说，我们请求苏联为我们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方面的专家。

四、农业

任弼时简要地叙述了解放区的农业状况。他说，1948年粮食种植面积是3 500万公顷，收成是4 120万吨，如果按农业人口1.07亿人计算，每人平均3亩(1/16公顷)地的播种面积，每亩的收成为245公斤小米。

任弼时说，华北是主要产棉区，有1 200万亩棉花地。1948年棉花种植面积为62万公顷，1949年为75万公顷，据我们平均统计，1公顷地可生产240公斤棉花。

---

① 原文如此。——编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任弼时强调指出，棉花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具有重大作用。棉花缺少，我们只得从美国进口。例如我们一年要从美国进口到上海30万吨棉花。

对此我说，棉花的确在国民经济中有着重大作用，但是从美国进口不合适。中国应该在棉花生产方面独立自主，做到自给自足。任弼时表示完全同意。

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棉花的产量增加到1.8亿公斤。

在讲到东北的农业时，任弼时说，1949年他们计划将该地区的农业收成提高12%。

他们设想1949年在下列各地粮食作物收成达到：华北——1 185万吨，山东——610万吨，东北——1 400万吨，察哈尔—热河省——260万吨，共计3 430万吨，[①]比1948年增加250万吨。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31 - 38

№34397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大城市和提供武器弹药的问题

(1949年2月3日)

绝　密
急　电

И. В. 斯大林在1949年2月3日致А. И. 米高扬的电报(№0862)

(关于对大城市和脱离群众的担心、关于武器弹药的请求)

米高扬：

请把这封电报的内容转告毛泽东。

第一，我们非常高兴，中国同志获得了大多数农民和大学生的支持，但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得到工人阶级大多数的支持。其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很少同大工业中心打交道。

① 原文如此。——编注

无论如何都应消除这种不足。大城市应该成为共产主义的基础。不仅不需要害怕大城市，而且相反，应努力尽快夺取它们，并将其变为自己的堡垒。工业化是中国独立的基础，而如果没有掌握大城市和其他的工业中心，就不可能有中国的工业化。

根据马列主义的重要原则，若没有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共产党人就不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并对其进行领导。需要在工厂、铁路组建工人共产党员及共产党的同情者小组。需要打开门户，接受劳动知识分子中可靠的工人和职员加入共产党。需要不通过罢工或者借助罢工帮助工人改善自己的物质状况。需要颁布劳动法，并对工人的生病、伤残和年迈进行保障。工会领导人应是经受考验的共产主义者，是在困难的情况下不抛弃共产党员的这样一些人，并将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的立场上。工会应当掌握在共产党人的手中。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有助于你们获得工人阶级的支持。

在制定劳动法方面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第二，无论怎样都应获得工农青年的支持，掌握妇女解放运动。在青年工作方面可以建立类似“青年爱国者联盟”的组织，在妇女运动方面可以组建“妇女民族联盟”这样的组织。

第三，当俄国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时候，他们比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人更不善于管理大城市和国家。但是，俄国共产党人在2—3年内就从工人、农民、劳动知识分子、青年军官中培养出了自己的干部、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就掌握了对国家的管理。

俄国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于，苏联工业、金融、农业、铁路、管理机构中9/10的干部或者都由原来的工人和劳动知识分子组成，或者来自于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子女。我们认为，在培养中国自己的干部的工作中，我们的经验是适合你们的。需要把更多的工人、农民及其子女，把青年军官送往学校或者送往对工业、农业、运输业、金融业和大城市等进行管理的特别的学习班进行学习。如果你们没有这样的学校，需要尽快建立。我们可以帮助你们。

当然，最初的时候俄国专家会帮助你们管理好国家。但俄国专家只是沧海一粟。你们需要千千万万中国自己的干部。没有这样的干部就不能管理国家。你们赢得了战争的巨大胜利，但如果没有中国自己的干部，你们无疑会失去中国。如果需要，我们可以接受你们的一些人到我们的学校学习各类专业。

第四，我们现在没有国外生产的高射炮和反坦克炮。如果中国共产党人希望的话，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一些俄国生产的高射炮、反坦克炮和反坦克武器。至于组织军事工业，我们会尽量帮助。三硝基甲苯我们可以送给你们。

斯大林

1949年2月3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83 - 84

№34398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①

绝　密

И. В. 斯大林致 А. И. 米高扬的电报(№0833)

(关于南京方面把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撤离区运往南方)

米高扬：

提请毛泽东注意如下问题：

根据我们可靠的情报，南京方面正在把银行和其他机构中的国有黄金和其他贵重物品从各撤离区和城市运往南方。最好对南京方面提出一项谈判条件，无条件返还所有这些贵重物品，把其转交给人民解放民主政权。②

斯大林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85

№34399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收悉并执行斯大林的指示电

(1949 年 2 月 3 日)

绝　密

急　电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② 原文如此。——编注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3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0830 和№0833 号电报的执行）

斯大林同志：

您的第 0830 和第 0833 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关于中国同志对苏联机构的建议另行电告。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3 日 19 时 10 分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86 – 88

№3462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对外贸易政策等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3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对外贸易问题、关于向苏联供应食品）

斯大林同志：

毛泽东就对外贸易问题阐述了一些主要的原则，在另外一次会谈中周恩来作了更加详细的阐述，在第三次会谈中，受毛泽东的委托，政治局委员任弼时和朱德详细阐述了他们的实际计划。

他们谈话的主要意思可归结如下：

1. 中国所有出口商品首先向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提供，只有他们不感兴趣的出口商品才向资本主义国家提供，以换取中国需要的商品。

2. 他们需要很大金额的进口商品，这些商品可以用自己的商品进行交换。

3. 今年他们能够向我们提供的商品要多于已经从满洲提供的如下商品：各种粮食和大米 25 万吨、植物油 5 万吨以及煤、盐、丝绸。

棉花不能提供,这是由于棉花的生产急剧减少了,国内对棉花的需求很大。

我们感兴趣的商品钨、锡、锑、桐油和茶叶可以在解放华南之后向我们供应,因为解放区没有这些商品。

4. 他们打算对对外贸易进行垄断,主要的贸易活动通过国有组织进行,但也允许一些大城市的进出口贸易通过在国家监督下的一些私人组织进行。

5. 最初不打算签署国家间的贸易条约,这指的是进行单独的贸易和商品交换。

6. 他们请求我们的顾问对对外贸易进行组织。他们担心自己会犯许多错误。

关于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贸易的原则,我说,这些原则与在苏联召开的六国会议协商的原则是吻合的。我通报了这次会议的工作情况。

我拒绝对 1949 年相互供货的清单进行讨论,我说,当他们向我们转达一些具体的建议的时候,我们很乐意对其进行审议。

米高扬

2 月 3 日

АПРФ, ф. 3, оп. 65, д. 606, л. 86 - 88

№16470

米高扬与刘少奇、任弼时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绝 密

1949 年 2 月 3 日白天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和任弼时就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会谈。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И. В. 科瓦廖夫和 Е. Ф. 科瓦廖夫。

关于没收四大家族、帝国主义、战犯的企业及外国企业

会谈一开始刘少奇就说,他们的经济政策首先规定要没收四大家族(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陈立夫)的资产和工业企业。

我问,他们是否有关于四大家族资产总量的资料,对此刘少奇作了否定的答复。接着他说,他们还准备没收帝国主义者和战犯的部分资产。对外国企业,他们考虑实行没收和赎买政策。刘少奇强调说,对外国企业马上实行没收政策有些困难,因此需要逐步进行。

他说，对于外国军工企业，例如在青岛的军工企业，或许我们会较快地没收。对于这个问题，刘少奇说，他们想听听您的建议。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接着刘少奇说，没收的外国企业以及四大家族企业将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范围。谈到英国人管辖的开滦煤矿时，他说，煤矿一年内可以开采500万吨煤。那里约有6 000名工人，今年与英国签订的开采合同到期，因此，英国人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要求帮他们协调煤矿的事，帮助他们把煤运出开滦。这说明英国企图与我们进行经济上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只有在国民党统治的上海才有可能，在我们这里没有可能。

我问，他们是如何区别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和国营企业的。刘少奇回答说，区别在于，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可以包含租让企业，这些企业使用国家的原料，但出产的产品要交给国家。东北有一些私营烟草企业，由于我们实现了烟草垄断，所以全部产品就交给国家。这也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形式。我们将努力通过条约将外国企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如果外国人不愿出卖自己的企业，我们将按照法律采取行动。我们认为，我们应该赎买银行和全长约600多公里的昆明—海峰(Хайфонг)铁路。

我问，是否有外国军工企业。刘少奇回答说，直接生产军火的外国企业没有，但与军事工业有间接关系的外国企业不少，特别是冶金和化工等其他企业。美国在上海的无线电台和从出口到美国的电缆都应归入军工企业。大部分外国企业都应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关于对待买办资产阶级的政策

我问，他们打算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采取什么政策。对此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考虑过，但他们认为，目前对他们要谨慎些，不要过分地触动他们。以后，等到我们壮大了，我们就会向他们发起进攻。现阶段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总政策是：不赶走他们。将来我们占领了沿海的省份，我们的干部成长了，国内的总形势明朗了，我们将对民族买办资产阶级发起进攻。到那时候，我们会编制一个应予没收的企业的名单。但现在我们认为，对买办资产阶级应谨慎。

刘少奇说，他们将以没收官僚资本为由没收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私营企业，一年半以后就可以提出收归国有的问题了。

我说，对民族资产阶级采用谨慎政策是正确的。暂时不必提民族资产阶级企业国有化的事，最好习惯他们，等政权巩固了，再提出这个问题。我强调指出，政策要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但是目标不变。

刘少奇完全同意我的看法，再次强调，没收买办资产阶级资产的问题还要再考虑考虑。

我问，哪些人属买办资产阶级。刘少奇回答说，官僚资本也属于这个范畴。

解放区的经济成分

刘少奇说，中国解放区的经济中含有5种经济成分：

1. 国营成分；

2. 合作社成分；

3.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4. 私营资本主义成分；

5. 具有自然性和半封建性的小商品经济。

他们认为，小商品经济占最大的比重。合作社经济所占比例不大，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远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例也不大，但会大大发展。他们认为，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达到约10%，尽管它所占比重不大，但是，按他们意见，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将起主导作用。他们把铁路、轮船运输、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列入国有经济。

在对合作化进行评价的时候，刘少奇说，它带有参加者互助的性质。

我问，有没有参加合作社人数的数据资料。刘少奇回答说，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有，也没有领导合作化运动的中心机构。他说，目前合作化具有资产阶级的性质。他们计划召开合作社代表大会作为巩固合作化运动的首要措施。刘少奇说，我们已经制订了合作化决议草案，正在建立培训数以千计合作社干部的学校，在组建这类学校方面刘少奇请求委派有经验的苏联合作社工作人员来校讲课。

刘少奇说，我们正在发展下列几种合作社形式：

1. 消费合作社；

2. 农业合作社(供应和销售)；

3. 手工业合作社。

在解释初级农业合作社形式时，刘少奇说，他们指的是在土地和生产工具私有的条件下最简单的农民共同耕作联合体。

手工业合作社有农村的供销社，也有城市的供销社。

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

刘少奇说，我们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新民主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过渡时期，这个时期比起欧洲人民民主国家的过渡时期要长得多。中国最复杂的问题是小生产者的问题：他们是走合作化道路，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刘少奇强调说，他永远不会忘记列宁的指示：小资产阶级经济是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

我们认为，国内战争结束后我们应该发展经济的各个部门，只限制那些对人民没有益处的部门。因此，我们重点放在发展国营经济上面。同时我们觉得，需要支持个体生产，促使它走合作化的道路。我们也认为，根据形势的发展，鼓励有利于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有益的。官僚资本的垄断经济应该完全控制在国家手中。

我们的目的是用加强经济中的计划成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从时间和斗争的残酷性来看，是一个相当长的阶段。我们也面临着当时列宁提出的谁胜谁负的问题。

我们估计，向我国经济领域中的资本主义成分全面进攻需要等上10—15年，然后我们将把工商企业交到国家手中，以此加快中国向社会主义前进。

刘少奇说，只有在农业拥有工业基础的条件下，我们才能考虑将农业纳入社会主义轨道。

国营商业

商业问题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有国营商业，而且它在农村地区几乎占据垄断地位，但在城市它才刚刚出现。我们对国营商业管理得不好，国营合作组织和商业组织之间出现了竞争，而国营组织、合作商业组织与私营商业企业之间出现了一些不良交易。

我们认为，部队工作人员的供应要实行票证制，同时要调整价格，采取措施将私商挤出商业领域。

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下建立工业基础

没有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在解放了的中国建立工业基础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帮助应对我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想，这种帮助的形式可以是：

1. 传授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的经验；

2. 提供相关的书籍，派遣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3. 向我们提供资金。

我们认为，苏联、人民民主国家和中国应该在经济方面相互帮助。有了苏联的帮助，刘少奇说，我们会很快到达社会主义。当然，我们不要犯错误。我们很清楚，没有苏联的帮助，我们不能恢复东北的鞍山联合企业。因此我们想预先了解苏联可能提供援助的规模，以便在我们的国民经济计划中考虑到这种援助。

经济建设的错误

在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中，我们尚未克服自发性和无计划性等重大错误。我们经济工作干部的业务水平不高也是缺点。在执行经济政策时，我们的干部把城市的商业企业分给工人，工人们将企业拆分当做商品卖掉，这样的错误不足为怪。实行土地改革时，我们有些人采取了对地主清算的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现在已被禁止。

我问，在土地改革中得到土地的农民占多少比例，刘少奇回答说，解放区约有50%农民得到了土地。土改后封建制度受到了破坏，农民的政治积极性大大提高。农民感到，他们有自己选举出来的、信得过的政权。这个政权给农民提供农业贷款和免费教育。

刘少奇回到1947年年底在土改中所犯错误的问题，他强调说，有些干部把中农划为富农，没收了他们多余的资产和土地。受非法伤害的富农有4%—5%，地主有1%—2%。

刘少奇说，应该区别对待新老解放区的富农和地主。在老解放区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资产，没收了富农的多余土地和资产。可是还给地主和富农留下与农民同样份额的土地和资产。

老解放区全部实行土地改革，而新解放区里只是部分地区进行土改。在老解放区周围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在今年秋季进行。在不久前国民党统治地区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过两年进行。在新解放区目前实行减租减息政策。

在谈到关于城市中的经济政策的错误时，刘少奇指出了提高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

资的错误政策。结果,我们要求私营企业主提高工人工资,他们就把店门关闭,工人就失业了。在纠正这一错误的过程中,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该这样处理与私营企业主的关系:既要有利于国家,又要有利于企业主。这些错误我们正在改正,但是必须直截了当地说,这些错误说明了一种危险倾向。首先,党内有一些人认为,应该尽量发展资本主义,依靠资本主义。实质上,这意味着对资本主义成分的让步,对资本主义投降。这部分人想把中国建成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即恢复半封建的资产阶级制度。其次党内有些有"左"倾倾向的人,他们倾向于冒险地、匆忙地建设社会主义。这种倾向表现在,某些人不考虑我们的能力,制订了毫无根据的计划。结果这些倾向损害了工农联盟。刘少奇说,必须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斗争,我们请苏联为我们提出这方面的建议。

关于土地国有化

对于是否考虑过土地国有化的问题,刘少奇回答说,这个问题得再考虑考虑。现在我们准许土地买卖,虽然我们清楚,如果不限制这种买卖,那就会让资本主义抬头。在实行土地改革的时候,刘少奇说,我们没有触动原先的富农,这些富农从性质上讲与地主没有什么区别。这里有一种危险的趋向:由于把土地分配给了农民,并使他们有权买卖土地,这就会滋生新型的富农。

关于币制改革

我问,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准备在解放区推行币制改革。刘少奇回答说,要在他们占领全国一年之后进行,暂时他们打算使用现有的纸币。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39 - 46

№16471

米高扬与毛泽东等人会谈纪要:中共历史问题

(1949 年 2 月 3 日)

绝　密

1949 年 2 月 3 日晚上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朱德,翻译师哲也参加了。我方参加会谈的有 И. В. 科瓦廖夫和 Е. Ф. 科瓦廖夫等同志。

关于国共谈判中外国调停的问题

互相问候之后会谈开始。我说，我们知道，英国、美国和法国曾同意担当国共谈判的调停人。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他们得知，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反对外国调停。这些大国怕丢脸，改变了自己的立场，放弃了调停。因此，必须认真做好保密工作，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毛泽东再次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

南斯拉夫问题

然后，应毛泽东的请求我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毛泽东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反苏主义者。毛泽东说，铁托就是张国焘，张国焘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是叛徒。

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行动的协调

随后，对于我提出的关于亚洲国家共产党之间协调行动的问题时，毛泽东回答说，对于这一问题他们还没有确定看法。他们支持与印度支那、暹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缅甸、印度、马来亚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我们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的联系比较紧密些，和其他共产党的联系较少，与日本共产党基本上没有关系。与各共产党的所有联络工作都是通过在香港的专门人员进行的，但是工作做得较差。因此，毛泽东说，在这样的条件下应尽早成立像欧洲共产党局①那样的亚洲国家共产党局。这个问题可以在我军占领了中国南方地区，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

毛泽东继续指出，北朝鲜、印度和中国共产党力量较强，其后力量较强的属日本共产党。在谈到日本共产党时，毛泽东说，众所周知，1946年日本共产党政治局委员冈野(野坂参三)坚持错误观点，认为可以通过议会斗争来夺取政权。日共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反对这种观点。最近日本共产党的情况有所好转，虽然日本资产阶级还支持美国，但日本人民中的反美情绪高涨。

毛泽东回到成立亚洲国家共产党局的问题，他告诉大家，据他们所知，暹罗和印度支那共产党表示赞成成立这样的机构。先由几个亚洲国家，不是所有国家的共产党，例如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印度支那共产党和菲律宾共产党的代表建立亚洲国家局比较合适。至于日本共产党，它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分量还不够，而且我们同日本共产党没有联系。关于日本共产党加入这个局的问题，毛泽东说，要事先与其交换意见，得到他们的同意。

---

① 指1947年9月成立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编注

我说，按我党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不应参加共产党情报局，而应建立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有三个政党：中国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和朝鲜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政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对此我作了肯定的回答。然后我提醒说，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暹罗和缅甸这些共产党政治局委员会中有许多美国和英国间谍，因此中国共产党与他们交往时要小心谨慎。毛泽东同意这个意见，然后问道，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的共产党进行联系，我作了肯定的回答。

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

后来毛泽东开始叙述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要问题。他把党史分成四个阶段：

1. 北伐；
2. 苏维埃运动；
3. 抗日战争；
4. 战后的国内战争。

在谈党史的第一阶段时，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是在苏联十月革命直接影响和联共(布)的帮助下于1921年成立的。如果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是在1903年伦敦代表大会形成的，那么我们作为布尔什维克党形成的时间要晚许多，即1921年。我们拥护布尔什维克党和民主集中制的纲领。从1921年到1927年，我们和国民党合作进行了北伐。1924年前，列宁领导的苏联帮助了我们，列宁逝世后斯大林领导的苏联也给了我们帮助。在这一阶段斯大林写了许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当时我懂得不多，但学习马克思主义很努力。虽然中国共产党英勇战斗，得到工农的支持，但是它的基础不牢固。那时以陈独秀为首的机会主义分子掌握了领导权，这导致了这一时期中国革命的失败。1927年8月，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才摆脱了机会主义的领导。

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是1927—1936年。这个阶段，我们吸收了1925—1927年革命失败的教训。在第一阶段(1921—1927年)党员的人数是5万人，而1928年党员的数量缩小到了1万人。党的一些不坚定分子跑到敌人阵营去了，其他人在战斗中牺牲或者脱党了。虽然当时犯了一些错误，但是党在政治上得到了巩固。首先要指出的是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错误在于，他们认为党的对内对外工作都是不正确的。1930年李立三一直坚持这种观点。众所周知，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受到共产国际的谴责。中国共产党相信共产国际，拥护对李立三处理的决定。反对李立三的有任弼时、刘少奇、周恩来。1928年后周恩来和斯特拉霍夫①到过莫斯科，在那里学习了一段时间，开始筹备党的工作。回到中国以后，他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会上李立三路线受到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不同意这个决议，要求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他们的举动使自己在党内的威望大受影响，况且，他们没有革命斗

① 斯特拉霍夫是瞿秋白的笔名。——编注

争和建设的实践经验。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讨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他们反对一切，认为自己是正统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称刘少奇为机会主义分子，因为他是工会运动的领袖，在当时国民党白色恐怖的条件下，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力量，要求作组织上的撤退。1931—1934年党的领导权掌握在这些"左"倾机会主义者手里。他们甚至夺取了地下党组织和苏区的领导权，指责我(毛泽东)是机会主义者，把我当做党的右倾路线代表。

从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1928年)到第七次代表大会(1945年)经历了17年。第六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至今只剩下三个人。其他人是在中共中央第三、第四次全会上增补进中央委员会的，增补的委员中有同王明集团保持联系的非法钻进中央的博古和洛甫。

1930—1931年这个集团发表了小册子，断言说，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起源于他们。后来在我们的批评下，这个集团改正了自己的错误，虽然并不彻底，但这没有影响我们在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把他们选入中央委员会。

1946年博古参加了与国民党的重庆谈判，同年4月他与叶挺和王若飞在飞机失事时遇难。洛甫现在东北。他的主要缺点是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另外他这个人喜欢饶舌。

关于王明，毛泽东说，至今他没有认识到自己过去的错误。我们对他采取怀柔政策，尽力以说服的方法来影响他。毛泽东说，他有资产阶级的习性。抗日战争期间他犯了特别重大的政治错误。中共中央第三次全会后他去了莫斯科，在那里他没有正确地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活动。他硬说，当时我军力量很强大，但实际上还是很弱的。他夸大了党的力量，没有考虑那个时期的具体形势。抗日战争期间，王明主张将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那种地位。他坚持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完成重大的政治任务，转而信任国民党，这在实际上就放弃了中国共产党独立的政治路线。1937年12月他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就召开了武汉会议，1938年3月印发了小册子，号召党脱离中央的领导。值得注意的是，1937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中国，给我们带来了共产国际纲领性的方针，而王明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王稼祥带来的材料对我们非常珍贵，非常有益。这些纲领性的方针有助于我们制订好自己的具体任务。

在继续对党史的第二阶段进行描述的时候，毛泽东说，这时他们还得跟叛徒张国焘和其他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在斗争中以及后来，苏联党的思想帮助了我们。例如，1946年斯大林就军事历史问题给拉辛上校写了一封信，指出撤退也是一种合理的斗争形式。① 但是在我党历史的第二阶段，按"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看法，撤退被认为是机会主义的做法。现在看来，他们犯了极大的错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遵义(贵州省)召开了与"左"倾分子斗争的会议。会议的形势非常不利，因为张国焘带6万人的军队进攻我们。我们并没慌乱，结果消灭了他们3万多人。那时才知道，张国焘是王明的好友，当在莫斯科要求他就这个问题进行解释的时候，他避而不答。

---

① 1946年2月23日斯大林给拉辛的信，见《斯大林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455—461页。——编注

抗日战争前夕我们的武装力量遭受很大的损失,只剩下了3万多人。因此,王明肯定地说,这些力量和日本斗是不够的,坚持要将他们融入到国民党部队里。现在清楚了,这是一条错误路线。正是由于这3万人的骨干,后来造就了目前300万人的人民解放军。

王明的这些错误,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都知道,并引起了代表们极大的愤慨。代表们还知道李立三、博古和洛甫的错误,他们要求不把他们选进中央。可是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中国的局势发生了变化。过去许多曾经犯过错误的人认识到了错误,退居第二线。党内开展了马列主义的学习,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虽然代表大会上有许多争论——是否将王明、李立三、博古和洛甫选进中央,但是为了团结一切党的力量,还是推选了他们。

现在李立三在搞工会工作,他在这方面经验丰富,他对革命的贡献比王明大。他同刘少奇一起在上海领导过工人运动。从苏联回到中国以后,他从未讲过苏联一句坏话,现正在努力使自己不辜负对他的信任。但是,中共中央与王明之间仍有隔阂。

后来毛泽东说,1936年中国共产党拥有4万名党员,其中大部分是在苏维埃运动时期入党的。目前党内已有300多万党员,中央委员44名,候补中央委员33名。

对于我提出的问题,现在党的队伍里是否存在不稳定情绪,毛泽东回答说,当然,还发现有,但在党的领导层里要少一些。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47 - 53

№34400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的海军问题

(1949年2月4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1949年2月4日致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海军)

斯大林同志:

现就海军问题进行报告。

从与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的会谈可以看出，他们对海军船只、港口和基地没有任何概念，在这方面没有任何计划，除了与他们建立了联系的在长江的海军以外。

毛泽东希望，他们能够把在长江的这支舰队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们对这支舰队特别感兴趣，因为在人民解放军即将发动进攻、横渡长江的时候，它将起到很大的作用。他们同海军没有任何联系，连一条军舰都没有，也没有机会使军舰转到共产党一边。

因为他们暂时还没有向我提出任何问题，我只限于获得信息。

米高扬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89

№3440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离开中国的日期等

（1949 年 2 月 4 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4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米高扬离开中国）

斯大林同志：

2 月 4 日晚上结束了同毛泽东就所有问题进行的讨论。这些信息将另外发送给您。对中国人所提问题的答复以及您转交给我的答复可以不经过我通报给他们。2 月 5 日之后，我在这里就没有什么可以做的了，如果他没有给我们新的委托的话。

我打算在 5 日离开这里，应毛泽东的请求推迟了一天。

如果对我们没有新的指示的话，我在 2 月 6 日拂晓前到达大连。

米高扬

2 月 4 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90

№3462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建议米高扬延长访问的期限

(1949 年 2 月 4 日)[①]

绝 密

И. В. 斯大林致 А. И. 米高扬的电报(№0861)

米高扬：

如果局势需要的话，我们建议你不要急于离开并留在毛泽东那里，至少等到 2 月 8 日。

斯大林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91

№3462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延长在中国的访问期限

(1949 年 2 月 4 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4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推迟离开)

斯大林同志：

收到了您的第 0861 号电报，我把自己离开的日期推迟到 2 月 8 日。

米高扬

2 月 4 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92

---

① 该档案未标明时间，这里是根据上下文推测的。——编注

№3440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毛泽东等人对斯大林电报的反应

(1949年2月4日)

绝 密
急 电

А.И.米高扬1949年2月4日给И.В.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毛泽东对斯大林同志的电报的印象)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指出，毛泽东和政治局成员对从你那里得到的电报的内容都非常满意，在整个晚上进行的长时间的会谈中，他们的情绪都非常好。

米高扬
2月4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3

№34621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反对调停情报的泄露和保密问题

(1949年2月4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4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国外对国共的调停、关于保密问题

在同毛泽东进行的会谈中，我向他通报说：我们得知，早些时候，英、美、法企图由自己对国共进行调停。后来，通过某种方式得知，苏联和中共反对国外进行调停，这些国家不想使自己难堪，就改变了立场，拒绝调停。

因此，必须认真地对待保密问题，必须明白，在中共周围是否有一些多嘴多舌的人，通过他们，这一信息会被美国人知道了。

毛泽东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因为，正如他所说，如此大的问题，包括同莫斯科的通信，通常只有在座的五位中央委员、翻译师哲和捷列宾同志知道。这些人是完全可靠的，他不会怀疑他们。

至于这种情况，他说，在得知我们的立场之前，英美就公开表示，苏联和中共反对调停。

我回答说，这可能只是他们的假设，但是，西方大国在得到了关于我们的立场的可靠的情报之后，就匆忙放弃了调停。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①]

毛泽东重复说，不排除的一种可能是，消息是从中共周围的人透露出去的。对此，提请您注意如下情况：在同我单独进行的一次会谈中，周恩来告诉我说，当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时候，那里有一个常驻的美国代表处，其中有情报人员和记者。在从延安迁出之后，在中共中央机关的编辑部里，有一名美国记者同他们一起工作，该记者通晓汉语，娶了一名中国妻子。

我们从捷列宾同志那里弄清了这一事实，捷列宾确认了这名美国人，并指出他的姓氏是李敦白。

用他的话来说，他在美国学了三年汉语，就把汉语学得这么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这是不可能的。令人怀疑的是，他为什么学习汉语，他用谁的钱来到了中国。

捷列宾同志通报说，当时他通过自己这条渠道通报了关于他的到来。

捷列宾同志还通报说，几天前，有一名美国记者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在我们到来的几天前他去了北平和满洲地区。

我们委托捷列宾同志对与李敦白和上述美国人有关的所有材料进行详细的查证，挑选出必要的信息，并向在莫斯科的 Ф. 库兹涅佐夫进行报告，因为这两名美国人很令人怀疑。

米高扬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94－95

---

① 这里的俄文是 Ритенберге，即美国记者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李敦白早期加入美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后期来到中国，1946 年 10 月到延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分配在新华社工作。米高扬离开西柏坡不久，李敦白便被逮捕关押，直到 1955 年才被释放，恢复工作。——编注

№34403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美国人

(1949年2月4日)

绝　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4日致А.И.米高扬的电报(№0927)

(关于中共中央周围的美国人、关于李敦白和А.Л.斯特朗)

米高扬：

该电请向毛泽东通报。

我们毫不怀疑，在中共中央机关编辑部工作的美国人李敦白是一个阴险的美国间谍。我们建议立刻逮捕他，通过他来揭露美国的间谍网。

我们非常确信，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一名美国间谍。近年她多次请求到苏联来，好似是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分子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每次都拒绝了她。事实上她早就在为美国人服务了，是他们的间谍。我们建议今后不要与她接近，不允许她到中共占领的地区。

斯大林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6

№34404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及派遣苏联顾问

（1949 年 2 月 4 日）

绝　密
急　电

A.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4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组建政府的准备）
（关于从苏联派遣顾问帮助组建政府机构）

斯大林同志：

我认为需要向您通报，感到这里不像对组建政府进行了准备。没有任何机构可以成为(政府)各部的基础。这里不包括中共中央各部，它们今后会被保留下来。

尽管组建政府的期限现在有所推迟，但目前中共方面必须着手采取一些准备措施，以便在成立联合政府之前组建一些可以成为各部基础的机构。要让被联合的各党派面临已有这样的机构和准备好的各部骨干的事实，这是必需的。

我是这样考虑这件事情的。

在现有的军事委员会(与我们的国防委员会毫无相同之处)之下组建一些关于国家各领域工作的部或局。

这些部或局的领导人应该是共产党，他们应被任命为未来的部长，如果部长为其他党派的话，共产党人应为副部长。在一个月内从苏联派遣顾问为这些部门的组织提供帮助。这需要事先挑选一些共产党员，以对国家的工作进行领导，应有几个月的时间来熟悉他们的新工作，应从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挑选可靠的干部，这不必都同其他党派进行协商。但如果在联合政府组建之后再进行这项工作的话，就不可避免地要同他们进行协商。各部应在北平组建。

是否要向毛泽东提出这一问题，请指示。

第 76 号电

米高扬
2 月 4 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97

№34406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对南斯拉夫的看法

(1949 年 2 月 4 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4 日给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关于南斯拉夫问题)

斯大林同志：

昨天，2 月 3 日，在应毛泽东的请求同他举行的会谈中，我根据在莫斯科规定的精神阐述了南斯拉夫问题。

毛泽东只是询问，南斯拉夫人是否在妨碍欧洲的共产主义工作。

我回答说，他们是不会妨碍的，因为他们已被完全孤立。各共产党无一例外都反对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者—反苏主义者。

米高扬
2 月 4 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99

№16472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关于民族和对外关系问题

(1949 年 2 月 4 日)

绝　密

1949 年 2 月 4 日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

少奇、任弼时和朱德以及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 И.В.科瓦廖夫和 Е.Ф.科瓦廖夫。

民族问题

我转告毛泽东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通过让少数民族独立而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

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

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 300 万人,而外蒙古只有 100 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新疆问题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毛泽东说,隶属于乌鲁木齐政府的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那里有共产党。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 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

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关于新疆的铁路建设

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共同防御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的联系问题。

他强调说，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的全面援助。我们需要两方面的顾问：经济方面的和财政方面的。

我回答说，И. 科瓦廖夫同志是苏联部长会议经济问题的特派代表，他的工作范围包括东北和华北。我补充说，他完全听从毛泽东同志的指挥。虽然他名义上属于中长铁路的编制，但实际上他的活动遍及全中国。

毛泽东对 И. 科瓦廖夫同志将听从他的指挥表示感谢。他继续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迁到北平以后，我们的关系将在党和外交这两方面发展。他希望在苏联大使馆里有党务工作的顾问。

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党务工作顾问时表示，希望他能更加接近中共，以便可以经常同他交换意见，虽然对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会直接与联共(布)中央联系。就像周恩来所说的那样，“主要问题应在莫斯科解决”。

关于驻苏大使候选人

关于周恩来提出的问题，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将定期和短期派人到莫斯科，以便得到相关的建议，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王稼祥作为未来的大使将在那里负责日常工作。

毛泽东在评价王稼祥时说，过去他与王明集团一起犯过错误。1937 年在莫斯科治病，并担任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 年 7 月他带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到我们这里。这些指示与我们的政治路线是符合的，有助于我们克服错误。

关于苏联的援助

毛泽东强调说，苏联过去和现在都给中国共产党巨大的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非常感谢联共(布)。毛泽东继续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必须服从整体利益。每当我们求助于苏联的时候，我们始终考虑到这一点。如果苏联无法援助我们，我们也不会有怨言。在去莫斯科前，罗荣桓问我，如何向苏联提出援助的问题，我对他说，不

应把自己的处境说成一筹莫展、束手无策。但也要强调,说我们希望得到你们对东北的援助。1947 年起林彪经常向莫斯科提出这样和那样的援助。毛泽东说,我指示高岗,苏联援助的一切一定得偿还,除此之外,还得靠国民党地区解决某些物资缺乏的问题。中国的同志应该合理地使用苏联的援助。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我们未必能取得今天的胜利。但这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否认这样一个事实,你们对东北的军事援助占苏联对我们全部援助的 1/4,这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于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

以后毛泽东把问题转到与国民党政府谈判方面。他说,中国共产党不同国民党谈判,而是同国民党政府谈判。这是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新现象。我们应当同政府达成协议,毛泽东强调说,而不是同国民党达成协议,因为同国民党的谈判会提高其在舆论界的威望。将来国民党将解散,假如我们现在承认它是谈判方,它必然会觊觎未来联合政府中的地位。现在我们加强宣传,目的是揭露国民党,以后解散国民党,像当年列宁召开立宪会议和解散立宪会议一样。

毛泽东说,我们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八项条件。这些条件都是谈判的基础。如果国民党员同意我们的第一项条件,我们就委托他们抓捕战犯。我们的条件中规定改编国民党军队,成立没有反动分子的政府,废除国民党的法律,特别是废除关于国民党地位的法律。当然,国民党员在与我们谈判过程中会坚持要参加政府,但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都会反对。现在不会有人再保护国民党。它已不能独立成立联合政府,实际上,国民党已经陷入孤立的境地。甚至美国、法国和英国都公开反对它。这样的局势客观上有利于我们。关于个别国民党的领导人,像白崇禧,我们可以利用他来为我们的利益服务,但他的军队必须完全消灭。

毛泽东说,许多人认为,战犯名单的公布会使我们孤立于其他政治党派之外,但我觉得,这张名单会给国民党有力的打击。面对这张名单,他们不敢联合起来,担心自己的性命。譬如说,白崇禧声明,他赞成与我们谈判,李宗仁也坚持这个立场,他准备派代表到我们这里来。众所周知,傅作义向我们交出了部队。我们把他当做战犯。如果他协助我们改编这些部队,我们可以对人民说出谅解他的理由。

关于张治中,毛泽东说,我们没有理由把他归入战犯名单,虽然他是蒋介石信赖的人。

谈到与国民党政府的谈判策略时,毛泽东赞成中断与中央政府进行的总的谈判,支持地方谈判。对待国民党要采取分散打击的办法。我们知道,原驻苏大使颜惠庆准备到北平进行和平解放上海的谈判。毛泽东说,这一切说明国民党屡次遭到失败,许多国民党地方政权已经开始独自与我们联系。例如,当傅作义与我们谈判时,北平派来了一个 10 人代表团,其中有市长、CC 派分子何思源和立法院成员。我们友好地接待了他们,他们对此非常满意。

回到张治中的立场问题,毛泽东说,有关他以及与他类似的人的问题是:该不该把他们吸收过来。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就是说他们背叛了国民党,可以吸收。譬如,如果张

治中向我们交出了部队，那可以考虑吸收他进入我们的政权机关。如果邵力子转到我们方面，我们也可以考虑，让他参加未来联合政府的工作。但是，毛泽东强调说，这些人不得人心，人民不喜欢他们。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

接下来毛泽东转入关于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问题。参加委员会的 23 个组织名单尚未公布，但已与有关党派协商过。名单中有下列组织：

1. 中国共产党；
2. 人民解放军；
3. 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4. 民主促进会；
5. 中国民主同盟会；
6. 救国会；
7. 第三党(工农民主党)；
8. 上海民主促进会；
9.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
10. 中国民主改造协会；
11. 中国工会代表大会；
12. 中国农民联合会；
13. 中国青年组织；
14. 中国大学生联合会；
15. 全国妇女联合会；
16. 中国民主人士联合会；
17. 上海工业企业联合会；
18. 教育工作者；
19. 无党派人士代表(郭沫若)；
20. 少数民族代表；
21. 中国东南亚华侨代表(陈嘉庚等)；
22. 美国华侨代表；
23. 孙逸仙研究会。

上述组织和团体选派 3—4 人参加筹备委员会，但不管代表人数多少，每个组织只有一席投票权。委员会里共产党员将有 9 名，共产党的支持者 5 名，中间分子 4 名，民主人士 5 名。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产党员占 2/3 席位。筹备委员会在 3 月初召开，准备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名额和会议的日程。政治协商会议上将讨论两个问题：一是通过共同政治纲领；二是成立联合政府。

接着毛泽东说，在筹备委员会召开会议之前他们在民主人士中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

我们向他们公开解释我们的政策(对外政策、土地政策、对内政策等)。他们喜欢我们的坦诚。这就保证了他们对我们的支持。

未来政权的性质

谈到未来政权的性质毛泽东说,这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专政。

毛泽东说,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实行领导。我们说,人民专政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是因为工人、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个专政反对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反对中国人民的敌人,这些我们要向我们的民主人士进行解释,他们还害怕专政这个词。

关于与外国列强的条约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的时候,他们向这些人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的考虑。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因为其中有些条约具有爱国主义性质。例如:

1. 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 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①
3. 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关系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主义性质的根据是什么。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毛泽东说,我向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的目的是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援助就不能保卫自己,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驻扎武装力量在旅顺港的苏联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等中国将来强大了,能自己保卫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自己也就不需要旅顺基地了。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声明,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旅顺港,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最后,毛泽东强调说,他们将公开表示亲苏。他援引了庆祝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上所说的话,他们强调说,中国应该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阵营中。我们没有中间道路。毛泽东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

① 这里指的是九国条约,即1922年2月6日巴黎和会参与国签署的《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主要内容有:缔约各国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各国不得在中国谋取特殊权利而损害友邦人民之权利,不得鼓励损害友邦安全的举动;除中国外,各国不得谋取或赞助其本国人民谋求在中国任何指定区域内获取专利或优越权。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关于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外国军警、关税自主、取消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均遭列强拒绝。条约的实质是确认了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实行的"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原则,从而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在中国占有的优势地位,使中国再次成为列强共同宰割的对象。——编注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54－62

№34407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外蒙古、旅顺和中长铁路等问题

(1949年2月5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1949年2月5日致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在民族问题上的政策、关于内外蒙古的合并

今天，2月4日，在同毛泽东的会谈中我转告他说，我们的中央建议中共不应为了在民族问题上炫耀自己而允许少数民族独立，这样会因共产党的上台而使中国的国土缩减。应当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不是独立。

毛泽东对这一建议感到高兴，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无论是谁，他也不打算让其独立。

毛泽东主动问道，我们怎么看待内外蒙古的合并。我说，我们不支持这样的建议。于是他问，为什么我们不支持合并。我回答说，我们不支持是因为，这样的合并会导致中国失去大片领土。

毛泽东说，他认为，外蒙古和内蒙古可以合并，并加入中国。当然，如果外蒙古和内蒙古的领导人都支持的话，这是可以的。

他认为有这样的可能，比如说，两三年后，当中国的共产党政权更加稳固的时候，一切都会向所希望的方向发展，到时候外蒙古宣布，它脱离中国是由于国民党统治中国。现在政权在共产党手中，外蒙古愿意加入中国，同内蒙古合并。

我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外蒙古早已独立。对日胜利之后，中国同苏联一样，也承认了外蒙古的独立。外蒙古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繁荣的道路上迅速发展，它早已尝到了独立的甜头，未必会自愿在某时放弃独立。

如果有朝一日它与内蒙古合并,它将成为独立的蒙古。此时任弼时插话,内蒙古有 300 万人,而外蒙古只有 100 万人。

最后毛泽东大笑起来,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关于新疆问题、关于独立运动、关于经过新疆的铁路的建设

因为毛泽东前一天通知我,他想跟我讨论新疆问题。我问他想就这一问题谈些什么。

毛泽东说,新疆伊犁州在进行独立运动,它不服从乌鲁木齐政府。那里有共产党。

我回答说,对伊犁州的共产党我不知道,但知道当地部族的民族运动。这个运动的起因是中国政府采取错误的政策,即不考虑这些部族的民族特点,不给他们自治权,不允许发展民族文化。

如果让新疆的部族自治,那么无疑将不会存在独立运动的土壤。

我们不支持新疆部族独立,也不觊觎新疆的领土,我们认为新疆是,而且应该是中国的组成部分。

我们赞成与新疆的经济合作和贸易,正如现在进行的,以及正如国民党政府新疆代表张治中建议的签署条约那样。

这时毛泽东说,1945 年他在重庆见到白崇禧时,白崇禧说,在伊犁州,当地的暴动者拥有苏联生产的大炮、坦克和飞机。

我回答毛泽东说,这事我不了解,没有什么能够说的,我只知道,我们没有对这个运动提供帮助,虽然这是一场反压迫的民族运动。

这时,毛泽东说,他们想让新疆像内蒙一样完全自治,内蒙古已经是自治区了。

毛泽东特别想知道,新疆的石油是多还是少。我说,在盛世才时期,我们开采和加工过大量石油,这被用于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因为没有交通来运出。

因此,毛泽东提出是否可以通过新疆建造连接中国和苏联的铁路,任弼时非常支持这个看法。如果发生新的战争,这条铁路对双方的国防将起到很大的作用。如果发生这样的战争,中国毫无疑问会和苏联站在一起。假如满洲遭到袭击,这条铁路将是向作战的中国军队提供供给的一条重要渠道。可以向多山的甘肃、陕西、河北、四川等省提供供给,为组织牢固的防御提供很大的便利。

我说,我认为这种想法是令人感兴趣的,是有前途的,但费用昂贵,决定建造之前,必须事先精确计算。

关于建造从乌兰巴托到张家口的铁路

这时任弼时提出,为什么我们不建设连接乌兰巴托和张家口的铁路。此段距离不长,它对连接华北有很大意义。

我说,这个问题值得重视,但我们还没有考虑过。

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

尽管在另一次联络中已经谈到过,但毛泽东对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看法同苏中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毛泽东说，在与民主党派领导人会谈之前，他们将开展大量的解释工作，寻求支持。他特别解释了他们对废除蒋介石卖国条约要求的理解。

他们要求废除的不是蒋介石签订的所有条约。蒋介石政府还签订了一些爱国条约，例如：

1. 关于废除外国人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的条约。

2. 废除所谓的八国列强条约。

3. 关于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苏中条约。

我问毛泽东，在会谈中他提到的苏中条约的爱国性的根据是什么。

毛泽东笑着说，这个条约不是我签的，而是蒋介石签的。这也是依据。

毛泽东继续说，我对他们解释说，苏联到旅顺港是为了保卫自己，保卫中国，反对日本法西斯，因为中国太弱，没有苏联的帮助就不能保卫自己。

苏联不是作为帝国主义的势力，而是作为维护共同利益的社会主义力量来到中长铁路和旅顺港的。

在回答为什么共产党反对美国在青岛的海军基地，而保护苏联在旅顺的基地时，毛泽东回答说，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是为了压迫，而苏联在旅顺港是为了反对日本法西斯。

等中国足够巩固了，能够保护自己免遭日本威胁的时候，苏联也不会再需要待在旅顺港了。

此时，毛泽东说，有一位中国妇女——国民党立法院委员宣称，如果共产党能为中国从俄国人那里收回在旅顺港的基地，那将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毛泽东说，这个妇女不懂得政治。

米高扬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100－103

№34408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关于中共历史、中国革命等问题

(1949 年 2 月 5 日)

绝 密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5 日致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中共历史的四个时期

在几次会谈中,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共自建立以来的历史以及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讲述了党的目前状况及其领导方法。

这些谈话的记录我将带回莫斯科。我认为,需要在电报中阐述一些要点。

毛泽东把中共的历史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开始成立(1921 年)到 1927 年,当时党在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之后,由于右倾领导(陈独秀)而在 1927 年遭受了失败。当时毛泽东被认为是“左”倾机会主义者。

第二个时期是所谓的苏维埃时期,这是党在从第一次失败后恢复起来之后,再次成为一股重大的政治力量,建立了苏区,以及自己的政府和红军。

但由于在 1935 年之前的四年内,党的领导掌握在“左”倾机会主义者手中(在李立三手中有一段短暂的时间,大部分时间掌握在王明一派的手中),党遭受了第二次失败,损失了 9/10 的苏区和 9/10 的党和军队,而在国统区党则被完全摧毁。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被看作是右倾机会主义者。自 1935 年 1 月中央全体会议开始,毛泽东的看法在中央内重获支持,党开始健康发展和巩固。

在此之前,毛泽东在中央内是孤立的,另一名中央委员刘少奇(现在是他的副手)提出了和他类似的看法。

第三个阶段是抗日战争时期,在这段时期党在内部得到了巩固,思想上成熟起来并达到了团结。

第四个时期是反对国民党的国内战争时期,并最终走向了胜利。

当毛泽东是少数的时候,他被开除出党,三次被撤销红军指挥官的职位,甚至有人试图逮捕他。

尽管如此,在最后两个时期对党进行领导的时候,他也没有对犯错的人实行排挤的路线。他保留了所有领导同志的职位,尽管他们犯了错误,他尽力去说服他们,给他们机会认识并改正自己的错误。

在不同时期同他进行过激烈争论的所有领导同志,都被保留在中央内(1945 年党的七大特别有助于党的团结)。所有人都改正了自己的错误,现在忠诚地进行党的领导工作,但两个人除外。

一个是张国焘,他背叛党并转投到了蒋介石一边(现在他进入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福摩萨①工作)。第二个人是王明,他现在仍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教条主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关于李立三和王明派别

在讲述党的历史的时候,毛泽东异常多地提到了李立三,他原是左派(被共产国际谴责)的引路人,托洛茨基主义者,现在是工联副主席。

---

① 原文如此。——编注

在此之前我对他说过，不允许让这样的托洛茨基主义者领导工会。

这一看法对毛泽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可以看出，他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想证明，李立三的左派对党危害了3个月，是对党造成了短暂危害的一个痼疾。

掌握党的领导4年之久的王明派别的危害更大。李立三后来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战时和战后推行的路线都是正确的，在忠诚地工作。他被任命到工会工作，因为他有在工人中工作的经验，他很愿意离开工会参加地方工作。

李立三当时在莫斯科遭到逮捕，但不久后被无罪释放，回到中国后，任何时候都没有说过苏联的坏话，没有隐瞒过任何错误。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在一次会谈中，我解释了我们中央对中国革命道路和性质的看法，及其同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

他表示完全同意我们中央的看法，这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求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斯大林同志向中国共产党提供的这一帮助和其他各种帮助。

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

因此，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自己的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保证了对人民的民主，保证了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

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据此，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

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在消退，但是最完善和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我们暂时还不能采取。因此，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的新民主主义的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

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

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就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劝我们不要多谈、多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

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

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的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

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关于1936年出版的有关军事战略的小册子,关于党的任务(1939年)的小册子、关于新民主主义(1940年)的小册子和关于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

在谈到1945年所写的小册子的时候,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高兴。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

米高扬

2月5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104 - 108

№16473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中共历史和目前任务

(1949年2月5日)

绝　密

1949年2月5日白天与毛泽东举行了例行的会谈。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 И. В. 科瓦廖夫和 Е. Ф. 科瓦廖夫。

关于外国资本在中国的作用

毛泽东说,中国是世界列强的压迫中心,自1840年以来的100年中,中国受到诸多国家的压迫,它不同于印度,那里主要是英国的压迫,也不同于印度支那,那里是法国的压迫。

在此期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在寻求摆脱现状的出路，太平天国的起义以及后来的孙逸仙，都提出了把中国从外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目标，可是当时的党派在人民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只有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共产党在我国取得了胜利。

关于中国的知识分子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毛泽东指出，外国资本不断地对其进行腐蚀。中国知识分子的许多代表都在美国、英国、德国和日本接受过教育，他们无意中成了这些国家在中国产生影响的渠道。毛泽东说，许多知识分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他们的思想还不是共产主义的。这就是在我国工作的两名苏联医生感到孤立的原因。他们过去和现在为我们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但是他们不能同我们的知识分子进行很多的交往。当然，他们汉语讲得不好也是一个原因。

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全会

随后毛泽东说，他们已经把中共中央政治局 1949 年 1 月 8 日的决议译成了俄文，并将通过奥尔洛夫转交给我们。毛泽东说，这个决议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近期的政治纲领。地方党组织要求对许多迫切的问题做出答复，因此我们要召开这次中共中央全会。①

我说，显然这次全会应使党对当前中国政治形势提出的新任务做好准备，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它将具有转折的意义。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说，最近一次中共中央全会是在 1945 年 6 月召开的。已经过去 3 年多了。现在开始进行全会召开的筹备工作。高岗、林彪、陈毅、林伯渠、薄一波都参加了关于全会问题的政治局专门会议。会议开了 4 天。现在他们都回去了，只留下了林伯渠一个人。林伯渠已经 63 岁了，当年他曾跟孙逸仙一起工作过。他到过莫斯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起的作用，像毛泽东所说的那样，有点像已故的加里宁同志。林伯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会议的还有政治局委员董必武以及现在的东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岗。高岗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共有 13 人。

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用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历史问题时，毛泽东把其分为 4 个时期：

1. 北伐；2. 土地革命；3. 抗日战争；4. 国内战争。

我党在这些时期得到了发展和壮大。毛泽东说，在所有这些历史时期，我们都特别重视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马列主义最尖锐的武器。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党内还存在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些都是国民党的思想残余。在我们军队中有时有军官殴打士兵，遇到这些情况，我们会向人们解释说，他们的行为跟国民党没有什么区别。我们的地方干部有时脱离群众，开展的土地改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党内坚持全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检查党员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的目的。在我们党的会议上我们提出这些问题，使得下级可以对上级进行监督。

---

① 这里指的是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1949 年 3 月 5—13 日在西柏坡召开。——编注

我说，毛泽东所讲的这些，说明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存在，其威力就在于此。富有朝气的民主集中制是布尔什维克所应有的检验的基础，对此，斯大林同志曾多次指出过。

毛泽东说，党通过开展党内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了统一。

我指出，各种小资产阶级分子从外部对党施加压力，如果在应有的高度上在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就可以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如果党脱离群众，党的个别队伍就有瓦解的危险。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的看法，他说由于近来许多大城市被人民解放军占领，反动派在积极活动，企图对党施加压力。他强调说，现在党的任务更加艰巨，工作范围不仅触及农村，还需顾及城市。

党在军队中的任务

谈到党在军队中的任务时，毛泽东说，在国内战争中我们对我们的武装力量逐步实行民主化。我们的基层指挥人员是选举出来的，但由上级指挥机关批准。每个连有士兵委员会，军官也参加，战争需要训练有素的干部。军队是人民很好的政治学校，战后我们准备派部队干部到国民经济和政治各个领域中去工作。我们的军队基本上是农民的军队，土改时领到土地的战士是我军可靠的支柱。我们也没有忽视国民党士兵，他们作为战俘，我们在努力从政治上对他们进行改造。人民解放军战士在原国民党士兵的大会上讲述了他们在国民党的统治下是怎样生活的，在我们的条件下他们又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着重讲述了新民主政权分配给他们土地，这对原国民党士兵产生了巨大影响。除此之外，我们还印了各种小册子，其中提供了我解放区和国民党地区的比较材料，我们在利用一切机会揭露国民党的专横。我们在用这些方法对国民党士兵进行改造。

毛泽东接着说，我们在军队中的民主政策让士兵甚至可以批评军官。例如，经常会发生如下情况，在战役开始之前召开基层战斗单位的会议，对即将进行的战役计划进行讨论。会上指挥官有时提出撤退计划，而战士则相反，提出进攻计划。在战士批评意见的影响下，指挥官会采纳进攻的计划。

毛泽东继续说，我们的军队在人民中享有较高的威信。1949 年 2 月 3 日，我军开进北平，几乎全城人民都出来欢迎。进驻北平的军队全副美式武器装备，这次，我们不用苏式武器，完全用美式武器装备军队，这是为了强调，蒋介石是在如何向我们提供美国装备的。人民也欢迎开进天津的人民解放军部队。这一切都说明，人民支持我们，同时也反映出人民解放军的良好形象。

中国工业发展的水平

后来毛泽东谈到中国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很低。他说，帝国主义利用中国作为自己的原料基地，这影响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我指出，现在中国经济上出现对比悬殊的现象，例如大工业中心的上海与落后的农村。在苏联国家建设之初也出现过这样的悬殊，但在苏维埃政权存在期间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它们。

毛泽东同意我的看法，并继续评述中国的经济状况。他说，工业在中国整个经济中占10%，东北除外，那里的工业占53%。

利用毛泽东提出的问题，我强调指出，工业是现代国家的基础，只有在工业发达的情况下才能比较容易地提高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农村的土地改革扫除了农业发展的障碍，但没有解决国家技术和工业的发展问题。

毛泽东同意这点，他说，在中国，向资本主义进攻的速度将比苏联慢一些。

我说，在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存在的条件下，中国工业发展的过程将比苏联工业发展来得快，因为苏联在成立初期不得不将大量的资金投入国防，抗击外国侵略者。

毛泽东同意我的说法，他说，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工业创造了有利条件。毛泽东说，日本和国民党促使资本集中到国家手中，例如，东北的工业占53%，其中47%在国家手中，6%在私人资本手中。总之，毛泽东说，中国工业的主要部门都掌握在国家手中。

关于对待外国资产的态度

我问他们有没有工业国有化的计划，毛泽东回答说这样的计划还没有。

根据提出的问题，我阐明了我们对在中国的外国资产的态度。我说，在外国资产问题上我们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必须对日本、法国，尽可能包括英国的资产实行国有化。对美国的资产要采取谨慎的政策，要让美国人产生一种看法，新政府会考虑他们的利益。当以共产党为首的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局势以后，可以再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形势和美国人的表现再作决定。

关于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

我强调指出，中国革命按其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它应该摧毁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阵地。消灭地主和国民党并未解决消灭帝国主义的问题，因为前者，即地主和国民党，都是外国帝国主义的爪牙。我说，在摧毁国内的外国阵地的同时，你们也因此会改善民族资产阶级的处境，他们当然会感到高兴。

然后我对中国革命的道路和性质，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以及人民民主国家革命的区别阐明了我党中央的观点。

我说，俄国革命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革命道路对中国并不适合，因为中国的条件与俄国和欧洲的条件不同。我指出了促使欧洲国家人民民主胜利的两个因素：

1. 这些国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勾结德国占领者，因此红军打进这些国家，资产阶级逃跑了。

2. 红军的进入并把这些国家从德国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使得共产党人更容易建立起民主制度。

我说，在中国没有这些因素。俄国和中国的革命都是靠自己内部的力量推进的，应该考虑中国和俄国的另一个不同点：俄国没有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俄国革命不具有反帝的性质，而在中国，帝国主义的压迫是长期的，因此中国革命具有反帝的性质。

谈到中国未来的制度，我说，它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中国未来的制度是没有苏维埃

的人民民主。列宁在1917年2月提出过俄国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问题,但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没有实行过这一制度。事情的发展是这样的:1917年10月提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或许,在中国能实现纯粹的没有苏维埃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思想。中国未来的联合政府应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

我说,在新民主国家里,政权履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履行。这些职能是用来镇压资产阶级的。而你们没有这些职能,更适合你们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专政。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也会这样想的。

毛泽东完全同意我党中央的意见。他说,这个意见非常有助于他们形成自己的关于革命性质的看法,并确定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请我转达对我们中央和斯大林同志的感谢,感谢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帮助。

此后毛泽东说,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期间,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了工农专政的纲领,但把欧洲国家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套机械地照搬到中国的资产阶级身上。因此,尽管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里只提到没收外国资本,但我们执行的却是没收一切民族资本的政策。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赞成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专政,赞成人民专政,因为工人和农民占中国人口的90%。这样的制度会保证对人民的民主,保证对地主、官僚资本和帝国主义的专政。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在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制度。

毛泽东继续说,近10年来,我们弄清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其中我们指出了中国革命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去了,但是最完善、最进步的民主即苏维埃民主,暂时还不能为我们所接受,所以我们称我们的制度为有别于苏维埃制度的新民主主义制度,称我们的革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人民民主革命。我们的革命按其性质来说是人民革命,它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切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按照毛泽东的话说,“我们的整个政治纲领都在于此”。

毛泽东说,我们这里有许多人都劝我们说,不要提及,也不要强调中国革命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进行的,以便不吓跑知识分子。近来我们没有顾及这些,并强调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这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甚至是从沈阳到这里的自由民主党派的代表在自己的宣言中也声明,他们愿意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工作。

接着毛泽东说,关于上述所讲的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早在1940年就写过,但当时对这一表述没有展开,他近期想再次谈谈这一问题。他就此强调,在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他依据的是斯大林在1917年前后关于中国革命性质的著作中所提出的主张。

毛泽东说,斯大林同志关于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和批判南斯拉夫西米奇[①]的

---

① 西米奇,时任南斯拉夫外交部长。——编注

指示对他来说特别珍贵。毛泽东多次强调，他是斯大林的学生，他坚持“亲苏的方针”。

关于提高共产党员的理论水平

毛泽东也援引了他在各个时期所写的小册子，特别是有关军事战略(1936年)、党的任务(1939年)、新民主主义(1940年)和中国革命的根本方向(1945年)的小册子。在谈到最后一本小册子时，毛泽东说，在斯大林同志给拉辛上校的信件中能找到“撤退是合理的进攻”的指示，这使他非常满意。毛泽东说，“我们马上把这封信在广播中播出，在各部队中对其进行研究”。毛泽东接着说，对他们而言，了解苏联对德波林和布哈林错误的哲学观点批判，对巩固党的队伍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我党的心目中，这次批判把列宁和斯大林提升到最伟大的马列主义理论家的高度。对德波林哲学观点的批判有助于我们与唯心主义者的斗争。总之，毛泽东说，我们对党员教育的要求落后了，因为我们掌握一定政权之后，首先抓的是政治和经济问题。可是在这次战争期间，我们还是为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做了大量的工作，以此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进行了准备。当我们组建了党校以后，其中不断出现意见分歧。我处于这样一种境地：身在中共中央机关却无法对其加以控制。中央各部门都有自己的意见。这种情况我曾经特别在1940年向党和中央提出过警告，但没有收到良好的效果。我清楚，要团结中央委员会必须认真处理这一问题，我们这样做了，并以此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代表大会前夕，我们召开了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中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过去党内小团体和派别(陈独秀、李立三等人)的政治错误。由于这些小团体和派别的错误，我们失去了9/10的受我们控制的苏维埃地区和9/10的党员。为什么会这样？其原因是我党有些领导人动摇不定的思想作祟。后来在对待这些领导人的问题上，我们坚持了同他们进行有原则的思想斗争的政策，但在组织结论上我们采取谨慎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因为有错误言论就采用开除出党的办法，而这促进了我们最近的团结。现在党内没有争论了，虽然在前不久的土改时和城市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中央很快就纠正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说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团结的出发点。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64－73

№16474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当前的形势和任务

(1949年2月5日)

绝 密

1949年2月5日晚与毛泽东举行了例会，参加会谈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和翻译师哲，我方参加会谈的有 И. В. 科瓦廖夫和 Е. Ф. 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党内形势

毛泽东继续谈论白天开始的关于党内形势问题。他再一次强调指出，在党内与“左”、右倾机会主义者作斗争的时期，苏维埃丧失了将近9/10的领土和党员。

1941—1945年期间党员的觉悟大大提高了，为1945年召开团结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奠定了基础。代表大会通过的政治纲领目前仍在执行，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达到了组织上、政治上和思想上的统一。毛泽东说，诚然，在党的队伍中还存在无纪律性和无政府主义的情况，但这仅仅是个别现象。总的来说，党内已经没有针锋相对的意见和相互竞争的派别。这一切为自己作为一个团结的党登上当今政治舞台做好了准备，不然，工作会很难做。知识分子不再跟我们竞争。国民党仍然在和我们竞争，但它在政治上的分量正变得越来越小。

工人问题

利用间歇时间，我传达了菲利波夫同志关于工人问题的电报内容。我说，不要禁止罢工，否则中国共产党会失去工人的信任。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在于其数量，而在于工人阶级是新的阶级，是最先进思想的代表，是最有前途的阶级，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作用将不断扩大。

关于不应禁止罢工的问题使毛泽东和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们感到困惑。

电报建议要在工人、青年、妇女中进行工作，要培养中国干部，其内容我已向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作了传达。总的来说，这些电报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传达电报内容的时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连声说是，毛泽东也说，将会执行这些建议。

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此后毛泽东把话题转入军事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把军事形势分成两个阶段：

1. 现阶段的国内战争。

2. 国内战争以后的防御措施。

谈到现阶段的国内战争时毛泽东说，目前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大战役阶段可以说已经结束。现在，纯粹的军事作战逐步被和平地向国民党的大城市进行进攻所代替。他

援引解放北平的和平结局作为例子说，在那里我们建议傅作义的军队投诚。毛泽东说，我们不会在南京、杭州、上海和广州进行大规模战役，但并不是说我们今后不作进攻战役的准备。在前进的道路上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对价格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会引起通货膨胀。应该注意的是，我们从未有过这样庞大的军队，也没有打过像现在这样的大战役。当然这需要一大笔开支，这会对解放区的经济产生影响。况且现在所有力量都放在先粉碎敌人，后搞经济方面。这一政策的结果是，我人民解放军从1948年10月至1949年1月共歼灭了130万国民党精锐部队。表面上看，我们尚未完全取胜，因为只占领了中国的一半，但是事实上战争正在结束。

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党的主要工作将是经济建设。要彻底消灭敌人，必须在经济方面壮大。所以现在应该对我们的计划作相当的调整，紧缩开支和稳定财政状况。我们应当以最少的牺牲结束战争，但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所事事。我们的军队应当继续进攻，夺取城市，对各种情况做好准备。但是不能忘记，在采取军事措施的同时，要培养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干部，解释我们的政策措施，准备解决工人问题、市场关系，对新条件下的农村工作做好准备。我们说，我们的军队不仅应该会打仗，而且也应为和平时期的工作做好准备。

在继续陈述军事措施的时候，毛泽东说最近两三个月内我们要为满怀信心挺进华南，夺取华南广大地区和经济上有价值的地区做好准备。再过一两年我们就能在经济上、政治上完全控制中国。应该在从北平到广州的战线上开展战斗。

将来我们的工作重心将转移到城市，近20年来，我们在城市居民中的工作经验很少。最近，当我军开始占领大城市的时候，在城市方面面临的问题就多了起来。我们现在有了大工业城市，(苏联)红军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要感谢红军，感谢它把哈尔滨和东北的其他城市归还给我们。苏军不仅帮助我们收回了城市，而且还在城市的恢复工作中向我们提供了帮助。现在我们应该开发长春、本溪、鞍山、张家口、芝罘、北平、天津等其他城市。近期在西安、上海和汉口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任务。或许，今年冬季我军就能攻克广州和桂林。

关于李敦白和马海德

利用间歇我讲了关于李敦白的电报内容，这份电报给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参加会谈的政治局委员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介绍留下的。毛泽东说，1936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有关李敦白的这一消息引起了惊奇的呼声：是的！是的！

会谈结束时，毛泽东请我通报苏联情况和国际局势。我满足了他的要求。对我通报的信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听得非常仔细。

会谈就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74－77

№16475

科贝良斯基给费德林的通知：为东北提供无线电台

（1949 年 2 月 5 日）

绝　密

对外贸易部东方局通知您，有关全苏远东外资处远东联合公司向列宁格勒厂厂长函询为东北生产无线电台事宜已收到答复：无线电台将整套装运。

联合公司将给东北寄去两份无线电台使用说明并附施工图。

装配完顾后(估计在今年 2 月)无线电台的安装工程师将去哈尔滨。

苏联对外贸易部东方局副局长

科贝良斯基(签名)

АВПРФ，ф. 0100，оп. 42，п. 290，д. 47，л. 2

№34622

米高扬致斯大林电：对斯大林指示电的落实

（1949 年 2 月 6 日）

绝　密

急　电

А. И. 米高扬 1949 年 2 月 6 日给 И. В. 斯大林的电报

斯大林同志：

关于№0927 号和№0862 号电报的执行

您的第 0927 号和第 0862 号电报已经收悉并执行。它们对毛泽东和政治局其他成员产生了深刻的印象，发来正是时候。应注意他们的如下看法。

关于美国人李敦白和马海德

任弼时说，李敦白是经记者斯特朗举荐留下的。

毛泽东说，1936 年起还有另外一个叫马海德的美国人住在他们那儿，他加入了这里的共产党。任弼时补充说，马海德是经记者斯诺介绍留下的。

我对毛泽东说，难道你不明白，这个美国人是美国间谍机关的间谍头子，应该把他抓起来进行审问。

美国人的这件事情使他们非常吃惊，他们的反应是，惊奇地说：是的！是的！实际上他们会怎么做，我在离开前会了解并向您报告。

关于就工人工作、青年工作和妇女工作及关于中国干部的培养工作提出建议的电报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毛泽东说，所有这些他们都将执行。

关于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

毛泽东问道，能否在苏联生产的高射炮上刻上日本的印记。我作了否定的答复。

关于建设的困难

毛泽东说，当然需要改善工人的生活，我们这里的状况是矛盾而艰难的。需要供养一支约 350 万人的庞大军队，需要供养国家机关，减少解放区居民的税收，而经济遭到了破坏，没有商品。

给了农民土地，而不能提供任何商品。

预算的赤字很大。价格不断上涨，货币在贬值，我们甚至都来不及印制货币。

关于今后停止动员参军并削减弹药的生产

当然，今后军队的数量将不再增加，不会进行任何的动员，不再把被俘的国民党人编入军队。也将缩减弹药的生产，因为不会再有像在沈阳、天津和徐州那么大型的战役了，尽管我们在为这样的情况做准备。

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对和平时期的准备

现在主要的任务是在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对其进行教育，以便通过军队来采取一些民事生活的措施，解决经济任务。

战争事实上在结束，现在主要是尽快恢复经济，处理好城市中的工作，巩固金融，组织起对国家的管理。

关于人民解放军在北平的阅兵

毛泽东高兴得一时喘不过气来，开始谈论在北平的入城阅兵式，参加这次阅兵的有一支以美国武器和汽车装备精良的部队。苏式的和其他类型的汽车和武器事先从参加阅兵的部队中撤出。这次阅兵给居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毛泽东请我做一个关于苏联局势和国际局势的报告。

关于这件事情，在此之前他已多次坚决地请求过。我满足了他的请求，做了必要的报

告,报告的内容我将在莫斯科的时候进行汇报。

米高扬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110 - 112

№34410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询问2月3日电是否转给毛泽东

(1949年2月6日)

绝　密

И. В. 斯大林1949年2月6日给 А. И. 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2月3日我们给你发送了一份有4条内容的长篇密码电报,要求你向毛泽东转达。迄今没有从你那里得到关于收到这份密码电报并将其内容转告给毛泽东的报告。

要求马上答复。

斯大林

1949年2月6日

АПРФ,ф. 3,оп. 65,д. 606,л. 113

№16476

米高扬与毛泽东会谈纪要:新政府的组成和任务

(1949年2月6日)

绝　密

1949年2月6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举行了

例会，参加会谈的有翻译师哲和我方 И. В. 科瓦廖夫、Е. Ф. 科瓦廖夫同志。

关于外蒙古

我向毛泽东传达了有关外蒙古和苏中条约电报的内容。

我说，外蒙古的领导人赞成中国所有蒙古地区与外蒙古联合，但是苏联政府反对这个计划，因为这计划意味着一系列地区要脱离中国，虽说这对苏联利益并不构成威胁。我继续说，我们并不认为外蒙古为了中国某个组成部分的自治会放弃自己的独立。

毛泽东说，我们尊重外蒙古想成为主权国家的愿望，如果它不愿意与内蒙古联合，会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也不会反对。毛泽东补充说，我们不赞成大汉族主义政策。

关于苏中条约

关于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苏中关于旅顺地区的条约是不平等条约。缔结条约的目的在于阻止国民党勾结日本、美国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我说，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解放运动是很有利的，但是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我继续说，苏联政府决定废除这个条约，一旦对日和约签署，马上就从旅顺撤出自己的军队。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应立即撤军的话，苏联愿意这样做。关于中国东北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靠俄国的资金建成的。可能，我说，这个条约没有完全体现平等的原则。我们愿意讨论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同志般地解决这个问题。

把这个条约看作是不平等条约的评价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非常意外，使他们坦称惊奇。之后，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能从辽东撤军，不能撤离旅顺基地，我们这样只会帮助美国。毛泽东说，苏联从辽东撤军这件事，他们将保守秘密，只有当他们粉碎了政治上的反对派，动员人民去没收国外资本的时候，只有在苏联的援助下，"我们可以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去重新研究这个条约。中国人民，毛泽东说，感谢苏联签订了这个条约。当我们壮大以后，"你们可以离开中国"，那时我们签订一个类似苏波条约的苏中互助条约。

随后毛泽东说，在确定中长铁路的资产归属问题上有些小问题，可以就地解决。例如，国民党部队夺走了中长铁路的部分企业，人民解放军来了以后又把这些企业归还给中长铁路。人民中有些传言，说过去国民党根据苏中条约夺走了这些企业，而人民解放军违背了条约，将这些企业交还给中长铁路。毛泽东提出，让高岗和 И. В. 科瓦廖夫研究这个问题，然后报告中国共产党和联共(布)。

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状况

毛泽东说，我们承认伊斯兰民族，从不赞同国民党压迫中国伊斯兰民族的政策，因此我们认为，应该让他们在中国范围内实行自治。中国共有 3 000 万伊斯兰教徒，主要居住在宁夏、青海、甘肃和西藏，语言是汉语，文字不同，经书是用阿拉伯文写的。

个别少数民族居住在西康省，他们受到当地封建主的奴隶般的剥削。

我们准备给居住在中国西南部的西藏人民以自治权。

少数民族中苗族居住在贵州和云南省,中国的地方当局与他们关系紧张。1934—1935年间我军经过这些省份的时候,苗族支持我们。我们认为,苗族应该在这些省政府有代表资格。

瑶族分散在广西和湖南,他们总是反抗汉族。

四川省5 000万人口中有一些不大的民族群体,可以组成个别的民族县。

黎族居住在海南岛,人口大约300—400万。少数人还处在未开化阶段。

台湾岛的600万人口中只有几十万是当地的民族。

东北有200多万朝鲜族人。

西藏问题很复杂。实质上西藏是英国的殖民地,只是在形式上归属中国。近来美国千方百计讨好西藏人民。

新疆约有14个民族,300多万人。新疆有很大的战略意义,在经济上把我们和苏联连在一起。按我们的计划,我们将在1951年进驻新疆。

毛泽东回到西藏问题上说,当我们结束国内战争,着手解决国内的政治问题以后,当西藏人民感到我们不是用侵略来威胁他们,而是平等地对待他们的时候,我们将解决这一地区未来的命运。对待西藏我们应该谨慎耐心,要考虑到那里复杂、麻烦的宗教事务以及喇嘛教的势力。

在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方面,毛泽东说,我们要向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学习。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接着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问题。他说,在中国的经济中工业占10%,有工业就意味着有民族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不注意到这一点,就会犯错误。中国经济的其余90%是个体农民经济,它受到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军。全中国农民人数3.6亿,农户有9 000万,其中67%是贫农户,解放区的农民得到了土地,他们受工人阶级领导。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不供给农民工业品,我们就不能保证工人阶级对农民阶级的领导。俄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仅应该给农民土地,而且还要供应城市商品。最近3个月来,在这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开始抓城市的工作,抓工业的发展。我们毫不怀疑,苏联会在发展工业方面帮助我们,那时我们就可以给我们农村提供帮助了。

回到中国经济中工业比重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这10%里包括国家的垄断组织和私人资本,官僚资本占这10%的最大部分,公路、矿山、航运等都被官僚资本控制。

私人资本在这10%中占的比例不大。我们对私营工业企业的政策不应该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便不吓跑民族资产阶级。所以我们目前不会没收私人资本和私营企业。我们是这样解释的,俄国进行的是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的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即便是在俄国,它在十月革命后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只是在过了12年之后才开始消灭富农。而我们的情况不同,我们对国内的资产阶级要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我们不怕资本家,也不会迎合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采用孙逸仙的口号:节制资本,平均地权。

要限制什么？

要限制放高利贷的银行，限制不生产日用品的珠宝工厂和丝织工厂。

应该给予矿山企业出口产品的机会，但条件是要由国家控制。市场上允许自由竞争，但不可以忽视国家的监督。例如，国家有许多粮食，它可以盘活市场为工农利益服务，这样的控制可以限制资本主义的膨胀。

在城市和农村应该鼓励发展合作社生产，不允许私人资本和地主过分剥削工人和雇农。在私营企业里资本家可以获得合法的利润，但同时应该保护工人的权利。跟过去不同的是：允许资本家和工人有自己的组织，例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工会。

在允许资本家从自己企业中获得合法利益的同时，应该调整这些企业的发展，使它有利于国家。要发展能使国家富强的工业部门。

毛泽东说，因此，在我们实行这样的经济政策的情况下，我们的经济有别于苏联的经济，但我们也反对以欧洲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为样本。我们主张加强国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成分。国有经济按其性质来说应该是社会主义的，但我们不会大喊大叫，以免吓跑一些人。国有经济将变得强大，因为政权和军队都掌握在共产党手中，这就是为什么国有经济在新中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原因。

合作经济按其性质来说是半社会主义的，它建立在联合私人利益的基础上。现在我们还不能走集体农庄的道路，虽然许多人都想这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条件。

国家政权的结构

在转入关于国家政权结构的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准备采用议会形式。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有自己的军队。国民党将被击溃，其他小党在国内没有影响，因此就以另外一种方式提出了关于政权的结构问题。它将不同于苏维埃。我们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选举政府，在各级代表大会上选举村政府、区政府、县政府和省政府，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中华民主共和国①的政府。

在各级省政府建立厅。东北将成立若干部，因为东北联合了9个省。中国将成立9个行政区，即：

1. 东北局，中心在沈阳；
2. 华北局，中心在北平；
3. 华东局，中心在南京；
4. 华中局，中心在汉口；
5. 华南局，中心在广州；
6. 西南局，中心在昆明；
7. 川康局(四川—西康)，中心在成都；
8. 西北局，中心在西安；

---

① 此处档案原文为 Китайская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编注

9. 新疆局,中心在乌鲁木齐。

行政区不设部(除东北外)。

我们需要这样的结构,毛泽东说,目的是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不把一切都集中在中央政府身上。这种制度的益处还在于,与民主人士相比更能提高共产党员在当地的作用。

华北政府已经组建,并将在其基础上筹建以北平为首都的中央政府。

在未来的政府中,看起来,共产党员和左翼民主人士将占据2/3席位。从形式上看,共产党员占的席位不太多,但实际上他们将占多数席位,因为有些席位为隐蔽起来的共产党员所占据。政府中还会有右翼党派参加,但只是少数。

关于政府首脑

中央政府的结构类似苏联政府。为首的是以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总理还没确定,但看来,毛泽东说,应该是周恩来。

至于自己,毛泽东说,他给自己留一个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参加政府。

主席团主席由孙逸仙的遗孀宋庆龄来担任。毛泽东说,她完全服从我们,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参加会谈的任弼时说,按他的意见,主席团主席还是由毛泽东担任为好。周恩来支持这个意见,他说,孙逸仙的遗孀仍然会使他们感到不安,虽然她接近共产党,但从来没有泄漏过从他们那里了解的共产党的秘密,尤其当时是她把共产国际的钱款转交给中国共产党的。周恩来说,如果毛泽东不当主席团的主席,人民会不理解。后来周恩来继续说,国民党对宋庆龄监视得很严,他担心她会被他们强行带走。周恩来最后说,不管怎样,如果宋庆龄当主席团主席,毛泽东应该当总理。

毛泽东继续说,主席团主席还有三个候选人:朱德、董必武和刘伯承(Лю Бочэн)①。确定主席的问题要考虑国内外的形势。

新形势和干部问题

谈及最近中国共产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毛泽东着重指出,这次会议将在如下条件下召开:国内战争尚未结束,进攻不能放松,蒋介石还有100万军队。现在的局势不同了,虽然还不完全明朗,但需要我们做出估计。现在的新情况是,以前我们只掌握了长江以北的土地,我们首先占据的是农村,其次是城市,一般采用包围的战略,而现在随着我们越过长江,我们不得不夺取大城市。军事行动的规模明显扩大,我们将面对的工业问题增多,即上海、南京、芜湖、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经济问题。因此干部问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尖锐。现在我们培养的干部有5.3万名。干部的来源是我们的军队,复员军人将被派去担任城乡的领导工作。培养干部的工作委派给了康生。如果考虑到,在上海—南京战场上我们有90万人,武汉—广州战场上也有90万人,西安战场上有30万人,这么一大批经得起战

---

① 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应是林伯渠。——编注

争考验、受过政治训练的战士将成为我们紧缺干部的补充力量。

关于苏联给中国的贷款

此后毛泽东转入财政问题，他问，能否得到贷款和印刷纸币的纸张。他说他们的白银不超过500万美元，他们想在三年内得到总额为3亿美元的白银(主要用于发行硬通货)、石油、原料、设备及其他的贷款。他们想从1949年起借贷这个数额，每年1亿美元。

谈到贷款，毛泽东说，3亿美元是我们需要的，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借给我们这个数目，或者多一些，或者少一些。即使不借，我们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我们并不要求无偿援助，因为这样就是中国在剥削苏联。我们请求的是支付相应利息的贷款，这些款项中国将来能够支付。这一点对中国的工人来说很重要，他们会知道，贷款是要归还苏联的。

毛泽东继续说，至今我们得到的武器是无偿的。但是我们清楚，生产武器需要苏联工人付出劳动，他们的劳动是应该补偿的。

我们需要的武器清单暂时不会扩大，用于目前作战的武器已经够用。但是还得说明，我们需要3 000辆汽车和汽油。对这些以及所需的其他汽车和物资我们已经拟定了请求书，但不知道价格是多少，其总价是否包括在贷款中，用什么方式来偿还贷款，我们也不清楚。如果贷款解决得顺利的话，我们将派一个代表团去莫斯科签订有关协议。为处理贷款问题，我们还想派一个工作组到苏联了解苏联银行的工作。

关于印刷纸币的纸张问题，我们需要1万吨纸。

中共中央1949年2—3月的计划

此后毛泽东转入叙述中国共产党1949年2—3月的计划。在这段时间要熟悉天津和北平的行政工作，对傅作义的部队进行改编，把领导机关迁往北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3月份上半月)，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开始工作，可能与国民党政府开始的谈判。尽管我们事先知道，我们提出的谈判条件，特别是关于战犯问题，他们是完全不能接受的。战犯名单中我们也将日本战犯列入其中。

计划还规定，4月份上海—南京战场上90万大军转入进攻，夺取南京附近的一些城市。4月份计划夺取南京，可能此时林彪的部队将到达汉口，并占领了它。那时陈毅的部队应该占领西安。

3月份召开妇女代表大会，4月份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

关于青年运动

毛泽东说，青年运动组织分为两个时期。首先，召开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大会，然后建立全国青年联合会，其中包括各青年组织(大学生联盟、农民青年联盟等)。

我提出如下一个问题：上次会谈时他们同意菲利波夫关于青年工作，特别是组织类似中国少年爱国者联盟的广大青年联盟的意见，而现在在他们陈述的计划中，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是几个青年联盟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共青团类型)、马克思主义青年联盟、基督教青年联盟、大学生联盟等组成的联合会。

在存在这样的组织的情况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的进步青年会被孤立，其他联盟仍

然掌控在资产阶级政党手里,可能成为他们的后备队。

我问,他们是否考虑到各联盟成员的资格。毛泽东回答说,将来他们准备取消基督教青年联盟,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青年组织联合会,大学生联盟保持独立。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周恩来和任弼时的支持。

我说,如何对待青年组织,他们当然看得比较清楚,但是我还是请他们好好考虑,全面地讨论这个问题,以便正确执行斯大林同志的建议。毛泽东和其他同志都同意这一看法。

会谈到此结束。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78－88

№16477

苏联部长会议的命令:关于组织对东北的援助

(1949年2月6日)

苏联部长会议1949年2月6日第1550рс号命令

1. 责成汽车拖拉机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和石油工业局在10天之内在И. В. 科瓦廖夫同志指挥下按附件内容将储备的汽车、汽车备件和器材发送到中长铁路。

责成苏联对外贸易部通过全苏联联合公司全苏远东外贸处按现有的贷款供货出境方式与汽车、汽车零件和器材供货商进行结算。

允许苏联财政部按1949年度对外贸易部根据收支平衡而规定的拨款形式支付这笔贷款。

2. 责成苏联财政部给交通部拨付去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经费578万卢布,从1949年度苏联部长会议准备金中支出,包括387.9万卢布苏联外汇,其中412.5万卢布用于购买装备。

允许对外贸易部和国家银行在И. В. 科瓦廖夫指挥下于1949年向东北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供经费相当于240.1万卢布的东北元。

3. 责成对外贸易部与中国“东兴”公司签订关于以商品供货方式清偿外汇支出和苏联外汇支出的协议,全部开支由苏联机构按任务单完成情况、规定期限和货物品种进行结算。

4. 保留И. В. 科瓦廖夫同志东北工作组全体人员出差期间在苏的职务以及苏联部长会议1948年5月17日第5970号,1948年8月31日第12138号及1948年10月20日第15188号命令规定的权利、优惠和外汇及卢布的支付条件。

5. 允许 И.В.科瓦廖夫同志根据他们去东北完成的工作量确定固定的外汇工资标准，此工资标准也适用于在苏联远东地区工作的专家。

6. 允许 И.В.科瓦廖夫同志工作组人员东北出入境手续简便，只须凭 И.В.科瓦廖夫签字名单即可。

7. 责成将军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予 И.В.科瓦廖夫援助，为工作组提供通信工具以及翻译、司机、医务人员和医疗器材，以保证工作组全体人员健康。

8. 责成 И.В.科瓦廖夫同志在一个月之内提出各生产领域和国民经济规划方面所需要的参考书和技术文献，以保证工作组专家、顾问的业务工作。

附件：

И.В.科瓦廖夫同志指示发送东北的器材明细表

	单 位	数 量	偿还来源	供货单位
ГАЗ-67 型汽车	辆	15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汽车配件	套	3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零件箱、盖	套	5	准备金	化学工业部
胜利牌汽车	辆	15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汽车配件	套	2	准备金	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
零件箱、盖	套	3	准备金	化学工业部
车用汽油(容器装)	套	50	准备金	石油工业部
车用汽油(容器装)	套	5	准备金	石油工业部

АПРФ，ф.3，оп.65，д.444，л.32-34

№34405

斯大林致米高扬电：关于新中国政府的组建

（1949年2月7日）

绝　密

И.В.斯大林1949年2月7日给А.И.米高扬的电报

米高扬：

对您的第76号电报的复电。

无疑，现在就需要组建今后各部的雏形。

斯大林

1949年2月7日

АПРФ，ф.3，оп.65，д.606，л.98

№16478

米高扬与中共领导人会谈纪要：关于经济政策问题

（1949年2月7日）

绝　密

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政策问题

毛泽东请我与政治局委员们谈谈经济政策问题，他们将对中国共产党今后的经济政策计划作详细的通报和阐述。

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听了两组政治局委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一组是刘少奇和任弼时的经济政策问题，另一组是任弼时和朱德的实际经济问题（贸易、财政）。

然后我们在毛泽东那里与政治局其他委员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讨论。

必须指出，中国同志们都是根据准备好的，显然是经毛泽东同意的书面报告作汇报的，因为他们在会谈时总是看着报告，尽量不脱离书面材料。

还要指出的是，与我们一起座谈的政治局委员对一般政治问题、党务工作、国际问题、农民问题和一般经济问题都非常内行，很有自信，可对经营管理问题却是知之不多。他们对工业、运输业和银行的概念模糊，例如，没有掌握战后国民党没收日本资产的任何材料，不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外国企业是哪些，这些企业属于哪些国家，也没有关于在中国的外国银行的活动的资料，因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他们对上述经济领域中的问题没有具体计划。他们还不了解哪些企业属于官僚资本，是他们想要没收的企业，有多少企业在解放区，情况怎样。他们不清楚北平和天津的银行在解放以后都留下了什么。他们所有的经济计划只是一般指示，缺乏具体指导，甚至在他们控制下的解放区也是这样。他们处在闭塞的农村，脱离现实。

关于1949年的预算(只限中国的解放区)

由于在解放区流通的货币价值下跌，价值还不确定，因此他们制定的预算不是以货币来进行的，而是通过小米来换算。根据这个预算，1949年所有的国家开支是1 500万吨小米，而收入仅1 000万吨小米，亏空500万吨小米。按他们的结算，赤字的数额是2.5亿美元(按实际时价)。他们说，财政赤字可以通过下列三个来源弥补，但没有说明弥补多少和通过哪个来源。

1. 增加城市的税收，因为他们认为农村中现行的税收已经很高了，虽然没有国民党的高，但也只是稍低一点。但城市的税收比国民党地区低好几成。除此以外，在解放区自解放之日起一年半内没有收过税，这是为了不引起城市居民的反感。

2. 发行内债，按他们的意见，收效不大。

3. 借外债，他们笑着说，不能向美国借，只有向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借。

货币流通

1948年12月3日他们通过了决议，现正在把解放区(东北除外)流通的、已经得到不同程度贬值的货币兑换成统一的货币：山东省100旧元折算成1新元，中国西北部2 000旧元折算成1新元。这样兑换所有钱币需要284亿新元。如果上述预算赤字不弥补，新币的发行量应该是1 000亿元，即一年之内贬值了2/3以上。总之，他们肯定地说，尽管共产党发行的纸币贬值得较快，但贬得仍然不多，比起国民党的钱币，居民更乐意接受。

现在感到印制纸币非常困难，这是由于缺少纸张和油墨。他们认为，一年需要1万吨纸，其中7 000吨自己生产，3 000吨请求苏联提供，还要苏联提供必需数量的油墨。

经济成分

他们认为在解放了的中国有下列经济成分：

1. 国营成分；

2. 合作社成分；

3. 国家资本主义成分；

4. 私人资本主义成分；

5. 带实物交换形式和半父权制交换形式的小商品成分。

小商品经济占最大比重。合作社经济占一小部分,但它的发展前景是良好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比重也很小,但有可能增大比例。他们认为,国营经济在没收官僚资本以后将占整个经济的10%左右。他们也认为,尽管国营经济比重不大,但它起主导作用,铁路、轮船、煤矿、冶金工业和银行都属于国营经济。东北的情况不一样,整个工业占53%,而国营工业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47%。

在会谈的过程中终于弄清,他们没有具体计划,指的是他们准备掌握哪些企业、大银行、大工业等作为国家的经济基础。他们没有关于私人银行和国家银行数量的资料。

他们指的国家银行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大银行,这些银行在全国都有分行,分行分布在哪里,交易量多少他们尚不清楚。

经济政策执行中的错误

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他们指出了自己的如下缺点:

1. 国营组织和合作社商业组织之间存在竞争。

2. 这些组织和私人商业组织存在不正当的交易。

对于这些缺点,他们的解释是对自己的干部的培训工作做得不够。

在夺取城市的时候也犯了错误。比如,他们将没收的商业企业交给了工人,工人们则私分了这些企业的商品,出售了它们,拆毁了房屋。

土改时在农村也犯了错误——没收了地主和富农的资产,也没收了中农的全部资产,不给他们留下最低限量的资产。

刘少奇说,只有在取得完全的军事胜利和发展重工业之后,他们才会开始将农业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在此之前他们将仅限于在农村建立生产和消费合作社,其基础是在保留生产资料和土地个人所有的条件下共同耕作土地。

关于没收资本

他们认为,在最终取得军事胜利之前,应立即没收的只限于那些属于中国军阀的企业,没收所谓的官僚买办资本、为支持国民党而建造的具有军事性质的外国军事企业以及港口和铁路。

关于中国和外国的大型非军事性的资本主义企业,他们认为只有在战争取得胜利,新的国家政权得到巩固以后,根据国内外的局势才可以考虑没收。

关于对待外国企业的态度

刘少奇问,对外国银行、煤矿,特别是属于英国的银行和煤矿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将来中国同志们打算对外国企业采取如下措施:

1. 没收;

2. 监督;

3. 赎买。

对盐、烟草和酒将实行国家垄断。

两种危险的倾向

在讨论中国共产党经济政策的时候，刘少奇说，在党内，甚至是在主要的共产党干部中有两种危险的倾向：

第一种倾向，个别同志希望发展资本主义，欲将中国变为一般的资本主义国家；

第二种倾向，是“左”倾冒险主义倾向，认为已经可以马上建设社会主义，不考虑中国有无实现这个目的的经济基础。

刘少奇没有指明这些同志的姓名，他说，党将与这些倾向作斗争。

过渡时期

刘少奇说，我们认为，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新民主国家更长一些。只有依靠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才能顺利将我国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帮助表现在三个方面：

1. 传授经验；
2. 提供文献、教材和技术情报；
3. 提供设备供应这种形式的贷款、货币贷款和实行经济互助。

1949 年 2 月 7 日毛泽东对中国经济政策做了概括，他说，中国工业只占 10%，90%是个体、分散的半宗法式的经济，这些经济在解放前受到三座大山即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

中国有 9 000 万农户，3.6 亿农民，其中 10%是贫农，他们是工人阶级的同盟军。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我们给农民分发了土地，但没有为他们提供急需的商品，可是这些商品我们自己也很少。

如果我们不发展工业，我们无法供给他们商品，这意味着我们会失去对他们的领导。

苏联在向我们提供热情的支持和帮助，对此我们很高兴，但只靠外来的帮助，是不能胜利的。因此，为了维护工人的利益(通过工会；通过国家对商业的干预，以便降低物价；通过向工人和城市居民出售粮食、燃料和商品)和农村贫农的利益(通过吸收他们参加生产和消费合作社)，我们也应该允许私人企业得到发展。

我们打算使用孙逸仙提出的两个口号：

1. 用控制达到节制资本；
2. 排挤危害人民的高利贷资本。

毛泽东说，我们认为，可以而且必须加强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自由竞争。因为我们在经济方面还不强大，还落后，我们应该利用私人资本，但不能犯急性病。

俄国在革命前有相对发达的工业和 7 万多公里铁路，而我们 4.7 亿人口的中国只有 2.6 万公里铁路，因此我们的过渡时期要比苏联长，苏联在废除专制制度 12 年以后才创造条件消灭了作为阶级的富农。

为了缩短过渡时期，我们需要经济援助。我们认为只有从苏联和新民主国家才能得到这种援助。我们需要为期 3 年(1949—1952 年)、每年 1 亿美元、总额为 3 亿美元的付息贷款。我们也想得到用于购买部分设备、石油和其他商品，以及用于稳定人民币所必须的白

银的借贷。

АПРФ,ф. 39,оп. 1,д. 39,л. 89 - 95

№16479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新经贸合作的谈判

(1949 年 2 月 7 日)

机　密

今天我和伊夫琴科[①]接见了中国代表,开始关于苏联和新疆的经济贸易合作的谈判。

着手工作时,刘泽荣声明,苏方提出的建议已经及时地转交给张将军[②]。张将军在南京逗留期间,行政院院长孙科同意他参见谈判。刘泽荣肯定地说,中方接受苏方的建议作为谈判的基础。今天在座的代表团全体成员,刘泽荣说,希望讨论苏联的建议,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在开始谈判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中方代表在对我们提议作补充和修正的时候,希望在协议中规定他们的权力：

一、在苏联境内进行贸易业务；

二、限制苏方自由选择客户；

三、调整商品的进出口；

四、在新疆的苏联贸易组织应服从中国法律；

五、在股份公司中确定优先地位。

对我们建议的修正和补充参见附注。

我们对中方代表建议的实质提出了概括性的意见,认为应适时地声明,中方的建议离同意进行谈判的条件相差甚远。例如,他们提出要求严格限制苏联和新疆商品流转的正常发展。关于经济合作问题,中方忽视苏方关于在均等原则基础上建立股份公司的建议,这一点背离了张将军的初衷。

① 伊夫琴科,时任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商务代表。——编注
② 即张治中。——编注

在回答这一点的时候，中方代表声明，他们是根据中国现行法律提出建议的，但他们希望在谈判过程中达成共识。

中方代表强调说，他们将竭尽全力加快谈判过程，并建议进一步讨论双方提出的条件。

我们并不反对他们的这一建议，但是我们指出，中方代表在会上提出的建议需要时间来研究。

双方约定，下次 2 月 10 日见面时，中方代表团应准备好与外国签订协议书直接有关的中国法律的主要资料。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A. 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附件：

中方的补充和修改

一、贸易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建议：

“双方应遵守：

(1) 双方国家法律要求的禁止和限制。

(2) 正常发展新疆经济所必需的限制。

(3) 海关手续。”

修改第二条和第三条，注意下列要求：

(1) 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服从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2) 在新疆和苏联进行贸易业务的中方机构是：政府贸易机构、依法注册的贸易公司和商业联合企业。

(3) 双方签订贸易契约手续及其条件不应违背当地的现行法律，如果在新疆的交易发生争议，则通过中国法庭解决。

(4) 新疆的商品进出口应服务于新疆经济的正常发展和人民的生活。

补充第四条：“双方在关税税收方面的措施应基于互惠原则。”

二、经济合作问题：

在第一条中补充的新内容：

两大股份公司应按中国法律建立。股份公司以及职工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解释“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的概念，开列出苏联所指的所有金属。

第二条,该条指明:

(1) 股份公司的活动地区范围应由双方商定。

(2) 勘查和勘查成果的研究工作应由中苏两方共同进行。

第三条补充:

“交给股份公司任何一方的物品和贵重物品,计入股份资本支付份额,其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这些物品和贵重物品的评价由双方共同进行。”

对第四条做下列补充:

(1)“正常利润”的概念要由双方确定。

(2) 收购的金属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3) 苏方意欲出售的部分收购石油产品,首先应提供给新疆省政府。

第五条,修改增补:

(1) 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的职务由中方充任。

(2) 各级股份公司的职员人数由双方平均充任。

(3) 调整两大股份公司业务的规章制度应由双方制定和商讨。

第六条,修改并用下列提法:

(1) 股份公司的业务活动期限定为20年。

(2) 双方商定在业务活动期限结束之后再处理股份公司的资产。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2, п. 255, д. 22, л. 55-60

№16481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关于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

(1949年2月11日)

机　密

今天在与中国代表的谈判中涉及了经济问题。

中国代表一直坚持自己的立场,因此这次会上没有达成一致的决议。

中国代表特别坚持的是下列几个方面:

一、他们要求向他们提出苏方打算勘查和开采的金属和矿物的明细表。

二、为取得中方配合，告知他们在新疆哪些地方可以勘查和开采金属和石油。

三、中方代表建议取消我方提出的允许苏方向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勘查开采公司采购各种产品的权利。中方代表提出，这种权力应双方共有。同时他们坚持“收购金属的等级和数量应由双方商定”。

换言之，中方希望事先商定好，苏方和中方准备收购哪些金属，比例是多少。中方代表指的是，他们收购到的商品不仅用来满足新疆内部的需要，而且还可能运到中国的中部地区。

四、中方希望我方事先同意共同确定转让股份公司的设备和物资的价格和名称。

五、然后中方引用了目前的法律，提出由中方任命股份公司的常务董事和董事长。

刘泽荣此时强调指出，他们所提出的要求并不违背张将军的建议，因为中方始终认为，董事长和常务董事都可参见股份公司的行政机关。

双方交换意见以后，中方提出了新的建议。他们同意将董事长的职位让给苏方，自己保留常务董事的职位。

六、对股份公司业务活动的期限问题进行了争论。中方代表不肯让步，根据采矿工业法，类似的股份公司活动年限不得超过20年。

由于出现分歧，决定不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合作条件问题。中方代表允诺下次会见之前再考虑自己的建议。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A. 萨维利耶夫(签名)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2, п. 288, д. 22, л. 63－64

№16483

萨维利耶夫与中国代表会谈备忘录：苏联与新疆经贸合作谈判

(1949年2月15日)

机　密

今天我们和中方代表继续就贸易的初步条件补充进行了讨论。

中方代表在维护自己观点的同时，最终放弃了他们以前提出的一些建议，他们用下列

提法表示接受初步条件：

一、苏中双方有义务促进苏联和新疆之间贸易扩展，除两国法律明令禁止和限制外，对商品进出口不做禁止和限制。

二、贸易业务通过苏方在新疆的商务代办处和苏联外贸机构与中方的商业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和商业公司来实现。

三、苏联在华的商务代表处的权力和作用适用于苏联驻新疆的商务代办处。

在新疆进行贸易业务的其他苏联外贸机构及其职员应在当地遵守中国法律和政府法令。

四、商务代办处和苏联的外贸机构有权在新疆地区进行贸易业务。

商品的收购和出售条件由买卖双方自由协商决定。

在新疆贸易中发生的争议应通过第三国法庭或中国政府法庭解决，但第三国法庭应按中国法庭组织。

五、双方应彼此履行海关手续。

向苏联贸易机构征收的进出口关税和税收以及新疆地区的营业税不应高于、重于新疆政府贸易机构、商业联合企业、公司和商人交纳的税款。

六、在新疆出口商品时双方应以正常发展新疆经济的利益以及新疆人民的利益为重。双方应对这类商品交换给予最大的优惠。

七、贸易协议的期限为3年，可考虑延长。

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

A. 萨维利耶夫(签名)

文件送：收件人、档案室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2, п. 288, д. 22, л. 68 - 69

№16484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苏联领事馆和新闻记者停止活动

(1949 年 2 月 16 日)

受莫斯科的委托，请向毛泽东口头转达下列事项：

“苏联政府已向在北平、天津、哈尔滨、沈阳及满洲里的苏联领事发出了指示。

鉴于我们与中国解放区的民主政权机构没有建立外交和领事关系，鉴于解放区民主政

权机关要求所有外国领事馆在建立正常的外交和领事关系之前停止活动，建议您：

1. 在收到特殊指示以前，在中国解放区停止一切正式的领事活动，把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看作与此无关的个人。

2. 与当地民主政权机构非正式关系的联系，必须在相关民主政权向您提出了请求或受外交部专门委托的情况下由领事或副领事处理。

3. 负责哈尔滨、天津和其他解放区苏联刊物出版工作的中国公民，必须经过领事挑选，他们应该到当地的中国行政机构妥善地办理刊物的登记工作。实际的出版工作仍由苏联公民负责。

4.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应该停止自己向中国解放区的出版社、报刊和广播电台发送信息和文章。

塔斯社分社和苏联新闻局在接受民主政权的要求时，必须与他们谈妥，来自莫斯科的苏联信息要转交给当地民主政权的相关机构，并由他们分送给中国的报社、出版社和广播电台，并将收集到的中国政权机构有关信息转送到莫斯科。

5. 在中国解放区的苏联新闻记者应该正式停止履行自己的职能，实际上他们只能根据来自莫斯科的课题和有关民主政权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写些通讯报道。”

执行情况请电报告知。

菲利波夫

送：波斯克列贝舍夫同志

АПРФ, ф. 45, оп. 1, д. 330, л. 129－130

№16485

罗申与薛岳会谈纪要：关于调解国共冲突的前景

（1949年2月20日）

摘自H.罗申的工作日记
1949年4月4日
第515号

机　密
文本第2份

今天我对薛岳做了礼节性的访问，此人是在重庆认识的。

会谈中，薛岳诉说了他出任广东省省长以后遇到的许多困难。由于日本侵略和国内战争，过去繁荣的广东给后人留下的东西不多了。工业衰落，原料和粮食不足。北方流亡者大量流入和金圆券灾难性的贬值使局势变得更加严重。大家都对尽快建立和平寄予希望。

薛岳问我怎样评估中国的和平前景，是否愿意尽快促进中国实现和平。我根据苏联政府关于大国调停的答复对他说，和平调解中国内部冲突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不受外国干涉的中国内政取得和平的道路是最理想的。苏联人民欢迎中国人民尽快实现和平。

薛岳声明，他完全同意苏方的观点。

我问，我们的商务代办处代表如果来广东的话，是否能与当地的实业界开展贸易活动。薛岳回答说，这种可能毫无疑问是存在的。他本人竭诚欢迎苏联和中国南方开展贸易业务。

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参加了会谈。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罗申(签名)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3-4

№16486

罗申与李宗仁会谈纪要：关于中国政治局势

(1949年2月21日)

机　密

今天，在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我应邀对他进行了第一次访问。

李问，我在广东就职后，贵使馆在新地方有否感到不便。我感谢李的关照，说大使馆安置得还不错，就是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住房有些紧张。外交部答应解决，可是已经过了两个多星期，至今尚无结果。

李说，他将指示外交部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我问，代总统准备在广州待几天。李答，2月22日他准备飞往桂林，然后在2月23日取道长沙和汉口回南京。

由于当地报刊刊登的关于中国政治事件的正面和反面的消息很多，以及本人暂时没有

与中国政府官员接触，我慎重地请李代总统谈些实际情况。

李代总统很高兴地表示同意，并谈了下列情况：蒋介石离任之后，政府官员中有一小部分人企图对抗和平事业，但最终他们遭到了失败。目前，政府一致要求尽快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有关代总统和孙科之间似乎存在分歧的传闻缺乏根据。孙科同意代总统的政策，近期他将返回南京。

李代总统坚定表示了自己与中国共产党缔结和平协定的决心。他声称，和平调停的前景越来越向有利的方向发展，目前在北平的和平代表团的活动就说明了这一点。近期邵力子可能亲自与毛泽东接触。

李代总统坚决驳斥了蒋介石似乎还可能重返政治舞台的传闻，他也驳斥了有关广东和广西之间似乎存在着严重分歧的说法。

谈到乌鲁木齐的谈判，我指出，有消息说，中国代表团对苏方提出的许多条款持反对意见，这会使谈判过程复杂化，时间延长。我强调指出，顺利进行谈判符合苏联、中国两国的利益。

会谈持续了30分钟，参加会谈的有苏联大使馆参赞瓦西科夫和李宗仁的私人顾问甘介侯。

苏联驻中华民国大使

H.罗申(签名)

文件共4份，送：维辛斯基同志、佐林同志、第一远东司、档案室

АВПРФ，ф.0100，оп.42，п.288，д.19，л.9-11

№16487

苏联外交部给中国使馆的照会：中国领事馆进行违法活动

(1949年2月27日)

苏联外交部获悉，中华民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总领事和中华民国驻赤塔领事以他们机关的名义呼吁中国公民离开苏联返回中国。从呼吁书中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号召不仅针对中国公民，也针对无国籍人士、中国公民家属的苏联公民以及汉族苏联公民。中国政府的领事们同时建议苏联公民将苏联护照归还给当地警察机关，要求发给他们收回苏联护照的收据。中国领事们允诺凭这些收据发给他们返回中国的护照。

我受委托,提请中国大使馆注意,不允许中国驻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的总领事们和中国驻赤塔的领事进行类似的违背国际法律准则的活动,并采取措施,立即让中国的正式代表们停止一切非法活动。

АВПРФ, ф. 0100, оп. 41, п. 276, д. 18, л. 15